

年度学科综述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郭 强

2018年河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看较往年大体相当,但从质量上看,注重研究视阈的多样性,既有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宏观层面的学理性分析,又有对经济哲学、劳动哲学、共产主义微观层面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与理论内涵的深度分析;既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鉴别分析,又有紧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从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李维意、赵英杰在探讨马克思世界交往的本质、特征及功能^[1]时认为,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和深远的实践意蕴。从本质来看,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具有社会实践本质、历史地理本质、政治经济本质、思想文化本质;从特征来看,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是时间性与空间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从功能来看,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时代,形塑了世界市场的空间,推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人类解放的基础。深入研究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对于理解“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

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都具有重大意义。

宫敬才对马克思逻辑与历史有机统一方法真相进行了还原。^[2]认为,逻辑与历史有机统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客观存在并运用的叙述方法。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一方法受到了挑战:国内学者的误解和否认,国外学者的否认、反对和批判。这样的理论情势要求我们回归马克思文献,把真相还原出来。马克思对这一方法的表述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种表述形式与恩格斯对这一方法的概括即“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有所区别,但内容一致。这一方法中的“逻辑”指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逻辑、组织逻辑、技术逻辑、法权逻辑、人学逻辑和历史逻辑。这一方法中的“历史”指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层面的历史及其具体化,如产业史、劳动立法史和雇佣劳动形成史等。这一方法的神妙之处在于,展叙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逻辑是“艺术的整体”,但它源自和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发生的历史,是这一历史的科学反映和理论表达。

此外,宫敬才还探讨了马克思独具特色的经验哲学方法。^[3]他指出,目前学术界在研究马克思思想体系形成问题时,仅仅关注了阶级立场和哲学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向,而忽略了方法论的根

本性转向, 结果是其独具特色的经验哲学方法被抛入视野黑洞之中。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主长期探索的结果, 与马克思思想体系一同成长。其主要内容是: 充分的占有材料、分析衍化过程、探寻内在联系和关注细节。独具特色的经验哲学方法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缺失这种方法的马克思思想体系具有不完整性。鉴于此, 马克思独具特色的经验哲学方法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教材、专著和论文中应有其理论表达的机会, 秉有天然的存在权利, 占有相应的理论地位。

种项戎探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新唯物主义本体论问题。^[4]他认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旧唯物主义, 提出了新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则。从本体论的视角梳理马克思的这篇文献, 可以看到马克思在与以往哲学不同的维度上重建了本体论, 即实践活动本体论, 这种本体论是对于费尔巴哈感性本体论的超越, 并对唯物史观的建构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马克思的经济哲学

宫敬才在其专著《重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中对马克思的经济哲学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 并提出了一系列的独到见解。^[5]认为, “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是有待确立的新提法, 该提法背后存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历史的重大理论问题。现在的情况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教科书, 都没有让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获得表示存在的机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 历史唯物主义占有“半壁江山”的地位, 但难见它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及其结果内在联系的揭示, 似乎马克思哲学的形成过程及其结果只与哲学研究有关, 与政治经济学研究无关。这样的事实与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心路历程剖白并不一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 哲学方法论内容如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统一占有重要地位, 但作为整体的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联系性内容却

难见踪影。在作者看来, 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面临的理论情势本身就是应该提出并加以探讨的问题。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无视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客观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在马克思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是否存在经济哲学传统? 说它存在的根据是什么? 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重建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的意义是什么? 对此, 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学科)研究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以期使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被重新建立起来, 让原生态的马克思经济哲学不再被人为地遮蔽。

作者认为, 从一般意义上说,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包含必不可少的哲学性内容, 否则, 就不能成其为一个学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皆然。这样的哲学性内容包括: 人学前提理论、经济哲学本体论、经济哲学方法论、经济哲学认识论、经济哲学价值观和经济史观。马克思的文献中确实客观地存在经济哲学性内容。这样的内容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传统, 承认这种传统的客观存在并加以继承和发扬, 我们就能得到巨大的收获, 一种理解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新思路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概括地说,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哲学的政治经济学或叫哲学经济学, 马克思的哲学是经济哲学。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理解问题, 经济哲学从属于政治经济学, 服务于政治经济学; 从经济哲学角度理解问题, 政治经济学从属于经济哲学, 服务于经济哲学。两个角度的理解都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它们的真正目标或说任务是准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原生态的思想, 进而准确全面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历史。这里切忌单一学科化的理解问题并把这种理解孤立化、固定化。真要如此地理解问题, 我们就不能从苏联僵化的理解模式中解脱出来。

于是, 作者提出, 在马克思那里, 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二者之间既具有密不可分的历史关系, 又具有生死攸关的逻辑关系。两种关系的客观存在向世人表明,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哲学都具有独树一帜的特质, 两种关系的有机结合, 正是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从目前教科书的情况看,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已被抛入人们的视野黑洞之中。面对这种状况, 重建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的意义如下。第一, 重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

具有存在论意义。第二,把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抛入视野黑洞是按苏联僵化的理解模式对待马克思文献的必然结果。第三,马克思经济哲学既与政治经济学血脉相连,又是真正意义上的领域性哲学,它与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历史哲学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是批判美国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哲学理念的有理、有力和有效的武器。

宫敬才还研讨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存在形式问题。^[6]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历史有30余年,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历史是20年。世纪之交从经济哲学研究发展到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是重大进步,但“瓶颈”性问题凸显出来: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仍未得到重视和研究。回答好这一问题,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才能深化一步,其体系性架构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命题中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哲学。马克思经济哲学存在形式承载的内容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生变量,准确理解前者,才能对后者做出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的理解和阐释。

宫敬才还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矛盾性质做了阐释。^[7]他指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理解为用于生产的物不同,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是矛盾集合体,马克思为我们揭示出来的是五种矛盾性质:表现形式与实际内容之间的矛盾、商品生产与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财富生产与其内在本质的矛盾、消费中节约与浪费之间的矛盾和目标追逐与其社会历史性后果之间的矛盾。出现于我们面前的资本矛盾性质是一种证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哲学性质,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资本的理解更深刻全面,更能逼真地再现资本的本来面目。

另外,宫敬才还研究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方法论,探讨了《资本论》中让当事人出场说话的方法。^[8]认为,以往和现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不认为让当事人出场说话是方法,这与《资本论》运用该方法的事实不一致。作为方法的让当事人出场说话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内在要求,是对劳动者表达自身诉求权利的有力保障,也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让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当事人悉数出场说话,借此使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全面厚重的经验事实根据。让当事人出场说话是马克思独具特色的经验主义哲学方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宫敬才发文又深入阐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方法及其性质。^[9]文章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内容丰富且成体系,概括性提法是“解剖典型”,理解方法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理解方法是马克思主体、客体及二者之间辩证关系这一哲学分析框架的方法论化,实质是主体性。理解方法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科学方法论主张判然有别,主体性质、批判性质、过程性质、追溯性质、革命性质和整体性质是题中应有之义。鉴于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专著和论文中,应给予理解方法以表示存在的机会。

三、马克思的劳动哲学

宫敬才提出并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0]他认为,通行哲学教科书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表述似乎已成定论,然而检视马克思文献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文献便可明了,这些表述有缺陷,大量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没有得到表示存在的机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命名为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包括: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劳动哲学本体论、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工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围绕如何认识社会历史问题而展开,结果具有方法论性质。劳动哲学本体论是马克思思想整体的哲学基础,在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完成了哲学本体论思想史中的革命且大功告成。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劳动为本体来看待人及其历史,就人论人地理解马克思人道主义理论是错误的。工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劳动的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是马克思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艺特点的理论成果之一。

此外,他还探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劳动范畴的性质。^[11]认为,相关教科书对马克思劳动范畴的界定有失公允,大量内容被抛入视野黑洞之中。回到马克思原生态语境,依据文献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文献理解劳动范畴就能发现它具有:

原型性质、历史性质、预设性质、创造性质、受动性质、技术性质、组织性质、法权性质和基础性质。这些性质客观存在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构成的主、客体关系之中，是劳动范畴的题中应有之义。

黄云明、王斌研究了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下的法律方法论问题。^[12]他们指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劳动本体论，其方法论是劳动辩证法，历史观是劳动历史观。马克思强调从劳动出发认识世界，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中认识世界，劳动历史观不是从物质出发把握社会，而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即劳动出发认识社会，不是强调物质决定社会生活，而是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即劳动决定社会生活。马克思在法律方法论上的革命不是将法律确定为精神现象，强调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而是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即劳动是人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决定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所以考察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法律活动，要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即劳动出发，劳动是解开法律现象奥秘的金钥匙。

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

代俊兰对《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进行了再解读。^[13]她认为，《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三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是“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事业。中国共产党人笃信笃行《共产党宣言》的理想信念，既从理论上推动共产主义理论与时俱进，更从实践中推进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田海舰探讨了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价值蕴涵。^[14]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一生从事全部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的主题，是《共产党宣言》所昭示的“初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是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和实

践追求。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价值蕴涵，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对于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五、西方马克思主义

李进书、侯雨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团结”思想进行了阐述。^[15]他们提出，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团结有助于弱势群体争取平等权利，有益于人们解决公共事件问题，有利于尊重并维护社会多样性。但团结也会遭遇多重阻碍，如权威借助话语伎俩来分离弱势群体的团结，人们因迷恋各自利益而轻视互助合作，文化战争导致冲突。同时他们也呈现了团结的有利条件，如深厚的共同文化是团结的基石与持续的保证，共同风险迫使人们增进团结，既有的共同体为团结提供了丰厚经验。

李文英、王薇在研究比较教育学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16]时指出，比较教育学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注重社会冲突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主张学校教育是对社会权利关系的再生产；运用“中心—边缘”的二元分析法。该范式采用全球化的研究视角，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再生产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研究工具。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丰富了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推动了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加深了国际理解，促进全球范围的教育公平；但也具有偏激和冒进的倾向。

六、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杜运辉探讨了张岱年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17]张岱年是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坚持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综合创新的态度，提出涵盖方法论、知识论、本体论、价值论、人生论、文化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蓝图，并在《中国哲学大纲》《天人五论》中进行了初步实践。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出“统一”与“分殊”相辉映的鲜明特色，这是其成为中国现代思想主潮的重要

因缘。当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继续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照着讲”与“接着讲”相统一的基本立场,汲取转化、批判超越张岱年等人的理论贡献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的必要前提和内在环节。此外,他还研究了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阐释。^[18]认为,张岱年哲学是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成果。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论、认识论、辩证法、人生论等做出了创造性阐释,鲜明地体现了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理论特色。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比较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人生哲学和文化哲学,这对于完整理解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张岱年毕生信持马克思主义,老而弥坚,这种精神在当下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

张伟着重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问题。^[19]他指出,儒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儒学现代性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紧密衔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组成部分,其中即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能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割裂。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价值塑造、道德修养、伦理认同及国家治理、法制建设等诸多方面,都需要现代儒学的智慧与资源。

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田海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和人类精神的精华的问题。^[20]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资本主义社会应该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无产阶级应该向何处去?面对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众多有识之士进行了不懈探索。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探索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悲惨命运、实现自身解放的现实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

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从此,无产阶级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一大批民族民主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是人类精神的精华。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这样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世界。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对政治、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作用。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范围的存在。作为“千年思想家”,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并没有“死”。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其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历史功绩和现实影响并没有过时。正如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所言,“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能被超越的”。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也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马克思是唯一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邓小平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穿越越世,具有真理性的力量,足以鉴古知今、资政育人。

王雅丽论述了马列主义公共精神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21]书中指出,现代公共精神是工业革命和理性启蒙运动以来的产物,是现代性的精神文化特质。公共精神概念源自于西方,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为公共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人的主体性、公民意识和公共性是公共精神形成的主观条件;在西方,公共精神经历了群体性公共精神和个体性公共精神两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公共精神虚伪性的基础上,建构了以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发展为主要特点的类公共精神;列宁结合苏维埃俄国实际,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共精神思想。公共精神问题存在于现代化进程之中,渗透到社会生活和公共交往的每个角落,是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随着当代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生活交往由“熟人模式”向

“陌生人模式”转变,培育中国特色公共精神日益迫切。该文在梳理中西“公共”涵义、解析公共精神概念的本质、特征和功能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公共精神是自我意识与公共生活之间的理性认知和良性互动关系的总和,是人们对于公共利益、公共价值的认肯和守护,它主要通过公民对于公共生活的关怀之情、参与意识、公民文明风范以及社会的公共价值理念体现出来。高扬公共精神对于公共生活具有规范、批判和建构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的公共精神研究始于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探索,主要经历了公共精神的滥觞、高涨和曲折发展三个阶段。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正加速向现代化和公共化转型,丰富多样的公共生活为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而人的主体性、公民意识和公共性日益彰显是当代中国公共精神形成的主观要素;人们对于公共生活之公共价值本质认知的变化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精神。在经济全球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公共精神培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状况不容乐观;公共精神培育必须从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坚持政府主导培育和公民自觉涵育相结合的方式和途径。总之,我们要正视社会转型期的公共精神培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公共精神培育任重道远。

周静莉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旅游的本质内涵^[22]时认为,当今时代,旅游产业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迅速发展,旅游规划、旅游开发等方兴未艾,但在旅游规划和旅游开发等方面却存在着一种严重的狭隘功利主义倾向,不能说这种现象的存在与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落后无关。因此,在这种境遇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旅游的本质内涵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思考和探究就显得非常迫切与必要。基于这一目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视角对旅游的本质内涵进行了理论上的初步探讨,以期能为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点理论上的参考。

郝瑞斌、杜倩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当今世界宗教的本质。^[23]关于宗教的本质及其作用,向来众说纷纭,尤其对当代世界宗教更是如此,让人无所适从。但如果能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典,从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就能得以透视和回答。宗教的本质其坚硬的内核就是人对神的

信仰。由于人对“神”的认识是发展变化的,所以人对宗教的认识也是发展变化的,这个变化从量变到质变,最终会导致“神”及其外在表现“宗教”的消亡。

耿建涛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特质。^[24]他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劳动本位的价值核心、劳动人道主义的价值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的价值途径,与马克思经济价值观倡导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从根本上确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本质。

王传林基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和存在问题。^[25]认为,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阐明市场经济总供给价值与总需求价值非均衡的内在矛盾,揭示中国40年来经济奇迹的奥秘就在于发挥国有经济所特有的宏观经济效益,化解这一矛盾。文章从理论、实践和国际比较三方面证明我国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李维意,赵英杰.论马克思世界交往的本质、特征及功能[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 [2]宫敬才.马克思逻辑与历史有机统一方法真相还原[J].现代哲学,2018(4).
- [3]宫敬才.论马克思独具特色的经验哲学方法[J].河北学刊,2018(6).
- [4]种项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新唯物主义本体论[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6).
- [5]宫敬才.重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传统[M],人民出版社,2018.
- [6]宫敬才.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存在形式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 [7]宫敬才.马克思论资本的矛盾性质[J].社会科学论坛,2018(6).
- [8]宫敬才.论《资本论》中让当事人出场说话的方法[J].人文杂志,2018(4).
- [9]宫敬才.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方法及其性质[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2).
- [10]宫敬才.论马克思的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 [11]宫敬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劳动范畴的性质[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 [12]黄云明,王斌.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下的法律方法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13]代俊兰.《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再解读[J].河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 [14]田海舰.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价值蕴涵[J].中华魂,2018(6).
- [15]李进书,侯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团结”思想[J].学习与探索,2018(9).
- [16]李文英,王薇.比较教育学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17]杜运辉.张岱年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之建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1).
- [18]杜运辉.张岱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阐释[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8(5).
- [19]张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家现代化[J].北方文学,2018(4).
- [20]田海舰.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和人类精神的精华[N].中国文化报,2018-5-16.
- [21]王雅丽.马列主义公共精神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M].北京出版社,2018.
- [22]周静莉.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旅游的本质内涵探析[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18(2).
- [23]郝瑞斌,杜倩.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当今世界宗教的本质[J].科学与无神论,2018(1).
- [24]耿建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特质[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7).
- [25]王传林.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和存在问题.[J].经济;经济论坛,2018(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杨春娟

2018年,本学科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多维研究,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研究,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成为研究热点。

一、改革开放40年成就、经验与展望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河北学者对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宝贵经验与启示、未来展望进行了探讨。

(一) 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

王彦坤等认为,我国40年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繁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生了走向全面小康乃至现代化的“中国模式”,提供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改革开放让社会主义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和世界舞台中央,具体表现为:一是改革开放是一条强国之路: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举世公认,中国综合国力全面增强。二是改革开放是一条富民之路:人民摆脱贫困,实现温饱,走向小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成现实。三是改革开放是一条开放之路: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大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1]

冯荣认为,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一

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成功飞跃和巨变;二是推动中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社会转型;三是推动人民生活从贫穷落后向全面小康迈进;四是极大提高了我国综合国力,推动我国向现代化强国奋进;五是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2]

康振海等还对河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辉煌成就进行总结:一是这四十年,河北人民开拓创新、艰苦奋斗,正在实现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迈进;二是这四十年,河北人民告别贫困、走向全面小康,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史无前例大幅度提升;三是这四十年,河北省农村改革行稳致远,广大农民实现温饱,正在乡村振兴路上大步走向全面小康;四是这四十年,河北省致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五是这四十年,河北省致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正在实现经济从高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转变;六是这四十年,我们致力所有制结构调整,实现从“一大二公”单一公有制经济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根本转变;七是这四十年,我们致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正在得到保障;八是这四十年,河北人民致力推进依法治省,法治河北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从“人治”向“法治”社会的深刻转型正在实现;九是这四十年,我们致力文化事业发展与体制改

革,河北正在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得到更好满足;十是这四十年,我们致力社会事业发展与体制改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十一是这四十年,我们致力生态文明建设,舒适宜居的自然环境正在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正在变成现实;十二是这四十年,我们走出封闭半封闭“小天地”,成功探索出一条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河北道路。^[3]

(二) 改革开放 40 年的宝贵经验与启示

冯荣认为,40 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主要有: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改革开放大业的全面领导;二是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三是审慎选择符合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改革开放模式;四是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自主性原则。^[4]

王彦坤等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启示: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必须始终具有自我牺牲、敢闯敢试的勇气,必须始终具有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智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5]

康振海认为,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和启示: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必须具有自我革命、敢闯敢试的勇气,必须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必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6]

穆瑞丽认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有:一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体人民的聪明智慧;二是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为先导;三是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四是始终把“三个有利于”作为重要标准;五是以开放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六是既先行先试、先易后难,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7]

贾玉娥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经验启示:一是聚焦远大目标,强化价值引领,在凝聚奋进力量中实现文化繁荣兴盛;二是把握时代脉搏,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突出矛盾中实现文化繁荣兴盛;三是传承中华文明,包容世界多样,在充分学习借鉴中实现文化繁荣兴盛;四是尊重客观规律,深化改革

创新,在释放发展活力中实现文化繁荣兴盛;五是坚守人民主体,顺应人民意愿,在深度共建共享中实现文化繁荣兴盛。^[8]

李彦青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化体制改革的启示: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规律。^[9]

彭建强还对农村改革 40 年经验和启示进行了探讨,认为 40 年的农村改革是尊重农民创造和注重实践创新的改革,是始终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坚持保障和增加农民权益的改革,是不断改善工农城乡关系的改革。^[10]

(三) 改革开放的未来展望

白占军研究指出,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应切实做到“五个必须坚持”:一是必须坚持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谋划和推进改革;三是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深化改革;四是必须坚持正确的改革认识论和方法论;五是必须坚持以钉钉子精神狠抓改革落实。^[11]

康振海认为,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要坚定信仰信念信心,要凝聚智慧、勇于担当和接续奋斗。^[12]

陈璐还提出,把握着力点,不断将新时代河北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一是着力在构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实现新突破;二是着力在对外开放上实现新突破;三是着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新型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实现新突破;四是着力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实现新突破;五是着力在破解生态文明建设难题方面实现新突破。^[13]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 内涵、特征及建构向度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高新文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决定,与西方普世价值观具有本质的区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不仅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形成的独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念。^[14]董向前、万海霞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适应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要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理念。^[15]朱晨静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一致,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16]田海舰、田雨晴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具体内涵进行了界定:其一,在经济目标层面,富强是指民富国强;其二,在政治目标层面,民主是指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其三,在文化目标层面,文明是指创造引领世界文化潮流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四,在社会层面,和谐是指形成稳定有序、和平相处的良好氛围。^[17]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征,董向前、万海霞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征表现为人民性、科学性、民族性和开放性。^[18]孟凡平、赵佳宾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具有具体性、现实性、历史性。^[19]耿建涛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特质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劳动者本位的价值核心、劳动人道主义的价值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的价值途径,与马克思经济价值观倡导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20]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向度,高新闻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依据。^[21]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

董向前、万海霞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基本内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坚持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22]

申文杰认为,创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和形式,要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创新各种实践活动载体和方式,强化实践养成;二是创新和完善制度,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心入脑;三是融入日常生活,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四要创新文化载体,以先进、有益的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是创新舆论宣传形式,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浓厚社会氛围。^[23]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法路径,杨福忠认为,立法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实现形式是,将核心价值观要求转化为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其中转化为立法规则是效果最佳的一种选择。^[24]

王秀华指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一要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二要充分发挥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作用;三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四要充分发挥家庭的基础作用;五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25]

李华认为,构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长效机制,一要建立健全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制;二要建立健全德才兼备的队伍保障机制;三要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规范评价约束机制。^[26]

刘文敏提出了自媒体视阈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落细落小落实的途径:一是以不同组织为单位建立交流平台;二是以身边实例的形式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增加内容的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四是及时净化网络环境,做好监督工作。^[27]

曹一伟、曹哲研究阐述了新时代河北高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着力点:一是培育三个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发展、服务至上),牢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二是营造良好育人氛围,强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文关怀;三是教师教学加强“三个含金量”(知识、科技、情感),丰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育人内容;四是高校创新培育方式方法,提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育人实效;五是加强培育机制建设,推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开展。^[28]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

朱晨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进行了系统研究,她以日常生活为研究视域和思维框架,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缘由、理论支撑、实践基础、现实课题、实现条件及运行机制的多维分析,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尝试。其主要观点如下:

何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化育?朱晨静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化育,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化与培育过程,其实质是一个民族、国家以寻求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指引或精神动力为目的、以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精神秩序的建构与整合过程。^[2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缘由,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逻辑前提,即价值哲学中关于价值、核心价值化育等问题的分析与界定。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可能性,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于日常生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必要性,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存在一定间距,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刻转型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向日常生活转向并给予现实关照。^[30]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理论支撑,朱晨静认为,马克思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西方现代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日常生活转向提供了必要的学理依据。^[31]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实践借鉴,朱晨静认为,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我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建设,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抑或是兼具东西方特色的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建设,其成功之处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日常生活化育。而苏联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失败也与其对日常生活的遮蔽和忽视密切相关。它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实践基础。^[32]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现实课题,朱晨静认为,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消费符号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带来重大影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33]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实现条件,朱晨静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需要以核心价值观的一般条件和特殊条件为前提和依据,进而不断提升主体文化自觉,缩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的间距,创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社会条件,大力开展化民成俗的日常生活实践,为实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提供必要支撑。^[34]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育机制的内涵及构建原则,朱晨静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育机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它是个有机系统,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育过程各环节、各要素的相互协作而实现系统整体功能的有机系统。其二,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育主体、化育客体和化育介体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联结方式的集合。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育各环节、各要素的有机运行离不开一定原理或机理的作用,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育各要素是在一定机理的协调和作用下产生趋向目标的连接方式和运行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机制的建构原则包括利益原则、渗透性原则、差异性原则、感性化原则。^[35]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的运行机制,朱晨静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离不开利益激励机制、态势激发机制、传媒引导机制、常识转化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36]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 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陈聚芳研究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其主要表现为: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我国在新的历史阶段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中国悠久而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文化土壤。^[37]

(二) 内涵界定、精神实质及特征

程瑞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了如下界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是全党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的指导思想。^[3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建设更

加美好、更加可亲、更高质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理论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展现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39]

展辉、张杰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又具有一脉相承的传承性。这种传承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二是借鉴我国古代治国经验智慧；三是吸收我们党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经验。^[40]

（三）理论渊源、实践基础与传统文化底蕴

王莲英、王景琦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成果和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基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实践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早年从政经历和历年理政实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基础。^[41]

纪洪娟的研究，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与“民为邦本”传统文化、“全面依法治国”思想与“道法者治”传统文化、“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与“廉政”传统文化、“建设生态文明”思想与“天人合一”传统文化等。^[42]

（四）核心要求和时代价值

魏四海、孙英臣、傅建芬认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求。其表现为：政治信仰坚定才能为党分忧、为党担责；政治立场鲜明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政治方向正确才能保持定力、不辱使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重要的时代价值，“在于标定新时代，体现通古今之变、察中外之情的历史大视野”；在于回应新时代，明确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新格局；在于引领新时代，发出对民族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的时代最强音。^[43]

（五）深化新思想及其引领新时代

关于深化新时代新思想认识的五个维度，程瑞山认为，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从不同视角进行多维探究，即概念维度、内容维度、时空维度、精神实质维度和文献维度。^[44]

康振海认为，新思想引领新时代表现为：一是政治引领：坚定“四个自信”和“四个意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指明前进方向；二是思想引领：统一思想认识、把握发展规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科学指导；三是实践引领：贯彻基本方略，落实战略部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提供行动指南。^[45]

（六）坚持新思想

康振海认为，新时代坚持新思想，一是理论武装：掀起学习热潮，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二是理论定力：增强“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坚决捍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三是理论创新：坚持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是理论转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46]

魏四海认为，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初心不改抓好民心工程，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47]

康振海还提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境界，一要深入学习、准确把握，学懂弄通、真信真用；二要深入实际把握国情，切实筑牢实践根基；三要积极进行思想斗争，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四要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全面提升素质能力。^[48]

四、新时代新思想专题研究

（一）新时代

王聚芹、王静、黎莉对十九大报告中的“新时代”从三个层面进行了解读：一是在微观的社会发展层面，这一“新时代”意味着，中国进入新常态，需要不断树立新理念、打造新产业、激发国家新活力；二是在中观的国家层面，这一“新时代”意味着，国家历史方位发生变化，面临新形势，必须立足新起点、依借新平台、熟悉新情况、投身新实践、启动新征程、解

决新问题、开辟“新局面”、夺取“新胜利”，全力以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是在宏观的国际层面，这一“新时代”意味着，我国将以文明新高度，树立新安全观，通过打造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9]。陈志环认为，从时代主题的角度看，新时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全力奋斗的时代，具体包括国家、民族、人民三个层面。^[50]

王聚芹、王静、黎莉认为，“新时代”之“新”意味着中国进入以科技创新立足于世、以党建创新立足于世、以道路创新立足于世、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世、以先进思想立足于世的崭新阶段。^[51]陈志环认为，理解新时代之“新”，应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依据，要从唯物史观、理性思维、客观现实的角度来理解。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涵理解，新时代的“新”，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了新的发展阶段特征，迈上了新的历史征程；在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需要我们凝心聚力解决新矛盾；在于明确了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还在于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三是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变”与“不变”，表现为主要矛盾的“变”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不变”，国际影响力的“变”与最大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不变”，执政环境的“变”与中国共产党初心的“不变”。^[52]

魏先法还对新时代使命进行了科学概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要牢记阶级使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要牢记民族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牢记人类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53]张勇提出，新时代要有新担当新作为，一要强化担当作为的政治责任；二要增强担当作为的本领能力；三要突出问题导向、勇于直面困难；四要努力营造敢于担当作为的良好氛围。^[54]

（二）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于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价值和方法，杜萍、赵英杰概括了新时代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必须孕育出现代新型文化观念，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必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现在：一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走好中国道路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是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一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要抓住重点内容；二是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高度重视教育传播。^[55]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李维意、赵英杰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论——源自五千年的深厚历史积淀，蕴含着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二是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论——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内容；三是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论——实现传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结合，力求推陈出新，用文化创新的成果驱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四是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论——要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持高度自信。^[56]

侯力丹、刘洪彩认为，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一要明晰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位，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要实现与马克思主义的协同发展，借助国民教育路径弘扬传统文化；三要高效利用网络技术传播传统文化，开展多样化传承活动。^[57]周振国认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需要科学的态度，而且要有科学的方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要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58]

杜运辉、田琳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生成当代智慧，就必须主动开展与其他文化的深入对话和有机融合，“集大成，得智慧”。^[5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走出去”？梁皓、崔丽认为，要想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必须要结合当下的时代需求，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国际认同，创新文化传播方式。^[60]

（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左华认

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包括:“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准确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及主要方面的内涵,必须全面把握社会生产力这个概念;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我国的发展实际出发,自觉地遵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必须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61]孙伊凡认为,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矛盾双方的内涵。认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一个相对概念;二是美好生活的需要以物质生活的保障为首要内容;三是美好生活的需要建立在可靠的现实基础之上;四是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密切相关。对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内涵:一是积极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二是深刻认识快速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三是科学把握快速增长中的发展不充分问题。^[62]

左华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一是从现实来看,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物质财富极大增长,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对更加美好的生活充满着期待;二是从历史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摆脱了生产力落后和物质短缺的困扰;三是从理论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必须始终把生产力放在第一位。^[63]

张云飞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原因:一是我国生产力水平由居于世界后列逐步进入世界前列;二是人民的生活需要由比较单一低级的形态向更加多元高级的形态转变;三是党和国家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由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造成的。^[64]

赵书昭、杜杨、宋新宇指出,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要有一个整体性认识:一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不是颠覆性的,也不是完全替代式的,而是在旧矛盾基础上的渐变式转化;二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非对抗性的,但转化成对抗性矛盾的风险依然存在;三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确定了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我们的新任务、新要求。^[65]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诸多“变化”表现为:一是人民需要从二维到多维,从平面到立体,从

突出重点到平衡充分的变化。二是人民生活从量到质,从多到好,从基本满足型到注重品质型的变化。三是经济发展从快到好,从多到省,从追求发展速度到追求效益和质量的变化。四是分配机制从集中到均匀,从选择性到普惠性,从强调效率到提倡公平的变化。五是社会建设从外到内,从粗到细,从硬件建设到内涵建设的变化。六是生活方式从低端到高端,从感官娱乐到精神快乐,从奢侈导向到健康节约导向的变化。^[66]

对新的主要矛盾诸多“变化”的哲学思考:一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解放思想的胆识和与时俱进的品格的高度统一。二是坚持矛盾的观点,始终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认识和分析事物。三是坚持质量互变规律,准确把握量变过程中阶段性质变的重要关节点。四是坚持发展的观点,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坚守中创新。五是坚持实践的观点,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要立足于践行“四个伟大”。六是坚持人民群众史观,始终将人民放在中心地位。^[67]

左华认为,全面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面的实践要求,一是深入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二是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三是明确主要问题和主要任务;四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68]

关于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方略,孙一帆认为,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立足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科学判断,并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必须明确认识到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二是必须为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三是必须全力构建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所需要的创新通道;四是必须为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建立起稳固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体系;五是必须为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尽力缓解和控制三大不平衡问题。^[69]

孙林琼认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耦合路径是融合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坚持经济体制创新,妥善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系统解决利益分化问题,准确把握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70]

(四) 新时代文明观

关于新时代文明观的含义,朱晨静认为,新时代的文明观是在考察人类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与

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人类文明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趋势进行深刻揭示和科学研判,进而提出“文明交流互鉴”与“文明超越”主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发展文明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深刻思考,集中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秉持的文明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71]

新时代文明观具有丰富的蕴涵:一是文明是多样的,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价值;二是文明是平等的,每一种文明都值得尊重;三是文明是包容的,不同文明应该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四是文明是和谐的,不同文明应该以交流交融超越隔阂与冲突。^[72]

(五) 习近平生态文明观

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观的内涵、特点与价值,沙占华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观内涵丰富,包括:一是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民生国计观;二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三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四是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系统观;五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法治保障观;六是培养公民环境意识的生态文明教育观;七是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的全球共赢观。这些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强烈的问题意识、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情怀和观察问题的国际视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生态文明观的价值体现在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推动我国走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为全球的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73]

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正定渊源,闫国文等认为,习近平在正定生态环境建设的实践思考,与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两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表现为发展理念上一脉相承,发展战略上不断深化,发展目标上与时俱进,发展举措上贯穿民本思维,制度建设上不断强化。^[74]

孙静茹认为,践行生态文明观,实现绿色发展,既要注重经济绿色化,也要注重绿色经济化;要进一步增强公民环保意识,让绿色发展观

念深入人心。^[75]

关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与特征,黄玥、王云峰认为,绿色发展是一种建立在传统生态建设理念上的全新模式,此理念旨在将生态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负荷进行合理分配与指向性调整,从效率、可行性、可持续度以及精简节约的角度来推进绿色生态发展。绿色发展理念的主要特征:一是以自然发展规律为建设导向;二是通过生态修复以期实现生态盈余;三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方针不动摇;四是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可持续化。^[76]

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内涵及其树立和践行,牟永福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破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立的传统思维,深刻阐明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的认识,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就要树立生态安全观、生态福利观和生态发展观。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一是强化生态红线意识;二是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三是构建低碳高效的生态经济体系;四是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77]

(六)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民生观

沙占华、冯雪艳认为,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民生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绿水青山是金钱不能代替的幸福;二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是把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四是强化公民的环境意识是改善生态民生的重要保障;五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是改善生态民生的根本出路。^[78]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民生观的基本特征: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情怀;二是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三是鲜明的问题导向。^[79]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民生观的价值:一是深化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二是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民生建设的融合推进到新的高度;三是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指南。^[80]

(七) 新时代民生思想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民生内涵,

窦孟朔、窦建爽认为,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来看,新时代民生需要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需要,而且扩展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需要;从人们的需要分类分化来看,新时代民生需要已分化和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从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来看,“五个方面需要”反映了新时代人民“五种生活”的发展要求。^[81]

新时代的民生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点,集中表现为当代民生的“八个转变”:一是民生消费由数量增长为主向质量提升为主转变;二是民生需求由私人产品为主向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并重转变;三是国民收入由落差式增长向同步式增长转变;四是我国人口由农村聚居为主向城镇聚居为主转变;五是人民生活由差别性改善向公平性改善转变;六是民生事业由重点发展向全面发展升级转变;七是民生建设由探索式行进向制度化推进转变;八是民生改善由纳入经济发展向统领经济社会发展转变。^[82]

关于习近平民生思想溯源,王红信认为,习近平的民生思想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具有强大的红色基因和从群众中走来的为民情怀。^[83]

另外,范拥军、赵婷、张泗考还对民生社会建设的内涵、特点与要求进行了探讨,认为所谓民生社会建设,是指围绕满足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为原则,着力保障民众社会权益,促进民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公共服务高质化、均等化和社会秩序运行良好的社会发展模式。其特点与要求表现为:民生社会建设的价值追求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民生社会建设的重点是保障基本民生;民生社会建设的关键是公共服务均等化。^[84]

(八)“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张治江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观点观察世界发展大势,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价值、中国方案,是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85]王聚芹、饶一鸣认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于中国新时代、立足于社会主义新时代、立足于全球治理新时代,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诊断当代西方全球治理病症,给予古代中国“天下”治理

精神的新时代弘扬,并凝练出当代全人类共同期盼的天下治理思想。^[86]黄云明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基于当下国际政治关系局面提出的协调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倡导世界各国放弃完全自利、对抗的战争或冷战思维,确立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国际关系新理念。^[87]

李进书、侯雨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风险时代人类的“共同福祉”,它提倡共同面对风险,倡导包容所有文明,强调以实际行动给予人们以切实的关怀;它召唤所有人共建共享,提倡以多种形态的共同体来分散风险的危害;它汲取着历史经验和教训,探寻着人类团结的持续动力。^[88]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原则,黄云明认为,世界各国都应遵守法制、坚持和平发展和人道主义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原则。^[89]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底蕴和伦理意蕴,黄云明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劳动辩证法和劳动历史观以及中国传统的和合哲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正义、和合和仁爱的伦理价值,勾画了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伦理愿景,也指明了实现伦理愿景的途径和方式。^[90]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建构路径,张治江认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使中国声音、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得到国际认可、认同以及积极合作,应该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在和平发展中践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知度;在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建构,不断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可度;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建构,不断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度。^[91]

(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道路思想

李维意、赵英杰认为,中国道路是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总体概括,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9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道路思想主要包括:一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走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二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走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三是以宪法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坚持走全面依法治国道路；四是坚持党要管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道路；五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道路；六是坚定“四个自信”，走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化发展）发展道路；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走合作共赢、和平发展道路；八是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93]

（十）习近平“统”的思想

张扬、程恩富认为，习近平“统”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习近平“统”的思想的产生标志——《摆脱贫困》；二是习近平“统”的思想的发展——从《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到《之江新语》；三是习近平“统”的思想在治国理政中的运用。^[94]

习近平“统”的思想的具体内涵是：“经济大合唱”思想，“大农业”思想，“统”与“分”辩证思想，“四条底线”思想（即“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贫困村集体经济较弱”思想。^[95]

（十一）以人民为中心与坚守人民立场

刘月、贾玉娥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丰富内涵体现在：一是坚持人民至上；二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三是以人民幸福为己任；四是接受人民检验。^[96]王菲认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科学内涵包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绩效和价值由人民评判。^[97]

王彦坤、苏晔认为，永远坚守人民立场，一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和价值追求；二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汇聚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的无穷智慧；三要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向着共同富裕目标不断前行；四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98]

刘月、贾玉娥还提出，切实依靠人民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一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体人民。二要自觉

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各领域。三要大力弘扬实干奋斗精神。四要聚焦重点任务实现新突破。^[99]程瑞山认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健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100]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问题研究

（一）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康振海认为，回看走过的路：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有深远的历史视角；比较别人的路：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有宽广的世界视野；远眺前行的路：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始终焕发革命精神。^[101]

（二）“四个伟大”的关系

王彦坤、王菲认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着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四个伟大”。其中，“伟大斗争”是前提，“伟大工程”是根本保障，“伟大事业”是前进方向，“伟大梦想”是奋斗目标。“四个伟大”紧密联系、相互贯通，辩证统一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之中。^[10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及廉政建设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的理论渊源，柳建辉等认为，兼容并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廉政思想、列宁的廉政思想、毛泽东的廉政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廉政思想。^[1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的基本内容：一是廉政文化建设，包括以推进人的需要的满足和全面发展作为廉政文化建设的目标；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方法。二是党风廉政建设、纪律建设，包括从严治党；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三是制度反腐、法治反腐建设，包括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实行民主监督；进一步推动行政公开；进一步完善反腐法律，严格执法。^[104]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的历史地位,柳建辉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思想有助于保证社会稳定,有助于增强党的人民性、纯洁性、先进性,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5]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主要经验: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正确方向;二是必须坚持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三是必须坚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证;四是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五是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六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反腐败斗争的整体合力。^[106]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基本特点:一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恢复探索期。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二是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逐步展开期。坚持“治国必须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点。三是从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继续推进期。“三个更加”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四是从党的十八大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全面深化期。坚持全民从严治党、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1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发展趋向:一是充分认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二是推动反腐败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发展;三是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四是夺取反腐败压倒性胜利;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制度体系会更加完善。^[108]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

源头与基础。柳建辉等认为,中国古代和中国近代所有促进廉洁政治为目的的思想、制度和

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基础。^[109]

内涵与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的、以全民族共同理想为主题的、以弘扬民族精神为目的、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宗旨的廉政文化。其主要基本内涵,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和道德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具有“四个统一”的鲜明特征:一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三是政治性与大众性统一;四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1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经验:一是坚持服务大局、统筹协调;二是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教育;三是坚持突出重点、面向社会;四是坚持继承创新、与时俱进;五是坚持重在建设、务求实效。^[1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功能在于教育引导、规范约束、教化陶冶、凝聚推动功能。^[1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价值意义在于:一是进行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思想基础;二是推进新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治本工程;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内容;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保证。^[113]

另外,李娟、李站稳、巩志娟还对西柏坡时期我党廉政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特点与功能进行了探讨,认为,西柏坡时期廉政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七个方面:一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思想文化;二是艰苦奋斗、公而忘私的廉政思想文化;三是依靠群众、为群众服务的廉政思想文化;四是民主监督、接受监督的廉政思想文化;五是集体领导,防止专断的廉政思想文化;六是严明纪律、严于惩戒的廉政思想文化;七是及时预警、防腐拒变的廉政思想文化。西柏坡时期我党廉政思想文化的主要特点:显著的时代性,突出的继承性,典型的创新性,严格的自律性,突出的针对性,极强的执行性,深刻的预见性。西柏坡时期我党廉政思想文化的主要功能:一是保障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二是推进了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三是保证了城市建设的顺利

推进；四是促进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展；五是促进全面执政的顺利实现；六是为新中国廉政建设打下基础。^[114]

(杨春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5]王彦坤等.改革开放:我国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光辉起点[A].改革开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C].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8.
- [2][4]冯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N].河北党校报,2018-12-20.
- [3]康振海等.让历史昭示未来[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
- [6]康振海.改革开放: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N].河北日报,2018-06-15.
- [7]穆瑞丽.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与主要经验[N].河北党校报,2018-06-20.
- [8]贾玉娥.以文化繁荣兴盛助力现代化强国建设[A].改革开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C].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8.
- [9]李彦青.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化体制改革的启示[N].河北党校报,2018-11-20.
- [10]彭建强.农村改革40年经验和启示[N].河北日报,2018-10-10.
- [11]白占军.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N].河北党校报,2018-11-20.
- [12]康振海.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N].河北日报,2018-12-26.
- [13]陈璐.不断将新时代河北改革开放推向前进[N].河北日报,2018-12-05.
- [14][21]高新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向度刍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
- [15][18][22]董向前,万海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爱国主义教育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16][29][30][31][32][33][34][35][36]朱晨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17]田海舰,田雨晴.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理论贡献[J].保定学院学报,2018(1).
- [19]孟凡平,赵佳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摄“普世价值”论争[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8(1).
- [20]耿建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特质[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7).
- [23]申文杰.不断创新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和方式[N].河北日报,2018-04-04.
- [24]杨福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法路径[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8(3).
- [25]王秀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N].河北日报,2018-01-12.
- [26]李华.构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长效机制[J].党史博采,2018(9).
- [27]刘文敏.自媒体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中落细落小落实的途径研究[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8(1).
- [28]曹一伟,曹哲.新时代河北高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探索[A].河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报告2017年[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
- [37]陈聚芳.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J].邢台学院学报,2018(3).
- [38][39][44]程瑞山.深化新时代新思想认识的五个维度[N].河北日报,2018-02-22.
- [40]展辉,张杰.十九大报告的历史思维及其启示[J].武警学院学报,2018(3).
- [41]王莲英,王景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N].秦皇岛日报,2018-03-27.
- [42]纪洪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统文化底蕴[J].新西部,2018(12).
- [43]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牢记殷切嘱托,努力向人民交出优异答卷[J].红旗文稿,2018(14).
- [45][46]康振海.新思想引领新时代[J].共产党员,2018(1).
- [47]魏四海.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改革发展实践[N].河北日报,2018-08-01.
- [48]康振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N].河北日报,2018-05-04.
- [49][51]王聚芹,王静,黎莉.论十九大以“新”宣告中国伟大复兴的新时代[J].宜春学院学报,2018(5).
- [50][52]陈志环.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8(1).
- [53]魏先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J].共产党员,2018(1).
- [54]张勇.新时代要有新担当新作为[N].河北日报,2018-06-06.
- [55]杜萍,赵英杰.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价值和方法[J].保定学院学报,2018(6).
- [56]李维意,赵英杰.从基因、内容到自信、创新[N].中国文化报,2018-04-04.
- [57]侯力丹,刘洪彩.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J].人民论坛,2018(3).
- [58]周振国.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N].河北日报,2018-11-07.
- [59]杜运辉,田琳.从优秀传统文化到当代中国智慧[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7-16.
- [60]梁皓,崔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走出去”[J].人民论坛,2018(28).
- [61][63][68]左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及主要方面探析

- [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3).
- [62][69]孙伊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经济学解析与解决思路[J].云南社会科学,2018(5).
- [64]张云飞.借助《矛盾论》深入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J].新视野,2018(2).
- [65][66][67]赵书昭,杜杨,宋新宇.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诸多“变化”的分析与思考[J].新视野,2018(2).
- [70]孙林琼.社会主义矛盾转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耦合[J].河南社会科学,2018(1).
- [71][72]朱晨静.新时代文明观与世界秩序重建[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 [73]沙占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生态文明观探析[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8(10).
- [74]闫国文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正定渊源[A].改革开放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C].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8.
- [75]孙静茹.践行生态文明观,实现绿色发展[J].人民论坛,2018(16).
- [76]黄玥,王云峰.让绿色发展理念落地生根[J].人民论坛,2018(14).
- [77]牟永福.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N].河北日报,2018-07-20.
- [78][79][80]沙占华,冯雪艳.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民生观探析[J].保定学院学报,2018(6).
- [81][82]窦孟朔,窦建爽.新时代的民生内涵与建设路径[J].科学社会主义,2018(5).
- [83]王红信.习近平民生思想溯源[J].邢台学院学报,2018(3).
- [84]范拥军,赵婷,张泗考.推进民生社会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J].邢台学院学报,2018(1).
- [85][91]张治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建构路径[J].理论学刊,2018(4).
- [86]王聚芹,饶一鸣.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治理[J].甘肃社会科学,2018(2).
- [87][89][90]黄云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底蕴和伦理意蕴[J].社会科学家,2018(5).
- [88]李进书,侯雨.“人类命运共同体”:风险时代人类的“共同福祉”[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 [92][93]李维意,赵英杰.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道路思想[J].保定学院学报,2018(3).
- [94][95]张扬,程恩富.壮大集体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原则与路径[J].现代哲学,2018(1).
- [96][99]刘月,贾玉娥.以人民为中心创造历史伟业[N].光明日报,2018-07-13.
- [97]王菲.深刻认识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内涵[N].河北日报,2018-07-20.
- [98]王彦坤,苏晔.永远坚守人民立场[N].河北日报,2018-07-04.
- [100]程瑞山.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N].河北日报,2018-05-11.
- [101]康振海.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N].河北日报,2018-01-31.
- [102]王彦坤,王菲.深刻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J].中国纪检监察,2018(4).
- [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柳建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M].石家庄: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
- [114]李娟,李站稳,巩志娟.知往鉴今砥砺前行[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8.

精神文明研究

郑英霞 鲍志伦

2018年,精神文明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河北专家学者围绕学科发展,对精神文明研究理论的重大创新进行深入挖掘,结合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加强和改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为全社会研究这一领域问题提供了学术规范、价值准则、科学品质、人文精神和创新意识的范本。

一、精神文明理论研究

(一)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马克思经济价值观倡

导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从根本上确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本质。耿建涛认为,第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等各种关系的准确判断。第二,以劳动者及其劳动为价值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展现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等各方面的关系,恰是给予人自由自在的存在,给予人对其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公平占有,使人在其劳动和劳动价值分配中占有和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

第三,以劳动人道主义为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包括国家强大、人民富裕、政治民主、社会文明与生态和谐,是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和自由自在发展的前提。第四,以公平和效率为价值实现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位一体”总布局下的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取向,其本身就脱生于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在国家层面设定了全社会共同奋斗的价值目标,在社会层面和公民层面凝练了最基本的价值理念,这三个层面相互支撑、共存共生、融为一体,是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自信的核心要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真正现实的马克思主义。^[1]

高新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决定,与西方普世价值观具有本质的区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不仅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形成的独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维度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强化民族价值认同,推动文化自信具有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积极作用。(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哲学基础。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这种本质主要表现为人民的主体性;社会主义社会旨在消除劳动异化,体现了劳动的目的性;社会主义社会以劳动神圣为根本的价值导向。(二)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资源。第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可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寻其价值根源。第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诉求。第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对个体的价值引导。(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依据。当前,国内、国际由于各种经济成分的不同,也涌现了不同的社会思潮,对此要认真鉴别,特别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主要体现在两个

层面:一是国内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存在,使得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多样化。二是防范和抵制西方建构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普世价值观、新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潮的渗透。^[2]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与科技进步,社会进入自媒体时代。刘文敏认为,自媒体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等特点,这给人们在获取信息方面获得极大便捷,对于当代高校学生的价值观培养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如何引导当代大学生主动净化自媒体网络环境,做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是我国所有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们应该重点研究的问题。(一)自媒体的概念及特点。1. 传播主体的个体化。2. 传播内容的自由化。3. 传播方式的交互性。4. 传播速度快捷。(二)利用自媒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中落细、落小及落实。1. 以不同组织为单位建立交流平台。2. 以身边实例的形式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 增加内容的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4. 及时净化网络环境,做好监督工作。综上所述,在自媒体时代,高校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面临机遇与挑战,只要我们抓住主要矛盾,制定合理策略,贯彻落实,最终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中落细、落小、落实。^[3]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接受理论为研究视角,张丽萍、单翀飞认为,(一)接受理论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启示,首先要重视大学生的接受主体性地位;其次要重视接受过程的双向互动性。(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受过程,有三个角度的理论分析。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受过程的构成要素分析。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受过程的运行过程分析。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受的运行机理分析有接受的动力机制与心理机制。(三)基于接受理论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优化。1. 优化原则。首先,增加接受主体的接受动力,实现选择获取环节的优化。其次,促进接受主体对接受客体的理解,实现整合内化环节的优化。再次,创造良好的接受中介,实现外化践行环节的优化。2. 优化途径。第一,课堂教育是主渠道,要提高教育者的教育水平。第二,教育活动有多种实现形式,要发挥丰富的隐性教育资源作用。第三,注重当代大学生的实

践体悟。第四，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估考核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长效发展。^[4]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和历史使命，也是社会主义大学管理者和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李华认为，（一）建立健全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制。一是加强党委领导。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体制逐步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领导体制。二是发挥职能部门齐抓共管作用。主要以学校职能部门为主，学校职能部门和服务部门在各自岗位上通过自身的实践，通过对大学生的贴心服务，以身示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二）建立健全德才兼备的队伍保障机制。一是建设一支政治立场鲜明、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高素质专业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至关重要；二是建设一支坚强有力的辅导员工作队伍。作为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要力量的辅导员，其能力水平将直接影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效果。（三）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规范评价约束机制。一是加强高校规章制度建设，强化制度约束。制度承载着价值，传递着理念，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需要制度建设的融入贯穿。二是加强惩戒考核建设，强化评价约束。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能够检验培育效果，激励起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积极性。^[5]

（二）关于文化软实力

苏国伟、智延娜认为，保定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要紧紧密结合客观实际情况。（一）明确城市定位，打造“国家级文化副中心”。保定独有的区域地位、历史沿革，使其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二）编制“文化软实力”发展规划，绘制文化发展蓝图。一是在保定市古城遗址，以现存古建筑群落为依托，规划建设“古文化区”；二是在保定东北部建设“新文化区”，可与保定市打造“中关村”“智谷”和白洋淀科技城紧密结合，特别是要充分借力河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保定学院等高校，打造一个反映现代科技文化产业特色的新文化区，建设好规划馆、体育馆、文化馆等一批重点文化设施；三是在保定西南部设立“农业文

化区”，因为保定南部地区农业基础较好，同时受京津影响较小，有利于做好农业基础产业，可以打造成一个展示现代农业的文化区域。（三）实施古城风貌恢复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文化体育品牌工程、旅游品牌转型升级工程等若干重大文化工程，形成以点带面新格局。^[6]

王倩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物质硬实力，一条腿是文化软实力，如果物质硬实力不行，这个国家可能一打就败；而如果文化软实力不行，这个国家难免不打自败。依托微电影的传播可以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利用微电影传播提升文化软实力需要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四个方面来把握。第一，传播者作为传播进程中的第一个环节，是传播活动的发出者。第二，在互联网时代，精致的内容制作成为媒体竞争的重心，微电影以其故事性和互动性吸引着广大受众。第三，微电影的传播媒介主要是新媒体，通过两微一端、短视频类网站进行网络传播。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微电影的观看、传播越来越便捷，媒介的进步为微电影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第四，受众作为传播过程的信息接受者，在新媒体时期，受众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受众不再是传播过程的末端被动接受信息，而是在接受信息的同时，进行信息传播，对传播内容进行反馈，进而影响传播活动。新媒体时代，要全面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就需要充分认识到微电影的作用，从战略高度规划和认识文化传播，进而提升文化软实力。^[7]

（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杜运辉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基因，是中华文化中恒常一贯、生生日新的积极因素或根本特征，是在中华民族的社会实践中不断综合创新的精神结晶。中华文化的核心基因体现了连续性与变革性相统一，独创性与包容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中华文化的核心基因内涵丰富，包括：“阴阳大化”“道法自然”的天道思想，“文明以止”“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致思取向，“民为邦本”“仁者爱人”的人文关怀，“协和万邦”“以德服人”的天下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

神。核心基因的创新发展,按照是否适合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需要,即科学性、客观性与进步性、人民性相统一的判断标准,不断创新的中华文化核心基因还有其他多方面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智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中华文化核心基因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灵魂,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在当代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革命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综合创新。^[8]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张翼、崔佳慧认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如“百善孝为先”的家庭观;“不信不立、不诚不行”的诚信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宽容精神等等。这些优秀传统观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了乡村民众的行为规范。但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外出打工人员逐渐增多,新生代农民的思想观念悄然发生了变化,祖祖辈辈延续的优秀传统观念在农村面临着弱化甚至消失的危险。如何延续我们民族的精神命脉,找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对于新农村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就需要从三个途径入手,第一,利用好春节假日、庙会、集日,发挥民间艺人的作用,搞好传播工作;第二,基层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科学设置课程,选好、用好教材,改进教学方法,并加大专业师资培训力度,进而发挥农村学校的传播作用;第三,将新媒体打造成传统文化宣传的新窗口、新渠道。认真做好弘扬传统文化这项固本、铸魂、打底色的工程。^[9]

二、精神文明实践研究

(一) 关于燕赵文化建设实践

郭秀丽认为,燕赵文化具有独特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精神特质。加强燕赵文化对外宣传,对于增强文化影响力、促进地区发展意义重大。近年

来,在燕赵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方面,虽然从政府到机构都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但目前宣传效应主要还局限于国内,走出国门的对外宣传仍差强人意,比如,河北省各地市级旅游网站上,只有石家庄市旅游网站提供英文网页;另外,燕赵文化各类文本的语料也相当匮乏,不足以支撑文化传播之用。鉴于此,做好燕赵文化文本翻译研究,做好外宣前期工作,助力燕赵文化的对外宣传仍是一项重要课题。首先看外宣效果比较高效的旅游文化。在石家庄旅游官网上,有当地重要旅游文化景点的英文介绍,这些文本目的是激发游客兴趣,引发游客前来了解,属感染类语篇。网页中的中英介绍文本大多并未从内容上机械对应,语言也比较平实明了,符合目标语交际特征。除旅游文化外,神话传说也是一种比较高效的外宣媒介。这种类型的汉语语篇一般篇幅短,叙事性强,语言浅显,结构简单。对于此类文本的英译,要注重文化内涵的传递,通过文化自身的魅力,增强感染力,达到文化交际目的,所以在翻译时,要注意避免文化的缺失或不力导致的文化信息传递失败。除上述文本类型外,燕赵文化中还有一个突出类型就是成语及其典故。探讨如何做好文化的翻译宣传工作,以期对燕赵文化的外向发展有所助力,促进区域文化的进一步提升。^[10]

孟祥昕、温建英、常海龙认为,将燕赵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有机融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大学生的自信心,增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为大学生今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和智力支持。燕赵人文精神的内涵,在这里指燕赵文化中的人文精神。燕赵人文精神是在古燕赵大地上形成并随时代不断发展而积淀孕育而成的内化于广大人民物质、精神活动中的对客观世界的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燕赵人文素质教育可以塑造高素质的人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功能:有利于大学生认识社会;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生活质量。将燕赵人文精神有机融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陶冶学生情操;指导学生把握客观规律;构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体系。^[11]

(二)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沙占华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观内涵丰富,

包括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民生国计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系统观，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法治保障观，培养公民环境意识的生态文明教育观，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的全球共赢观等。这些思想不仅彰显了强烈的问题意识、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情怀、观察问题宽阔的国际视野。同时也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这三大规律的认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12]

王士良认为，《国语》中蕴含着“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的天人关系论、“懋昭明德，物将自至”的生态德性论、“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的生态共同体论等思想。特别是其提出的“和实生物”的命题，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亦是人和万物的存在方式，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特点，极富生态意蕴。第一，“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的天人关系论，呈现出天地人三者的内在统一关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第二，“懋昭明德，物将自至”“被文相德，非国何取”“圣人贵让”与“胡可专也”的生态德性论。第三，“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的生态共同体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域中，人类不仅要以德性来规范和约束自身的主体性行为，而且从更为积极的层面上去主动地关怀自然万物，从而形成包含人与自然万物在内的生态共同体。第四，“和实生物”的生态哲学范畴。《国语》关于天、地、人关系的论述，关于生态德性论和生态共同体的内容，亦构成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国语》关于文与德的关系的论述，体现了人在天地自然面前的认识主体性和道德主体性的统一；《国语》记载了大量的关于鸟兽、土地、山川的礼制和对于其生态价值的论述，集中体现了生态共同体的思想特点。^[13]

（三）关于农村文化建设实践

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不断加大文化资源向农村倾斜的力度，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随着城

乡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在文化上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逐渐突显，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与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目标不相适应。张翼、崔佳慧认为，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我国乡村文化发展呈现的三大特点：现代因素的增多与民间传统文化的失传并存，历史连续性与文化断层并存，政治主导性与文化自觉精神缺失并存。对此，相应提出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协调发展，乡村发展与文化传承同步，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三条发展对策。^[14]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其建设的优良是衡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果的重要标志。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建设促进了农村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更主要的是不但提高了为农民服务的质量，而且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更好地反映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李珍、赵丽芳、赵树国认为，改进和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首先要加强农民对公共文化需求的表达；其次要推进农村高质量人才建设；最后要利用科技建设改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于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才能更好地满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才能够加速农村文化体制的改革进程。尤其在大数据时代下，乡政府应该转换角色，以农民需求为理念，以服务为宗旨，将农民的需求放在首位，结合现代化技术，把传统文化与大数据有效结合，更好地满足农民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15]

陈静、栾文敬和周蒋婕认为，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贴近其原生社区的生活常识，承载村落记忆和文化共识，内含民族文化基因。通常情况下，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扮演了“非遗”的“保护主体”和“传承主体”双重角色，村落原生居民参与“非遗”保护的能动性和文化建设能力有限，外界对于村落“非遗”保护多是补救性措施，不利于“非遗”在原生自然社会环境中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传承。因此建议，第一，明晰“非遗”的“保护主体”和“传承主体”的角色和职责分工。一是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经济搭台，文化融入，构建政府、学界、企业、新闻媒体和村落居民五位一体的“非遗”保护和乡村文化建设网络。二是“非遗”保护

与传承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应明确政府、学界、商界和新闻媒体的“保护主体”和村落“非遗”传承者“传承主体”的角色分工,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助力、家庭社区和社会组织积极自觉自愿参与的“非遗”保护和传承机制。第二,对濒危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抢救性”“生产性”和“整体性”保护。一方面将民间艺人和匠人视为专业人才,通过提供工作平台和稳定的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险,创造条件协助其提高知识技能,增强民间艺人和匠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职业安全感,让他们真正受到社会尊重。另一方面,应建立民间文化艺人、匠人档案,对其进行跟踪培养,实施动态管理,活态传承,鼓励民间艺人、匠人对先祖文化进行创新性研究和传播,增强“非遗”的艺术感染力和适应现代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能力。第三,完善监督和咨询机制。在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通过兴办实体、捐赠项目、赞助设施、建立专项基金等形式参与村落“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宣传和教育等方式唤醒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尊、自觉和自省意识,对基于经济利益驱动而扭曲“非遗”外形及精神内涵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打击和规范;另一方面,政府应培育和促进专业化的“非遗”保护机构或社会组织的成立,为“非遗”保护与传承提供及时稳定的监督、评估和咨询等服务,保障“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在遵循传统文化演进规律背景下科学合理开展。^[16]

(四) 关于城市文化建设实践

彭翠、刘新杨认为,文化大散文的纪实功能对城市文化建设有诸多启示。以保定文化建设为例,第一,以加法点燃保定文化建设的火焰,培养文化建设人才的热爱之情。保定市素有戏剧之乡、民间特色艺术之乡、游泳之乡等诸多美名。同时,还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与民俗文化。面对众多的文化形态,保定市应培育不同专业的文化建设人才,以满足城市文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同时,这样的文化建设人才不仅要拥有坚实的专业知识和多元的学科背景,还要有对文化建设的恒心和对生活的热爱。第二,以减法剔除落后的思想观念,保证正确的文化建设方向。保定在文化建设中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剔除落后的思想观

念,以保障文化建设方向的正确性,推动文化建设的进程。第三,以乘法倍增文化场景的记录和传播,推进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政府应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培育一批创造力强、业务突出的骨干文化精英,让他们深入文化现场,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记录下文化场景,例如曲阳定窑遗址、满城汉墓、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等,并将其以文字、图片、视频和音频的形式,用最快的速度 and 最好的质量传递给受众。或者,文化企业可充分利用工作人员自身的创造力,在保定众多的文化项目中精选几处,安排工作人员驻扎在文化项目附近,亲密接触文化现场,并将其中的文化元素应用在文化产品的创作当中。第四,以除法增加优质文化项目比重,提高保定文化建设质量。将保定市优质的文化项目定为“被除数”,保定市所有文化项目总和定为“除数”,若想得到较大的“商”,则需要加大保定市优质文化项目数量来提升文化建设的质量。^[17]

蔡禹龙认为,深度挖掘城市的传统文化有助于体现城市的文化品位。城市文化的变迁伴生着空间记忆,地理学意义的街区空间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空间进一步诠释着文化空间的内涵。作为空间存在的街区,承担着文化记忆的功能。民俗文化、教育文化、报刊文化的嬗变促成了文化街区的产生与消失,从而使街区文化表现出新的特征。灯市、庙会等民俗活动是空间顺序感与集体记忆的交织,以行动轨迹为表征的空间流动打破了城市区域化的分割状态。以新式学堂为载体的近代教育、以报刊为载体的媒介传播,构成了近代街区文化空间的主体,是城市空间“去味化”的转变,是文化嬗递的重要印迹。^[18]

(五) 关于网络文化建设实践

尹航、张莉认为,建立和完善网络文化产业链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强化网络文化产业思维。打破传统思维局限,借鉴互联网思维,关注用户体验,从产业形态、商业模式、组织制度等方面系统谋划网络文化产业发展。二是坚持创新驱动。围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加快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网络文化产业中的深度应用,改造提升内容生产、发行、传播方式,实现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重塑网络文化产业的技术体系、生产模式、产业形态和价值

链,实现传统文化产业链和网络文化产业链融合创新发展。三是壮大产业规模。推动网络文化企业兼并重组,培育龙头骨干企业,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实现重点企业、上下游相关配套企业协调发展,不断优化产业链结构,壮大产业链规模。^[19]

曹顺兴认为,校园网络文化传播需要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丰富和完善专业电子学习平台,积极创建虚拟学习社区和互动交流平台,实现师生网上实时交流,及时解决学习问题。如何合理利用现有资源来对大学生进行更具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教育则成为各大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校园网络文化传播渠道主要是由各种团体运营和管理的微信、微博、QQ群,这在丰富学生学习生活的同时,也有着引导学生发展的重要作用。第二,为满足教学需要,提高教学效果,大学校园宜充分利用新媒体教学,设置丰富的电子课件资源,保证学生随时随需学习。

1. 建设并完善基于移动网络的电子学习平台。
2. 保存电子作业档案,充分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
3. 创建虚拟学习社区和互动交流平台,师生网上适时交流及时解决问题。
4. 充分利用应用群及微媒体-公众号等形式进行文化宣传和教

育。^[20]

(六) 关于红色文化建设实践

张春艳、唐文玲认为,雄安新区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淀上神兵”雁翎队的英雄事迹,荷花淀派的红色文学,珍贵的红色历史遗存,这些构成雄安新区红色文化的主体。雄安新区红色文化具有良好的政治教育价值、经济发展价值、文明传承价值和历史印证价值,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对这些红色文化进行弘扬传承。对雄安新区红色文化的传承对策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加大红色文献的编制力度。红色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经久不衰,离不开各类红色文献的制作以及传播。这些作品不会随着时间的飞逝而失去它的魅力或意义,相反愈久弥香,成为不可替代的经典。第二,红色旅游开发。白洋淀是5A级景区,有“华北明珠”之称,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同时,白洋淀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处处闪耀着革命的光芒,记录着光辉的红色历史,成为人们旅游观光、心驰神往的地方。第三,校园文化传播红色文化是珍贵的教育资源,

学校应该充分利用红色文化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第四,大力发展红色文化产业,以打造红色品牌为重点,促进雄安新区红色文化产业向高端化、数字化、集群化、创意化方向发展,并且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形成完整产业链条,明确品牌发展定位,深化品牌文化内涵,充分运用新媒体平台,创新品牌营销渠道,带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21]

赵凤华、陈立秀认为,河北省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主要四个方面。第一,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内容和文化内涵。红色旅游的关键在于丰富其内容和文化内涵,使之成为发扬中华民族红色精神的载体。深入挖掘红色旅游的文化内涵,在全社会开展“国际博物馆纪念日”“讲好红色故事”等活动,展现红色旅游深层魅力,实现红色旅游现实价值。第二,加强红色旅游资源与民俗文化相融合。红色旅游与民俗文化融合开发,从资源角度讲,有利于发挥二者的资源优势,促进二者共同协调发展。从民俗文化讲,民俗文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将二者进行整合开发,不仅可以借助红色旅游的平台推动民俗文化发展,而且可以利用民俗文化的特点丰富红色旅游的文化内涵,实现二者共赢。第三,旅游规划与管理形成联动机制。河北省各个旅游部门形成联动机制,发挥各自的职能,完善市场竞争规则,减少恶性循环的价格战,为旅游者提供独特有意义的旅游产品,安全舒适的旅游体验。第四,构建红色旅游生态系统。从生态发展的视角,整合不同的资源和元素,实现红色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功能,构建红色旅游生态系统。^[22]

新时代条件下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需要挖掘红色文化的忠诚教育价值。周立军认为,红色文化作为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历程中积累和总结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宝贵文化遗产,在军人忠诚教育中有着积极的作用与价值。第一,红色文化应用于军人忠诚教育的必要性,一是加强军人忠诚教育的意义。忠诚是军人最基本的职业素养与道德标准;忠诚是军人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根本动力;军人忠诚度是关乎国家与人民安全的关键要素。二是红色文化与军人忠诚教育的逻辑关联。红色文化是军人忠诚教育的重要资源与素材,军人忠诚

教育是传承红色文化精髓的重要途径。第二,红色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红色文化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是由当时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出来的一种先进文化,其不仅是革命精神的体现,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其在军人忠诚教育中的作用与价值主要为,一是红色文化对于培养当代军人人民子弟兵意识的作用;二是红色文化对于培养当代军人对党忠诚意识的作用;三是红色文化对于培养当代军人为国尽忠思想的作用。^[23]

周立军认为,以红色文化铸就当代革命军人忠诚品质的路径有四个方面。第一,依托红色文化开展党史军史教育,强化理论武装浇铸忠诚。一是系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二是深入开展军魂教育;三是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第二,挖掘革命先辈优秀事迹的榜样力量,用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植忠诚。一是挖掘革命先辈事迹,讲好红色故事;二是利用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邀请革命前辈亲临现场,发挥老一辈革命人的榜样作用;三是发扬红色传统,重塑我军作风。第三,聚焦使命任务,强化红色实践锻造忠诚。一是开展仪式教育活动;二是开展遂行任务红色教育;三是红色文化的精髓内容与部队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在部队生活中处处体现红色文化的内涵,处处渗透忠诚教育的元素;四是借助红色文艺活动推动。第四,建设红色军营文化,优化环境升华忠诚。一是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内容,创建红色军营环境;二是加快推动红色网络资源建设。^[24]

(七) 关于长城文化建设实践

对于长城的宝贵价值的重要意义,杨德春认为,首先体现在物质文明的层面上,即长城的雄伟壮观以及由此所体现的中国历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坚韧和创造力,长城在历史上具有抵御侵略、保卫和平的重要意义。其次体现在精神文明的层面上,实际上长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用“万里长城永不倒”来象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这是“长城精神”和“长城文化”的基本内涵。但是,中华民族“长城精神”和“长城文化”的内涵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完整而全面之阐释,故“长城精神”和“长城文化”的内涵还有一些问题亟须研究。^[25]

(八) 关于礼仪文化建设实践

礼仪文化教育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校德育的热点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吴丽君、尹琪认为,学校开展礼仪文化教育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有利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礼仪文化教育的实施策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按年级分学段实施礼仪文化教育。小学阶段,要求学生注意仪容仪表,学会基本礼貌,遵守小学生守则。初中分为3个阶段:初一阶段的学生对礼仪文化教育认知不够明确,应该以校园和个人礼仪为主;初二阶段的学生应该以家庭礼仪为主;初三阶段的学生心智已经趋于成熟,该阶段应该以社交礼仪和民俗节庆礼仪为主。高中阶段要引导学生对教材文章中的礼仪文化深入挖掘,提高学生的社交能力。第二,编写礼仪教材并增强礼仪教学内容,让礼仪文化教育走进课堂,可采取单独设学科或者与语文课堂相融合的方式,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中能更加直观地学习到礼仪知识。第三,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礼仪文化教育。在礼仪文化教育中,社会是保障,提供完善可靠的教育制度;学校是主要阵地,为开展礼仪文化教育提供环境和知识来源;家庭是后盾,在日常生活中协助学校将礼仪文化教育的成果深入学生内心和生活。“三位一体”的格局一旦成立,礼仪文化教育一定能有成效。此外,优化教师队伍,改善学校育人环境也是礼仪文化教育的重要方面。^[26]

(九) 关于诚信文化建设实践

李晓君认为,高校图书馆应当重视读者诚信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读者诚信教育活动,以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第一,加强读者诚信教育,培养公德意识,图书馆应充分利用其便利的条件为读者进行诚信教育和引导,进一步树立守信为荣、失信为耻的道德观念。第二,加强图书馆自身建设,提高诚信形象,图书馆制定的各项制度要坚持以人为本,以读者为中心,切实保障读者平等使用图书馆资源的权利,同时要保护好读者的个人隐私。强化图书馆自身建设应该从硬件设施和人员素质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图书馆应加强硬件设施的定期维护和更新,将有问题的或者存在隐患的设备设施及时修复,以降低设备的损坏率。同时针对高校图书馆普遍的占座现象,图

图书馆应该普及线上预约座位系统,提升图书馆自动化水平,为读者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图书馆对于读者要进行帮助和引导,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不断增强自身的素质,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第三,建立读者诚信档案,完善细化相关制度。图书馆应不断完善馆内的各种规则制度,使读者可以更明确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建立读者诚信档案的同时要针对个别读者的失信行为制定具体的处理细则,将责任义务进一步细分。设立读者失信、不文明行为的惩治制度,并进一步细化对读者一些不良行为的惩治办法,给予读者不同形式的惩罚措施。第四,加强读者入馆教育及签订诚信协议书,让读者了解图书馆与读者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让读者知晓图书馆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这样可以有效减少读者诚信缺失甚至违法事件的发生。^[27]

近几年来,科研诚信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赵风华认为,科研诚信建设新规范的亮点主要表现在:第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研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以推进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为重点、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为目标及健全完善工作机制为保障,坚持惩治预防并举、监督自律并重,坚持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严厉查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全力打造共享共建共治的诚信建设新格局,营造诚实守信、崇尚创新、追求真理、鼓励探索、勇攀高峰的良好氛围。坚持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系统推进重点突破、宽容失败激励创新、终身追责坚守底线的基本原则。第二,科研诚信管理体系要建立健全高效协同、职责明确的工作机制,并首次明确了科研诚信工作统筹协调和宏观指导的分工,科技部负责自然科学领域,中国社科院负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第三,实行科研活动全流程诚信管理。科技计划管理部门要在项目指南、立项评审、过程管理、结题验收和监督评估等管理全过程落实诚信建设要求,建立科研诚信承诺制,加大科研诚信审核力度,凡是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实行“一票否决”。第四,强化科研诚信制度化信息化建设和教育宣传。新规范要求科技部和社科院要会同相关单位强化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完善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行为的调查处理规则。健全学术期刊管理及预警制度,对问题学术

期刊,实行黑名单制度。第五,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立罚则。新规范明确规定,科技部负责监管自然科学论文造假,中国社科院负责监管哲学社会科学论文造假,要切实履行好调查处理责任,一经发现,随时调查处理。这样,就有利于形成诚实守信的科研环境,有利于强化科研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的责任意识,有利于增强科研人员的诚信意识。^[28]

(十) 关于家风文化建设实践

王秀彦、刘凤茹认为,家风是指在一个家族或家庭内、大家都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循的言行规则。家风有好坏之分。好的家风通常表现为家族或家庭和美、关系融洽,成员均知书达理,遵守社会公德,体现出健康、积极、向上的正向价值观。好家风的养成,主要是借助于家族或家庭长辈对后人的正确引导与教育,即所谓道德传家。柏乡魏氏以道德传家,不仅在历代家族成员中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其于安身立命、待人处事中从容应对,而且又最大化地体现了他们个人的社会价值。其良好家风传承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勤勉向学,修养自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翻检史籍旧志,不难发现,魏氏族人,无论有无功名,身居何位,莫不自幼至老以读书为第一要事。他们勤勤恳恳,嗜学不倦,以丰富知识、开阔眼界、修养自身。“学而优则仕”,魏氏子弟嗜好读书的风气养成,在科举盛行的时代,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为步入仕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进士、举人出自魏家,占据了地方贡举人才的半壁江山。第二,重视家庭教育,教书育人。首先在学业上,魏氏子弟除正常的接受各级别学校正常教育外,还在家里接受父兄长辈的课业督导。其次,伦理道德的教育。这是魏氏家庭教育的重点,也是道德传家的最好体现。一方面家长通过督课子弟、兄弟子侄间彼此交流、著书立说等形式,对儒家伦理、理学著述的讲解、阐述,将其中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灌输给下一代。另一方面,采用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直观形式进行教育。^[29]

三、理想信念与时代精神研究

(一) 关于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理想信念问题,反复

告诫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王秀华认为,第一,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永不结业的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第二,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要做到以知促行、知行合一。坚定理想信念,一方面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加强理论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另一方面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做到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以知促行、知行合一,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体现在工作生活中、细微环节上,转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第三,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贵在时时处处、持之以恒。时时处处,就是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一如既往地坚守和践行理想信念,在胜利时和顺境中不骄傲不自满,在困难时和逆境中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考验,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第四,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领导干部要作表率。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就会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就会在无形中产生强大的引领力量。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坚定理想信念方面当标杆,决不能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一要求不仅适用于工作生活,在坚定理想信念问题上更应如此。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体现到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体现到做好本职工作上,体现到严格要求自己上,一刻不能放松、丝毫不能含糊。^[30]

薛国凤认为,学校、家庭、社会这三种教育力量要协同起来,时时处处为少年儿童提供合适的环境,让少年儿童自己去参与、去实践,并在

做、看、听、想的参与实践中完成对个人理想信念的思考、选择以及进一步的建构。在现时代,要有效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至少应建立起以下三重视域。第一,建立价值论视域。无论是生活理想、职业理想还是国家理想、社会理想,本质都是一种价值赋予,而价值具有属人性,其存在旨趣在于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是有用性的表现。所以在今天,当对少年儿童进行理想信念教育时,必须把握理想信念的这种价值赋予性。第二,建立生态化视域。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一定的理想信念教育。这种理想信念教育既是与社会其他子系统共生的一种存在,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存在系统,因此须以生态化视域考量理想信念教育并营造生态化教育环境。第三,建立微文化视域。微文化是指“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的产生和普及使用使人们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更加关注个体和微观发展的文化现象、文化格局”。教育工作者必须把握微文化内涵,深刻认识其本质,建立微文化整体视域,积极利用微文化的正向力量,以平等化、对话化、生活化、实践化等为关键词赋予理想信念教育以新的实施机制。^[31]

梁明伟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促进教师理想信念教育。第一,强化理论认知,增强教师积极情感。加强中小学教师的理想信念教育,应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教师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把理想信念教育与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和专业发展结合起来,结合时代特点和教师的实际需求,为中小学教师量身定制适宜的理论认知内容,在理想信念教育过程中应该注重激发中小学教师的兴趣和动机。第二,拓展教师理想信念教育可以从教师教育培训、学校组织学习活动和新媒体运用等方面展开。首先,中小学教师可以通过参加各种教师教育培训来接受理想信念教育。教师教育培训是当前中小学教师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培训,教师的知识与技能、态度与情感等都会得到一定的提升和发展。其次,学校可以通过组织相关学习活动来增强中小学教师对理想信念的认同感,还可以借助新媒体互动性强、方便快捷等特点,促进教师间的交流与沟通,让教师在互动中增强学习的效果。第三,健全管理制度,完善教育评价机制。中小学教师理想信念教育应该注重

健全学校教育管理制度,从而为中小学教师理想信念教育提供必要的组织支持和制度保障。完善教师理想信念教育的评价机制,就是要打破现实中存在的中小学教师理想信念教育中“低效果、无评价”的局面,让教师理想信念教育实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让教育评价与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改进和教育教学制度的完善紧密联系在一起。^[32]

对党员干部来讲,坚定理想信念是一项基本功,须臾不可放松。刘丽认为,第一,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基础上,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思考问题,廓清思想迷雾,坚定“四个自信”,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第二,要强化党性修养。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补足精神之“钙”;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把稳思想之“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筑牢信仰之“基”;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理想与事业,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靠得住、信得过,切实做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不断提升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第三,要提升道德水平。党员干部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坚决抵御腐朽思想、错误观念和不良风气的侵蚀,自觉净化“交际圈”“朋友圈”,老老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情趣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为坚定理想信念提供道德支撑。^[33]

刘延雷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理想信念培育的策略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践行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大学阶段的学生相对来说对未知事

物的好奇心相对较强,更加愿意接受新鲜、有趣的事物。为了迎合广大学生的喜好,坚定广大学生实现伟大“中国梦”的目标。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利用学生喜欢的内容以及教学方式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第二,渲染思想政治教育情感。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程是极其不易的,是伟大先辈用血液与汗水为我们建造的。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带领学生感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坚定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理想信念。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思想,用平等、诚恳的态度对学生进行点拨。第三,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大学教育并不只是将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而是在传授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人格,养成学生高尚的品质。教师应该积极秉承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实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文化育人的教育目标,用高雅、积极、优秀、鲜明的文化观念对学生进行情感以及精神的熏陶。总而言之,高效地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理想信念培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职责。思想政治教育与理想信念培育的目标一致,皆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人才培养目标。^[34]

(二) 关于“赶考”精神

李辉认为,“赶考精神”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党的优良作风,国内学者对其从不同层面进行过研究阐释,概括起来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一是以人民为本,尊重人民的历史地位和主人翁地位的群众情怀;二是居安思危,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忧患意识;三是勇于探索,善于挑战的学习精神;四是敢于自我革新,自我批评,乐于接受群众批评建议的果敢魄力。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须牢记初心,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解读好“赶考精神”的现代内涵:一是尊重人民群众“主考官”地位,密切联系群众,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二是执政党的学习之路永无止境,要时刻充电学习,建设学习型执政党;三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纳谏,自我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不断优化治国理政策略。^[35]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要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矢志接续奋斗,唯有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才能更好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陈春生认为,第一,

增强执政本领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担当新使命,要求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是开启新征程的需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是肩负新时代历史使命的需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是实现新目标的需要。第二,适应新时代赶考要求,深刻把握增强执政本领的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了党的建设和执政经验,从党和国家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出发,提出从八个方面增强执政本领。深刻把握增强执政本领的内涵,对于走好新时代赶考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增强学习本领,面对新形势新使命新任务,各级干部要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善于学习,勇于实践,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和学习型组织中加快知识更新、重构知识体系,着力提升科学文化素养,不断增强解决问题的本领,努力成长为新时代的优秀干部。二是增强政治领导本领。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三是增强改革创新本领。党员干部的改革创新本领,从根本上决定着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四是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发展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五是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各级干部的法治素养和依法执政本领,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工作的绩效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综合形象。六是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增强群众工作本领。七是增强狠抓落实本领。“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把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关键是要狠抓落实。八是增强驾驭风险本领。新时代赶考之路会面临种种风险和挑战,各级干部必须端正赶考心态,保持战略定力,不断增强驾驭风险本领。^[36]

(三) 关于西柏坡精神

冯雪梅、温瑞认为,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敢于”、两个“坚持”、两个“善于”、两个“务必”。两个“敢于”即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两个“坚持”即坚持依靠群众、坚持人民参政的民主精神;两个“善于”即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两个“务必”即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一种自励精神。“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特质,“探索、创新”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自信担当是西柏坡精神的顶层精神”,这些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精神体系,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断奋进的强大的精神动力。西柏坡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西柏坡精神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源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37]

薛建中、田丽认为,把西柏坡精神概括为三句话,就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慎终追远的主动“赶考”精神,艰苦奋斗、拒贪防变、固本守正的永葆本色精神,增强本领、提高能力、与时俱进的不断学习精神。这三个方面的要求,是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容,相互间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进京赶考”,其中就包括共产党人能否永葆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能不能为人民群众执好政、掌好权、创造美好生活的“考试”内容,而要在各方面都考出好成绩,也离不开艰苦奋斗、永葆本色的政治自觉,离不开通过学习提高各方面的本领;永葆本色,目的是为了考个好成绩,而且只有永葆本色、不断学习才能考出好成绩;而不断学习,则不仅是考出好成绩的必要条件,也是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的必然要求。人们耳熟能详的“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进京赶考”是西柏坡精神重要特征,但西柏坡精神亦非“进京赶考”四个字就能全部概括。把“两个务必”“进京赶考”融入以上三方面要求并将这些要求作为有机整体来理解,才能科学把握西柏坡精神的实质与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西柏坡精神的实质,就是谦虚谨慎、永葆本色、正视挑战、面向未来的不懈进取奋斗精神。它的核心,是“不懈进取奋斗”。其他要素,都是为这个核心服务,围绕它而展开。其中,永葆本色是根本,也是党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只有永葆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才能跳出“其兴也浚”“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始终成为革命、建设、改革各项事业和为实现最高理想远大目标而奋斗的领导者、开创者;谦虚谨慎是保证,只有牢记“两个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慎微慎初,才能少犯错误,不走弯路,推动党领导和开创的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正视挑战是前提,面对事业发展带来的本领恐慌,只有主动学习、努力学习、持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各方面能力,才能在新形势、新任务、新课题、新考验面前攻坚克难,胜任愉快;面向未来是归宿,共产党人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始终坚持在做好当前工作同时,不忘为实现远大理想而奋斗,西柏坡精神常提常新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就是它始终在激励全党为实现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而奋斗。西柏坡精神,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初心。^[38]

(四) 关于塞罕坝精神

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必须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着力把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推向深入,不断书写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周金中认为,第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和把握塞罕坝精神的深刻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精神做出了深刻概括,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首先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其丰富内涵。牢记使命,是塞罕坝精神的核心。牢记使命、对党忠诚,是党员干部最基本的政治品格,也是塞罕坝人创造荒原变林海奇迹的重要支撑。50多年来,塞罕坝建设者始终不忘党的重托,牢记修复生态、保护生态的使命,用心血和汗水在莽莽荒原筑起万顷林海。艰苦创业,是塞罕坝精神的支点。塞罕坝林场的创业史,就是一部不断开拓奋进、攻坚克难的奋斗史。绿色发展,是塞罕坝精神的根基。塞罕坝人始终以改善生态为己任,一代接着一代干,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深刻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第二,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我省林业生态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大力营造弘扬塞罕坝精神的浓厚氛围,林业生态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表现为植绿护绿保护生态环境的氛

围日益浓厚,国土绿化步伐全面加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第三,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不断书写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牢记职责使命;其次要围绕重点工程,扎实推进绿化工作;再次要增绿富民,发展壮大林果产业;最后,强化资源管理,巩固绿化成效。^[39]

(郑英霞、鲍志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 [1] 耿建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特质[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7).
- [2] 高新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向度刍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3] 刘文敏.自媒体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校中落细落小落实的途径研究[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8(1).
- [4] 张丽萍,单翀飞.接受视阈下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9).
- [5] 李华.构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长效机制[J].党史博采,2018(9)下.
- [6] 苏国伟,智延娜.京津冀协同发展视阈下保定文化软实力建设[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
- [7] 王倩.微电影传播与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研究[J].传播力研究,2018(3).
- [8] 杜运辉.传承创新中华文化核心基因[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2-23.
- [9] 张翼,崔佳慧.新农村建设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18(9).
- [10] 郭秀丽.燕赵文化功能文本翻译研究[J].科技咨询,2018(3).
- [11] 孟祥昕,温建英,常海龙.燕赵人文精神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1).
- [12] 沙占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生态文明观探析[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8(10).
- [13] 王士良.《国语》中的生态哲学思想述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4).
- [14] 张翼,崔佳慧.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发展的特点及对策[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
- [15] 李珍,赵丽芳,赵树国,肖静.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现状和决策研究[J].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
- [16] 陈静,栾文敬,周蒋婕.乡土记忆与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研究——基于湖北巴东堂戏的思考[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 [17] 彭翠.文化大散文的跨域传播对承受文化建设的启示[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12).
- [18] 蔡禹龙.解构与变迁:城市文化的空间记忆——基于清

- 代杭州城的分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 [19]尹航,张莉.传播主流价值 引领社会风尚 创造性构建网络文化产业链[J].四川戏剧,2018(7).
- [20]曹顺兴.校园网络文化传播渠道与新媒体教学建设研究[J].大众文艺,2018(5).
- [21]张春艳,唐文玲.雄安新区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8(11).
- [22]赵凤华,陈立秀.河北省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J].才智,2018(1).
- [23]周立军.红色文化在军人忠诚教育中的应用研究[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7).
- [24]周立军.论红色文化与当代革命军人忠诚教育[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7).
- [25]杨德春.关于“长城精神”和“长城文化”的几个问题[J].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2).
- [26]吴丽君,尹琪.语文课堂礼仪文化教育策略探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 [27]李晓君.高校图书馆读者诚信教育探讨[J].河北科技图苑,2018(5).
- [28]赵凤华.略论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新规范[J].河北企业,2018(8).
- [29]王秀彦,刘凤茹.柏乡魏氏之家教、家风的当代启示[J].邢台学院学报,2018(3).
- [30]王秀华.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N].河北日报,2018-11-7.
- [31]薛国风.“三重视域八种方法”:论少年儿童理想信念教育[J].中国德育,2018(6).
- [32]梁明伟.理想信念教育:教师教育的重要内容[J].中国德育,2018(6).
- [33]刘丽.革命理想高于天[N].河北日报,2018-8-8.
- [34]刘延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与理想信念培育分析[J].现代职业教育,2018(4).
- [35]李辉.论“赶考”精神的现代意蕴与新时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8(5).
- [36]陈春生.全面加强执政本领 走好新时代赶考路[N].河北日报,2018-4-18.
- [37]冯雪梅,温瑞.西柏坡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究[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8).
- [38]薛建中,田丽.西柏坡时期党的历史方位与西柏坡精神的实质与核心[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6).
- [39]周金中.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 书写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N].河北日报,2018-8-22.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田海舰

2018年度河北省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重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文化、网络技术为载体、平台和依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出版专著10多部、发表论文80多篇,但基础理论研究仍显薄弱,高水平、有质量的论著缺乏。

一、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与工作创新

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郭晓葵的《新时期高校教育问题探索——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视角》、^[1]梁巍的《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2]谷丽新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3]张鹏路的《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方法探析》、^[4]赵云霄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融入研究》^[5]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6]等等。

李维意、赵英杰认为,高校“滴灌式”思想政治教育是现代农业滴灌技术在高校育人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本质特征看,

高校“滴灌式”思想政治教育是点滴指导、细致入微的精细化教育,是循序渐进、持续滋润的渗透性教育,是对症下药、求真务实的高效化教育。从核心理念看,高校“滴灌式”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生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德育为先的品德教育理念、尊重差异的个性教育理念。从实现方式看,高校“滴灌式”思想政治教育采用以德为根的因材施教方式、主动贴近的点滴指导方式、潜移默化的环境育人方式。^[7]

黄云明、王海认为,创新创业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是贯彻落实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问题的重要渠道和方法。从本质上来看,创新创业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学理基础、内生逻辑的一致性。构建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融合的教育体系,是破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匮乏的新思路、新模式,也是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新举措。因此,实现创新创业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互借力与跨越发展、合力推进与耦合

联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8]

张连春认为,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跟随时代变化背景及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综合素养的新要求,在教育理念、路径、载体、方法、方式上跟上教育客体的成长成才实际需求。河北北方学院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二三四五一”的新模式,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思想政治教育“二三四五一”模式包含如下五个方面:第一,打通“行”“知”两个教育环节,选准思政工作路径;第二,贯通第一、第二、第三育人课堂,厚置思政工作载体;第三,联通学校、家庭、社会及学生四个教育主体,形成思政工作合力;第四,融通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心理健康、遵纪守法、安全稳定五个教育层面,突出思政工作重点;第五,直通真善美统一的教育主旨,实现思政工作目标。^[9]

温永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有效路径,是“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体现,是对“现实世界”生活本质的向往,是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理想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空壳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单一化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片面化的方法路径。要立足以人为本核心教育理念,回归现实生活本质,从构建多重目标体系、提供源于现实生活的教育内容、采用多种教育方法、实现人本化价值取向上下功夫,构筑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模式。^[10]

温永强认为,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既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遵循教书育人规律,实现立德树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现实体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提升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内容、方法和环境四个维度的影响。要从培养满怀亲和力的教育主体、提炼富有亲和力的教育内容、采用饱含亲和力的教育方法、创设充满亲和力的教育环境四个方面下功夫,并使之有机契合,达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目的。^[1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时强调,全国公安机关和公安队伍要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全面加强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做到对

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巩竞认为,这“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不仅为全国公安队伍能力素质全面提升,也为公安现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行动方向,注入了发展动能。“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融入公安现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现了公安现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决定着公安现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其融入的原则和内容要突出对党忠诚是政治灵魂、服务人民是永恒主题、执法公正是核心要求、纪律严明是根本保证,其融入的载体和路径要体现“互联网+”集成的时代性、课堂主渠道解读的思想性、实际工作中落实的实践性。^[12]

刘容箏认为,毛泽东诗词以诗言志,展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苦难辉煌历程,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无比崇高的理想信念、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坚韧不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情怀。这些蕴含着优秀品德教育内容的毛泽东诗词为新时代军校发挥育人功能提供了新视角。军校肩负着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军事人才的重任,应始终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要以无比崇高的理想信念指引军校大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培养军校大学生克敌制胜的胆气血性,以坚韧不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引导军校大学生投身强军实践,以同甘共苦的群众观点强化军校大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13]

胡海霞认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标准,是新时期优秀教师的重要素养。其中有理想信念,是实现中国梦的思想基础,体现了思想育人的导向。加强师范类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在历史新时期尤其重要。河北师范大学12年来的师范生顶岗实习支教工程,实施生活化实践的理想信念教育模式,促进了生活实践的创造和学生理想信念养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想信念如何形成”“理想信念教育如何更有效”的难题。^[14]

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胡海霞认为,作为精神之巅的理想信念,源于具有超越性的人的生命活动,植根于人的生命活动构成的生活。理想信念教育必须融

入人民群众的实践生活才能彰显其“精神之钙”的功能。^[15]

时代认为,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供给侧,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供给优质人才的重要保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分析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影响,找到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聚焦理论创新、弘扬传统文化、剖析社会热点改进思想理论供给,提升引领力;坚持党的领导、树立服务意识、加强行为培养改进教育服务供给,提升影响力。^[16]

韩继锋、王斌认为,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格完善和发展,实现主体精神自觉和道德自律。教育者要秉持人文关怀和价值理性,通过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文化自觉培育的融合、显性规约与隐性激励的融合、思想教育与生命成长关怀的融合、抽象理论疏导与现实生活的融合,才能实现人性化、生活化、个性化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17]

梁巍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智库作为一种政策指向性的新型智库类型,是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智库具有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智库面临资政能力不足、政策研究不足、数据管理薄弱、跟踪研究机制不健全等困境,其建设呈现思想生产协同化、专业研究精准化、智慧传播媒体化的发展趋势。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智库应从协同创新、成果转化渠道、数据管理平台搭建、高端研究队伍等方面加强。^[18]

王凤鸣、许宁以 CNKI 数据库中 2016 年以来发表的主题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1080 篇 CSSCI 期刊文献为分析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多维度分析、词频统计等方法进行分析,呈现出 2016 年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核心明确,研究内容多元化、载体丰富、方法创新,但同时体现出研究内容的松散和宽泛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学者队伍庞大,但部分学者贡献能力有待提高。建议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畅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者沟通平台,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体系化建设,逐步构建稳固的学术团队,使大学生思想政治研究迭代进步,促进内涵式发展。^[19]

杨渝玲等把心理学的内容和方法融入思想政

治教育实践,从知识层面、情感卷入和行为体验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索。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学导入之学科优势。心理学中的方法和手段,尤其是一些实证研究的成果和前沿研究结论,应用到思政课堂上,有助于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政教育,提高思政教育水平,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次,导入心理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计。通过构建问题情境,引发学习需求;情感卷入,强化认知体验;反馈体验,习得思政教育的具象阅历三个过程,学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所学知识,并在体验环节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对其以后的行为会有引导和激励的长久效应。最后,营造学习情境与氛围,良性循环与互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所有学生组成相应的课程学习小组,活动都以团队的形式展开。小组合作学习不仅有利于学生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宽容和友善,而且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抽象的概念还原和回归到日常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加深对科学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达到从认知到接纳再到践行的效果。教学相长的同时,教师也进一步了解学生关注的重点,实现因材施教,“思想育人”。^[20]

石立博等认为,将人本思想和理念引入并运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在更为广阔更为长远的前瞻视角下审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变革,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正规化、科学化以及人性化发展的趋势。人本教育思想有利于改革传统教育模式,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增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它要求创造良好的人本教育环境,全面培养学生,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模式。^[21]

陈颖等认为,医学院校口述校史的挖掘整理工作和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工作特点和侧重点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相关性。立足于口述校史的视角,以之为切入点,创新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构建两者工作的有机融合,既能提升彼此的工作效能、又能实现资源的整合和优势集结,对于医学院校不仅必要且有优势。医学院校应该招募学生志愿者参与口述校史专业工作组,在活动中实现医学生的教育与自我教育;开发推广口述校史的衍生产品和活动,提高口述校史励

志育才的影响力和辐射面；建设以“口述校史”为主题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医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22]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赵婉华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以唐山师范学院为例》。^[23]

赵学琳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全面系统、层次分明的教学目标，其中提高大学生能力和素质方面的教学目标具有重要的功能，这是由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目标、教学内容和实践趋向决定的。我们需要从功能、现实、条件和实践等多个角度，准确厘清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能力目标的学理关系和互动性影响，进而为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提供新的维度，为全面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创造条件。^[24]

张云飞、王新华基于京津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情况的调查数据，分析论证了北京、天津与河北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机构建设、经费管理、师资建设、教材选用、教学效果评价等方面的区域差异，提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发展应遵循因地制宜、互补共赢的原则，立足长远、积极谋划的原则，分类合作、广泛参与的原则，可持续性的原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发展应建立和完善协调领导小组、科研课题联合攻关机制、区域内师生交流培训机制、优势资源共享机制、社会实践基地共享共建机制。^[25]

王建洲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育人能力建设呈现出一些新的客观趋向，主要是价值引领性、教学技能性、创新驱动性更加凸显。要深度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提质增效”，切实增强高校师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与学中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就必然要求“多点发力、重点突破”：打造高校思政课教师师德建设工程，提升价值引领能力；创新高校思政课教师在职培训模式，提升教学技术能力；完善高校思政课教师考核激励机制，提升创新驱动能力。^[26]

朱晓琳认为，长期以来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全程育人的中心环节——课程考评体系，由于未能正确认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之间的关

系，多以终结性考核为主要考评方式，忽视了课程考评本身所应具有的激励、反馈、检验和诊断功能，大大制约了学生综合素质特别是思想道德素质的发展，严重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立足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教育任务，在探索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评价体系构建中引入“过程管理”“行为管理”和“绩效管理”的理念，将学生的日常表现和量化成绩与课程考核结果紧密结合，建立多维度考核评价体系，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推动“终结性考评”向“过程考评”的立体化考评转化。^[27]

王希艳、周立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这种教学模式是混合式教学思想和课堂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要点包括在课前采用以学生需求为中心的在线资料学习，在课上以思想启迪为取向的课堂教学，在课后以线上测评为依据的综合考试。这种教学模式不仅会极大地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效果，而且会使学生线上的学习和线下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28]

赵雪等认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开展应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三方面出发，以“四个正确认识”为前提，提升思政课教学中的“问题意识”“坚持在改进中加强”。以基于生活化的高校思政课“嵌入式”教学思路为重点，强调社会实践与思政理论融合，努力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养，努力将思政课培养目标嵌入高校现实生活进程，以增强教育的针对性。^[29]

王红向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大班教学、小班助教”的教学模式，既兼顾了传统教学模式的优点，又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本科生作为助教，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任课教师、助教本人、大学生和课程本身相融合，更好地实现教学模式的最优化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有利于缓解高校师资紧张，提升教师科研能力；有利于锻炼助教教学技能，提高助教综合素质；有利于夯实学生基础理论，落实立德树人任务。^[30]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红色文化

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李维意和赵英杰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路径研究》、^[31]李维意的《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研究》、^[32]朱晨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研究》、^[33]万海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爱国主义教育研究》、^[34]白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研究》、^[35]常海龙的《燕赵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36]等等。

田海舰、田雨晴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毛泽东在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价值目标时，提出了许多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相关的思想观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基本内涵、实现路径、价值意义做了初步阐释，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艰辛的思考、探索和实践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37]

田海舰认为，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一生从事全部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的主题，是《共产党宣言》所昭示的“初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是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和实践追求。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价值蕴涵，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对于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要求和启示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38]

申文杰认为，只有不断创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和方式，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创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和方式，要着重把握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要创新各种实践活动载体和方式，强化实践养

成；二是要创新和完善制度，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心入脑；三是要融入日常生活，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四是要创新文化载体，以先进、有益的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是要创新舆论宣传形式，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浓厚社会氛围。^[39]

高新文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决定的，与西方普世价值观具有本质的区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不仅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念。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维度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加强民族认同，推动文化自信具有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积极作用。^[40]

周立军认为，传承红色基因，铸就忠诚军魂，是“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建设强军的基础工程。红色基因的主要载体是红色文化，其蕴含了丰厚的忠诚养分，具有天然的育人铸魂功能。红色文化可为我军忠诚教育提供新的视角，确保强军目标的实现。在当代革命军人忠诚教育中，红色文化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坚定当代革命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红色文化诠释着党的意志，铸牢当代革命军人对党忠诚的军魂；红色文化蕴涵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当代革命军人为国尽忠的意识；红色文化孕育“人民子弟兵”意识，强化当代革命军人忠于人民的精神品质。通过理论学习、榜样引领、实践体验和环境熏陶等，红色文化可创新当代革命军人忠诚品质的培育路径。^[41]

孟祥昕等认为，燕赵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大学生认识社会，有利于大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生活质量。将燕赵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有机融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陶冶学生情操，指导学生把握客观规律，构建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体系。同时能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大学生的自信心，增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为大学生今后的发展提供精神和智力支持。^[42]

冯雪梅认为，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将西柏坡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从“究内涵、求方法、重成效”这三个方面着手。“究内涵”是西柏坡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求方法”是西柏坡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重成效”是西柏坡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达到理性上认知西柏坡精神,情感上认同西柏坡精神,行为上践行西柏坡精神。^[43]

陈淑玲等认为,抗日军政大学在战争环境和生活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成功办学,不仅书写伟大民族精神新篇章,而且培育出优秀的“抗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弘扬好这一宝贵财富,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孕育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脉源泉。抗大培育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斗争敢于夺取胜利的精神,不畏艰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敢于牺牲自己的无私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仅进一步深化、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所形成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我们新时代履行新使命的不竭动力。^[44]

王欣认为,唐山红色资源具有特殊性,存在极高的教学价值,是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教育资源。她认为高校思政教育存在思政课教师的专业水平和素养亟待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政课学习情况不容乐观、部分高校对“思政课”的定位不准确等问题,主张依托唐山市红色资源推进思政课教学转型,要传承红色基因,创新思政教育教学路径;发挥理论宣传优势,加强贯彻党的指导思想;重视转型特色,突出思政课实践教学。^[45]

赵雪、曹甜甜认为,唐山精神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是当代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充分发掘唐山精神的教育价值,把它嵌入教学全程,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实性、灵活性和趣味性,真正让思想政治理论课入脑入心。^[46]

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康建林的《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探究》等。^[47]

赵金萍等认为,新媒体环境下思政工作面临着多元冲击下价值观扭曲、教育权威被冲击、讲

台思想摇摆的挑战。高校思政教育在发挥并利用新媒体在思政教育方面优势的同时,要始终坚持团结一切力量加入到思政工作上,要树立党委权威,落实马列核心;要占领舆论高地,引导核心价值观;要强化教师队伍,坚定理想信念。让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真正价值,敦促高校教师特别是思政课教师不断学习并加强利用新媒体工具开展思政教育的能力以及面对新媒体上各种问题的分析力和判断力。^[48]

刘华卿、张清华认为,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学生课外学习和获取生活资讯的最重要渠道。充分利用互联网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院校育人工作的新重点,而建设一个满足高校师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需要的网络资源体系,是高校实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保障,也是顺利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的基础。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重要的信息中心,应充分发挥自身在信息资源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方面的优势,主动参与学校网络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为广大师生的教学科研提供更直接、更深入的信息资源服务。^[49]

(田海舰:河北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郭晓葵.新时期高校教育问题探索——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视角[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2]梁巍.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
- [3]谷丽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 [4]张鹏路.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工作方法探析[M].北京:研究出版社,2018.
- [5]赵云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融入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8.
- [6]赵云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
- [7]李维意,赵英杰.高校“滴灌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核心理念和实现方式[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28-35.
- [8]黄云明,王海.创新创业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发展探赜[J].保定学院学报,2018(5):75-80.
- [9]张连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二三四五一”模式探索[J].中国高等教育,2018(Z3):43-44.
- [10]温永强.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模式[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97-99.
- [11]温永强.关于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的思考[J].

-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2):136-139.
- [12] 巩竞.“四句话、十六字”总要求融入公安现役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探析[J].武警学院学报, 2018(3):53-56.
- [13] 刘容箏.毛泽东诗词在军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育人功能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 2018(1):57-60.
- [14] 胡海霞.理想信念教育生活化的实践探索——以河北师范大学顶岗实习支教为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8(2):123-128.
- [15] 胡海霞.理想信念教育生活化的三重解读[J].人民论坛, 2018(15):128-129.
- [16] 时代.浅析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供给侧改革[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75-78.
- [17] 韩继锋, 王斌.大学生道德教育重在以人文关怀为主导[J].人民论坛, 2018(3):114-115.
- [18] 梁巍, 白金, 朱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智库观察:类型、功能与趋势[J].高校辅导员学刊, 2018(3):36-40.
- [19] 王凤鸣, 许宁.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热点领域的实证研究——基于 2016 年以来 CSSCI 期刊文献的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6):40-48.
- [20] 杨渝玲, 阎晓军, 孙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心理学实现机制与路径探索[J].唯实(现代管理), 2018(11):68-70.
- [21] 石立博, 薛灵芝, 程程.将“人本教育”思想充实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对策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8(2):148-149.
- [22] 陈颖等.论口述校史视域下的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 2018(5):773-776.
- [23] 赵婉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以唐山师范学院为例[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8.
- [24] 赵学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现大学生能力目标的多维机理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5):51-53.
- [25] 张云飞, 王新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区域差异与协同发展——以京津冀高校为例[J].学术探索, 2018(2):152-156.
- [26] 王建洲.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育人能力建设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8(7):87-91.
- [27] 朱晓琳.多维发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考核评价体系创新研究——以华北科技学院为例[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8):28-30.
- [28] 王希艳, 周立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初探[J].高教学刊, 2018(15).
- [29] 赵雪, 白臣, 曹甜甜.高校思政课生活化“嵌入式”教学法探究[J].决策与信息, 2018(8):115-119.
- [30] 王红向.浅析思想政治理论课“大班教学、小班助教”的教学模式[J].课程教育研究, 2018(13):91.
- [31] 李维意, 赵英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路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 [32] 李维意.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教育模式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8.
- [33] 朱晨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34] 万海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爱国主义教育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35] 白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8.
- [36] 常海龙.燕赵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8.
- [37] 田海舰, 田雨晴.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理论贡献——以国家层面为例[J].保定学院学报, 2018(1):12-17.
- [38] 田海舰.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价值蕴涵[J].中华魂, 2018(6):17-20.
- [39] 申文杰.不断创新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和方式[N].河北日报, 2018-4-4.
- [40] 高新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向度刍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2):68-72.
- [41] 周立军.论红色文化与当代革命军人忠诚教育[J].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8(4):119-123.
- [42] 孟祥昕, 温建英, 常海龙.燕赵人文精神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1):159-160.
- [43] 冯雪梅, 温瑞.西柏坡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究[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8(4):82-86.
- [44] 陈淑玲, 杨树, 谷瑞雪.新时代抗大精神传承弘扬的路径思考[J].邢台学院学报, 2018(4):45-46, 53.
- [45] 王欣, 李丽丽.唐山市红色资源在高校思政课教学转型中的应用[J].绿色科技, 2018(19):226-229.
- [47] 康建林.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探究[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8.
- [46] 赵雪, 曹甜甜.唐山精神嵌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探析[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3):105-108.
- [48] 赵金萍, 王晶晶, 张晓芳.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科教导刊(上旬刊), 2018(1):72-73.
- [49] 刘华卿, 张清华.依托高校图书馆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资源的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 2018(4):144-146, 149.

经 济 学

经济理论研究

田学斌 封玉荣

一、西方经济学

(一) 经济增长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刘新建应用动态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深入分析了投资需求与其他需求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方式,认为投资需求动力与其他需求之间不完全独立,当年积累消费配置决定未来潜在增长,当年需求状态决定当年实际增长,主导拉动力的转换会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1]刘宾认为要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战略新兴经济的发展,一个优势平台的建立健全本质上是不同促进机制的相互作用,这是进行制度创新的价值所在。建设战略新兴经济平台有利于资源、人才、技术的重组,从而形成更有效的流动,为高新技术项目建设提供支撑。^[2]

如今中国处于经济新旧常态转换的重要时期,刘文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以重塑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目标,在熊彼特创新经济学视角下阐述了创新驱动的含义、改革的根本任务、改革中政府的职能和根本性质,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的思维解开了人们对供给侧改革认识上的一系列困惑。^[3]

高技术产业是国家创新战略的基石,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其中创新是重要推动力。袁旭梅基于协同学理论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系统的创新实体和创新环境子系统,确定了其影响因素和因果关系及系统流程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系统仿真模型,提出了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能力的对策。^[4]

(二) 就业与消费

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式扩大了社会就业范围。宣懿楠认为共享经济为社会提供了更多更新型的就业岗位,但与就业形成良性互动的

同时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为此应该采取扩大共享经济规模、提升共享经济条件下的就业能力以及稳定共享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就业关系等措施加以有效保障和稳步推进。^[5]消费金融作为互联网和电子支付行业飞速发展背景下诞生的新消费形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段宏煜首先分析了消费金融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增值机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就完善消费金融管理政策、优化市场建设、引导居民科学消费给出了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的政策建议。^[6]

樊锦霞研究了房价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认为在现阶段房价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这种不确定性呈现出非对称的特征,城镇居民消费对“优于预期”不确定性反映更为敏感。政府在对房价的不确定性进行调控时一方面可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以保障居民心理安全,另一方面可通过合理引导预期提升居民消费意愿,进而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7]

张超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分析认为住房消费模型化主要沿 Helpman 范式和 Tabuchi 范式两大脉络展开,十余年来其在住房供给弹性、住房部门嵌入方式、劳动力住房消费异质性、住房租金归属、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模型进行了拓展和修正,认为未来新经济地理学住房消费模型化在诸如住房消费份额固定、租金从城市系统蒸发和劳动力住房消费同质化等方面还存在改进空间。^[8]

(三) 公共服务

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王晓洁从京津冀公共服务供给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关系入手,分析了京津冀公共服务的供给差距和制约京津冀公共服务供给不利因素,并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利用财政政策提升京津冀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一方面要明晰协同

范围和深度,优化政府干预,另一方面要倡导区域财政合作制度和提升区域的财政能力,争取中央财政支持。^[9]王金营将财政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整合为公共服务支出,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利用1998—2014年中国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和动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理,认为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会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同时指出公共服务支出水平是有一定限度的而非无限增长的。^[10]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张玉瑾认为河北财政虽助推了创新型河北建设,但仍然存在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小、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有待加强等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健全财政科技经费管理机制、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完善对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创新型河北建设。^[11]

二、政治经济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张辉认为面对新时代、新发展、新问题,客观上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完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以此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坚持以实践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科学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应着力从研究基点、研究范围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不断创新,从根本上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12]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值源泉是经济学价值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焦点问题。种项谭在梳理和反思我国学术界关于“什么创造价值”和“什么劳动创造价值”的争论基础上提出:价值本质是劳动交换中人与人的关系;“相互交换的劳动”创造价值;承认商业劳动创造价值并不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原则;劳动并不是与非劳动生产要素平行并列的生产要素之一。^[13]

三、区域经济学

(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提是缩小冀与京津的经济差距。郭小卉利用TVP-VAR模型分析2005年第一季度到2017年第三季度京津冀三地之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样本区间内,河北对京津的溢出效应大于京津对河北的经济溢出,天津对北京的经济溢出大于北京对天津的溢出水平,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河北与京津之间的经济差距。^[14]针对不同区域的税负差异,李克桥首先对近几年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和税负状况进行分析,挖掘当前京津冀地区产业布局存在的问题,从建立整体税收优惠政策和各地税收协调政策两个角度提出构建京津冀产业合理布局的一系列政策。^[15]对于京津冀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县域经济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王金营认为,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是京津冀地区发展落后的重要影响因素,以京津冀154个县域单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拓展的县域生产函数进行估计检验,发现中心城市对周围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而这种作用受到了行政区划和体制的限制,因而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必须打破这种限制才能真正促进京津冀县域经济的良性发展。^[16]

王秀芳认为,京津科技金融的资源利用存在“灯下黑”的现象,为了提升协同创新发展水平,促进京津冀区域发展驱动力由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建议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科技金融平台建设中的引导作用,三地联合创建科技金融服务公司,形成政府主导型科技金融平台,同时要设立三地联合的科技创新引导基金和科技信贷担保公司,形成科技金融服务公司对接服务的资金引导力量和融资风险分担机制。^[17]近年来随着国家和公民环保意识的加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受到高度关注,河北省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粗放式的发展模式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刘二亮认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一个能够整合各种创新资源的协同创新网络,在分析协同创新网络对促进河北产业转型升级的机理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协同创新的河北

省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分析和路径选择。^[18]

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经济领域相互作用和城市群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的过程。魏丽华从经济联系的视角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地区沪苏浙城市群的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经济发展的梯次结构还是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沪苏浙地区都优越于京津冀。为了改变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一城独大”式的发展模式,进而构筑梯次良好、经济互通密切的城市空间布局,魏丽华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建议。^[19]张贵以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对京津冀城市群2005-2015年的创新活动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群创新产出地理集聚特征明显,空间分异显著,且京津存在虹吸效应,为了促进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和缩小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空间分异,不同地区要根据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20]

推进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是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初钊鹏基于共生思想、协同学、区位理论和产业规划等视角研究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基本规律与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京津冀一体化共同体和建立“产业=区位+布局+结构+集群”的产业协同规划,探索“一区多园”空间布局的“飞点→辐射→横截→填充”组织模式对京津冀产业集群发展的实现路径,为进一步加快京津冀产业对接协作提出了政策建议。^[21]产业分工定位是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争夺产业链高端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重点内容和竞争的焦点。颜廷标从分析区域产业分工定位影响因素入手,研究区域特质与产业选择偏好及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模式,认为产业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难点与重点。京津冀产业协同推进中出现偏差和效率不高甚至盲目推进的重要原因,是三地的产业分工定位及实现机制这个涉及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22]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产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王韶华通过构建三次产业结构影响能源强度的岭回归模型来分析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优化路径。结果显示,在经济增长目标下,北京市和河北省的产业结构优化不能完成节能目标,而

在节能目标下,天津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不能完成经济增长目标。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北京市应通过节能倒逼第三产业内部升级,河北省应通过节能倒逼工业化进程加速,天津市应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23]。谷彦芳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下产业转移税收分享政策涉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京津冀三地同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这需要三地政府进行有效的协商和协调,同时也需要中央政府进行有效干预。产业转移税收分享政策和税收分享比例的有效设计和运行实施将关系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效、产业转移的顺利推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等各个发展的重要方面。^[24]

(二) 雄安新区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徐永利认为雄安新区现有的传统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行业与未来新区发展规划的高端定位表现出了诸多的非适应性,为此雄安新区传统产业必须转型升级,重构商业生态系统,促进“产城融合”,建立高端商业生态系统,打造国际化品牌和高端大市场,全力推进产学研多维合作,营造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促进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耦合互动,鼓励产业组织形态创新,从而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不竭动力。^[25]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和关键。阚景阳结合国内外科技园区研究基础和实践进展,对国内外科技园区管理体制和融资模式创新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得出相关结论,同时针对雄安新区建设提出了建设应用研究所联合体、试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以及谋划金融小镇等对策建议。^[26]

在雄安新区发展的投融资模式上,胡继成认为应将绿色发展与绿色金融支持体系相融合,利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思维的新理念拓展雄安新区的未来发展空间,用系统工程思维和方法谋划综合发展,基于此提出以下九点建议:一要提升城市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二要做好开发城市的规划、联通和融资的整体性战略性方案;三要增强地方政府信用和财政筹资能力;四要推动地方财政的融资创新和制度突破;五要优化财政资金使用的方式和形式,提升使用效率和效果;六要确保财政资金能有效撬动社会资本的投入;七要充分利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和绿色金融的地方

试点；八要选取最有效的融资渠道、投资模式和政策手段；九要有效利用多边发展性金融机构的资金和技术。^[27]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不仅起因于疏解非首都性功能，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李克桥认为，在雄安新区的产业布局中要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扶持和引领作用，以降低征纳成本和风险为目标，以创新引领为导向，体现灵活机动、科学高效的地方特权运作机制，从而制定出符合雄安新区产业布局特质的税收政策制度，构建“合纵连横”的综合治税机制，强化税收信息现代化建设，厘清雄安新区与其纵横隶属关系的税收征收管理权限以综合促进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28]

四、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一) 人口经济学

随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向资源集中的发达地区聚集。阎晓莹依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利用 1995—2013 年间的城市劳动力结构与工资水平数据，分析不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关系和外来人口冲击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端人才和实践型人才的迁入刺激了本地工资水平的上涨，简单劳动力的迁入则抑制了本地工资水平的上涨，同时高端人才的迁入导致对应的劳动力市场饱和时也会抑制本地工资的上涨。^[29]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面临着的是人口和企业过度集聚而产生的交通拥挤、资源紧缺、环境恶化、劳动力供给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王金营采用生产函数反演法，对京津冀未来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和不同综合要素生产率下的劳动力需求进行了模拟和比较，结果显示，京津冀未来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可能性不断增强，为使区域经济实现持续高质量增长和发展，京津冀地区在新的人口发展形势下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创新驱动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并保持必要的人口和劳动力的规模与活力，进一步促进京津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0]

杨胜利在构建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水平的协调性问题。研究发现，1996 年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

发展保持着良性互动的关系，经济发展环境、对外开放程度、公共财政支出、人口迁移流动、市场化程度、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等是制约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31]

韩晓杰收集了《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以研究贫困地区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贫困地区人口的流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农民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外出劳动人口的持续增加一方面不利于人口流出地的社区管理、农业发展和农业科技传播，另一方面对流入地的城市管理、社会秩序也造成了困扰。他建议加强贫困地区社区管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的科学水平，促进科学的人口流动，同时也要加强城市社会管理，提高市区的基础设施承载能力。^[32]

(二) 环境经济学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博弈是当前中国转型发展的必然表现。初钊鹏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雾霾治理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提出中国式分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框架下雾霾治理的基本假设，尝试从环境规制执行视角对中央指导、地方响应和企业执行的理想化“合作”博弈提出解决方案。^[33]为治理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污染，政府正在不断增加京津冀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俞会新运用 EBM 超效率模型对京津冀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显示，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逐年递减，科技水平越高、资金管理越完善、环境政策越合理、环保产业自身发展水平越高，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值就越大。^[34]

韩楠通过分析供给侧要素与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关系来构建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并模拟预测未来中国碳排放的发展趋势，发现通过增加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升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以及加大科技投入等路径均能够使得碳排放呈现不同程度地下降，其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增加对碳减排作用最为显著，因而在资本、劳动力及创新等要素综合调控下能够实现 GDP 增加的同时碳排放量下降。^[35]当前我国的生产发展模式正处于转型期。黄玥认为部分现有模式背离了绿色生态发展模式从而诱发了一定的资源生态问题，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建立健全保障制

度,充分借助政府职能来对生产企业与市场流通渠道进行监管与定期调控,以期促进绿色开发生产、消费利用及生态修复。^[36]

五、国际经济学

(一) 国际贸易

在经济全球化愈发深入的今天,我国的对外贸易进程会更加融入全球经济。张国梅等介绍了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贸易的特点,发现双边农产品贸易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同时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农产品的贸易不平衡程度与产业内贸易呈负相关,对外开放度与产业内贸易呈正相关。^[37]马文秀以我国和拉美新兴市场双边贸易数据为基础,构建出口竞争力测评指标体系,分析中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工业制成品出口现状,研究发现,中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工业制成品出口规模较大且增速快,出口产品以机械和运输设备为主,从而得出中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较强和潜力较大的结论。^[38]在中日对东盟基建关联产业出口的竞争中,中国较日本出口规模大、增速快,在出口竞争力上中国呈上升趋势、日本呈下降趋势,相比日本而言,中国整体上是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的,且竞争效应是其主要原因。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处于劣势地位,但行业组合效应为正,因而中日基建关联产业应加强在东盟市场上的合作力度,提高出口的联合竞争力,实现中日贸易的动态互补与合作共赢。^[39]

刘妍收集了2005—2014年间的贸易数据并运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结构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效用优化关系,并给出相关结论和对策建议。^[40]吕荣杰基于我国1992—2015年对外承包工程与出口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了VAR模型,并就对外承包工程与货物出口、服务出口和技术出口的内在关系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物出口、服务出口和技术出口均带动了对外承包工程,其中对外承包工程对货物出口和技术出口产生了替代效应,对服务出口产生了带动效应,货物出口对外承包工程的贡献率最大,最后通过实证分析为缓解出口困境、实现我国对外合作与出口贸易的利益最大化提出了政策

建议。^[41]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尤其是中国对中东地区的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发展势头良好。李敏认为随着“一带一路”持续推进,我国对中东地区直接投资格局还将进一步优化,这对于我国相关企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并基于“一带一路”背景深入分析了我国对中东地区直接投资的情况,进而从强化保险业务力度、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大信息技术应用与推广、采用多元化投资策略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对中东地区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42]

(二) 世界经济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吴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日本1990—2014年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是经济增长质量的较大提升,且日本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实际上是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提供了改善空间。^[43]

董佳佳认为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和新形势下,日本农协的发展显现出越来越多的制约因素。结合市场经济学理论,从产品开发营销、市场管理、人才培养等角度提出了日本农协在农产品市场营销中的新战略,对完善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产品市场活动中的职能,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44]

随着自由贸易区的蓬勃发展,优惠原产地规则对一国参与区域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成新轩以东亚自贸区优惠原产地规则呈现的特征为分析起点,探究了优惠原产地规则通过贸易成本、贸易流和投资影响东亚区域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机制,对如何通过完善东亚自贸区原产地规则、加深区域专业化分工和提升我国在区域内的产业地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45]

六、体制改革

土地产权制度关系到千家万户。赵金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初的农地产权政策是不断缩小土地耕作的责任主体直至农户家庭从而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开始赋予农户稳定的土地经营权,通过“两权分置”使农户成为市场经营主体。随着农民的非农就业趋势的增强,中央开始推进“三权分置”,即在

所有权不变、承包经营权稳定的基础上放活经营权,利用经营权的市场化配置实现耕地的有效利用。农地产权演变的特征体现为:农地产权政策演变顺应宏观环境的变化,产权主体的重心不断下移直至承包户,承包经营权身份属性弱化而财产属性增强,未来农地产权将不断细化经营权可能得到强化,所有权主体面临重构,但同时改革难度也将不断加大。^[46]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陈俊龙通过构建双寡头垄断模型,考察是否存在部分管理授权条件下的产能过剩,并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探索最优的产品差异化水平。研究表明,不同条件下的产品差异化对产能过剩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政府的产能规制政策未必会彻底化解产能过剩;产品差异化程度与社会福利水平呈正相关,需要鼓励企业走产品差异化发展之路,这些研究结论对中国目前的去产能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47]

经济发展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陈俊龙认为企业的交叉所有权行为需要政府的科学规制,在混合所有制条件下又需要考虑国有股比例。对此,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制定科学的规制政策,稳步有序地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时政府对企业交叉所有权的规制要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互配合。^[48]李巧莎以河北省为例探究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实现路径,其认为尽管近年来河北省及各地市不断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和创新投入,但河北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为此应采取加大财政税收支持力度、拓展直接融资渠道、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和科技保险体系等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融资对策,从而带动科技型中小企业走创新发展道路。^[49]

七、三农问题

(一) 农业

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严春晓等对邓氏关联度模型的适用条件进行了剖析,并通过搜寻 2012 年河北省 139 个部门投入产出表和 2013—2016 年农产品加工业统计资料,发现河北省皮毛羽丝加工、棉麻纺织业关联度综合优势评价分别位居全省第 2

位和第 1 位,因而应将其作为主导产业有针对性地予以重点扶持。^[50]

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愿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陈薇的研究以威县农业为例,以共生的视角对其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的主体行为及所处环境进行分析,她认为威县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主体间的共生关系可以促使其密切合作和良性互动发展,其中共生环境对共生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并指出“种植—养殖—微生物处理—种植”这一整体型共生模式可以使收益实现最大化。^[51]

(二) 农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切实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和尊严感,并且新设立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同时指出也要培养新时代下的职业农民。吕雅辉等采用实地座谈、电话访谈、案例剖析等方法对以产业联盟为载体,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阳晨模式”中,农广校和企业“校企合作”培训机制是基础,政府“自上而下”保障机制是关键,政府、企业、联盟户间利益联结机制是动力,以期为培育新时代下的新型职业农民提供意见参考。^[52]

(三) 农村

普惠金融如今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李伟等认为,在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金融服务薄弱问题一直比较突出,要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加快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并对有效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53]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土地流转已成必然趋势。赵帮宏从博弈的视角,在新形势下基于三次大规模调查,针对调研过程中土地流转遇到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以充分发挥农村土地流转在促进“三农”方面的积极作用。^[54]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战略举措。郑丽果认为实现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对接必须处理好体制改革和政策落实、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价值观引导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协同问题。^[55]

(四) 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和艰巨任务,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较快实现乡村振兴。陈丽莎从分析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出发,指出为了实现乡村振兴,必

须统筹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以城镇经济反哺和带动农村经济,以城镇化战略助推乡村振兴战略,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合作,实现城镇利益和乡村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主体利益的多赢。^[56]

科学、合理的财税体制能够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互动,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助推器。司洁萌认为当前我国的财税制度、体制及地方政府财力、债务风险等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她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该加大财税体制改革,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发展。^[57]宋宁分析了商贸流通业的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认为此集聚作用将扩大产业对就业人口的吸纳作用,有助于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目标。^[58]郭岩峰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对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河北省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发挥地域优势、平衡地域发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不断推进河北省新型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59]

(五) 精准扶贫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李汉才认为,新时代下的精准扶贫,应坚决抵制形式主义,从事实出发,找准症结把准脉,开对药房拔“穷根”。对于当前我国精准扶贫中存在的走马观花、繁文缛节、“样板工程”、空喊口号、虚假脱贫等形式主义问题,要通过管理规范化、参与民主化、考评科学化、服务制度化等方式坚决杜绝,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准扶贫。^[60]

郭小卉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分析了金融精准扶贫的两种模式,即“股份合作制+”模式和“政银保”模式,其认为保定市在金融精准扶贫中还存在金融扶贫精准度不够、地方政府融资担保平台监督机制尚未建立、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示范带动效应不显著等问题,因此需要建立贫困人口大数据信息和农户信用评级体系,加强地方政府各级融资担保平台的监督和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政银保三者之间的利益联结,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继续完善股份合作制,以有效提升金融扶贫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61]

陈凤珍认为,中国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还面临着四个问题和挑战:深度贫困地区依然是脱贫攻坚要啃下的硬骨头;易地扶贫搬迁任务艰

巨;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乏力,返贫压力上升;扶贫领域作风问题突出。建议应该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攻坚,重点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需要,优化和加强扶贫资源的投入和分配,从而推进脱贫攻坚的顺利进行。^[62]

八、经济史

左海军认为,明清以后,中国商业的规模发展与商业资本运作方式的转变促使中国传统“内生”金融机构呈现出连贯的、系统化的发展趋向,同时金融资本逐渐从商业资本中缓慢独立出来。晚清民国以后,中国的金融需求和金融市场进一步复杂化,钱庄以一种超越账局和票号的全新形态出现,以特殊的运作方式最大程度地为商业活动提供支持,在推动商业领域的信用交易方面具有非凡意义。^[63]从商业资本中独立出来的钱业在明中期以后发展缓慢,但对后世的账局、票号、钱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钱业谱系演变体现了制度的不断创新,在明清两代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缔造了中国钱业自身发展的逻辑。^[64]

(田学斌: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封玉荣: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

参考文献:

- [1] 刘新建,房俊峰.经济增长动力的投入占用产出分析[J].管理评论,2018,30(05):95-100.
- [2] 刘宾.以制度创新推动战略新兴经济发展[J].人民论坛,2018(02):76-77.
- [3] 刘文超,李辉.熊彼特创新经济学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河北学刊,2018,38(02):150-156.
- [4] 袁旭梅,蔡文书,王伟,张旭.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系统建模与仿真[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04):63-71.
- [5] 宣懿楠.共享经济与就业何以良性互动[J].人民论坛,2018(31):50-51.
- [6] 段宏煜,武敏,韩敏敏.消费金融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增值机制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8(13):162-164.
- [7] 樊锦霞,叶莉,张玉梅.房价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一个行为金融学角度的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8,40(05):9-14.
- [8] 张超,兰宗敏,王慧娟,关凯.纳入住房消费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式[J].经济问题探索,2018(04):182-190.
- [9] 王晓洁,王丽.新时代背景下促进京津冀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37):18-26.
- [10] 王金营,李庄园,李天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1998-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

- [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1(06):92-99.
- [11]张玉瑾,武根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动创新型河北建设[J].经济研究参考,2018(58):21-28.
- [12]张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辩证思考——基于经济新常态视阈[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39(02):7-11+54.
- [13]种项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于对价值源泉争论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05):23-33.
- [14]郭小卉,康书生.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探析[J].经济与管理,2018,32(06):4-12.
- [15]李克桥,左玉娇,王坤,王伟婷.区域税负差异背景下京津冀产业布局的财税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18(22):4-9.
- [16]王金营,何岩浩.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要素作用与城市辐射[J].河北学刊,2018,38(01):139-144.
- [17]王秀芳,于濛,程月.构建京津冀科技金融平台的思路[J].经济与管理,2018,32(03):17-21.
- [18]刘二亮,纪艳彬,于敏.基于协同创新的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8,28(05):21-24.
- [19]魏丽华.论城市群经济联系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基于京津冀与沪苏浙的比较[J].地理科学,2018,38(04):575-579.
- [20]张贵,李涛.京津冀城市群创新产出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8,32(01):69-76.
- [21]初钊鹏,王铮,卞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理论认识与实践选择[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6):178-184.
- [22]颜廷标.区域特质、产业分工定位与实现机理——以京津冀产业协同为例[J].河北学刊,2018,38(03):155-160.
- [23]王韶华,张伟.基于能源强度和经济增长目标的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8(07):88-96.
- [24]谷彦芳,王坤,李克桥.京津冀协同发展下产业转移税收分享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46):4-7.
- [25]徐永利.雄安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考[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01):69-73.
- [26]阚景阳.国内外科技园区开发建设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基于雄安新区科技园区建设[J].建筑经济,2018,39(01):11-15.
- [27]胡继成,鲍静海.雄安新区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探讨[J].中国流通经济,2017,31(12):108-114.
- [28]李克桥,孙颖鹿,李佳伟.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税收政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保定学院学报,2018,31(01):1-6.
- [29]阎晓莹.外来人口供给冲击对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来自CHIP 1995—2013的证据[J].人口与经济,2018(02):25-36.
- [30]王金营,唐天思.京津冀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下的需求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8(06):1-11.
- [31]杨胜利,王伟荣,王艺霖.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及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与社会,2018,34(05):84-93.
- [32]韩晓杰,张晶晶,陈丽国,郭静.贫困地区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34):22-27.
- [33]初钊鹏,卞晨,刘昌新,朱婧.基于演化博弈的京津冀雾霾治理环境规制政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2):63-75.
- [34]俞会新,林晓彤.京津冀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8,37(05):136-144.
- [35]韩楠.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碳排放减排路径及模拟调控[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08):47-55.
- [36]黄玥,王云峰.让绿色发展理念落地生根[J].人民论坛,2018(14):76-77.
- [37]张国梅,宗义湘.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34(09):143-146.
- [38]马文秀,孟彤.中国对拉美新兴市场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及潜力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02):92-102.
- [39]马文秀,王惜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对东盟基建关联产业出口竞争状况分析——基于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与转移份额分析方法[J].日本问题研究,2019,33(02):34-44.
- [40]刘妍,吴远远.中国—东盟贸易效用水平测度及优化评价[J].商业经济研究,2018(02):127-129.
- [41]吕荣杰,张冰冰,张义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与出口贸易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8(04):46-57.
- [42]李敏.“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中东地区直接投资的机遇与挑战[J].对外经贸实务,2018(06):77-80.
- [43]吴宇,王珂珂.199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长质量研究[J].现代日本经济,2018,37(05):52-68.
- [44]董佳佳,王利艳.日本农协在农产品市场营销中的新战略及启示[J].商业经济研究,2018(01):65-67.
- [45]成新轩,于荣光.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优惠原产地规则对区域专业化分工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8(08):112-122.
- [46]赵金龙,王丽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产权政策演变及未来展望[J].经济纵横,2018(05):89-96.
- [47]陈俊龙.产品差异化、政府规制与产能过剩[J].财贸研究,2018,29(09):1-11.
- [48]陈俊龙,汤吉军,汤昊.企业交叉所有权行为与政府规制研究——兼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有股最优比例[J].

- 中国软科学,2018(01):171-182.
- [49]李巧莎,吴宇.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融资实现路径——以河北省为例[J].税务与经济,2018(01):57-61.
- [50]严春晓,刘景芝,李含悦,熊晓轶,宋辉,张润清.基于改进关联方法的河北省农产品加工主导产业选择[J].农业工程学报,2018,34(11):268-277.
- [51]陈薇,杨帆.基于共生理论的威县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主体行为分析[J].农业经济,2018(08):9-11.
- [52]吕雅辉,张润清,张亮,赵帮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阳晨模式”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8(11):38-49.
- [53]李伟,刘景芝.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参考,2018(06):43-54+58.
- [54]赵帮宏.新形势下农村土地流转研究的新进展——评《博弈视角下的农村土地流转研究》[J].河北学刊,2018,38(03):223.
- [55]郑丽果.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振兴如何协同发展[J].人民论坛,2018(30):78-79.
- [56]陈丽莎.论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作用[J].云南社会科学,2018(06):97-102.
- [57]司洁萌.新型城镇化建设呼唤财税体制改革[J].人民论坛,2018(17):86-87.
- [58]宋宁,温赛.商贸流通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J].商业经济研究,2018(17):20-22.
- [59]郭岩峰,张春艳.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对策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8(05):41-42.
- [60]李汉才.精准扶贫应坚决杜绝形式主义[J].人民论坛,2018(36):56-57.
- [61]郭小卉,康书生.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分析——基于河北省保定市的案例[J].金融理论探索,2018(02):34-42.
- [62]陈凤珍.完善脱贫机制打赢脱贫攻坚战[J].中国合作经济,2018(03):25.
- [63]左海军.中国传统金融的“内生”特征与近代转型——基于银号与票号的对比分析[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4(02):62-67.
- [64]左海军.清中期以前中国传统钱业发展与性质演变[J].学术探索,2018(07):116-121.

区域经济和部门经济研究

陈志国

2018年度研究延续了往年的问题为导向的范式,突出了地域性、现实性和应用性的特点,重在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出思路 and 对策。

一、区域经济发展

(一) 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与战略

孟永峰和杨竹晴认为,自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中央和京津冀三地都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但是,通过对比三地的产业结构状况,尤其是通过对比河北省和京津两地的产业结构状况,发现京津冀区域产业合作仍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距,政府相关部门的合作水平较低、缺乏长效的协同机制,京津冀三地在金融、能源、工业制造等方面存在产业重合等问题。因此,根据三地的产业发展差距以及相关问题,河北省应该在承接京津两地产业对接的基础上,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扩大第三产业占比,积极发展绿色循环经济,走出一条现代化的工业发展道路。同时,还应在现有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产业集聚,增强发展优势。在

农业发展上,逐步提高现代化水平,延长农业生产链,促进农业高质量的发展。^[1]

孙丽文、张蝶、李少帅运用京津冀2010—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创新系统协同性指标体系,并且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能力进行了测度和评价。结果显示,近些年来河北省虽然与京津两地的协同创新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较京津之间的协同创新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且三地之间的协同创新水平差距较大,尤其是河北省与北京之间的差距。因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中,京津冀三地要打破行政壁垒,共同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同时要明确各地的分工与地位。其次,三地之间要加强科技和人才资源的共享。最后,河北省应该增强自身发展的实力,打造高质量的高新技术园,缩小与京津两地的发展差距。^[2]

郭小卉、康书生根据2005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四季度的数据,使用TVP-VAR模型对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初期,三地的经济溢出效应较为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三地的经济溢出效应出现逐步下降的态势;而且,三地之间溢出效应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三地的经济发展差距。这充分说明北京非首都职能的疏散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小,也充分说明了建设雄安新区的重要意义。因此,河北省应该打造经济增长极,更好的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而且要进行整体规划,打破行政间的壁垒以及区域经济的分割态势。^[3]

(二)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刘宾认为,新时期的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虽然具有政策优势、基础设施优势以及地缘优势,但是仍然存在高精尖产业与资金投入向京津两地集聚、三地之间缺乏高效产业管理机制以及河北地区产业发展水平低、环境质量较差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京津冀三地的产业协同发展进程。因此,要适度调节三地之间的产业失衡,提高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关联性和协同度。河北省应该把握建设雄安新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机遇,扩大其优势产业,打造属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对产业转移加大扶持力度,不断优化产业转移环境,依托雄安新区的发展逐步缩小与京津两地的融资差距,走出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发展—出口”的可持续发展道路。^[4]

张波通过京津冀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在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对比以及京津冀区域内部各工业门类的对比,对京津冀产业协作的基本方向 and 政策的选择进行了阐述。首先,京津冀三地应该根据自身的功能定位,明确自身的产业发展道路,使三地产业布局更加的合理化。尤其是河北省要承接产业转移和京津两地的科技成果转化,推动自身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其次,在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河北和天津要明确分工,河北省主要承接生产制造以及与之相关的研发和策划环节,天津主要承接高端生产环节和研发环节。最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程中,要稳步推进三地的政策一体化,以缩小河北省与京津两地在营商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更好地推动三地的产业协同发展。^[5]

陈永昶、王玉成阐述了智慧旅游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仍处于不均衡且分散的发展状态,京津冀三地之间的实力差距较大。其中,旅游市场和资源分布呈现向京津两地集聚的形态,

这成为了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的重要阻碍。因此,通过分析创新机制、学习机制、知识管理机制、资源整合机制以及可持续发展机制对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驱动作用,明确指出要推动“智慧化旅游”,加强技术创新,转变发展模式,利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提升信息的掌握度,最终形成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基础的知识管理机制。同时,还要加强京津冀三地人才、技术、资本的流动,推动区域旅游协同的可持续发展。^[6]

(三) 河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闫永路认为,河北省作为沿海省份,应该充分发挥海洋这一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加快培养海洋经济新动能,深入推进河北省海洋产业与“一带一路”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融合,实施科技兴海战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海洋新兴产业,提高海洋服务的占比,促进海洋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在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海洋产业优化升级的同时,要走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道路,牢牢守住海洋生态红线,合理利用海洋空间资源,加强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与此同时,还应完善人才、产业政策体系以及海洋管理服务,为海洋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保障。^[7]

张立华、李南等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沿海城市的港口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各子系统进行了综合评价,建立了共生度和共生趋势模型,并根据唐山市的数据进行了具体的测算。实证分析结构表明唐山市的港口经济和低碳经济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虽然呈上升趋势,但二者只是低水平的共生。^[8]

二、区域竞争力

(一) 区域竞争力的选择路径

王金营、李庄园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很多时候会依赖于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动和人力资本的聚集。因此,打造中心城市成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实现中心城市的这些作用,人力资本的聚集是关键因素。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从经济、产业、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探讨中心城市对区域人力资本聚集的效应和路径,发现中心城市的产业发展、公共支出、教育医疗等因素均对人力资本聚集有着显著影响。不同的中心城市在区域

人力资本聚集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有的是积聚作用为主,有的是溢出作用为主。因此,中心城市在制定自身发展战略时既要自身经济发展角度考虑又要兼顾城市间的互动关系,最终实现共同发展。^[9]

孟永峰、杨竹晴认为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下,河北省需要加强与北京、天津的合作,利用地区优势推进三大产业的现代化发展;要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提高工业水平,找到适合本省产业发展的路径,积极发展绿色环保循环经济,以激发河北省的产业发展活力。同时,河北省还要不断推进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进程,做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京津的人才培养合作,使农业技术人才更好地服务于河北农业的发展,要拉长河北省农业产业链,形成农业产业优势,以达到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合作的目标。此外,河北省还要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学习京津两地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经验,降低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阻力。要形成地区产业聚集的优势,利用集群化来做好京津产业转移的承接,在合作中探索出适合河北省发展的产业发展之路。^[10]

颜廷标认为,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实际上是按照空间优化发展目标,将多方利益主体有效链接起来,形成基于区域层面最优产业体系的过程。但某个产业体系的建立,也有可能不是发生在区域内,也无法保证区域内就是产业分工协作的最优组合,所以产业协同实则包括区域间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实现京津冀产业分工优化,市场起着决定性作用,或者如果能够让市场充分发挥其有效作用、企业按照区域特质及产业属性自动流向适宜区域,也能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的目标。所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重点是如何放松管制,强化政府的引导和支持,让市场充分发挥其决定性作用。^[11]

(二) 促进区域竞争力提高的政策措施

郭子雪、张雅辉运用 DEA 模型测算了京津冀地区的物流效率,并利用投影分析对非 DEA 有效的决策单元从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调整。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京津冀区域物流效率的对策建议:进一步加强京津冀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要合理利用天津港、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等港口资源,充分发挥其作用,建立多种交通运输方式协同发展的局面,

提高京津冀物流效率;加快京津冀区域内物流资源的优化整合,针对京津冀区域物流资源布局不合理、物流资源未能很好地整合优化以及物流资源利用率低的现象,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宏观调控,通过改进物流技术、改善物流管理方式、提高物流网络的畅通性等方式,优化京津冀物流资源配置,提高物流资源利用率,均衡调整京津冀物流业从业人员的结构,积极推进京津冀区域内信息化建设,强化京津冀区域内物流产业的分工协作。^[12]

李炜、康凯在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时发现,有一些创新型产业,它们在区域内创新活动密集、创新规模较大、创新能力具有代表性,它们的发展对区域创新和区域经济具有溢出和辐射带动作用,因而称这样一类创新型产业为区域中的创新极,整个区域创新系统就是多个创新极共生并存在复杂演化的系统。因此,衡量一个区域创新极培育能力,对鉴别区域创新发展的潜力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应推出激励产业创新集聚的财政支出,促进产业创新极化的形成与发展。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对创新极培育支持力的必要组成部分,对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都具有重要作用。当地政府应关注产业的发展困境,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和支持,对于有明显区域带动性的产业,要起到协调和监管作用,同时利用财政支持的刺激作用,增强自身的创新极培育能力,推动创新极形成。^[13]

马林靖、严雪晴认为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环京津贫困带”必须实现京津冀三地协调共建,在多领域密切协作。从生态补偿、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着手进行,在联合中求发展,逐步缓解与京津远郊区县的贫富差距,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要把握“京津冀都市圈”战略带来的合作机遇,加强京、津、冀三省市的联合,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加强生态环境合作共建,跨区域合作减贫,通过跨区域合作共同保护生态屏障,为“环京津贫困带”脱贫制造机会;加大京津冀三地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对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建设的资金投入,使京津冀的交通运输体系网络化、绿色化、安全化。^[14]

（三）河北省区域产业竞争力

王健、张悦玲通过对河北省农业劳动力人口、耕地面积和农业灌溉数据的分析，认为河北省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减少，耕地面积稳定在较低的水平，有效灌溉面积和旱涝保收面积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随着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农业灌溉设施和农业排水设施的不断完善，农业生产得以改善。因此，河北省在农业投入方面要提高劳动力素质、保障耕地面积和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随着河北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对劳动力文化和科技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政府部门和农业从业者都要有意识的提升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河北省应根据生产的实际需要，确定耕地面积的最小值，维护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持续性。^[15]

王东平、郭少博研究发现河北蔬菜产业发展中存在价格优势不突出、区位优势发挥不够、经济效益不足、产业链条不完善和产品质量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等问题。供给侧改革要想得到有效的推进，除了国家的宏观调控之外，农民也要转变发展观念，调整种植结构，多生产绿色有机食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提升经济效益。河北省蔬菜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应抓住机遇，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和现代化产业升级。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对河北农业发展的定位是高产高效的生态农业，因此，河北蔬菜的发展应围绕高产、高效、高质的产业目标，加快蔬菜产业的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区域的布局，立足于服务京津都市群消费的大市场，确保蔬菜的供应；以提高蔬菜产业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针对河北主要蔬菜品种实施一品一标，以标准引领品质档次提升；蔬菜产业质量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做到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保障质量安全，强化产业链质量管控。^[16]

吕荣杰、贾芸菲以 GEM 理论模型为框架，从基础、企业、市场 3 个层面分析了河北省吸纳京津技术的竞争力。河北省在吸纳京津技术时，在资源方面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储备丰富，人力资源充足，劳动力成本廉价，区位优势明显等方面。完备的设施建设不仅支持了河北省企业的发展，为河北省企业更好更快地获取资源信息提供了保障，同时还进一步方便了河北省与其他省份的交流协作。河北省区域内产业的规

模、集群的数量等要素可以保障河北省中、下游产业链的完整，促进核心竞争力的提高，规模企业数量多，政府鼓励支持其发展企业品牌优势，有利于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京津技术，扩大竞争优势。河北省政府要引导帮助支持省内企业的健康合理发展，同时兼顾硬件设施、制度安排以及市场机制的有序发挥。政府部门应建立统一严格明确的创新绩效评分体系，定期进行企业考评，关停评分很低的企业；对于一些创新潜力大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甚至提供财政补贴，同时还要对中小型企业给予政策、资源方面的优惠倾斜，可以通过对其减免税收、减免租金等方式缓解他们资金的压力。^[17]

三、城市经济

（一）新型城镇化建设

陈丽莎认为，中国乡村资源相对匮乏，除了土地资源外，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都呈现出不足的势态。这说明，单纯依靠乡村自身力量很难实现新型乡村振兴的目标，必须依靠城市资源的优势来推动乡村振兴。为了顺利实现乡村振兴以及促进乡村社会的良好发展，必须处理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者的关系，促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带动乡村振兴战略。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时，不仅要兼顾乡村振兴战略，还要制定具体的措施，促进城镇经济反哺和带动农村经济，城镇化战略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促进政府与市场合作，实现城镇与乡村之间、社会公共和市场主体的共同促进、共同发展。^[18]

顾瑶、刘宇轩认为京津冀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遇到了瓶颈期。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规模扩大挤占了乡村用地，从而出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二是作为京津冀发展的短板，河北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落后，人才资源不足，导致京津冀发展不均衡，城镇化也出现失衡现象。三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带动力不足。四是由于缺少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导致产业升级困难。五是小城镇能源和环境资源的制约，影响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为了推进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该统筹城乡规划用地，优化空间布局，引导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围绕中心城市发展其相关产业，推进绿色城市建设，破除环境污染难题，从而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城

镇化稳步推进。^[19]

黄惠英、张连春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不仅是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也是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必要生产力,经济、生态、社会各方位发展的过程。通过构建城镇化、科技创新、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对三者进行动态关联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2000—2015年间,城镇化、科技创新、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在时间顺序上存在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从而为了促进城镇化、科技创新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应该建设智慧城镇,引进科技人才,发展现代农业;利用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发展基础以及完善配套设施。^[20]

(二) 城市化与产业规划

朱峰、单耀辉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要素禀赋配错,价值观念被扭曲的现象,青年群体真正的需求未得到重视,使城市与青年的关系产生了严重异化。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要求正确对待青年发展和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人才集聚所带来的生产力对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产业集聚所带来的高收机会是城市吸纳青年的基本动力,完善的基础设施、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宽容的社会环境是城市承载青年的关键因素。为了促进青年与城市化共同发展,使青年为城市贡献更多才能智慧,城市应为青年提供更多的包容度和吸引青年群体聚集城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便利条件,并提升经济包容性、政治包容性、社会包容性、文化与空间包容性,必须保障青年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共享中的优先权,为青年更好贡献城市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21]

杨梅、刘嘉茵认为,过渡型社区是城镇化发展的产物,是由于农民离开了自己原有的居住地,开始在相对集中的社区内生活而形成的。同时,为了提升过渡型社区居民的知识、技能水平,加快经济发展构建了过渡型社区居民教育,专门为该社区居民提供教育服务。过渡型社区教育有利于整合社区资源和提高社区居民的整体素质水平从而促进社区居民再就业,但是在城镇化视域下的过渡型社区教育实施起来却存在难题:

过渡型社区教育缺少专门保障社区型教育模式构建的法律,缺乏强有力的管理体制,导致管理的无效性,缺少专职工作人员,且现有工作人员专业性不强的现象。因此,不仅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还要关注过渡型社区教育相关者的诉求,给予相关者自由参与决策的平台,重视资源开发与利用,完备保障体系。^[22]

李东雷、黄彩英指出,河北省是人口和农业大省,这些年,乡村经济畸形发展,农村生态环境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振兴乡村首先要改变乡村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实行绿色发展,实现经济、生态、社会三方效益的有机统一。但是农民主动参与乡村经济绿色发展的积极性并不高。农民盲目追求产量高农作物的生产,污染型企业、油品不合格的加油站仍然存在和发展,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影响了乡村经济的绿色发展进程,这是因为农民的“脱贫求富”愿望强烈,新型职业农民的缺失和留守农民的文化水平偏低,乡镇经济绿色发展的外部效益不太明显,基层政府对经济绿色发展的支撑力度不够。为了提升农民参与乡村经济绿色发展的积极性,应该做到:为农民积极参与绿色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制度保障,发展规划和平台保障。^[23]

(三)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薛晴、陈会谦等人指出,在城镇化进程中,只依靠耕种土地来取得经济来源的农民越来越少,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时代背景下,有更多农民想要通过劳动就业来取得经济收入。而就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现状来看,农民工政治参与程度较低,职业地位总体不高,创业择业能力缺乏,职业发展延续性较差,职业技能与素养不高,并且职业认同处于两难境地。因此,为了提升农民的社会保障,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反贫困问题,应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待遇,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利益诉求,突出公民素养和意识形态的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全面发展,创造新生代农民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需求、转型成为高素质新型产业工人条件。^[24]

金浩、李瑞晶等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地区土地城镇化现象明显,大批农民失地、劳动力外流、开发区建设沦为“鬼城”,导致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各类生产要素非农化速度与程度失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构建“人口—资

本城镇化、人口—土地城镇化、资本—土地城镇化”三重城镇化协调发展指标，并利用复合系统混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我国 283 个地级市三重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分别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三重城镇化的空间分布及其驱动力。研究发现：我国地级市尺度的三重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整体有所提升，但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依然存在；在影响三重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因素中内部动力占主导地位；人口—资本城镇化和资本—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较高，能够促进三重城镇化的协调发展。^[25]

张亚明、石笑贤等人从自然、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综合评价体系，研究中发现环京津贫困带各县的社会建设和投入不足，有待加强。河北省围场县、丰宁县、赤城县、张北县、顺平县及阜平县属于经济中高度致贫区，康保县、涞源县、尚义县、沽源县和围场县情况最严重，是自然高度致贫区，针对贫困农民政府要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改善贫困人口居住环境，为贫困农户布局扶贫产业，针对失业者和贫困农民，开展实施“精准扶贫人才服务计划”，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集中开办职业技术学校，提高农民的相关知识技能，不仅可以使贫困农民生活和社会保障达标，经济保障也可以通过再就业得到保障。^[26]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孟庆瑜、梁枫认为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与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正式进入实质推进阶段，生态环境保护作为这一战略中需要率先突破的任务之一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因而采取京津冀协同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制度及对策成为了一项重大的社会课题，根据对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调查数据显示，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形势复杂严峻但社会民众对于其成因和危害后果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在遭遇环境侵害时难以做出正确应对，因而为加强民众的认识需形成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新格局，即协同立法新机制；司法合作新模式；生态保护补偿新发展。^[27]

胡悦、金明倩等认为，对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测度，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由目标层面转化为

建设实施的操作层面，因而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运用文献频度统计法构建京津冀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地区的生态文明发展演变及区域状态进行了定量研究，分别从综合评价结果、子系统评价结果（生态健康子系统和生态可持续能力子系统）、协调分析结果、差异性分析结果等方面对京津冀三地区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针对京津冀当前各自的生态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首先各地区要立足自身优势，寻找解决途径；其次要摆脱属地主义，以“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感走合作之路；最后要配套市场的力量，建立长久的机制。^[28]

乔颖丽、王馨玮认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定位于环境支撑区的河北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是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面临的困境，因而提出在跨域治理思路的框架下结合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主体多元性、主体双向互动性、主体网络化联系的特点，选择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模式。在权力线与扁平化相结合的跨域治理机制下，通过政府运用政线制定统筹配置资源，为生态协同发展提供参与者利益均等的条件；为企业参与生态协同发展创造市场机会；提升利益者的生态文明价值观，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生态保护的参与渠道；创建提升环境支撑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点发展特区。从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框架中，构建生态协同发展利益机制，解决生态协同发展面临的困境。^[29]

（二）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

孟永峰、杨竹晴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地积极开展了多样的对接形式，形成了若干承接平台并推动了部分产业的转移。然而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三地产业结构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以河北为例，它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钢铁产业大省与北京、天津两地的发展差异较大，其产业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因而要做好与两地的合作，加强产业对接，同时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提高工业发展水平、推进现代化农业发展进程、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激发三地的发展活力，为构建京津冀大城市群奠定基础。^[30]

王韶华认为，产业结构间具有相互关系以及与能源强度之间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基于此

研究了京津冀产业结构的优化,对于北京而言,短期内可通过降低第二产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内通过产业内部升级实现技术节能和管理节能;对于天津而言,短期内可通过降低一二产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内应优化工业内部结构;对于河北而言,短期内可通过降低一、二产业比重,提高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内应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契机,通过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加快工业化进程;对于京津冀整体而言,应降低第一产业比重,促进农业现代化,降低第二产业比重,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31]

岳至春、张晓蕊认为京津冀现代化产业版图要以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为核心,但其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面临一些困境,一是北京和天津独立性强但合作理念不强,导致区域发展并未达到统筹兼顾的要求;二是由于河北的经济实力不及两者导致区域内单向人才流动更加剧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不平衡;三是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缺少中型城市的过渡,导致产业向小城市发展缓慢。并指出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突破口是以完善京津冀产业协同合作机制,加快发展功能性区域中心城市,合理分配资源,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等多方面为突破口,通过多方共同努力实现京津冀产业的协同发展。^[32]

(三) 京津冀市场协同发展

杜茂宝、王述芬等指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家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促进了一体化的发展,而市场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内容,而对于京津冀地区而言,加快市场一体化是京津冀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研究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对于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京津冀市场一体化存在的问题有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导致极化现象严重,更多地表现为虹吸效应,而无法发挥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京津冀地区各地建立的发展新区的主导产业相似,地区的区位优势相近,导致各地区之间恶性竞争。为促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应加快合作步伐,实现产业互补错位发展,完成政府在协同发展中的职能转变,持续推动区域对外开放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33]

杜茂宝、张颖等认为,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是三地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展,而市场一体化又是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动力。基于价格波动规律的测度模型,运用价格法对京津冀内商品市场一体化、要素市场和整体市场一体化的程度进行测度,从而构建测度京津冀地区市场一体化的指标,并对市场一体化的程度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经济发展活力、政府行为、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吸纳水平是影响市场一体化的因素。基于此提出促进京津冀地区一体化的政策建议,适度的弱化北京的中心地位,完成政府在市场一体化中的职能转变,推动对外开放。^[34]

(四) 首都经济圈与河北发展

张波的观点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产业定位中,对于京津的定位侧重于研发和创新的研究,对于河北的定位在于先进产业的集聚区和生产基地,以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发展。目前从外部来看,京津冀地区相对于长江三角洲存在一定的差异,长三角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与工业发展相协调,直辖市发挥区域引领的作用,腹地省份是产业布局的主要载体,而京津冀地区的产业错位明显、发展差距较大。为进一步推动京津冀产业合理分工与布局,填平河北的政策洼地,让河北成为与京津共同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就要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产业转移对接、加强京津冀产业协作,这不仅需要加快京津冀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步伐,同时要加快形成京津冀政策一体化。^[35]

孟祥林的观点是构想“软区划河北”,他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为“近京津的河北省地区”创造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为“远京津的河北省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通过做加法和做减法构建起整合程度较高的城市体系,避免河北省在行政区划上不容易构建区域经济中心的发展问题,重新考虑京津冀三地的耦合机制,通过区域协管对三地重新分割,构建“软区划天津”“软区划北京”“软区划河北”。通过城市带和核心城市团对“软区划河北”进行构建,同时构建城市环链、微中心三角形等模式,不断开发新的交通线路,提升不同城市之间的通达程度。^[36]

五、产业集群

(一)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袁旭梅、张旭和王亚娜从区域协同创新能力的角度对 2010—2015 年中国 6 个区域、18 个省(直辖市)的高新技术产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而且以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协同创新综合能力水平—波动、创新环境水平—波动以及投入—产出为维度来对其进行分类,探索不同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能力的水平及波动情况。发现在这一阶段,所研究的各个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创新能力差异是非常显著的,根据各区域根据最终分类结果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提升本区域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协同创新能力。^[37]

邢会、朱欢、高素英和臧丽娟指出,兼具产业链与产业集群双重优势的新型复合组织“集群式产业链”的内在提升机理尚待进一步解析,而集群式产业链能显著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所以以京津冀为例对集群式产业链与高技术产业创新提升机理进行深入探究。在研究过程中主要用了 BCC-DEA 模型,并且采用多阶段的算法,发现集群式产业链通过高效要素流动、联动创新平台以及外部性效应实现创新低成本、技术集成创新和扩散,进而提升技术创新效率,并且产业链水平不同,创新效率也不同。对京津冀研究发现三地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呈现“天津—北京—河北”的格局,并且差距在逐步缩小,并且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38]

李子彪、孙可远、汪锦熙从创新生态系统演化视角,结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引入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态势的概念,构建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创新态势的测度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 2014—2016 年河北省 11 个地市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态”和“势”进行了测度和深入剖析。然后利用生态位理论确定了“态”和“势”的权重,计算河北省各地市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创新态势的综合得分,并对其态势进行实证分析与评价,明确了产业内创新主体的定位及自身所处的创新环境,进而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39]

(二) 传统产业集群

徐永利认为雄安新区现有产业主要以传统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行业为主,与未来新区发展

规划的高端定位存在巨大落差,表现出诸多的非适应性特征。指出雄安新区传统产业必须转型升级,作出适应性改变,按照顾客价值和品牌创新理论,重构商业生态系统。强调“产城融合”,建立高端商业生态系统,打造国际化品牌和高端大市场,全力推进产学研多维合作,营造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促进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耦合互动,鼓励产业组织形态创新,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不竭动力。^[40]

石亚碧认为,雄安新区承担着以改革创新为抓手,改变整个京津冀发展格局、探索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重任。产业是雄安新区建设的支撑和载体,以发展定位、产业发展现状、产业发展趋势、创新发展要求为基点,对雄安新区建设中处理好高新高端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关系及高质量融合发展进行分层研究,据此提出雄安新区产业发展的具体思路和措施。^[41]

刘洁、汪存华指出,雄安新区的建立对于河北省来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的特大红利,另外廊坊地理位置优越,处在京津雄“金三角”之内,这是加快廊坊发展的一个重大机遇。廊坊南三县县域经济的一些传统产业为当地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产业的弊端也不断显现出来,因此在产业发展理念、产业布局规划、新兴产业聚集、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等方面探索南三县加快转型、绿色发展、跨越提升的路径。^[42]

(三) 河北省产业集群

齐美然、郭子雪指出物流产业是河北省的支柱性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促进河北省物流产业的质量发展,研究了河北省物流产业升级对策问题,界定了物流产业升级概念,分析了河北省物流产业升级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促进河北省物流产业升级的相关策略。实现物流产业升级是物流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它对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具有极大促进作用。^[43]

谢会芹、方巍、王湘玉指出,自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河北省承接了来自京津的多种产业,产业集聚效果明显。在区域经济的研究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区域经济的整体战略至关重要,而产业承接后能不能实现产业集聚效应,发挥更大地辐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的重大举措,是河北省“十三五”时期发展的重要机遇,因此采用区位商系数法测度河北省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上的集聚度,分析近年来河北省产业集聚效应,发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可行性建议。^[44]

六、农业经济

(一) 县域经济

王金营、何岩浩将京津冀都市圈与“长三角”及“珠三角”进行对比,认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是京津地区发展落后于“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对京津冀154个县城单位拓展的县域生产函数进行估计检验,分析了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及制约因素。结果显示,在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投资等投入要素尽管存在差异,但都起到了应有的显著作用。中心城市对周围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受到了行政区划和体制的限制。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须打破行政和体制的限制。^[45]

王智新、梁翠通过构建我国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效率评价指标,测度了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效率,分析了效率提升潜力。指出我国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部分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效率比较低;不同县域之间的创新驱动知识发展效率水平和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效率水平差距较大;部分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协调推进,还有部分县域创新驱动知识发展和经济发展出现背离现象。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移转化,加强创新创业载体建设,培育县域创新创业专业人才三条推动我国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效率不断提升的建议。^[46]

葛文光、谢海英、张明华等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是重点。依托地区比较优势,推进县域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进行产业升级,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区域经济的现实需求。选取河北省清河县为研究对象,清河县以马屯红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促进当地山楂产业融合发展,延长了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在探索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分析清河县马屯红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山

楂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模式,提出有利于清河县山楂产业优化升级的对策和建议,为其他县域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借鉴。^[47]

(二) 农业现代化

金书秦、韩冬梅、牛坤玉从农业污染入手,研究农业现代化的污染治理,认为农业面源是水体污染的重要来源。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正处于一个转折期:一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取得初步成效;二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相关职能主体发生了变化。在此背景下,从理解和发挥机构改革对面源污染防治的促进作用,切忌急于追求农业面源污染物减排的量化目标,借鉴国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经验制度三个方面,对下一步做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提出了建议。^[48]

于雷、王静雅指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的需求也正在提档升级,物质色彩明显降低,而人文色彩则日渐浓厚。当前,一种产品或服务能否打开市场,能否满足人的人文性需求已成至关重要的因素。特色休闲农业作为一种集合了观光、游览、食宿、购物等多种功能的新型产业,与传统农业相比,人文色彩十分浓厚,由此而展现出勃勃生机。但是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我国休闲农业的人文色彩导向尚未牢固树立,效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发展特色休闲农业需要多方发力,综合施治。^[49]

吕雅辉、张润清、张亮等采用实地座谈、电话访谈、案例剖析等方法,对以产业联盟为载体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模式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阳晨模式”的形成、相关主体行为、运行机制与应用条件及策略。结果表明:在“阳晨模式”中,农广校和企业“校企合作”培训机制是基础,政府“自上而下”保障机制是关键,政府、企业、联盟户间利益联结机制是动力。模式相关利益主体行为均衡,机制运行高效,在一定条件和策略下可复制应用。^[50]

(三) 土地经济

户艳领、李丽红、任宁等指出农村土地流转是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尤其对于山区的脱贫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贫困山区农地流转过程中还存在农户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不匹配、对土地流转政策理解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基于河北省贫困山区县的调研数据,运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从农户自身情况、农户家庭情况、

农户对土地政策认知、农户对土地流转期望等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了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利用交叉分析判断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的匹配情况。将贫困山区农村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分为外围、较强和显著3个层次。提出了通过重点完善贫困山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培育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做好信息服务定位;深化土地相关政策的宣传和解释;拓展农村土地流转纠纷调解渠道,丰富调节形式等促进贫困山区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举措。^[51]

户艳领、褚建坤、刘少丹等认为开展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体系的研究有利于全面客观认识土地综合承载状况并对其进行优化提升。基于区域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的实证结论,对比了京津冀各区域土地综合承载的优势与短板。依据区域间子承载力发展相对不均衡状况,探讨了经济承载、建设承载、资源环境承载等承载子系统之间的博弈关系。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资源环境、基础设施服务等方面分析京津冀土地综合承载差异的成因。提出了协调各区域承载力的角度探索推进京津冀承载力协同发展、实现区域承载力整体提升的对策思路。^[52]

赵金龙、王丽萍对农村土地产权进行研究,分析了农地产权演变的特征。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农地产权调整的历程:最初的农地产权政策调整源于激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需要,做法是不断缩小土地耕作的责任主体,直至农户家庭。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开始赋予农户稳定的土地经营权,通过“两权分置”使农户成为市场经营主体。随着农民的非农化就业趋势,中央开始推进“三权分置”,即在所有权不变、承包权稳定的基础上,放活经营权,利用经营权的市场化配置实现耕地的有效利用。认为农地产权演变的特征体现为:农地产权政策演变顺应宏观环境的变化;产权主体的重心不断下移直至承包户;承包经营权身份属性弱化而财产属性增强。未来农地产权将不断细化,经营权可能得到强化,所有权主体面临重构,但改革难度也将不断加大。^[53]

(四) 农业经济政策

冯雪芹、李梦影、陈薇基于河北省2011至2016年的统计数据,从农业经济总量及构成、重要农产品产量、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和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四个方面,描述了全省现代农业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剖析了当前在农业的有效供给、结构优化、生产设施装备条件和生产经营人员文化素质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新时代经济下推动全省现代农业发展的相应政策着力点,为相关政府部门助推河北省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提供决策参考。^[54]

崔海霞、宗义湘、赵邦宏认为,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生态环境恶化的风险,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中国农业的绿色发展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过研究欧盟在支持农业绿色发展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梳理了欧盟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内在演进逻辑,基于OECD政策评估系统,对欧盟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的支持水平和支持结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欧盟绿色支持政策的实施具有层次清晰、工具多样、结构合理、支持水平高等特点。对比分析中国绿色农业支持政策的实施情况,提出了从加强政策的针对性、提高政策实施效率、丰富政策工具手段等方面推进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55]

马彦丽、何苏娇、高艳从奶产业入手,将“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奶产业链的重塑政策概括为“养殖环节规模化+乳品加工环节高集中度+以乳企为核心的纵向一体化”。发现乳企和养殖企业间的纵向联系仍然脆弱,市场和政策双重因素导致中国奶产业链处于被动的“非整合”状态。以乳企为核心的纵向一体化政策限制了养殖者的外部选择权,养殖者与乳企间市场势力、市场进入规则和交易对象选择权的不对等使其谈判力进一步失衡。资源配置扭曲的后果是奶农在产业链上利益分配进一步恶化,中国的奶牛养殖业发展,正失去国际竞争力。指出中国政府应通过技术标准保护国内养殖企业发展,对乳企自建奶源行为保持中立,支持适度规模的家庭牧场发展,提高奶农的组织化程度,取消进入乳企加工环节的行政壁垒,为以养殖者为核心的一体化创造可能性。^[56]

七、工业经济

(一) 新型工业化道路

宋之杰、赵桐认为,随着我国在全球经济活动的价值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经济已经从传统的发展结构逐渐转变为依靠技术

驱动的发展结构。而 R&D 投入作为因绩效增长而最终取得经济指标提升的关键因素,中国在此方面的资金投入量虽逐年提升,但还无法与一些发达国家同日而语。该文从确切的数据与严格的理论推导相结合的角度全面分析了中国制造业 R&D 投入绩效总体情况和中国制造业 R&D 强度驱动因素及变化。结果显示, R&D 投入的质量应受到进一步重视,而非仅仅注重在量上赶超发达国家。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创新改变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定位薄弱这一现状,这才是侧重质量投入的内核所在;其次, R&D 投入还要考虑到制造业的要素禀赋,例如其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因此,政府要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商业贷款融资方面的困难,起到引导和扶持的作用。^[57]

任立媛、赵莉认为,河北省钢铁行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就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在过去快速发展的 30 年内,钢铁产业一直都是对 GDP 贡献突出的产业,但现在由于国外钢铁供给价格低的冲击以及国内房地产经济下行而导致的钢铁供大于求的不平衡状态,其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期。首先,钢铁应用的重点应该投入到新兴发展的电动汽车行业,通过鼓励性政策法规,依托线上线下互通一体,从而促进钢铁产品的性能提升,不断扩大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市场;其次,随着钢铁产能的减少,劳动力过剩问题也需要妥善处理。要努力解决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难题,使企业成长为人民放心的好企业,也使人民能有更高的发展获得感。^[58]

(二) 河北省工业转型升级

初钊鹏、王铮、卞晨认为,一方面京、津、冀三地存在较为严重的优势产业趋同现象,且产业协同发展并没有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反馈理论的和谐状态;另一方面,各地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产业互补,而这正是三地之间能够实现协同发展的基础。此文从产业链共生、产业协同规划、产业转移惯性和“一区多园”空间布局等理论角度出发,分析出河北省现在正处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后工业化阶段以及后工业社会,其区位优势所在以及利用好此优势从而实现传统产业的更新换代的关键正是与北京、天津一起构成的首都圈沿海地区的出口主导型经济,河北省应吸纳京津科技成果转

化,培育地区优势主导产业,以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为核心,实现跨梯度超越发展。此外,由于北京地区将很多夕阳、落后产业转移到河北省,从而阻碍了其产业结构调整(跳出后工业化时代)的步伐。针对此问题,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出台的力度,保证产业结构调整有序进行。^[59]

岳志春、张晓蕊认为,首先,河北省缺乏一定规模的中型城市来作为北京、天津这样大城市发挥其辐射作用的载体;其次,京津冀这一庞大经济体的内部资源匮乏,多依赖于外部能源供给;第三,河北省的创新能力仍然不高。这样一来,大小城市差距过大,内部资源供给无法满足一体化的进程,以及经济发展动力的衰退就使得区域间的产业协同发展变得困难起来。此文针对这些现有问题提出了对策及建议。^[60]

李忠华、张艳东、陈菡彬按照规范分析的方法认为,河北省不可再生能源开采过度,使得煤炭产量过剩;且生产要素转移有一定困难,例如庞大的设备处置、已具备高度专业知识的工人安置等问题。加之煤炭生产与生态环境的不兼容,都导致煤炭产业转型困难。对此,该文根据国家 and 行业的发展规划方向分析了河北省煤炭产业的发展定位,建议对省内煤炭产业进行整合并进行资源配置合作;各煤炭企业也应充分借鉴转型成功的企业的经验和教训,加强产业转移风险控制。^[61]

(三) 自主创新

薛景梅、王杰认为,目前,京津冀地区创新节点主要集中在各大高校而非企业,使得创新的产出性较低。因此,他们对 2008—2017 京津冀产学研联合申请专利数据进行了统计与整理,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京津冀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及这 10 年间的变化做出了系统性分析。针对这一问题,得到和提出了几点结论以及对策:京津冀区域创新网络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企业在创新网络中发挥的作用仍然偏低。京津与河北地区应充分实现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开展多层次、多元化的合作创新;各个企业应加强创新意识,注重创新成果的转化,对资源实现真正的有效控制和高效利用。^[62]

马志东、俞会新、续亚萍从政策角度出发,就如何实现创新型产业集群和城市群的互动发展

提出了相应的举措。首先,政府要巩固创新主体地位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大要素投入以增加创新支撑企业的数量和类型,以及营造积极的创新氛围和环境;第二,人才是创新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因素,政府应分别从人才引进、激励、培养方面分别发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第三,尊重企业家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带来的价值回馈;第四,政府要重视本身的规制机制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制度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63]

朱凤战、张丹认为,提升地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内外兼修,一方面加大地区内部科研投入,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先进地区的技术外溢效应。在京津冀协同的战略背景下,河北省承接京津地区产业转移进程逐渐加快。此文研究发现,产业转移给产业承接地带来机遇,有利于承接地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自主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京津产业转移发挥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产业承接地科技活动内部经费支出对自主创新能力无显著影响,而且对技术水平较低的自主创新能力产生较大负向溢出效应;产业承接地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对河北自主创新产生溢出效应显著,尤其是对低技术层次的自主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对此,就提升河北省自主创新能力提出相关建议。^[64]

(四) 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保型社会

王亚飞主要对 2009—2015 年这 7 年间全国钢铁工业的排放量和碳足迹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列表和说明,发现我国的钢铁产业碳足迹仍在不断增加。本文建议应注重生产附加值高的钢铁生产,减少能源的浪费;加大对低碳技术的资金投入;加强对突破性节能技术研发力度;通过政策福利加深节能工艺装备技术的推广;最后,还应加快对钢铁产业的海外转移,既可以减少我国的碳排放,也可以满足越南、埃及等国对钢铁的需求,实现双赢。^[65]

韩兆柱认为,京津冀三地府际关系存在诸多问题,作者从合作主体、合作起点、治理主体、合作渠道等方面进行了现状分析。发现政府作为顶层设计者和合作主体在环境治理方面起到的作用太过单一;三地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目标等方面的不一致,导致合作起点不平等;各地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容易陷入到自身利益维护的圈子里,很难形成合力,使得治理主体“各自

为政”;且三地之间缺乏深度、创造性的合作渠道,使治理之策不能够做到完全适应本地环境问题的解决。而这些,都成为了制约京津冀生态治理发展的瓶颈。此文也从多个方面分析了导致以上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建议和对策。首先,政府、民众、企业都应积极参与到生态治理中去,完善合作治理网络体系;其次,加速资源在三地之间的均衡流动,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第三,形成尊重自然发展规律的新理念,不可急于求成,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治理工作,需要各地积极参与,积极配合,实现“五位一体”和谐发展的局面;第四,还需完善生态网络合作治理的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此外,作者还阐述了在相关法规、监管制度等方面建议和意见。^[66]

八、商贸经济研究

(一) 流通体制改革

鲍琳、张贵炜认为,智慧物流是物流业发展的趋势和必然要求,智慧物流的产生既是电子商务、供应链发展的要求,又是新时代我国现实国情的要求。智慧物流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实时应对、智能优化决策的高效绿色的物流服务体系。研究表明以程序化理论构建智慧物流体系主要着手于技术基础、平台功能和保障三个方面。最后对河北物流集团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构建智慧物流体系对物流领域进行全方位智能化变革,能有效地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研究表明对物流公司构建智慧物流体系是高效的、可行的,能满足公司发展的需求、促进河北省物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67]

赵松岭指出,近年来物流业已成为推动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助推力,大力发展绿色物流产业,可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经济贸易损失。发展绿色物流生态是当今国际物流发展的方向,也是京津冀物流业发展的主流之一,其目的是确保整个物流体系呈现高效、有规划性、健康清洁的状态。构建绿色物流业创新生态系统,需要加强绿色物流理念宣传,制定严格的企业标准,促进绿色物流行业科学发展;构建绿色物流创新生态系统框架;全面改革物流运行体

制,加强绿色物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与实施。发展绿色物流能实现现代化发展与世界接轨,有利于可持续战略的实施,有助于保持京津冀三地经贸增长和自身物流产业重组提升。^[68]

董博、董康成认为,京津冀的经济社会环境不利于区域物流业的低碳协同发展,因为它不仅缺乏行业低碳协同运作的标准和规则,而且物流信息技术处于较低水平。分析得出阻碍京津冀区域物流业低碳协同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物流标准化和信息化水平低;物流低碳技术水平低;区域交通结构单一。在此基础上,通过综合考虑物流业内部以及物流业和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因素,建立区域物流业低碳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应用 DEA 模型分析京津冀三地的物流业低碳效率值,为京津冀区域物流业低碳协同发展提供重要的衡量指标。因此建议京津冀三地应制定促进区域物流业低碳协同发展的政策法规;加快区域智慧物流平台建设;促进物流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的低碳化协同;构建一体化的智能交通系统;促进区域物流人才的协同流动;构建京津冀区域的碳交易系统,设计碳排放交易价格机制,使京津冀物流业参与者形成自发减排的良好习惯,打造低碳环保的绿色经济地带。^[69]

朱军伟、景瑞蓉、崔贺金指出,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农产品物流已经成为衔接农村与城市的桥梁,如何构建农产品物流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三农”发展研究的重点。为缩小城乡差距,党中央提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通过弥合城乡资源,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表明加快协调我省城市物流和农村物流,不仅有助于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同时也为经营者提供有效的市场信息,减少农产品生产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邢台市农产品物流发展运作模式多种并存,但在城乡统筹发展方面存在不足,其中农产品流通效率低严重阻碍邢台市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建议邢台市制定农产品物流发展的优惠政策;建设农产品信息平台;加强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校企合作培养农产品物流人才。^[70]

郭子雪、张雅辉认为,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河北省物流产业迅速发展,并产生了较大的物流人才需求变化。当前河北省在产业结构升

级背景下物流人才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现状,根据河北省近几年的物流行业发展状况,发现河北省高校和企业的物流人才培养存在的各种问题,例如高校物流课程设置与行业实际需求不符、高校物流专业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差、高校缺乏物流人才培养的环境;企业内部培养体制不完善,企业对物流人才职业素养要求不高。结合河北省物流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需要从学校教育和企业培训两方面制定物流人才培养政策。建议充分发挥政府在物流人才培养中的主导作用;校企联合培养社会物流人才;高校各尽所能培养全方面物流人才;物流企业完善内部人才培养机制。因此,在河北省产业升级的背景下,通过培养物流人才增加物流人才供给,对推进河北省物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深远影响。^[71]

(二) 零售产业组织优化

袁旭梅、宓翠首先通过采用 Stackelberg 主从博弈分析方法,得出在集中回收、零售商回收、制造商回收、第三方回收四种模型下,信息分享前后对零售商主导的闭环供应链利润的影响。然后发现预测精度、努力回收成本参数和回收支付水平等具体数据也会影响零售商信息分享决策。研究表明无论信息分享与否,集中回收决策都优于分散回收决策。在集中回收模型下,零售商信息分享使得整个供应链预期利润增加;在零售商回收模型下,信息分享使得供应链预期利润减少;在制造商回收和第三方回收模型下,预期利润取决于回收努力成本参数和回收支付的大小范围。因此,在零售商主导的市场结构下,零售商分享信息会降低供应链总体利润,相反,零售商应进一步加强供应链的整体协调性,进而提高供应链利润;制造商应选择回收并主动分享私有信息,提高供应链绩效;当信息精度较低、回收努力成本较高时,制造商可通过适当提高回收支付水平,选择第三方回收,确保自身和供应链最优利润不受损。^[72]

仇莉、代金鑫指出,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在市场上占据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然而电子商务零售商取得的成功对传统零售商形成了极大的冲击。虽然传统零售商在商品体验度上优于电子商务零售商,但是电子商务零售商在商品价格、购买的便捷程度、商品种类上优于传统零售商。通过建立改进后的种群

价格竞争模型对传统零售商制定合理的价格竞争策略。当传统零售商的竞争力较弱时,可以采取特定商品定价策略和动态定价策略以增加顾客体验,提高商品品类及品牌丰富度。通过信息分享拓宽宣传渠道,提高服务质量等竞争策略;当传统零售商的竞争力较强时,可以采取维护好老顾客和开分店扩大规模等策略;当传统零售商和电子商务零售商的竞争力都较弱时,传统零售商可以开展电子商务来增加销售渠道,同时拥有实体店和网店并制定双渠道定价策略,实现利益最大化。^[73]

参考文献:

- [1] 孟永峰,杨竹晴.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产业合作发展策略——以河北省产业对接为例[J].经济研究参考,2018(34):16-21.
- [2] 孙丽文,张蝶,李少帅.京津冀协同创新能力测度及评价[J].经济与管理,2018,32(03):12-16.
- [3] 郭小卉,康书生.京津冀三地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探析[J].经济与管理,2018,32(06):4-12.
- [4] 刘宾.非首都功能疏解背景下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8(08):68-73.
- [5] 张波.京津冀产业布局调整与河北产业转型升级[J].经济研究参考,2017(62):4-10.
- [6] 陈永昶,王玉成.智慧旅游驱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机理与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05):62-70.
- [7] 闫永路.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N].河北日报,2018-05-11(007).
- [8] 张立华,李南,史宝娟.沿海城市“港口经济—低碳经济”共生的定量评价——以唐山为例[J].生态经济,2018,34(04):59-63.
- [9] 王金营,李庄园,李天然.中心城市在区域人力资本聚集中的作用[J].人口研究,2018,42(03):9-23.
- [10] 孟永峰,杨竹晴.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产业合作发展策略——以河北省产业对接为例[J].经济研究参考,2018(34):16-21.
- [11] 颜廷标.区域特质、产业分工定位与实现机理——以京津冀产业协同为例[J].河北学刊,2018,38(03):155-160.
- [12] 郭子雪,张雅辉,黄新.基于 DEA 模型的京津冀区域物流效率评价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8,48(24):41-50.
- [13] 李炜,李子彪,康凯.区域创新极培育能力综合评价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04):49-53.
- [14] 马林靖,严雪晴.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环京津贫困带”出路探讨[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0(02):1-6.
- [15] 刁广付,张悦玲,王健.河北省主要农业生产条件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8(20):34-36.
- [16] 王东平,郭少博.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河北省蔬菜产业的发展路径[J].贵州农业科学,2018,46(05):155-160.
- [17] 吕荣杰,贾芸菲,张义明.河北省吸纳京津技术竞争力分析——基于 GEM 理论模型的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07):106-111.
- [18] 陈丽莎.论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作用[J].云南社会科学,2018(06):97-102.
- [19] 顾瑶,刘宇轩.京津冀怎样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J].人民论坛,2018(03):102-103.
- [20] 黄惠英,张连春,虞洪.科技创新、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动态关联分析[J].农村经济,2018(06):110-115.
- [21] 朱峰,单耀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与新时代青年发展[J].青年发展论坛,2018,28(04):3-17.
- [22] 杨梅,刘嘉茵.城镇化视域下的过渡型社区教育模式构建策略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8(03):154-157.
- [23] 李东雷,黄彩英.农民积极参与乡村经济绿色发展的路径探究——以河北省为例[J].农业经济,2018(04):81-82.
- [24] 薛晴,陈会谦,苏庆国.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反贫困路径[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05):112-116.
- [25] 金浩,李瑞晶,李媛媛.基于 ESDA-GWR 的三重城镇化协调性空间分异及驱动力研究[J].统计研究,2018,35(01):75-81.
- [26] 张亚明,石笑贤,严玲玉.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39(03):74-80.
- [27] 孟庆瑜,梁枫.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反思与制度完善[J].河北法学,2018,36(02):25-36.
- [28] 胡悦,金明倩,王溧,孙丽.京津冀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05):243-252.
- [29] 乔颖丽,王馨玮.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的跨域治理模式与机制——基于生态环境支撑区的视角[J].南方农村,2018,34(02):27-31+40.
- [30] 孟永峰,杨竹晴.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产业合作发展策略——以河北省产业对接为例[J].经济研究参考,2018(34):16-21.
- [31] 王韶华,张伟.基于能源强度和经济增长目标的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8(07):88-96.
- [32] 岳志春,张晓蕊.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障碍及对策[J].人民论坛,2018(29):76-77.
- [33] 杜茂宝,王述芬,杜琳,鹿艳茹.京津冀市场一体化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J].玻璃,2019,46(02):6-9.
- [34] 杜茂宝,张颖,苏蔚,曹先磊.京津冀市场一体化进程及

- 其影响因素的度量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06):813-818.
- [35]张波.京津冀产业布局调整与河北产业转型升级[J].经济研究参考,2017(62):4-10.
- [36]孟祥林.京津冀协同发展与“软区划河北”发展构想[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01):5-13.
- [37]袁旭梅,张旭,王亚娜.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协同创新能力评价与分类[J].中国科技论坛,2018(09):13-21.
- [38]邢会,朱欢,高素英,臧丽娟.基于集群式产业链的京津冀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0(03):1-9.
- [39]李子彪,孙可远,汪锦熙.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态势测度——基于河北省11市的实证研究[J/OL].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1[2019-09-28].
- [40]徐永利.雄安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考[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01):69-73.
- [41]石亚碧.雄安新区建设要处理好高端高新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J].经济论坛,2018(07):109-112+153.
- [42]刘洁,汪存华.借力雄安新区发展加速廊坊南三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J].时代经贸,2018(30):47-48.
- [43]齐美然,郭子雪.河北省物流产业升级面临的困境与策略分析[J].河北企业,2018(11):92-93.
- [44]谢会芹,方巍,王湘玉.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产业集聚效应分析[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17,7(23):5-6+22.
- [45]王金营,何岩浩.京津冀县域经济发展:要素作用与城市辐射[J].河北学刊,2018,38(01):139-144.
- [46]王智新,梁翠.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效率评价及激励政策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8,36(03):48-51.
- [47]葛文光,谢海英,张明华,孙万挺.县域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实践考察——以清河县马屯红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J].林业经济,2018,40(06):60-63.
- [48]金书秦,韩冬梅,牛坤玉.新形势下做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探讨[J].环境保护,2018,46(13):63-65.
- [49]于雷,王静雅.人文色彩导向下的特色休闲农业发展之路[J].农业经济,2018(06):20-21.
- [50]吕雅辉,张润清,张亮,赵帮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阳晨模式”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8(11):38-49.
- [51]户艳领,李丽红,任宁,王洲.基于二元 Logistic 模型的贫困山区农村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源于河北省贫困山区县的调研样本[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07):137-143+211.
- [52]户艳领,褚建坤,刘少丹,任宁.承载力协同发展视角下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研究[J].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5(02):72-76.
- [53]赵金龙,王丽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产权政策演变及未来展望[J].经济纵横,2018(05):89-96.
- [54]冯雪芹,李梦影,陈薇.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及政策着力点思考——基于2011~2016年的数据分析[J].统计与管理,2018(04):31-35.
- [55]崔海霞,宗义湘,赵帮宏.欧盟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演进分析——基于 OECD 农业政策评估系统[J].农业经济问题,2018(05):130-142.
- [56]马彦丽,何苏娇,高艳.以乳品加工企业还是以奶农为核心?——中国奶产业链纵向一体化政策反思及改进思路[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6):146-156+162.
- [57]宋之杰,赵桐.中国制造业 R&D 投入绩效分解与演化——基于增加值视角[J].管理现代化,2018,38(04):18-21.
- [58]任立媛,赵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河北省钢铁行业去产能问题与对策研究[J].纳税,2018,12(31):289-292.
- [59]初钊鹏,王铮,卞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理论认识与实践选择[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6):178-184.
- [60]岳志春,张晓蕊.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障碍及对策[J].人民论坛,2018(29):76-77.
- [61]李忠华,张艳东,陈茵彬.“去产能”背景下河北省煤炭产业发展思路研究[J].中国煤炭,2018,44(02):26-28.
- [62]薛景梅,王杰.京津冀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及演化趋势[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2):17-23.
- [63]马志东,俞会新,续亚萍.创新型产业与创新型城市互动发展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经济研究参考,2018(22):70-72.
- [64]朱凤战,张丹.河北承接产业转移与自主创新实证研究[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34(01):72-76+82.
- [65]王亚飞.我国钢铁工业碳足迹及升级路径研究——基于先进钢铁国家低碳发展的经验与启示[J].广西社会科学,2018(02):80-83.
- [66]韩兆柱.京津冀生态治理的府际合作路径研究——以网络化治理为视角[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18):75-85.
- [67]鲍琳,张贵炜.基于扎根理论的智慧物流体系构建[J].企业经济,2018(4):140-144.
- [68]赵松岭.让物流业搭上绿色生态的快车[J].人民论坛,2018(4):78-79.
- [69]董博,董康成.京津冀区域物流业低碳协同发展研究[J].价格月刊,2018(9):44-48.
- [70]朱军伟,景瑞蓉,崔贺金.城乡统筹背景下邢台市农产品物流发展模式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7),17(14):27-28.
- [71]郭子雪,张雅辉.产业升级背景下河北省物流人才需求分析与培养对策研究[J].河北企业,2018(10),10:123-124.
- [72]袁旭梅,宓翠.零售商主导下的闭环供应链信息分享价

值研究[J].企业经济,2018(6),3:80-85.

策略[J].商业经济研究,2018(6),12:126-128.

[73]仇莉,代金鑫.电子商务冲击下传统零售商的价格竞争

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

孙健夫

2018年,河北的财政理论与政策研究,紧密结合国家经济改革发展进程,特别是结合构建新型财政理论体系和财税治理的迫切需要,对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一批新的成果。

一、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理论

在财政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齐守印和张晋武近年来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在全国学术界保持了较大影响。齐守印的《中国特色财政学部分基础理论问题辨析》一文,全面评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对财政学研究对象问题上存在的六种不同观点,提出把握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以所处社会形态及其特定发展阶段、具体国度中由特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具体财政活动及其内在联系、固有矛盾为特殊研究对象,从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联系中准确而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本社会阶段特定财政形态的内在联系、特殊矛盾和特有规律。我们所要构建的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应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财政运行过程、内在联系和固有矛盾为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形成能够解释现代中国财政现象、财政运行过程和阐明现代中国财政本质联系、特殊规律的特色财政理论,并以此作为整个财政学理论体系的主体部分。关于财政学属于什么学科的问题,作者认为,财政学是一门综合研究财政活动中经济内容和政治内容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融合的社会科学,而不仅仅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相应地,中国特色财政理论体系或财政学,就是从经济与政治双重视角,以综合研究中国公共财务活动为主,分析其特殊矛盾,揭示其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以服务于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立社会科学。关于中国特色财政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作者指出,就财政学研究的经济学逻辑起点而言,由于公共物品是满足公共需要、防范公共风险的手

段,将公共物品这个媒介公共需要与财政活动的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以生产型公共经济理论为学术基点,论证为提供广义公共物品而筹集、配置、监管经济资源的财政活动必要性,将是顺理成章地展开财政学本体理论分析研究的一种较为完善和缜密的因果逻辑选择。^[1]

齐守印在《从混合经济、公共经济视角全面认识财政功能》一文中认为,“财政”即公共财务,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功能,在整个公共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整体联系中准确理解、深刻认识公共财务的功能是积极有效发挥财政职能、有力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作者从五个方面归纳概括公共财务的内涵:其一,公共财务是由公共经济发挥固有功能、提供公共物品所引起的筹集、配置和监管经济资源运用的活动。其二,公共财务向社会公众筹集经济资源必须依据共同约定的规则或者说依照社会契约,而不能任意而行。其三,公共财务所筹集的经济资源来自于社会公众的缴纳或让渡,必须全部用于满足社会公众所需要的各类公共物品生产,而不得用于与满足社会公众公共需求无关的事项。其四,公共财务资源筹集力度、方式和配置方案需要通过能够反映社会公众意愿的公共选择机制最终确定。其五,公共财务所筹集的经济资源必须得到科学合理的配置和严格的监督管理,包括通过财务信息公开直接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以避免滥用浪费、确保取得应有的效益。这些内涵,可以通俗地表述为:公共财务资源取之于公众,用之于公益,定之于公决,受之于公众监督。关于财政的公共财务功能定位,作者概括揭示了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为整个公共经济体供给“血液”。二是为所有公共机构运行和公共物品再生产循环提供动能。三是为实现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均衡提供杠杆。四是公共机构实施其他公共经济政策提供助力。五是直接运用公共财务收支和预算政策调控宏观经济运行。^[2]

齐守印在《试论公共经济基于自身属性的特有规律》一文中指出,公共经济也是在客观规律支配下运行发展的,正确运用相关规律是自觉驾驭公共经济、增进人类福利的基础条件,而准确揭示和全面把握这些规律既是正确运用它们的认识前提,又是公共经济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然而,现有公共经济理论受西方经济学传统局限,疏于对公共经济规律的探究,相关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实际上,公共经济规律是一个由普遍与特殊共同构成的多层复合结构体系,而基于公共经济自身属性的特有规律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通过分析与借鉴,作者概括归纳出包括公共经济追求增进公共利益和公共福利、规模持续扩大、与民间经济均衡占用资源、公共物品提供结构均衡、与民间经济相互作用等五大特有规律。这在财政学界有关问题的讨论中具有显著的创新性。^[3]

张晋武的《公共经济:基于社会再生产视角的重新认识》一文提出了以下主要观点:第一,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大类,本应比其脱胎的财政学具有更高、更具总括性的内容层次和区别于财政学的相对独立的内容体系,但目前公共经济学的主体内容和基本研究对象仍与财政学大同小异,几无二致,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成熟状态。第二,从社会再生产视角理解公共经济的意义和内容,既符合公共经济产生和存在的历史逻辑,也符合公共物品与公共经济思想的原始内核。第三,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公共物品再生产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在满足这种需要过程中谋求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活动,既内在于上述四个环节有机联系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又在生产的组织形式及具体的分配、交换、消费机制和各环节之间的关联方式等方面,具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私人物品再生产活动的自身特质。第四,以公共物品再生产或公共物品供需实现为内容的公共经济活动,既是人类需要裂化为私人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后的一般存在,又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逐步演进,具有显著的一般存在性、共同性和历史演进性、阶段性的双重特征。^[4]

二、河北省财政形势

高云霄撰文对河北省40年来的财政改革进

行了全面总结。她指出,在我国40年波澜壮阔的财政改革大潮中,河北财政始终是勇敢的改革“弄潮儿”与先锋队,并从持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持续加大财政收入改革、持续优化财政支出改革和持续强化财政管理改革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尤其是在财政管理改革领域大胆推进,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了示范。包括:1998年在全国率先启动预算改革;2001年最早试编社会保障基金预算;2008年在全国最早探索试编了发展性财政支出三年滚动预算;2010年实现三年滚动预算编制“覆盖省级所有部门、所有发展性支出”。2004年省财政厅拉开了绩效预算改革序幕,将绩效管理理念全面引入了财政预算管理,2014年起在省直部门全面实施绩效预算管理改革,2015年所有市县全面推开,形成“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绩效缺失有问责”的全过程绩效预算管理新机制。2013年起,试编“四本预算”,逐步建立起定位清晰、分工明确、衔接有序的全口径地方预算管理体系。在全国率先出台《县级财政预算管理业务操作规程》《乡镇财政业务操作规程》,不断强化县乡财政规范管理。^[5]

王帆、王艳真分析本省财政运行情况后认为,河北财政总体平稳,但受财税体制、财政管理、财源结构等因素影响,仍然存在冲击财政运行的重大因素,存在县域财政运转、地方政府债务、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等方面的风险隐患。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并发挥调节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需从影响河北财政运行风险着手,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推进产业升级、加强债务管控、防范风险转移。作者对河北财政风险的认识是:第一,财政收支运行风险状况,表现为在整体收支运行上,河北财政支出和可用财力高度依赖中央补助,分级收支运行上,各级收支缺口不断扩大,依赖上级补助程度高,尤其是市县财政运转困难,问题突出;第二,政府债务风险状况,全省地方政府债务运行总体可控,但部分地区债务已超过风险警戒线,且全省隐性债务底数不清,成为影响未来地方财政运行的重大隐患;第三,养老保险支付风险状况,河北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从2014年起处于收不抵支状态,累计结余逐步减少,即将面临全部耗尽的风险。^[6]

三、促进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

(一) 促进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白玉芹、陈虹认为,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之所以保持世界领先的产业优势,主要是因为建成了规模较大、竞争力较强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却始终徘徊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起点并不高,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先进性和规模化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当前,我国正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现代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如何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加快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迫切需要围绕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特色制定切实有效的财政政策,为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财政政策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作用方式包括:强化刺激企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为集群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促进产业链优势形成。^[7]

(二) 促进钢铁产业节能减排

王亚飞计算了我国钢铁产业的碳排放量,认为我国钢铁产业的节能减排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与国际先进钢铁企业减排水平尚有很大的差距,行业平均吨钢能耗仍比国际先进水平高 15%左右,并且我国钢铁企业在能源回收利用方面也有明显不足。对此提出的对策是:首先,要整合产能,提升产品品质,避免能源浪费。因为正是我国钢铁行业中众多的落后产能致使产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产品所消耗资源、能源不匹配,导致高污染高耗能问题突出,同时国内环保监管也极为困难。其次,保持高水平的环保研发投入强度。我国钢铁行业低碳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落后,而针对钢铁行业的环保研发费用更是非常有限。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钢铁企业,都应转变观念,加大钢铁工业环保研发投入。再次,要鼓励开发突破性节能技术。国外先进钢铁企业主要从钢铁冶炼技术和钢铁循环经济技术这两个方面进行突破,来实现钢铁行业的节能减排。我国钢铁企业也要注意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同时,更加注重突破性节能技术的跟踪开发。最后,要增强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引导,在资金补助、税收优惠、风险分担等方面设立相应的补偿激励机制。^[8]

(三) 推动旅游业发展

张晋武、马广巨研究了京津冀旅游业协同发展的财政政策。作者认为,京津冀旅游业协同发展,目的是在旅游业发展中谋求区域整体优势,获取“1+1+1>3”的协作效应。实现京津冀旅游业协同发展,一方面依赖于京津冀三地政府决策的协调和统一战略、统一规划;另一方面依赖于旅游企业的联合与合作、旅游资源的整合和旅游市场的一体化。就此而言,运用财税政策支持京津冀旅游业协同发展的着力点主要在于:第一,突破行政藩篱,打造三地旅游经济利益共同体;第二,创新京津冀旅游企业协作机制,构建有利于京津冀旅游业协同发展的旅游企业区域组织格局;第三,优化京津冀旅游产业布局,促进实现三地旅游产业的体系化;第四,打造开放性、竞争性的统一旅游市场,推进京津冀区域内多元化的“全域”大旅游。^[9]

四、促进公共服务发展的财政政策

公共服务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与人们的利益和人的发展相联系。财政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资金支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王金营等人探讨了公共服务对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的作用。作者研究发现,对于相对贫困的家庭而言,公共服务对贫困的缓解和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更需要政府提供充分、均等、广覆盖的公共服务。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居民通常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供给不充分甚至缺失导致贫困程度越高的人口面临越大的风险。中央脱贫攻坚的目标是,到 2020 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作者得出结论:政府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因地制宜地提供及时、充分、满足其迫切需求的公共服务,对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效应的持续性、包容性和公平性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服务的全面提升,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提供了选择生存和发展机会的权利及空间,减少贫困发生的制约性因素,构建公共服务提升的反贫困路径,可使扶贫政策和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及功能。^[10]

杜建林等人关注了雄安新区公共服务问题。作者在分析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基本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基本社会保障服务相关数据后指出,目前雄安新区无论是服务效果还是地方财政投入,不仅与河北各县平均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更与北京供给水平存在明显差距,难以有力承担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以及满足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发展定位需要。如按国家《“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和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制定的指标体系、主要目标及标准建设新区基本公共服务,资金需求将十分巨大,雄安新区及河北财力难以承受。作者提出了四方面的建议:协调好雄安与北京、河北关系,建立三地公共事务协作管理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与北京市相关部门、国家部委等沟通衔接,提出雄安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导向作用,创新融资方式,探索建立多样化融资渠道;积极推动北京、河北、雄安三地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11]

吴春丽、万翠英认为,近年来,山东从强化市级统筹责任入手,大力推进全省县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了较好成效。与山东相仿,河北也是一个具有众多人口、众多县域的经济大省,有必要借鉴山东经验,推进全省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需要立足省情,选择雄安新区等集中承载地,从民生政策保障标准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水平入手,分区域、分领域有序推进全省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并逐步建立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项目融资渠道。^[12]

杨会良、杨雅旭专题研究了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作者选取了《2016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的教育事业费、基本建设经费、教育费附加等指标及相应的数据,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省市地方高校教育经费配置水平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地方高校教育经费配置水平不均衡,且差距较大;我国地方高校经费来源的多渠道筹措机制还不健全,对政府财政拨款过于依赖;根据聚类结果,相应地划分出5级梯队,总体呈底部巨大的金字塔形分布。该结果为今后推动各区域教育经费配置与教

育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13]

五、公共支出及其绩效管理

(一) 教育支出

杨会良、杨雅旭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教育财政体制的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将教育财政制度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两级分权、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初创、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的完善与后4%时代教育财政制度的完善四个阶段,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财政制度,表现出受制度环境影响、自上而下贯彻落实、政策执行推动、法制建设逐步完善以及从效率转向公平等特征。最后从理念重塑、职能划分、投入标准与法律制度四个方面,提出中国未来教育财政制度改革的思路和实现路径。^[14]

(二) 科技支出

财政科技投入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近年来,河北省财政科技经费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健全,科技经费管理改革不断深入,与此同时,在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体制、投入方式、使用方式等方面还与国内其他先进省份有一定的差距。张玉瑾、武根启指出,目前仍然存在研发投入强度整体较弱、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小、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有待加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财政科技经费管理机制、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方式、推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培养和引进科技创新人才、完善对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等。^[15]

张学军通过分析福建省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经验做法,提出了河北省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路径选择。认为,福建省与河北省都是沿海省份,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出现较大变化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同样受到巨大挑战。如何撬动财政在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中的新作用,福建正在以新的实践探索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新路径,在以体制改革为抓手推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对于创新河北省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方式上有重要启示作用。福建省的经验主要有:财政科技经费预算跟进,推动科技创新政策落地;改进财政经费扶持方式,促进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科技经费择优重点支持,扶持各类创新平台建设;试行科技经费切块下拨,提高科研院所创新能

力；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促进区域产业优化升级。^[16]

（三）文化支出

贺佳、孙健夫的论文追踪了县市级公共图书馆财政资金支出的绩效问题。根据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将县市级公共图书馆的财政支出绩效分为两个指标——产出效率和使用效率，依据全国相关的面板数据，用三阶段 DEA 方法分别评价。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当地的经济状况、对县市级公共图书馆的财政投入数额、县市级公共图书馆对现有资源的利用程度、县市级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文化产品是否满足当地群众的需求都会影响该地区县市级公共图书馆的财政支出绩效。他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增加公共图书馆财政支出。作为城市政府的领导和管理部门，重视公共图书馆的财政投入，满足和鼓励新的历史时期城市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要，是理应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责。第二，要提升县市级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在增加公共图书馆文化产品供给数量的基础上，努力改善文化产品的供给结构，创新图书馆的管理机制。^[17]

陈兰杰、刘利梳理了目前在政府购买公共图书馆服务研究方面的情况。针对存在的研究不足，作者提出了相应的建议：首先应该加强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研究，加强绩效评估结果的应用研究，第二，应该加强绩效评估结果的实证研究，分析哪些结果应用对于绩效评估是真实有效的，哪些结果的应用是如何执行的，执行的过程会有什么困难，结果应用完成之后会产生哪些影响。第三，加强风险评估的相关研究，我国政府购买公共图书馆服务正处于快速发展的上升期，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在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都会有风险出现，所以相关风险评估尤其重要。第四，加强政府购买公共图书馆服务相关管理机制的研究，政府在购买服务过程中如何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如何处理与企业的分歧和矛盾，企业如何处理服务纠纷，工作如何交接才最有效，以及如何完善政府购买公共图书馆服务的管理法规都是管理层面需要研究的问题。^[18]

（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是深化财政改革乃至整个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相关研究不仅涉及到理论分析，也有不少成果进入实证分

析阶段。

王莉莉、孙健夫提出了要重新认识对政府绩效的第三方评价问题。指出，第三方指的是独立于委托方和被评价对象的机构或专家（个人），它与委托方和被评价对象不存在隶属关系和利益关系，以“局外人”的视角来客观地审视被评价对象活动。第三方属于典型的外部评价范畴，既不是执行财政资金预算的政府内部机构，也不是财政资金使用的受益者。基于国内外经验，第三方评价具备专业的评估人才、深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评估经验使其在政府和社会各界有较好的声誉和影响力，是目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政府绩效评价主体的中坚力量。^[19]

谢恒等人将建筑信息化模型（BIM）应用于 PPP 项目，研究 PPP 项目建设全过程中的绩效评价难题，取得了一定收获。作者将评价过程分为不同的阶段，认为这更加体现出影响绩效的重点所在，并帮助投资者改善其决策行为目标和防范项目实施中的风险。在投资决策阶段，政府主要关注项目可研报告估算的准确性、合理性。做好设计方案的投资估算，对投资影响大的因素或主要设备价格等进行仔细分析和准确把握，充分运用已有项目的经验和数据来提高投资估算的准确性。此时可以借助方案图纸建立 BIM 模型，通过模型直观地了解设计方案以及和估算相关的技术参数，还可以借助财政信息化管理平台对以往积累的类似工程数据进行对比，提高估算的准确性。在招投标阶段，BIM 模型可以提供准确的清单，并对招标清单进行抽查或全面审查，从而对招投标清单的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做出评价。在项目施工阶段，BIM 模型可以使投资控制更加透明，提供政府所需数据，便于政府对项目进行投资监控。在项目运营阶段，建立基于 BIM 的项目运维平台，从运维平台上提取关注的财务数据，可以实现对项目运营效率和成本的分析以及对项目运营绩效的跟踪监测，并进行项目运营的中期评估。^[20]

胡德仁等人选取 2014—2016 年河北省直 10 所幼儿园的面板数据，分别设计了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运用 DEA 方法对幼教公共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学校规模太小造成师生比太高，大多数幼儿园存在教师过剩、占地面积过多的问题，因此导致分析样本的人员经

费偏高、绩效普遍偏低的情况。作者提出,鉴于存在的问题,应按照财政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的客观比例性要求,对学前教育实施资源优化配置。^[21]

张岳、段洪波引入平衡计分卡作为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建立的主要工具,结合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构建了一套更为合理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四个维度,即服务对象维度,具体包括服务对象满意状况以及服务措施完善情况。效益维度,考察扶贫资金使用后在经济、社会、生态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数量及质量。资金管理流程维度,包括经济性、效率性与合规性。学习与成长维度,包括扶贫人员自我提升、扶贫部门硬件提升。为力求使该指标体系能更好地应用于实践,作者对该指标体系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22]

六、财政资金管理

(一) 扶贫资金管理

马源禾考察了张家口、衡水、承德等市县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指出当前扶贫项目资金较多,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诸多问题不容忽视。一是资金拨付不及时,导致扶贫资金长期滞留。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部分项目前期申报论证不充分、方案不科学,甚至是为了争取资金随意立项;项目多而散、资金扶持存在“撒胡椒面”现象,影响了资金整合的实际效果,由此造成部分项目实施进度缓慢,资金暂时闲置;极少数项目实施完毕后的结余资金未做安排。二是精准识别难度大。基层情况错综复杂,临时性现金收入多,隐蔽性很强。而且贫困是多维的,不仅受收入水平的影响,还与住房、健康、教育、社区环境等多种因素相关,加大了贫困人口精准识别的难度。同时,建档立卡工作十分繁杂,识别人员有限,识别成本很高,导致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动态管理流于形式。三是项目管理不规范。在项目实施中存在部分项目执行管理制度不到位,项目招标、监理和验收都流于形式,造成项目施工缓慢、工程质量不达标、采购价格虚高等问题。四是政策落实不到位。在贯彻落实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扶贫政策推进过程中,存在机制不完善、责任不落实、信息不共享等影响政策

措施落实的问题。^[23]

李存英、赵秋梅的调查还发现了另外的问题。一是部分贫困地区存在挤占、挪用套取扶贫资金现象。虽然精准扶贫政策要求扶贫项目要按照规定进行“阳光”操作,但在具体扶贫工作中,仍然存在扶贫资金跑冒滴漏、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等腐败和“微腐败”现象。从实际情况看,贫困县一般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有的地方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擅自调整扶贫资金用途,把扶贫资金当成普通资金来使用;有的在项目资金下拨到位后又巧立名目套出资金,挪为他用。二是人力资源的素质低下严重影响资金使用效益。目前,在农村实施的财政扶持项目中,扶贫资金的使用大都用在老弱妇幼的弱势群体上,在扶贫项目管护上很难到位,资金的使用效益较低,留守群体的生产自救能力较弱,致使扶贫的效果不理想。此外,各地评价扶贫开发效果的主要标准是扶贫对象的减少情况,而对于扶贫资金使用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没有进行全面、科学评估,难以查明扶贫资金在使用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24]

刘霞等人研究了关于扶贫专项资金绩效审计问题。认为,当前河北省对精准扶贫专项资金应着力解决好以下审计问题:重结果评价轻过程控制,审计覆盖范围有限,还难以做到全覆盖,扶贫专项资金审计法律制度不够完善,以及扶贫资金审计监督力度不够等。^[25]

(二) 农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管理

2008年,中央确定在黑龙江、河北、云南三个省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这项政策是取消了村提留、乡统筹和农村“两工”,为了解决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一项新的惠农政策。10年中,成为河北农村基层组织为民办实事和村内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欢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了坚实基础。^[26]马磊对此项政策的实施作了有益的总结和分析。认为,按照“统一规划、集中使用、性质不变、渠道不乱、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原则,河北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捆绑各方资金,将现有新农村建设资金、新民居资金与“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捆绑使用,加大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支持力度,有力推动了新农村建设,从根本上破解了农

村公益事业资金发展瓶颈。同时,该政策的实施探索完善了政府引导,村民自愿的村级公益事业发展新机制;让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做到了村里的事情村民商量着办;促进了村级组织规范化管理,推进了农村民主理财制度建设。^[27]

七、税收政策与管理

(一) 增值税问题

郭海玲等人研究了 PPP 项目增值税成本效应问题。提出了如下观点:第一,随着国内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PPP 模式被广泛应用。但 PPP 模式本身存在较大的增值税成本效应。政府作为非税主体,会因纳税主体变化而缴纳增值税,使得政府的收入出现再分配过程。也就是说,纳税主体的特殊性导致了增值税成本的发生。第二,PPP 项目的增值税导致政府机构内发生收入再分配,从社会分配视角来看,PPP 项目具有全覆盖功能,能够从横向和纵向双重视角去影响政府的再分配功能。纵向收入再分配指的是中央与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横向收入再分配指的是政府各级部门间的分配关系。在征税体系中,作为参与合作的政府部门必须要缴纳增值税。如果其上缴增值税流入到税务部门,就会出现资本的横向流动。一旦参与部门成本过高,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降低服务标准;二是缴税成本转移。但两种情况都不符合 PPP 项目设计的初衷。第三,PPP 全生命周期中的增值税成本效应。从增值税周期来看,PPP 项目的增值税可以贯穿整个生命周期。^[28]

(二) 所得税问题

宋凤轩、王坤讨论了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发展策略问题。认为所谓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处于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第三层次,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其主要功能是允许投保人将保费在个人所得税前列支,缴费的投资收益免税,将当期纳税义务递延,减少当期税款支付,在领取保费时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其结果,就构成了对当事人的一种税收优惠,能够激励纳税人增强参与商业性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对建立稳定性更强的社会保险体系有重要意义。对此需要有以下配套措施:建立个人收入、保险投保和税收征缴的综

合信息平台;跟踪管理纳税人的递延纳税信息,实行差别化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实行限额内保费免税政策;建立个人退休金账户,实行单独核算。^[29]

2018年6月6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是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重要配套性文件。王利娜等结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具体规定,以案例的形式详解了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范围、扣除凭证与扣除资料三者的关系,在13种交易情形下如何取得税前扣除凭证,4种可以以相关资料替代税前扣除凭证的情形,以及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后税前扣除凭证的补救措施等四类重点问题,以帮助广大纳税人更好地理解文件精神,维护合理的税收利益。^[30]

(三) 新业态税收问题

电子商务运营模式的电子化、虚拟化和隐蔽性等特征,对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加大了政府监管和税款征收的难度。王凤飞等人指出,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国家十分重视电子商务的技术创新。在电子商务发展之初,给予电子商务企业政策支持以鼓励其发展无可非议,但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以及日渐成熟,电子商务企业在其运营成本较之线下实体企业本就凸显优势的情况下,继续游离在工商、税务登记监管之外,让其成为税收的真空地带,势必产生税负不公,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严重违背了税收中性、税收公平的原则,需要适时加快实现电子商务企业与实体企业税负水平的统一。提出的具体建议包括:完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规则,为电子商务税收提供法律依据;引入委托代理机制,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路径;利用大数据开展电子商务税收的现代化信息管理;成立专门的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机构,推进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专业化、规范化。^[31]

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相比,其范围更加广泛,是典型的新业态经济。刘森、金戎基于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和实际经验,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数字经济税收问题产生的技术层面原因在于,目前基于“实体性存在”关联规则(nexus rule)及利润划分原则(profit allocation rule)已经不能适应基于“网络连接”的商业模式,如何确

认与合理划分跨境所得税收管辖权是问题的症结；在政治经济层面，数字经济税收问题是传统所得来源国与居民国（投资母国）税权划分遗留问题的“网络版”，而经济的数字化进一步加剧了税收利益冲突。作者还对三种潜在解决方案，即：BEPS项目解决方案、增值税方案和公式分配法进行了介绍。^[32]

（四）京津冀税收协同政策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产业布局的协同，以充分发挥京津冀区域的整体分工优势。河北大学财政学专业的师生依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河北省社科基金课题，就此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关于产业转移及其税收分享政策。京津冀协同发展存在着行政区划的界限，为了让三地之间的产业不受行政阻碍，必须解决好产业转移中的税收分享问题。谷彦芳等认为，产业转移及其税收分享政策的制定涉及范围广，影响大，因此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会面临一系列困难。同时，产业转移税收分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政策缓冲期、迁入地和迁出地税收利益冲突以及成本分担等一系列问题。为解决这一重大战略性问题，这需要就相关政策做好必要的协调工作。一是构建涉税争议协调机制。为有效解决税收利益分享矛盾，促进产业转移的有序健康发展，应构建京津冀税收利益协调机制，在国务院层面成立三地联络协调机构，制定协调制度，协调三地的税收利益争议问题。二是规范税收优惠政策，避免政策洼地，建立和维护正常有序的税收分享秩序。三是分支机构实行属地纳税，以保证合理分享税源。四是产业转移过程中主要涉及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都是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需要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五是建立京津冀统一的税收征管制度，增强其趋同性。^[33]

制定有利于产业转移的税收优惠政策。李克桥等人分析了京津冀三地的产业结构特征。从三次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整体来看，北京表现为“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天津和河北则表现为“二三一”的产业结构。虽然天津的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下降且第三产业比重逐年提高，但是第二产业仍然是天津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河北第二产业比重略大于天津，但第三产业比重略低于天津。需要注意的是，河北的第一产业虽然

和北京、天津的第一产业一样呈现递减趋势，但是递减速度较慢，其发展指标远远不及北京和天津。从具体产业类型上看，北京主要以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并且拥有较为发达的服务业；天津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态势可观；河北对农业和工业的依赖程度仍然较高，知识、资源和技术类产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作者就此提出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思路：首先，明确各地的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以此来确定产业转移方向和内容，尤其是要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京津冀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和质量的发展；其次，应加大产业转移承接的税收优惠力度，增强转移企业到承接地进行发展和建设的吸引力。^[34]

雄安新区的建立，不仅是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起因，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结果。未来的雄安新区无疑需要在高端产业发展的引领下进行建设，包括京津产业向雄安新区的转移。在一个原本县级低端产业的基础上，如何实现这样的产业发展目标？李克桥等人提出，在雄安新区产业布局中，要发挥税收政策的扶持和引领作用，就应该以降低征纳成本和风险为目标，以创新引领为导向，体现灵活机动、科学高效的地方特权，制定出符合雄安新区产业布局特质的税收政策制度，构建“合纵连横”的综合治税机制，强化税收信息现代化建设，厘清雄安新区与其纵横隶属关系的税收征收管理权限。^[35]

（五）涉税保证金

李亚松指出，当前涉税保证金制度体系在我国存在实施效率低、救济措施缺位、信息公开程度低、缺乏有效监督等诸多问题，一方面影响制度实施效率，另一方面也可能对纳税人生产经营所需的现金流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对此提出，应取消过时的保证金制度，改进保证金制度的启动和替代条件，建立跨部门沟通协作机制，建立涉税保证金公示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可有效解决存在的问题，达到优化涉税保证金制度和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双赢效果。作者分别就发票保证金、纳税担保金、欠税出境担保金、涉嫌骗税担保金进行了系统的分析。^[36]

（六）跨区域税收管理

我国对跨省企业税收缴纳制定了详细的汇算清缴制度，但从对河北省跨省企业缴纳税收的调

研情况看,这类企业税收管理仍存在难点,容易产生征收不到位、分支机构所在地利益保障不够等问题。靳志英、徐磊结合河北实际,对跨省总分机构企业税收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对策建议。指出,河北省拥有较多的分支机构,这些从事生产经营的分支机构享受了河北提供的公共产品及服务,但其产生的税收通过政策导向、转移收入、关联交易、汇总缴纳等途径,归入总机构所在地的政府收入,导致地区之间税收利益分配不公平、税收收入不均衡。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总部经济发展环境相对薄弱,总机构外迁造成税收流失;税收分配体系不完善,总机构和分机构所在地之间利益分配失衡;总分机构企业税收征管和监管存在漏洞,需要尽快完善;总机构在税收分配中影响较大,容易出现操控税收转移问题。^[37]

八、地方财政

廊坊市财政局历来有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之风,其研究成果对本市领导的决策发挥了重要的参谋作用。姚振辉、南云芙根据近年来廊坊市财政资金的管理实践,凝练出四个具有启发意义的经验。发挥财政“灌溉网”的作用,为民生事业提供资金支持;发挥财政“引水渠”的作用,为经济发展引入源头活水;发挥财政“蓄水池”的作用,为全市发展储备优质财源;发挥财政“流量表”的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作者用生动的数据资料和案例将廊坊市财政局用好资金积极助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做了有说服力的分析探讨。^[38]

郭媛媛认为,廊坊市各级各部门采取多项有力措施,确保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取得实效,使国家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政策得到有效落实,同时,盘活财政存量资金也成为了一项“新常态”工作,作为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推进整体财税改革、发挥积极财政作用的必要措施,能最大限度释放资金活力。作者从市级财政存量资金的主要构成部分,即:公共财政预算结余结转资金、政府性基金结余结转资金、预算单位结余结转资金方面,深入剖析结余结转资金成因,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和思考提出相关建议。^[39]

(孙健夫:河北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 齐守印.中国特色财政学部分基础理论问题辨析[J],财政科学,2018(8):29-39.
- [2] 齐守印.从混合经济、公共经济视角全面认识财政功能[J].中国财政,2018(1):62-64.
- [3] 齐守印.试论公共经济基于自身属性的特有规律[J].河北学刊,2018(3):143-149.
- [4] 张晋武.公共经济:基于社会再生产视角的重新认识[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74-80.
- [5] 高云霄.河北:以改革为统领 全面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质量财政[J].中国财政,2018(11):22-25.
- [6] 王帆,王艳真.风险视角下的河北财政运行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10):14-21.
- [7] 白玉芹,陈虹.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财政政策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8(10):30-40.
- [8] 王亚飞.我国钢铁工业碳足迹及升级路径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8(2):80-83.
- [9] 张晋武,马广巨.京津冀旅游业协同发展的财税支持政策简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8(4):13-17.
- [10] 王金营,李庄园,谢秋实.公共服务全面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之固本大计[J].河北学刊,2019(5):128-134.
- [11] 杜建政,林文利,赵志伟.提升雄安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对策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18(9):3-7.
- [12] 吴春丽,万翠英.借鉴山东经验 推进河北县域公共服务均等化[J].经济研究参考,2018(10):61-65.
- [13] 杨会良,杨雅旭.我国地方高校教育经费配置区域差异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2):73-80.
- [14] 杨会良,杨雅旭.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教育财政制度演进历程、特征与未来进路[J].教育经济评论,2018(11):3-13.
- [15] 张玉瑾,武根启.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推动创新型河北建设[J].经济研究参考,2018(10):21-28.
- [16] 张学军.福建省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做法及对河北省的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18(12):32-35.
- [17] 贺佳,孙健夫.县市级公共图书馆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J].经济研究参考,2018(8):15-22.
- [18] 陈兰杰,刘利.政府购买公共图书馆服务研究文献计量分析[J].河北科技图苑,2018(3):86-92.
- [19] 王莉莉,孙健夫.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价的再认识[J].经济研究参考,2018(2):7-10.
- [20] 谢恒,王舒翼,章晓玲.PPP项目绩效评价与建筑信息化模型(BIM)应用[J].经济研究参考,2018(12):51-54.
- [21] 胡德仁,刘亮,宋伟远,赵洁.我国学前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究[J].预算管理与会计,2018(2):22-26.
- [22] 张岳,段洪波.基于平衡计分卡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体系设计[J].经济研究参考,2017(12):81-88.
- [23] 马源禾.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思考和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18(9):24-27.

- [24]李存英,赵秋梅.精准扶贫财政专项资金使用存在问题研究[J].财政科学,2018(3):123-128.
- [25]刘霞,胡宣宣,刘明昊,任驿佳.扶贫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2):50-53.
- [26]刘霞,胡宣宣,刘明昊,任驿佳.扶贫专项资金绩效审计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2):50-53.
- [27]马磊.河北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十年的回顾与总结[J].经济研究参考,当代农村财经,2018(11):24-26
- [28]吴玉凤,郭海玲.政府管理视角下降低PPP项目增值税成本的探讨[J].税收经济研究,2018(12):6-10.
- [29]宋凤轩,王坤.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发展策略[J].经济研究参考,2018(4):21-26.
- [30]王利娜,张伟,马莉.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解析[J].财务与会计,2018(10):53-56.
- [31]王凤飞,贾康.加强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思考和建议[J].税务研究,2018(12):112-114.
- [32]刘淼,金戎.数字经济税收问题的潜在解决方案探讨[J].财政科学,2018(11):86-92.
- [33]谷彦芳,王坤,李克桥.京津冀协同发展下产业转移税收分享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8):4-7.
- [34]李克桥,左玉娇,王坤,王伟婷.区域税负差异背景下京津冀产业布局的财税对策.经济研究考,2018(4):4-9.
- [35]李克桥,孙颖鹿,李佳伟.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税收政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保定学院学报,2018(1):1-6.
- [36]李亚松.关于优化涉税保证金制度的思考[J].税务研究,2018(12):64-67.
- [37]靳志英,徐磊.跨省总分机构企业税收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经济论坛,2018(7):66-69.
- [38]姚振辉,南云芙.引来资金活水 润泽京津冀明珠[J].中国财政,2018(2):56-57.
- [39]郭媛媛.市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政策研究[J].财经界(学术版),2018(6):11-12.

货币银行学理论与政策研究

王重润 庞晓宇

2018年,河北学者主要在PPP与地方投融资平台、中小企业融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普惠金融与金融扶贫、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资本市场与衍生工具市场、房地产金融、商业银行经营等九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

一、PPP与地方投融资平台

PPP项目作为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重要抓手,在投融资及财政收支创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等多方面被寄予厚望。胡恒松、孙久文分析了PPP项目实施面临的问题,包括PPP项目的立法困难与实践困难。从投融资制度与运营机构建设、拓展投融资渠道方面提出加快构建符合PPP项目特点的多层次融资体系。^[1]

胡恒松、陈德华等人结合我国目前PPP项目发展现状,总结出多种PPP融资模式的特点,分析了近年来国家针对PPP项目出台的文件,设计出具有逻辑性的可融资性评价指标,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所处行业发展状况、政府方及国有出资人代表基本情况、项目质量、社会资本方基本情况、风险及增信情况以及其他共七个一级指标,以及4个具有一票否决权的指标,对

PPP项目的可融资性进行了全面评价。对几个具有典型参考意义的PPP项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可融资性评价指标具有较好的适用性。^[2]

白德全研究发现,在社会融资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跨期调度机制的作用下,PPP能够在短期内通过多种渠道缓解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在中期内通过约束地方政府的非理性行为促使政府职能的转变,在长期内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成本收益机制、债务隐藏机制和目标分化机制的作用下,PPP也有可能短期内诱发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在中期内诱发连锁的隐藏债务风险,在长期内诱发系统的金融经济风险。为了限制PPP负面影响,充分发挥其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作用,应该从完善PPP的配套制度建设、加强对PPP运行的监督和管理、培养参与主体的市场契约精神、制定社会资本的进入退出机制等四个方面来采取相应对策。^[3]

采取ISM和F-ANP相结合的方法对PPP项目成功影响因素的关联性和重要性进行分析,得出其关键成功因素的影响程度权重值综合排序。研究发现,绿色PPP项目经验与技能、政府监

管持续性和政府对项目支持意愿是开发区绿色 PPP 项目关键成功影响因素中的深层次因素,是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并积极实施绿色生产技术的核心推动力。^[4]

陈立文、杜泽泽根据文献识别出适用于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四种 PPP 模式,构建了四种 PPP 模式下的投资回报率模型并判断四种 PPP 模式的可行性,建立四种 PPP 模式下的博弈投资决策模型,运用等额年金法对四种 PPP 模式进行比较优选,以实际案例对构建的投资回报率模型和决策模型进行验算分析。^[5]

李建英、王梓哲等人发现,目前河北省 PPP 项目中民营资本的参与度不高。他们分析了河北省民营资本参与 PPP 模式的优势、可行性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引导民营资本参与 PPP 模式的对策建议。^[6]

随着地方债务监管力度不断加强,如何合法合规地筹集资金,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面临的现实问题。鲍静海、胡恒松等人对地方政府融资和城投公司产生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未来可行的融资方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结合实践经验提出地方政府融资体系的构建路径。^[7]

胡恒松、鲍静海基于 2014—2016 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经营数据,通过时序变化跟踪近三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公司业绩、市场化转型、社会责任三个板块指标的数值,构建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全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除了公司业绩外,市场化转型和社会责任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从各地的发展实践看,投融资平台的转型发展有三种模式:1. 从单纯的“土地运作模式”跨越至“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两翼齐飞模式”;2. PPP 模式下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需要明确投融资平台在 PPP 项目中的角色定位;3.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需要实现“政企分开”,逐步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化运作过渡。^[8]

胡恒松、王宪明等人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及地方政府债务管控的角度出发,提出转型和债务管理途径。通过构建测度指标体系,形成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展评价的综合报告,

对中国三大区划的 15 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进行系统分析,全面反映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整体发展,并提出适合当地融资平台转型的相关建议。^[9]

二、中小企业融资

李素红、方洁等人以博弈论证明,互联网金融融资平台能够提高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融资成功率。提出构建多方参与的科技型小微企业互联网金融融资平台。从培育指导机制、加强风控机制和完善信用机制方面对建设科技型小微企业互联网金融融资平台提出建议。^[10]

胡继成、鲍静海认为,雄安新区发展定位要求其在投融资模式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将绿色发展与绿色金融支持体系相融合,利用互联网思维、大数据思维的新理念拓展未来发展空间,用系统工程思维和方法谋划综合发展。建议:1. 提升城市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2. 做好城市开发的整体性战略性方案;3. 增强地方政府信用和财政筹资能力;4. 推动地方财政的融资创新和制度突破;5. 优化财政资金使用的方式和形式,提升使用效率和效果;6. 确保财政资金能有效撬动社会资本投入;7. 充分利用绿色金融试点;8. 选取最有效的融资渠道、投资模式和政策手段;9. 有效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和技术。^[11]

胡恒松、胡朝凤等人认为,东北地区长期忽视金融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以致在信用债券融资方面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严重制约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他们选取 2006—2015 年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区域信用债券融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地方政府通过信用债券融资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带动效应。东北地区应积极培育良好的资本市场环境、构建完善的地区融资体系、提高债券融资能力和规模、有效借助产融结合手段,推动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稳健发展。^[12]

杨会朴、康凯以风险—收益分析为起点,探究供应链融资模式的产出绩效和风险结构,对供应链融资系统中参与个体与集群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定量分析与评价,论证了创新型产业集群合作主体收益分配的改进路径。研究发现供应

链融资模式的信用转换和信用回流效应有助于解决创新型企业的信贷弱势地位,但供应链系统网络结构和参与主体联结的脆弱性,容易出现供应链融资风险聚集特征。^[13]

穆秀清、康凯等人利用博弈理论分析了分散决策下银行贷款融资模式和享有价格折扣的商业信用折扣融资模式及其对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提前支付价格折扣与银行利率相等的情况下,提前支付融资模式可更好地解决制造商资金约束问题。^[14]

李红英、王炎以2011—2015年深交所的中小科技企业为样本,研究这些企业选择不同融资方式的影响因素和制约条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科技企业有不同的融资方式倾向性,在货币增发的社会阶段,科技企业更倾向于债权融资。具有良好持续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科技企业更容易获得股权投资,具有雄厚企业实力和政府补贴的科技企业更容易获得债权投资。^[15]

吴超、吕荣杰以2015年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媒体情绪的视角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并率先以金融业竞争水平分组讨论金融环境差异下的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敏感性。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2015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检验,以WIND数据库中的新闻情绪作为媒体情绪的衡量指标,将债务融资能力细分为银行贷款率、贷款期限和债务融资成本三方面,并基于金融业竞争水平高低对公司所处的金融制度环境进行分组。实证结果表明,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都会显著降低银行贷款率,负面报道与银行贷款率和贷款期限的显著负相关关系仅在金融竞争水平较低的地区出现,同时并没有发现媒体情绪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突出了金融环境地区差异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为解释我国债务融资市场乱象提供了新的视角。^[16]

张娟认为,农村合作银行服务对象是中小企业和农业产业,其特点是层次较低、基础薄弱、贷款风险大,因而导致了不良贷款的产生。建议:1.改进农村合作银行服务策略,形成有效的风险控制;2.完善中小企业风险管理,从源头上降低贷款风险;3.加强金融制度创新,为破解难题提供保障。^[17]

杨蕾、张恒瑄等人通过对北京市中小型外贸企业进行调查分析,发现中小型外贸企业融资需求呈现三大特点:融资渠道的选择上,更加依赖内源融资;融资方式的选择上,更加依赖银行信贷;融资需求旺盛,融资规模增加,增速加快。基于北京“政保贷”案例分析,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破解中小型外贸企业融资困境的三大路径: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路径、联合担保公司组拳增信路径、“大数据+供应链”融资路径。^[18]

李巧莎、吴宇认为,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境,主要体现在:1.财政资金投入偏少,财税政策支持效果不明显;2.金融机构不愿涉足科技型中小企业,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业务少;3.直接融资渠道狭窄,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受限;4.科技型中小企业自身不足及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增加了融资难度。提出融资对策:1.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财政税收支持力度;2.引导、鼓励金融机构提供特色产品和服务;3.拓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19]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王重润认为,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因为科技创新具有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如果没有金融支持,没有金融市场提供的风险分散与交易机制,科技创新就很难进行下去。但是传统金融囿于经营方式与经营理念,不能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所需要的金融支持。中小企业是重要的科技创新主体,但由于规模小、轻资产、高风险等特点,面临的融资约束相对来讲更加严重。所以必须建立完善适应科技创新活动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建议:1.培育新型科技金融服务主体,多维度、全方位支持;2.创新科技信贷产品和模式,加大信贷支持力度;3.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能力;4.建立完善科技金融协同服务体系,提升科技金融服务效能;5.创新财政支持手段,推进财政与科技金融深度融合。^[20]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需要从供给侧对金融业进行结构性改革,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体系。王重润从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完善创新创业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战略转型,优

化金融生态环境,防控金融风险 6 个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对策建议。^[21]

曹袁阳、刘敏对跨国公司在苏州工业园区的投资与技术现状,以及制造业产业集聚现状进行描述,阐述了跨国公司对园区产业集聚影响的机理及程度。研究发现:苏州工业园区中跨国公司投资、跨国公司技术对园区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并且跨国公司投资的作用在两年后显现,短期影响比长期影响更强。跨国公司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正在由投资拉动逐渐向技术推动转变。^[22]

四、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防范金融风险、治理银行业市场乱象方面,以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和房地产泡沫等为代表的风险点成为 2018 年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领域。

王培辉基于中国 1998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多维经济金融数据,运用时变参数 FAVAR 模型测度了中国宏观金融风险,将其分解为外部金融冲击成分、宏观经济波动成分和金融内在脆弱性三个部分,分析了各驱动成分特征,识别了各驱动因素脉冲响应冲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宏观金融风险较好地刻画了金融体系面临的金融压力,三大驱动成分是中国宏观金融风险波动重要推动力,外部金融冲击成分影响更为持久,金融内在脆弱性波动的作用效果相对最短。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各驱动因素对宏观金融风险影响随经济金融环境变化而变化,必须对宏观金融风险及其驱动因素保持动态跟踪监测。为防控中国宏观金融风险,长期来看应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短期上应加强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23]

李杰、刘露等人以融 360 平台提供的 4738 名借款人借贷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借款人违约风险的关键因素,就违约借款人的具体特征以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还款能力方面,经济特征中借款人总收入、总支出、工资收入因素对借款人是否发生违约有显著影响;在还款意愿方面,性别、借款额度、借款金额以及拖欠金额对借款人违约风险产生显著影响;在线上浏览行为方面,借款

人最少浏览网页数量和网站访问次数是 P2P 网络借贷借款人违约风险的显著因素。建议:风险监管部门应建立关键信息共享机制,明确审查范围,落实审查重点,通过建立违约风险评估模型降低平台和出借人的经济损失,推动 P2P 网络借贷行业的健康发展。^[24]

李延军等人以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优化为出发点,构建调整的流动性资产定价模型(M-LCAPM 模型),研究股票流动性风险构成及其对股票定价的影响。根据 M-LCAPM 模型,股票流动性对期望收益率的影响途径,包括单个股票流动性与市场整体流动性的共变性、单个股票的收益率对市场整体流动性的敏感度以及单个股票的流动性对市场收益率的敏感度等三个方面。结果表明流动性影响股票预期收益率有以下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为股票的流动性水平(流动性成本),第二种途径为股票的流动性风险。^[25]

李延军等人运用固定 GLS 面板回归研究了 200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中国 A 股市场流动性水平效应与敏感效应的具体表现以及产生的流动性溢价效应。研究表明:流动性水平效应、敏感效应与中国股市超额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二者的影响遵循流动性溢价理论;相比较而言,水平效应对我国股市的影响更大,但敏感效应的作用不容忽视,敏感效应呈现出规模递减与流动性递减趋势;牛熊市下都存在由水平效应与敏感效应引起的流动性溢价效应,但牛市中该现象更加显著。^[26]

五、普惠金融与金融扶贫

余军、康书生认为,对金融禀赋与客户红利融合机制的研究是转变传统金融范式、探索新金融普惠模式的重要切入点。普惠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应是维持金融禀赋与客户红利的时间均衡性。然后基于时间价值三要素对普惠金融提出了三阶段发展设想。^[27]

宋宁认为普惠金融发展通过破除金融门槛效应、弱化贫困效应及涓滴效应对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借助普惠金融发展减少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措施:1. 提高贫困农户的赋权强度;2. 完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拓展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3. 完善普惠金融扶贫对象的筛选机制;4. 加强普惠金

融基础设施建设。^[28]

王宁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的金融成因，金融扶贫主要制度安排及金融机构扶贫实践，金融扶贫的制约因素。揭示了金融扶贫直接和间接作用机理，通过构建模型对金融扶贫直接与间接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结合国内外经验从金融扶贫理念、体系、机制、模式和产品创新五个方面构建了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29]

郭小奔、康书生分析了保定市金融精准扶贫“股份合作制+”模式和“政银保”两种模式，认为金融精准扶贫中还存在金融扶贫精准度不够、地方政府融资担保平台监督机制尚未建立、银保之间通道不畅、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示范带动效应不显著等问题。提出如下建议：建立贫困人口大数据信息和农户信用评级体系，加强地方政府各级融资担保平台的监督和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政银保三者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继续完善股份合作制。^[30]

郭小奔、断胜英通过分析河北隆化县的“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的运行机制及扶贫成效，发现“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具有4个优势，即担保基金发挥担保、激励和缓冲三重作用，合理设置企业和贫困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打通贷款绿色通道，科学设计金融机构激励约束机制等；同时发现“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存在制约因素：县级可用财力较少、产业层级相对较低、致贫因素复合叠加、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和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等。在此基础上提出隆化县深入推进“政银企户保”金融扶贫模式的对策建议。^[31]

胡恒松、徐丹等人认为我国目前仍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和若干贫困区域。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乏力的根本原因不单是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更重要的是对资本市场重视不够、运用不足，以致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助推力没有得到激发。他们建议：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有针对性地进行金融创新，构建区域融资体系，探索产融结合新途径，提供完善的政策保障。^[32]

金浩、李瑞晶基于农村金融生态与贫困之间的交互机理，以河北省为例，构建了农村“金融生态—贫困”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实证考察了系统动态发展规律，并通过政策模拟试验探索

系统的优化方案。研究表明：河北省农村金融生态主体持续增长，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在波动中有所提升，农村综合贫困也得以持续缓解。财政支出的增加可以有效缓解贫困，但不具备可持续性；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加快农村金融征信体系和法律法规建设是优化系统的有效方案。^[33]

程京京、王彧婧等人通过对河北地区金融机构和农村走访调研，了解农户对小额信贷影响指标的满意度和重要性判断。在此基础上建立四分图模型，充分展示影响农户小额信贷满意度的优势因素、修补因素、机会因素以及维持因素。总体来看，河北省农户对小额信贷满意度偏低。农户对关系切身利益的价格类因素比较看重，对其满意度也偏低。据此提出金融机构应着力优化小额信贷产品、树立机构品牌等建议。^[34]

杨蕾、杨兆廷等人分析了区块链在金融领域应用的业务模式及典型案例，建立了博弈模型对传统金融和区块链金融模式下的农户信贷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四种基于区块链的金融支农创新模式：1. “区块链+政银担”支农创新模式；2. “区块链+政银保”支农创新模式；3. “区块链+两权抵押贷款”支农创新模式；4. “区块链+互联网+物联网”支农创新模式。^[35]

闫屹、冀瑞超对做市商制度影响市场流动性的研究进行了综述，总结了新三板发展历程与交易制度。从两个方面分析了新三板市场做市商制度对市场流动性的具体影响：1. 在协议转让下，新三板流动性处于令人担忧的境地。做市商制度在新三板应用后，新三板的成交数量和成交金额都有很大提高。2. 在成交金额上，做市转让公司要优于协议转让公司；做市转让公司的成交笔数远大于协议转让；挂牌公司以协议转让为主，做市公司数量偏少；出现做市转协议“回流”现象。同时提出了做市商数量少且主体单一，做市转让缺乏大宗交易制度，投资者数量少的问题，给出了促进新三板市场流动性的对策建议。^[36]

金浩、张晓园构建基于互联网金融的供应链主要成员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风险因子修正的Shapley值法并结合蚂蚁金服的供应链案例，对比分析引入互联网金融前后供应链风险和收益

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与供应链结合优势明显,蚂蚁金服降低了供应链整体的风险,提高了供应链整体的收益。^[37]

李巧莎考察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运行机制和风险控制措施,从参与主体、服务机构、处置机制等角度总结了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实践经验,提出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创新的思路和对策建议:1.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模式创新;2.修订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3.构建专业的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体系;4.加快建立统一的农村土地流转平台;5.拓宽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的资金来源渠道。^[38]

曹宝瑞从博弈论角度出发,探究影响P2P资金存管制度的因素,认为在监管机构严格监管环境下,只要监管部门增加对P2P平台违规惩罚力度,理性的P2P平台最终会选择合规运营,即(严格监管,合规运营,受理业务)是唯一的一个平衡决策。最后从商业银行、监管机构以及P2P平台角度出发,提出各自发展的建议。^[39]

六、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

陈尊厚对京津冀金融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存在问题。建议:加强区域金融监管协调及创新,完善三地金融办沟通协调机制,为三地金融机构提供“直通车”服务;推动监管的行为、资质互认;协同防范和化解区域重大金融风险,扩大区域票据交换的覆盖范围,支持支付工具创新等。^[40]

康书生、郭小卉等人在分析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金融业以及金融协同发展的现状基础上,分析了京津冀三地之间金融落差的影响因素。利用京津冀三地2005—2014年的统计数据,以灰色—多层次分析法对京津、京冀、津冀两两之间的金融发展协同性以及京津冀区域金融发展的总体协同性进行了检验。通过搭建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框架,明确了京津冀三地金融功能定位,提出了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41]

杨蕾认为,雄安新区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要走在国内和国际前沿,需要从绿色金融格局、绿色金融主体角色定位、绿色金融工具、绿色金融环境、绿色金融服务五大方面探索构建新路径:1.构建“分工—合作”的绿色金融格局;2.明

晰三大绿色金融主体角色定位;3.综合运用多种绿色金融工具,如强化雄安新区绿色信贷实施过程、设立雄安新区绿色发展基金、发行雄安绿色债券等;4.创造良好的绿色金融环境,如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政府政策扶持机制、打造绿色金融人才集聚高地和思想前沿阵地、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制定对环境社会和金融机构的约束政策等;5.完善绿色金融服务,如发展多样化的第三方机构、构建多重的绿色评价体系、建立广泛的绿色信息共享机制等。^[42]

冯文丽、史晓运用改进的熵值法和2005—2015年的数据计算京津冀三地农业保险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发现三地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农业保险发展不足。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三地农业保险差距较大的原因,结果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每公顷农用机械动力千瓦数、人均农林水事务支出、成灾率、财产保险密度等显著影响京津冀农业保险发展水平。通过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充分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保险需求、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对保险公司进行财政支持及税收优惠、保险公司提高对农业保险的重视程度等政策措施可促进京津冀农业保险的发展。^[43]

七、资本市场与衍生工具市场

毕海霞等人认为随着全球资本流动格局的不断演变,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加剧。伴随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双向开放进程的加快,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表现为: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差额呈现双向波动,短期化趋势明显,跨境资本流动活跃度日益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为防止跨境资本流动“大进大出”,避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建立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体系,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加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防范跨境资本流动的过度冲击。^[44]

叶莉等人基于时点视角,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货币流动性对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融资流动性的冲击效应,并引入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模型(DCC-MVGARCH),从时段角度分析货币冲击下的跨市场流动性传导以及不同金融子市场流动性之间的动态相关性。研究表明:

1. 货币冲击对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融资流动性有正向影响; 2. 货币流动性与股票市场流动性、银行融资流动性呈动态正相关关系; 3. 货币、银行融资和股票市场三元流动性在金融市场中的同向运动表现为螺旋式联动效应, 流动性的传导方向为货币市场→银行间市场融资→股票市场; 4. 在市场异常波动期间, 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融资流动性表现出显著的动态正相关关系, 进而产生正向的流动性螺旋, 加剧金融市场波动。^[45]

李延军、金相杉运用流动性调整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LCAPM), 选取沪深股市 2006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共计 144 个月 300 支股票的数据为样本, 对我国股市流动性风险溢价效应与三种溢价渠道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 相较于其他市场风险, 流动性风险对我国股票期望收益率的影响更为显著; 三种流动性风险中个股流动性成本对市场收益率的敏感度最为重要, 是流动性风险溢价的主要渠道, 而另外两种风险渠道的影响相差不大。同时, 通过 4 种不同分组方式研究了流动性风险在中国股市的具体表现, 结果发现; 中国股票市场也存在“flight to liquidity”现象, 在市场整体流动性降低时, 投资者会选择将投资资金从流动性低的股票转移到流动性高的股票中, 使流动性较差股票的价格急剧下降。^[46]

叶莉、李伯龙利用 component-wise gradient boosting 处理高维备选变量集合, 允许波动率的解释变量在不同时间段内存在差异。分别以线性及树形基分类器考察波动率短期及长期敏感因素的变化, 得出各经济变量对波动率的主要作用区间和作用符号。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行, 股市波动对宏观基本面因素的敏感度上升, 国际经济因素对我国股市波动具有较为持续的长期影响。^[47]

石善冲等人以基于微信文本挖掘的投资者情绪与上证指数收盘价、成交量为研究对象, 研究了投资者情绪时间序列与收盘价、成交量时间序列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验证了投资者三种情绪倾向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方式和效果不同: 基于微信文本挖掘的投资者消极情绪比例能够稳定预测上证指数收盘价, 基于微信文本挖掘的投资者积极情绪倾向和中性情绪倾向比例的增减变动能够迅速引发滞后 1 天的上证指数成交量的增减变

动。研究表明基于微信文本挖掘的投资者情绪对于预测股票市场表现有重要作用。^[48]

金浩、姚臻基于双重差分 (DID) 模型, 选取我国 2015 年沪深 A 股市场股价异常波动时期的融资融券业务对股价特质性波动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异常波动时期, 在融资融券业务的参与下, 股价特质性波动率呈现出上涨趋势。融资融券业务在股价剧烈上涨和剧烈下跌两个子时期对股价特质性波动率的上升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 股价振荡上涨阶段, 融资融券对股价特质性波动的影响却表现出抑制性的特点, 但影响程度较小。^[49]

许东海等人基于 A 股 199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数据, 以上海和深圳两市投资者为研究对象, 对我国股市是否也同样存在与“博彩偏好”理论相一致的投资者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股市也存在与该理论一致的现象, 投资者喜好具有博彩特征的股票。另外, 我国股市投资者强烈地喜好投资拥有历史最高收益率 (Max) 的股票, Max 与股票期望收益率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 Max 可能是在影响彩票特征股票定价第一位、最重要的因素。所得结果在控制 CAPM 贝塔、小规模效应、账面市值比效应和流动性溢价等异说之后仍然显著。^[50]

陈业华等人针对投资者因证券收益率的变化引起的投资心理变化, 提出一种基于累积前景理论和熵理论的投资风险决策方法: 首先把证券的历史收益率划分为若干个状态区间, 将某证券落在某状态区间定义为该证券的状态; 然后计算各证券状态的概率及熵值; 再利用累积前景理论, 将无风险利率作为投资者的目标参照点, 计算各证券所有状态相对于参照点的“损益值”, 得出各证券所有状态的价值, 并将各证券所有状态发生的概率转化为投资者的心理概率, 计算出各证券所有状态下的前景值, 进而得出各证券的累积前景值; 最后建立一种度量各证券投资风险的决策模型来确定最优组合。选择沪市证券市场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证明方法是可行且有效的。^[51]

李玉兰、邢妍从一个完整并购周期的角度研究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关系, 以 2014 年深市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运用二项 Logistic 回归研究投资者情绪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 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

投资者情绪引起的并购行为的短期和长期市场反应情况。结果表明：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对上市公司并购行为有助推作用；上市公司并购行为进一步提升了投资者情绪，二者存在“顺周期效应”。^[52]

刘霞运用 2009—2015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全面考察管理质量、风险投资和公司 IPO 日及日后的市场效应，得到结论：1. 风险投资对管理质量有正向作用；2. 风险投资声誉对管理质量提升的作用显著；3. 获得风险投资支持和管理质量高的公司，承销券商的声誉较高，上市首日抑价率较低，上市成本较低，募集资金规模更大；4. 获得风险投资支持和管理质量高的公司，市场价值和长期市场回报率较高，也更受到机构投资者的偏爱；5. 风险投资对负债融资决策影响不显著，但能提高投资规模，管理质量高的公司，资产负债率更低，投资规模更高；6. 风险投资支持和管理质量对经营业绩直接影响不显著，但会显著提升经营业绩的增长能力。同时也发现，风险投资支持和管理质量在公司 IPO 当日市场效应中发挥着替代效应，在 IPO 后公司价值、投融资决策和经营业绩方面发挥着互补作用。^[53]

秦亚飞等人以 2010—2017 年在沪深两市主板上市的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外商投资、股权结构以及企业财务绩效三者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企业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外商投资与企业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外商投资能够显著削弱股权集中度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抑制作用；外商投资能够显著增强股权制衡度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54]

李俊强采用 2005—2014 年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事项意见的独特数据，从明确监管议案事项、非明确监管事项和股权分置改革等三方面，深入考察其对独立董事出具否定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对明确监管议案事项出具否定意见概率低，说明“逆淘汰”机制和“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的存在使得监督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发现，在股权分置改革后，独立董事对议案事项出具否定意见概率更低；出于规避法律风险的考虑，独立董事对明确监管事项出具否定意见的概率相对较高。因此，

监管层应加强对各类议案事项检查力度而非仅仅明确监管事项；科学厘清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决策中的责任边界，明确独立董事承担的法律风险。^[55]

八、房地产金融

近些年，房价与企业用工成本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涨。王重润、路迪使用 663 家在主板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研究在 2008—2016 年之间房价波动与用工成本的关系，估计方法采用 SYS-GMM。全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企业用工成本有微弱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 0.0013。不过，房价对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受到城市宜居性的反向作用。另外，房价与企业用工成本的关系存在产权差异、规模差异以及行业差异。房价波动对民营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要大于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对信息业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要大于对制造业的影响；对大型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要大于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56]

王重润、王赞运用 2004—2016 年上市公司数据，证明房价波动确实能够改变企业家的风险偏好水平并进而影响企业投资。当房价上涨 1% 时，风险偏好渠道效应使得企业投资增加 0.060%—0.093%，而传统的抵押担保渠道效应使企业投资增加 0.005%—0.008%，房价波动所产生的风险偏好渠道效应要比抵押担保渠道效应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以工具变量与关键变量替代所进行的稳健性检验证明结论是可靠的，即房价波动风险偏好渠道效应是存在的。^[57]

房地产价格长时间、大幅度上涨增加了中小企业的非流动资产价值，对企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影响。王重润、史宝英通过房地产抵押担保渠道效应，以 2013—2016 年中小板、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房价波动对中小企业权益融资成本的影响。实证发现，房价上涨会降低中小企业的权益融资成本。他们从两方面提出建议，一方面，从政策、经济、法律多方面入手，使房价保持在合理水平上，避免房价出现大幅下跌，从而稳定宏观经济；另一方面，应该进一步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58]

陈立文、王荣等人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分析了高速铁路开通对城市住宅价格的

影响。研究显示,高速铁路的开通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的住宅价格,其影响效应也存在城市规模和区域的差异。建议:配合一系列房价调控政策,在开通高速铁路后,根据城市具体情况进行房价调控。^[59]

陈昭翔、陈立文以天津某房地产项目为例,从新建公租房项目和改建商品房项目两个方向构建公租房融资租赁模式。通过收益测算,新建公租房项目以8%左右的内部收益率吸引相关企业参与,可解决一、二线新城市人口住房问题。改建商品房项目因成本偏高,收益不理想,但仍可考虑通过税收减免、租赁期结束重新收购、销售住房方式吸引相关企业参与。^[60]

娄文龙、张娟以1998—2017年国务院及各部委颁布的678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为分析样本,采用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政策文献计量方法,研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聚焦点在不同时期的变迁。结果表明,房地产宏观调控围绕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化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发生了明显的政策主题变迁。研究认为,只有将房地产市场调控目标从注重住房的商品性价值逐步向住房居住功能回归,才能实现“住有所居”的长远目标。^[61]

郑宁、陈立文采集199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用总样本和区域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货币供给量变动以及其他因素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供给量、前期房地产价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数量等因素,对房地产价格产生正向影响且均显著,实际利率对房地产价格负向影响显著。其中,房地产价格的滞后项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货币供应量,城镇人口数量对房地产价格正向影响较小。分区域分析房地产价格影响发现,不同区域存在着较大差异。^[62]

刘广平、韩爱舍等人认为,将存量房转化为租赁住房是盘活存量资产切实有效的方法,但是资金问题成为最大障碍,借助于房地产投资信托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他们研究了存量房转换为租赁住房采用REITs的可行性以及其具体运作模式,并分析了目前阶段采用REITs模式面临的问题,同时为“两房转化”的实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和保障措施。^[63]

樊锦霞、叶莉等人为了探究房价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影响的内在原因,借鉴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假设居民的不安全心理是决定其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且不确定性变化又为影响居民安全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通过检验发现,当不确定性变动危及居民心理安全需求时,居民消费对收入增长的弹性反应系数显著降低。上述结论预示着政府在房价不确定性进行调控时,一方面可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以保障居民心理安全;另一方面可通过合理引导预期,提升居民消费意愿,进而达到刺激消费增长的目的。^[64]

九、商业银行经营

马洪超在分析中国影子银行特殊性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对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最终目标的异化效应。影子银行由于具有“银行的影子”“非典型性脱媒”“剪刀差式风险”等三大特征,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传统操作工具和操作目标发生异化,并使得货币供给量的传统中介目标失效,同时也使利率这一新中介目标的效力得以提升。但是,由于信贷配给下的利率双轨制、土地垄断下的收益双轨制和监管缺失下的体系双轨制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导致资金脱实向虚、资产泡沫不断膨胀、金融风险持续累积,最终使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产生异化。建议:为了改善货币政策的效果,应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影子银行监管和完善配套制度建设等三个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65]

辛兵海、张晓云等人基于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和微观银行数据,分析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可通过不同负债融资来源之间的替代,来应对央行的货币政策变动。在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货币政策收紧降低了商业银行的零售存款并提高了批发型融资,进而提高了批发型融资占比。由于所面临的金融摩擦程度存在差异,相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大型银行批发型融资的提高更加显著,而这也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研究从新的视角解读了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的交互影响。^[66]

辛兵海、陶江使用中国A股上市银行2007年第1季度至2017年第1季度数据,首次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同群效应问题进行实证

检验。研究发现：1. 中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同群效应，个体银行的流动性政策选择会受到群体银行的影响。2. 中小银行之间的同群效应最为显著，“太多而不能倒”的集体道德风险构成了中小银行之间相互效仿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国有四大银行与中小银行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模仿行为，这排除了基于信息获取的学习动机导致同群效应的可能性。从宏观审慎的视角，研究结论为系统流动性风险监控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实证支持。^[67]

辛兵海、陶江基于我国 2003—2015 年间 135 家商业银行数据，实证分析银行经营模式对其自身经营风险的影响，用银行负债融资结构和收入结构来反映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结果发现：1. 平均而言，批发融资占比较高的银行，其经营风险也较高；非利息收入占比对银行业的经营风险影响并不显著。2. 经营模式对经营风险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商业银行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国有银行的经营风险对收入结构和负债融资结构均缺乏敏感性；批发融资依赖显著增加了股份制银行和区域性银行的经营风险。非利息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股份制银行的收益率波动性，但收入多元化会显著降低区域性银行的经营风险。^[68]

辛兵海、胡逸飞等人基于我国 2003—2016 年 16 家上市银行样本数据，应用 HP 滤波方法对个体银行的过度信贷增长进行测度，并实证分析过度信贷增长和事后信贷风险的关系。结论发现：1.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会受到过度信贷增长的正向影响，这证明了我国信贷市场上“赢者诅咒”效应的存在性。2. 由于风险偏好存在差异，相对于其他中资上市银行而言，国有银行信贷风险对过度信贷的敏感性更强。3. 过度信贷在增加信贷风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银行的稳定性，增加了银行的破产风险。^[69]

(王重润：河北经贸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 胡恒松, 孙久文. 基于 PPP 项目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J]. 甘肃社会科学, 2018(01).
- [2] 胡恒松, 陈德华, 黄茗仪, 张建红. PPP 项目可融资性评价研究与应用[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10.
- [3] 白德全. 规范 PPP 发展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J]. 理论探讨, 2018(03)
- [4] 李妍, 马丽斌, 薛俭.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下开发区 PPP 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8, 38(22)
- [5] 陈立文, 杜泽洋. 保障性住房项目 PPP 模式可行性与投资决策研究——基于博弈论[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04)
- [6] 李建英, 王梓哲, 刘陆. 引导民营资本参与 PPP 模式的问题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 建筑经济, 2018, 39(05)
- [7] 鲍静海, 胡恒松, 魏洪福, 肖一飞.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务及融资体系构建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06.
- [8] 胡恒松, 鲍静海.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 指标体系与转型模式[J]. 金融理论探索, 2017(06)
- [9] 胡恒松, 王宪明, 付海洋, 费超. 中国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转型发展研究(2018)[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11.
- [10] 李素红, 方洁, 蔡犇.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平台建设[J]. 科技管理研究, 2018, 38(11)
- [11] 胡继成, 鲍静海. 雄安新区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探讨[J]. 中国流通经济, 2017, 31(12)
- [12] 胡恒松, 胡朝凤, 孙久文. 信用债券融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以东北地区为例[J]. 会计之友, 2018(11)
- [13] 杨会朴, 康凯. 创新产业集群供应链融资风险结构与收益分配[J]. 会计之友, 2018(09)
- [14] 穆秀清, 康凯, 何华. 制造商资金约束的多渠道供应链融资策略研究[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8, 38(03)
- [15] 李红英, 王炎. 中小型科技企业的融资方式选择[J]. 财会通讯, 2018(02)
- [16] 吴超, 吕荣杰. 媒体情绪对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基于金融业竞争水平的分组检验结果[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02)
- [17] 张娟. 农村合作银行化解中小企业贷款风险难题研究[J]. 农业经济, 2018(03)
- [18] 杨蕾, 张恒瑄, 刘静怡.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小型外贸企业融资困境破解策略——基于北京“政保贷”案例[J]. 农村金融研究, 2018(03)
- [19] 李巧莎, 吴宇.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融资实现路径——以河北省为例[J]. 税务与经济, 2018(01)
- [20] 王重润. 提升金融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能力[N]. 河北日报, 2018-08-10
- [21] 王重润.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N]. 河北日报, 2017-12-08.
- [22] 曹衷阳, 刘敏. 基于 ECM 模型的跨国公司主导型产业集聚发展研究[J]. 运筹与管理, 2018, 27(04)
- [23] 王培辉, 康书生. 外部金融冲击、宏观经济波动与金融内在脆弱性——中国宏观金融风险驱动因素分解[J]. 国际金融研究, 2018(04)
- [24] 李杰, 刘露, Chao-Hsien Chu. P2P 网络借贷借款人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研究[J]. 商业研究, 2018(09)

- [25] 李延军,金相杉,王丽颖,张蒙.基于 M-LCAPM 模型的股票流动性风险构成及其经济意义解释[J].金融发展研究,2018(09)
- [26] 李延军,张蒙,刘华堂.流动性风险、水平效应与敏感效应——基于流动性溢价的实证检验[J/OL].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版),2018(10).
- [27] 余军,康书生.普惠金融禀赋、弱势客户红利与时效性[J].财会月刊,2018(22)
- [28] 宋宁.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农业经济,2018(07)
- [29] 王宁.金融扶贫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01.01
- [30] 郭小卉,康书生.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分析——基于河北省保定市的案例[J].金融理论探索,2018(02)
- [31] 郭小卉,段胜英.深度贫困地区金融精准扶贫模式探析——以河北隆化县“政银企户保”小额贷款为例[J].区域金融研究,2018(11)
- [32] 胡恒松,徐丹,孙久文.金融创新助推扶贫与区域经济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18(01)
- [33] 金浩,李瑞晶.农村金融生态减贫的系统动力学仿真——以河北省为例[J].系统科学学报,2018,26(04)
- [34] 程京京,王彧婧,郝立斌,杨宜.基于四分图模型的河北农户小额信贷满意度测评[J].武汉金融,2017(12)
- [35] 杨蕾,杨兆廷,刘静怡.基于区块链的金融支农模式创新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18(01)
- [36] 闫屹,冀瑞超.做市商制度对我国新三板市场流动性的影响[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07)
- [37] 金浩,张晓园.互联网金融对供应链风险及收益的影响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8,37(10)
- [38] 李巧莎.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实践与创新[J].经济研究参考,2017(62)
- [39] 曹宝瑞.我国 P2P 网贷资金存管制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博弈理论视角[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09)
- [40] 陈尊厚.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与创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05.01
- [41] 康书生,郭小卉,杨博宇.京津冀金融协同发展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07.01
- [42] 杨蕾.雄安新区绿色金融体系构建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01)
- [43] 冯文丽,史晓.京津冀农业保险发展差距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18,32(05)
- [44] 毕海霞,陈小荣,刘玉娟.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新动态、潜在风险与化解对策[J].经济纵横,2018(05)
- [45] 叶莉,陈勇勇,李园丰.货币冲击下的跨市场流动性传导研究[J].南方金融,2018(08)
- [46] 李延军,金相杉.中国股市流动性风险测度及风险溢价渠道[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05)
- [47] 叶莉,李伯龙.经济增速下行阶段我国股市波动敏感因素分析[J].系统工程学报,2018,33(04)
- [48] 石善冲,朱颖楠,赵志刚,康凯立,熊熊.基于微信文本挖掘的投资者情绪与股票市场表现[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8,38(06)
- [49] 金浩,姚臻.异常波动时期融资融券对股价特质性波动的影响研究[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01)
- [50] 许东海,米彦香,杨晓叶.中国股市投资者博彩偏好与股票收益率[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8,34(04)
- [51] 陈业华,李兴源,白静,黄璐.基于投资者心理的证券投资组合熵决策及应用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8,48(04)
- [52] 李玉兰,邢妍.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顺周期效应”研究[J].财会通讯,2018(14)
- [53] 刘霞,任驿佳.风险投资与管理质量:上市公司 IPO 效应的经验证据[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05)
- [54] 秦亚飞,高洪显,田国双.外商投资、股权结构与企业财务绩效[J].财会通讯,2019(15)
- [55] 李俊强.股权分置改革视角下独立董事对议案事项监督机制研究[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18,15(05)
- [56] 王重润,路迪.房价上涨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8(05)
- [57] 王重润,王赞.房价波动、风险偏好与企业投资[J].武汉金融,2018(10)
- [58] 王重润,史宝英.房价波动对中小企业权益融资成本的影响[J].河北金融,2018(06)
- [59] 陈立文,王荣,杜泽泽.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高速铁路开通对城市住宅价格的影响[J].管理现代化,2018,38(02)
- [60] 陈昭翔,陈立文.公租房融资租赁创新模式可行性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39(01)
- [61] 娄文龙,张娟.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变迁量化研究——基于共词和聚类分析的视角[J].上海经济研究,2018(08)
- [62] 郑宁,陈立文.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的货币因素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8(05)
- [63] 刘广平,韩爱舍,常夏源.存量房转化为租赁房的 REITs 运作模式研究[J].管理现代化,2018,38(04)
- [64] 樊锦霞,叶莉,张玉梅.房价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一个行为金融学角度的分析[J].当代经济管理,2018,40(05)
- [65] 马洪超,易崇艳.影子银行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异化效应及应对研究[J].理论探讨,2018(06)
- [66] 辛兵海,张晓云,陶江.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商业银行负债结构——理论与实证[J].世界经济文汇,2018(03)
- [67] 辛兵海,陶江.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同群效应吗[J].财贸经济,2018,39(04)

[68] 辛兵海,陶江.银行异质性、经营模式和风险——基于我国银行业微观数据的实证[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71(01)

[69] 辛兵海,胡逸飞,王重润.银行过度信贷增长的测度与风险[J].金融论坛,2018,23(04)

语言学研究

杨清臣 侯晓舟

2018年河北语言学研究成果涉及汉语文字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多个方面,共发表论文120余篇,出版著作10余部。

一、汉语文字研究

(一) 文字、训诂

为人所不识或为人所误释的字称作疑难字。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在汉字贮存领域,还是在汉字使用领域,都存在大量疑难字。疑难字的存在,不仅影响字书编纂质量和利用价值,还会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杨宝忠举例说明了大型字书疑难字在文献校勘、方言研究、汉语词汇研究、汉语音韵研究、汉字学研究以及汉字规范化与标准化工作等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1]

近代汉字学是汉字学中新兴的分支学科。梁春胜融汇相关研究成果,介绍了近代汉字的范围、主要材料、研究意义,近代汉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近代汉字学简史,并就近代汉字学的未来发展做了初步探讨,为近代汉字研究指明了方向。^[2]

隋唐碑志是研究隋唐史的重要资料,在史学界备受关注,相关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而隋唐碑志所蕴含的语言文字学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发掘,语言文字学界也关注不够。尤其是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疑难俗字仍未准确考释,直接影响到对隋唐碑志文献的正确解读和利用。梁春胜在前贤录文的基础上,对隋唐碑志中的17个疑难俗字加以考释。^[3]

北魏霍扬碑1920年出土于山西省临晋县东霍村(今临猗县东霍村),在历史、书法、文字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录文至少有近十种。但因原碑剥蚀较甚,各家录文误读之处颇多。梁春胜参照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拓对各家录文作出汇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霍扬的家世,认为霍扬很可能是晋交州刺史霍弋的

后代。^[4]

《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墓志》和《墨香阁藏北朝墓志》是新近出版的两部收录和整理北朝墓志的重要著作,为北朝历史、考古、语言、文字、书法、美术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批新资料。梁春胜从石刻文献整理的角度,对两书的优缺点做出评论。^[5]梁春胜还从以上两部书中选取16个误释的俗字加以考释。^[6]

刘征等以邯郸市响堂山石窟北齐至隋唐时期的文字作为隶楷过渡阶段的代表来研究形体混同现象。从原形体与混同后形体的形义关系来看,以形体相近意义无关最多,形体上以简化而发生的为主;数量上体现出一定的普遍性、稳定性;另外混同关系具有复杂性;混同发生与形体层级、位置呈反相关;发生存在演进性以及造成文字系统简化,加强符号性。^[7]

《通用规范汉字表》是最新、最权威的规范汉字的依据。杨清臣结合《通用规范汉字字典》和《〈通用规范汉字表〉解读》,对其中的三级字表所收的六个疑难字进行考释,并指出三级字表中的部分汉字属于疑难字,在没有厘清字际关系前,不适合作为人名用字继续使用。^[8]

《尔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训诂专著,它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在《尔雅》文本传抄、文献征引、后世字书储存的过程中,《尔雅》用字发生各种变异,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同形字。新产生的《尔雅》用字可能与其他字书或文献用字同形,也可能与《尔雅》其他名物词用字同形。杨清臣就后一种现象进行讨论,同时指出《汉语大字典》在义项收录方面存在的问题。^[9]

《汉字标准字典》对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确定的21003个汉字字头在形音义方面进行了汇通简释,非常有利于汉字标准在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在推动助力汉字的国际化和规范化方面功效显著。但其在对字源的注释说明中存在把一

些明明有汉字使用例证的字形标注为别国形源的问题，齐霄鹏发现其中的“日本汉字”有21例属于此类情况。^[10]

《汉语大字典》是一部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主要任务的大型历史性语文工具书，在字形收录、注音、释义、举证各方面均超越前出字书。《大字典》引证丰富，所引书证、例证大多未经后人整理，没有标点，在编纂过程中编者对这些引用文献加上了标点符号。标点整体水平较高，绝大部分标点准确、恰当；但由于书成众手，加之条件限制，仍存在不少标点失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该书的编纂水平和利用价值。杨涛等以《汉语大字典》第二版标点问题为研究对象，订正《大字典》标点失误凡350条，每条标点失误少则1处，多则4、5处不等。^[11]

张振谦全面辑录齐莒地域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器，时间范围自西周早期到战国末年，涉及齐、逢、郛、铸、曾、鄆、过、莱、纪、诸等国。其中多有书法家未闻、未见、未识的书法精品，作者第一次让每件铜器“国别清楚，地域明晰，断代明确，历代著录一目了然”。为研究齐系齐莒地域的语言文字、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提供极大方便，具有重要的文字学、文献学和艺术学价值。^[12]

太子鼎是1998年10月出土的一件战国时期燕国铜鼎，原发掘报告认为鼎盖铭文为“亦取”。张振谦认为：“亦取”应该释为“工师取”，读“工师取”。“工师”为官职名，“取”为人名，是典型的“官职”+“人名”的燕系铭文。另外，新近见到一战国时期赵国有铭鼎盖，铭文为典型的晋系题铭。铭文中“卅一年”为赵惠文王31年，即公元前268年；“平臺”见《汉书·地理志》，其地在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战国时在赵国疆域内。^[13]

《史记·白起列传》中的相关记载错误较多，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已有指正。徐世权结合出土文献材料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的记载，对《白起列传》中的三处记年错误进行了辨析。^[14]作者还对对已公布的秦“四十四年上郡守绾戈”的置用地名加以补释，提出“徒”为“徒淫”的省称，“衍”地因无法确定加刻的时间，其可能是“衍氏”或“广衍”的省称。进而初步整理了目前所见的秦兵器二字地名的省

称情况。^[15]

20世纪中后期，音义关系任意性的观念流行，认为音义关系任意性是唯物主义，理据性是唯心主义。因此，一些学者将声训现象不加分析地看作“唯心主义”，以《白虎通》为代表的汉代声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刘青松深入分析《白虎通》义理声训的性质、历史背景、来源，及其反应的思想文化等一系列问题，认为《白虎通》大规模使用声训，反映了古人对音义关系必然性的坚持，是对“任意性”的一种反动，其中符合语言规律的部分虽为数不多，但终究以其合理性成为科学词源学的起点。而不符合语言规律的声训，尽管对词源学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干扰，但也具有语言学之外的丰富内涵，值得深入研究。^[16]

徐铉校订的《说文解字》在《说文解字》的流传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徐铉的校勘是理校加本校，但理校中的“理”不是普通的事理，而是由《说文》生发的一套科学的文字系统论，这个系统论对后世《说文》学的形成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当“大徐本”成书后，这一理论却被隐藏在了背后，人们对“大徐本”版本的重视远远大于对其文字理论的关注。刘青松分析了徐铉的校语，从中抽绎出他的文字学理论，加以评析，试图在文字学史上给徐氏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17]

《国语·周语上》有“众以美物归女”句，学界有不同的训释，郭万青认为其中的“以”是并列连词，先秦传世文献中“以”的这种用法比较常见。“归”字在本句中是“嫁”的意思。“众以美物归女”的真正解释应该是“三个美女（一起）嫁给了你”。^[18]

由吴汝纶点勘、吴闿生续成的《桐城吴先生点勘国语》中有吴闿生案语27条，涉及到《国语》文字校勘、文字通假、文字改读、语词训释、句读、时代特征、文学描写手法、韦注评价等多个方面。郭万青通过辨析认为：27条案语中既有吴闿生个人的见解，也有与前人相同之处，其中有些说法颇有益于《国语》研究，但有些说法有欠妥当。^[19]郭万青等还对唐代五部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群书治要》《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所征引的《国语》材料进行全面整理与研究；将五部类书所引《国

语》材料和《国语》的多种版本进行校勘,对所涉及的条目进行语义训诂、文字字形考辨,对《国语》版本系统进行了梳理厘定。^[20]

(二) 词汇

安新县位于京津冀腹地,白洋淀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其鲜明的渔业生产特色,也积累了丰富的渔谚。张莉通过渔业生产谚语的列举与解读,分析其所蕴含的知识和凝聚的语言智慧和文化习俗。^[21]张莉等还研究搜集梳理了安新事理谚语百余条,并择取典型谚条,解读分析所蕴含的淀域文化特色。^[22]

“前”和“后”是一组基本的空间概念,在许多语言中,描述空间概念的词语都发生了向时间概念系统的隐喻。汉语对时间系统的表述也大量借用了表示空间概念意义的词语,其中“前”“后”在与不同时段表述的对应过程中,呈现出错位和不对称的现象。武文杰对这些现象的描写和分析发现,错位和不对称现象的成因是人们认知角度和认知习惯的不同。^[23]

王华等对日常用语“真有你的”进行考察研究,认为作为评注性话语标记表示出乎说话人意料之义,在具体语境中有夸赞、嗔怪、责备、明夸暗贬等意思。在使用模式上,“真有你的”可以与评价的内容、说话人的态度或具体评论共现,同时上下文中含有提示说话人具体态度的显性信息。“真有你的”具有人际协调、话题标记及语境顺应三种主要的语用功能。^[24]

现代汉语中,量词“个”是量词系统中与名词搭配范围最广的个体量词。量词的“个化”问题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王重阳在对大量语料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对量词“个化”问题从语体和语料角度进行解读。研究认为,虽然量词“个”在量词体系中占重要地位,具有表量范围宽泛、使用频率高等特点,但是由于量词“个”自身语义的局限性,它并不能取代其他量词。^[25]

韩书庚考察并列双音词认为:并列双音词是汉语复合词中重要的类型之一,其产生受多种动因的促动。并列双音词由同义语素构成的完全透明,由反义语素构成的比较透明,由类义语素构成得比较晦涩。并列双音词中具有羡余现象的类型为两种,一种是同义语素构成的并列双音词;另一种是偏义复词,两者都是在汉语历史发展中

形成的共时层面的羡余现象。理解其产生动因、语义透明度及羡余现象,会加深对并列式双音词的理解与掌握。^[26]

(三) 语法

李永等通过一组历史语料(“至于”“过于”“加以”“甚至”“可以”),考察一个非结构如何整合为词汇单位,然后进一步演变为语法单位,或者由一个较实的成分语法化为较虚的成分。研究发现,在这种非同步演变中,词汇化总是先于语法化的发生,由此形成的非结构虚词缺乏内部形式,但其词汇形式的获得和语法意义的“浮现”,可以通过一个外在的结构性单位进行论证,充分显示了语言和语言使用者的互动性,以及语言本身强大的整合性和创新能力。^[27]李永还认为:在汉语非结构双音序列的词汇化中,“动+介”式、“介+动”式、“名(代)+副”式等非结构类型的变化具有比较典型的认识价值。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句法、认知等因素的强制或诱导使其固化为无内部形式的词汇或语法单位。“完形”心理通过韵律压制和显著度凸显,促进了非结构词汇化的发生;转喻不但可转指所在构式及其语义,而且扩大了搭配成分的范围,使得非结构的某一成分由于句法约束的减弱,相对强化了与另一非结构成分重新分析的可能性。^[28]

蒋静忠从主观量的视角来考察现代汉语中的副词,梳理出了判别副词是否表达主观量的方法,并根据这些方法筛选出90个能够表达主观量的副词。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全面考察现代汉语副词,对同义副词之间的差异有不少新发现,有助于推动同义副词的对比研究,对于副词的对外汉语教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9]

被动句研究还存在很多不一致的看法,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研究对象过于复杂。另一方面是因为学者们采用的理论体系不同。刘亮等基于以语义谓词为核心的词汇概念结构,从词库角度对几类被动句式进行生成分析,主张直接和间接被动句是通过词汇概念结构上的不同操作得到的,长被动句和短被动句的区别是句法模块和语音接口上的不同操作得到的。^[30]

(四) 方言

在方言研究方面,田恒金等对巴东话的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及方言色彩浓郁的疑问代词、反

身代词和旁指代词进行了考察研究。^[31]李小平等通过对河北运河沿河方言文献的梳理和田野调查以及和其他方方的比较,考察分析了京杭大运河对河北运河沿河方言在语音、一般词汇、语法及地名等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32]

汉语方言中存在着许多有音无字的口语词,这些词的本字往往是汉语历史上曾经的通用字。尹凯的《考无极方言字》^[33]《再考无极方言字》^[34]依据古今音变规律,以音理探究、字形分析、方言佐证、文献佐证等方法,考证河北无极方言口语词的本字问题。

《红楼梦》的基础方言研究一直是个热点,且观点众多。高光新认为:《红楼梦》为了“真事隐去”,故意使用各地方言词,而且各个版本的方言词又有变化,因此判定《红楼梦》的基础方言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更不能用现在的方言词作为依据,而应该用清代的语料作为依据,分为不同题材,逐类对比,进行综合判断。^[35]

二、外语教学与研究

(一) 外语教育与教学模式研究

外语教育“国际化”是新时代背景下建设教育强国中的重要一环。李迎新等通过对加拿大大学教师接收国际访问学者的原因和动机、挑战性问题、主要收获以及未来合作建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建议,对中国高校教师接收访学和申请访学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36]

张素敏认为留学语境是词素加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目前研究相对缺乏留学语境在时间概念表达方式加工中的影响分析。作者以76名中国、留英和留美学生为被试,通过对比句子判断任务中被试在英语一般过去时不同表达方式中的形式—功能联结,分析了留学语境在输入加工中的作用。^[37]

在国标与校标研究方面,李正栓等指出,《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是按照教育部要求制定的翻译专业的纲领性文件,是本专业的准入、建设和评价依据。作者在解读国标内涵的基础上,从培养目标、特色课程设置、实践教学体系和教师队伍建设的四个方面对校标的制定提出了建议。^[38]

张健稳从“一带一路”背景下多语种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入手,结合国内外语言

翻译服务研究发展概况,对“一带一路”背景下多语种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对策进行探讨,以供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语言文化产业部门决策者参考。^[39]

肖潇认为,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不同国家之间在语言交流时要想传递的信息更加准确和易于他国人民理解就离不开文化的导入。就日语教学来说,在日语教学中导入文化主要是指将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与语言教学相结合。加强对日本文化的学习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日语,了解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以此来避免在交际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冲突。^[40]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外语教学模式也随之丰富。张秀芹以大学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为期10周的网络文本互动和课堂面对面互动实验,以探讨同伴支架的作用和差异。研究发现,网络文本交际互动在提高参与度、提供情感支持和维持既定目标3个方面的支架数量远高于课堂互动;而纠正错误表达和提供词汇两种支架出现频率则远低于课堂互动。网络文本互动中同伴支架能有效地推动小组讨论的顺利进行,有助于降低学生的焦虑感、提高学习自信心。^[41]

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方面,王林海在分析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目前存在问题的基础之上,结合CDIO教育理念构建大学英语口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同时以燕山大学非英语专业的103名学生为实验对象对该模式进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CDIO理念下的口语翻转课堂效果显著,为大学英语口语教学带来了新启示。^[42]

近年来,MOOC以其大规模开放性的特点,通过互联网平台在外语教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齐灿等认为,MOOC具备资源多、受众广、易于使用等优点,SPOC作为MOOC和传统课堂的结合体,以其“小规模”“私有”等特点,更符合各高校人才培养的个性化需求。在线上 and 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下,探讨了如何将小组合作融合到各阶段的学习过程中,设计出基于SPOC混合教学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并指出了该学习模式所具备的优势。^[43]

魏慧哲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地方高校

青年教师普遍存在信息化教学能力较薄弱的问题,提出了丰富提升青年教师信息化能力的教育形式、强化青年教师信息化媒介素质教育等提高地方高校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策略建议。^[44]

此外,杜淑萍的《文本体验式的英语阅读教学》,^[45]杨国燕的《英语教师课堂教学口语汇编》^[46]《现代英语教学论》,^[47]徐丽欣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48]魏慧哲的《小学英语教师课堂反馈研究》^[49]等从多个角度和层次论述了外语教学理论与方法的相关问题。

(二) 外国文学研究

卢卡奇文艺思想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引介到中国,至今已经走过了 80 多年历程。他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典型性、总体性和物化理论已为国内文艺界耳熟能详。卢卡奇文艺思想在中国的接受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发轫、发展,至今形成了多元化的学理性探究局面。杨林从历史角度,梳理卢卡奇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总结其接受史呈现出的特征,阐释卢卡奇文艺思想对中国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建构作用。^[50]

杰伊·帕里尼等认为,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是个伟大的诗人。在其有生之年,只有 T. S. 艾略特和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声望能与其相抗衡。弗罗斯特的诗歌传统着眼于从自然界开掘出精神隐喻。这种诗歌传统在英语诗歌中和威廉·华兹华斯紧密相关,正是他在 19 世纪初把诗人定义为不过是“一个对人说话的人”。^[51]

陈耀庭等认为罗伯特·潘·沃伦诗歌中含有“向外借鉴”与“向内批判”两种神秘主义趋势。前者表现为萨满意象、埃及意象,后者表现为《圣经》意象、食人意象,其诗学中的神秘主义质素具有批判社会的功能,反映了当时美国文坛对基督教中心主义与白人中心主义的祛魅和对工业文明与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反思。^[52]作者还对罗伯特·潘·沃伦的叙事长诗《内兹珀斯酋长约瑟夫》进行了分析研究。^[53]

李正栓等指出,约翰·邓恩是英国 17 世纪玄学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阐释邓

恩神学诗歌中所体现的伦理方面的问题,从而去把握邓恩在皈依英国国教后的伦理困境以及做出的伦理选择。通过对邓恩神学诗的解读来发现诗人在其所处时代的伦理环境和思考,从而挖掘文学经典的现实伦理意义,通过文学现象出发去了解伦理事件背后的伦理意义。^[54]

《地理学之三》是美国著名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晚期创作的经典诗集,作品中刻画了面貌各异的“他者”意象。刘露溪的研究旨在透过德里达的“他者”伦理学视角解读诗人在作品中面对“他者”的呼唤如何进行真诚的回应,并展现毕肖普对“他者”的伦理担当,以揭示其作品蕴含的伦理学维度。^[55]刘露溪等认为,伊丽莎白·毕肖普的作品声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她对事物卓越的观察力、对意象精妙的呈现及对生命的透彻洞察。自然、动物、女性、孩童等弱势群体成为其诗歌关注的对象。其研究旨在探索毕肖普对这些“他者”群体的观察中所蕴含的诗人对以“人—男性—自我”为中心的压迫机制、与性别政治暴力的批判以及对“他者”面向伦理的勇敢追求。^[56]

陈昕等在研究鲁迅和王尔德两位作家时认为,就其思想资源而言,鲁迅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双重底色,这一特征决定了他既坚守传统,同时又向世界敞开,这也是他积极译介王尔德的前提和基础。认为鲁迅在译介王尔德的过程中,不仅接受和借鉴了王尔德唯美颓废主义文学的积极因素(色彩、意象和象征手法的运用),而且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在追求文学“公共性”的过程中,大胆地对唯美颓废主义的思想内核进行转化和超越,从而在其文学创作中成功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57]

赵志刚研究认为,新加坡华裔作家林宝音以当地华裔族群文化为素材,聚焦新加坡社会中的核心问题。在其小说中,混杂的文化语境是人物冲突的文化根源,表明新加坡人在寻找共同的“国家身份”过程中的认同困惑;其中所创设的混杂的文化意象,更是华人传统文化和英国经典文学双重影响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混杂性文化书写中,林宝音并没有盲目地认同东方或者西方,而是将二者作为新加坡的镜像或参照,以此来思考和审度新加坡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58]

彭瑶认为,小说《流离失所的人》展现了美国南方农村白人群体因历史记忆、社会变革造成的受害者身份意识及其围绕选择性的历史伤痛记忆而生产去语境的民族叙事以便清除异己的机制。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身份转换揭示了受害者身份背后的历史意识形态土壤以及当今西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身份政治建构。^[59]

王彦军在研究《卡萨玛西玛公主》时指出,亨利·詹姆斯以本真的叙事手法,将伦敦的城市景观、时代思潮、阶级结构、政治状况等诸多要素以全景画的方式再现给读者,把伦敦的诸多空间元素塑造成蕴含着权利、身份、性别等多维社会因素的体系。作者以自己独特的空间意识将政治元素有机地融入到小说中涉及到的监狱、街道、百货商店等具体的伦敦空间意象中,小说中每个被书写的空间都再现出当时新兴的政治观念。^[60]

在日本文学研究方面,张如意指出,自日本作家太宰治的小说《惜别》问世以来,作品中的鲁迅形象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日本研究界的批评观点基本上呈现出了批判→剥离→重塑的发展脉络。这与日本当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从“作家论”到“作品论”再到“文本论”的发展脉络趋于一致,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新的批评方法论不断改变着《惜别》中的鲁迅形象认知,也促使我们从多个维度去重新审视作为作家的鲁迅和太宰治。^[61]

在俄罗斯文学研究方面,张春芳对《俄罗斯文学选集》进行了评介,认为该书不仅收集精选了众多俄罗斯名著,还有相关文学巨匠的生平经历,涵盖了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全过程,能够让读者很好地领略俄罗斯文学大家的风范,对俄罗斯文学有一个比较全面清晰的了解,更能从中透视俄罗斯的宗教哲学理念。^[62]

此外,黎新华的《早期反乌托邦小说的人性异化问题反思》^[63]、侯静的《“有种阿拉斯加”中的女性身份定位》^[64]、段艳丽的《何物最坚实?——弗吉尼亚·伍尔夫短篇小说“坚实的物品”主题词剖析》^[65]、张妍的《华裔戏剧与中国本土戏剧的跨文化交流评析》^[66]、唐翠云的《话剧“哥本哈根”诗意语言背后的哲理命题》^[67]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丰富而广泛的研究。

(三) 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张素敏在评介《二语加工导论》一书中指出,“‘二语加工’是一门研究第二语言使用和习得的心理过程的学科。”二语加工从认知和心理语言学角度对非母语/二语进行研究,在这一研究方法下,二语使用主要作为一种认知事件,而不是文化、社会语言或教学事件来研究。其主要目的是理解二语使用中的心理过程和心理机制,并通过这些心理过程和机制来了解二语习得。^[68]

孙斐通过检索《汉日对译语料库》发现,「テクレル」句较为频繁地用于间接引语,且不容易译为汉语的“动词/介词+我”。并以“人称”为中心,对间接引语中的「テクレル」句,以及对应的汉语进行了对比考察。^[69]

苗佳分析考察了计算机为媒介的英语写作纠错反馈中的追踪修正、单词处理器、追踪修正和单词处理器混合三种技术类型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学生写作成绩的平均错误和平均反馈有所降低,在即时、延时后测中,纠错反馈呈现显著性,特别是采用追踪修正和单词处理器混合类型的实验组最为明显。因此,在写作中追踪修正和单词处理器混合采用可引发更精准、更持久的语法准确度。^[70]

李楠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中有关“话语语言学”论文的内容、年代信息等进行统计分析,综述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历程、研究范围及研究状况。表明话语语言学作为一门20世纪70年代的新兴学科在不断得到广泛关注,尽管话语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未有确切定论,但其研究范围的广泛性和跨学科性得到了认可。^[71]

赵春龙等以捷克对《萨迦格言》的翻译史为例,从宏观上考察了《萨迦格言》的外译史,以反映其外文译本的基本情况,分析了捷克文译本产生的社会背景,揭示译者翻译的起因。^[72]

侯静等对郑振铎和冯唐的泰戈尔《飞鸟集》汉译本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郑译本散文体呈现,复制原作形式;冯译本诗文呈现,把原作升华。郑译本忠实于原文本内容;冯译本内容超越原文本。郑译和冯译中的文化传递都有改进的空间,也提醒所有译者都应重视文化传递。复译有必要,但要力争越译越好。^[73]

侯羽基于“《红楼梦》中英文语料库”考察

了霍克思和杨宪益夫妇对《红楼梦》前八十回原文人称指示视点进行翻译转移的异同点。发现译者们均对原文中三种人称指示视点进行了翻译转移,均以第一人称指示视点翻译转移为主要类型,均以第一人称指示复数视点变单数视点、第二和第三人称指示视点变第一人称视点为主要转移方式。并认为霍氏进行人称指示视点翻译转移的主体性较杨氏夫妇显著。^[74]

申玉革认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1839—1978年为起步阶段;1979年后开始走入学术视野,评论和翻译出版发展迅速;21世纪以来,进入快速发展期,十四行诗的教学、译介和评论实现了量的增长和质的飞跃,与莎剧呈比肩之势。^[75]

在语言学与翻译研究领域,还有宋萌等的《“一带一路”背景下媒体对外传播策略探析》^[76]、赵咏的《国内语音及语音教学研究现状与分析》^[77]、王俏的《文化安全视野下的外宣翻译研究》^[78]、张媛媛的《“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河北省外宣翻译策略研究》^[79]等。

(杨清臣,河北大学副教授
侯晓舟,河北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杨宝忠. 疑难字的负面影响[A]. 近代汉字研究(第一辑)[C].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8.
- [2] 梁春胜.“近代汉字学”刍议[A]. 近代汉字研究(第一辑)[C].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8.
- [3] 梁春胜. 隋唐碑志疑难字考释[J]. 中国语文,2018(4).
- [4] 梁春胜. 北魏霍扬碑校考[J]. 文物春秋,2018(1).
- [5] 梁春胜. 北朝墓志整理的新收获——评《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墓志》《墨香阁藏北朝墓志》[A]. 近代汉字研究(第一辑)[C].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8.
- [6] 梁春胜. 新出北朝墓志俗字例释[J]. 汉字汉语研究,2018(2).
- [7] 刘征,郑振峰. 响堂山石窟文字楷化阶段形体混同现象研究[J]. 语言研究,2018(3).
- [8] 杨清臣.《通用规范汉字表》疑难字考辨[A]. 近代汉字研究(第一辑)[C].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8.
- [9] 杨清臣.《尔雅》同形字略探[J]. 现代语文,2018(1).
- [10] 齐霄鹏.《汉字标准字典》所见“日本汉字”考[A]. 近代汉字研究(第一辑)[C].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8.
- [11] 杨涛,杨宝忠.《汉语大字典》标点订误[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
- [12] 张振谦. 齐系金文集成·齐莒甲卷[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
- [13] 张振谦. 燕赵鼎铭考释两则[A]. 古文字研究(第32辑)

- [C]. 北京:中华书局,2018.
- [14] 徐世权. 据秦简《编年记》谈《史记·白起列传》的编年错误问题[A]. 古文字研究(第32辑)[C]. 北京:中华书局,2018.
- [15] 徐世权. 秦“四十四年上郡守绾戈”置用地名补释——兼谈秦兵器铭文中的地名省称问题[A]. 中国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C].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
- [16] 刘青松.《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17] 刘青松.《徐铉的〈说文〉学》[A]. 近代汉字研究(第一辑)[C].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8.
- [18] 郭万青.《国语》“众以美物归女”正诂[J]. 语言研究,2018(3).
- [19] 郭万青. 吴闿生《国语》案语辨正[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8(4).
- [20] 郭万青. 唐代类书引《国语》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2018.
- [21] 张莉. 安新渔谚的知识传授及文化传承价值[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22] 张莉,李琴. 安新事理谚的白洋淀流域文化内涵探析[J]. 汉字文化,2018(24).
- [23] 武文杰. 空间方位词“前”“后”的时间概念用法[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24] 王华,李娅. 评注性话语标记“真有自己的”语义语用分析[A].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秋之卷[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25] 王重阳. “个化”问题及量词“个”表量的局限性分析[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8(4).
- [26] 韩书庚. 汉语并列双音词的多维考察[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4).
- [27] 李永,李冠男. 汉语非结构双音序列的非同步演变:从词汇化到语法化[A]. 励耘语言学刊第2辑[C]. 北京:中华书局,2018.
- [28] 李永. 汉语非结构双音词化的若干类型及句法认知动因[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 [29] 蒋静忠. 现代汉语表主观量副词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 [30] 刘亮,刘晓静. 现代汉语几类被动句式的词库生成分析[A].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秋之卷[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31] 田恒金,田未名. 湖北巴东话的代词系统[A].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秋之卷[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32] 李小平,赵梅赏. 京杭大运河对河北沿河方言的影响[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 [33] 尹凯. 无极方言本字考[J]. 汉字文化,2018(9).
- [34] 尹凯. 再考无极方言本字[J]. 石家庄学院学报,2018(4).
- [35] 高光新.《红楼梦》基础方言的判定方法[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1).
- [36] 李迎新,李正栓. 基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国际访学合作双

- 方主体间性研究——对加拿大某大学教师的访谈分析[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8(1).
- [37]张素敏.留学语境在英语一般过去时间表达方式加工中的作用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6).
- [38]李正栓,申玉革.本科翻译专业“校标”制定的原则与要求[J].中国翻译,2018,(4).
- [39]张健稳.“一带一路”背景下多语种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探讨[J].上海翻译,2018(4).
- [40]肖潇.日语教育中的文化问题探究——评《多样化日语教育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8(7).
- [41]张秀芹.网络实时文本交际互动中的同伴支架研究——与课堂互动相比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4).
- [42]王林海.CDIO理念下的大学英语口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实证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8(2).
- [43]齐灿,张宏.基于SPOC混合教学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探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8(1).
- [44]魏慧哲.地方高校青年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分析和提升[J].中国成人教育,2018(3).
- [45]杜淑萍.文本体验式的英语阅读教学[J].教学与管理,2018(6).
- [46]杨国燕.英语教师课堂教学口语汇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 [47]杨国燕.现代英语教学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 [48]徐丽欣.“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18,(1).
- [49]魏慧哲.小学英语教师课堂反馈研究[J].教学与管理,2018(9).
- [50]杨林.卢卡奇的文艺思想在中国:一个接受史的回顾与启示[J].中国比较文学,2018(3).
- [51]杰伊·帕里尼,雷武铃.罗伯特·弗罗斯特和生存之诗[J].上海文化,2018(3).
- [52]陈耀庭.罗伯特·潘·沃伦的诗性神秘主义[J].社会科学战线,2018(3).
- [53]陈耀庭.生之渗透:《内兹珀斯酋长约瑟夫》的空间叙事[J].山东社会科学,2018(11).
- [54]李正栓,马洋洋.约翰·邓恩神学诗歌伦理思想研究[J].外国语文,2018(5).
- [55]刘露溪.“他者”诗学:毕肖普的《地理学之三》[J].国外文学,2018(4).
- [56]刘露溪,李正栓.伊丽莎白毕肖普的“他者”诗学[J].当代外国文学,2018(4).
- [57]陈昕,邵丽君.公共性:鲁迅对王尔德的接收与转化[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3).
- [58]赵志刚.混杂性书写:林宝音小说与新加坡“本土性”[J].外国文学评论,2018(4).
- [59]彭瑶.《流离失所的人》中的受害者身份政治[J].外国文学评论,2018(3).
- [60]王彦军.《卡萨玛西玛公主》中伦敦空间政治的再现[J].外国文学,2018(1).
- [61]张如意.太宰治《惜别》中的鲁迅人物形象批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
- [62]张春芳.从俄罗斯文学透视俄罗斯的宗教哲学理念——评《俄罗斯文学选集》[J].新闻爱好者,2018(3).
- [63]黎新华.早期反乌托邦小说的人性异化问题反思[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 [64]侯静.《有种阿拉斯加》中的女性身份定位[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8(2).
- [65]段艳丽.何物最坚实?——弗吉尼亚·伍尔夫短篇小说《坚实的物品》主题词剖析[J].语言教育,2018(3).
- [66]张妍.华裔戏剧与中国本土戏剧的跨文化交流评析[J].戏剧文学,2018(11).
- [67]唐翠云.话剧《哥本哈根》诗意语言背后的哲理命题[J].戏剧文学,2018(6).
- [68]张素敏.《二语加工导论》介评[J].当代外语研究,2018(4).
- [69]孙斐.间接引语中「テケレル」句的认知特征——兼与汉语的对比[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8(5).
- [70]苗佳.基于追踪修正和单词处理器的英语写作纠错反馈研究[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 [71]李楠.话语语言学研究现状综述[J].邢台学院学报,2018(3).
- [72]赵春龙,李正栓.《萨迦格言》外译史考察——以捷译史为例[J].民族翻译,2018(4).
- [73]侯静,李正栓.泰戈尔《飞鸟集》汉译策略与艺术研究——以郑振铎和冯唐译本为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1).
- [74]侯羽.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人称指示视点翻译转移比较研究[J].红楼梦学刊,2018(2).
- [75]申玉革.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译介史研究[J].外国语文,2018(4).
- [76]宋萌,刘涵.“一带一路”背景下媒体对外传播策略探析[J].新闻战线,2018(4).
- [77]赵咏.国内语音及语音教学研究现状与分析[J].教育教学论坛,2018(22).
- [78]王俏.文化安全视野下的外宣翻译研究[J].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18(3).
- [79]张媛媛.“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河北省外宣翻译策略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18(1).

文 学

文艺理论研究

姜文振 赵佳 郭明东

2018年,河北文艺理论工作者在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古代文论、文艺美学以及当代文艺批评研究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回应了当下文艺理论研究的前沿论争,彰显了中国文论研究在“新时代”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新成就与新趋势,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当代建构作出了一定贡献。

一、关于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研究

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问题是当下中国文论界一个极富前沿性的学术焦点。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宏观语境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都已发生变化,文学艺术的生态已经产生重要变革,既有的文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逐渐陷入与时代和文学的现实发展脱节的困境。“文学是什么”“在新时代如何看待文学理论”“文学的定位在哪里”等问题引起人们更深层的反思与讨论,人们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文学。由邢建昌教授领衔的文学理论研究团队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境况下,聚焦于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问题,以一系列学术成果展现了对当代文论发展的深刻反思。

邢建昌的《反思与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进行了方法论层面的分析,认真考察了利用知识学模式分析研究文学的可行性和对当下文学研究和发展的意义。他认为,反思是一种知识学模式的视角,最初被布迪厄运用到社会学领域,其初衷是将反思意识注入到社会科学组织内部和认知结构内部。文学内部出现反思意识,目的在于探究文学理论形成的内在深层结构。文学理论的陈述是这种深层结构的外在显现,即“知识型”。邢建昌认为,存在两种“知识型”模式:一是设置和解决问题的情境(Context)主要由一个特定共同体的学术兴趣所主导;二是知识处理是在一种应用的情境中进行。第二种模式是一种跨学科的模式。从反映论

到审美反映论再到文化研究论,是知识型模式的变更,文化研究论即属于真正打破学科间壁垒的第二种模式。从知识学模式进入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并不会导致遮蔽文学理论思想性。文学理论的知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中所说的知识,而是一种解释性、非实证性的知识。文学的人文属性要求我们在讨论文学时,始终把对人文的、思想的关怀放在首位。他还认为,人文学术必须坚持思想性,但思想性和开放性必须接受学术性的规范,实现思想性和学术性的统一。这里所说的学术性,即要求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必须体现人类知识生产的一般逻辑,必须破除以往文学理论过度经验化和印象式特点,人文学术的自由性和开放性不能成为经验式文学理论的借口。^[1]

邢建昌的《文学理论知识学模式的变化——从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到文化研究论》认为,早期的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到文化研究论实际上是实现从西方理论总体性叙事向知识型模式转变的趋向。邢建昌认为,早期的反映论是一种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是对文学本身的僭越,这是过于依赖早期的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反映论占据文学理论的主流,在认识论的框架里,文学不过是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后来的审美反映论进一步关注文学理论的人文特性,虽然延续着相同的认识路径,但认为审美是对美的事物的认识和欣赏。审美反映论关注人思维的特殊性,涉及人的精神心理的各个层面,关注潜意识意识的种种形态,相对早期的反映论,这种突破是巨大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文学研究方式,更是一种跨越“知识型”模式的认知方法,主要表现出两个向度:一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二是文化诗学的关注。与传统的二元论、本体论研究不同,文化研究的兴起为文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路径,扩大研究领域,关注凝聚在文本上的政治、性别、种族

和权力要素，但彼此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关系。邢建昌认为，文化诗学的核心在于确认文本美学上的优点。文学文本具有美学意蕴才能成为文化诗学研究的对象，这是对文化研究的一次纠偏。文学本身包含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文化研究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文化诗学与审美反映论存在一种张力，是对文学理论所蕴含的“可能性世界”的守护，充满人性的关怀，凸显理论研究的人文色彩。邢建昌认为，文化研究论是一种“知识学型”模式的转变，它关注文学理论的“应用的情景”，研究过程注重考查系统的总体性，文学理论内在的深层结构决定文学理论陈述的样态。相关学科的，或跨学科的文学类理论知识正活跃在文学理论的中心。^[2]

邢建昌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动力学根据》认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具有学理上的连贯性和内在演进力量，文学问题的出现看似是某种特定社会历史因素的促动，其实却是某种知识演进的内在逻辑使然。邢建昌把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召唤”：基于文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基于哲学或美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基于相关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基于跨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文学与文学理论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文学和文学理论在本体论承诺和价值取向上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和内在一致性——它们都是关乎人的存在的，是为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为人生”既是文学存在的理由，也是文学理论赖以存在的理由。指向一个“美好世界”的建立，是文学的也是文学理论的共同追求。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动力学根据基于哲学，哲学具有众多学科“元学科”的特性。哲学是人用来理解和解释宇宙的一门学科，文学最初被看作是对“理式”的模仿，这种理解奠定了后世对文学本质的解读。文学理论作为对于文学进行艺术解释的学问，只有依赖于特定的哲学观念才会获得牢固的根基。康德是“第一位使审美理论变成一个哲学体系整体的组成部分的现代哲学家”，哲学、美学成为文学发展的推动力。邢建昌认为，文学理论的寄生性决定它易受相关学科的影响。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文学理论的发展，并形成一整套完

备的思想体系。文学理论跨学科发展实现了“知识型”模式的转变，成为一种多学科参与的研究活动，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文化研究领域的开展。文化研究更加关注大众文化，揭示被各种本质主义观念所遮蔽的意识形态内容，抵制权力真理观，抵制强加于文本上的身份特征，抵制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偏见知识”。邢建昌认为，文学、哲学美学、相关学科的以及跨学科四中因素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源。^[3]

邢建昌的《从知识学模式看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认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是一种具有人文意义的知识生产。基于文学的、基于哲学或美学的、基于相关学科的、基于跨学科的，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几种主要路径。这几种路径相互交织或交替，构置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图景。主要包括四种生产路径：一是基于文学的生产路径；二是基于相关学科的生产路径。路径一，文学理论就是用来解释文学的，文学对于理论具有基元的性质。路径二，是由文学理论的寄生性决定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语言学转向是文学理论的“知识型”转向。知识学模式，既是理论的，也是方法的。从知识学模式出发，不仅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特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知识生产具备这样的特点。^[4]

孙秀昌的《“历史化”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之反思》认为，陶东风提出的文艺学知识的“历史化”路径是对福柯“事件化”方法和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的片面解读，这种做法把具有“境界”意趣的“文学艺术的自主性”混同于具有“权利”意趣的“文学艺术场域的独立”，进而将其置于历史性、关系性、利害性的场域理论之中予以反思之际，同时也就以所谓“本质主义”“普遍主义”之类的名义否定了其在价值上的“自明性”以及作为主体的个体之于文艺自主性的根本地位。福柯的事件化方法是一种历史学方法，有自身的适用范围，将事件化方法拿到文学研究领域，其结果并不一定符合文学规律。^[5]在《“地方化”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之反思》中，孙秀昌认为，陶东风的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地方化”与“历史化”是一致的，被简单为归纳为民族性，是不可取的。孙秀昌认为，陶先生在引进西方文艺理论时，注意到的“语境抽离”的问题，同时东西方两种共时性空间进行切换。

在这个过程中,国内文艺学理论本质主义和“历史化”“地方化”的文艺学知识模式之间的矛盾需要被高度重视。过度重视空间和时间维度的文学理论容易忽略其普遍性,忽略普遍性便是忽略其特殊性。^[6]

毕日生的《大众文化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认为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是导致文学理论知识“合法性”危机的语境和动因之一。作者认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来源于四个方面:研究对象的危机、文学理论阐释效力的危机、文学理论与生俱来的矛盾与知识生产主体的思维方式。应该正确认识文学理论与生俱来的知识学属性上的矛盾特性。新的知识学模式应该具备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现代化的学科建构和后现代的跨学科知识探求的结合;二是历史化、地方化、语境化的知识生产路径;三是多元化、异质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代替本质化、同质化的方式;四是共同体的权威“立法”结构变成个人化的“阐释型”的知识建构模式;五是具有反思性、批判性、参与性、实践性特征,参与公共领域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新模式的知识生产。中国当前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知识型研究改写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版图,已经正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知识学属性上的矛盾特性,在建立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和弥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合法性危机方面取得一定成果。^[7]

孟新东认为,20世纪80年代自然科学方法向文艺学、美学的跨界历险,是一次打通文艺研究与自然科学的有益尝试。其意义在于用科学的冷慧打破了政治功利化文论和庸俗社会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拓宽了文艺学研究的思维路径和话语空间。但同时也存在着方法移植中的生硬搬套、问题意识的匮乏与阐释效力的低下、价值判断的缺席、思维模式上的“唯科学主义”倾向等问题。孟新东认为,新方法的运用不能脱离对文学本体的认识,必须是从本体论中生长出来且又作为本体论的有机部分,否则就会陷入概念、术语和公式的套用,丧失新方法的生命力。文艺学的知识演进应该服膺问题的召唤,是在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文学研究是对个别、具体的文学事实的解释,更是一种基于研究主体所秉持的某种价值体系的“发现和理解”,这种“发现和理解”中体现着研究者的价

值判断。文学理论的研究必须体现研究者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为文学指明方向,同时也是文学作为一种人文学科,为人类提供“可能性世界”的独特性之所在。^[8]孟新东的《20世纪80年代“方法论热”的知识学反思》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文艺学美学领域的方法借鉴经历了从“老三论”“新三论”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转变过程。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助力、80年代高涨的科学主义精神的策动、文学研究者们独立学术意识的自觉以及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合法性的艰难探寻,促成了“方法论热”的勃然而兴。^[9]

孟庆雷等的《强制阐释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困境的知识根源》认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的强制阐释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知识理念不断发展的结果,这种现象反映了西方文化传统下的知识困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种:一是西方学术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思维,在这种思维路径指导下,人文学科也试图得出普适性的理性模式;二是人文思潮的失范,在缺乏稳定价值本源的情况下,人文领域放任各种思维全面渗入,最终在历史相对主义的导向下走向无序。孟庆雷认为西方传统的认知模式奠定了近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体系,随着这种认知模式发展,逐渐成为西方人文学科认知的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具有系统化、体系化和可语言传达的特性,与此同时,西方人文学术也追求人文学的价值关怀。语言学的分析提供了叙述学的基本分析模块,而结构主义的模式则提供了构建模型。它们共同构成了叙事学的发展,但是叙事学的研究方式把文学研究看作一种解码游戏时,文学本身所蕴含的意义层面就被消解掉,叙事于是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技巧,与文学的价值无涉。在内部,人文学科没有办法为自己建立规范法则并从自身内部寻求终极价值坐标,无法承载起意义。总的说来,科学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失范共同造成了西方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乱象,但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对西方知识体系进行全面革新。^[10]

牛军的《失语症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危机》梳理了曹顺庆以及学界对于“失语症”“异质性”的看法,牛军认为,西方的分析型的知识形态与我们的传统文论是异质的。在我们接受

并习惯于西方的知识谱系之后，中国古代文论对我们而言也具有了异质性。“失语症”现象的讨论其实是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危机的反映，要想消除“失语症”危机，需要打破现代学科划分，先放下西方的标尺，也不要急于和西方理论进行比较，摆脱带着西方理论框架审视中国古代文论的错误做法。其次应该从思想观念的层面理解古代文论才能够更好地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的自身价值。^[11]

王亚芹的《知识生产视域中的“形式本体论”探究》认为，理论知识生产是对所在时代文化环境与学术生态的真实映现，因而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形式本体论”这一在新时期文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理论形态进行探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国内“向内转”的理论风潮、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在中国的介译以及先锋文学的形式主义实践，均为形式本体论的出场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同时，“形式本体论”对于语言、形式、文本的推崇不仅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过渡意义，而且引起了文学理论在观念、方法和模式上的转型。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国内文论知识生产的路径又重新转移到社会、历史、政治和现实等“外部研究”中去。这种理论思潮的反复和震荡，引起了学者们关注视角的变换和转移，使文论的知识生产在方法和模式上呈现出了多样化趋势。^[12]

二、古代文论研究

面对充满变数的新时代，中国文学理论该往哪里去的问题被学者提到日程。一批学者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方向就深藏在自己的文化血脉之中，于是他们把视线转向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借助西方的研究方式，反思中国当代的文学艺术发展，探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丰富的理论资源，以此寻求推进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新的路径。

李卫华的《中国古典文学符号学：研究对象、策略及方法》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述中国古典文化符号学的发展趋向，从研究对象、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对符号学进行分析，寻找建立中国特色的中国古典文化符号学的有效途径。在研究对象上，中国古典文化符号学既包括对中国古典文学中蕴含的符号学思想的整理和挖掘，也包

括运用符号学理论对中国古典文学所作的分析和研究。在研究策略上，首先，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符号学的前沿理论，充分发掘本民族的符号学资源，实现东西方理论的双向阐发。其次，将理论与其所分析对象结合起来，既以理论之光烛照作品，达到对作品意义更为深刻的揭示；同时对作品分析考量理论，达到理论和文本的双向阐释。在研究方法上，应该关注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化学术著作，对其中所包含的符号学思想进行梳理和阐发；二是对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学术著作进行分析，研究其意义的生成、转换和阐释过程，并试图对之做出新的阐释。中国古典文化符号学应该同时吸收东西方的文化资源，才能实现东西方理论平等对话的效果。^[13]

孟新东的《黄宗羲的豪杰理想及其诗学安顿》分析了儒家“豪杰”性格，认为它来源于居仁由义的底蕴和根基、刚毅劲健的品质、独立无畏的精神气度以及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四个层面。黄宗羲就是将四种品质融合为义的“豪杰”人物，黄宗羲一生以豪杰自励，将豪杰精神寄于毁家纾难的抗清斗争和长达四十载的著述讲学、发扬学术的文化大业之中，经学、史学、文学、历算等领域无一不成就豪杰之名。黄宗羲全力批判明代的模拟之风、力倡张扬着民族浩然正气的风雷之文、发掘诗文于时局板荡中的补史之用、以奇文妙笔表彰故国志士遗民。后世人多称赞黄宗羲为“豪杰”之士，都是其精神气象的外在显现。^[14]

孟新东的《黄宗羲“元气”论文学观探微》从元气的独特内涵和理论渊源来论述其本质，并对黄宗羲以“元气”入诗文形成的文学观进行探究。传统文气论认为，天地间存在阴阳二气，二气是宇宙的本原、始基和构成天地万物的质料，对宇宙万物的生成具有根本性意义，元气为道之体，“文以载道”之“文”也蕴含这种宇宙本原之气。黄宗羲认为“遗民者，天地之元气”，说明黄宗羲同时也受时代和自身遗民身份的影响。“逮夫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郁遏，忿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厄运危时”，“至文生”。黄宗羲把文章与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认为所处时代的“阳气”被“阴气”包围，奋激而发，而生至文。至文是天

地阳气激发的表现。黄宗羲赞扬至文，也是在张扬一种奋起反抗的豪杰精神。^[15]

牛军的《熊十力文化思想研究》认为，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熊十力是将中西文化之辨引向深微处的重要思想家。牛军从“体用不二”的宇宙论、“天人不二”的人生观以及“道器不二”的治化论三个方面辨析熊氏文化思想及其运思的内在逻辑，并对学界争议的熊氏前后期思想变与不变等问题作出一种回答。熊氏思想的前后期存在有“举体成用”到“摄体归用”的微妙变化，但是作为“天人不二”“道器不二”之依据的“体用不二”却是其贯穿始终的措思宗趣所在。^[16]

杨天奇的《晚清变局与公羊学之“新命”》认为，晚清公羊学主力常州学派倡言“大一统”，宣扬“通三统”“张三世”，专讲“微言大义”，讥讽时政、批判现实、大谈改制。公羊学违背晚清学术潮流，但却顺应时代趋势，是真正的“致用”之学。公羊学坚持不同于乾嘉考据派的学术路径，采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激活传统文化所蕴藏的内在价值。它所采取“复古”与“取今”兼容的学术路径，“复古”的首要目的不是“守旧”，而是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和确保；“取今”的目的不是“全盘西化”，而是采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激活传统文化所蕴藏的内在价值。晚清公羊学呈现出四个显著特点即“以经议政”“变法改制”“重建道统”“发蒙启蔽”，企图通过以经议政的方式，实现变法，改制重建道统，达到启蒙的目的。^[17]

赵志刚等的《评史蒂芬·霍吉对〈道德经〉译释的多视域融合》认为史蒂芬·霍吉的《〈道德经〉英译与评论》在底本的重新编排、类文本的设计上，都体现出多视域融合的特点。赵志刚从读者接受和文本变异两种理论出发，探究史蒂芬·霍吉这样翻译《道德经》的得失。作者认为，《老子》译介的过程就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译者在翻译的生产过程中担负着“阅读、接受、理解和阐释”的任务，而最终的结果即是使“意义”再生成。首先，在译本的结构上，史蒂芬·霍吉使目标读者更好地理解《道德经》语篇，对《道德经》的文本结构进行调整，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但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文本的开放性。其次，从英译版本

中类文本的使用来看，霍吉将其他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译释有机结合在一起，有效地照顾到了读者的阅读审美感受，较之其他译本更能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再次，在关键词书名、“道”以及“德”的翻译上，也体现出视域融合的特点。赵志刚认为，《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旅行实际上就是“符号化”或“再符号化”的过程。霍吉跨越文化障碍的努力，促进《道德经》在西方的符号化进程，将“古”“今”“中”“外”不同维度的视域融合在一起，更好地将文本融入西方的文化语境当中。^[18]

三、文艺美学研究

文艺美学研究关涉到当下文学、艺术、审美文化等多个方面，河北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诸多优秀成果。

王亚芹的《身体美育：一种美育新形态》基于美育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失衡与错位，提出了一种新的审美教育设想——身体美育。中西方传统审美教育体系中以“情感教育—心育”为主的美育观的缺憾，为身体美育的建构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坍塌和身体疾病等身体生态的失衡现象，为身体美育的实际践行提供了现实的必要性。王亚芹认为，身体美育主要包括实践的身体美育和感知的身体美育等方面，身体美育的根本宗旨是坚持身心和谐共通，通过对身体的训练和培养使躯体和心灵共同发展完善，趋向美好和谐，以塑造出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个体，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为旨归，从而更好地认识自我、使用自身、追求幸福而诗意的生活方式。因此，对身体美育的倡导，不仅是当前审美教育体系建构的应有之义，而且对于化解目前教育存在的问题，实现自由而美好的生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19]

然而，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思想也不例外。王亚芹的《舒斯特曼“泛身体化”美学思想批判》就讲到，在当下这样一个物质富足、文化迷失的消费时代，为了捍卫哲学与美学的生活之维，舒斯特曼提出了“身体美学”的理论愿景。毫无疑问，身体美学理论在拓展传统美学研究范围、重构身心和谐的美学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作为在西方消费文

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身体美学思想它一开始就带有不可规避的矛盾性：由于舒斯特曼本人学术身份和学术背景的多元性，他的美学研究涉及到哲学、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等方面，甚至还将其扩展到美容化妆、体育健身等具体的身体训练和实践。如果我们还承认每一门学科正是由于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和明确的研究范围而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话，那么，舒斯特曼这种打破学科界限大包大揽、无所不包的“泛身体化”工程就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尤其在消费文化场域中，由身体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所引发的“泛化”悖论格外突出，因此，重新审视舒氏美学，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祛魅”的同时，也对建构中国化的美学体系具有启发意义。^[20]

同时，王亚芹翻译了《“具身性”的实用主义：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哲学与文学理论》一书，这是英语世界第一部系统研究理查德·舒斯特曼思想的专著。它全面介绍了舒斯特曼关于实用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主要哲学思想。书中主要论述到审美经验的多样性，阐释与超越以及为大众艺术进行辩护。由于其中涉及分析传统与大陆传统的对话，王亚芹将舒斯特曼对传统实用主义哲学（特别是杜威主义）的继承、为大众文化正名，以及倡导身体美学等主题都视为其哲学思想的具身性体现。这不仅是舒斯特曼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也是当代实用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向——即由单纯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走向对实际问题的具体探析。在此意义上，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当代实用主义思想的批判性视野。^[21]

张敏等的《刘纲纪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转向》深刻分析了刘纲纪的实践自由论美学理论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实现实践转向的过程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实践转向的理论产物，刘纲纪从理论性质上将马克思美学确证为“实践观点的美学”，不仅将“实践”确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逻辑起点，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逻辑起点的实践转向，而且还促使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从反映论模式向实践论模式的转向，实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逻辑架构的实践转向。同时，得益于刘纲纪对马克思实践观的本体化阐述，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在逻辑起点上实现了现实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在

理论逻辑架构上实现了唯物性与辩证性的统一。^[22]

余安安的《时空视域下轻安的美学品格与诗艺传承探析》讨论了“轻安”这一体现着佛学意蕴的休闲美学概念。“轻安”（梵文Prasrabdhi的意译）本为佛教术语，意指身心轻利安适，对所缘之境优游自适的自在菩提。轻安作为远离粗重的境界，既是修行的时空体验，也是感动兴发诗情的文艺时空之境。文人墨客将轻安的菩提智慧纳入诗心，借用云等禅意盎然的意象吟咏轻安之美。诗艺主体以优游不迫的性情、从容无执的品格、轻旷无为的方式，通脱地将轻安的时空质地圆融于诗境，巧妙地演绎轻逸安然的美学风格。“身闲诗简淡，道生梦轻安”是诗意与悟性的人生追求，心堪任性的轻安涵化，以超达般若禅悦和诗性解放。^[23]

胡海的《由“艺者道之形”看传统美育观》，从刘熙载的《艺概》中探讨艺者道之形的艺术观。《艺概》开篇说：“艺者，道之形也。”刘熙载为之专设一章，一是因为经义写作有特定写作技巧和规范，二是因为刘熙载重道，以“艺”为道之形，所以就将内容比形式更重要、思想学问性和实用性高于艺术性的科举文列入艺的范畴，这也表明现代性的艺术概念尚未形成。艺者道之形的艺术观，集中体现了以育为主、以美为辅的传统美育观，或者说以知识、学问、政治伦理教育为主，以文学艺术为辅、寓教于乐的美育观。这种以明道、载道为本的美育观，可谓传统美育话语的特色。只要我们不将“道”局限于某种特定思想，而是涵盖一切真知、真理、真情，那么它在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24]

卢小合在《诠释学中相对于“意义”的“涵义”——兼谈巴赫金的“涵义”观》中指出，在20世纪的人文科学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对涵义与意义的关系的区分及其研究。这一工作首先是由德国数学家、分析哲学家弗雷格在1892年提出的。他在《论涵义与意义》一书中明确界定了这两个术语的区别。然而，我国学术界仍然将这两个术语混为一谈。卢小合在这里所说的不是观点上的分歧，而是表现为对这两个术语的基本的内涵把握上。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在美国学界，在1960年把弗雷格的书错误地译成《论涵义与指称》；于是，在我国，“指称”

理论一度大行其道。而美国在 1980 年把它改正译为 On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因为英语中 sense 一词早已退出科学用语舞台而被 meaning 所取代; 在这里的 significance, 才是“意义”(重要性, 重要意义), 而 meaning 才是文本中读者理解的“涵义”。苏联文艺学界运用“涵义”一词是比较早的。巴赫金在 20 世纪 20 年代伊始就开始了。首先, 他赞同“意义”与“涵义”的区分。他的基本的学术思想是以这种区分为依据的。这种思想, 与弗雷格学术思想一脉相承, 而且有更大的发展。第二, 在巴赫金的学术思想中, 一以贯之的思想是他的“双主体”思想。这种“双主体”思想在美学思想中表现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第三, 在人文科学中, 在涵义与意义的两者关系中, 涵义是第一位的。第四, 在诠释学中, 涵义是读者创造的, 是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因此, 我们用巴赫金本人的话对他的“涵义”观的本质作一简单的归纳, 即: 没有“自在的涵义”, 涵义具有“对话性”“共通性”“世界性”和“全时性”。^[25]

四、当代文艺批评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繁荣发展, 我省文论工作者积极回应当下热点问题, 形成活跃的理论探索氛围。其中有对陈超诗学理论的研究, 有对赛博格新技术的探讨, 也有对国内批评术语的评述等等。

邢建昌在《论陈超诗学理论与批评》中指出, 生命/生存, 既是陈超诗歌创作得以展开的内生动力, 又是其诗学理论与批评的本体依据。陈超诗学理论与批评独特贡献, 就在于提供了这样一个从生命/生存出发理解的文学世界。不仅如此, 陈超诗学理论与批评还找到了使生存/生命得以展开的语言论通道。所谓噬心的主题、晦暗不明的经验等都是通向语言的途中实现的。陈超用鲜活的文本解读和切肤的生命体验来唤醒一切热爱诗歌的人们生命意识, 把异质的经验, 陌生的体验, 怀疑、多元、差异以及弱者的声音呈现给这个世界, 与世界性的后现代哲学、诗学思潮保持着鲜活的对话关系。^[26]

杨林等的《卢卡奇文艺思想在中国——一个接受史的回溯和启示》讲到, 卢卡奇文艺思想自从 20 世纪 30 年代被引介到中国, 至今已经

走过了 80 多年历程。他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典型性、总体性和物化理论已为国内文艺界耳熟能详。卢卡奇文艺思想在中国的接受并非一帆风顺, 而是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发轫、发展, 至今形成了多元化的学理性探究局面。文章从历时角度, 将卢卡奇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分为三个阶段。其一, 中华民国时期的误译与发轫(1935—1949); 其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1949—1977): 批判中的发展; 其三, 改革开放以来(1978 至今): 复苏、蓬勃、多元化。文章总结其接受史呈现出的特征, 阐释了卢卡奇文艺思想对中国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建构作用。^[27]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 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发展趋向。王亚芹等的《从〈P. K.〉看印式喜剧的杂糅叙事》就以印度电影 P. K. 为例, 对其进行跨文化的研究。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博弈过程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努力绝不可少, 而电影艺术是这种“后文化”状态的最直观显现之一。印度导演拉库马·希拉尼执导的电影 P. K. (中文一般译为《我的个神啊》) 以其特有的印式“严肃喜剧”风格, 为我们展现了一种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宗教与世俗之间冲突与对话的时代风貌。影片创造性地从 P. K. 这样一位具有杂糅性文化身份的外星人视角, 展现了印度宗教社会的种种弊端, 挑战并颠覆了传统印度宗教的权威。但是, 这种印式喜剧形式并没有否定宗教本身, 而是通过对宗教的喜剧化“解构”, 规劝民众不要盲目狂热地追捧宗教, 而应该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协调中探寻真正的民族理想与信念。尽管印度电影与中国电影有不少差异, 但是这种“后文化”的叙事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印度文化的现实维度, 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影视的发展路径, 思考当下中国的文化建构。^[28]

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成为近年来公共舆论的热点话题, 刘大先的《赛博格的怕与爱——新技术时代的经验与叙述》就对新技术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表象上来说, 对赛博格的怕与爱无疑是由大众传媒追新逐异的时髦冲动所造成的, 背后则是公众的好奇心、既爱且恨的矛盾心理与资本和利益集团诉求之间的完美结合。在文学场域中, “未来已来”的喧嚣声已经震耳欲

聋,其中构成标志性事件的无疑是机器人小冰能够写诗并且开设专栏了。这让原先无论处于市场、官方体制(作协文联机构)和小部分所谓的“严肃文学”团体的作家和批评家们心生怵惕,而出于避免落伍的羞涩心理,不管是赞扬还是批判,他们都不得言不及义地争抢着要加入到这股议论的潮流之中。古罗马诗人奥维德讲述的庇格玛利翁故事是爱的叙事的母题,1912年,萧伯纳用这个原型创作了著名的《卖花女》。在戏剧的结尾,息金斯说:“我说过要把你改造成人,我现在成功了。”伊莉莎则回答:“对啦,你现在转过来向我讨好了,因为我不怕你了,可以用不着你了。”萧伯纳写下这些台词的时候也许并没有特别的含义,但如今则可以做出阶级与性别的解读,而最显意味深长的则在于,它将爱的故事逆转成了关于“造物——他者”的怕与焦虑的叙事:被创造者获得了自主性和自觉之后,反过来不需要创造者了。怕的叙事隐藏在爱的叙事之中,可以归结为人对技术游移不定的两种情感原型:恐惧与迷恋。同时,刘大先指出,较之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甚嚣尘上的传媒鼓噪,文学的反应是滞后和态度暧昧的。威廉在《后人类》中关注的意识问题,确实是赛博格时代人工智能的根本问题。只不过,《后人类》所体现出来的理念,正表明工业革命时代和启蒙时代的科技所形成的还原论和客观性遗产依然通过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和隐喻,继续在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希望和噩梦。关于赛博格,我们仍然在暧昧未明的进行时之中。同样,生活在赛博格时代的“人”,首先需要清理的便是我们时代知识范型和认知经验里对于生命的隐喻,尤其反映在那些不假思索的关于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心与身的二元划分之中——文学中的这种集体无意识,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内在观念桎梏。那么,新技术时代的文学何为?在这里似乎可以找到一种解答。在表述独一无二的实体经验和非程式化地想象未来的意义上,文学确实是我们时代为数不多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艺术方式。^[29]

穆军芳在《2017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述评》中对2017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特征进行梳理和评述。为方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一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特点和前沿动态,文

章在武建国和陈聪颖对2015年批评话语分析国内外研究评述和赵芑对2016年批评话语分析国内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从研究方法、分析方法、跨学科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五个方面进行述评。第一,传统研究方法如辩证-关系、社会-认知、话语-历史及后起的研究方法如话语-空间、批评认知法和积极话语分析等都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这些多维度研究路径深化批评话语分析的前沿研究;第二,分析方法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等分析方法推进批评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第三,批评话语分析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翻译学、政治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及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方兴未艾;第四,研究对象聚焦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本土热点问题,如网络暴力、老年身份建构、教师身份建构、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妇女形象、生命和死亡问题、医患会话、外语教育改革等;第五,研究成果通过期刊专栏和研讨会等得以展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相信在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之下,批评话语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将会进一步发展,也会在国际学术界展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30]

马德生的《从异质文化冲突到融合的中国想象探源》以严歌苓、张翎、虹影小说文本作为考察对象,从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家国情怀的传承坚守和“落地生根”的精神诉求等方面,探讨她们从异质文化冲突到融合中想象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建构中国形象的深层根源。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海外新移民文学强势崛起,其中严歌苓、张翎、虹影等三位女作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被喻为海外新移民文学的“三驾马车”。她们以开放的文化心态、独特的异域境遇和性别策略想象中国,不仅从“异域”到“历史”书写中呈现出繁复多样的形态与可能性,而且从异质文化冲突到融合中,向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开掘拓展,寻找人类命运的共同性,表达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沟通、平等对话的美好愿望,凸显出她们对中国想象的新转型与新特质。她们身上有着家国情怀的传承坚守,对民族历史的深思批判,以及“落地生根”的精神诉求与文化身份认同重建。^[31]

新世纪频现的“文学事件”引起雷鸣的关

注,他的《新世纪中国文学生态与“文学事件”的发生》试图对文学的外部环境(经济、政治、社会等制度因素)与内部环境(创作主体、读者主体、批评主体)等所构成的新世纪文学生态系统进行整体勾勒,厘清“文学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而探析新世纪“文学事件”发生的深层动因。雷鸣指出种种“文学事件”的发生,乃是新世纪文学整体生态系统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学生产的市场他律与政府调控的文化领导权并存,作家的生存状态、文化心态遭逢商业诱惑与精神主体能动性的博弈;文学传播亦在媒介化社会语境下呈现出新变革,过去依赖于印刷媒介的传播方式已被无所不在的“大众媒介场”所操控,市场营销策略导入文学作品的传播流程之中;作为文学接受主体的读者,在消费主义时代发生异变,文学作品嬗变为消费品,过去纯然的文学阅读者变身为类似娱乐场中的“粉丝”读者。“文学事件”实乃这些变化的折射。弄清楚此类“文学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协调文学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使新世纪文学生态保持一种良性平衡颇有助益。^[32]

郗智毅的《文学批评的普遍的历史前提与批评的公共性》提出,文学批评建立于文学批评标准基础之上,批评标准成为批评“普遍的历史前提”之一。从历时性角度看,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制约着批评标准。文学史是一个民族的公共记忆和集体确证,文学史书写提供了公共知识谱系和精神价值家园。文学经典的建构是长期的过程,它染有民族集体记忆的痕迹,是民族的集体确证和共同书写。从共时性角度看,文化历史语境规导着批评标准,现实文学场域、历史语境、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都对文学批评标准的生成起着现实的制约作用。由此,批评标准生成于传统和现实共同构成的公共场域之中,以批评标准为基础的批评阐释行为也就具有了不同于私人阐释的公共属性。毫无疑问,批评当然要讲究个性,批评无疑是一个具体的、个体的行为。文学批评要有对作品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从对作品的细读中形成凝聚着批评家智慧的阐释和评价,最后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批评的每一个环节——从一开始对作品的选择和体悟到最后批评成果的表达——都渗透着批评家的情感、智慧、才情和个性。但却不能因此就断言

“我所批评的就是我”,批评完全成为批评家自我个性的确证。批评家的批评阐释行为是个人的,但却不能是私人的,批评带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只有把批评的个性融入普遍性、社会性和公共性之中,阐释行为才是有公信力的、有效的、确当的。^[33]

王志亮在《反转剧场与反场所的异托邦》讲到参与式艺术的两种空间特性。目前学界对参与式艺术的阐释多从政治哲学的“对抗”和“协商”视角出发,而若从前卫艺术的空间生产角度展开分析,可看到参与式艺术的两种主要空间生产方式:“翻转剧场”和“反场所的异托邦”。翻转剧场是对一般剧场二元化空间的颠覆,从而模糊了剧场空间和日常空间、观看者和表演者之间的界限。反场所的异托邦借用福柯的术语,特指那些扎根日常生活空间、拒绝表演、把持续性的事件作为艺术生产方式的在地实践。最终,参与式艺术继承前卫艺术挑战艺术体制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美术馆展示档案和触发社会事件的新功能。相比基于现成品的装置艺术,参与式艺术已经成为21世纪更前卫的艺术形式。它通过事件来从事空间生产,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当下的整个艺术体制。同样,如何定义和言说这类艺术形式,也是我们当下艺术理论面临的巨大挑战。^[34]

(姜文振,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赵佳、郭明东,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参考文献:

- [1] 邢建昌.反思与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J].社会科学论坛,2018(6).
- [2] 邢建昌.文学理论知识学模式的变化——从反映论、审美反映论到文化研究论[J].中国文学批评,2018(1).
- [3] 邢建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动力学根据[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8(2).
- [4] 邢建昌.从知识学模式看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5-14(4).
- [5] 孙秀昌.“历史化”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之反思[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8(1).
- [6] 孙秀昌.“地方化”的文艺学知识生产之反思[J].社会科学论坛,2018(6).
- [7] 毕日生.大众文化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J].社会科学论坛,2018(6).
- [8] 孟新东.20世纪80年代文论研究中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热再反思[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8(2).

- [9]孟新东.20世纪80年代“方法论热”的知识学反思[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7(2).
- [10]孟庆雷,孙易君.强制阐释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困境的知识根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2).
- [11]牛军.失语症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危机[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8(1).
- [12]王亚芹.知识生产视域中的“形式本体论”探究[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8(1).
- [13]李卫华.中国古典文学符号学:研究对象、策略及方法[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18(3).
- [14]孟新东.黄宗羲的豪杰理想及其诗学安顿[J].湖北社会科学,2018(2).
- [15]孟新东.黄宗羲“元气”论文学观探微[J].河北学刊,2018(3).
- [16]牛军.熊十力文化思想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18.
- [17]杨天奇.晚清变局与公羊学之“新命”[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6).
- [18]赵志刚,陈天惠.评史蒂芬·霍吉对《道德经》译释的多视域融合[J].中华文化论坛,2018(4).
- [19]王亚芹.身体美育:一种美育新形态[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20]王亚芹.舒斯特曼“泛身体化”美学思想批判[J].文艺美学研究,2018(2).
- [21]王亚芹.“具身性的实用主义”:理查德·舒斯特曼的文学与哲学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22]张敏.刘纲纪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转向[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8(2).
- [23]余安安.时空视域下轻安的美学品格与诗艺传承探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
- [24]胡海.由“艺者道之形”看传统美育观[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8-03.
- [25]卢小合.诠释学中相对于“意义”的“涵义”——兼谈巴赫金的“涵义”观[J].俄罗斯艺术,2018(4).
- [26]邢建昌.论陈超诗学理论与批评[J].诗探索,2018(1).
- [27]杨林,张雪丽.卢卡奇文艺思想在中国——一个接受史的回顾和启示.中国比较文学,2018(3).
- [28]王亚芹,沈绍云.从《P.K.》看印式喜剧的杂糅叙事[J].电影文学,2018(12).
- [29]刘大先.赛博格的怕与爱——新技术时代的经验与叙述.小说评论,2018(2).
- [30]穆军芳.2017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述评[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8(6).
- [31]马德生.从异质文化冲突到融合的中国想象探源.文艺评论,2018(5).
- [32]雷鸣.新世纪中国文学生态与“文学事件”的发生[J].天津社会科学,2018(2).
- [33]鄯智毅.文学批评的普遍的历史前提与批评的公共性[J].求是学刊,2018(3).
- [34]王志亮.反转剧场与反场所的异托邦[J].文艺研究,2018(3).

古代文学研究

吴秀华 郭丹阳 梁妩怡

一、古代诗词

(一) 诗歌研究

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2018年,诗歌研究在河北省古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在《诗经》、魏晋南北朝诗歌、唐宋诗、明清诗研究整理方面结出了丰硕果实。

1. 《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不仅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而且造就了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张志勇着眼于《诗经》中的“颂”文体对后代颂赞文的影响,认为“诗经三颂”对后代颂赞文学的历史意义在于:确立了后代颂赞文学以四言句式为主体的形式,确

立了后代颂赞文学以“美盛德”和“述形容”为主流的内容取向。作者认为,诗经三颂可用以观照颂赞文学在后世发展变化的轨迹,帮助我们洞见其中蕴含的文体发展规律,可以更科学、更全面地把握颂赞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本质特征^[1]。

《诗经》学是《诗经》研究的重要方面。受志敏以明代复社文人的《诗经》学研究为对象,通过对复社文人学术活动及文学观念的考察,将以往的《诗经》学研究分为评析类、科举类、诗话类三个层面,把握明清之际《诗经》学的学术流变,充实了《诗经》学研究的内涵。作者认为,明代复社文人的《诗经》学研究,为清代《诗经》学向汉学的过渡,起到了津梁作用^[2]。

雷戈将《诗经》视为先秦最具特色的思想史文体,把《诗经》研究视阈扩展到中国思想史领域。作者认为《诗经》对王权作了最为形象和透彻的描述,蕴含并展现了王权理念。《诗经》中的具体篇章折射出周代王权的影子,闪烁着思想价值的光芒,如史诗一样蕴含着某些政治理念。特别是其颂歌,呈现出以“王”为中心的模式,一些政治性诗歌反映出对周王朝的美刺用意。该文结合《诗》《书》的时代背景,从《诗经》中解读出了新的意含^[3]。

2. 魏晋南北朝诗歌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宗匠,其诗歌风格被总结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马燕鑫《否定词与陶诗风格之关系》,着眼于陶诗频繁使用否定词的重要特征,认为陶诗遒劲、婉曲风格的形成,得益于否定词的妙用。作者从修辞的角度,重新认识陶诗风格的形成,强调内容与形式并重,对陶诗风格研究有重要意义,为陶渊明诗歌研究拓宽了道路^[4]。

谢灵运是山水诗鼻祖,他精研佛学并有重要建树,其思想融合儒释道,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姜剑云等《谢灵运新探与解读》一书,揭示了谢灵运在佛教史、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该书上册梳理考证谢灵运的著述与交游,下编在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上对诗人的思想与创作成就进行了有见地的分析与评价,对谢灵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了新论证^[5]。

南朝宋“元嘉体”诗人钟情山水题材,崇尚繁密、华美、精巧、奇险的诗风,追求长篇大制,以五言句式为主,工于对偶,追求押韵。谢庄是南朝刘宋中后期的重要作家,是元嘉诗风的承接者与变革者,其文学创作具有引导诗风和文风转变的独特地位。姜剑云《论谢庄对“元嘉体”的“复”与“变”》,结合元嘉诗人的创作,对“元嘉体”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对“元嘉体”多方面的体制特征进行了重新总结,进一步探讨了谢庄对“元嘉体”的继承与变革。作者认为,其“复”表现在以山水题材为创作主流,追求繁密、精巧的诗歌风格,以长为美,以五言句式创作为主,大量运用对句;其“变”表现在大力创作郊庙歌词,开拓清雅诗风,创作出富有骚体特色的杂言诗,将九言体引入乐歌创作,加强了诗句的谐律程度,实现了灵活

转韵^[6]。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深受佛道思想影响,尤其是诗歌与佛道保持了深厚而密切的联系。佛道思想的流行,推动了由“尘”构成的各种词语和意象在诗歌中的运用,既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又拓展了诗歌的情志内涵。针对这一问题,陈斯怀《道、佛与中古诗歌的“尘”意》一文进行了探讨,文中分别对道教、佛教以“尘”入诗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佛道思想与诗歌交汇互动,而在中国思想史和诗歌史上形成的充满喻义的“尘”的世界^[7]。

《玉台新咏》是一部汉代至南梁收录男女闺情之作的诗歌总集。清代纪昀批校的《玉台新咏校正》被广为传抄,在品质各异的众多抄本中,徐行可朱笔校订本堪称精校本。张蕾《徐行可校订〈玉台新咏校正〉考述》,对校改抄本讹误、修正稿本疏误等校订之功进行了总结,并对徐校本偶有的漏改、漏补、臆改之憾进行了举例,为人们选择版本提供了借鉴。

3. 唐诗

唐诗是唐代文学研究的热点,曾智安在《唐代生活的维度与唐诗研究空间的拓展》一文中,认为唐诗研究必须置于对唐代生活的全面观照中。他对唐代生活与唐诗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引出对唐诗研究空间拓展的思考。如认为应当加大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关注力度,重视公共生活领域中更为基础的物质生活层面,注重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理论体系的建构。^[8]张志勇的《唐诗指津》一书,以时间为经,以诗人为纬,从文学、文化的角度对唐代诗歌给予了全面观照。该书在丰富的文献基础上梳理唐诗发展的脉络,对唐代诗人的生平履历、诗学主张、风格个性、创作成就等做了信而有征的考辨,为人们更深入了解唐诗成就指点迷津。^[9]李浩《朝气蓬勃的盛唐之音》,对盛唐诗歌的非凡气象进行了阐述,揭示了盛唐诗歌中包蕴的民族强盛状态所特有的精神风貌,体现出非凡的自信力和进取精神。认为唐诗的盛唐气象,由李白发挥到极致。^[10]李浩在《唐诗的会通精神与厚生意识》中,还将唐诗取得的成就,归因于“会通”精神,指出唐诗厚重的灵魂源于厚生意识。唐诗对文化遗产能够充分汲取并创造性地转化,唐诗因“会通”而能至远,因“厚生”而能厚重,以致流传百

代而不朽^[11]。

杜甫是唐代诗人的代表，乐府诗是他反映生活的重要形式，杜甫对乐府诗的贡献，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吴淑玲《杜甫乐府诗的体类特征》，对杜甫乐府诗的音乐体制、句式格律、声韵特征、联章组诗形式等进行了论述。认为杜甫的乐府诗不仅扩大了乐府诗反映生活的层面和深度，而且使乐府诗拥有了比以往更加深刻的价值。^[12]吴淑玲还探讨了杜甫乐府诗与其他唐代乐府诗不同的叙事风貌。认为与其他乐府诗相比，杜甫的乐府诗故事性完整，人物形象鲜明，长于剪裁及细节的描写，善于通过人物语言传达情境，具有叙事视角多样化、场面客体化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反映了古代乐府诗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杜甫为乐府诗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3]。

4. 清诗

明清易代之际，风雷激荡，向慕豪杰成为时代风尚。黄宗羲诗歌创作及诗学主张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他积极践行豪杰思想，拿起刀枪亲赴战场，在诗歌创作上更呈现出豪杰气概。黄宗羲反模拟、求创新，倡导“元气”，铸就风雷之文，发掘诗文的补史之功，借传奇笔法表彰故国志士。孟新东对黄宗羲的豪杰理想进行解读，探讨了如何在诗歌创作与批评中安顿豪杰理想。认为彰显豪杰理想，对理解清初诗学特点及转向，有重要意义和价值。^[14]在《黄宗羲“元气”论文学观探微》中，孟新东又着眼于黄氏“元气”论文学观，对其独特内涵、理论渊源及“元气生至文”观念进行了阐释，肯定了元气论诗学对重视文学价值、推崇文章至高地位的重要意义^[15]。

清初诗坛诗人辈出，流派众多。河朔诗派是清初北方的著名诗派，以申涵光为代表的遗民诗人占据了中心位置，其诗风悲壮沉雄、清刚劲健。李冰燕对该派成员的生平与作品、宗唐宗宋的诗歌主张进行了全方位介绍，全面展示了河朔诗派的风貌。^[16]而河间派诗的诗人才高位卑，于公务之余纵情诗文，戈涛是其中的代表。刘青松对戈涛的诗文集《坳堂诗文集》进行校辑。作者以天津图书馆藏《坳堂文集》残稿为底本，辅以各种选本及方志、族谱、笔记等资料，辑戈涛诗80余首、文157篇，共35万字，成为研究河间诗人的基础读本。同时附有《献县戈芥舟

先生年谱》，因该谱出自家族史料而更显珍贵。《坳堂诗文集》对戈涛诗文的钩稽，不仅对戈氏家族、对沧州，乃至对河北、京津冀的地域文化研究均有重要意义^[17]。

梅成栋《津门诗钞》，是天津地域文学中的诗歌总集，也是研究近千年来天津文学发展的基石。王长华点校的《津门诗钞》（三十卷），让这部尘封已久的著作焕发出光彩。该书存诗歌三千首，另有万余字前言。刘万川认为该书以繁体配新式标点，对底本中的衍、误及避讳加以改正，其整理本既可满足专业学者之需，又为天津地域文学研究、畿辅文学形态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18]。

（二）词学研究

词是宋代文学的主流，本年度对词的研究涉及三个层面：一是对宋词整体风貌的概述，二是对前代作品的整理，三是从语言层面对唐宋词进行研究。

李浩从婉约词与豪放词的辨析切入，探究二者在题材与内容、风格及情感表达方面的差异，全面把握宋词的丰富内涵与多元面貌。文章肯定宋词开拓抒情新平台、创造诗歌新境界的价值，揭示了宋词成为“一代之文学”的原因。^[19]李浩还结合作品挖掘了宋词中蕴含的亲情、友情、爱情和家国情，认为宋词之所以能成为词体的最高典范，原因之一就是它进一步深入到心灵与情感世界，传达出异彩纷呈的人生体验和心理感受。^[20]田玉琪就唐宋词断句中存在的韵断而意不断、句拍有限而文意无穷的问题，提出了点断、欣赏唐宋词既要严格按照韵断、句断的处理方式，又要有韵断、句断而意不断的意识，在欣赏词调本身的美妙旋律的同时，又要注意前后的贯通，以捕捉词人词作完整的意境^[21]。

晚清藏书家曹元忠所著《凌波读曲记》，是词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词话。其内容多为词调、字词、字声、作者、版本之考证，于当时词学研究成绩卓然。其所为转踏、大曲等“俗词”之考证，开唐圭璋《全宋词》编词范围之先河。刘少坤等将之整理后出版，为词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22]。

二、散文及骈文

散文研究集中在《史记》；骈文研究分散于

《文选》《文心雕龙》与初唐律赋。

王俊杰《〈史记〉战争叙事的三种笔法》，将司马迁叙述战争的史家笔法归纳为三种，一是铺排大量长篇人物说辞，二是大量采录军用文书，三是熔铸军功档案。作者结合作品对每种笔法进行了详细阐释，使《史记》叙述艺术的相关研究有了更深一步的推进^[23]。

《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其中的辞赋诵读存在拗口的现象。马燕鑫《尘封的声韵美——〈文选〉辞赋的音读特征》，从读音角度对《文选》辞赋的声韵特征进行了研究，揭示出辞赋原有的声韵之美，进一步认识到辞赋家对音声技艺的讲究。该文对读者准确认识和理解《文选》的声韵有很大帮助^[24]。

《文心雕龙·神思篇》揭示了创作论所要探讨的全部内容。况晓慢《〈文心雕龙·神思篇〉之再思考》，认为“神”以“物”为载体而发端，以“游”为终极目标，经过“思”的纵贯线贯穿，最终达到了神与物游的境界。作者首先对“神思”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界定，继而分别叙述了“神思”三个阶段的状态。其“再思考”是对以往从想象层面理解《神思》篇主旨的一种可贵超越^[25]。

近年来，初唐律赋考论产生了系统性成果，治赋者对初唐律赋的关注度日渐提高。初唐律赋现存篇什稀少，且所存总集多有疏讹。姜子龙《初唐律赋补考》，对前贤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核校，并结合新材料的撷取与解读，就其中可商榷的问题进行了补考；对以往意见中诸如作品系年、归属、题旨等方面的存疑之处做出了补正，为初唐律赋的考证研究做出了努力。此外，作者还对初唐律赋呈现的宗经倾向的具体表现进行阐述，并蠡测其成因^[26]。

三、小说

在小说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另辟蹊径，将研究视野落到了较为冷门的小说著作和领域上，在理论、考证等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霍现俊对涉倭小说的思想内涵及展现的文人心态作了论述。认为虽然清代的“涉倭小说”体式、类型不一，但对“倭患”的反映却采用了大体相同的书写方式，即将“倭患”发生的背景放置于明代，尤以嘉靖朝为多，“抗倭”成

为小说主人公事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章看，清代“涉倭小说”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多重思想内涵和一定的认识意义，展现了清代文人复杂的心态^[27]。

《续耳谭》是一部国内失传的志怪小说集，研究者很少。陈国军《新见明代小说集〈续耳谭〉考论》，首先就版本问题进行了考证，通过对目前仅知的日本所藏两种明刊本进行比对，指出了内阁文库本早于早稻田大学本。同时又对日藏《续耳谭》的不同署名进行了考证辨析，指出《续耳谭》的编者当以内阁文库本署名为准，并证实两种明刊本均为晚出本。此外，作者对《续耳谭》一书的取材来源及取材影响做了分析，指出取材具有一定的小说史意义，其文本对此后的话本、通俗小说、戏曲等有一定影响力^[28]。

四、戏曲

相较于小说研究而言，本年度在戏曲研究上收获颇丰。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曲牌研究及曲学理论研究两方面，对曲家新资料的发掘也有所收获。

时俊静《元曲曲牌研究》一书，在元曲音乐失传、文献记载缺乏的情况下，通过深入挖掘，还原元曲曲牌吐故纳新的动态历史，勾勒出元曲曲牌系统新陈代谢的变迁史。作者着力探讨元曲曲牌与词牌的关系，梳理元曲曲牌的地域来源，揭示金元时期的词曲关系、南北曲关系、元曲体式、民间俗曲等方面的具体面貌。全书涵盖了元曲曲牌系统的各要素，对明清戏曲、明清小曲、说唱文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是近年来元曲研究的优秀著作^[29]。

徐文武的《〈抛球乐〉与“抛打曲”关系考论》，深入探讨了《抛球乐》与“抛打曲”间的关系，指出“抛打曲”一词最早出现于元稹与白居易诗歌的自注中，其本义指行“抛打令”时的伴奏曲，产生于贞元、元和年间，是随着“抛打令”的兴盛而产生的曲名，其曲调来源于盛唐教坊曲。而《抛球乐》并非起源于“抛打曲”，而是产生于中唐时期的“抛打曲”借用了盛唐时期的教坊曲《抛球乐》，以用于行“香球”抛打令，而流行于中晚唐时期。文章依据史料，论证细致^[30]。

元曲家多非名公巨卿，记述他们生平的文献史料极少。都刘平《元曲三家生平新考》，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考证出史樟、范居中、鲜于去矜三人的生卒年及大致生平。这于曲家研究乃可喜之发现。^[31]叶会昌对元代曲家王和卿进行了考证，他从新见《秘书监志》《开州志》材料出发，与《录鬼簿》《南村辍耕录》等材料互相印证，认为蔚州人王鼎即为王和卿。这一结论对考证关汉卿等其他元曲作家，有重要参考意义^[32]。

除戏曲曲牌、作家考证相关研究外，戏曲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刘少坤的《论衬字》。作者认为，元明之时衬字理论范畴的内涵比较明确，衬字是南北曲的一个专有理论范畴。而到了元明之后，由于词乐亡佚，词谱制作者根据词曲同源特点，亦称词有衬字。衬字不应单纯是一种语言现象，而更应是一种音乐现象。它是曲体音乐“工尺化”、节奏“板眼化”、曲子声腔化的直接表现，而未完成板眼节奏的词体与后来兴起的板腔体京剧等乐体皆无衬字^[33]。

“一本四折”外加“楔子”，是认识元杂剧结构的基本术语，似成为常识，但这其中也存有疑问。都刘平《元剧结构理论的建立与悖谬》，检核《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关于“折”的用例，发现元人“折”的本义是仅针对正末正旦之外的其他次要角色扮演的科白表演，与以套曲为单元划分的“折数”并非同一概念。作者又进一步追溯“宫调—韵部—折数”的理论链条的提出者，发现对元剧结构进行规划的是周德清、钟嗣成、朱权等元末明初曲学理论家。而现存元刊本杂剧的创作实践与此理论设想之间并不完全一致，由此指出这种结构理论的悖谬，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34]。

杜桂萍等的《明清戏曲宗元问题论稿》基于明清戏曲与元代戏曲的关系而立论。认为明清戏曲创作和理论领域普遍存在“宗元”观念、现象与思想，与诗文领域的宗唐、宗宋、宗汉等具有近似的理论价值和创作指导意义。从“宗元”视角切入明清戏曲，促成了戏曲史观念的多元化，解决了许多不易解决或尚待深化、细化的戏曲史、文学史命题^[35]。

清末民初，王国维重新阐释“知人论世”思想，并将之引入文学批评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给“知人论世”观念带来新变。朱维

提出，在理论层面王国维通过重新阐释“知人论世”，使其从经学层面的论述走向了诗学层面的论述，并提出了具体的解诗步骤。在文学批评实践层面，作者认为王国维在延续传统“人格”说的同时，通过使用心理学概念，纵向挖掘“人”的深度，使“人”从经学中剥离出来；通过将地域与作家联系起来考察，拓展了“世”的广度，并在地域与文学关系的问题上，让地域特色服务于文学分析。王国维的研究思路有诸多值得借鉴之处。^[36]朱维《王国维戏曲文体观的嬗变》，认为王国维在戏曲理论、戏曲历史和戏曲文献等领域之所以能够取得开拓性成就，与其戏曲文体观密不可分。基于此，作者就戏曲文体观的建立过程，戏曲文体应该具备哪些要素，以及背后蕴藏的冲突和矛盾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认为王国维戏曲文体观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将戏曲划入叙事文学类型，与诗词等抒情文学类型截然对立，且以西方戏曲等叙事文学为衡量标准，认为中国戏曲几乎无一可取；后期明确界定了戏曲概念，将叙事性、代言体、诗性作为戏曲文体的构成要素。并由此归纳出前后两期戏曲文体观变化的主要表现：从将戏曲和诗歌对立、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对立，走向将叙事和抒情两种元素融入到中国戏曲中。作者认为其原因是治学理念和对西学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作为“曲学无法绕开的丰碑”，其戏曲文体观的建立相关研究未能得到充分开掘，该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王国维戏曲文体观相关研究的补白之功^[37]。

五、其他研究

本年度在两汉典籍、四库学研究、黄老之学研究等方面也有新成果。

《儒学述要》是罗庸在云南省教育厅的讲演，是一部言简意赅的儒学简史。杜志勇的《儒学述要》辑校，分为《儒学述要》《孟子比谊》两部分，其中《儒学述要》由杜志勇负责辑校。该书的整理出版，为后世学者进一步了解罗庸的思想提供了新的契机。^[38]陈斯怀《桀与四罪：先秦两汉典籍中的两类被逐者形象》，探讨了被逐者形象。作者认为，先秦两汉典籍记录了各种被逐者，桀与四罪是其中的典型。桀代表新旧秩序更替中的被逐者，四罪属于统一秩序内部

清整下的被逐者。汤放桀涉及君臣失序问题,各典籍对它的叙述出现不同角度。尧、舜放逐四罪是构建理想天下秩序的重要环节,四罪被逐渐经典化,与四凶混为一体,衍生出“四佞”之称。不同典籍基于不同目的,各取所需地从不同角度展开叙述,叙述角度的选择隐含着话语权的构建^[39]。

石刻文献也是研究者关注的方面。杜志勇以《史记·赵世家》所记封龙山为引,论及山上赫赫有名的《封龙山颂》。作者将《封龙山颂》碑的发现及流落情况、拓本留存情况、碑文全文原貌等做了介绍,同时将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幅《封龙山颂》的整幅裱本与流传于世的拓本加以对比,考辨出故宫所藏为初拓本,但残损状况更为严重。说明并非越完整的拓本产生时间越早。《封龙山颂》碑的拓本从书法艺术的角度也影响到了后世不少书法家^[40]。

“四库学”研究方面,张春国有《四库辑本蓝智〈蓝涧集〉考略》^[41]《〈四库全书〉本〈文敏集〉考略》^[42]《四库辑本〈蓝山集〉与〈蓝涧集〉考略》^[43]系列研究。分别对元末明初著名诗人蓝智、明初台阁体代表作家杨荣、明初重要诗人蓝仁三个人的作品《蓝涧集》《文敏集》《蓝山集》做了版本考辨,并就不同版本的讹误、校勘价值等作了评价,以备学界参考。

李笑岩的《先秦黄老之学渊源与发展研究》一书对黄老思想进行了研究,全书共分三编十四章,分别从天道观念、修心理论、政治理论、君臣观念等方面入手,讨论了先秦黄老之学的发展,分析了黄老之学对诸子学,特别是儒家和法家学术的吸收,力求开拓黄老子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44]。

在典籍域外传播方面,赵志刚以史蒂芬·霍吉的《〈道德经〉英译与评论》为研究对象,从霍吉的《道德经》英语译释入手,以其他英译本为参照,深入解读“视域融合”为霍吉对老子思想译释带来的影响,并通过“读者接受”和“文本变异”等相关理论的应用,探讨霍吉对老子思想译释的得失,为当前世界老学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45]。

历史上,儒学与越南有密切的联系。不管是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出的儒士情怀,还是越南宫廷文学的志趣表达,很大程度上都深受中国儒学的

浸润。彭翠等在《论儒学对越南古代文学的影响与文化建构》中提出,儒学文化的渊源,在越南古代文学中的传播与影响尤为明显。特别是忠君意识、忧患意识、积极进取、修己安人等儒学思想,在越南诗歌创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46]。

此外,探讨古代人文思想当代价值的研究成果有:赵萍的《庄子“不言之教”思想的语文教育镜鉴》^[47]及《庄子“绝对自由”思想之于现代语文教育的启示》^[48]两篇文章分别从庄子的“不言之教”及“绝对自由”思想出发,探寻庄子思想为语文教育带来的启示。认为庄子“绝对自由”思想的基本内涵是追求人身与心灵的自由,因此在语文教育中应当以自由读书突破规范之困,以自由写作突破情欲之困,以直觉审美突破求知之困;“不言之教”给人们带来的启示在于,语文教学的目标可以通过言教以外的方式达到,对于学生来说,知识的获得离不开言教,而能力的提升主要依赖于教师的不言之教。

(吴秀华: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郭丹阳、梁妩怡:河北师范大学助教)

参考文献:

- [1] 张志勇.“诗经三颂”对后代颂赞的文体意义[J].诗经研究丛刊,2018(3).
- [2] 受志敏.复社文人的《诗经》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3] 雷戈.《诗经》文体与王权秩序——《诗》《书》时代的思想史研究之一[J].史学月刊,2018(12).
- [4] 马燕鑫.否定词与陶诗风格之关系[J].浙江学刊,2018(3).
- [5] 姜剑云.霍贵高.谢灵运新探与解读[M].中华书局,2018.
- [6] 姜剑云.谢庄对“元嘉体”的“复”与“变”[J].新华文摘,2018(1).
- [7] 陈斯怀.道、佛与中古诗歌的“尘”意[J].国学学刊,2018(3).
- [8] 曾智安.唐代生活的维度与唐诗研究空间的拓展[J].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18(7).
- [9] 张志勇.唐诗指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10] 李浩.朝气蓬勃的盛唐之音[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10-12.
- [11] 李浩.唐诗的会通精神与厚生意识[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11-2.
- [12] 吴淑玲.杜甫乐府诗的体类特征[J].南都学坛,2018(5).
- [13] 吴淑玲.杜甫乐府诗的叙事风貌及其转型价值[J].南都学坛,2018(2).

- [14] 孟新东.黄宗羲的豪杰理想及其诗学安顿[J].湖北社会科学,2018(2).
- [15] 孟新东.黄宗羲“元气”论文学观探微[J].河北学刊,2018(3).
- [16] 李冰燕.河朔诗派及诗学分析[J].商情,2018(6).
- [17] 刘青松.坳堂诗文集[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8.
- [18] 刘万川.津门瑰宝,畿辅遗珍——评王长华教授点校《津门诗钞》[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 [19] 李浩.宋词的幽情单绪与家国天下[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11-9.
- [20] 李浩.宋词与中华情[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12-7.
- [21] 田玉琪.唐宋词的韵断、句断与意断[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8-13.
- [22] 刘少坤.凌波读曲记[J].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18(1).
- [23] 王俊杰.《史记》战争叙事的三种笔法[J].理论月刊,2018(4).
- [24] 马燕鑫.尘封的声韵美——《文选》辞赋的音读特征[J].文史知识,2018(9).
- [25] 况晓慢.《文心雕龙·神思篇》之再思考[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3).
- [26] 姜子龙.初唐律赋补考[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8(2).
- [27] 霍现俊.论清代涉倭小说的思想内涵及其展现的文人心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8(3).
- [28] 陈国军.新见明代小说集《续耳谭》考论[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8(1).
- [29] 时俊静.元曲曲牌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30] 徐文武.《抛球乐》与“抛打曲”关系考论[J].中国韵文学刊,2018(3).
- [31] 都刘平.元曲三家生平新考[J].中华戏曲,2018(2).
- [32] 叶会昌.元代曲家王和卿新考——以新见《秘书监志》《开州志》材料为中心[J].中国韵文学刊,2018(4).
- [33] 刘少坤.论衬字[J].中国韵文学刊,2018(2).
- [34] 都刘平.元剧结构理论的建立与悖谬[J].新疆大学学报,2018(4).
- [35] 杜桂萍等.明清戏曲宗元问题论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36] 朱维.因袭与善创:王国维的“知人论世”思想与批评实践探析[J].中国文学研究,2018(1).
- [37] 朱维.王国维戏曲文体观的嬗变[J].文化与诗学,2018(2).
- [38] 罗庸著,杜志勇辑校.儒学述要[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
- [39] 陈斯怀.桀与四罪:先秦两汉典籍中的两类被逐者形象[J].历史文献研究,2018(2).
- [40] 杜志勇.《封龙山颂》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8-17.
- [41] 张春国.四库辑本蓝智《蓝涧集》考略[J].四库学第三辑,2018(1).
- [42] 张春国.《四库全书》本《文敏集》考略[J].中国四库学第一辑,2018(1).
- [43] 张春国.四库辑本《蓝山集》与《蓝涧集》考略[J].中国四库学第二辑,2018(2).
- [44] 李笑岩.先秦黄老之学渊源与发展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45] 赵志刚.评史蒂芬·霍吉对《道德经》译释的多视域融合[J].中华文化论坛,2018(4).
- [46] 彭翠,韦永恒.论儒学对越南古代文学的影响与文化建构[J].广西社会科学,2018(12).
- [47] 赵萍.庄子“不言之教”思想的语文教育镜鉴[J].语文建设,2018(13).
- [48] 赵萍.庄子“绝对自由”思想之于现代语文教育的启示[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7).

现当代文学研究

李致 田建民

2018年河北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相对集中于文学思潮与现象、小说和诗歌等领域。对钱钟书、鲁迅等优势传统研究领域继续有新成果产出的同时,在胡适、丁玲、茅盾、莫言等作家研究方面也有新的收获。尤其是在当代小说研究方面,打破了以往对作家单篇作品进行赏析式的研究范式,将当代作家或作品置于大的文学思潮中进行阐释和分析,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分析更加深入,彰显了研究者“文学史”意识

的提升。研究队伍总体平稳,田建民、郭宝亮、阎浩岗、雷鸣、熊权、田丰、邓招华、宫立等老中青学者形成了一支富有活力的学术队伍。河北作为文学大省有着丰富的研究资源,但多年来河北文学研究成果产出与之不相匹配的问题,需引起多方重视。

一、经典作家研究

经典作家向来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难

点。2018 年对鲁迅、胡适、钱锺书、丁玲、莫言等作家的研究有不少研究成果。

鲁迅研究。熊权将鲁迅置于左翼文学发生的历史语境下分析“左翼鲁迅”，认为鲁迅“左转”前后，对吴稚晖进行批判是一段值得重视和追究的历史。作者从鲁迅批判吴稚晖说开去，考察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等多重思潮的交锋和对话，还原左翼文学发生时的历史语境。以国民政府“清党”为分水岭，五四新文化走向不可避免的分化，从主义之争到“以理杀人”则构成了左翼文学发生的重要历史语境，“左翼鲁迅”深受这一语境的影响与塑造。^[1]

胡适研究。田天等的《胡适“好人政府”政治理念与〈努力周报〉考论》，联系胡适超然的实验主义的政治理念，考述分析了他于 1920 年代以《努力周报》为平台发起的“好政府主义”的政治改良运动。作者认为胡适在不推翻军阀专制统治的情况下想通过舆论监督与“好人”参政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他以美国的民主宪政为样板设想的“好人政府”及施政蓝图，在军阀割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缺乏实施的体制保证与社会基础。“好人政府”的失败是由胡适不承认“根本解决”而主张改良的实验主义政治理念的局限性所决定的。^[2]在《从胡适对政治的热衷与疏离看〈努力〉的缘起与转向》一文中，作者提出《努力》的“转向”与最终停刊，虽然与胡适“治学兼论政”的心态及身体病痛与情志转移有关，但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其改良主义政治理想的失败。胡适在不触动军阀政治统治的情况下，幻想用舆论监督甚至依靠一个“开明”军阀吴佩孚的支持建立起一个“好人政府”来解决现实的政治问题，无疑是不切实际的政治乌托邦。胡适等推动组成的所谓“好人政府”，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达到改良社会的黑暗政治的目的而与军阀权力的一次你情我愿的联姻。而这种联姻由于不是基于共同的理想或目标而是基于相互的利用，所以必然是虚弱和短命的。^[3]

钱锺书研究。田建民在《“痴气”的“书癖”与超然的哲人——谈杨绛笔下的钱锺书》(上、下)^{[4][5]}两篇文章中分析了杨绛笔下的钱锺书独特的创作个性。认为钱先俏皮幽默的心

态，善于想象与联想的才能，聪颖睿智、深思明辨的性格，渊博的知识与雅正的训练，共同形成了钱锺书基本的精神风貌和创作个性。俏皮幽默的心态形成钱锺书作品幽默嘲讽的主调；聪颖睿智、深思明辨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喜欢对一些抽象的观念理论问题进行理性思辨，得出一些令人难以预料而又合情入理的解释；学识渊博反映在他的学术著作和创作中就是旁征博引，说理深刻及各种中外典故的巧妙运用；善于想象和联想的天赋在作品中则表现为众多的新颖奇特的比喻。

丁玲研究。邓招华注意到北大荒生活在丁玲创作生涯中的影响，提出严酷的北大荒体验于丁玲的身心是一种伤害和摧残。丁玲复出后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但丁玲一直没有改变其左翼的革命立场，一方面拒绝“苦难”叙述，一方面并不否认文学的政治性诉求。在与时代话语的偏差之中，投射出丁玲晚年的“左倾”身份与形象。透过历史话语的迷雾，可以探测到丁玲对革命性诉求的坚守，包含着不同寻常的生命付出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意蕴，也蕴含着需要去把握的一种人性可能。^[6]阎浩岗则注意到了丁玲对土地革命的书写嬗变，指出丁玲 1931 至 1948 年的土地革命书写在叙事伦理及艺术处理上有明显差异，有一个马鞍形演变轨迹。早期的《田家冲》与《母亲》从个体生命体验角度切入，中期的《东村事件》是对“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模式的尝试，但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因此后期的《桑干河上》及《严寒日子》在适应新的创作规范的同时，又探寻新的属于自己的道路。这一马鞍形轨迹的形成，取决于作家独特的个人境况与创作追求。^[7]

茅盾研究。闫浩岗的《茅盾丁玲小说研究》^[8]，以茅盾和丁玲这两位地位特殊、经历独特的作家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如何处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遵循政治要求与保持自身个性、忠于艺术理想的关系，是作者近年来关于茅盾与丁玲小说研究成果的结集。此外，在《左联时期的茅盾与瞿秋白——从迎合到疏离的心路历程及其根源解析》^[9]一文中，作者对茅盾与瞿秋白的关系从文学观念、政治理念方面所经历的从迎合到疏离的转变过程进行了深入探析。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研究也在某

种意义上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显学”，这些研究构成了莫言创作经典化的一部分。雷鸣注意并探讨了研究莫言小说的经典化路径，认为经典的生成，是在一定时间与空间不断展开的社会历史过程，是社会、文化、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莫言小说亦如此。批评家的阐释与评论、小说的影视改编、各类文学奖项、文学选刊和文摘的转载、文学史书写等，共同构成了莫言小说“经典化”的多元路径。莫言作品的经典化历程远没有结束。^[9]

二、文学史研究

本年度文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方面，研究成果显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研究的历史纵深感。

1916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是新文学发生期的关键时刻。张瑜《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一书，从年代学的角度立论，考察1916年的中国文学，并在此基础上回顾新文学权力的获取过程及其占位策略，以场域理论的视角探源新文学的发生。作者通过征引大量原始文献，对1916年的文学传播空间、创作主体，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发展、接受主体，读者共同体的形成及其自主性的彰显以及市场化文学机制的形成等几个方面的论述，提出在文学革命发生前夜，一个相对自由且自主的文学场渐趋形成，并构成了新文学发生的必要生成语境。^[10]

乡土文学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创作思潮和流派。田丰在《左翼乡土小说家缘何“想象”革命》^[11]《左翼乡土小说的身体、悲剧和暴力审美形态解析》^[12]《1930年代左翼乡土小说的历史价值、局限及当下意义》^[13]中对左翼乡土文学进行了多角度的思考。认为左翼乡土小说家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大都从事过实际的革命活动，有一定的城市革命体验，但大部分没有农村革命或苏区生活的经历和体验。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投身于文学创作，也基本上是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生活，创作活动更多依据的是自己以往的革命体验和间接地对农村革命进行的文学想象，与实际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土地革命有着一定的距离。关于左翼乡土小说的审美形态和历史价值，作者认为他们不仅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建构起具有

独特审美特质的政治美学，而且还呈现出身体美学、悲剧美学和暴力美学等独具特色的多样化审美形态。认为革命文论家对于“力”和“美”的呼唤在左翼乡土小说家那里也得到了热烈的回应，揭示出血与火的时代里农民革命意识的觉醒及其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和革命意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和审美表征。认为作为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一环，左翼乡土小说虽然在人物塑造、创作手法和艺术审美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但却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对于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在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崔志远分析了新时期乡土小说所体现的中华文化精神。认为鲜明地域性的乡土小说之所以能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就在于中华民族文化在各地域文化的相互沟通中形成。新时期乡土小说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现代演进中的生动活跃形态，表现在：一是通变发展思想，表现为中华文化在全球化冲击下的“冲击—反应—反思民族文化—创造中西结合的新机制”的历史过程；二是家国忧患意识，包括忧国忧民精神、恋土怀乡情结和家族伦理观念；三是和合包容精神，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和人与社会的文化整合。^[14]

康鑫通过梳理对20世纪40年代文艺大众论争中徐訏、无名氏对“大众化”的理解展示了20世纪40年代抗战大后方关于文艺大众化的争论中“文艺大众化”的丰富性，作者通过对比分析两位作家的文学观，认为重视文学的“娱乐”因素是他们的共同之处。无论是从“娱乐”角度阐述“大众化”，还是以“新的媚俗手法”夺取读者，他们将对生命、世界的思考熔铸在通俗的小说情节建构中。他们阐述的“大众化”理论及其创作实践丰富了“文艺大众化”的内涵。^[15]阎浩岗则分析了《白毛女》等“土地革命叙事”的叙事策略，认为以《白毛女》为代表的“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有其独特的叙事策略，即为佃户或债户设置一种生存绝境，运用“催租逼债”情节模式，将农民的贫困单纯归因于地主剥削，将地主形象恶霸化，将贫民形象高尚化。这类叙事在今天看来固然存在明显的局限和偏颇，但历史地看，亦有其哲学、政治、伦理和美学依据，呼吁对其偏颇局限、特有的真实性

及文学、社会的价值,给予客观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16]刘起林就“十七年文学的特殊雅俗形态与‘革命通俗文艺’论的观念局限”进行了阐述,认为“革命通俗文艺”论是对十七年文学的一种全局性审美文化定性判断。这一论断将认同“新型国家意识形态”、采用传统小说或民间艺术形式与“通俗文学”“大众文艺”联系起来,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十七年文学的大量作品也并非国家意识形态与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结合体。“再解读”群体表现出以“文化雅俗”反对“政治雅俗”的思想立场,遮蔽了十七年文学因个体精神与集体话语有效“同化”而形成的审美创造特征。后来的研究者以“对历史的叙述”为基础修正了“革命通俗文艺”观念,但其指认为“革命通俗小说”的抗日战争题材作品,意蕴建构中同样隐含着“世界的大故事”,叙事形态表现出传奇性与纪实性相融合的倾向,“英雄的说部”只是局部、片断性的特征,因而也不能归入“通俗文艺”的范畴。十七年时期的“大众文艺”创作,从体裁到范围均在“革命通俗文艺”论者的关注视野之外,民间通俗文艺文体的写作、“基层写作”和“群众文艺创作”才是其特殊的实践形态。^[17]

当代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文学思潮与现象也是研究者重点思考的领域。雷鸣通过梳理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事件”思考中国文学的生态,认为厘清“文学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协调文学生态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使新世纪文学生态保持一种良性平衡颇有助益。他分析认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生态的特点:一是文学生产的市场他律与政府调控的文化领导权交错并存;二是文学传播引入了市场营销策略,大众媒体话语主导权得以确立;三是文学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呈现新变,除了文学阅读之外,符号消费也成为文学接受的潮流,部分读者则嬗变为类似娱乐场里膜拜明星的粉丝。^[18]

此外,研究者也关注到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杪樱分析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民族性和大众化特征,认为网络文学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格局,也影响了民族文学的发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逐渐受到关注。作者以《苗疆蛊事》这部网络小说为例,从叙事策略上分析网络文学在促进民族性大众化过程中的优势,并概括了当前少数

民族网络文学的总体特征:第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网络文学普及程度较低;第二,认为一切网络上的文学形式都是网络文学,而非已被网络文学业界“约定俗成”认定的在网络上连载的长篇小说;第三,大部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作者的民族身份意识不强,其作品的“民族性边界”不清晰;第四,目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网络文学产业化程度较低,随着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将成为坚守民族传统、反映民族生活、书写民族精神、呈现民族新变的重要载体。^[19]

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工作。宫立对梁实秋和周瘦鹃佚文的发掘值得关注。作者在《复旦旬刊》《图书评论》《文选》找到的梁实秋三封书简,均不见于十五卷本的《梁实秋文集》(鹭江出版社2002年10月版)和《雅舍遗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涉及梁实秋与傅东华、赵清阁的文人事以及梁实秋的批评观、翻译理念等。^[20]而新发现周瘦鹃的《黄山纪游》《我所爱游的名山》《我的苦学史》三篇以及周瘦鹃为赵君豪《游尘琐记》作的序,均不见于范伯群主编的《周瘦鹃文集》和范伯群、周全编的《周瘦鹃年谱》,当为集外文,为读者了解周瘦鹃早年生平提供了第一手文献资料。^[21]李建周选取整理了数十篇先锋小说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以独到的眼光把值得发掘和发现的文献史料呈献出来。并于书后附有详尽的研究资料索引,提供了文学研究的丰富材料和历史信息。^[22]

三、小说研究

郭宝亮认为新世纪小说的发展路向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由西而东的超越式回归;二是乡土小说的“城乡间性”,表现在写乡村或者都市的作品都不那么“纯粹”了,而城乡融合、城乡纠缠的小说大量涌现;三是“向外转”与“在地性”,认为九十年代以来那种狭隘的“过分向内转”的“私人化写作”逐渐式微,代之以正面敞开式的现实叙写。相当多的作家开始自觉面向现实,书写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生存状况。而“在地性”则是说作家的写作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作家经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悟,从而行诸笔端的行为。同时有两种发展趋

向值得注意：一是由向西方现代派学习到主动回归中国传统和民间，但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回撤，而是超越式的回归；二是由向内转到向外转，而这一次的“向外转”是文学自身发展演化的结果，因此它不是向内向外的简单轮回，而是否定之否定的艺术辩证发展。^[24]

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特征与发展逻辑是雷鸣思考的重点。首先作者注意到作家的中产阶级化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指出当下作家大都在城市里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缺乏乡村生活体验，往往以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思想感受预设乡村，用包含现代主义哲学的寓言化小说，作为叙述乡村的惯常文体，乡村现实往往被都市想象或都市视野所置换。这些具有中产阶级美学趣味的想象乡村的方法，与真实、鲜活的乡村相去甚远，也无法体察当下农民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呼吁发扬现实主义“体验生活”的优良传统。^[25]作者还分析了长篇小说创作中“边地历史”书写热潮与都市化语境的内在关联，认为新世纪以来的都市化语境，催生了长篇小说“边地历史”书写热。在都市化语境的支配与规约下，新世纪长篇小说“边地历史”书写的话语逻辑，在于为都市人提供一种代偿精神机制以及缓释心理焦虑的通道。现实都市爱情的物化沉沦，引致作家有意演绎边地纯美的爱情童话；鉴于都市人精神焦虑与信仰缺失，边地历史书写以“神性话语”的方式召唤宗教信仰，以重建超拔物质的精神高地。边地历史的暴力叙事模式，是作者旨在缓释都市读者日常生活的庸常与疲惫。以爱情童话、宗教神性、暴力叙事作为言说边地历史的三种话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遮蔽或歪曲了边地历史的丰富与复杂。^[26]“乡绅”阶层作为乡土中国独特而复杂的存在，作者在《新世纪长篇小说“乡绅”书写的文化征候》^[27]一文中，认为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乡绅”的书写呈现极度理想化与神圣化的倾向。这体现了作家为破解新世纪中国乡村困境，而向传统探掘资源与途径的思考；也通过这些正面“乡绅”形象，直观地展示了丰富而复杂的乡村生态。同时，作者认为这种一味呼唤前现代社会“乡绅”文化的回归，在价值取向上有现代性缺失之憾。

刘大先对当代文学中的非虚构、武侠小说、后青春文学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当代中国经

验的内外挑战是非虚构写作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但这种经验还包括着另一维度：它既有着中国特殊性的因素，也有着超出于“中国特殊”的普遍性层面的多重现实，即市场化、资本化、消费化和技术化的全球蔓延，构成了几乎每个当代中国人都身其中的环境，它由直接经验、间接经验和虚拟经验的多重部分组成。对于真实感、历史性、整体观的重视，是非虚构写作的立身之基，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写作如此强调伦理问题。^[28]作者在《传统位移、趣味主义与文化救赎——从王小波到徐皓峰的武侠想象》^[29]一文中高度肯定了武侠文学的样式，认为武侠文学日益成为一种回首过去、重释民族根性的方式，成为本土传统文化复兴的现象之一。这其中的遗产固然泥沙俱下，但未尝不包含着返本开新的可能性，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港台新武侠和新世纪青春文学及流行文学中的新武侠写作势能消耗殆尽，从王小波到徐皓峰这一脉以精英文学切入的武侠想象，在经历了反讽的解构之后，并没有全然陷入虚无主义，倒显示一种超出于既定文学秩序与生态的新的书写形式。它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武术一道，在价值观的重建中体现了对于古典的温情与对于当下的想象。在分析后青春文学时，作者以张悦然为例分析后青春文学的出路和困境。指出自恋者、躁郁者与缺席者，折射出后青春文学的叙述模式、情感结构与历史认知，从启蒙、叛逆到自我关注和消费的文学形象，是我们时代主导性文化生产模式的结果。这些形象内在于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之中，属于“后纯文学”的组成部分。而这样一种时代现状与文学现实，其实对文学提出了根本性转变的挑战，当历史上的“纯文学”之路已经走到尽头之后，后青春文学的贫乏之处也许正蕴含着历史前行的实在力量与动能——它如何应对现实、创造出自己的形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0]

此外，邓芳宁研究分析70后小说创作的“母题”，提出逃离母题在70后作家的笔下幻化出“角色转换”“到世界去”和“闲情偶寄”三种变体形式。这一母题形态的演化，标示出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感知社会环境、应对生存压力方式的微妙变化。^[31]

现代小说研究方面，值得关注的有申丽炜《蒋光慈小说中的“革命”与“浪漫”》^[32]—

文,作者分析认为蒋光慈的小说是革命文学,首先体现在他写斗争、写革命,此外还表现在他塑造了许多崭新的革命者形象。另一方面,蒋光慈在小说的叙述中把激荡奔放的感情直接流露,带有明显的主观抒情色彩。其小说还常采用革命加恋爱的方式,充满着浪漫的革命气息。虽然其创作中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对之后的革命文学活动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在客观上推动了革命文学的发展。

四、诗歌研究

诗歌研究成果相比小说研究稍显沉寂。李建周关于穆旦诗歌研究、邓招华关于郭沫若诗歌研究值得关注。邓招华分析了郭沫若对早期诗歌发展的贡献,剔除出郭沫若等在《三叶集》中有关“人格忏悔”的探讨,突破了传统的文化“场”,一个反思性“内面”得以登场。在诗学意义上,这标示着现代抒情主体的裂变与生成。《三叶集》建构的诗学观念在诗集《女神》中得到具体显现,二者构成互文性文本。《女神》显著的艺术特质是以抒情为本,确立了抒情的诗学本体地位。《三叶集》与《女神》共同推进了抒情主义诗学的建构,在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价值。^[33]李建周分析了穆旦的诗歌创作,认为穆旦的诗歌观念是在自我角色定位边界的移动中形成的,其创作延续着自己原有的诗学探索,在词与物的关系中加入更为复杂的痛苦思索和难以名状的情愫,力图把对大历史的介入和现实经验的复杂性结合起来,既有历史动感又有语言穿透力,同时又对诗歌在政治实践中的角色保持着必要的警醒和质疑。正是借助对国外诗人和前辈诗人的想象和重构,穆旦真正完成了自己现代诗歌的意识转换。穆旦的诗歌从来都不试图指向一种确定性的知识,而只是提供时代烙印于自身的复杂体验。诗人能充分认知历史处境的混乱和周遭现实的残酷,同时又以一种诗歌的伦理学探索救赎的可能性。在这种张力和平衡之间的匿名经验,不断召唤读者进行深入阐释,进而和当下建立一种深层的历史关联。^[34]

当代诗歌方面,李建周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性与诗歌先锋型之间的关联,分析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性”出演了一场颇有声势的历史变形记。它的出现和不断增值,

对先锋诗歌秩序的建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在一部分诗人笔下,叙事性在一种诗歌常态化的状况下焕发出活力,展示出另一种先锋性,从而与“90年代诗歌”趣味构成一种对话;另一方面,历史后遗症是非常明显的,直接导致仿写者将最具先锋性的探索变成俗套。先锋和“伪先锋”在历史之手的操纵下发生反转,从而使得这个本来针对具体历史情境的诗学概念,反而逐渐变得缺乏历史性。^[35]陈国元则分析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对“朦胧诗”的影响,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歌对“朦胧诗”有潜在影响。尽管抒情主题相异,晚近诗歌与“朦胧诗”同具政治抒情性。“朦胧诗”保留了晚近诗歌的意象所指范畴,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意象的能指与所指功能。“朦胧诗”中的箴言诗、哲理诗用理性对抗晚近诗歌中的非理性情绪,其实却是语录体的变相沿用。与晚近诗歌相似,“朦胧诗”的诸多作品表达了公共意识,而非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在文本基础上,历史地考察转型期文学,不回避“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关系,可还原文学史的完整性、客观性。^[36]

五、河北文学研究

孙犁、梁斌、铁凝是河北当代文坛标志性作家,向来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2018年河北文学研究又有新拓展——顾随和付秀莹研究取得可喜成绩。

顾随在学术上的成就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作为作家的成就,现存的12篇小说显示了顾随在文学上的成绩。他的创作是河北文学的重要收获。孙胜存等析研究了顾随小说创作的成就和个性。孙胜存认为顾随出生于河北清河望族,其家族文化特征可概括为耕读传家、雅俗并收,家族聚居、长于省思,乐善好施、关心民瘼等三个方面。顾家特色鲜明的家族文化影响了顾随的小说创作。今所见顾随小说12篇,就主题取向而言,大略可分为对女性特质的崇拜、对家庭生活的重视、对农村生活的描摹及对儒家经典的借鉴四个方面,其中均可看出家族文化的影响。^[37]石蓬勃在《顾随小说创作主题取向衍进》一文中^[38]分析了顾随小说创作的主题,认为顾随小说创作主题取向的演进与生活阅历密切相关,亦体现出作

者对社会人生的持续思考。其 12 篇小说中,就主题取向而言,大抵可分为对家庭生活的眷念、个体人性的剖析、济世目标的表述、众生苦难的描摹等四个方面。

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出版后引起批评界关注,杪楞等对小说的独特性进行了解读。赵振杰认为小说的独特性根源于乡村社会现状的复杂性。当下面对愈演愈烈的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从物质到精神,从肉体到灵魂,一切都处于动荡之中,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新与旧、好与坏、对与错、真与假……原本界限清晰的价值判断逐渐变得模糊混沌,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有效应付新的变革,传统的礼治秩序濒于瓦解,新的法治秩序尚未健全,整个中国乡村社会普遍处于价值真空的状态。为了能够尽可能全面、立体地呈现当下乡村社会的现实样貌与精神生态,付秀莹巧妙地采取一种可以称为“两级并置的文本策略”的方式,来呼应巨变之中的乡土中国。^[39]杪楞则比较全面客观地分析了《陌上》的艺术得失。认为由于作者饱满的情感介入,《陌上》对乡村生活的表达是活态化的、丰富的审美呈现。作者将乡村伦理的主要现实表现和结体形式挪移到作品中,作为小说的主要书写对象,不仅直接决定了文本的内容,同时也决定了文本的主要结构方式,实现了乡村生活由题材到内容再到艺术形式的转换,这是《陌上》最重要的艺术特征。作者是用农业的、自然的方式创设人物及其生活的环境,而不是工业的、模式化的方式。作者的女性意识对创作有直接影响,对女性心理有一个准确把握。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陌上》的女性群像具有现实的生动活性,无论老少,每个人身上的细节都充满诗性的美感。但作者的批判意识明显强过了对人物复杂性的考量,因此在大多数人物身上,都充满了与传统道德观念相背离的成分,有种将乡下人性格、品德中的阴暗部分放大到所有人身上的嫌疑。这种情况更存在于其中的男性形象男性普遍缺乏神韵。^[40]

陈超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一直是近些年河北诗歌研究的焦点。邢建昌《论陈超的诗学理论与批评》^[41]一文梳理了陈超的诗歌理论贡献,认为在陈超的生命世界里,诗歌创作、诗歌批评与诗学理论建构,是彼此融合、相互照亮的。他的

诗是温润的、鲜活的,既感性呈现又哲学思辨,闪烁着哲性之诗的光芒;他的批评文字与理论书写,也如诗一般,散发着独特性和陌生性的迷人气息。陈超诗学批评与理论建构的文字,是一个富于召唤结构、有待打开的文本。陈超的诗学理论建构是有着鲜明的人文立场和现代哲学底蕴的,陈超以独有的心性悟解人类历史上每一个先哲诗人提出的破解人类命运的命题、思想等,又以特定的文化过滤机制和独有的汉语表达使之转化、生成为具有本土性的命题。

(李致 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田建民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熊权.左翼文学发生语境下的鲁迅批判吴稚晖问题[J].文学评论,2018(03).
- [2]田天,田建民.胡适“好人政府”政治理念与《努力周报》考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09).
- [3]田天,胡连利.从胡适对政治的热衷与疏离看《努力》的缘起与转向——胡适与《努力周报》考论[J].鲁迅研究月刊,2018(06).
- [4]田建民.“痴气”的“书癖”与超然的哲人——谈杨绛笔下的钱锺书(上)[J].名作欣赏,2018(16).
- [5]田建民.“痴气”的“书癖”与超然的哲人——谈杨绛笔下的钱锺书(下)[J].名作欣赏,2018(19).
- [6]邓招华.北大荒体验和丁玲晚年的“左”[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6).
- [7]阎浩岗.丁玲土地革命书写的马鞍形轨迹[J].中国文学研究,2018(03).
- [8]阎浩岗.茅盾丁玲小说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8.
- [9]雷鸣.莫言小说的经典化路径考述[J].山东社会科学,2018(03).
- [10]张瑜.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1]田丰.责任与担当:左翼乡土小说家缘何“想象”革命[J].北方论丛,2018(02).
- [14]崔志远.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中华文化精神[J].中国文学批评,2018(03).
- [15]康鑫.被批判的“娱乐”——20世纪40年代文艺大众化论争中的徐訏与无名氏[J].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8,23(01).
- [16]阎浩岗.论“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叙事策略[J].励耘学刊,2018(02).
- [17]刘起林.十七年文学的特殊雅俗形态与“革命通俗文艺”论的观念局限[J].江汉论坛,2018(02).
- [18]雷鸣.新世纪中国文学生态与“文学事件”的发生[J].天津社会科学,2018(02).

- [19] 杪樱.网络文学的民族性与大众化[J].中国文艺评论, 2018(05).
- [20] 宫立.梁实秋佚简三通释读[J].新文学史料,2018(02),
- [21] 宫立.周瘦鹃集外文四篇及其释读[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35(06).
- [22] 李建周.先锋小说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
- [24] 郭宝亮.新世纪小说创作的两种趋向,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
- [25] 雷鸣.作家的中产阶级化与21世纪长篇小说乡村想象的几种方法[J].文艺研究,2018(08).
- [26] 雷鸣.都市化语境与新世纪长篇小说“边地历史”叙事的话语逻辑[J].青海社会科学,2018(03).
- [27] 雷鸣.新世纪长篇小说“乡绅”书写的文化征候[J].江西社会科学,2018,38(04).
- [28] 刘大先.当代经验、民族志转向与非虚构写作[J].小说评论,2018(05)
- [29] 刘大先.传统位移、趣味主义与文化救赎——从王小波到徐皓峰的武侠想象[J].小说评论,2018(04).
- [30] 刘大先.后青春文学的形象与贫困——张悦然笔下的自恋、躁郁和在场与缺席[J].小说评论,2018(03).
- [31] 邓芳宁.“生活在别处”——论70后小说的“逃离”母题[J].扬子江评论,2018(04).
- [32] 申丽炜.蒋光慈小说中的“革命”与“浪漫”[J].阴山学刊,2018,31(05).
- [33] 邓招华.论《三叶集》《女神》对早期新诗观念的建构[J].北方论丛,2018(02).
- [34] 李建周.穆旦诗歌中的词与物[J].文艺争鸣,2018(11).
- [35] 李建周.“叙事性”的变形记——兼及近年诗歌的“先锋性”问题[J].北方论丛,2018(04).
- [36] 陈国元.晚近诗歌对“朦胧诗”文本形态的影响[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03).
- [37] 孙胜存.家族文化对顾随小说主题取向的影响[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04).
- [38] 石蓬勃,顾之京.顾随小说创作主题取向衍进[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02).
- [39] 赵振杰.两级并置的文本策略或阐释的焦虑——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J].新文学评论,2018,7(01).
- [40] 杪樱.用种庄稼的方式书写乡村——评长篇小说《陌上》[J].新文学评论,2018,7(01).
- [41] 邢建昌.论陈超的诗学理论与批评[J].诗探索,2018(01).

艺术学研究

孟庆军

一、美术学研究

(一) 美术教育

代晓蕾等认为,中国画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的传统绘画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瑰宝之一。高校教育是传承和普及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高校中国画专业课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传承和发展中国画的文化精髓。社会信息化、多元化和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高校的中国画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1]

任梅勤等认为,河北省武强县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木板年画,由于长期形成的市场产品单一和与社会的脱节,逐渐走向衰败。在大力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绿色城镇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深入整理和研究武强年画及其市场的潜力,使这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丰富人类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从产业的特点出

发,培养后继人才和开拓市场。^[2]

王志亮认为,艺术批评已进入危机,近期的相关讨论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判断。批评本身的危机,还得按照批评本身的情况来开“药方”,即回到基础文本。中西两本艺术批评文选的编者洞察了艺术批评的这一危机,通过编辑基础文献,为学界重建艺术批评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径。^[3]

吕琼雯认为,“架上艺术”是指用画架和支架完成的绘画和雕塑等传统艺术,随着多元艺术形态的出现,这些曾经有着正统身份的“架上艺术”受到巨大的冲击和考验。而架上雕塑这种艺术形式具有的精神是今天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体认与感知,是个体情感与社会关怀的交流与互通。今天架上雕塑艺术应该承载着当代人的普遍人性和价值观念。^[4]

苏锋认为,中国动画产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动画内容创意的问题。动画创意已成为当下推动中国动画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文章从人才供给、人才需求和产业秩序三个

方面剖析了中国动画创意缺失的原因,并从技术、政策、学术研究和教育四个角度提出了解决中国动画创意问题的方案。文章指明以五千年中华文明为依托,以“一带一路”的文化遗产为契机,中国动画创意一定会横空出世,绽放全球!〔5〕

李军等认为,艺术专业中国画课程建设是院校转型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新形势下转型院校艺术专业回避不了的教学改革内容之一,它在转型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需要根据教学和课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地域经济文化、错位发展、师资培养等方面着手开展建设,以创新的思维逐步培育形成自己的专业优势和特色,为学科建设的深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更为转型发展提供课程支持。〔6〕

郝琮认为,写意画家赵贵德在几十年的中国画创作生涯中,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强化着自己艺术创作的精神力量和审美品质,他的作品不但具有意象混沌、气势恢宏的大美壮美境界,同时具有豪放自在的笔墨特质。〔7〕

张志强等认为,改革开放40年,我国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伴随着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美术教材建设迎来了新的起点。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总结经验、参考与借鉴教材发展的历史演变,贯彻新时代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理念,重构符合我国新时期发展要求的美术教材体系,并以科学的方式推进我国中小学美术教材建设迈向更高的台阶。〔8〕

马骁骅等认为,郎世宁来华距今已经有300余年了,如何看待东西方绘画的不同以及两者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似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作者从中西审美感知方式的差异出发分析中西绘画在形式语言上各自的特点,同时借用里格尔与沃尔夫林关于艺术发展的理论体系,从中审视和评价郎世宁在中西绘画结合中所做的努力与探索,并分析在郎世宁之后中国画家在中西结合道路上的态度与对策。〔9〕

张惠丹认为,《富春山居图》是元代山水画大师黄公望晚年的代表作,描绘了富春江两岸秀美的山水景色。它拥有深厚的文化价值、美学价值以及品牌价值,这成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灵感来源。借助《富春山居图》的品牌影响力,不

断丰富相关的文化产业类型,发展现代文化产业,进行多元化的创新,实现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10〕

洪京等认为,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我国冀东地区城市雕塑艺术发展方向出现了偏差,结合冀东地区城市雕塑现状,探索其未来发展的方向,旨在通过分析冀东地区城市雕塑艺术发展历史及现状,尝试探索适合冀东地区城市雕塑艺术创建体系,找到一条适合冀东地区城市雕塑艺术未来发展的道路。〔11〕

刘莹等认为,水彩画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中国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通过研究中国水彩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探索水彩画在当代发展的形式语言变化,揭示水彩绘画艺术形式语言在当代水彩艺术发展中的重要性是学习水彩艺术的必然选择。〔12〕

郭世杰等认为,20世纪初象征主义艺术思潮传入中国,一批中国画家在其影响下,结合我国时代发展要求创作出大量具有民族主义特色的美术作品。通过近百年的不断实践探索,象征主义美术在中国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并体现出中国特色。这无疑丰富了中国的美术创作形式,也给世界的绘画体系带来了新的内涵与生机。〔13〕

(二) 设计理论

杨冬梅等认为,针对老年产品设计过程中色彩感性意象不明确的问题,构建了符合用户真实感性需求与偏好的产品色彩设计方法。对某家电产品配色的感性特征进行心理反应测试,得到用户对色彩意象的数据。采用相关性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解析色彩意象的测量结果,得出体现老年偏好的产品色彩意象关键词,并将其作为评价因素,应用模糊评价法检验设计方案的隶属度,其结果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与有效性。〔14〕

王玲玲认为,文化设施规划须服从城市景观的整体格局,才能充分发挥真正的应用价值和服务效果。文章基于文化设施在城市景观空间中的视觉内涵分析,分别从文化设施在景观环境中的可识别性、景观语境中的可读性以及景观情境中的可意向性3个层面,给出了以文化设施视觉信息的有效传达为核心的设计理念。城市景观空间中文化设施的视觉传达设计,能更好地满足、完善城市功能和传承城市文化的时代需求。〔15〕

宋辰等认为,音乐源自于生活动作、情感思想等,是对现代生活情感的提炼与艺术处理。服装作为人们生活的关键构成部分,与音乐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两种艺术形态之间存在的神韵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服饰与演艺》一书是针对服饰与演艺活动之间的联系与关系进行研究的著作,该书提出了服饰与演艺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服饰与演艺融合才能打造听觉与视觉盛宴。^[16]

赵琳等认为,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坚持文化先行,民间技艺不断发展,树立文化引领经济的发展策略不断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促进现代文化和现代设计的不断创新。将剪纸艺术与茶叶包装设计融合到一起,不仅发扬我国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能够精准将民间剪纸的形象生动性和创新艺术性以及美好寄托应用到茶叶包装设计之中,这样不仅丰富了茶叶包装的文化内涵,还突显出中国传统特色的设计风格。^[17]

赵琳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让众多设计师在设计表现中不断追求的所谓“个性风格”,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虚假议题,而当我们自身诚实面对自己时,就会逐渐发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风格。个人的风格并不是刻意去找出来、追出来或做出来的,而是在生命的历练过程中,自然呈现出来的性格与气质。^[18]

王婷婷认为,绿色设计理念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大力倡导的设计思想,而绿色设计理念在建筑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室内生活环境,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约室内设计、装修与装饰等方面的成本。文章对建筑室内设计中绿色设计理念的应用原则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绿色设计理念在建筑室内设计中应用的基本策略。^[19]

李明认为,在茶叶包装设计时,如果能将中国美术融入其中,茶叶包装的文化艺术价值就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文章主要从中国美术中的水墨画着手,先对水墨画与茶文化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阐述,其次对茶叶包装设计中水墨画的应用体现进行了描述,文章最后对茶叶包装设计中水墨画应用应注意的事项进行了探讨。^[20]

杨光等认为,在河北美丽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目前高校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相对滞后,乡村

建设又迫切需求大量人才,提出将景观规划设计实践教学与当下河北美丽乡村建设面临的困惑相结合,明确实践教学目标,丰富实践内容,解决乡村存在的问题,从而打造出具有当地特色、文化性、生态性的河北乡村景观。^[21]

代秀峰等认为,设计实践与设计思维应该贯穿于设计专业学生学习的全过程,在设计色彩课程中同样需要实践项目的融入,墙体彩绘项目将对此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文章分析了目前设计色彩课程存在的问题以及墙体彩绘项目融入其中的意义,重点阐述了如何将墙绘项目融入设计色彩课程的教学实践。^[22]

(三) 书法理论

田熹晶认为,古代文章的流布主要依赖于文字,文字的表现手段是书写。随着时代的发展,书法的内涵逐渐离开了它深厚的文化土壤,成为单纯的艺术形式,而其背后综合的传统文化根基,我们永远都不能视而不见。当前书法创作在文辞选取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提高文化修养,增强文化意识,是当前书法创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23]

田熹晶认为,书法理论研究是指对书法及相关领域进行形而上的探讨,形成一套体系完整的理论架构,阐释书法的文化意义以及提高人们对书法的鉴赏能力,并对书法实践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24]

李明银认为,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及社会各界的重视。2017年中国书法教育在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努力与支持下稳步前进,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主要涵盖高等书法教育、中小学书法教育以及社会书法培训三个方面。文章对于这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问题及解决对策。^[25]

刘宗超等认为,叶秀山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书法美学家。叶秀山用西方哲学解释书法美学的思想,亦将随着社会时代的进步和世界民族文化艺术的融合,愈来愈显示它独特的价值和意义。^[26]

吴增辉认为,浙江作为清初四画僧之一,并不以书法著名,根据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除了绘画上的题款,几乎没有独立的书法作品,因此绘画题款便成为研究浙江书法的基本依据。文章就浙江画风与书风之关系及浙江的文化构成等角

度尝试对题画楷体书法的特征及成因进行了探讨。^[27]

何林英认为,隶书作为汉字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它的结构特点必然会受制于并反作用到汉字结构的总规律上。隶书的字形结构是朝着简化、符号化、规范化、美化的方向发展的。这些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有机的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隶书字形结构变化的主要基调。^[28]

周予认为,国内高等院校面向师范专业学生普遍开设了书法课程。在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可以从高师书法课“以文化人”功能发挥的视角出发,积极探索其实践路径,努力使高师书法教育成为师范生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有效载体。将“以文化人”的教育理念深植于高师书法课程建设,将在更新教育理念、深化课程改革、创新培养模式、推进文化传承、促进师范生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促进作用。^[29]

周予等认为,教学用书是课程教学的基础性材料,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是学生进行高效学习的重要参照。小学书法学习的书体为楷书,学习欣赏的书体包括篆、隶、草、楷、行五种,并就此推荐了楷书临摹范本十种,欣赏作品三十种。教师也可结合教学实际,自行推荐其他作品作为临摹范本和欣赏作品。^[30]

二、音乐学研究

(一) 音乐教育

张伟等认为,乐曲改编是音乐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民歌、器乐曲整理、移植、改编的琵琶曲是琵琶原创作品之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很多优秀的琵琶改编曲问世,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原曲。^[31]

崔伟认为,20世纪30年代,河北钢琴教育开启了自己的篇章,经过80年发展,已形成系统的钢琴教育体系,培养了众多国家音乐骨干人才。文章按照不同历史阶段,将河北省钢琴教育分为高师钢琴教育、专业钢琴教育和社会业余钢琴教育三部分,分别从历史概述、重要机构教师构成、教学法和教材建设等几方面进行论述。填补了国内对河北钢琴教育研究的空白,为日后对河北钢琴教育进行更加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32]

魏欣从多个方面探讨“红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红歌”指的是歌颂革命和赞颂祖国的歌曲。它是我国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特殊文化成果,在当代,红歌仍有很大的价值,它不仅是我国音乐艺术的宝贵财富,而且是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33]

张伟等认为,琵琶独奏曲《山之舞》采用贵州苗族的歌舞音乐为素材,在结构安排以及演奏技法的运用等方面布局精妙、独具匠心,全曲既不失其浓郁的西南少数民族音乐风格特点,又体现着高难度琵琶演奏技巧所带来的新颖、丰富的音响效果,是当代琵琶乐曲创作中的佼佼者。^[34]

胡小满对河北省民族音乐集成工作者群体的活动进行了总结思考,认为“集成代”为我们植起一株文化大树。他们与我们是时空与学缘关系最亲近的师者。透过他们的集成,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音乐的“老腔老味儿”,感受到一种“中国人的音乐气质、中国的时代精神”。但作为后学,我们认识师长却存在着“灯下黑”的问题,对他们的集成贡献存在重视不够、知之甚少、研究不够的问题。^[35]

耿飞等认为,音乐教育质性叙事研究是研究者常用的质性研究方法之一,音乐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音乐课程过程中有意义的教学事件,及其音乐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的经验的描述和阐释,发现或揭示内隐于音乐教育教学活动当中的教育理念。音乐教育叙事法建构的理论处于从特殊性到普遍化的中间阶段,它可以进一步向上发展出更具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宏大理论,也可以针对音乐教育教学个案做出具体的运用与展示。^[36]

梁艺丹等认为,在采茶戏的大背景下,冀东皮影戏这类小众戏曲表演在茶文化复兴的带动下,进行了传统再现的现代化表演。四胡与二胡是冀东皮影戏中的通用弦乐乐器,也是采茶戏中的常见伴奏乐器。基于此作者主要分析了在传统采茶戏背景下,冀东皮影戏中四胡与二胡的异同点以及融合发展策略。^[37]

朱婧燕认为,《拉贝日记》创作团队人员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中国事件国际化表达的一次成功尝试,其在音乐、舞美、导演等方面所显示出的优点,尤其是该题材所彰显的意义和价值,是一部值得“走出去”的当代中国歌

剧佳作。它所带来的震撼呈现,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歌剧在采用“西体中用”形式表现深刻历史题材中的一部优秀作品。^[38]

史静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今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对综合性音乐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通过高校音乐教育模式的改革,让高校音乐教育能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探讨高校音乐教育模式改革的现状,确立了坚持服务基层的目标定位,分析了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高校音乐教育模式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39]

刘春江认为,新时期音乐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钢琴是学习难度比较大的音乐种类,而即兴伴奏是钢琴伴奏的重要内容之一。作者从大学钢琴教学中即兴伴奏的应用概况角度,详细阐述应用即兴伴奏中所需的音乐知识,论述了大学钢琴教学中即兴伴奏应用的训练方法,为大学钢琴教学中即兴伴奏的应用研究提供参考。^[40]

李文皓等通过对音乐在茶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进行分析认为,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茶文化的出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促进了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而音乐作为一种无国界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好地体现出我们生活中的各种感情,能够增加世界各地的交流与沟通。作者从茶文化形成与发展角度阐述音乐和茶结合后在社会中的传播作用。^[41]

(二) 声乐理论

宋辰等认为,茶文化的综合内涵为整个音乐艺术的内涵升华,甚至是音乐情感表达,注入了新的价值理念。文章从当前声乐教学活动的问题与不足入手,结合茶文化体系的价值内涵理解认知,通过探究茶文化元素应用于声乐教学活动的可能性理解,进而分析声乐教学活动中茶文化体系的具体运用机制认知。^[42]

许晖认为,声乐室内乐课程在高等院校声乐教学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河北省对于这门课程的建设还略显欠缺,作者对建设这门学科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希望为河北高校的教师和学生提供相应的经验。^[43]

美声是源于欧洲的音乐演唱方式,对演唱中的发音和情感要求较高,王俊卿撰文对美声概念

及基本特征做了详细阐述,探究美声在中国音乐作品演唱中的作用。认为美声和中国音乐作品唱法有效地结合起来,不仅能够提高中国音乐水平,推动中国音乐的国际化发展,让中国音乐登上国际舞台,从而提高中国国际文化影响力,推动中国音乐国际化发展。^[44]

王俊卿认为,当下国家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社会对学前教育专业歌唱教学越来越重视,如何提升歌唱教学适应性与有效性是学前教育专业应长期努力的方向。学前教育专业歌唱教学改革是素质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学前教育专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培养学生音乐综合素养水平、提升幼儿园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45]

(孟庆军 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代晓蕾,崔强.高校中国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发展研究[J].美与时代,2018(4).
- [2]任梅勤,杨柳.河北省武强特色传统木板年画文化产业发展之研究[J].学周刊,2018(4).
- [3]王志亮.危机之下重建批评——评《20世纪西方艺术批评文选》的雄心与实践[J].美术研究,2018(3).
- [4]吕琮雯.恒定的原点与生发的起点——架上雕塑的当代价值[J].美术观察,2018(6).
- [5]苏锋.动画创意——中国动画产业再升级的关键因素[J].同济大学学报,2018(3).
- [6]李军,李明.院校转型背景下艺术专业中国画课程建设初探[J].保定学院学报,2018(3).
- [7]郝琮.把握文化精义 挥写大美壮美——评赵贵德大写字中国书画艺术[J].美术观察,2018(4).
- [8]张志强,黄颖茜.改革开放40年我国中小学美术教材的演进考述与未来展望[J].课程.教材.教法,2018(9).
- [9]马骁骅,刘玉蓉.郎世宁的穿越[J].世界美术,2018(2).
- [10]张惠丹.探析《富春山居图》的文化价值传播[J].美与时代(中),2018(11).
- [11]洪京,齐甲子.我国冀东地区城市雕塑发展研究[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8(2).
- [12]刘莹,郭世杰,栗伟正.水彩画表现语言探索[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8(1).
- [13]郭世杰,刘莹,王小金.象征主义绘画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研究[J].艺术科技,2018(4).
- [14]杨冬梅,张健楠,丁满,杨培,许晓云.基于感性意象的老年产品色彩设计方法[J].机械设计,2018(3).
- [15]王玲玲.城市景观空间中文化设施的视觉传达策略[J].包装工程,2018(24).
- [16]宋辰,李杨.音乐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评《服饰与演艺》[J].印染助剂,2018(6).

- [17] 赵琳,刘韦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剪纸艺术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福建茶叶,2018(8).
- [18] 赵琳.设计表现中的个性风格[J].美术观察,2018(5).
- [19] 王婷婷.绿色设计理念下的建筑室内设计探讨[J].中外企业家,2018(16).
- [20] 李明.美术元素在茶叶包装设计中的应用[J].福建茶叶,2018(3).
- [21] 杨光,霍菲菲.河北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如何改革景观规划设计实践教学[J].大众文艺,2018(2).
- [22] 代秀峰,宋明轩,徐丽丽,田园.墙体彩绘融入设计色彩课程的教学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8(3).
- [23] 田熹晶.当前书法创作中的文辞考察[J].中国书法,2018(22).
- [24] 田熹晶.书法理论研究述评[J].中国书法,2018(14).
- [25] 李明银.书法教育综述[J].中国书法,2018(14).
- [26] 刘宗超,范宇光.论叶秀山的书法美学思想[J].艺术百家,2018(3).
- [27] 吴增辉.弘仁画风与书风之关系[J].中国书法,2018(15).
- [28] 何林英.隶书结构演变的特点[J].汉字文化,2018(4).
- [29] 周予.论高师书法课“以文化人”的实践路径[J].大学教育,2018(10).
- [30] 周予,张学鹏.小学书法教材毛笔楷书范字选择标准研究[J].语文建设,2018(4).
- [31] 张伟,库玉丹.“新疆风味”琵琶曲成功改编的原因探究——以王范地改编的琵琶独奏曲《天山之春》为例[J].大众文艺,2018(13).
- [32] 崔伟.河北省钢琴教育发展历史研究[J].音乐创作,2018(12).
- [33] 魏欣.红色歌曲的思想教育意义——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为例[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8(24).
- [34] 张伟,董菡,杨晓丹.起舞弄歌 何在山间——琵琶独奏曲《山之舞》解读[J].当代音乐,2018(9).
- [35] 胡小满.续修文化长城的“集成代”——关于河北省民族音乐集成工作者群体的思考[J].人民音乐,2018(3).
- [36] 耿飞,任志宏,刘晓利.音乐教育研究中的质性叙事法[J].音乐创作,2018(7).
- [37] 梁艺丹,马凌云.传统采茶戏背景下冀东皮影戏四胡与二胡的比较分析[J].福建茶叶,2018(11).
- [38] 朱婧燕.人性光辉的颂歌——评歌剧《拉贝日记》[J].艺术评论,2018(3).
- [39] 史静.服务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高校音乐教育模式探索[J].邢台学院学报,2018(1).
- [40] 刘春江.大学钢琴教学中即兴伴奏的应用探究[J].教育现代化,2018(4).
- [41] 李文皓,吴旻,曹艳.音乐在茶文化传播中起到的作用分析[J].福建茶叶,2018(8).
- [42] 宋辰,李杨.论茶文化在声乐教学中的运用[J].福建茶叶,2018(8).
- [43] 许晖.探索河北高校声乐室内乐学科建设——以声乐室内乐音乐会实践为例[J].音乐创作,2018(4).
- [44] 王俊卿.探讨如何用美声唱法演唱好中国音乐作品[J].戏剧之家,2018(27).
- [45] 王俊卿.学前教育专业的歌唱教学[J].黄河之声,2018(17).

历史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

魏建震 冯金忠 陈瑞青

一、先秦秦汉史

2018年,河北先秦与秦汉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史前史与传说时代、西周史、春秋史、国语、两汉史和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等方面。

(一) 史前史与传说时代研究

在史前史研究方面,张鑫等通过对邯郸地区发现的磁山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对邯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

的交流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基本厘清了邯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如磁山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等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1]任乃宏通过梳理砥柱山至龙门之间黄河河道的演变,对孟子关于“洪水”即“水逆流”的说法提供了一种解释,以期揭开史前大洪水的真相。^[2]

(二) 西周史研究

张怀通将《世俘》文例与柞伯鼎、乖伯簋、静方鼎铭文进行比较,认为乖伯簋铭文中的至、

告是省略形式，静方鼎铭文与《世俘》中的至、告是完全形式，但内容各有侧重。并推论只有内容为世人所熟知的时候，简略的形式才能成立，说明《世俘》所据以改编材料的时代应在乖伯簋之前，甚至在静方鼎之前，大约是西周早期，由此证明《世俘》是西周文献，史料价值很高。^[3]在西周地理研究方面，任乃宏等的《“采石之山”与“走廊南山道”》通过梳理前贤及今人之成果，考定周穆王一行自“敦煌”东归并未走河西走廊“大路”，而是选择了“走廊南山道”前往“张掖”。^[4]

（三）春秋战国史研究

魏忠强的《孟子以史论〈书〉研究》一文，认为孟子称引《书》经，多是作为谈说的依据，或作为辩论的论据，并往往附述《书》篇的历史背景与作《书》的原由，此实为孟子以史论《书》的体现。孟子称引《书》经有以史论《书》的风格，这也同时体现前经学时代重“史”的风气，孟子时代尚未形成后世经师治《书》等经学训诂与阐发大义的范式。^[5]张海的《清华简〈系年〉四则春秋战国史事考》，依据清华简《系年》，对赤狄伐卫、齐晋之争、楚助宋平权臣、三晋联合伐楚等四则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史事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从这四则重要的事件中可以读出相应的历史发展趋势。^[6]

冯小红《从清华简〈系年〉看侯马盟书的年代》一文，通过梳理分析以往学界对侯马盟书年代的7种说法以及对主盟人主要有赵桓子嘉和赵简子鞅的两种说法，认为赵桓子嘉主持侯马盟誓的说法最为合理，侯马盟书中的“宗盟类”和“委质类”盟书的年代为公元前442年至前441年。^[7]张润泽等在《赵国武城戈及其地望辨析》中经过考证，认为定襄郡的武城县非战国赵国武城城邑，而是汉代设置的，与先秦赵国武城无关。十四年武城令戈的武城应该位于今河北磁县讲武城。^[8]王红超通过对秦末三次军事行动分析，对荀子的军事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荀子的军事思想承继儒家的主张，又兼融兵家思想。^[9]范文华对廉颇家族世系进行考证，认为其世系上可追溯到上古颛顼帝的来孙大廉、春秋时代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的廉洁，下传至西汉右将军廉褒、新朝大司马廉丹、东汉太守廉范。^[10]

（四）《国语》研究

2019年，河北学者在《国语》研究方面取得多项研究成果，促进了《国语》研究的发展。郭万青发表了四篇相关论文。《〈国语正义〉稿本价值初探》对上海图书馆所藏董增龄《国语正义》稿本与后来刊行的式训堂本进行比较，认为总体而言《国语正义》稿本较刊本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更完整保持了董增龄《国语正义》的本来面目^[11]；《高塘〈国语钞〉初探》对高塘《国语钞》进行了研究，认为《国语钞》是清代前期《国语》评点中的重要著作，在《国语》评点史上和畿辅评点学史上都有重要价值；^[12]《清代〈国语〉的传抄及版刻》对清代《国语》传抄刻板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清代《国语》的传抄与版刻是《国语》版刻及流传史上第二个黄金时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张一鲲本在清代出现了数量较多的重刻本，明道本抄本以及校宋本的早期流传及黄刊明道本《国语》的刊刻，诗礼堂本的刊刻及四库本的形成；^[13]《韦昭〈国语解叙〉初探》一文对韦昭《国语解叙》进行了研究，可以参看。^[14]王士良发表《〈国语〉中的生态哲学思想述论》一文，认为《国语》中蕴含着“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的天人关系论、“懋昭明德，物将自至”的生态德性论、“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的生态共同体论等思想。特别是其提出的“和实生物”的命题，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亦是人和万物的存在方式。^[15]

（五）两汉史研究

在两汉史研究方面，王尔春发表两篇文章。其一《“赐姓”与“更姓”——与汉代宗室相关的姓氏变动现象解析》一文对汉代宗室相关的姓氏变动进行了解析，认为汉代与宗室相关的姓氏变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皇帝利用皇权赐予臣民以皇家姓氏；二是宗室诸刘自愿或非自愿放弃皇家姓氏而改以他姓。但不论哪种情况，都应与皇权消长、宗室地位升降息息相关。对汉代与宗室相关的姓氏变动现象进行总结与分析，不仅会深化对汉代皇权的认识，还会在汉代社会变动的理解上开拓一个新的视角。^[16]其二《汉代宗室的“世代规模”考》一文对汉宗室的世代规模进行了研究，认为汉代宗室涵盖所有的皇室成员，世代规模可以说是无限的。但这并不意味

着汉代宗室内部毫无区别，他们以在位皇帝以及蕃诸侯为中心划定五服范围，五服内的宗室才拥有属籍，五服外的宗室没有属籍；有属籍的宗室才有特殊待遇，无属籍的宗室其特殊待遇自然随之终结。^[17]

（六）先秦秦汉思想史研究

胥仕元的《先秦儒道墨理想社会思想研究》对先秦儒道墨理想社会思想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先秦儒道墨理想社会思想，是中国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深入探索。孔子提出“天下有道”，孟子提出“王道”，荀子提出“王制社会”，三者共同构成儒家关于理想社会的基本内容。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社会，庄子提出“至德之世”，体现了道家的理想社会思想。墨子主张“兼爱”，体现了平民的主张。诸子的主张，反映了对人类社会现状的认识以及未来命运的思考，对当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18]李志亮《韩非子治国理论的逻辑》一文，认为韩非子以法为核心，构建治国理论体系，被历代统治者或明或暗纳入治国之术，原因有三：一是以人性为基础，抓住了人心政俗的根本；二是以天道为依托，赋予了法治理论的天地观权威；三是韩非子结合现实对儒家德治思想进行了批判，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法治理论的现实可行性。^[19]臧明《刘向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一文认为，西汉中期之后外戚王氏擅政，刘氏政权岌岌可危。刘向为打击王氏，匡正君王的得失，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先秦诸家之典籍，并吸收了阴阳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进而结合西汉时期所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构建起了极具时代特色的“灾异学说”。刘氏的灾异思想虽充满了怪诞色彩，但将其运用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体现出刘向重民与治世二者兼采的思想特质。^[20]陈鹏的《汉代儒学建制与王权法统的整合及主体精神的失落》一文，对汉代儒学建制与王权统治的整合进行了研究。认为汉代儒学思想顺应国家统一形势而进行调整，以主宰之天确立政权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法天立道使君主权威得到强化，君权成为臣民绝对服从的对立性存在，这无疑使主体精神与独立人格在等级秩序中难以彰显。董仲舒在一定程度上以天道制约君权滥用，同时建言朝廷制定政策为儒者入仕提供机会。但是这一点被统

治者有意无视，进而导致了儒学逐渐走向僵化。董仲舒以历史的新高度审视儒学与政治的发展动向，满足政治的统治需求，而儒学建制为自身发展赢得机遇的同时也付出相应的精神代价。^[21]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一）社会经济史研究

近年来，邢铁一直致力于唐宋家庭经济研究。他认为，考察唐宋时期家庭经济问题，需要运用社会经济史“眼光向下”的研究方法，把研究视角由“国计”转向“民生”，把研究内容从社会化的经济活动转向平民百姓的日常家庭经济生活。在研究资料方面，不能把唐宋文献中关于家庭经济的记载作为信史直接引用，要去伪存真，从中看出“通常”情况。他认为唐宋时期家庭经济运行以自给自足为原则，以男耕女织为基本内容，直接目的是家人的衣食温饱，最终目的是传宗接代。呈现出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运行方式体系；二是家庭经济运行节奏按三个周期安排；三是家庭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是财产的家庭所有制形式。^[22]邢铁还对吐鲁番文书中《定户状》和《贮粮符》两件文书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两件文书可以补充唐前期户等制度的两个细节问题：划分户等的主要依据是私有田地，与均田制下的授田关系不大，也不包括人丁；地税按户等征收的粮食数量可以灵活变通，可以分散存放在民户家中。前者具有普遍意义，而后者只是西北边地的变通方式。^[23]

（二）社会史研究

夷夏观是中国古代在民族关系上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雷戈指出，学人喜欢用一种华夏主义的眼光来安置和评价胡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和特性，却忽视了胡人的历史特质以及对汉人观念的冲击乃至颠覆。胡人在汉人的帝王之间加入了一个新位阶，从而构成了王→天王→皇帝三级序列。胡人入主中国的过程，不仅是学习和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过程，也是反思和修正中华道统谱系的过程。胡人观念影响中国思想的方式是实践而非思辨。其对中国思想史的最大贡献是，证明了皇权主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性政教文明体系。^[24]

东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慈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的慈善思想、慈善活动均肇始于东

汉。魏晋至南北朝形成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佛教慈善事业亦逐步兴盛。许秀文等指出，佛教慈善思想主要是佛教的慈悲精神、因果报应学说和福田思想，这些思想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类似理念相融合，构成了佛教慈善活动的力机制和直接起因。在此基础上，佛寺、僧侣和信徒广泛开展慈善活动，涉及慈善宣传、救济贫乏、施医恤病、赈济灾荒、建义井和救济狱囚等诸多方面。在这一动荡时期，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效果。^[25]

环境管理是城市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唐代是中国古代城市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对城市环境的管理也日益提到统治者的议事日程。张春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唐代城市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唐统治者的应对措施，进而总结了唐代城市环境管理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她认为唐代城市环境管理特点包括：一是有法可依；二是管理主体队伍庞大，形成由上至下的环境保护体系；三是管理措施已体现出关爱生命、追求和谐的思想。^[26]

（三）法制史研究

死刑是唐代各种刑法处置的最高等级。石冬梅《唐代死刑制度研究》一书对唐代死刑制度进行了全面研究。首先，详细论述了唐代的起诉、审判和复核制度，特别是在大理寺的职能、司法三司问题等方面有所辨正；其次，讨论死刑的减免，对唐代赦书的赦条作了全面梳理，总结各个时期赦条内容的变化，探讨了不予赦免的罪名及其所反映的当时的政治形势，并辨析“常赦”不是与大赦并列的单独一类，可以称之为普通大赦，与全面大赦同为大赦的一个类别；再次，论述唐代死刑的行刑方式、行刑时间和地点等，重点分析唐代行刑时间禁忌的思想渊源、流变、利弊以及唐代死刑的废除问题。^[27]

（四）经济史研究

货币作为经济交换活动的媒介，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朱安祥从“货币史的研究”和“钱币史的研究”两方面对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进行了细致梳理。在充分肯定既有研究成绩的同时，指出了三点不足：一是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点”（即钱币学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和一个“面”上（即货币层面中关于货币经济发展程度的争议），缺乏全面系统的综合性成

果，没有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有着内在逻辑关联的货币发展体系。二是，以研究视角来看，以往的研究成果不是注重宏观性的整体考察，就是针对某一问题展开微观性的分析，这种游移于宏观的宏大叙事和微观的细碎短钉之间的研究，难免存在偏颇。三是，以研究方法而言，以往的学者大都把“货币史”与“钱币史”视为两门关联性并不紧密的学科，造成货币史的论文基本上不参考钱币学界的成果，同时钱币学界也对货币史的研究内容漠不关心的局面。这种传统研究范式对深入探讨魏晋南北朝货币问题十分不利，他呼吁学术界在方法上抛弃传统研究的隔阂，把“货币史”与“钱币史”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8]

（五）学术史研究

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并依内容或字、韵，分门别类编排以供寻检、征引的工具书。由于其资料性强，在辑佚、文献整理方面价值巨大，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唐代类书编纂成就突出，郭万青《唐代类书引〈国语〉研究》一书以唐代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群书治要》《初学记》《白氏六帖事类集》等所摘引的《国语》语句为研究标的，综核传世《国语》诸版本，指摘异同。主要包括《北堂书钞》引《国语》校证、《艺文类聚》引《国语》校证、《群书治要》引《国语》校证、《初学记》引《国语》校证、《白氏六帖事类集》引《国语》校证等五部分。^[29]

北京师范大学宁欣教授在唐宋史，特别是制度史和城市社会史方面研究成绩斐然，著有《唐代选官研究》《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选举制》《唐史识见录》和《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对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关注》等专著及一系列相关论文。张春兰对宁欣学术研究特点进行了评述，将宁欣的治学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即制度、空间、人口和故事。认为此四点要旨既各自独立，又紧密联系，共同构建了宁欣学术研究体系。具体来说，一是关注唐代选官制度研究；二是提出城市空间的三个维度；三是利用笔记小说证史或补史。^[30]

（六）考古资料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近年来，碑刻的价值为学术界所重视，碑刻整理和利用碑刻撰写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孙继民等主编的《邯郸新出东魏北齐隋唐五代碑刻论文集》是在2012年赵文化研究中心召开的“邯郸新出东魏北齐隋唐五代碑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基础上编辑而成,也是对邯郸学院赵文化研究中心在邯郸地区碑刻新材料研究方面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31]

任乃宏等的《邯郸地区隋唐五代碑刻校释》分上、下两册,内容包括邯郸地区现存隋代碑刻、大名现存唐五代碑刻、馆陶魏县广平现存唐五代碑刻、临漳磁县成安现存唐代碑刻、邯郸市(含矿区)现存唐代碑刻、响堂山石窟现存唐代题记选释、武安曲周邱县现存唐五代碑刻、永年现存唐五代碑刻等八部分。他以笺释的形式,对《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河北金石辑录》《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壹)》《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等主流文献相关篇目录文中存在的讹误进行了梳理,形成了到目前为止较为可靠的录文定本,可称为隋唐五代碑刻的邯郸大全,为历史研究者的翻检利用提供了便利。^[32]

北魏霍扬碑(1920年出土于山西省临晋县东霍村),在历史、书法、文字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其录文有近十种。但因原碑剥蚀较甚,各家录文误读之处较多。梁春胜对各家录文作了汇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霍扬的家世,认为霍扬很可能是晋交州刺史霍弋的后代。^[33]

三、宋元明清史

2018年河北史学界在宋元明清史研究领域出版学术著作3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在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等方面成绩突出。在资料方面,除传统史籍外,还大量使用碑刻、出土文献、纸背文书和民间文献,不仅丰富了史学研究的范围,而且形成河北史学界鲜明的研究特色。

(一) 政治史与军事史

王晓龙著《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研究》借鉴现代行政学研究中有关“行政成本”的概念与理论,从行政设施成本、公务接待成本、“羨余进奉”成本、无形行政成本、无效行政成本五个方面对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的根源在于宋朝的财政和军事制度。两宋时期中央政府由于外部战争和内部养兵压力所进行的无限

度赋税征调,带来地方政府行政经费不足,不得不变相向民众征调和搜刮,从而导致官民矛盾突出。而惩贪不严也导致官员贪污腐败问题屡禁不绝、无效行政成本过高,这也是两宋经济虽然发达,却不能将财富优势转化为国力优势,做到国富、兵强、民安的重要原因之一。^[34]王晓龙认为宋代行政成本问题呈现出五个特点:一是存在“精简—膨胀”反复循环的怪圈;二是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三是地方政府用于自身运转需求的成本越来越高,用于社会公共服务支出的费用占比日益降低;四是地方政府显性的成本规模有限,而隐性成本消耗日益增高;五是地方政府非合理性解决行政成本的手段日益增多。^[35]王晓龙、梁桂圆认为宋代地方行政设施修建经费来源问题,既包括地方自有经费的投入,又包括向上级和中央政府申请经费,也存在大量的向下级和普通民众摊派费用的情况。^[36]许伟宁、王晓龙以成都为例,探讨了宋代地方政府公务接待问题,认为公务接待可分为公务宴会、礼物馈赠、公务旅游等。存在着一些地区在公务接待上监察力度缺乏、活动无规范与支出巨大等不足。^[37]胡明颖、王晓龙对宋代地方政府公务迎送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宋代地方公务迎送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公使钱和自筹经费,迎送人员、交通工具、迎送地点和程限因迎送对象不同而有所差别,并有相关法规规范,但在实际运行中仍会出现非法差借、贪污浪费和科差百姓等违法行为。^[38]贾文龙、郑迎光对宋代地方治理中“短安长治”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宋代地方治理中,呈现了“短安”与“长治”并存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分权性地方行政体制密切相关。宋代地方行政结构是非完整的统治单元,而地方司法结构不仅是完整的治理单元,还有地域分化和人群分化的功能。这种职能结构间的差异性,使宋代地方统治形成了一朝独具的法治特点。^[39]

丁建军对宋朝皇帝诏求直言的功能和效果进行了研究,认为诏求直言在宋朝的主要政治功能是向臣民展示皇帝开明纳谏的明君形象。由于适应了皇帝塑造开明形象以及安抚遭灾民众焦虑心理的需要,特别是出于党争政治的需要,诏求直言便成为宋朝皇权专制体制下一种常见的政治文化现象。^[40]常沁飞对宋代“祖宗之法”形成原因

进行了探析,认为宋代“祖宗之法”经太祖、太宗朝奠基和真宗、仁宗朝发展而确立,对宋代政治统治及施政方略产生深远影响。宋代士大夫阶层在祖宗之法动态累积过程中充当了构建者、维护者、捍卫者、传承者的角色。^[41]寇欢对北宋奏议留中问题进行了考论,认为北宋时期,留中的奏议可分规定之内章奏处理方式的奏议留中、皇帝对奏议的随时留中以及大臣乞求留中三种情况。留中现象在北宋频繁出现的原因是政治制度运转过程中人为因素的介入。^[42]

李欣以《文昌杂录》为中心探讨了元丰官制问题,认为《文昌杂录》作为宋代笔记的一种,记载的是庞元英为官时的所见所闻。时值元丰改制,书中对新制记载颇多,是反映北宋元丰官制改革的重要资料。^[43]常沁飞对北宋宰相加官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北宋前期宰相加官类别有中书、门下侍郎、六部尚书、六部侍郎、侍中、东官官等十余种官衔。加官类型复杂多样,给宰相的加官既有荣誉官称,以彰显其身份地位,又有寄禄官,以提升其品阶及俸料。真宗、仁宗时期宰相加官到达高峰,宰相加官对宰相自身俸料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至神宗初年,宰相加官类型逐渐单一化,经元丰官制改革,宰相加官这一制度被取缔,逐渐淡出宋代职官舞台。^[44]崔玉谦对南宋重臣李宗勉的职官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利用《宋史·李宗勉传》《咸淳临安志·李宗勉传》以及《南宋馆阁续录》等文献进行对比,指出李宗勉于宝庆元年(1225)五月至三年五月添差嘉兴府通判。^[45]郑心蕾对北宋宗妇的社会地位进行了研究,认为皇帝比较关注宗妇的权益,对犯罪宗妇的惩治措施主要有削封邑、冠帔、勒住请授,严重的强制出家为尼或入道。在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宗妇是附属于丈夫宗子,离开夫家相应的地位和待遇也就随之丧失。^[46]陈瑞青对西夏时期的“替头”进行了研究,认为古代“替头”具有两重含义,一是与正身相对应的替身,一是与正员相对应的白员。明代以后,替头逐渐被顶首取代。西夏替头广泛存在于军队士兵和官府文吏之中,并非仅仅局限在官府胥吏。从职能上看,西夏南边榷场使文书中的替头是掇客或栏头的替身,具有双重身份,不能简单地称其为中介或代理人。西夏替头出现的社会原因主要在于解决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之

间的矛盾。^[47]

郭天翔指出南宋建炎、绍兴初年的京湖战区,国防形势严峻,中央对各支武装力量的掌控亦为不足,故而并无成型的统军体系。“稍复藩镇”中枢决策的实施使得战区内各武装力量在镇抚使兴废的过程中渐归统一,岳家军建制初步成型。对金和议达成后,南宋中央实现对京湖守军彻底掌控,罢除安抚使之外包括宣抚使、制置使在内的诸类使臣,始置都统制司管军,鄂州都统司成为京湖战区的最高统军机构。^[48]李子雄等对《军林兵人宝鉴》进行了研究,指出该书为宋代兵学家施子美所著,是一部中国古代军事理论著作。此书目前国内已亡佚,现存于日本市立米沢图书馆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全书有序言、上卷和下卷,近4000字,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等国军事思想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49]张勇对北宋陕西保捷军进行了研究,认为保捷军是北宋驻陕部队中主要禁军,在宋夏对峙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招配与拣退有严格要求,可从当地就地招募和其他部队中选拔,对退伍兵亦实施严格管理。保捷军的驻扎分为防御型和进攻型两种,对夏策略直接影响驻扎形式。^[50]常沁飞对宋代递铺兵法律权益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厢军体系中设立递铺兵的兵种作为承担递铺工作的主要人员。宋代递铺兵群体任务繁重,地方政府还会因财政窘迫而克扣其俸禄,并存在有官劳役过度等诸多不法问题。通过相关法律条文及实际执行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宋代法律促进了递铺兵群体享有权利的完整化及多元化。^[51]李建武对明代镇守内官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镇守内官是明代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代“双轨制”中内官体制在地方的集中体现。镇守内官设置范围的普遍性表明其得到国家的认可并加以推广,公署及其附属人员表明镇守内官体制的日益稳定及其权势的扩张。明代镇守内官体制在各地的运转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52]

(二) 经济史与环境史

关于城市史,王茂华、王曾瑜认为辽宋金时期,京津冀地区修筑了大量防御功能优越的城市与堡垒,城市多为重城结构,规模与形态依行政等级序列有差。堡垒多散布于辽金、辽宋边界两

侧。因受多重因素影响,城市频繁重建与摧毁,个别城市升降兴废明显,但总体呈现多极中心城市群并存,趋向以中都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模式。^[53]王茂华、张金花对宋朝城市公共空间夜晚秩序进行了研究,认为虽夜禁之令一直存在,但宋朝是唐朝以来相关管理最为宽松的政权,其城市公共空间夜晚秩序总体散漫。都城经历由禁到放的过程,地方城市禁放不一,总体宽松与官民侵夜而动多见记载。上元节等节日彻夜狂欢模式、夜市兴盛较为普及是宋朝城市公共空间活跃的重要体现。^[54]

刘明昱、李潇认为北宋时期丝绸之路有所恢复,但随着西夏、金、西辽帝国的相继兴起,至南宋时因重重阻隔不再是沟通东西方的主要商路。中原汉地的对外贸易也由陆地转向了海洋。原本流入中亚各国的金银,转向了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受到了很大打击。蒙古人统治丝绸之路地区后,商路恢复。此时,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的金银流通,主要体现在政府赏赐、斡脱商人的金银往来及民间商业的流通三个方面,并形成了以元朝政府行为下金银流出、民间商贸活动流入的特点。^[55]万明以明代以来霸州胜芳镇音乐会中的管子为例,对箏箏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研究,认为源自西亚波斯,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箏箏,经历千余年的流变,成为胜芳镇音乐会主奏乐器——管子。箏箏见证了丝绸之路文化的发展传承进程,管子蕴含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外文明交融的鲜明特色。来自域外的箏箏向管子的中国本土化重大转折——材质的变化也发生在明代,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外文明交融中不断发展、更新的结果。^[56]

柴勇等对典当业与中国传统农业再生产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产业低利润、生产高风险和信贷高成本的传统农业再生产的强烈融资需求推动了典当业的发展和普及。而典当业则对传统农业再生产资金链建构、便利化需要的满足和商品化程度、市场化能力的促进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典当业对传统农民的沉重剥削也严重冲击着传统农业再生产的进行。典当业对中国传统农业再生产的作用发挥所带来的生产自由、资本集聚、市场发展都将经由三位一体社会经济结构发挥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作用。^[57]

河北史学界还利用新发现的民间文献对清代社会经济问题进行了探讨,王中良、王菱菱利用《光绪曲阜增义典信稿抄本》对清代山东地区晋商当铺社会关系进行了探析,认为新发现的《光绪曲阜增义典信稿抄本》是反映清代晋商当铺与山东地区各种社会关系之间往来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具体包括山东藩司吏胥、同籍地方官员、票商、典当同业人员等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晋商当铺商业经营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对维护晋商当铺的经营环境,应对经营难题,降低经营成本,获取利润具有重要作用。晋商当铺与这些社会关系的联系体现了以“地缘”“业缘”为纽带,以权势为导向,以维护权益及应对经营困难为归结点的互动模式。^[58]他们还以《立账簿头绪》为中心,探讨了清代晋商典当业会计账簿组织,认为《立账簿头绪》总结了晋商典当业会计账簿的种类、记账方法以及簿记编制等内容,改变了中式簿记师徒口耳相传的传授方式,是对中国会计史上中式簿记的一种理论总结。^[59]刘新龙以鄂县《泰来恒租银账》为中心,探讨了清代关中乡村金融与农业经营问题,认为《泰来恒租银帐》显示出鄂县地区的区域自由租佃关系以及土地自由交易制度。泰来恒以字号身份出现,具有早期企业化的特点,是明清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商人地主自发形成的一种经营模式。^[60]

关于环境史,郭志安等对北宋黄河水灾防治中的相关审计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北宋时期为中国古代史上黄河水患颇为突出的一个重要阶段,相应的黄河水灾防治活动也相当频繁。鉴于黄河水灾防治动辄即需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宋廷在人力、物料、河堤修护等方面也有着相应审计法律的制订和审计举措的实施,借以保障黄河水灾防治活动的顺利开展与水灾防护成效的提高。^[61]他们还对北宋时期的黄河滩地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北宋时期黄河的频繁泛滥、多次改道,客观上造就了黄河退滩地的显著增加。伴随着民众对黄河退滩地开垦力度的增强,宋廷也逐步加强了对黄河退滩地的租税征收和管控,并将其运用到种植芟草、充实边地军储、安抚灾民、召集流民复业等诸多领域。^[62]

王晓龙等探讨了宋代地方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及政府治理举措,认为宋代地方工程建

设活动中,存在着对生态环境的损害现象,突出表现在各地官署修造、河道治理、围湖造田、矿冶开采等领域。面对这些情况,宋朝政府出台多种举措进行治理,如加强预算管理和审计,减少营造活动,惩治相关责任人,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等,从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63]秦国攀等探讨了两宋时期淮南地区自然灾害问题,认为宋代淮南地区以水灾发生次数最多,其次是旱灾和蝗灾。在灾害的时间分布上,北宋灾害发生次数要多于南宋。在受灾地域分布上,淮南东路受灾面积和频次要高于淮南西路。淮南地区伴生性和连发性灾害也较多见。^[64]

关于历史地理,李志影研究了北宋时期朝五台山路线,认为宋代朝台路线分别由东路镇州、南路太原、北路幽州、西路宁夏府路灵州四条路线去往五台山。^[65]吴晓杰研究了金代婆速路,认为金代婆速路位于金与高丽边境,是金朝边疆的重要行政区划和防御腹地。自保州路并入婆速路后,其承接了辽代保州路职能,统治当地熟女真,更成为金与高丽间的军事和外交重地。婆速路在行政上隶属东京路,在军事上与东京路平级,并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婆速路的沿革是金朝路制改革的反映,更是金朝兴亡的真实写照,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对金与高丽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66]

王宏斌研究了清代南海帆船海道,认为清代南海帆船海道历经多次变迁。由于南海岛屿命名时代不同,难免出现同名异处,同处异名等现象,各种书籍记载难免相互抵牾。在对中英文献资料进行比对和初步考释之后,可以看到清代中外航海者先后在南海开辟的帆船海道共有13条。^[67]他还对清中期山东的内外洋与水师巡洋制度进行了研究,指出如同江、浙、闽、粤等省一样,山东的近岸海域同样按照清廷的旨意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凡是靠近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内洋,凡是远离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外洋。由于帆船在黄海的海道距离山东海岸遥远,加之渤海全部划入内外洋,山东水师的内外洋十分宽广,东到黄海中部的黑水洋,北到渤海北端海峡之中间线,西到现在黄河入海口。^[68]

(三) 文化史与文献学

孙继民对《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6册全部汉文佛教文献(佛经正文除外)进行了文献

学整理,包括定名、题解、录文和校勘等。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内容全面、释读准确、格式规范的文本。^[69]

梁松涛对西夏文《宫廷诗集》进行了全面整理,对诗集的存世数量、版本、抄写时间等做了详细考订,对诗集中的词汇、修辞、用典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还对诗集反映的西夏历史以及对汉文化的借鉴吸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扩大了西夏文学史料的范围,为西夏语词汇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语料。^[70]

廖寅对宋六陵冬青树文化意义进行了研究,认为冬青树以其“冬夏常青”“寒凉守节”,自周朝以来即被赋予贞节女性的象征,但自至元二十二年(1285)宋六陵冬青之役后,冬青树被赋予了新的、更重要的文化意义,即忠义之象征。这种新的象征意义最初主要指代六陵冬青义役本身及其参与者之精神,随后此种意义逐渐上延下伸,扩展到文天祥、张世杰、岳飞和史可法等忠义之士。^[71]他还对宋真宗《劝学诗》形成过程及作伪原因进行了考述,认为《劝学诗》并非宋真宗的作品,而是出自下层士人,是由很多士人长时期共同完成,大致在宋末元初形成的。因为宋真宗的独特身份和对于科举制度的独特贡献,这一由许多无名士人集体创作的作品,其作者“最佳人选”无疑是宋真宗。^[72]

李胜奎认为王安石在治学上以义理解经,并把义理之学以科举的手段推向全国,打击了汉代以来的传注之学。王安石首倡道德性命之学,改变了宋初学者不知性命之理的现象,使道德性命之理走向学界。重视孟子,是王安石学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王安石已经不像宋初学者那样尊崇韩愈,而是超越了韩愈直接上承孟子。^[73]他还对荆公新学衰微探因进行了探析,认为北宋末年以来政局的变动,以及神宗以来党争持日旷久是其衰微的政治因素。新学内部后继无人,学无长进是其内在原因。而作为新学的反动派,理学的日益兴盛以致得到朝廷扶持是外部条件。^[74]王菱菱等对南宋地方政府的方志编修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南宋编修方志的刊刻由地方首要行政长官主持,参与编修人员多为基层文官和乡贤,编纂内容丰富,体例完备。方志完成后由政府出资或官员、民间资助刊刻发行。虽然部分方志存在失实的问题但是方志的刻印既有利于地方政府有效施

政,又有利于进一步宣扬官方思想,达到稳定宋代基层地方统治的目的,方志编修对地方文献的整理及保存也具有积极意义。^[75]王薇以《永清县志》为例,探讨了章学诚的方志理论和实践,认为《永清县志》在内容上体现了“方志乃一方全史”的主张,在体例上渗透了方志分立“四体”和“三书”的思想演变,是章学诚“志属信史”“经世致用”及“备国史要删”等方志理论的具体实践。^[76]

王昕认为辽代殿试成为常制始于重熙五年。辽圣宗效仿北宋科举制度,开始进行贡举改革。兴宗重熙五年殿试之后,科举殿试成为常制,皇帝对及第进士的恩赐仪式也开始制度化。辽代科举增设殿试后,及第进士通常直接释褐授官,像唐代那样比较严格的“守选”制度在辽代应没有形成。^[77]王慧杰对宋代真定府的教育进行了研究,认为宋朝真定府的官学修建在当地官衙附近,经费来源为政府出资和民间捐助,教学内容主要以经为主;人们普遍重视家庭教育,有些大家族延请名师大儒以教子,进而形成师承私学;境内的封龙书院教学级别高,教学形式灵活。因此,宋朝真定府的基础教育呈现出日渐普及的倾向,对培养国家人才,扩大统治基础和化育民俗都有重要的意义。^[78]

周永川对巫术在金太祖反辽建国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反辽建国过程中,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通过巫术,以异象、梦兆来塑造“卡里斯马”形象,树立个人权威及在政治军事中的领导权,利用巫术仪式组织和团结女真人,以鼓舞士气,促进了反辽战争的胜利和金朝的建立。^[79]孙连娣对金代射柳文化进行了研究,认为金代射柳活动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体育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演变受到多元体育文化因素影响。射柳活动具有一套完备的活动仪式,且有固定的举行时间和地点;在祭祀方面以拜天射柳为主要方式,并且与军事活动相联系,成为下层普通民众日常体育活动之一;且具有宗教祭祀、民族地域、军事色彩、娱乐竞技及融入节俗等文化特征。^[80]

关于黑水城文献研究,梁松涛认为西夏境内所流行的《乌鸣占》更多地带有中原文化痕迹,其所依据底本可能与《事林广记》所收《鸦经之图》有比较密切的关系。^[81]宋坤对黑水城所出

《慈觉禅师劝化集》作者宗贇进行了研究,认为宗贇虽出身禅门,但一生大力弘扬净土信仰,是宋代佛教世俗化的重要人物,并结合新出资料对宗贇的生平、交游情况进行了新的考证。^[82]文健以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基础,从僧官任命、试经度僧、寺籍管理和赐衣制度等方面探讨了西夏佛教管理中的中原文化特色。^[83]朱建路对元代议札文书进行了研究,指出议札文书与元代的圆议联署制度密切相关,增加了对圆议联署制度的认识。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照刷案牍的刷尾,为研究元代地方政府行政运作提供了新认识。^[84]

关于古籍公文纸背文献研究,孙继民等对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指出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的基本内涵是指位于册子类古籍书叶背面、以写本为主要构成的各类公私文档账册簿籍等的文献形式。基本类型有内文纸背文献、封皮裱纸文献、拓本裱纸文献和内文衬纸文献四种。^[85]明太仓州施贞石墓出土古籍《古今考》中存有散夹于各卷内的手抄文牍共14页,该手抄文牍性质为明嘉万时期太仓州太仓卫前千户所官员奖惩履历文册。其中“巡抚”“巡按”“巡盐御史”等官职的出现体现了明代御史“因事特设”的特点和巡查地方及考核官员的职责。该文牍在保存明代卫所官员履历资料和反映都察院御史考核卫所官员职能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物和史料价值。^[86]芷兰斋藏《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为清代公文纸本古籍,其纸背文献包含两种不同册籍,一为康熙初年山西地区重大司法案件的卷宗记录,一为康熙二十三年江西省各府州县的年度奏销册。为学界又提供了一批清朝前期司法档案文册以及康熙年间奏销文册的实物性资料,对于深化清代奏销制度和推进清代财政制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87]宁波天一阁藏《国朝诸臣奏议》为宋刻明印公文纸本,纸背公文均为明正德二年(1507)三至五月南京各卫仓场收纳税粮、马草及日常管理事务中形成的实用文书。在刊印《国朝诸臣奏议》之时,原始公文被裁剪,并造成了较为严重的错简问题。这批公文对于研究明代税粮的交纳及解运、卫所余丁的差役、明代公文制度等均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88]

陈瑞青利用新出土的宋元买地券资料,对宋

元时期祝文类买地券进行了研究,认为宋元时期出现的祝文类买地券是在祝文基础上吸收了买地券纪年形式、亡者家属信息、墓穴方位四至四兽、辟斥诸鬼邪神、荫益子孙等记述形式,并以“急急如律令”作为结语。祝文类买地券借用买地类地券的诸多表述形式,使本来没有买地内容的祝文类石刻形式上与买地类地券极其相近,这是宋人将这类石刻视作买地券的真实原因。^[89]张春兰、杨振北对内丘扁鹊庙宋代《重修神应侯庙记》进行了考释,认为此碑对于了解扁鹊庙的建立及重修情况,掌握当时主持重修官员的事迹以及考察该历史时期政府组织扁鹊庙重修的社会影响及意义都有重要价值。^[90]耿超对新出的《明故孺人李氏墓志铭》进行了研究,认为志文详细记载了孺人李氏的出身、婚嫁、妇德、子嗣等情况,有助于对明代女性教育与日常生活的研究,同时也为研究士大夫阶层的婚姻关系、出仕、交往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91]朱建路利用石刻资料对明清时期响堂山的修建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明代僧人在寺院重修过程中起组织作用或是重要参与者;清代重修寺院活动中出现士绅作为社首的“社”这样的组织,僧人在其中作用降低。这反映出明清长时段中响堂山所在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的变化及佛教的衰落。清代中期碑刻题名中出现越来越多商铺名称,反映了武安商人的兴起。^[92]

南炳文指出,徐乾学在清修《明史》时担任总裁官,其将很大部分列传初稿由繁改简,成98卷本《明史》一部,此部《明史》亦称《明史列传》。其书以简练为特点,并为王鸿绪、张廷玉等所继承、发扬光大,形成横云山人《明史列传稿》、抄本《明史列传稿》《明史稿及《明史》等简练本系统《明史》拟稿及《明史》定本。^[93]时亮将《明史》相关列传与各朝《明实录》、万斯同《明史》、王鸿绪《明史稿》等文献相对校,指出《明史》1974年点校本在吏部长官的仕途履历中存在官职讹误、脱漏及记时错误等问题。^[94]乔治忠对张居正编纂的《帝鉴图说》进行了详尽考订,指出该书编纂目的是以历史事例教导年幼的万历帝,由张居正亲自编纂和进讲,其中也隐含着他不但位居内阁首辅,还要身居帝师,为独揽大权准备条件。《帝鉴图说》对于万历帝的“启沃”,效果则走向了反

面,不仅未能培养出一位仁德、勤政的君主,而且这位皇帝最终也完全蔑视历史学的地位和功能。^[95]

(四) 医学史与民族史

马晴晴等以《宋史·五行志》为中心对宋代的防疫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宋代重视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推广,注重培养和提高全社会的疫病防控意识,在卫生防疫方面收到了积极成效,同时积累了不少卫生防疫的经验,甚至有些良方至今仍然被应用于临床。^[96]杨小敏认为宋代以前,黄耆主治痈疮、兼顾补虚,重在“遏病”,不被视为典型的补益药物。随着唐宋之际人们对植物类药物的深入利用,北宋中期至南宋末年,黄耆被不断赋予“补气”良药的理论地位。这变化既来源于汉唐以来杰出医药学家的拓展实践,也有赖于宋代官修药方和官办药局的认可普及。^[97]她还指出宋代是伤寒学积累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中经过汉唐八百年的隐约传承,宋代倡导“经方”的文人、分科实践的专业医家和习惯寻求验方的基层民众,三者以不同的旨趣关怀,合力推动伤寒学真正走向成熟。这三个群体在宋代的有所作为,不仅构筑起更加完善的伤寒学体系,也直接引导了金元医家寒温争鸣的医学空间和发展倾向,为之后伤寒学的独立设科奠定了充分基础。^[98]

梁松涛对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医方进行了系统的翻译和研究,先后发表《黑水城出土二则西夏文妇人产后医方考述》^[99]《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三则治恶疮医方考述》^[100]《黑水城出土二则西夏文治脾胃医方考述》^[101]《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治妇人乳病医方二则考述》^[102]《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古佚方“顺气化痰丸”考释》^[103]《黑水城出土两则西夏文治妇科病方考述》^[104]《黑水城出土二则西夏文治杂病医方考》^[105]这些医方的翻译和研究,对了解西夏医药学发展概况,研究中原医学与西夏医学之间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程彩萍认为明代宫廷医官精通医术,兼修儒学,依靠皇帝的信任与宠遇而在仕途上进阶。至明中后期,经世致用之风渐起,行医济世成为习儒之外人们步入仕途的另一门径。“传奉”等升迁方式使得医官群体快速增大,引起了文官的恐慌与不满。文官通过重定管理制度等

方式,对医官的选任、考察进行约束。而与朝堂之上的复杂处境不同,医官凭借医术与医德赢得士大夫交游圈的认可。^[106]周立志通过对南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记录的宋金交聘公务接待清单的分析研究,揭示了南宋地方政府尤其是平江府在宋金交聘公务接待中的角色和作为。^[107]蹇雪认为宋朝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为海上交通提供了条件,促使宋代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与高丽的往来大为密切,海难事故频繁发生。宋政府为彰显其仁德仁心和扩大市舶收入,对遭受海难的漂流人采取身份核查、人员安置、财产保护和送还本国等措施予以救助。^[108]

朱建路对帖木儿帝国使者所见天球进行了研究,认为所谓的“天球”应当指转轮藏。^[109]王俊才对明清之际回儒刘智宇的宇宙观进行了研究,认为清初的刘智绍,精研、细梳伊斯兰文化的精神实质,并结合对明清之际批判总结理学的理解,建构起中华“天方”思想体系,为伊斯兰教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110]

史伟指出清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末端,其政治制度将满洲贵族作为主体,沿袭传统王朝政治体系,将皇权作为政治核心,从而使政治制度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充满满洲民族的政治特色。清代建立的八旗合议、军权集中及清代后期新政治制度的建设对我国少数民族政治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111]张云霄等对“抚黎官”官职的缘起、演变及利弊得失做了探析。^[112]高艳林发表了《明代日本对华施为考辨》^[113]。

(魏建震: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冯金忠: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学刊》

编辑部研究员

陈瑞青: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张鑫,邹蓓蓓.邯郸及其周邻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初探[J].邯郸学院学报,2018(1).
- [2]任乃宏.砥柱山的崩塌与史前大洪水真相[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 [3]张怀通.乖伯簋与《世俘》文例[J].中国史研究,2018(3).
- [4]任乃宏,冯小红.“采石之山”与“走廊南山道”[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 [5]魏忠强.孟子以史论《书》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8(7).

- [6]张海.清华简《系年》四则春秋战国史事考[J].邯郸学院学报,2018(2).
- [7]冯小红.从清华简《系年》看侯马盟书的年代[J].邯郸学院学报,2018(2).
- [8]张润泽,范文华,黄楠.赵国武城戈及其地望辨析[J].邯郸学院学报,2018(1).
- [9]王红超.荀子的军事思想与秦末三次军事行动分析[J].邯郸学院学报,2018(3).
- [10]范文华.廉颇家族世系考论[J].邯郸学院学报,2018(3).
- [11]郭万青.《国语正义》稿本价值初探[J].文献,2018(4).
- [12]郭万青.高塘《国语钞》初探[J].邢台学院学报,2018(2).
- [13]郭万青.清代《国语》的传抄及版刻[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1).
- [14]郭万青.韦昭《国语解叙》初探[J].郑州师范教育,2018(1).
- [15]王士良.《国语》中的生态哲学思想述论[J].中央党校学报,2018(2).
- [16]王尔春.“赐姓”与“更姓”——与汉代宗室相关的姓氏变动现象解析[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5).
- [17]王尔春.汉代宗室的“世代规模”考[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8(1).
- [18]胥仕元.先秦儒道墨理想社会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9]李志亮.韩非子治国理论的逻辑[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20]臧明.刘向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继承与发展[J].衡水学院学报,2018(2).
- [21]陈鹏.汉代儒学建制与王权法统的整合及柱体精神的失落[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
- [22]邢铁.唐宋家庭经济运行方式的思考[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6-19.
- [23]邢铁.从两件吐鲁番文书说唐朝前期户等的依据和作用[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 [24]雷戈.变夷从夏——五胡政治观念实践分析[J].文史哲,2018(5).
- [25]许秀文,王文涛.东汉魏晋南北朝佛教慈善的滥觞与发展[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
- [26]张春兰.唐代城市环境管理初探——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考察[A].张祎主编.切德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沙龙论文集:第2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27]石冬梅.唐代死刑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8]朱安祥.学术史视野下的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J].中国钱币,2018(6).
- [29]郭万青.唐代类书引《国语》研究[M].济南:齐鲁书

- 社,2018.
- [30]张春兰.制度·空间·人口·故事——宁欣学术研究述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7-09.
- [31]孙继民,杨金廷.邯郸新出东魏北齐隋唐五代碑刻论文集[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
- [32]任乃宏,等.邯郸地区隋唐五代碑刻校释[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
- [33]梁春胜.北魏霍扬碑校考[J].文物春秋,2018(1).
- [34]王晓龙.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研究[M].科学出版社,2018.
- [35]王晓龙.论宋代地方政府行政成本问题的特点及启示[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5).
- [36]王晓龙,梁桂圆.宋代地方行政设施修建经费来源考论[J].宋史研究论丛,2018(1).
- [37]许伟宁,王晓龙.宋代地方政府公务接待问题研究——以成都地区为中心[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8(6).
- [38]胡明颖,王晓龙.宋代地方政府公务迎送制度考论——以迎送外使为中心[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8(5).
- [39]贾文龙,郑迎光.宋代地方治理中“短安长治”模式的生成[J].中原文化研究,2018(1).
- [40]丁建军,宋若岩.宋朝皇帝诏求直言的功能与效果[J].河北大学学报,2018(1).
- [41]常沁飞.宋代“祖宗之法”形成原由探析——以士大夫阶层为中心[J].西安航空学院学报,2018(4).
- [42]寇欢.北宋奏议留中考论[J].保定学院学报,2018(1).
- [43]李欣.宋代笔记中的元丰官制记载研究——以《文昌杂录》为中心[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8(5).
- [44]常沁飞.北宋宰相加官问题考论[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11).
- [45]崔玉谦.李宗勉馆职经历与添差嘉兴府通判考论[J].宁夏大学学报,2018(1).
- [46]郑心蕾.北宋宗妇的社会地位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2018(4).
- [47]陈瑞青.也说西夏“替头”[J].宁夏社会科学,2018(4).
- [48]郭天翔.南宋初期京湖战区军事领导体制变迁——以岳家军的起步与发展为中心[J].河北大学学报,2018,(5).
- [49]李子雄,王茂华.《军林兵人宝鉴》介绍与整理[J].军事历史,2018(2).
- [50]张勇.北宋时代的陕西保捷军[J].长江文明,2018(3).
- [51]常沁飞.论宋代政府对递铺兵法律权益的保障与维护[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8(1).
- [52]李建武.论明代镇守内官的设置、地位与作用[J].安徽史学,2018(4).
- [53]王茂华,王曾瑜.辽宋金时期京津冀地区城市空间形态与群体格局[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6).
- [54]王茂华,张金花.宋朝城市公共空间夜晚秩序[J].城市史研究,2018(2).
- [55]刘明昱,李潇.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间的金银流通[J].河北大学学报,2018(6).
- [56]万明.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承:筌筌在中国——明代以来霸州胜芳镇音乐会渊源考[J].河北学刊,2018(1).
- [57]柴勇,刘秋根.典当业与中国传统农业再生产——兼论“三位一体”社会经济结构[J].河北学刊,2018(3).
- [58]王中良,王菱菱.清代山东地区晋商当铺社会关系探析——以《光绪曲阜增义典信稿抄本》为中心的解读[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4).
- [59]王菱菱,王中良.清代晋商典当业会计账簿组织探析——基于《立账簿头绪》[J].财会月刊,2018(3).
- [60]刘新龙.清代关中乡村金融与农业经营研究——以鄠县《泰来恒租银账》为中心[J].西安航空学院学报,2018(6).
- [61]郭志安,王晓薇.论北宋黄河水灾防治中的相关审计[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11).
- [62]郭志安,王晓薇.论北宋时期的黄河退滩地[J].保定学院学报,2018(3).
- [63]王晓龙,常沁飞.宋代地方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及政府治理举措[J].宁夏社会科学,2018(5).
- [64]秦国攀,王丽歌.两宋淮南地区自然灾害考论[J].宋史研究论丛,2018(1).
- [65]李志影.北宋时期朝五台山路线研究[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8(4).
- [66]吴晓杰.金代婆速路探析[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8(3).
- [67]王宏斌.清代南海帆船海道考[J].安徽史学,2018(4).
- [68]王宏斌.清中期山东的内外洋与水师巡洋制度研究[J].晋阳学刊,2018(3).
- [69]孙继民.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佛经除外)整理[M].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
- [70]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71]廖寅.忠义之魂长存:宋六陵冬青树文化意义之演进[J].绍兴文理学院,2018(5).
- [72]廖寅.宋真宗《劝学诗》形成过程及作伪原因考述[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3).
- [73]李胜奎.论荆公新学之“新”[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8(1).
- [74]李胜奎.荆公新学衰微探因[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1).
- [75]王菱菱,刘潇.南宋地方政府的方志编修[J].河北大学学报,2018(3).
- [76]王薇.略论章学诚的方志理论和实践——以《永清县志》为例[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8(4).
- [77]王昕.辽代殿试考辨[J].文史哲,2018,(1).
- [78]王慧杰.宋朝真定府的教育刍议[J].北方文物,2018,(2).
- [79]周永川.异象、梦兆与仪式:论巫术在金太祖反辽建国中的作用[J].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8(1).

- [80]孙连娣.金代射柳文化考述[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2018(2).
- [81]梁松涛.西夏文《乌鸣占》考释[J].西夏学, 2018(1).
- [82]宋坤.黑水城所出《慈觉禅师劝化集》作者宗贇生平交游新考[J].西夏学, 2018(1).
- [83]文健.略论西夏佛教管理的特色——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例[J].西夏研究, 2018(2).
- [84]朱建路.黑水城所出元代议札文书探研[J].宁夏社会科学, 2018(2).
- [85]孙继民,张恒.古籍公文纸背文献学的内涵与外延[J].宁夏社会科学, 2018(3).
- [86]张恒,孙继民.明太仓州施贞石墓出土卫所武官档案考释[J].史志学刊, 2018(2).
- [87]田琳,孙继民.清刊古籍纸背新见康熙时期奏销册的内涵与价值——芷兰斋藏古籍纸背文书研究之一[J].邯郸学院学报, 2018(3).
- [88]宋坤.天一阁藏《国朝诸臣奏议》纸背公文复原与价值新探——以个人撰拟公文为中心[J].文献, 2018(2).
- [89]陈瑞青.略论宋元时期墓葬中的祝文类买地券——以百石斋藏新出宋元买地券为中心[J].宋史研究论丛, 2018(1).
- [90]张春兰,杨振北.内丘扁鹊庙宋代《重修神应侯庙记》考释[J].宋史研究论丛, 2018(1).
- [91]耿超.《明故孺人李氏墓志铭》考释及相关问题[J].北方文物, 2018(1).
- [92]朱建路.明清时期响堂山的修造活动——以现存碑刻题记为中心的考察[J].邯郸学院学报, 2018(3).
- [93]南炳文,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二——撰写简练得体张廷玉《明史》开路先锋之发现[J].史学集刊, 2018(2).
- [94]时亮.《明史》列传考误十七则——以吏部长官仕履为例[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8(1).
- [95]乔治忠.张居正编纂《帝鉴图说》及其在官方史上的建树[J].史学史研究, 2018(4).
- [96]马晴晴,吕变庭.宋代的卫生防疫问题——以《宋史·五行志》为中心的考察[J].医学研究与教育, 2018(5).
- [97]杨小敏.“遏病”与“补虚”:宋代黄耆药用重心的变化[J].医学与哲学, 2018(8).
- [98]杨小敏.宋人与伤寒学的崛起[J].中医药文化, 2018(2).
- [99]梁松涛.黑水城出土二则西夏文妇人产后医方考述[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年(1).
- [100]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三则治恶疮医方考述[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1).
- [101]梁松涛.黑水城出土二则西夏文治脾胃医方考述[J].甘肃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1).
- [102]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治妇人乳病医方二则考述[J].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4).
- [103]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古佚方“顺气化痰丸”考释[J].河南中医, 2018(6).
- [104]梁松涛.黑水城出土两则西夏文治妇科病方考述[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2018(2).
- [105]梁松涛.黑水城出土二则西夏文治杂病医方考[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2).
- [106]程彩萍.明代中后期宫廷医官生存状态探微[J].历史档案, 2018(3).
- [107]周立志.宋金交聘地方公务接待清单的发现与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8(1).
- [108]蹇雪.宋朝对高丽漂流人救助研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2018(2).
- [109]朱建路.帖木儿帝国使者所见天球考[J].中国史研究, 2018(1).
- [110]王俊才.回儒刘智宇宙观刍议[J].回族研究, 2018(1).
- [111]史伟.清代政治制度建设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J].黑河学院学报, 2018(2).
- [112]张昂霄,刘晓东.明代海南“抚黎官”与抚黎政策谏论[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8(3).
- [113]高艳林.明代日本对华施为考辨[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2018(1)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杨 瑞 王 坚

2018年,河北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数量稳中有增、整体质量较高,在《历史研究》等专业权威期刊发表高水平学术研究论文,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研究视野和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为繁荣全省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政治史研究

(一) 政治人物研究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近代中国

历史走向具有重大而深远影响,1924年孙中山抱病由粤北上牵涉到中国时局与内外关系的重大事件。杨瑞以主流报纸舆论为中心,对孙中山北上的“本事”与“叙述”进行深入细致考察,认为1924年孙中山北上关系到全国政治格局重组及其个人政治形象的再建构。回到历史现场,发现孙中山北上的事实本身及其本意,与南北不同政派和报纸舆论的观察、解读虽有部分吻合,但更多地呈现出来的是背离与错位。作者通过爬

梳相关史料,并以此历史事件为中枢尽可能地排比各相关方史事,正向寻绎“本事”转换为“叙述”的逻辑,反向回溯“叙述”还原“本事”,探源两者间的内在关联,不失为解读孙中山北上本意以及南北内外政治互动与演化的有效锁钥,从而得以揭示不同党派围绕新政治体系重建各种错综复杂的事实联系和内外影响。^[1]

郑孝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较复杂的人物,对近代政治、文学、艺术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李君立基于史学、文史结合,在客观评价前人研究和合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各方面、多类别文献资料,基本厘清了郑孝胥在1931年以前的生平经历,并以清末民初的时代大变局为背景,探讨了郑孝胥的“存在之由”与“变迁之故”,对其政治、社会活动以及相应的身份,做了客观而多层面的呈现,拓宽了以往认识的视野。^[2]

(二) 晚清政制研究

为加强对近海水域进行有效行政和军事管辖,清廷曾经谕令沿海各省将近海水域统一划分管理,其中问题错综复杂,很多未经厘清。王宏斌就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患与水师巡洋制度恢复、清中期山东内外洋与水师巡洋制度、清代南海帆船海道进行了仔细考察,认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内外洋面海匪活动十分猖獗,官方采取多种措施,试图恢复水师巡洋制度,但收效甚微,事实证明清水师无力镇压海匪活动。基于疏防责任和被惩办的各种压力,福建和广东的一些文武官员开始与英军尝试合作。中英海军联合镇压海匪的做法,尤其是英国海军在中国洋面参与的缉匪行动和护商活动,不仅破坏了清代前期建立的巡洋制度,同时也损害了中国的近海行政和司法管辖主权,而且导致中国内洋与外洋的管辖观念日渐模糊。^[3]认为就清中期山东的内外洋与水师巡洋制度来说,其近岸海域同样按照清廷的旨意划分为内洋和外洋。凡是靠近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内洋,凡是远离海岸的岛屿和洋面均划入外洋。由于帆船在黄海的海道距离山东海岸遥远,加之渤海全部划入内外洋,山东水师的内外洋十分宽广,东到黄海中部的黑水洋,北到渤海北端海峡之中间线,西到现在黄河入海口,宽至百余公里,或数百公里,广至三千余公里。^[4]就清代南海帆船海道来说,海道变迁是随着海内

外贸易的对象和航海技术水平变化而变化的。清代南海帆船海道历经多次变迁。由于南海岛屿命名时代不同,出现同名异处,同处异名等现象,各种书籍记载相互抵牾。在对中英文献资料进行比对和初步考释之后,可以看到清代中外航海者先后在南海开辟的帆船海道共有13条。^[5]

(三) 晚清政局研究

“东南互保”是影响晚清政局走向的重大事件之一。董丛林对此考察认为,“东南互保”清朝方面的涉局人员中,角色状况颇为复杂,试分作策谋、主持、加盟等类型。刘坤一、张之洞是局内共同决策、主持的大员,其职分条件和作用上亦有细微差别;而李鸿章、袁世凯就此局而言只是“加盟”者,但在其中乃至更大局面上有着各自的特殊角色,发挥着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东南互保”成为抗衡清廷抚用义和团、对外开战的一种应对时局的“模式”,这在当时清方的政治格局中特别凸显,是只能存在于特定情势下的一种政治景观,但又直接牵系着政治格局的后续演变。^[6]晚清时代由于时势变化,中央与地方权力不断重组形成“内轻外重”格局。董丛林从宏观比较视野审视晚清“内轻外重”成局,认为自中国帝制王朝开启直至清前期的长时间里,皇权专制与中央集权相辅相成所呈现的权力格局,是以“内重外轻”为典型样态。及至晚清时势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在外患“内忧”交相作用之下,朝廷陷入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其权威大大削弱;而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契机,湘、淮集团势力崛起,特别是形成军政结合的实力派督抚群体,其权势上较以前疆吏显著增强,遂出现“内轻外重”之局,这由多个方面反映出来。^[7]

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一) 抗战史、解放战争史研究

1933年察哈尔抗战是抗战史上较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段智峰等对国民党要人胡汉民与1933年察哈尔抗战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察哈尔抗战是胡汉民运筹许久的南北共同倒蒋计划的组成部分,胡是察哈尔抗战得以兴起的关键策动者。冯玉祥、方振武崛起时,胡汉民依计划力促陈济棠反蒋,出兵呼应察省,陈不仅按兵不动,

而且对援察抗日消极以对。胡、陈博弈，以胡挫败告终，察哈尔抗战遂入孤军绝域之境，迅疾遭到南京弹压。察哈尔抗战的历程，特别是结局，对胡汉民个人及其领导的反蒋抗日活动，都产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影响。^[8]

在中国现代革命和中共军政建设史上，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是一个重要里程碑。把增强对目前学界研究状况进行深刻反思，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论者出于强烈的现实关照和学术敏感性不断展开探讨，积聚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既有精兵简政的专题资料汇编，也有精兵简政的相关资料汇编，间或涉及精兵简政的各类论著以及专论精兵简政或涉及精兵简政有关问题的论文。具体到相关研究内容，无论是宏观论述，还是微观探讨，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并不乏精到之论。但仍有不少问题乏人关注 and 探讨，业已引发关注和探讨的研究领域也仍有可深化余地。^[9]

杨豪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为中心，对华北解放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根本性置换和相关社会观念和社会认同变迁进行了考察。认为翻身运动在较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身体的革命”，因为只有身体的“翻身”才是最终意义上的翻身。通过规训、控制身体，华北解放区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实现了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根本性置换，审美、名字等跟身体相关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认同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身体更成为构建革命合法性和实现国家权力下移的一个重要因子。不过，中共政权规训身体、遮蔽身体的实践在华北解放区的革命进程中也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借助翻身运动的革命机制，革命场域下的身体逐渐走向了组织化与革命化，但是乡村传统依然制约和塑造着革命身体的历史演变形态。^[10]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代雅洁以福建、湖南、贵州为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剿匪工作进行考察，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贵州等地的匪患异常严重，共产政权采取了积极的应对与治理之策，通过强化党的领导，以人民战争的方针，坚持军事打击、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相结合，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了历代为患的土匪问题。在“党政军民”人民战争的系列链条中，

以华北南下干部为主体的地方干部则是这其中的重要一环。华北南下干部来自于华北老解放区，武装斗争和地方治理的经验非常丰富，政治觉悟较高，因此肩负着配合军队剿匪、开展政治攻势、培养本地干部、发动群众、收集情报、组建地方武装等方面的责任。经过剿匪实践，共产党政权开始真正嵌入南方新区的基层社会，中央权威逐步树立，并为新区土改运动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条件。^[11]

范铁权等对1956至1965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国旅行进行考察，认为中国政府组织旅行团出国旅行，由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和各分（支）社负责具体实施。这一时期的出国旅行已初步具备现代出国旅游的基本特征，可以视为当代中国组织出国旅行的开端。1956—1965年间的出国旅行是当代中国开展外交关系的产物，反映了中国希冀增进国家间相互了解和往来合作的美好愿望及政治目的，难免更多带有国家计划的成分，在人员选拔、出行前准备、参观内容、旅行总结等方面均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性，旅行者个人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压抑。但客观而论，它为之后中国政府不断完善出国旅行机制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诸多值得参考鉴戒的经验及教训。^[12]

三、经济史研究

（一）金融史研究

刘秋根等以清光绪中期的商业金融业调查报告《人地纲目》为例，考察放账铺的经营与近代华北农村金融。认为以灵石商人为主的山西商人在直隶开设了大量的各行业字号，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应与放账有关，可能是兼营放账的字号。他们还在河南东部及相邻的山东、安徽、江苏一些府县城市及乡镇开设了大量的放账铺，这些放账铺既有独资开设者，也有以多种多样的合伙形式开设之例。它们采取一家多处设店，或开设支店的办法扩张资本，每家字号资本总规模并不大，其股份转移比较频繁，其业务形式主要是放乡账——即在乡镇对农村居民放款。这应该满足了一部分农村金融需求，对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3]

肖红松等对1963年11月至1985年1月期间农业银行接办和开展财政对农业拨款监督工作的历史进行了考察，认为，为加强对国家支援农

业资金的管理,自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央决定开始着手接办财政对农业拨款的监督工作。中国农业银行在第三次存在期间以及第四次成立后,克服诸多困难接办和开展了对农业拨款的监督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果。分析阐述农业银行接办和开展财政对农业拨款监督工作的做法、成效及面临的问题,旨在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管理支农资金的使用,以适应农村金融市场的多样化要求。^[14]

(二) 华北区域经济史研究

华北财团为民国初期以官僚军阀私人资本为主体的特权资本集团,活动范围以京津为中心,遍及华北、东北等北方地区。康金莉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1912至1927年华北财团产业投资整体规模与分布进行较为精确的估计与分析,同时系统梳理华北财团产业资本体系,认为北方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华北财团以其资金与特权优势,成为北方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投资力量。华北财团总体未形成对北方民族资本主义的垄断地位,资本分布呈现较强的行业与区域差异;为近代北方地区民族产业资本主义发展起到资金支持作用,但亦存在对普通民族产业资本的排挤。虽然华北财团在民族资本中居首位,但仍远逊于外商资本规模。^[15]

杨昊等以北京琉璃厂旧书业为例,考察了冀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认为清末琉璃厂旧书业从业者多为河北人,形成了“以书为媒,以书会友”,广交文人学者的独特经营方式。他们聚书流通,致力于中国传统典籍的搜求、挖掘、保护和传播。由商而士,编书撰文,是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形成了著书编目的优良传统。这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对近现代中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6]

(三) 近代工商业研究

刘秋根等以晋商《宣统三年转本底账》为中心,对清末北京印局及其对工商业的放款进行了考察,认为从明代开始,印子钱便在城乡普遍存在。清代以后,印子钱经营者开设固定的机构,走向专业化经营,其业务在继承原来对城市贫民及小商小贩放贷的同时,开始对工商业中中小字号进行资金放贷,从而在清代传统金融机构的诞生、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工商业放款

业务对城市工商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7]

李中庆对全面抗战前“桐油危机”的产生与演化进行了细致考察,认为全面抗战前十数年,在世界局势日益紧张化的态势下,作为重要军事战略物资的中国特产桐油,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出口贸易逐渐走向兴盛。吊诡的是,与此同时“桐油危机”论却屡见报端。持此论者认为中国桐油产业因为不够现代化,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加之美国试植桐树,担心桐油重蹈丝茶衰微的覆辙。其目的旨在推动政府与桐油业者对桐油产业进行改良,以巩固并扩张其国际市场地位。“桐油危机”是报刊舆论基于未来的预期,成为政府和桐油业者在讨论桐油产业时的重要话语。政府与桐油业者在使用“桐油危机”时表现出不同的目的,使得“桐油危机”一定程度上演化成为二者实现自身诉求的工具。^[18]

学徒制是商铺内部劳动组织的基础。卢忠民对民国时期北京五金商铺学徒制进行了考察,认为北京五金业作为新兴行业,仍多沿袭传统行业学徒制的一般规定。五金商铺学徒籍贯多集中于河北枣强县及其周边县,即当时冀州所辖县区。学徒一般都上过学,有一定文化功底,十五六岁的孩子当学徒为最佳年龄。学徒一般出身中农以上家庭,其日常工作比较繁杂,无工资,到春节有馈送。学徒制利于商铺节省管理成本、培养与储备管理人才。^[19]

肖红松对1933—1937年间华北白银走私与中国各方应对进行了考察,认为日本政府借助美国白银收购政策所引发的中国白银外流之机,利用在华北攫取的特殊权益和外交军事威势,庇护日韩浪人走私白银,使华北地区成为中国白银走私的“最大漏洞”,藉此破坏中国金融秩序、削弱中国财力,以增加侵华的财力。中国政府实行提高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政策,联合外资银行遏制白银合法外流。在防止白银走私方面,国民政府及华北地方政府、津海关、北宁铁路局颁行多项法规,压缩商民携银出境额度,实行运银领照制,并开展有限度缉私,加强关路合作稽查,寻求日方协助禁运。以上举措在限制本国商民走私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对涉日走私案件的处置表明中国政府与虎谋皮。^[20]

郑清坡以民国以来定县为例,从基层集市演

变透视了农村发展路径,认为民国以来,定县集市数量逐渐增多。集市的演变深受政治环境和市场化程度影响,也与农民的市场行为紧密相关。农村改革以来,基层集市呈现出定期消费集市和专业化市场的多元化演变,由集市向城镇发展的趋势并不明显,集市功能也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转变。从定县的实践来看,集市演变更多的是农民适应农村市场化的主动应变。农村本身的发展仍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途径。^[21]

四、社会、学术思想史研究

(一) 乡村、城市史研究

杨学新等基于冀南西豆庄村的实证分析,考察了中国农村畜力的百年变迁,认为近百年来,西豆庄村畜力的变迁大体经历了一个“M”型的发展轨迹,即从民国时期的严重不足,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快速发展和1970年代中后期的逐步缩减,再到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短暂繁荣,直至近年来全面退场。畜力与人力的消长和共存、畜力与机械力的反复和更替说明,中国农村农业技术条件的进步是一个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22]

肖红松等对1840至1937年间白洋淀区域的村庄、集市与社会变迁进行考察,认为以白洋淀区域村庄演变的历史脉络为线索,来考察该地区以水为中心的生产生活与当地集市之间的关系。淀区人民作为集市的消费者与产品供应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集市的发展。此外交通变更、政府引导、战争等也是该区域集市兴衰的因素。在村庄、集市的兴衰间,淀区民众的社会生活发生着迟缓但持续的变化。^[23]

蔡禹龙对清代杭州城市文化的空间记忆进行了考察,认为深度挖掘城市文化传统有助于体现城市的文化品位。城市文化的变迁伴生空间记忆,地理学意义的街区空间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空间进一步诠释文化空间的内涵。作为空间存在的街区,承担着文化记忆的功能。民俗文化、教育文化、报刊文化的嬗变促成了文化街区的产生与消失,从而使街区文化表现出新的特征。灯市、端午竞渡、温元帅庙会等民俗活动是空间顺序感与集体记忆的交织,以行动轨迹为表征的空间流动打破了城市区域化的分割状态。以新式学堂为载体的近代教育、以报刊为载体的媒介传

播,构成了近代街区文化空间的主体,是城市空间“去昧化”的转变,是文化嬗递的重要印迹。^[24]

(二) 社团史研究

民国社团研究历来受到学者的充分重视,研究论著时有推出,研究范围和质量不断提升。中华农学会是近代以来历史最久、组织最稳固的全国性农学团体,见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寻求农业问题出路,由“技术”转向社会组织改进、社会制度变革的历史。杨瑞致力于整体观照下的社团个案研究,为民国社团研究提供可供资借鉴的新路径,书中引用大量未刊档案,结合报刊、方志、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当事人回忆等资料,全景式重建中华农学会发展演变的历史,深入探讨其组织源流、人脉联系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揭示其不同时段的历史特质和时代影响。通过梳理近代农业知识与农业制度转型的内涵和过程,本书对农业如何由技术问题演化为社会改造问题,对变革农村旧式生产关系、陈腐社会制度,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启示。^[25]

范铁权对中华学艺社“定居”上海和办学实践及其启示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华学艺社的前身——丙辰学社,1918年留日学生纷纷归国,上海商务印书馆为陈承泽、郑贞文、周昌寿等社员提供了安身之所。1920年前后,中华学艺社迁回上海,组建上海事务所及其他机构,曾出版中华学艺社的刊物、丛书,为学社提供了阐发言论、学术交流的平台。^[26]中华学艺社多途径向国人传输文化知识,致力于推进现代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陆续开办学艺大学、学艺中学,因受各种因素制约多以失败告终。^[27]同时对抗战时期的中华学艺社进行了考察,认为抗战爆发打断了该社团的发展步伐,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中华学艺社积极应对,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支援抗战;另一方面克服困难迎接抗战的胜利。此间多数社员直接或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亦有少数社员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28]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边疆情势危急,诸多边疆团体应运而生,中国殖边社即为重要的一个。范铁权等考察认为,该团体自1931年成立以来,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创办《殖边月刊》、创建图书馆、发行图书、开展边疆考察、

投身抗日救国活动等。围绕移民殖边、边疆教育、开发西北等方面，该社阐发了诸多主张。该团体的成立切合了当时边疆危机、国人要求保卫边疆需求，对当时以及后世的中国边疆开发及边疆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9]

（三）农业、水利与灾荒史研究

晚清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光绪年间尤为严重。把增强对晚清重臣张之洞备荒举措及其成效进行了考察，认为张之洞对于备荒问题始终极为重视，尤其是执掌一方后，每到一地均针对当地特点采取了有效的应对之策，主要有建仓积谷以备饥荒，开垦荒地、均减差徭，修堤防洪、兴利除害，禁种罌粟、推广桑棉，改善交通、发展通讯等。张之洞的备荒举措，既重视前人，又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展。这种理论结合实践所提出的备荒主张极具价值，其实践效果也颇为明显，值得肯定。但其实施效果并非尽如人意，其原因一方面与具体办事人员办事不力、主政官员更迭及政策未能及时跟进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与传统社会中地方百姓对新事物、新方法的抵触行为密切相连。^[30]

卜凯作为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为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杨学新等对卜凯视阈下的1931年江淮流域水灾调查进行了梳理，认为卜凯采用样本采样与农户采访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对1931年江淮流域6省90县农家的受灾农田、役畜、房屋、死亡与流离人口等方面进行调查，并提出诸如建立农产预测报告机构、设立常设调查机构以及防灾保险等方面的建议。^[31]杨学新还运用文献法和田野调查法，对卜凯一生的国内外著述进行了认真梳理，多次深入到卜凯曾经开展的河北农村进行回访调查，并对卜凯的后人保罗先生及其学生的子女等进行了走访，对卜凯生平及其关于中国农业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在中国的农业改良及其推广活动、关于中国农家经济与社会状况的调查、卜凯视阈下的中国农业区域生产与环境、南北方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其水旱灾害的防治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考察。^[32]

（四）医学史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纷纷探求解决卫生落后问题。范铁权等以定县、清河为中心，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北省的“卫生实验”进行了

考察。认为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公共卫生工作，专设卫生部统管全国卫生行政事务，并倡导创立卫生行政实验区。河北定县、清河两地围绕学校卫生、妇婴卫生、疫病防治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改善了乡村卫生状况，为国内其他地区的卫生建设提供了经验。^[33]王胜对1958年至1964年河北伤寒疫情的政府应对进行了考察，认为在“大跃进”运动中，河北是华北地区伤寒疫情发病最为严重的一个省份。虽然省内各级政府采取多项措施，但并未能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大跃进”运动期间过分强调生产，“抓了工作，忘了生活”，而随后的大饥荒又使疫情加重；二是调整时期大量社队医务人员被精减下放，防疫措施难以落实。^[34]

（五）妇女史研究

《妇女杂志》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妇女史材料，任文京、刘伟娜对杜就田主编《妇女杂志》征文中的女性风貌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一时期征文第一次将女性作为传播主体，以生活性、文学性和浅近性为传播特点，以两性关系和时髦语境为角度展示了1920年代后期的女性生活状态、思想状态和情感状态，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女性文化传播模式，为当今女性媒介培树女性情怀，还原并宣扬真实的女性主义，以理性思维和女性视角审视和反思整个社会文化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35]该杂志刊载有关女性的图像超过1000幅，主要分为摄影图片、多彩广告图片、手绘插画三类，出现在杂志封面、栏目、内文和广告中。考察认为，图像展现了崇尚时尚的新生活方式、追求平等的新两性关系、走向社会的知识女性的民国新女性风貌。^[36]

（六）学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学术与知识体系转型中，由“四部”到“七科”之学成为其重要标志之一。李敏对戊戌东渡后梁启超与“文学”概念转变之间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在近代中国“文学”演变的历程中，日本明治时期新观念的输入具有重要意义，戊戌东渡后的梁启超在其中发挥了引介导向作用。在梁启超的文字著述中，“文学”的含义随语境而变化，并非固定一成不变。在日本新观念影响下，出于国民国家改造的现实需要，原本受到轻视、属于不同性质范畴的诗文、小说、戏曲成为“文学”的重要成分，甚而发出“小

说乃文学之最上乘”的宣言。由梁启超引发的关于输入新学的论争中，“文学”成为论争理据，显示出同时代人的“文学”观具有共同的来源与内涵特点。^[37]

胡适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李长银对胡适的《诗经》研究进行了考察，认为一部近代《诗经》学史即是一部《诗经》学由传统向近代过渡与转型的历史。胡适的《诗经》研究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起到了近乎奠基的作用。^[38]作者还对钱玄同“六经与孔子无关”说进行了梳理，认为此说虽是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正式提出来，但其形成却经历一个过程。至于钱玄同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惑经”之说，一方面在于其“兼通今古文而又对今古文都不满意”，另一方面则在于其对“辨伪”之学的重视。此说一经问世，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殊为学者所重视”。直到当下，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问题仍然作为一桩悬案困扰着学术界，但钱玄同提出的这一学说不失为探讨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一个代表性论说。^[39]

近代中华民族迭遭列强凌辱及其抗争屡受挫折的灰暗记忆，导致了部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片面认同乃至膜拜有加，而对本土传统文化则多有否定甚至信心缺失。武吉庆等对由此信心丧失而导致的历史认知若干误区进行考察，认为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意义和有效解释能力毋庸置疑，但其在抽绎历史规律和诊释宏大问题的同时，往往也遮蔽了繁富历史之“执拗的低音”，淡化以至无视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历史面相。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应该被客观认知并着意接续。唯物史观的运用条件和作用场域并非漫无边界，诸多理论和方法之中的合理因子应被客观扬弃。“了解同情”的历史认知态度，或许有益于今人关于中华传统文化之“后见之明”的矫正。而欲走出历史认知的多误区，不断创新史学理论和方法固为精要所在，但持守与弘扬中国史学之优良传统，当亦为其题中应有之义。^[40]

董丛林对近年学术界颇为流行的近代中国历史“阐释”问题进行梳理，认为“阐释”与“理论”问题紧密关联，不可割裂。“理论”包括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同时也涵盖阐释本身的理论；而“务虚”，就是指理论务虚，不是贬义

的空虚、虚浮、虚假之“虚”。从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现实情况来看，通过强化理论务虚来强化“阐释”是非常必要的。^[41]此外还对民间文献、地方文献的界定与利用问题进行了辨析，认为应该按照定义须能反映该事物本质属性的原则，界定“民间文献”和“地方文献”的根本要素，当分别是其“原始民属”和“原始地属”，而非存藏处所。在利用层面，应“斑”“豹”（略同于点与面、局部与整体问题）兼顾，由二者可知“斑”本身之外，亦应有借以“知豹”和由“豹”反观此“斑”的更高境界追求，这离不开与其他多方面、多种类文献的有机结合利用，并且对某一文献作者的角色特征也需要清楚和妥适把握。^[42]

（杨瑞：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王坚：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杨瑞.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北上的“本事”与“叙述”——以主流报纸舆论为中心[J]. 历史研究, 2018(5).
- [2] 李君. 1931年前郑孝胥[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3] 王宏斌. 论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海患与水师巡洋制度之恢复[J]. 近代史研究, 2018(2).
- [4] 王宏斌. 清中期山东的内外洋与水师巡洋制度研究[J]. 晋阳学刊, 2018(3).
- [5] 王宏斌. 清代南海帆船海道考[J]. 安徽史学, 2018(4).
- [6] 董丛林. “东南互保”相关事局论析[J]. 晋阳学刊, 2018(2).
- [7] 董丛林. 宏观比较视野下晚清“内轻外重”之成局,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2).
- [8] 段智峰. 胡汉民与1933年察哈尔抗战[J]. 历史教学(高校版), 2018(1).
- [9] 把增强. 鉴往知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精兵简政研究之省思[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3).
- [10] 杨豪. 身体的革命与革命的身体——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为中心的考察[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1).
- [11] 代雅洁. 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北南下干部与南方新区剿匪工作研究——以福建、湖南、贵州为例[J]. 党的文献, 2018(3).
- [12] 范铁权, 王素君. 旅行、政治与外交: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出国旅行(1956—1965)[J]. 河北学刊, 2018(2).
- [13] 刘秋根, 张鹏. 放账铺的经营与近代华北农村金融——《人地纲目》解读[J]. 新史学, 2018(3).
- [14] 肖红松, 赵富春. 关于农业银行接办和开展财政对农业拨款监督工作的历史考察(1963.11—1985.01)[J]. 金

- 融理论与实践,2018(1).
- [15]康金莉.华北财团产业资本体系研究(1912—1927),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 [16]杨昊,刘洪升.冀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以北京琉璃厂旧书业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17]刘秋根,陈添翼.清末北京印局及其对工商业的放款——以晋商《宣统三年转本底账》为中心[J].人文杂志,2018(3).
- [18]李中庆.全面抗战前“桐油危机”的产生与演化[J].史学月刊,2018(9).
- [19]卢忠民.民国时期北京五金商铺学徒制[J].城市史研究,2018(2).
- [20]肖红松.1933—1937年间华北白银走私与中国各方应对探析[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 [21]郑清坡.从基层集市演变透视农村发展路径——以民国以来定县为例[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3).
- [22]杨学新,王晶.中国农村畜力的百年变迁——基于冀南西豆庄村的实证分析[J].河北学刊,2018,(4).
- [23]肖红松,王永源.白洋淀区域的村庄、集市与社会变迁(1840—1937年)[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 [24]蔡禹龙.解构与变迁:城市文化的空间记忆——基于清代杭州城的分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 [25]杨瑞.中华农学会研究:农业现代性因素的接引(1916—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 [26]范铁权.中华学艺社“定居”上海考[J].学术界,2018(7).
- [27]范铁权.中华学艺社的办学实践及其启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28]范铁权,柳丽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殖边社[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1).
- [29]范铁权.抗战时期的中华学艺社[J].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3).
- [30]把增强.未雨绸缪:张之洞备荒举措及其成效探研[J].安徽史学,2018(2).
- [31]杨学新,高志勇.卜凯视阈下的1931年江淮流域水灾调查[J].中国农史,2018(5).
- [32]杨学新.卜凯与20世纪中国农业变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33]范铁权,单伟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河北省的“卫生实验”——以定县、清河为中心的考察[J].民国研究,2018(1).
- [34]王胜.国家缺位的防疫——1958—1964年河北伤寒疫情的政府应对[J].医疗社会史研究 2017(2).
- [35]任文京,刘伟娜.杜就田主编时期《妇女杂志》征文中的女性风貌[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 [36]刘伟娜.《妇女杂志》(1915—1931)图像中民国女性风貌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8(10).
- [37]李敏.戊戌东渡后的梁启超与“文学”概念的转变[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 [38]李长银.“新眼光”与“新方法”:胡适的《诗经》研究[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2).
- [39]李长银.非破无以立:钱玄同“六经与孔子无关”说考论[J].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8(1).
- [40]武吉庆,王一凡.遮蔽、越界与后见之明——论历史认知的若干误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 [41]董丛林.务虚·求实·创新——有感于近代中国历史的“阐释”问题[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 [42]董丛林.民间文献、地方文献的界定与利用[J].河北学刊,2018(4).

世界史研究

王向鹏 倪世光

一、世界古代史

赵克仁对法老与埃及生态文明进行探析。认为埃及文明是人类古典文明之一,其内容不仅限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包括鲜为人知的生态文明。由于埃及社会的农业属性,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关系农业的收成、政权的稳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法老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地位,

通过制度建设将生态意识灌输给民众,较为成功地构建了生态文明社会,使埃及文明长达3000年经久不衰。^[1]赵克仁还分析了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异质性及其原因。认为希伯来文明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埃及文明的精华,但其已完成了历史性的超越,与埃及文明属异质文明。尤其是二者在国家政治体制、经济秩序、道德法律、宗教信仰和文化属性等方面都存在质的区别。这些区别形成的原因有历史因素、民族因

素、宗教因素，还有生活方式与活动地域的影响。因此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关系充分体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点。同时希伯来文明又被后来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继承，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埃及文明对人类历史进步与文明演进所作的贡献仍值得我们敬仰。^[2]

马月兰对亚伯拉罕之妾夏甲的艺术形象进行重塑。在圣经描绘的所有人物中，夏甲的身份最为特殊，她是一个“三重大山（女人、异族、奴隶）”重压之下的弱女子，夏甲的多重母亲形象以及母子二人的悲惨命运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激发了不少西方艺术家的创作灵感。科扎、提埃坡罗和卡桑对荒野中夏甲的艺术重塑，以各具特色的表现风格歌颂了母爱的伟大。尽管人物的呈现方式不同，但都突出了夏甲无私奉献、自信坚定、不畏磨难的多元之美。^[3]

王琳、王向鹏等的专著《世界古代历史文化拾珍》一书，介绍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和波斯等地区的古代文明。作者认为世界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是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相互融合的，这种横向的动态联系从来未曾改变过。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是持续性的，从无到有，由原始、蒙昧到文化文明，从部落到王国，从王国到帝国，从石器到青铜、金石并用，再到铁器，乃至近代以后的工业化革命，都是如此。自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之后，农本文明与游牧文明间的交往、互动、冲突就一直延绵不绝，也是一条影响世界发展演化的重要线索。此外，东西方间，横跨中亚草原，由西域到君士坦丁堡，再到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丝绸之路，都是贯穿历史长河的恒久线索。因此失去的往昔、世界的过往，自然会成为历史的镜子，可参鉴、可怀念，更可实现解释今日世界、预见世界发展趋势之终极关怀的现实愿景。^[4]

苏剑光分析了古希腊神话和西方文化的关系。古希腊神话成型于公元前八世纪，记载了诸多神、英雄和人的故事，对西方文学的主题、形象、原型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是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源头和永恒参照系。作者认为古希腊神话不但影响了西方文学世界对文学作品及文本的理解，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西方作家。诸多作家或借鉴了古希腊神话的故事架构，或重塑了某个英雄角色，或续写了某个神话故事，或赋予了自

己的作品神话的内涵或寓意。同时在民族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层面来看，古希腊神话故事为东方文化或者东方世界了解西方提供了参照系，是全人类文明、文化、文学的源头之一。^[5]

周中新探讨了圣经中的传统节日观在基督教的圣经中，记载了重要传统节日的设立，以及节日纪念的目的和意义，这些节日一般包含感恩、赞美、团圆等内容。中国传统节日的本质也是如此，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对大自然的感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国泰民安和家庭幸福的祝愿。虽然二者有着不同的节日和习俗，但是其内涵精神是一致的。在当今基督教中国化的大语境下，基督教应该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相适应、相融合。历史上，基督教也曾进行过很多次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探索和实践，提出了“合儒”“补儒”等思想，希望将基督教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使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与中华文化相融合。这些对于中国基督徒如何看待和过好中国传统节日，具有借鉴意义。^[6]

二、世界中世纪史

刘程从中世纪大宗贸易视角入手，探析了北欧贸易区成型的溯源。中世纪盛期欧洲社会的物质积累激发了商品交换活力，引发了“领主—农民”二元结构和庄园经济的解体，“黑死病”后社会经济结构再调整，物质积累和消费水平复增，市场交换成为常态，国际市场体系得以优化重组，北欧地区出现了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地理分工，确立了大宗贸易的内容和运行体系。14至15世纪专职贸易的汉萨商人建构起一个东起俄国、西至葡萄牙，北抵冰岛，南达意大利的贸易帝国，标志北欧贸易区初成。尼德兰和英格兰依靠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又以港口集散贸易取代汉萨同盟的转运贸易，先后主宰北欧贸易区，最终发展成现代贸易强国。经济体、贸易模式与贸易区间的深层关联对于积极谋求从生产大国向生产强国转变的中国具有启发意义。打造国家品牌，建构“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是参与或主导全球贸易的有效尝试。^[7]

三、周边国家区域研究

何美兰通过对李克莱弗斯的研究进行解读，

阐述了印度尼西亚早期的伊斯兰化的过程和影响因素。认为印度尼西亚的早期伊斯兰化过程主要发生在苏门答腊、爪哇、马鲁古群岛,记载这个过程的有不同语言和形式的实物和文献资料。印度尼西亚早期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建立过程受到贸易和商人、伊斯兰教苏菲主义等因素的影响。此外,伊斯兰教的扩张不仅通过和平宣传和商贸活动的方式,武力也是一个重要途径。^[8]

何美兰比较研究了 1849—1940 年间中国和日本移民秘鲁的情况,指出中日两国移民秘鲁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性主要表现在两国移民的个人目的、生存方式及两者对秘鲁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等方面;差别则主要表现在两国移民的时代背景、政府的移民态度和政策及两国移民与秘鲁社会的融合等方面。中日两国移民在融入秘鲁社会方面,日本移民的融入多一些官方性,而中国移民的融入多一些民间性。在当今的秘鲁,日裔在政治上的话语权比华裔突出,而华裔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渗入更普遍。^[9]

张淑明研究了阿斯塔菲耶夫创作中的西伯利亚形象。认为其创作中所呈现的西伯利亚形象既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对于西伯利亚时空做出的神话诗学阐释,同时又体现了他作为一位新根基主义代表和西伯利亚地方作家的创作思想。西伯利亚形象的这种呈现方式表达了作家本人的三种意图:规避物质欲望膨胀、道德堕落的都市精神的一种文化选择;以群体意识、平等思想、和谐原则为旨归的宗教理想;饱含忧患意识和高度责任感,渴望达到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宇宙和谐的全人类情怀。^[10]

四、美国问题研究

任晓龙等探究了美国社会福音运动产生的历史根源。认为美国社会 1865—1915 年间经历的宗教改革运动——社会福音运动,其目的在于将基督的精神和思想运用到社会改革中去,从而完成对社会整体的救赎,实现在俗世建立接近于上帝之国的理想社会。社会福音运动将社会整体救赎视为核心目标,同时强调信仰过程中理性和经验的重要性,肯定人类性本善,通过道德劝说和思想教育人类可以不断完善、进步。其特色在于一改以往美国新教以个人灵魂救赎为核心的思想,转而对社会问题热切关注。社会福音运动的

产生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其中福音主义、自由主义和现代社会思想的影响尤为重要,对当时及此后的美国宗教及社会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也给当代社会留下一笔巨大的思想遗产。^[11]任晓龙等还对美国社会福音运动中三位领袖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格拉登为社会福音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伊利大力推动了其发展并确立了基督教伦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核心作用,饶申布什完善了社会福音神学思想体系并为其指明了未来的发展目标和途径。社会福音运动为当代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问题提供了启示。^[12]

罗永忠等探讨了印尼与马来西亚对抗时期美国对马来西亚的政策。认为印马对抗时期是美国对马来西亚政策的重要演变期。美国对马政策经历了肯尼迪政府道义上支持马来西亚实际上援助印度尼西亚的“双轨政策”、约翰逊政府时期的“调节干预和直接卷入”,和“扶马抑印、确立美马友好关系”三个阶段。美马关系的变迁主要是美国的冷战遏制战略的体现,马来西亚是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发展和扩张的重要据点,也有利于美国构筑从韩国、日本到南亚的遏制中苏的冷战链条,从而确保了美国在东南亚的核心利益。^[13]

刘京对尼尔斯·玻尔的原子能国际管制思想及其实践进行研究。认为二战期间,在原子弹问世前夕,玻尔秉着对人类社会的深切关怀,率先提出对原子能进行国际管制的思想,并通过多方联络和奔走来宣传和推广这一思想,以期实现建立在开放基础上的分享与合作。然而 1944 年 9 月英美《海德公园备忘录》的签署,使玻尔推行其国际管制思想的实践遭遇挫折。即便如此,玻尔首倡的原子能国际管制设想及实践,不仅体现了一位富有智识的科学家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深切关怀,也为二战后原子能国际管制起源提供了先行的思考。^[14]

杨赞就“美朝峰会”与朝鲜半岛核问题展开论述。认为美朝峰会是在国际社会的共同支持下举行的,符合有关各方的利益要求。它缓解了朝鲜所受到的国际压力,也避免了美韩等国面对战争摊牌的危险,为东北亚地区局势的缓和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后只有有关各方彻底摒弃相互猜忌与敌视,加强互信,切实履行峰会达成的协议,朝核危机才能最终平息。^[15]

五、环境史问题研究

刘向阳对20世纪40—90年代洛杉矶烟雾治理进行反思。认为目前学界研究的缺陷有二：一是将20世纪70年代设为分界点，人为地割裂了前后两个时期洛杉矶空气污染治理的有机联系和因果关系；二是从历时性的角度单一追溯政府公共政策的演进，对空气污染治理涉及的其他经济、技术和社会问题鲜有提及。作者拟从重要节点入手审视洛杉矶烟雾治理过程的复杂性，从中可以发现这是复杂的命题和系统的工程，不能简单依靠不计其数的法律和条令进行解释。^[16]

闫华荣等在借鉴国外空气治理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京津冀雾霾治理的方案。指出要充分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空气治理上的理念推进京津冀地区雾霾治理的步伐，如：英国的环保立法理念、美国的空气治理洲际协定模式和日本的公众参与模式都能够为京津冀地区雾霾治理提供可供参考的经验。注重环保立法理念的更新、注重京津冀协同治理和强化公众监督机制将有利于京津冀雾霾治理。^[17]

六、中西文化交流

何美兰翻译出版了沃尔夫冈·贝林格所著《巫师与猎巫：一部全球史》。该书是有关巫术历史的一部通览之作。沃尔夫冈·贝林格把巫术视为一种具有历史维度的人类学现象，利用最新的历史学和人类学成果，重新审视了欧洲巫术的历史。从物质条件、宗教因素、政治力量的竞争等各方面阐释了“猎巫”这一历史现象的根源与发展，为理解现代早期欧洲的猎巫现象提供了一种解答。同时，作者的眼光超出欧洲，把非洲等地区也纳入讨论的范围之内。作者证明，尽管猎巫在欧洲早已被视为非法，但在世界很多地方，巫术仍是人们生活中难以回避的主题，相信某些人拥有造成真实伤害的超自然力量这一观念一直持续至今。^[18]

王士良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国语》中人神关系的思想史变迁。宗教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或者说是神与人的关系。无神论即是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基本态度，通过对各种天人关系或人神关系的分析，可以为探求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提供一种重

要的视角。《国语》作为一部先秦时期的重要史学著作，其所记载的关于天人关系或人神关系的言论，呈现出这一基本问题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由“事神保民”向“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的思想史变迁，构成了中国无神论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

参考文献：

- [1] 赵克仁. 法老与埃及生态文明探析[J]. 中东研究, 2018(02).
- [2] 赵克仁. 希伯来文明与埃及文明的异质性及其原因[J]. 中东研究, 2017(02).
- [3] 马月兰, 王琰. “英雄母亲”还是“卑微使女”——亚伯拉罕之妾夏甲的艺术重塑[J]. 世界文化, 2018(08).
- [4] 王琳, 王向鹏. 世界古代历史文化拾珍[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8.
- [5] 苏剑光. 古希腊神话和西方文化关系谈[J]. 世界家苑, 2018(10).
- [6] 周忠新. 圣经中的传统节日观[J]. 中国宗教, 2018(02).
- [7] 刘程. 北欧贸易区成型溯源——中世纪大宗贸易视角[J]. 商业研究, 2018(01).
- [8] 何美兰. 印度尼西亚早期伊斯兰化研究——对李克莱弗斯研究的解读[J]. 国别和区域研究, 2018(01).
- [9] 何美兰. 1849—1940年间中国和日本移民秘鲁比较研究[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46(01).
- [10] 张淑明. 阿斯塔菲耶夫创作中的西伯利亚形象[J].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2018, 23(01).
- [11] 任晓龙, 宁晓静, 施志艳. 美国社会福音运动产生的历史根源[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18, 37(01).
- [12] 任晓龙, 邵迪, 李来. 美国社会福音运动中三位领袖的历史作用[J]. 怀化学院学报, 2018, 37(02).
- [13] 罗永忠, 曹海霞. 印尼马对抗时期的美国对马来西亚政策[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8, 37(06).
- [14] 刘京. 倡导国际管制的先行者——尼尔斯·玻尔的原子能国际管制思想及其实践(1943—1944)[J].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2018(01).
- [15] 杨赞. “美朝峰会”与朝鲜半岛核问题[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18(07).
- [16] 刘向阳. 20世纪40—90年代洛杉矶烟雾治理的历史反思[J]. 史学理论研究, 2018(04).
- [17] 闫华荣, 王慧娟, 段妍. 国外空气治理立法对京津冀雾霾治理的经验借鉴[J]. 邢台学院学报, 2018, 33(04).
- [18] 沃尔夫冈·贝林格[德]著. 巫师与猎巫：一部全球史[M]. 何美兰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19] 王士良.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视域下《国语》中人神关系的思想史变迁[J]. 科学与无神论, 2018(01).

哲 学

哲学及相关问题研究

张燕京 穆青 郑甲平

2018年,河北省学者在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哲学基础理论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领域取得进展,在省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逻辑学研究

(一) 逻辑哲学

张燕京、穆青认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逻辑建立新的语言分析方法以来,诸多学者对传统的真之符合论予以批评。戴维森并非是要全盘否定传统的真之符合论。他承认传统的真之符合论中的“符合”的直觉,同时认为一种以符合关系为基础的对于真的解释方式存在着合理的理论成分,甚至在改良之后会成为一种必要的解释真的方式。但他却不满足于传统真之符合论对于“符合”概念的说明。戴维森认为,真概念是希望通过求诸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来进行说明的。一个句子为真表达了一种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但反对以“事实”这一含混的概念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真值是一个句子为真或为假的属性,但不同意将语句从语言整体中割裂开来。一个陈述是对于现实世界的描述,一个孤立的句子本身是无法为真为假的,这一点必须依靠整体语境来实现。一个句子为真实实际上是指:一个特定的说话者在特定时间所说的这个句子为真。由此,他建立了关于句子、说话者和时间的三位谓词:Ts, u, t。戴维森运用塔尔斯基的满足概念完成了对于“符合”关系的说明,从而提出了一种新的符合论真理的一般理论形式。他所倡导建立的真之符合论本质上是一种融贯的真理理论,是一种同语言语境相符合的真理理论,因此这是一种整体主义真理理论。戴维森运用语言分析方法构建的真理理论,绕开了传统符合论中关于事实概念这一难题,对符合关系进行了新的扩展,强调了语言对于探讨哲学问题的重要性,强调了真理理论的整体论特征,堪称语言哲学研究

的典范。^[1]

穆青认为,自哲学研究的关注点开始转向语言以来,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逐渐成为了当代哲学的理论热点。其背后的根源问题则是对于意义理论如何建构的争议。戴维森在实在论的阵营中,以其细致、深入的语言分析和严谨精密的理论建构著称,将他的真之理论与意义理论思想融汇成一个统一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实在论体系。戴维森认为,传统的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以指称概念作为理论基础,存在着难以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的理论缺陷。整体论的方法也存在建构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使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得到更加清晰的阐释,戴维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权衡比较。最终,他将绝对真理视为先于指称、满足等概念的前分析概念,对指称、满足这样的语义学概念进行严格限制,形成了可行的整体论真理理论和意义理论。此时指称概念与满足概念只是绝对真理理论当中的一种理论设定,只具有语义学的作用,并不具有对绝对真理整体的解释作用。同时,绝对真理理论同意义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在上述问题的澄清过程中得到阐释。戴维森将这种形式的绝对真理理论自身称作一种意义理论。绝对真理概念的建立在戴维森意义理论当中发挥着对于语言意义的绝对建构作用。戴维森的语言哲学体系当中,绝对真理概念是唯一的核心的前分析概念。这决定了他坚定的实在论立场。真理概念的建构成为了戴维森语言哲学当中一切信念和意义的基础。这种以真理概念作为一切事物尺度的理论,将戴维森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进行了形式与功能上的统一。这使得戴维森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为当代实在论阵营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和重要的影响力。^[2]

孙新会等认为,紧缩论和公理化真理理论看似分属不同的领域,但实际上紧缩论既包括对非形式化真理理论的研究,又涉及到形式化真理理论的部

分内容。而公理化真理论的构造则基于非形式化的实质真理论和半形式化的语义真理论的研究。与实质真理论相反,紧缩论认为“真”是非实质的。起初基于保守性,公理化真理论以紧缩论作为其哲学依据,但保守性问题却充分暴露了二者各自存在的困境。一方面是由于紧缩论本身的不当承诺,使这种有瑕疵的理论不能作为刻画不同真谓词的公理化真理论的统一哲学解释;另一方面是由于多数公理化的真理论根本不满足基于基础理论的保守性。因此,这两种理论的匹配问题亟待新的探究。造成紧缩论与公理化真理论不匹配的根本问题在于紧缩论不应当要求一个真理论满足保守性。保守性源自于数学,形式化的语言不带有任何主观色彩,概念本身是中立的。从紧缩论和公理化真理论的匹配程度来看,虽然希望公理化真理论能有一个合适的哲学依据,但需要为不同的分支系统选择不同的哲学理论。因为这些系统刻画的真概念原本就是有差异的。一个好的公理化真理论应该嵌入在一个更广泛的哲学背景中,并通过获得一个促进选择特征公理的哲学解释得以巩固。因此,紧缩论不能一概而论地作为经典公理化真理论的哲学依据。^[3]

刘叶涛、魏良钰认为,“忒修斯之船”这个传说提出了如何理解个体事物同一性的问题。作为对逻辑的哲学反思,逻辑哲学探讨逻辑定律背后的哲学,反思逻辑思维发生的理据。“忒修斯之船”问题作为一个“思想实验”,本身就是思维虚构的产品,问题的构造和消解源于思维加工,也将终结于思维加工。从形式逻辑角度看,这种思维加工是一种形式思维的处理,不关涉个体事物的内部结构。而辩证思维则本质地关注对事物内部结构的把握。由个体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结构所决定的事物的变动不居,是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发生的,但对事物进行形式思维加工却与时空无涉。因此,仅仅把忒修斯之船定位于历时同一性问题是失偏颇的。从逻辑哲学角度论证,“忒修斯之船”与典型连锁悖论的推理形式相似,但实质不同,后者所用谓词是初始的逻辑谓词,而且是典型的模糊谓词。“忒修斯之船”之所以会被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是因为人们并置了整体和部分,将其组成部分是否同一看成了这条船是否自身同一的衡量标准。通过同一性的研究可以把握形式思维的存在及其作用机理。如果说

忒修斯之船是因为并置了整体和部分而成为问题,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就是在准确把握形式思维与辩证思维各自功能的基础上,解除这种并置。^[4]

(二) 逻辑应用

刘叶涛、林艺霏以“电车疑难”为例,在当代逻辑悖论研究一般方法论的指导下,分析道德悖论的认知结构,指认道德悖论的本质与归属,并为探寻其解决方案指明方向。首先,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道德悖论现象进行了叙述,从而认为,道德悖论之所以格外引人关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源自现实生活。其次,基于道德悖论与逻辑悖论之关联的再三权衡,进一步明确道德悖论并不是逻辑悖论。通过能够建立矛盾等价式的要求看,道德悖论并不包含真正的逻辑矛盾;通过与道义悖论及合理行动悖论的比较看,道德悖论实质上是关于道德“行动”的问题,不属于“理论事实”。道德悖论作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存在,是以道德选择作为一种“行动”为前提的,因而作为道德实践中遇到的行动选择困境,道德悖论所刻画的是一种“类悖论行动困境”:主体面临两个行动选择,具体采取哪个行动,需要进行证成,但在对行动的合理性进行证成的过程中,产生了道德上相互冲突的责任,从而使主体面临行动选择上的二难困境。这就是道德悖论的实质。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道德悖论不构成严格的逻辑悖论,但其研究价值不容忽视。道德悖论的解决需要还原到具体的社会实践当中。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当代行动哲学的视角出发,以实践推理代替理论推理来考察道德悖论的产生和发展,是道德悖论解悖的必由之路。^[5]

孙雯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Gibbard-Satterthwaite 防策略投票不可能性定理确立后,人们对如何避免操纵投票,即防策略投票问题开始了广泛的研究。孙雯从逻辑的角度研究防策略投票理论,主要介绍了如何用逻辑的方法有效的刻画社会选择中的防策略投票问题。第一,从逻辑的角度,系统地梳理了防策略投票理论的萌芽、初步形成、正式提出及深入发展四个阶段,并讨论了避免策略投票的方法;第二,以集合论为数学工具,研究防策略投票的理论基础——Gibbard-Satterthwaite 防策略投票不可能性定理。并运用 Saari 方法和归纳法,形式化证明

了 Gibbard-Satterthwaite 防策略投票不可能性定理。最后,对 Gibbard-Satterthwaite 防策略投票不可能性定理的证明进行反思;第三,基于投票逻辑 (VL) 对 Gibbard-Satterthwaite 防策略投票不可能性定理进行刻画,并讨论了 VL 的不可判定性和可判定性特例;第四,对社会选择函数、策略博弈等概念进行概括介绍。基于命题控制联盟逻辑 (CL-PC),提出了社会选择函数逻辑 (SCFL),进而对防策略投票的相关性质进行了刻画,最后解决社会选择函数是否防策略这一问题;第五,将投票过程看作多主体策略博弈,提出多主体策略逻辑 (MASL),基于 MASL 讨论防策略投票的相关属性。然后,对 MASL 进行认知扩张,给出了认知多主体策略逻辑 (EMASL),并刻画知道独裁、知道防策略。对防策略投票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是对跨文化互动的逻辑认知机制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所获得的理论成果不仅将丰富当代的逻辑学理论,也是逻辑学在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上的具体应用。因此,利用逻辑的方法来研究防策略投票问题,在今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6]

孙雯认为,进行社会选择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投票,投票是一种体现民主制度的方法,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进行社会决策的方法。近年来,现代逻辑的迅猛发展,为投票理论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学理支持,使许多难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案,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首先,利用逻辑形式化的方法,对投票理论中的经常用到的概念和公理进行了表示。例如,意向表的集合、偏好关系、社会福利函数和社会选择函数等概念;匿名性、帕累托原则、无关备选项的独立性、非强加性和独裁者等公理。其次,借助多主体策略逻辑 (MASL) 和认知多主体策略逻辑 (EMASL) 的最新成果,刻画了投票的一般模式,并阐发其独特意义。多主体策略逻辑是对个体或群体策略能力进行推理的一种模态逻辑。孙雯借助于多主体策略逻辑语言从 MASL 的语言和语义、MASL 的表达力和防操纵三个方面探讨投票问题,提供了一个从模态逻辑角度探讨投票的途径。而认知多主体策略逻辑是多主体策略逻辑的扩展。因此,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语义上,多主体策略逻辑和认知多主体策略逻辑都能够更严格准确地刻画投票中的概念和定理,能够更清晰地表示投票

理论中的重要思想和涵义。更重要的是,刻画了防操纵投票的独特性,对投票中的防操纵提供了一种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为建立投票的逻辑系统和模型给予了技术支持,也为分析投票程序,以进行计算机模拟处理打下了基础。^[7]

(三) 逻辑研究动态

赵贤等对“第三届京津冀逻辑论坛”的开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总结和说明。学术会议是了解学术领域前沿问题、分享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环节。学术会议的举办不仅是所在单位学术能力的体现,也是提升学术水平,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的重要方式。2017年11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学研究室、南开大学哲学院、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共同发起的“第三届京津冀逻辑论坛”在河北大学政法学院举行。论坛主题为“新时代背景下京津冀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内容涉及逻辑前沿问题研究、逻辑教学研究与动态等。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等院校及研究所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中国逻辑学会原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吴家国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新文研究员,南开大学哲学院田立刚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张燕京教授主持论坛开幕式。与会代表围绕论坛主题进行了八场学术报告,并就相关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吴家国教授作题为“我的逻辑人生与追求”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回顾并总结了自己的逻辑学研究生涯,同时为振兴中国高等学校逻辑教学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把逻辑研究同逻辑教学区别开来。二是把本科生逻辑教学同逻辑专业研究生教学区别开来。三是把不同专业、不同对象和不同教学时数的本科(或专科)逻辑教学区别开来。在论坛闭幕式上,张燕京教授作了总结发言,他认为论坛的召开达到了推动京津冀三地在逻辑学教学与研究方面合作和交流的目的。^[8]

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一) 科学哲学

吴三喜认为,在现象学复兴近代哲学的过程中,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得到了非比寻常地关注和重视。就其意义关联而言,单子论的现象学意义

直接关涉于当代哲学争论中的实在论—反实在论问题，并在结论上为后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入思方式，这种方式不是正面回应和解决实在论—反实在论的争论，而是力求发起一场视域转折，从根底上清理该争论的缘起，从而有望超越实在论—反实在论争论的基本预设。在莱布尼兹的整个哲学体系中，单子论构成了其中的形而上学部分。单子指的是单一实体，它无广延、不可分、不受动，单子最重要的规定是表象能力，单子的表象能力有时也被称为知觉和欲求能力。每一个被创造的单子在其自身之中都包含着与所有其他单子的稳定关系，这些关系成为所有其他单子在一具体单子那里得到表现的契机。因而，每一个单子就是世界的一面镜子，而反过来说，世界也可以被理解为单子的表象。莱布尼兹所谓的那个唯一的世界，指的是单子关系在最高单子那里获得的清晰表象。因此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和宇宙论可以被看作一种将世界人格化的理论。而这个问题，从一种比较的视野看，其实就是当代英美哲学中被广泛讨论的反实在论问题。当今实在论—反实在论争论中的唯心论问题，指的是世界对于心灵的依赖性问题，因单子表象世界的缘故，单子论往往被视为一种典型的反实在论样式。然而随着现象学的出现，在对单子论的重新解释中海德格尔将单子还原为更加本源的意向性和超越性，将单子论纳入到现象学意向性理论之中，从而在根基上避开了心物二元论，成功地超越了实在论—反实在论争论框架。^[9]

（二）休谟思想研究

李伟斌认为，一般来说，由休谟所引发的哲学问题总是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将自然科学设想为知识的范式。这一直都是理解休谟的一条富有成效的路径，却并不是唯一一条要选择的路径。休谟是以建立真正的人学为最终目的，从哲学的改造、日常生活哲学的确立开始，进而探查观念与存在在本体层面上的一种叙事结构和历史性，最后落脚于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具体来说，休谟哲学的真义并不显明直白，而是曲折地隐藏于其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著作及其各类书信和评论当中。休谟首先是一位纯粹的哲学家，他的所有论述都始于他对哲学本身的反思和改造，并且都是在真正哲学（日常理性、历史理性）与虚妄哲学（抽象理性、

理论理性）的巨大张力下展开的。休谟洞察到了抽象的虚妄哲学所引发的一系列心理困境，自觉地将哲学限制于对日常生活的系统化反省。在这样一种反省中，休谟发掘并彰显了一切知识、思想和存在在本体层面上的一种“历史性”，建立了一种日常生活哲学。由这样一种哲学信念出发，在对本国历史的书写中，痛感于虚妄哲学和抽象理性所引发的种种形而上反叛割裂了历史有机体并给历经久远的政治秩序和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威胁，休谟由此站在了保守主义的立场上。休谟对西方近现代哲学最大的意义就是，他对置身于其中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在将哲学探究从一种对物理学和数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几乎是单一的专注中转移到对历史知识和存在本质的一种研究上，而与维柯一同开启了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之外的另一种“历史性”哲学传统。^[10]

三、伦理学研究

（一）社会伦理

王莹、尚琳琳认为，志愿服务是富有时代特色的道德实践，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社会关爱和弘扬社会正气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党中央对发展志愿服务事业高度重视，有效推动了我国志愿服务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这不仅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也充分显现出志愿服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志愿服务的道德属性可以表述为：志愿服务的特征体现了道德的特征；志愿精神体现了伦理精神；志愿服务体现了以“善”为核心的价值追求；志愿服务是学雷锋活动的拓展；志愿服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代体现。志愿服务是促进社会道德水平提升、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抓手，是政府职能的重要补充，是实现社会“善治”的重要途径。发挥好志愿服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其基础是推动志愿服务持续健康发展。志愿服务在我国的开展时间还不长，一些基础性的关键环节仍然比较薄弱，一些基础性的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国家还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志愿服务站点建设力度，加快信息平台建设步伐，支持引导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激发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特别是大力宣传和弘扬志

愿服务精神,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理念深入人心,使志愿服务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一种生活方式和道德自觉。^[11]

黄云明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国际政治形势,提出了一系列处理国际政治关系的新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国际政治伦理理念,为人类未来世界政治格局建构指明了伦理价值取向。十九大报告和新党章,更是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定为处理对外关系工作的指针。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世界各国放弃完全自利、对抗的战争或冷战思维,确立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国际关系。第一,是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国际政治秩序。第二,是合作共赢的经济伙伴关系。第三,是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世界。第四,是多种文化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世界文化格局。第五,是崇拜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劳动辩证法和劳动历史观以及中国传统的和合哲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以往所有思想家不同,它从社会实践出发认识世界,特别是从物质生产实践即劳动出发认识世界,把握人类社会历史,把劳动作为理解世界的本体概念。劳动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劳动中,人们不得不结成一定的社会组织,所以劳动也是个体和社会的统一。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思想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精神,强调在社会生活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以及社会组织中成员与组织的关系、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统一关系,既有对立又有统一。习近平运用辩证法思想结合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拨开矛盾尖锐的国际关系外在表象,阐发各国之间利益的共同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正义、和合和仁爱的伦理价值,勾画了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伦理愿景,也指明了实现伦理愿景的途径和方式。^[12]

黄云明认为,在具体的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和法律伦理问题的研究中,社会基本制度建构的哲学和伦理问题的阐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的哲学方法论是不可能阐发清楚社会制度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是中国人对现代人类

文明作出的最伟大贡献。道德的社会本质论和道德的主体本质论都只是抓住了道德本质的一个侧面。用马克思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辩证法的观点分析道德本质问题,道德是人的社会实践方式之一,而人社会实践的目的就是实现自我,所以说,道德是个人自我实现的方式,揭示了道德的本质属性,但是,人的社会实践不能脱离客观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社会实践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维护社会和谐是社会实践的需要,当然也是道德本质性追求,道德就是人类为了协调自我实现与其所需要的和谐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文化。关于宗教问题,马克思一再强调,宗教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产物,神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神是人的异化,是对象化了的人。总之,从社会实践出发把握宗教,宗教是以信仰超自然力量为核心的社会实践方式,在这种社会实践中,人可以获得幻想性自我实现。马克思认为以往一切哲学不是单纯从客观物质世界出发就是单纯从主观精神世界出发认识世界,既不能真正解释世界,更不利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认为哲学根本的意义在于改造世界,所以马克思将实践——人的感性活动作为把握世界的出发点,在本体论上超越了传统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在辩证法上,将事物的辩证运动不是作为纯粹的精神运动,也不是纯粹的自然运动,强调辩证法的精髓在于主体与客体的互动,社会实践是事物辩证运动的根本原因,所以事物的对立统一最核心的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社会主义究其根本来说是劳动人道主义,物质生产劳动是社会价值的基础,劳动神圣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设计最根本的价值导向。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主体,法律权利保障的基础应该是社会物质生产劳动,也就是说只有建构在劳动基础上的权利才是合理权利,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公正、平等和自由等所有价值观念都应该建构在劳动基础上。这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13]

(二) 应用伦理

王莹、尹思聪认为,在国家治理中,法治与德治必须协同发力。一方面,德治的内在约束作用必须有法治的外在强制力支持与保障,惩恶是扬善的基础,法治的威慑力量使法治成为德治的坚强后盾。另一方面,法治不能离开德治文化的

滋养和土壤，需要发挥好道德教化的作用，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法治与德治的相互支持，从法治的角度说，一是德治的价值原则和价值体系需要法治的保驾护航加以推行，责任、诚信、互助、友爱、孝敬等美德的传承与弘扬也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二是德治的任务之一是调节好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法律法规可以公正地协调利益矛盾；三是社会成员道德自律性的培育，有时需要制度的强制惩戒予以推动。从德治的角度看，德治为法治提供价值遵循，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以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为依托的，都必须具有道德价值；法治的实施离不开人的道德素质，好的制度需要有德之人来落实；德治作为一种文化的积淀，会形成人们遵纪守法的环境和基础。法治与德治的共同作用，表现为法律与道德的共生性。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法治与德治协同发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法律法规、行政组织规范、党内法规等制度体现了社会价值导向、伦理精神。第二，加强道德法律法规建设，即将道德规范、道德提倡通过立法体现出来。第三，乡村的乡规民约也体现了法治与德治的共同作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律与道德协同发力，这不仅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14]

柴艳萍、陈晓彤认为，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对工人造成的危害，而且提出了“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再利用的循环经济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伦理价值。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思想最早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自从有了人类及人类劳动以后，自然界原有的天然物质循环系统就被改变了。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日益严重，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变换的裂缝日益增大，生态危机不断加剧。究其原因，根本就在于资本的扩张和资本家无限追求利润的贪婪本性。经济问题的解决不能仅靠经济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问题也不能在资本主义内部解决，必须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进行根本变

革。未来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消除物质变换的断裂，实现人和自然的重新统一。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各种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基础上，指出在生产过程中应该将排泄物再利用、减少废料、清洁生产等。这实际上已经说明了现代循环经济思想的核心，即资源再利用、废物减量化、清洁生产等。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具有重大的伦理价值，它的提出明确了人类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新转向。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兼顾经济、生态、社会等多重效益；循环经济内在地要求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预示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有利于愈合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产生的巨大裂缝，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15]

景枫认为，习近平对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论述，伦理已成为目前社会治理创新的关注点，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实现伦理与制度的交互作用，实现社会善治就要努力探索社会治理创新中伦理的实践路径。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法治中国建设好，必须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道德约束”，发挥道德的作用，这是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关注点，也可以说是社会治理的创新点。一方面，伦理体现了社会治理的“软治理”。另一方面，调整人及其各种社会关系离不开伦理。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实现伦理与制度的交互作用。伦理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党委的领导、政府的主导作用，社会基层组织和民间组织的参与，公民个人的参与等层面的共同努力”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及党的各级组织是实施社会治理的领导者。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党委中的重要成员，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毋庸置疑，必须坚持。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来看，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伦理与制度的交互作用中，以人为本是政府决策的根本要义，须坚持公共服务的均等性和秉持利益的公平性。志愿服务组织是汇聚社会资源、传递社

会关爱、弘扬社会正气的重要载体,是形成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志愿服务活动是富有时代特色的道德实践活动,志愿服务组织是当代中国的伦理组织,志愿者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实践者。^[16]

(三) 医学伦理

边林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作为学科的形成,在经过了初期的“医德学”形态阶段后,对西方生命伦理学的引进与吸纳,助推了中国医学伦理学的进步,但也要看到为此所付出的历史代价,因为这种借鉴强烈地影响了其后中国医学伦理学学理和学术范式的形成。当代中国整个医学界如火如荼的“医学伦理”“医学人文”热潮,确实在深刻影响着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中国医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发展路径选择、发展取向甄别和发展方式调整。也正是因为医学伦理学在中国已经开始显露出从曾经的伦理实践智慧向伦理智慧实践的转化趋势,其价值和分量就可能因为这种转化的持续性而带来这个学科系统质变。在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展和日趋深入,在学界对学科的进步越发充满自信的时候,更有必要对学科发展进行全面的反思。只有这样才能理智地看待这个学科的成长和成就,以便为学科的未来选择更加合理的发展方位,探寻前进方向,确立进步的目标,进一步在中国医学(生命)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中体现和发挥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从目前医学伦理学的总体情况看,医学伦理学的研究领域和学术演进方向,呈现出一些突出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恰恰隐含和反映着这一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认为医学伦理学只具有实践伦理学属性成为一些学者的共识,因此基于问题、案例等开展研究成为学科的发展方向。二是医学伦理(人文)走进临床成为研究的热点。然而,医学伦理对于临床医学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能够发生作用,发生作用的路径和机制是怎样的,如何去评价这种作用等问题,是探讨医学伦理如何走进临床医学的前提问题。医学伦理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有基于自知之明的界限和方位感,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医学伦理学学科因为跨界所具有的哲学、道德哲学“基因”所不能改变的自身学科性质和由此决定的实践形态上所必然具有的实在力量的有限性和精神力量无限性之辩证

关系,依据思想、观念、理论贡献建立医学伦理学自身的评价标准。合理处理医学伦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医学伦理实践中推进医学伦理学理论的创新与完善,在医学伦理学理论的指导下把医学伦理实践活动引向深入。^[17]

杜莹、赵金萍认为,涉医暴力事件不但严重伤害了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也挫伤了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和从业信心,对我国优秀医学人才的培养极为不利。涉医暴力事件属于典型的危机事件,在医学生中开展涉医暴力危机管理教育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前医学生普遍缺乏针对涉医暴力的危机管理与应对能力,也急切地期待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因此,对医学生进行该方面教育,培育他们高度的安全与危机意识并掌握一定的危机管理知识与技巧,一方面有利于培育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有效减少或避免医患冲突,有利于医患和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维护和保障医学生的身心健康。从危机管理的四个层次出发,通过在教学中加强人文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危机体验教学、进行危机应对实践等尝试,对医学生开展涉医暴力危机管理教育,提高医学生危机防范意识、预警能力、处理能力和恢复能力,从而为防范涉医暴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借鉴。危机管理理论特别强调管理者在平时能敏锐观测到各类信息以感知和预测危机的发生,并做好充分的事前准备,在危机发生初期,管理者能迅速作出反应,启动危机预警和应对计划,运用各种手段和危机处理技巧,解决危机并减少危机带来的冲击力和影响力,以及在危机发生后总结经验教训,做好恢复和重建工作,化危机为机遇。危机管理的内容包括:“危机缩减”,加强人文教育,提高医学生危机防范意识;“危机反应”,通过危机体验教学提高医学生危机预警能力;“危机预备”,利用危机应对实践提高医学生危机处理能力;“危机恢复”,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医(学)生危机恢复能力。^[18]

边林认为,当医患矛盾与冲突之类的问题带来一个社会从媒体高度关注到公众热议甚至忧虑的时候,说明这类问题已经演化成为一个社会焦点问题或者已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医患关系由此出现前所未有的种种问题,特别是矛盾升级为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且应运而出生诸如“职业医闹”之类的丑恶现象,在这种所谓医患

关系“恶化”现象的背后，一定隐含着深层原因。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复杂原因，认识医患关系的实质，是一个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医患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任何医患关系之间矛盾的形成、纠纷的出现乃至冲突的发生，虽然几乎所有个案都可能会有主导因素、诱发因素等，但所有问题的发生都一定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存在于医患双方，既有主观性（主要是心理、情绪、情感等）因素，也包括外在于这一关系的社会和专业上的客观因素。疾病比人类更古老。从古至今人类都在运用不同形态的医学手段与疾病进行斗争，这种角逐将是一个有始无终的过程。疾病在与人类的矛盾存在中，改变了其原有的自然史形态，成为生物的乃至社会的实体。当“活着”成为人类生命的底线和“健康地活着”成为人的生命追求，就必然形成围绕生命的科学探索和基于这种探索而来的对生命的本体性哲学沉思，“生命—疾病—医学—文化—哲学”这样一个链条，就构成了人类源于人与疾病关系的深刻矛盾而反思生命、身体、健康、存在、死亡等这些哲学命题的医学哲学和文化上的认识路径。医患关系正是这样以临床医学活动的形态进入医学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视野。因此，考察医患关系，应基于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法学、医学教育学、医学人文学等学科，从医患矛盾的必然性，医患矛盾关系的形态与类型，医患矛盾、纠纷与冲突的边界与越界，医患关系的医学道德原则和规范，医患冲突的心理诱导因素分析，法律框架内的医患纠纷与冲突处置，健康与死亡教育对医患沟通的积极意义，医学人文与医患关系，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医患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和论述。^[19]

（四）生命伦理

赵金萍认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带给国人物质生活的巨大富足，对健康的关注与日俱增。当“健康中国”成为国家战略，公众对健康在全生命周期中重要性的认识也更为深刻，人们对一切与健康相关的信息都表现出空前的兴趣，而新媒体让这种关注与渴望更容易实现。如此众多又备受关注的健康谣言，恐怕也植根于现代社会人们对于健康的高度关注和深度的忧虑。在自媒体时

代，部分人在商业利益驱使、奇怪的创作动机或别有用心的编排下编造或放大了某些传言，甚至还有人为了吸引眼球不惜用偏离事实真相、言过其实或者耸人听闻的标题与言辞来增加点击率。新的传播手段的运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加之健康传播对于传播主体专业性、传播内容科学性、权威性的要求非常高，实在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胜任的。事实上，多数新媒体平台网站及编辑没有医学背景，撰稿时又缺乏专业健康权威的指导，在信源选择和内容编辑方面很可能出现误差，因此发布的健康信息难免有失偏颇。如若本身再带上一定的主观情感倾向，难免会发布一些以偏概全、不够科学权威甚至不够公允的信息。事实上，在自媒体时代，新媒体的态度与作风是重要的风向标，且因其广泛的群众基础，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便捷的交流方式在谣言破解方面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平台加入到对健康谣言的破解和治理中来。由于健康传播的学科特性，新媒体有必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探索如何开展专业性更强的健康传播实践。同时，不断通过学科交叉打造一支汇集媒体内部专业报道队伍以及外部医学专家资源的健康传播队伍，并在日常操作的基础上逐步使新媒体健康传播规范化。用科学方法、专业论证粉碎健康谣言。^[20]

四、心理学研究

（一）普通心理学

王素娟、张雅明认为，空间存在是个体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虚拟环境中时产生的身临其境的主观体验、感觉，包括自我定位与知觉到在虚拟媒介环境中的可能行为两个维度。与我们在真实环境中的体验相似又不同，属于具身认知的范畴。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心理学研究者们面临着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媒介使用者是如何理解并体验媒介所呈现的虚拟世界的？媒介使用者经常报告他们有一种置身于虚拟环境的“身临其境”感。正是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得媒介使用者相信自己“身”“心”确实处于虚拟环境中，由此空间存在应运而生。新媒体时代很多现实问题都和空间存在有关，比如教育中的慕课、游戏中的成瘾、虚拟技术在新闻传播中的使用、培训形式的创新、心理治疗中的真实性体

验,等等。因此,空间存在研究成为媒介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当前对空间存在问题的研究可分为理论建构与实证检验研究两类。前者主要是采用演绎推理方式,探究空间存在的产生过程、决定因素与影响因素;后者主要采用实验研究,对空间存在进行测量,通过实证研究考察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并检验在不同虚拟环境中的效果。未来需整合两类研究,把理论模型应用于媒介心理学基础性与应用性问题上,以促使这一领域研究不断深入。此外,空间存在的神经机制、实际应用的价值与效果也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21]

贾宁、陈换娟等在四个实验中通过应用句子启动范式,来考察道德概念空间隐喻的匹配抑制与匹配易化。实验1中,被试先阅读一个含有垂直空间信息的句子,然后立即对随后出现的一个词进行道德词或者不道德词的分类判断。实验2和实验3分别要求被试关注句子中空间信息的终止位置或起始位置。实验4设置了延迟反应,要求被试在句子消失4秒后再进行词汇分类判断。结果显示,前三个实验都出现了明显的道德概念空间隐喻的非绑定性的匹配抑制,即“下一道德”或者“上一不道德”,而在实验4中出现了隐喻的非绑定性的匹配易化,即“下一不道德”。这一结果证实空间信息句子的加工确实能够激活道德隐喻。但是由于句子加工时间较长,如果空间信息与道德概念占用相同的资源,就会导致道德空间隐喻的匹配抑制。如果有足够时间加工句子中的空间信息,就能够启动随后的道德概念加工,出现匹配易化。资源的竞争与激活是道德概念空间隐喻出现匹配抑制和匹配易化的关键。^[22]

贾宁、李聪慧等以高中一年级学生为被试对象,以具体名词词对联结学习材料,采用自控步调学习范式,通过两个实验,分别考察高中生即时学习判断和延时学习判断的准确性,特别是预见偏差及其对学习时间分配的影响。元记忆监控的研究主要分为元记忆监测和元记忆控制。元记忆监测是指在客体记忆过程中,从接受信息开始,形成对此过程的难度、自己已学习或记忆的程度、提取的可能性等情况的了解。元记忆控制是在准确监测的基础上对记忆行为进行控制,包括记忆项目的选择和学习时间的分配。该研究不

仅揭示了高中生的元记忆监测存在预见偏差,以及这种偏差对学习时间分配的不良影响,还验证了延迟判断对预见偏差的修正作用。研究表明:第一,高中生的即时学习判断出现了预见偏差。第二,即时学习判断的预见偏差会影响学习时间的合理分配,降低学习效率。第三,延迟判断能消除预见偏差,进而实现更为合理的学习时间分配。^[23]

宋耀武、王润洲等认为,当前对有意遗忘以及自我参照条件下有意遗忘解释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编码和抑制的观点上,并且很少有研究内隐自我参照条件下的有意遗忘。有意遗忘(directed forgetting),属于主动遗忘的一种,指的是由于遗忘指令引起的记忆内容受损的现象,强调遗忘的指向性和有意性。前人通过研究发现,主动遗忘无关的干扰信息对提高个体的认知加工效率,使之更专注于处理当前的问题有重要的价值;而对自己负性情绪和创伤性生活事件的主动遗忘则可以促进良好的心理健康的形成。但是,近些年研究发现受创伤个体不能有效遗忘与自身所受创伤经历相关联的材料,其原因可能是自我在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提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存在记忆优势效应。为了探究个体是否能够主动遗忘与自己有关的信息或事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应用于有意遗忘研究。而以往的研究之所以会造成争议,其主要原因是没有使用一种可量化的研究方法来分析有意遗忘过程中信息的储存和提取。宋耀武、王润洲尝试引入储存—提取模型来为自我参照条件下的有意遗忘提供新的研究方向。未来有意遗忘以及其他记忆和遗忘的研究可采用储存—提取模型并结合多项式建模技术,通过对储存和提取过程的参数分析帮助研究者解释有关现象产生时伴随的内部心理机制。^[24]

(二) 应用心理学

史云静通过采用倾向性道德敏感问卷(DMSQ)和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BMU)的方法,对354名医学院校大学生进行调查,旨在研究探讨医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对其道德敏感性的影响。道德敏感性(moral sensitivity)是对情境中道德问题的领悟和解释能力,是敏锐地觉察到某个情境中包含道德内容和意识到行为如何影响别人的能力。道德敏感性的形成会受到多种因

素的影响,比如社会和家庭环境、角色卷入、个体道德图式、人格等。父母教养方式是父母在抚养子女的日常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倾向,它是对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特征的概括,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行为风格。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有预测作用;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自尊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人格的形成密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父亲过度保护正向预测道德敏感性;母亲情感温暖、父亲情感温暖负向预测移情烦扰;父亲拒绝、母亲过度保护正向预测觉察频率,父亲情感温暖负向预测觉察频率;父亲过度保护正向预测共感想象,母亲拒绝负向预测共感想象。医学生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其道德敏感性有预测作用。^[25]

刘艳、马红霞等通过探讨父母自恋人格与初中生在亲子冲突时采取的归因方式的关系,为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提供新依据。心理学家把自恋归为一种普遍的人格特质,它以自夸和自我重要性为核心,并将其分为显性自恋和隐性自恋。而初中阶段是一个敏感、关键,而又特殊的阶段,这阶段的学生由儿童向成年人迈进,正处于过渡的青春期中,其在生理和心理都发生急剧的变化,因为生理方面的原因和因年龄不同导致认知方面的差异,容易发生亲子冲突。作者采取随机抽取某地区初中生及其父母共 238 对进行问卷调查,中学生完成亲子冲突归因量表,其父母完成自恋人格量表的方法。得到的最终结果显示:①不同组别家长自恋人格与初中生亲子冲突归因方式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②父—子组父亲的权欲、优越感等自恋人格特质与初中男孩亲子冲突时选择多个归因方式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r = 0.258 \sim 0.377$, $P < 0.05$ 或 0.01),而父—女组父亲的自恋人格特质与初中女孩亲子冲突归因方式无相关($P > 0.05$);母—子组母亲的权欲与初中男孩亲子冲突时选择 ISU、ESU 正相关,母—女组母亲的权欲、优越感、自我钦佩以及自恋人格总体特质与初中女孩的亲子冲突选择 EUC 归因方式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r = 0.264 \sim 0.377$, $P < 0.05$);③初中生亲子冲突归因方式与其父母自恋人格部分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r = 0.123 \sim 0.196$, $P < 0.05$ 或 0.01)。结论:初中生在面对亲子冲突时采取的归因方式受父母的自恋

人格的影响且父亲、母亲对初中男孩和女孩的归因方式的影响效果各不同。^[26]

刘艳红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心理咨询临床工作和家庭暴力公益咨询的心得,依据自己在家庭治疗和创伤治疗中不断积累的经验,同时也翻阅了大量创伤文章、著作,形成了对暴力创伤及心理干预形成系统的构思,编著了《亲密伤害》一书。书中详细讲述了关于暴力家庭的研究设计、研究方法、理论背景、评估工具、家庭系统资料、问题探讨、解决之道。从心理、家庭、社会的维度探索家庭中的亲密伤害。第一篇重点介绍了研究的背景、研究方法与设计思路;第二篇以家谱图为线索呈现了家庭故事,以直观材料感受暴力状况及暴力家庭系统特点;第三篇讨论暴力创伤及社会支持系统,不仅有受害者、施暴者还有家庭系统内创伤,介绍心理创伤的干预,社会支持的调研情况及意义;第四篇试图构建社会支持系统工作模式。本书主要研究,在与受害者深入对话的基础上,从暴力家庭系统视角,带着问题假设去探索这一社会问题。即暴力家庭的家族背景怎样?是什么使得他们对自己的家人下手施暴?暴力情景、失控扳机点怎样?受害者遭受暴力虐待后的精神创伤情况如何?什么使她难逃暴力境遇?社会资源在家庭暴力中如何发挥作用?重构关于家庭暴力问题的认知,从当事人、家庭系统、生态系统角度探讨反家暴社会支持系统工作模式。试图给读者呈现暴力家庭的结构状况、造成的家庭创伤及代际传递,呼吁社会关注家庭暴力问题,为反家暴工作作出应有贡献。^[27]

张定燕、郑凯等通过评价积极心理学融入心理健康教学对大学生感恩意识进行干预的效果,为高校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和教育教学提供新视角。研究者专门对 90 后大学生的感恩意识现状做了调查,发现他们的感恩水平总体上是乐观积极的,但也有部分学生的感恩意识不强甚至很低,这些感恩意识缺失现象及问题,已经引起当今社会广泛关注和重视,因此大学生感恩教育理应成为当前高校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感恩中所体现出的积极品质和积极情绪体验,正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河北省某高校随机选取 4 个开设《大学生身心健康教育》选修课的班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为期 1 个学期的教学干预(实验组),并将

干预效果与另 4 个未接受教学干预的班级学生(对照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为实验组干预初和干预末的感恩意识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19.010, P < 0.001$);对照组干预初和干预末的感恩意识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3.735, P < 0.001$),但与实验组相比对照组得分涨幅低。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初的感恩意识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实验组干预末感恩意识总分高于对照组($P < 0.001$)。研究表明,积极心理学对提升大学生感恩意识有效。^[28]

张可、杨萌认为,“互联网+”背景下的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不同于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它不是简单地将心理健康教育从线下搬到线上,而是在教育理念和模式上进行创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应该调整自身定位,重新审视自身专业发展的现状与困境,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的引导者和领路人”,以迎接“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是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积累专业知识、实践专业技能、提高专业素养的过程。进入互联网时代,教育生态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人才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模式和师生关系等方面均有所体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教育变革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诉求。面对教师角色复杂化、教师信息素养能力不足和专业发展的支持系统不完善等现实困境,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可以通过完善专业培训制度、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教学支持服务体系、提高教师专业发展的主动性等策略来实现。^[29]

宋耀武、崔佳等认为心理学对教学设计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教学设计理念的发展与完善,与心理理论的发展,教学理论、传播理论、媒体技术的发展,甚至社会历史发展等因素密切相关。各种相关因素之间又存在着一种流动的交互关系,它们共同推动着教学设计的阶段性发展。教学设计的目标是解决教学问题、优化教学效果,其目标实现所采用的方法,与学习者的身心特点、学习目标设定、学习任务分析、学习动机激发、学习过程推进、学习评价改良等心理学所研究的内容息息相关。教学设计的发展与心理学

的发展相辅相成,心理学是理论导向,教学设计的实践导向;教育心理学研究学习过程的内部机制,教学设计则研究如何实现和调整学习过程。按照心理学发展历程可将教学设计演变进程分为前心理化阶段、行为主义阶段、认知主义阶段、构建主义阶段等四个阶段。在每个发展阶段,教学设计的目标与原则等关键要素都在发生变化。教学设计在学习者、学习目标、学习任务、学习情境四个心理因素的互相影响中,有选择地实现了动态发展。^[30]

王佳佳、牧新义等结合应对方式和自尊两个因素,系统考察消防官兵的总体幸福感。预期假设是:消防官兵的总体幸福感较高,常采用积极应对方式,自尊水平较低,应对方式通过自尊影响消防官兵的总体幸福感。亦即目的为探讨应对方式、自尊与消防官兵总体幸福感的现状和关系,以及自尊的中介作用。作者使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自尊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的方法,对河北某地区 11 个消防中队 144 名消防官兵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消防官兵总体幸福感水平较高,且两种应对方式均要高于其他部队军人得分,自尊水平低于其他陆军士兵得分;来源地在消极应对上存在显著差异($t = 2.807, P < 0.05$),年龄仅在积极应对上存在显著差异($F = 3.572, P < 0.05$);积极应对和自尊与总体幸福感均为显著正相关($r = 0.538, 0.974; P_s < 0.01$),自尊与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r = 0.512, P < 0.01$);积极应对和自尊对总体幸福感产生直接正向预测作用,并且自尊在积极应对和总体幸福感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89.97%。由此得到的最终结论为:积极应对不仅能直接影响消防官兵的总体幸福感,还能通过自尊间接影响消防官兵的总体幸福感。^[31]

(三) 心理学发展史

阎书昌认为,历史编纂学本义是编写历史,但它并非限于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而是同样包含着历史研究的理论以及方法问题,尤其是当下历史学界更强调它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论是历史学界由新文化史兴起而引发的“新旧史学”之辩,还是心理学历史领域的“旧”史与“新”史学的区分,都为当前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带来新的启发和开拓空间。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新历史编纂学使命在于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主要表现为:从内在史研究策略走向外在史策略,即从强调思想史到社会、文化背景下心理学实践活动史;从“宏大叙事”到“微观描写”,即从总结近现代心理学发展历程的内在一致性规律到进入具体心理学历史事件内部进行厚描(Thick description);从心理学大人物研究到心理学边缘人物研究,即以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发展历程参与者的身份再现他们的历史贡献;从文本文献到图像视觉、口述记忆文献,即搜集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进程中影像资料开展图像学研究;从纪念与歌颂到批判与反思,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多灾多难的发展历程绝非只用纪念、歌颂的方式就能理解地更为深刻,批判与反思的策略将带来不可或缺的洞见;开展心理学家心理传记学研究,以心理学家的生命故事为基础展开其心理学观点与实践活动的传记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的基石是文本文献和档案资料文献,乃至心理学家后人手中的私藏文献,它们将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发展历程的某些片段提供不可或缺的证据支持。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目标是在理解百余年历史的基础上,进而为审视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进路提供思考工具。^[32]

(张燕京:河北大学教授

穆青:沧州师范学院讲师

郑甲平:河北大学博士生)

参考文献:

- [1]张燕京,穆青.论戴维森的整体主义真理理论[J].河北学刊,2018(2).
- [2]穆青.戴维森基于真与意义的无指称的实在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
- [3]孙新会,李娜.紧缩论和公理化真理理论的匹配性问题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 [4]刘叶涛,魏良钰.“忒修斯之船”的逻辑哲学解读[J].人文杂志,2018(6).
- [5]刘叶涛,林艺霏.从逻辑的观点看道德悖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 [6]孙雯.防策略投票理论的逻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7]孙雯.投票理论阐释的新视角——从逻辑的角度看[J].世界哲学,2018(1).
- [8]赵贤,张燕京.“第三届京津冀逻辑论坛”召开[J].哲学动态,2018(4).
- [9]吴三喜.实在论——反实在论争论中的单子论问题[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
- [10]李伟斌.从日常理性到历史理性再到保守主义——休谟的微言大义[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11]王莹,尚琳琳.志愿服务的道德属性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J].道德与文明,2018(1).
- [12]黄云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底蕴和伦理意蕴[J].社会科学家,2018(5).
- [13]黄云明,唐鑫.寻求社会制度的伦理基础——河北大学博士生导师黄云明教授访谈[J].社会科学家,2018(5).
- [14]王莹,尹思聪.推动法治与德治在治国理政中协同发力[N].光明日报,2018-12-21.
- [15]柴艳萍,陈晓彤.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及其伦理价值[J].道德与文明,2018(5).
- [16]景枫.伦理在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探微[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8(1).
- [17]边林.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发展反思[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8(12).
- [18]杜莹,赵金萍.在医学生中开展涉医暴力危机管理教育的实践探索[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8(3).
- [19]边林.医患关系论——医患矛盾与冲突的医学人文社会科学思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
- [20]赵金萍.健康谣言的生命伦理透视——兼评果壳网《谣言粉碎机》[J].新闻战线,2018(2).
- [21]王素娟,张雅明.空间存在:虚拟环境中何以产生身临其境之感?[J].心理科学进展,2018(8).
- [22]贾宁,陈换娟,鲁忠义.句子启动范式下的道德概念空间隐喻:匹配抑制还是匹配易化?[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5).
- [23]贾宁,李聪慧,代景华.高中生元记忆监测准确性及其对学习时间分配的影响[J].应用心理学,2018(1).
- [24]宋耀武,王润洲,刘昌昊,赵小军.有意遗忘与自我参照:基于储存—提取模型的新方法[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8(1).
- [25]史云静.医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对其道德敏感性的影响[J].教育现代化,2018(26).
- [26]刘艳,马红霞,余银,于爽,李雨萌,梁钰芬.父母自恋人格对初中生亲子冲突归因方式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8(7).
- [27]刘艳红.亲密伤害——暴力家庭的家谱图和心理创伤探索性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
- [28]张定燕,郑凯,王丽芳.积极心理学对大学生感恩意识培养的实验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8(3).
- [29]张可,杨萌.“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J].中国成人教育,2018(2).
- [30]宋耀武,崔佳.心理学发展与教学设计的演变[J].教育研究,2018(7).
- [31]王佳佳,牧新义,崔占玲.应对方式与消防官兵总体幸福感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8(7).
- [32]阎书昌.新历史编纂学视野下的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2).

中外哲学史研究

郝晏荣

2018年度河北省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史三个领域,共有成果50多项,其中专著6项。本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成就非常突出,尤其是河北大学宫敬才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研究,今年的成果特别显著;中国哲学史研究保持其一贯的深度,并有新的开拓;外国哲学史研究原是河北省哲学研究的一个弱项,今年也有重要成果产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冯燕芳指出,列宁那里,领导权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资产阶级的保守和软弱,无产阶级承担了反封建的任务,这种阶级关系和阶级任务的错位是领导权的内涵之一。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抑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产阶级都应与其他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并在联盟中占据领导地位。这是领导权的内涵之二。为了获取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权,必须重视理论宣传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列宁的政治领导权理论中,无产阶级在阶级联盟中坚持领导权、重视理论宣传和知识分子的作用等思想,都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葛兰西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继承和发展列宁政治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后马克思主义典型代表拉克劳和墨菲又在后者的基础上,提出了话语领导权理论。如果不理解列宁的政治领导权,就无法理解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领导权;如果不阐发列宁的政治领导权,就无法彰显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1]

宫敬才指出,以往和现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不认为让当事人出场说话是方法,这与《资本论》运用该方法的事实不一致。作为方法的让当事人出场说话,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内在要求,是对劳动者表达自身诉求权利的有力保障,也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力武

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让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当事人悉数出场说话,借此使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全面厚重的经验事实根据。让当事人出场说话是马克思独具特色的经验主义哲学方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让当事人出场说话方法绝非仅是论证技巧问题。被叙说者如雇佣劳动者享有与政治经济学家平等的表达诉求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权利。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被政治经济学家叙说的经济事实与被叙说者是生命攸关的关系。二者皆表明,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让当事人出场说话是正确反映客观事实的科学性要求问题,同时也是重要的政治法律哲学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作为是典范,也是表率,后继者只有像马克思那样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

宫敬才指出,通行哲学教科书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表述似乎已成定论,然而检视马克思文献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文献便可明了,这些表述有缺陷,因为大量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没有得到表示存在的机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命名为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包括: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劳动哲学本体论、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工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围绕如何认识社会历史问题而展开,结果具有方法论性质。劳动哲学本体论是马克思思想整体的哲学基础,在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完成了哲学本体论思想史中的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劳动为本来看待人及其历史,就人论人地理解马克思人道主义理论是错误的。工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劳动的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是马克思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艺特点的理论成果之一。文献事实明证可鉴,马克思原生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核心范畴是劳动。马克思对劳动的理解朝社会历史研究方法论方向发展,哲学性成果是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朝哲学本体论方向发展,哲学性成果是劳动哲学本体论;朝人及其历史方向发展,哲学性成果是人学历史唯

物主义理论；朝技术基础和组织基础方向发展，哲学性成果是工艺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四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有机统一，构成马克思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3]

宫敬才指出，马克思语境中，准确全面理解资本家范畴是准确全面理解资本范畴的前提条件之一。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语境中，少见以资本家范畴为研究对象的成果问世。此为应当改变的状况。马克思从各不相同的角度看待资本家，目标聚集于资本家的职能。资本家的即时经济职能是追逐剩余价值，社会历史变迁意义的工具性职能是为未来社会创造物质前提。马克思对资本家的看法中存在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其一，资本家依据管理性劳动提出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是否合理？其二，资本家在推动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让农民等非资本家阶级和非白人的其他种族付出了言语无法表达的代价。这样的代价应否补偿？谁来补偿？补偿了吗？放大学术视野来看，马克思对资本家的看法有理论来源，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解释以资本家不断分化的历史演化过程为客观根据。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存在货币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又产生出产业资本家。这种资本家用自己的资本进行生产并管理自己的企业。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计算范围的判断就是根据这种资本家的情况作出的。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产业资本家又发生了分化，即分化为自有资本且自己管理的资本家和借入资本但自己管理的资本家。这里的情况已经变得复杂，但产业资本家管理性劳动的性质又清晰了一步，马克思剩余价值计算范围的缺陷已显露出来。再到后来，产业资本家又进一步分化，即既不是自有资本也不是借入资本但管理企业的单纯经理出现于社会历史舞台。^[4]

宫敬才指出，人们在研究马克思思想衍化历程时往往倾力关注其阶级立场和哲学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向，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第三种转向，即哲学方法论的根本性转向。其结果可想而知，马克思思想衍化历程得不到真实再现，相应的方法论转向被虚无化。与此相伴随，我们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学科）、专著和论文中，很难见到关于马克思独具特色的经验哲学方法论的内

容。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历史中的惊人一幕，作为剧中人的研究者身在其中却浑然不知。没有哲学方法论的根本性转向，阶级立场和哲学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向就难以实现。不能实现这两个根本性转向的马克思主义到底何谓，只有借助于想象才能给出猜测性答案。依据马克思的研究实践和相关文献，再现马克思独具特色的经验哲学方法，是历史赋予研究者的责任。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主长期探索的结果，与马克思思想体系一同成长。其主要内容是：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衍化过程、探寻内在联系和关注细节。独具特色的经验哲学方法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缺失这种方法的马克思思想体系具有不完整性。鉴于此，马克思独具特色的经验哲学方法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教材、专著和论文中应有其理论表达的机会，秉有天然的存在权利，占有相应的理论地位。^[5]

宫敬才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历史有30余年，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历史是20年。世纪之交经济哲学研究发展到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是重大进步，但“瓶颈”性问题凸显出来：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仍未得到重视和研究。研究和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才能深化一步，其体系性架构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命题中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哲学。马克思经济哲学存在形式承载的内容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内生变量，准确理解前者，才能对后者作出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文献的理解和阐释。进入21世纪，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有了新变化，什么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问题成为关注和探讨的焦点。几种看问题的角度对人们理解何谓马克思经济哲学的问题具有启发意义，但其中存在着共性且是“瓶颈”性的问题：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存在形式是什么？虽然稍后有人在自觉意识层面提出和探讨这一问题，可惜的是学术界几无反应。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在自觉意识层面探讨和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就无法深入下去。这是我国目前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急待解决的问题。^[6]

宫敬才指出,马克思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语境中开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其核心范畴、基本问题和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哲学思想是他必须面对的对象。要使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确立起来,任务之一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即制度前提批判、人学前提批判、阶级立场批判和方法论批判。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同时进一步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这种批判由四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制度前提批判、人学前提批判、阶级立场批判和方法论批判。批判过程是本质展示的过程。私有财产制度的历史起源本质是对劳动者生产资料的剥夺,经济学本质是对剩余价值的侵占,哲学本质是劳动异化;人学前提的本质是“敌视人”和“否定人”。其中的物即“经济人”中的“经济”才是要害。资产阶级经济学阶级立场本质往往被“科学”宣示掩盖起来,真实内容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本质是“超历史和反历史”,出于为资本辩护的需要而随意抽象和归类。^[7]

宫敬才指出,马克思长期探讨政治经济学中的方法问题,稍加梳理是如下情况。第一,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初试身手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自己的方法论主张,要用经验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第二,13年之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为其写有长篇导言,该导言的第三节篇幅最长,题目便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第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有不少插入语,其中为数不少的部分针对方法论问题,此为独特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资源。第四,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写的《跋》中,马克思畅谈政治经济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是严格区分研究方法方法与叙述方法,二是清楚地说明自己的方法与黑格尔方法之间的关系。第五,在个人性通信中,马克思多次谈论政治经济学方法问题,例证如下:“只有抛开相互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立,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有……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五个方面的情况向我们证明了事实的客观存在,马克思确实长期且是不

拘形式地探讨和论述政治经济学中的方法问题。综合起来看,从1843年10月至12月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到1845-1846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解剖典型的方法论思想经历了从萌芽到基本形成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哲学紧密交织的研究过程使内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且为政治经济学所必需的方法论思想有了突破性、标志性的成果。这样的方法论研究成果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研究如虎添翼,以至于开始于1850年代的第二次大规模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神速。^[8]

宫敬才指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理解为用于生产的物不同,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是矛盾集合体,马克思为我们揭示出来的是五种矛盾性质:表现形式与实际内容之间的矛盾、商品生产与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财富生产与其内在本质的矛盾、消费中节约与浪费之间的矛盾和目标追逐与其社会历史性后果之间的矛盾。出现于我们面前的资本矛盾性质是一种证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哲学性质,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资本的理解更深刻全面,更能逼真地再现资本的本来面目。如果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把资本理解为用于生产的物,那么资本便与矛盾无关;如果把资本理解为生产关系,那么资本中便存在矛盾,或者说资本是矛盾集合体。有感于此,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至少有四次指出资本的矛盾性质:“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资本本身就是矛盾。”“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基于此,把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界说为《资本矛盾论》名正言顺。^[9]

宫敬才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劳动范畴出现于叙论商品二重性环节,旨在说明商品二重性源于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暗示读者,马克思的劳动范畴只具有政治经济学含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劳动范畴出现于叙论物质生产力环节,旨在说明生产力的要素构成即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暗示读者,马克思的劳动范畴具有哲学含义,但它

被包容于生产力范畴之中且从属于生产力范畴。检视马克思文献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文献便知,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颠倒了劳动与生产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在马克思原生态语境中,生产力包容于劳动范畴之中且从属于劳动范畴,是劳动的内涵之一。学术专著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例如洛维特在他那部著名的《从黑格尔到尼采》中说,“马克思始终仅仅在经济学上把握劳动问题”。这样的判断与马克思文献中有关劳动的真实思想南辕北辙。上述例证是“盲人摸象”行为,马克思劳动范畴丰富内容的大部分被这种行为丢掉了。回到马克思原生态语境,依据文献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文献理解劳动范畴就能发现它具有:原型性质、历史性质、预设性质、创造性质、受动性质、技术性质、组织性质、法权性质和基础性质。这些性质客观存在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构成的主、客体关系之中,是劳动范畴的题中应有之义。^[10]

宫敬才指出,中国自觉接受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已有近百年历史。这一历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历史使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质的飞跃,这一历史过程的代表性人物是毛泽东。改革开放后,国人面临的历史使命是让国家强大和使个人富裕,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质的飞跃。与第一次质的飞跃的理论内核即为什么要革命和如何革命相比,第二次质的飞跃的理论内核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此为建设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可以从纯理论层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不同意见,但明证可鉴的事实是,正是这一理论使中国获得独立和尊严,变得繁荣和强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两个方面的理论任务时时提醒其不能停却前进的脚步。一是不断从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中吸取于己有益的成果;二是在自觉意识层面提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类型学问题,即革命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建设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的结果将会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演化逻辑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演化历史是多么地有机统一和相互印证。^[11]

李维意指出,所谓世界交往,是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市场的历史过程,它以资本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以世界市场的开辟、占有、利用、扩大为手段,表现为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普遍联系。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交往最初是由资产阶级所主导开创的,它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但却把劳动和资本的矛盾由民族、国家扩展到了整个世界。世界交往最终将把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发展到顶点和最高阶段,它奠定了马克思“两个必然”的现实性基础。在世界交往所创造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背景下,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开始向实践逻辑飞跃。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和深远的实践意蕴。从本质来看,马克思的世界交往具有社会实践本质、历史地理本质、政治经济本质、思想文化本质;从特征来看,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是时间性与空间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从功能来看,马克思的世界交往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时代,形塑了世界市场的空间,推动了世界文学的发展,奠定了人类解放的基础。深入研究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对于理解“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都具有重大意义。^[12]

黄逸超指出,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法律价值论以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为基础,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价值哲学以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本体哲学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哲学价值论是马克思法律价值论的哲学基础。以往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受苏联《联共党史·四章二节》中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阐释的影响,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物质本体论,进而也将马克思的法哲学本体论理解为物质本体论,基于法哲学物质本体论将马克思法哲学价值论也理解为物质价值论或客观价值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是实践本体论或者叫劳动本体论,从社会实践出发或者从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实践即劳动出发认识世界才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特点。马克思的价值论不是物质价值论或客观价值论,而是主客观统一的实践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法律价值论也不是客观价值论,而是基于实践价值论的主观统一价值论。马克思认为法律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社会、抽象与

具体、阶级性与人类性以及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对立统一。劳动哲学本体论和辩证法是马克思法律价值论的哲学基础,只有坚持劳动本体论、劳动辩证法和劳动历史观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法律价值论。^[13]

田海舰指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考察人类社会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发 展实际和历史趋势出发,把共同体划分为“自然共同体”“抽象的或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三大发展阶段和历史形态。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使每一个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一生的不懈追求。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学理基础,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实现“真正的共同体”,使每一个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一生的不懈追求。可以说,其全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命题而展开的。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真正继承和创造性发展。^[14]

田海舰指出,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三个倡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在价值观上的集中反映,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4 个词”“8 个字”,是立足国家层面提出的价值目标,回答的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国家的重大问题,是中华民族的崇高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目标,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根本任务和价值旨归。毛泽东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不断思考和探索推进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途径和途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研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贡献,有助于科学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有助于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

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四个自信”。^[15]

二、中国哲学史

李宏亮认为,在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法家思想大体分为三派,可以称为早期法家。韩非子的思想是在对三派思想兼收并蓄而后集其大成。韩非子认为,要实现社会的安定和富强,使用儒家所倡导的不成文礼制和难以把握的以德服人之术,根本不会对社会产生好效果。相比较而言,用成文的规范法律,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平等和一致才是十分有效的。在韩非子看来,人的道德行为单单依靠仁德教化,根本行不通。如果想得到好的道德行为,就必须对不好的道德行为进行严厉惩罚,使大家不敢违背道德,在这个意义上讲,道德是建立在严格的法治基础上,单纯的道德很难发挥作用。君主依靠法治来确立和管理人们的道德行为,很快就能实现君子与小人都遵守社会规范、人人都清廉正直的理想社会。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人人趋利避害、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特征之上,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他对人性的剖析过多沉溺于人性恶的论调之中,但在当时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变革中,韩非子提出的道法相生,法内无为,法应随时而变,轻罪重刑等治国理论确实也符合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其表现的积极的历史进化观是值得肯定的。在我们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6]

李宏亮认为,贤人政治曾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在社会的特定环境下,有众多学者将其视为人治,认为其是造成官员滥用职权,官员等级僵化,破坏社会流动性等众多社会顽疾的根源,我们暂且不管其理论上的辩论,起码“选贤任能”即让优秀的人而不是无知者成为管理者,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普遍的价值认同。官吏如何作为,将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先秦循吏是贤人为政的一个典型,春秋战国时期,贤人政治思想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儒墨都提出尚贤的基本政治框架,但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循吏列传却只记载了五个人,选贤任能虽然普遍成为列国国君任用官员的共识,但这些“贤能”却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行政能手。那么这些被载入史册的行政高手到底都有哪些高明的施政方法呢?司马迁在继承先秦吏治思想的基础上,强调的循吏是“奉法循理”的品格体现。在《史记·太

史公自序》中有对循吏“百姓无称，亦无过行”的记载。“百姓无称”的意思是说不居功自恃；“无过行”，并不是说他们不犯错误，而是实事求是，勇于担当，不徇私情，使百姓无可挑剔。各位“循吏”的事迹及其为政特点，互相融合补充，共同勾画出循吏的总体为政风格，使得“奉职（法）循理”的内涵更为丰满，尤其是在循理上，体现了为政者的仁爱和德政，应该更为贴近我国贤能政治的本质。^[17]

张少恩认为，“孟子学”指的是针对孟子其人、《孟子》其书所展开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孟子》文本所进行的版本考证、文字校勘、章句注疏等文献考据；或者对孟子思想中的概念范畴、论断观点所进行的义理阐释和创造发挥的孟子哲学研究；或者对孟子研究的发展流变所进行的分析考察与梳理汇总，并探寻其变化规律和发展逻辑的孟学史研究。孟子学研究包括孟子哲学研究和孟学史研究两部分。1978年以来，随着学术环境宽松和学术交流发展，孟子学研究打破地域局限，两岸、国际趋向合流，形成多元视角，取得显著成就。孟子哲学方面，国内摆脱日丹诺夫模式的局限，经历了学术回归、成长、成熟的过程；港台学者或关注“人性向善论”的争论，或从比较哲学的视角援引康德、海德格尔诠释孟子。包括通史与断代史的孟学史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的新探索：孟学通史方面，黄俊杰引入诠释学理论，尝试建构儒家经典诠释学；孟学断代史方面，学界集中于汉唐、两宋与清代，而对于元、明孟学史有所忽略。概言之，孟子哲学研究成就突出，而孟学史研究的规模与深度有待提升。作为学界的当前研究热点与未来趋势，孟学史应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合理平衡微观个案与宏观思想史的关系，从而拓展研究深度，提升研究层次，推动孟学史研究的独立与壮大。^[18]

张少恩认为，郭沫若基于唯物史观，注重从社会背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阶级分析等立足点出发对孟子进行探索与批判；凭借翔实的史料、文献为基础，涉及文献学、考古学、音韵学、哲学等学科；把孟子放到先秦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脉络下进行梳理，从晚周的社会环境中分析孟子与思孟学派的学术路径，还原历史真相，开阔研究视野，在学界影响很大。首先，郭沫若基于其历史学家考证历史文献的基础对孟子展开研

究。其次，郭沫若从诸子间比较视域出发，分析孟子与荀子、告子、墨家、道家等诸子不同之处，能够从宏观与微观，纵向横向角度全面把握孟子及儒家的研究。第三，最重要的是郭沫若以人民本位立场衡量和评价孟子。五四之后学术界弥漫着批孔的言论，马克思主义者皆以西方的唯物史观为武器对孔孟进行批评，而郭沫若坚定地认为孔孟是人民本位，在唯物史观“反孔”浪潮中坚持孔子的正面作用难能可贵。^[19]

张少恩认为，梁启超思想的变化性在其在一系列的孟学阐述中多有体现，从早期的《读孟子界说》《读春秋界说》《论中西学术思想之变迁》（1902），到后来的《读〈孟子〉遗稿》（1918）、《先秦政治思想史》《孟子之编纂者及其篇数》《孟子之内容及其价值》《读孟子法》等著作中。探究梁氏的孟学诠释似乎无章节可循，其实不然，梁启超的孟学研究与其整个思想体系具有内在理路的一致性，这条不断变化的思想脉络与时代的发展和任公自己的思想轨迹相关。梁启超早年受其师康有为的影响，基于政治功利的目的，在《读孟子界说》中梁启超通过诠释孟子来奠定维新改制的理论基础，指出孟子的贡献主要在于经世致用。孟子传承的是大同之义，主张“天下为公”，但是荀子主张小康之学，秦汉以来的两千年的专制社会为荀子小康之学，政治制度推行“霸道”，只关注一国的治理，没有上升到“天下”的境界。因此，应该通过阐发孟子“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从而实现改良的维新之道。梁氏晚年思想趋于成熟，摆脱了早年的激进主义，趋向渐进与保守，这种趋势在其对孟子的解读中也可以体现。^[20]

张少恩认为，熊十力虽然没有关于孟子的专门论述，但其整个哲学体系完全体现了孟子的思想，这一点在熊先生的本体论、修养论、治化论体系中都有体现。熊十力“新唯识论”的思想来源与孟子思想有很大关系，孟子的性善论、操舍存亡的修养论、内圣外王的民本思想都是熊氏思想哲学体系建构的源泉。一般而言，熊氏的体系有三个来源：一为佛学的法相唯识宗；二受康德、叔本华、柏格森等人影响，吸取近代本体论、知识论的西方哲学；三即儒家哲学《易经》、孟子和陆王心学等思想。熊十力涉猎佛学西学而归宗孔孟，撷取佛学唯识宗精华而去其

弊，吸收西学而弃其失，归宗儒家《易经》、孟子心学、王夫之等思想构筑新唯识学体系。牟宗三曾说：“《新唯识论》融合孟子、陆王与《易经》而为一，以《易经》阴扩孟子，复以孟子陆王心学收摄《易经》，直探造化之本，露无我无人之法体。”熊先生对孟子的研究体现于其一系列著作之中，诸如《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释》《乾坤衍》《读经示要》等。^[21]

张少恩指出，胡适以杜威实用主义为基础，吸纳怀疑主义、进化论，糅合理学思想与朴学考据，创立一整套孟子学研究方法论。该方法论以平等主义和价值中立对待孟子在儒家的地位；用“科学实证”的方法考辨孟子的生平和著作；借鉴“明因求变”研究方法，分析孟子的时代背景，探索孟子及其后学内在发展逻辑；引入“历史演进法”剖析孟子井田制性质，回应学术争论。胡适孟子学方法论开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之先河，拓展孟子研究新视野；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援西入孟”应以维护孟子生命学问本身为前提，尽量避免方法论化的格义与解剖。胡适对于儒学与孟子的研究就是在此视域中展开。胡适以西方启蒙理性为立足点，吸纳实用主义，借鉴科学主义方法论，融合理学、朴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创立科学主义一元“方法论”哲学，即实验主义。以此方法论哲学为框架纳入孟子的思想，多角度分析孟子想的起源、发展与流变，探索孟子思想的体系与学术特色，考察孟子出生地、生平世考。通过整理、剖析、评判来探索孟子思想的源流与发展以及孟学中的现代性因素。^[22]

李振纲指出，王阳明虽然没有专门的易学著作，却有丰富的易学思想。他精通易道，不仅知易乐易，而且玩易占易，对《易》有着特殊的敏感、彻悟和信仰。王阳明写于不同时期的诗文、游记、奏疏、书信，处处蕴含并洋溢着易道哲理和人文精神。心即易，易即心，阳明心易贯通的“道”在其亦儒亦宦、亦文亦武、亦顺亦困、亦真亦幻、知行合一的生命实践中得以亲证。阳明心学的泛易学情结，至贵州龙场贬所而益加浓厚。心学家爱讲悟道时神启般的特殊经历，此所不论，但门人所记阳明的心路历程是真实的。悟道意味着良知本体论的奠立，它为“知

行合一”说确立了前提和根据，标志着阳明心学的诞生。其实，阳明心学的豁然贯通，与此间如醉如痴地“玩《易》”颇有关系。贬谪异地，苦旅他乡，灵台无寄，阳明把全部心思用在了如何安身立命问题的思考上，玩《易》无疑是最好的方式。潜心读《易》几乎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依托，阳明把玩“《易》”之感受与快乐描述为“始其未得”“其或得之”“得而玩之”三个不同的阶段。心即易，易即心，易道有多么广，心灵就有多么大。心学与易学的贯通，为阳明立身天地间找到了精神的本原，这样《乾》卦《文言》传中的“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在阳明心学中也就有了着落。^[23]

李振纲认为，朱伯崑《易学哲学史》沿用经学史上汉易、宋易、清易的传统说法，却能不囿于经学史上正统异端、汉易宋易、义理象数的门户之见，其易学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义理而不轻象数，用文献说话而不独断空谈。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其对汉代易学特别是“孟京易学”之肯定和重视上。朱伯崑曾将汉代易学（汉易）研究风格归结为三种倾向：一是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宋人称其为象数之学，注重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经传，以卦气说解释《周易》原理，利用《周易》宣扬阴阳灾变。二是以费直为代表的费氏易学。费氏易传虽已失传，但从班固所述及其后世影响看，此派易学不讲卦气说和阴阳灾变，注重《周易》经传的义理，是汉初陆贾《新语》、韩婴《子夏传》《韩诗外传》中零散发挥的人文易学精神的继承发扬。三是将易学与黄老思想相结合来讲阴阳变易学说的道家易学，《淮南子·天文训》、西汉后期严君平援《易》入《老》的《道德经指归》及其弟子杨雄易老合一的《太玄》是其代表。这三种倾向的易学并非截然对立的。^[24]

李宏亮认为，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其与中国文化结合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在儒家文化的结合上，没有一个恰当的方式。《百丈清规》的面世，突破了佛教戒律制度中国化的困局，标志着中国佛教从之前的改良道路转向了创新道路。《百丈清规》的创制，从中国文化背景出发，结合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实际情

况和丛林寺院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发展，其与原有的戒律制度相比，不但更加易于中国佛教信徒为接受，而且很好地解决了中国佛教寺院管理的实际问题，因此《百丈清规》迅速传遍了全国，成为禅宗寺院最重要的管理规范。甚至其他宗派的佛教寺院也参考《百丈清规》制定其管理制度。自此之后，禅宗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百丈清规》的创制成功，得益于禅宗大师敢于突破陈规束缚，因地制宜地处置问题的首创精神。后世佛教的禅师，沿袭了这种因地制宜的精神，并没有完全墨守《百丈清规》的所有条文，而是根据自身寺院的实际情况，在遵守其基本精神的情况下，不断地对寺院管理制度的具体内容进行调整，从而适应变化的形势和不同的情况。这是后世佛教禅宗不断更新发展，在全国乃至东亚地区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25]

向慧认为，道安（312~385）晚年在长安组织翻译小乘毗昙一事，在其建树颇丰的一生中，不及禅学和般若研究那么引人注目。但是，毗昙论书对佛教名相的阐述，恰恰提供了道安认为最恰当的解释经典的方法，为其学习禅学和般若提供了资粮，也是道安晚年重视毗昙翻译的重要原因。道安力图沟通毗昙、禅法与般若，给予不同的思想以恰切的定位，是道安在佛教大小乘并传背景之下进行的有益尝试。以这一线索来审视道安，更容易把握其思想的连贯性。道安搜求毗昙，并非热心于有部论书中主张的“实有”观点，而是专注于毗昙名相解析方面的优长。正是这一优长，成为了道安解决他当时面临问题的“万能钥匙”。其一，对待格义问题，道安极力否定，摒弃连类和比附，力图以佛教的方式理解佛教。在这个目标之下，道安尝试过合本之法，总结过数法，并对经典的翻译近于苛求。而毗昙中对名相的大量说明，可修正在格义过程中产生的误解。其二，在禅法的修持上，道安认为，止观是通向涅槃的关路，鉴于晋土禅观弛废的现状，他留意到了安世高译经的“禅数最悉”。他潜心研究多部禅经，写序作注，通过辨名析理的方式，修正前贤对禅法的错误理解，使禅法的实践者有法可依。其三，在般若研究中，道安一方面肯定了学习毗昙的名相是进入般若研究的基础，“平数以成经”，另一方面，用以把握般若空观的小乘禅法又是借毗昙得以阐明的，故毗昙

又间接地为空观的证悟提供了条件。^[26]

程志华提出，为了弥补康德哲学的“缺陷”，牟宗三立足于中国哲学，通过肯定人具有“自由无限心”，进而肯定人具有“智的直觉”，对应性地证成了“物自身”为一个“价值概念”，从而不仅“稳定”了“物自身”，亦“稳定”了“现象”与“物自身”之“超越”的区分。对于“物自身”价值概念的证成，牟宗三认为他避免了其“消极的意义”，而证成了其“积极的意义”。所谓“消极的意义”，指康德以“物自身”为不可知，不具有可知的内涵。他说：“他（指康德——引者注）也很一致，因此取消消极的意义而说物自身不可知，因为物自身不能对我们呈现，我们只能逻辑推论（by logical inference）地设想一些。”所谓“积极的意义”，指自己肯认“物自身”作为“价值意味的概念”，具有可知的内涵。在此，牟宗三使用“消极”和“积极”两个反义概念，意在通过两个概念的反差来表达其超越康德哲学的意图：康德的“物自身”为“消极义”，牟宗三的“物自身”为“积极义”；康德关于“现象”与“物自身”之“超越”的区分未能“稳定”，牟宗三关于“现象”与“物自身”之“超越”的区分得以“稳定”。对此，牟宗三自己评论道：“我与康德的差别，只在他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因而只能承认‘物自身’一词之消极的意义，而我则承认人可有智的直觉，因而亦承认‘物自身’一词之积极的意义，而以智的直觉之有无决定‘物自身’一词之或为积极的意义或为消极的意义，则总成立。”^[27]

程志华提出，“生活儒学”的理论建构分为三大步骤：其一，“破解”，即“开解”，指“拆除”已有“儒家形而上学”的“理论大厦”，揭示“形而上学”构造之初的“生活本源”，为儒学重建“清理场地”。他说：“生活儒学的破解工作，不过就是从传统形而上学向生活本身的探本溯源，从而说明形而上学、包括儒家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破解乃是一种‘开解’——开塞解蔽。”其二，“回归”，指通过“破解”，回归“生活本身”，回归人们的真正“家园”，阐明“生活本身”的“本源结构”。黄玉顺说：“生活儒学之所谓回归，则是通过破解，回到生活这个本源。而此生活本身既非经验主义的经验生活，

也非理性主义的先验生活,甚至也不是海德格尔生存论分析那样的“此在”的生存。”其三,“构造”,指以对“生活本源”的“生活感悟”为基础,重新建构“形而上学”本身,进而建构诸如逻辑学、知识论、日常人伦等“形而下学”。他说:“生活儒学在破解传统那种‘无本的’(孟子语)和‘无家可归的’(海德格尔语)形而上学的同时,拒绝‘后现代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倾向,主张积极的形而上学重建,并自始至终把这种重建工作建立生活感悟的地基上。”直言之,“生活儒学”的基本理路是探本溯源,揭示原始儒家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儒家形而上学”。^[28]

三、外国哲学史

于建星指出,斯密对人的责任及其责任的担当有许多精彩独到的论述。他通过“同情”“合宜性”以及“公正的旁观者”等概念揭示了责任形成的机理以及责任担当合宜性,这些均是匠心独具的理论创新。斯密并没有从主观臆断出发,而是坚持从人心理活动等经验出发,从而给人以更多的亲切感与信服感。他又极为重视宗教在人的责任感培养中的作用,这对于那些生活在具有强烈宗教文化背景中的人而言既是亲切又是真实的,而对于不具强烈宗教背景的人而言同样具有借鉴意义,那就是如何造就人对道德(义务)的敬畏感,这对于人们担当责任与履行义务是至关重要的。斯密认为义务的履行应是合宜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合宜的义务人们有拒绝与不服从的权利。一位看似保守的思想家骨子里竟然有如此激进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斯密的整个理论由于过于重视经验而缺少形而上学的基础,这就使得其理论的系统性与自洽性存有局限。^[29]

张燕京指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逻辑建立新的语言分析方法以来,诸多学者对传统的真之符合论予以批评。戴维森并非是要全盘否定传统的真之符合论。他承认传统的真之符合论中的“符合”的直觉,却不满足于其对于“符合”概念的说明。他认为,一个句子为真表达了一种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但反对以“事实”这一含混的概念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他还认为真值是一个句子为真或为假的属性,但不同意将语句从语言整体中割裂开来。戴维森提出,一

个句子为真,实际上是指:一个特定的说话者,在特定时间,所说出的这个句子为真。由此,他建立了关于句子、说话者和时间的三位谓词:Ts, u, t。戴维森运用塔尔斯基的满足概念完成了对于“符合”关系的说明,提出了一种新的符合论真理的一般理论形式。戴维森所倡导建立的真之符合论本质上是一种融贯的真理理论,是一种同语言语境相符合的真理理论,因此是一种整体主义真理理论。他运用语言分析方法构建新的真理理论,堪称语言哲学研究的典范。^[30]

冯燕芳指出,第二国际时期是资本主义从自由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的特殊时期,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都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都对资本主义新变化做出了理论反应。在三种不同反应中,拉克劳和墨菲刻意向我们展示出偶然性逻辑的逐渐扩张。但是,偶然性逻辑并没有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而是受到来自多方面的限制;考茨基看到了历史偶然性的存在,但并不承认它的有效性;伯恩斯坦充分承认历史偶然性的存在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也打开了从阶级统一到政治统一的思考空间,为拉克劳和墨菲建构领导权概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索列尔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阶级统一体,在多方面给予拉克劳和墨菲启示。在阶级统一体或政治统一体的建构中,领导权概念隐约“现身”。这正是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开始就花大篇幅谈论第二国际的原因。^[31]

(郝晏荣: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冯燕芳.列宁的政治领导权:错位与联盟[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8(1).
- [2]宫敬才.论马克思《资本论》中让当事人出场说话的方法[J].人文杂志,2018(4).
- [3]宫敬才.论马克思的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 [4]宫敬才.论马克思的资本家范畴[J]学术研究 2018(5).
- [5]宫敬才.论马克思独具特色的经验哲学方法[J],河北学刊 2018(5).
- [6]宫敬才.论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存在形式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8(6).
- [7]宫敬才.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哲学基础的批判[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1).
- [8]宫敬才.马克思解剖典型方法的形成[J]河北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 [9] 宫敬才.马克思论资本的矛盾性质[J] 社会科学论坛, 2018(3).
- [10] 宫敬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劳动范畴的性质[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
- [11] 宫敬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问题[N].中华读书报, 2018-4-11.
- [12] 李维意.论马克思世界交往的本质、特征及功能[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6).
- [13] 黄逸超.马克思劳动哲学视阈下法律价值论思想[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1).
- [14] 田海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探析[J] 伦理学研究, 2018(1).
- [15] 田海舰.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的理论贡献[J] 保定学院学报, 2018(1).
- [16] 李宏亮.韩非子治国理论的逻辑[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 [17] 李宏亮.先秦“循吏”施政特征探析[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2).
- [18] 张少恩.改革开放 40 年孟子学研究:学术回归与方法多元[J] 社会科学战线, 2018(8).
- [19] 张少恩.郭沫若孟子学研究初探[J] 中华文化论坛, 2018(12).
- [20] 张少恩.坚守与嬗变之间——以梁启超孟子学研究为中心[J] 社会科学家, 2018(4).
- [21] 张少恩.“仁心本体”与“体用不二”——以熊十力孟子学诠释为中心[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
- [22] 张少恩.范式与路径——以胡适孟子学研究的方法论为例[J] 学术探索, 2018.(7).
- [23] 李振纲.阳明心学的泛易学特质[J] 哲学研究, 2018(2).
- [24] 李振纲.朱伯崑“孟京易说”生命哲学发微[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
- [25] 李宏亮.《百丈清规》对当代佛教寺院管理的启示.中国宗教[J] 2018(3).
- [26] 向慧.道安对毗昙、般若及禅法的沟通[J] 法音论坛, 2018(9).
- [27] 程志华.“物自身”何以可能[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 [28] 程志华.存在即生活,生活即存在——“生活儒学”之形而上学的建构[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 [29] 于建星.亚当·斯密的责任担当合宜性思想探析[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5).
- [30] 张燕京.论戴维森的整体主义真理理论[J] 河北学刊, 2018(2).
- [31] 冯燕芳.拉克劳和墨菲为什么要“重读”第二国际[J]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2018, (3).

法 学

法学理论研究

董颖

2018年,河北法学理论研究主要围绕法治中国建设、法哲学、文化法等方面展开,党内法规建设成为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但在法制史等领域研究成果减少。学科研究的传承和持续性应引起关注。

一、法治中国建设

(一) 中国法治发展回顾与展望

武树臣、武建敏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法治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深入探讨。他们认为,在新时代,要注意避免法治建设中的“西化”思想倾向,同时要慎重而合理地对待法治发展中的道德合理性。今天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出西方类型的法治,中国法治四十年的实践印证了这样的结

论。如果照搬西方的法治教条,可能会使中国法治建设一筹莫展。经过四十年的探索,回顾以往、定位当下,就是要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使法治建设具有更多的中国元素,深入到社会的深层挖掘中国自身的法治资源,已经成为时代的共识。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才是正确的法治发展道路,也才是真正的实践精神。中国法治建设四十年表现出了对道德的追求。道德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对于法律而言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它在向法律渗透的过程中赋予了法治以价值合理性。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道德追求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和标准,是实现“良法善治”的基本前提。作者还提出

要树立法治类型学的思维,走出一条真正属于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在法治的道德问题上,作者主张一种行动主义的策略,法治建设需要坚持实践理性,着力于解决现实的流动世界的矛盾与冲突,而不能停留在文本的世界中,必须在法治动态的意义上把握中国法治发展。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也体现了一种实践主义的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新时代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根本的指导和准则,落实“知行合一”“脚踏实地”的实践精神,树立实践性法治发展观。作者认为一种慎重的法治态度应该是理性的、稳健的、实践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关系到每个个体及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幸福,只有通过真正的行动才有可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种“践行”精神所具有的务实品格正是脚踏实地的实践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我们切实有效的“行动”加以落实。^[1]

(二) 党内法规

伊士国从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主体、客体、指标体系、评估程序、方法、评估结果及其运用等几个方面对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制度化进行了探讨。认为通过对党内法规进行实施后评估,有利于及时发现党内法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有利于提高党内法规的质量,如期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在今后的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工作中,应将自主性评估与他主性评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不同评估主体各自的优势。此外,由于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组织实施、评估对象的选择、评估指标和程序的设定、评估结果的做出等都是由评估主体完成的,因此评估主体是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工作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必须根据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工作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评估主体。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指标体系是指用来进行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工作,由多个有机联系、层次分明、各部分权重设置科学合理的指标形成的标准综合体,其解决的是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标准或依据问题。一般说来,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方法有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两种。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结果及其运用主要是指在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工作结束后,要撰写党内

法规实施后评估工作报告,对党内法规的质量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总结分析,并将之运用到不同的部门或场合,党内法规的“立改废”工作提供基本的依据。^[2]

伊士国、郭康认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主体与对象,解决由谁评估和评估什么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制度构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具体实施主体主要包括党内法规制定部门、党内法规实施部门以及专业社会评估机构三类,相应地在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实践中形成了自主性评估主体模式、他主性评估主体模式以及多元化评估主体模式。无论是单纯的自主性评估主体模式,还是单纯的他主性评估主体模式,都不尽完美,各有利弊。在我国立法后评估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多元化评估主体模式,即将自主性评估主体和他主性评估主体结合起来,强强联合,发挥两者各自优势和作用,但也有其自身缺陷。要发挥上述三种评估主体模式各自优势,并克服其弊端,就应构建一种新型的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主体模式。从我国立法后评估实践来看,多元化评估主体模式应是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工作的首选,但不应仅以党内法规制定部门或党内法规实施部门为主导,也可以由专业社会评估机构为主导。因而,要构建的新型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主体模式就是以专业社会评估机构为主导的多元评估主体模式。作者还提出了新型多元化评估主体模式的建构原则和路径,认为为了实现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必须构建新型多元化评估主体模式操作规范。另外,由于目前我们党内法规的种类和数量繁多,不可能对每一部党内法规都进行实施后评估,只能选择其中有现实评估必要性的党内法规进行评估。因而,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对象选择的范围即有现实评估必要性党内法规的范围,探讨这些党内法规有评估的现实必要性的原因。^[3]

(三) 农村法治化

刘志刚、贾少涵提出农村普法教育要超越过去普法“独进”、司法行政机关“独唱”、普者“独热”的小格局,构建适应新时代的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新时代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就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度,立足现阶段农村实际,把农村普法教育纳入新时代依法治国

大视野和全民普法教育总体布局当中,以实现新时代对农村普法要求为目标,充分整合城乡资源,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各部门分工负责、齐抓共管,全社会尤其广大农村居民(以下简称村民)积极参与,全面创新普法内容和形式,充分满足新时代农村对法治建设需求的新格局。建立农村普法教育内容新体系。其重点和难点,在于构建“三教”结合新内容体系。为此,需要按照“三治”结合的要求,明确和正确处理“三教”之间的关系。其中,自治是核心,让村民当家做主是乡村治理的本质与核心;法治是保障,德治和自治都要通过法治规范和保障;德治是基础和引领,法治和自治都要通过德治体现和引导。最终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创新农村普法实施机制。完善农村普法教育运行与保障机制。一是创新普法模式。运用传统的实地调研与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方式,准确把握村民法律需求,并连接普法、司法、执法部门和基层单位,以法律需求为导向,进行精准普法、互动普法;二是推动普法教育工作立法,优化农村普法环境,同时,把法治文化建设纳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推动农村法治文化建设。^[4]

董琦认为,农村法治化是我国法治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在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还存在法治建设不完善、普法教育缺失等问题。农村法律服务的主体缺乏,普及不广泛。尽管我国现行的法律服务体系在不断完善,但总体上将城市作为重点,农村的法治建设工作仍然相对滞后。农村专业法律人才严重匮乏。出现配置不协调的现象。必须探析加强农村法治建设路径,不断完善农村服务法律体系,构建法律公益服务体系,加强普法教育,引导农民群体不断提高对法治的认识和了解,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公益型法律服务体系。国家要完善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并且在其中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公益型法律服务存在诸多方面的特殊性,必须要由政府和法律部门进行调整,从而减少法律服务费用。要有一个最高收费标准,收取的法律服务费不能超过这个标准。此外,也要采

取不同的措施来为农民提供服务。^[5]

(四) 司法改革与公众参与

陆洲认为,公众参与司法是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其基本理论问题应进行深入研究。对公众参与司法之意涵的厘定,应注意公众主体的适恰性。公众参与司法的主体经历了从“群众”到“公民”再到“公众”的发展历程。“公众”更能表达和实现公众参与司法的合理性与广泛性。同时,应注意公众参与司法行为的外部性、实质性、广泛性和有限性。在价值层面上,公众参与司法有利于促进司法民主,培养公众法治意识,最终实现政治民主;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增强司法公信力;有利于协助司法运行,提高司法能力。但公众参与司法也存在相应的短板,相关的补救措施是:基于公众参与司法之理性不足的特点,进行理性引导,通过普及法律知识,推进司法公开等,发挥公众参与司法的作用;基于公众参与司法的合法性缺失,确立相应规范,针对不同的司法阶段,创设不同的形式,在公众参与司法的范围上,应以法律规范明确公众参与司法的边界,对于公众参与司法的程序,也应该在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基于公众参与司法的有效性之不足,通过建立长效保障机制加以弥补。要提高公众参与司法的实效,让参与成为实质性参与。^[6]

(五) 核心价值观与立法

杨福忠认为,立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指引、评价和教育作用。立法之所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首先是由法的价值判断属性决定的,其次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需要,第三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首先要将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贯彻到立法当中去。因为就法治的运行机理而言,法治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其中,立法居于前提和基础性地位,执法、司法、守法都是以立法机关所立之法为依据。立法体现核心价值观状况,直接影响着执法、司法和守法活动中能否践行核心价值观。因此,将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应当重视发挥立法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作用。立法体现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实现形式包括转化为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其中转化为法律规则是效果最佳的一种选择。国家应该建立保障机制以确保每一部立法都

体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7]

二、法哲学

武建敏认为,司法中的实践智慧是一种思想方式,也是一种实践方式。作为思想方式,实践智慧是法官对司法合理性的一种判定方式,一项司法裁决是否合理,关键要看是否满足了实践智慧的基本要求。作为实践方式,实践智慧就是法官进行司法裁决的方式。实践智慧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思想与行动的契合。由于司法与法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古代司法中所蕴含的实践智慧也正是中国法内含的实践智慧。古代司法的实践智慧包含了道德维度,道德作为实践智慧的内在元素,为司法活动提供了引导性价值。古代司法的实践智慧还包含了经验的维度,经验作为实践智慧的组成部分,构成了古代司法活动娴熟技艺的基础;古代司法的实践智慧具有辩证法属性,无论是在普通与具体之间,还是法律与道德及情理之间,古代法官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充分体现了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属性。从司法观照法本身,作为实践智慧的法反对法条主义,倡导情境主义,肯定人治主义的合理性,表达了鲜明的价值论立场,同时主张行动的自主性。相比于古代司法,今天的司法已经缺失了道德的维度,即缺失了司法实践智慧的道德维度。当司法被功利主义和经济至上所控驭的时候,司法的灵魂和法律的精神就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这应该是当代中国法治谋划所需慎重考量的问题。让司法回归生活世界,让司法回归实践智慧,让司法回归经验世界,正是确定当代中国司法合理性的根本前提。换一种视角而站在实践智慧的立场去理解和把握司法的改革,会生成真正属于我们自身的司法哲学及其方法论。走向实践智慧是摆脱迷茫的基本路径。^[8]

武建敏探讨了当代法学教育中理论训练的必要性,认为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突出地强调了“实践教学”,但却并未领会“实践”的真谛,与理论的游离更使“实践教学”日益显示其片面性。理论训练的缺失使得法学教育显得幼稚且浅薄,沉浸在部门法知识化学习当中却遗忘了背后的理论元素。缺乏理论训练的法学教育无法培养学生强大的思想世界,更难以有效提升法律实践的层次和水平。这就要求法学教师必须首先

训练自身的理论素养,展现思想的魅力。同时加大课程设置中理论课的比重,理论课程的开设不仅应该包括法学的理论,而且应该包括相关学科的理论。法学内的理论课程既包括理论法学的理论课程(这些课程是从各自的角度对法的一般理论和原理的探讨),也包括部门法学的理论课程。另外,部门法学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就是是否具有自主性的理论原理。理论训练应该体现在每一门法学课程当中。法学理论教育内在地蕴含着一种精神教育,精神的嵌入将在最高层面上提升法学教育的质量,这也是中国法治建设所必需的。拥有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法律理论,用这些理论去武装法科学生,中国的法学教育才有希望。一个没有理论的教育模式必然是盲目的、依赖性的,没有理论就不可能真正创造中国自己的法学教育模式。法学教育所当有的精神是和法学中的理论性能内在相通的,只有把握了法的理论性能,才能够真切理解法的精神价值,进而理解和把握法学教育精神维度的重要性,一种法学教育在塑造学生理论素养的同时所需要造就的被培养者的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创造了一个法治的世界,正是这样的精神在支撑着法治国家的法学教育。作者强调了法学教育中的去功利化问题。认为在功利化的情景中法科学生失去了真正内在的精神追求,而法治生的思想世界,就是要把青年学生塑造成为富有国家责任感的个体,这正是法学教育者不可推卸的责任。^[9]

刘国利探讨了文化多样一体的法哲学范式。提出多样一体文化在文化资源、文化活力以及文化发展诸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是一个社会文化繁荣的基础条件。建立文化多样一体的法哲学范式可以为论证包容性法治提供话语体系。当前文化法哲学学科建立的重要工作是寻找和梳理其理论渊源。在法哲学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在文化体系中居于支配、主导地位,文化多样形态亦是不可缺少的;社会主义文化主导的文化多样一体具有较大的利益涵盖性,具有更大的价值包容性和更强的公共有序性。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多样一体思想集中体现为“和而不同”、“中庸”的适度、平和思想,在挖掘和梳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内在因素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古代法制中利益倾向和价值倾向常常重视当时的“主流”文

化、忽视文化多样性。这种情况加剧了不同文化主体的对立、治理模式的频繁更迭和成本高昂的变革。三是文化人类学关注对他者文化的借鉴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传统文物的保护。文化的多样与一体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不仅要坚持文化的一体性，而且要在守牢底线的前提下，提高对文化多样性的包容程度。社会主义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文化发展史的巨大创新，意味着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新的光彩。应当保持中华文化血脉的延续性，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创新发展。在我国文化多样性上，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和精神凝聚、共有共护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团结和谐的精神家园，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主导、主流的核心价值观进程中，在守牢底线的前提下，包容性程度越高，党的事业越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党的执政能力越强大，社会越和谐，人民越幸福。^[10]

三、文化法

宋慧献探讨了文化促进法的基本原则和构成等问题。指出文化促进是以经济、制度或政策等手段，实现公民文化活动的自由、平等与活跃。政府实施文化促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依法落实公民的文化权利。政府文化促进措施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政府实施文化促进的力度并无绝对标准，需在整体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背景下做协调性衡量。文化促进法应遵循文化自由权优先保障、文化促进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市场运作与政府促进相协调等原则。就实体规范来看，文化促进法的内容主要涉及文化财政资助法、文化设施提供法、特殊人群文化利益促进法、文化遗产法以及特殊文化领域的发展促进法等。我国当前尚需建立健全合理而高效的文化促进法律制度。作者对我国文化促进依法治理的现状与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完善立法、建立合理而高效的文化促进法律制度，是摆在我国文化治理过程中的紧要任务。首先，制订完备的文化促进成文法体系，是文化法治的重要基础；其次，建立合理而高效的文化促进制度与机制，是文化促进法治化的关键环节。文化促进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应该具有合理性与高效性；再次，我国应通过制度建设，充分调动社会

力量支持文化发展；最后，文化促进法律制度的设计要全面而具体尤其要做到权利、权力与责任的确定和明晰。^[11]

崔璨关注到农村历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关完善措施。认为加强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一个亟待重视的课题。一些地方历史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农村的特有文化与地方性特征正在快速消亡。而农村历史文化遗产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缺少专门立法、割裂式的保护方式、不健全的监督惩戒机制等导致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堪忧。立法的细化割裂了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仅是对特定区域中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的一个原则性规定，缺乏实际操作性。依法保护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对丰富农村地区文化和全面保护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作者认为要实现农村历史文化遗产整体性、有效性保护，采用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专门立法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将农村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统一到一部立法当中予以整体保护，既可以规避以上两种模式的不足，实现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又能够不破坏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中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完整统一与内在联系。在国家层面尚未出台针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立法的情况下，地方可以先行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状况的地方性立法，以保证地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够有法可依。应当通过制定专门立法、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扩大法律保护范围、完善事后救济机制等方式加强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建议对适用公益诉讼制度的情形做扩大解释，只要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的需要，都可以适用公益诉讼制度，立法应当对有权提起诉讼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做进一步解释，明确其范围。与此同时，要赋予普通公众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诉讼主体资格。这样不仅可以规避因诉讼主体不确定导致诉讼不成立的问题，而且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参与农村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12]

四、法制史

王志敏、张蕾认为，北宋年间的熙宁变法是古代历史上一次承上启下、波澜壮阔的改革，在北宋历次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

深。但熙宁变法的内容中蕴含的法治理念和现代财政管理制度的先进思想却未能延续下来。因此,研究熙宁变法的现实借鉴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熙宁变法失败的教训之一是不不要把改革的成败寄予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变法之所以能取得比北宋前期变法更大地成就,离不开宋神宗坚定的支持,而熙宁变法最终失败也与宋神宗帝王权术密切相关。我国古代历次重大改革无不因时而生却因君主更迭而失败,所以人治或专制的社会也能引起社会的变革和带来社会进步,但是缺乏制度即法的统治,即使再好的改革举措也难以持久。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也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充分借鉴和吸收我国以往历次改革的成功与失败经验,无疑有助于更有效地开展此次改革^[13]。

五、专业理论问题

徐均、王森炎探讨了过失认定中汉德公式量化存在的困境,并分析了消解困境的“修正的汉德公式”。认为随着法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引入,汉德公式标准应运而生,可以认为是过失认定标准的进化,但依然存在量化困境。根据间主观性理论,传统标准和汉德公式标准统一于主客观连续统,传统标准客观性较弱而非纯主观,汉德公式客观性较强而非纯客观,故难以量化实属必然。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此困境,在假定原始汉德公式具有准确概率 N 之基础上,提出包括四个命题的“修正的汉德公式”。指出“修正的汉德公式”可能是目前唯一旨在提升汉德公式判定准确度的理论进路,同时其简洁清晰之特质也可以为司法实务部门的操作提供较大的便利^[14]。

六、法律教学

董琦、杜婉音等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为例,从现阶段警察院校就业形势与政策需求着手,分析现阶段就业指导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师资配备、体系课程分配等多方面问题,找出相应的对策,为便捷入警机制出台之后警察院校就业指导课程体系的改革和调整,提供参考意见。指出当前警察院校毕业生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不足,主要表现为就业指导课程体系不完善;就业

指导课程讲授内容较为滞后;缺少稳定、专业的师资力量;师资的培训和科研较缺乏等。并提出了警察院校就业指导课程的改革与对策:一是完善就业指导课程体系建设,增加警察职业教育内容;二是精化课程讲授内容,丰富教学手段;三是加大师资培训经费投入,争取职称单独评定;四是建立与用人单位合作的长效机制,确保就业指导无缝对接。总之,就业指导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实践需要以用人单位岗位实际需要为指导,以现有警察院校的教学大纲为基础,有针对性且有创新性地开展警察院校的就业指导课程教育活动,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课程、大学生择业教育等就业指导课程内容进行改革,提出更有特色、更适合警察院校的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程教学,同时促进教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理论研究指导等多方面从而建立具有警察院校特色的就业指导课程体系^[15]。

(董颖: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武树臣、武建敏. 中国的法治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回顾与展望[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4).
- [2] 伊士国. 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制度化[J]. 人民法治 2018(4).
- [3] 伊士国, 郭康. 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主体与对象[J]. 党内法规理论研究 2018(11).
- [4] 刘志刚、贾少涵. 新时代农村普法教育要有大格局[J]. 人民论坛 2018(4).
- [5] 董琦. 为农村发展注入法治能量[J]. 人民论坛 2018(3)上.
- [6] 陆洲. 我国公众参与司法的价值挖潜及短板补救[J]. 甘肃社会科学 2018(5).
- [7] 杨福忠.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法路径[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18(3).
- [8] 武建敏. 古代司法中的实践智慧—以兼及法作为实践智慧的基本立场[J]. 人大法律评论, 2018(1).
- [9] 武建敏. 当代法学教育中的理论训练[J].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 [10] 刘国利. 文化多样一体的法哲学探源[J].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 [11] 宋慧献. 保障并落实公民文化权利[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 [12] 崔璨. 农村历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困境与出路[J].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 2018(4).
- [13] 王志敏, 张蕾. 熙宁变法的现实借鉴[J]. 河北工程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14]徐均,王森炎.汉德公式量化困境及其消解以间主观性为视角[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15]董琦,杜婉音,黎璐玮.便捷入警机制下的警察院校就业指导课探析——以中央司法警官学院为例[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8(5).

部门法学研究

肖 辉

2018年,河北省法学界在部门法学研究领域延续已有特色,门类齐全,各有建树,数量、质量均有进一步增加和提高。宪法及宪法性法律主要围绕公民权利、政党制度、国家权力、监察制度、国家安全和立法制度等展开;行政法涵盖行政管理、行政干预、行政执法、行政裁量、行政程序、行政监管、交通及边境管理等多个方面;诉讼法涉及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和仲裁以及证据制度,还涉及公益诉讼热门话题;民商法则包括民事主体、民事行为、婚姻家庭、物权制度、合同制度、侵权及其他民事责任、知识产权、商法研究等,其中知识产权有了质和量的进一步提高,而商法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公司制度;刑法在理论研究上有了更大上升,总则研究基本与上年度持平,分则研究反而有所下降,就事论事式的单一分析实证方法被系统性研究所替代,表明厚度在增加;经济法仍是主要的研究门类,从企业制度到金融、保险、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税收、会计、环境保护等,连续多年没有缺位;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继续保持适度规模;军事法研究数量尚可,但研究内容有所发散;司法及相关制度等交叉研究领域范围广泛,从司法改革到司法运行,从审判制度到检察制度再到法律援助等配套制度,从各类治理到纠纷解决机制均有涉猎,势头强劲;而国际法研究中,除公法、经济法较为稳定且稳中有变外,国际私法也突破近似空白的状态,有了相应成果。内容上看,国家安全、网络监管、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纠纷解决等热点问题已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

一、宪法及宪法性法律研究

(一) 公民权利

宋慧献从保障并落实公民文化权利入手,对文化促进立法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文化促进是

以经济、制度或政策等手段,实现公民文化活动的自由、平等与活跃。政府实施文化促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依法落实公民的文化权利。文化促进法治应遵循文化自由权优先保障、文化促进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市场运作与政府促进相协调等原则。我国政府一直重视文化促进工作,在当前,需要建立健全合理而高效的文化促进法律制度。^[1]

宋慧献还进一步研究了文化促进法的基本原则,认为,文化促进是以经济、制度或政策等手段,对文化事业实行扶助、支持、推动,以助其发展。依法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是国家的文化义务,是其实施文化促进的正当性基础之所在。实行文化促进法治,应遵循文化自由权优先保障原则,文化促进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原则,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原则,市场运作与政府促进相协调原则等。^[2]

高志明对个人信息的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予以分析,认为,个人信息既具有人格利益又包含财产利益。个人信息人格利益理论强调确定个人信息自决权、通过法律全面保护个人信息人格利益。个人信息连带关系理论、社会主义信息法学思想可以阐释网络社会的个人信息互联关系。个人信息财产利益理论涉及功利主义、隐私经济学和个人信息商品化理论,注重个人信息所蕴含的经济价值,注重商业利用个人信息,以发挥其最大效用。^[3]

朱振洁研究了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路径,认为,大数据在创造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给个人信息安全带来了挑战。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对《网络安全法》的内容进行细化,构建信息控制权体系,并对信息主体“信息控制权”的权利以“同意规则”进行限制,并在借鉴国外立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设计出法律规制为主导、行业自律

为辅并成立专门监管机构的“三位一体”的法律保护模式和完善的共治体系。^[4]

（二）政党制度

伊士国研究了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主体与对象问题，认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主体与对象，解决由谁评估和评估什么的问题，是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制度构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主体包括组织主体和具体实施主体两类。由于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组织主体一般是党内法规制定部门，因而，应当重点探讨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具体实施主体，并明确其主体与对象。^[5]

伊士国还研究了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制度化问题，认为，如同立法实施后评估，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也是党内法规建设的必要环节和重要内容，有利于及时发现党内法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有利于提高党内法规的质量，如期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6]

（三）国家权力

任广浩、解建立对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变革及其法治化探索展开研究，认为，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单一制国家，如何在制度上设计和规范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间的权力纵向配置始终处于治理结构的核心地位。改革开放 40 年来，围绕构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地方分权自治相结合的权力结构，进行过多轮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的改革探索。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为基础的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改革，进一步向纵深领域发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改革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各级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改革，仍停留在行政性分权层次。要巩固改革成果，就必须实现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由政策主导向立法主导转移，以宪法的相关规定为统领，形成规范政府间纵向责权划分与运行的一整套法律体系。^[7]

（四）监察制度

方资、聂晶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监察委员会的留置措施进行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留置措施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监察法（草案）》处于立法阶段，对适用留置措施的情形

进行了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完成社会意见征求工作。因此应加快制定留置措施规范化管理规定，切实加强被留置人员的权益保护，监督执法，提高执法人员素质。^[8]

（五）国家安全

刘志勇对中国跨境反恐的路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认为，随着世界全球化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恐怖组织对我国海外利益及人员安全造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多，我国境外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我国跨境反恐路径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跨境反恐的成效。只有综合考量政治、法律、战术等问题，进一步构建反恐力量体系，完善我国反恐法律体系，细化反恐战术行动，才能有效维护国家海外利益免受恐怖活动威胁。^[9]

刘春玲对反恐法律责任的泛化问题作出研究，认为，由于我国反恐法治经验和原理认知不足，《反恐怖主义法》实施及相关配套法规还不健全等原因，对于以“巨额反恐罚单”为代表的反恐法律责任的设置和追究能否造成“反恐法律责任泛化”现象的出现，进而可能对公民权益实现、国家反恐效率及社会平稳发展等造成负面影响等问题，亟待厘清。^[10]

张冬、黄东升从警卫视角出发，对“独狼”式恐怖袭击的特点及防范对策展开研究，认为，“独狼”式恐怖袭击作为一类传统、特殊的恐怖袭击方式，在信息时代下逐渐演变为恐怖主义实施破坏活动的主流趋势。“独狼”分子具有动态难掌握、身份难识别、危害难控制等特点，要想对“独狼”式恐怖袭击威胁采取行之有效的管控，警卫部门就必须牢牢把握杜绝“独狼”分子产生、避免“独狼”式恐怖袭击发生以及袭击发生后危害减免等关键环节。在警卫视角下应对“独狼”式恐怖袭击，警卫部门要从孕育“独狼”分子的源头监控入手，优化既有安保制度，提升“独狼”式恐怖袭击发生时警卫应急处突能力。^[11]

宋维才立足于反恐战略视角，对边防社区警务反恐问题加以研究，认为，边防社区警务反恐是边境地区反恐怖斗争的源头性、基础性工作，是对传统被动应对式反恐手段的新突破，是全民反恐的战略支撑。应充分利用社区警务的资源优势，最大化地动员社区民众，建立健全社区警务反恐工作新格局，完善反恐工作体系，坚持专群

结合、依靠群众，以社区为单位，加强反恐联动，形成全民反恐的社区警务新思路。^[12]

马振超研究了边民国家安全教育的路径问题，认为，我国边境地区的外部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内部安全问题不断凸显，部分边民的国家安全意识不足，加强边民的国家安全教育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当前，边民国家安全教育存在重视程度不足、师资能力有待提高、内容和形式滞后、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重点从提高政府部门的重视程度、加强师资能力建设、创新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完善相应的体制和机制等方面，做好边民的国家安全教育工作。^[13]

（五）立法制度

杨福忠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法路径展开研究，认为，立法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指引、评价和教育作用。立法之所以体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首先是由法的价值判断属性决定的，其次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需要，第三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立法体现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实现形式包括转化为立法目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其中转化为法律规则是效果最佳的一种选择。国家应该建立保障机制以确保每一部立法都能体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14]

杨福忠还立足于诚信价值观法律化视野，具体研究了我国社会信用立法问题，认为，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不仅存在于观念层面，而且更主要地存在于规范层面。把诚信价值观的要求由道德诚信转化为法律诚信，能确保诚信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培育和有效践行。在中国，将诚信价值观的法律化具有必然性，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重建高信任度社会所需要的。诚信价值观的法律化有两种实现途径，而制定专门的信用立法是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中国未来的社会信用立法应采用集中立法模式，即由全国人大制定专门的信用信息管理法。信用信息管理法应确立如下主要制度：建立失信行为的认定标准，信用信息采集和披露的负面清单制度，信用信息符合正当目的的使用制度，失信行为的惩戒制度，以及信用修复制度。^[15]

宋振业对行政立法专家咨询制度进行探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部门法律的合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我国的法治建设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规范行政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行政立法专家咨询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修改和完善，切实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备的行政立法专家咨询制度。^[16]

陆洲、杨梅则立足于商谈规则的视野，就立法论证问题作出研究，认为，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体逐渐多元化，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亦变得错综复杂，如何保证立法的公正合理，使其能够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立法论证存在于立法过程的各个阶段，对于合理公正的立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就我国现状来看，立法论证由于起步较晚，仍存在大量的不足。为此，可以借鉴商谈规则原理，从基本逻辑规则、普遍证立规则、商谈资格和商谈方式规则三个角度出发对我国的立法论证加以完善。^[17]

二、行政法研究

（一）机构编制

王志颖、杨福忠就机构编制管理的法制化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机构编制管理法制化是指由有权机关进行机构编制立法，将机构设置管理和人员编制管理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它有利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解决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利于保障机构编制改革的成果。在我国，机构编制管理法制化有国际经验可以借鉴。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时可采用集中立法模式，将“三定”制度、编制实名管理制度等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18]

（二）行政管理

王金兰、梅媛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法治化路径作出研究，认为，国外高等教育有分权制、集权式以及分权与集权混合模式等管理体制，给大学以自主权是其共性。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经历了探索期、确立期、行政体制改革深化期，以及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深化改革深化期，既有经验，也有不足。因此，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法治化道路上，应实现高等教育立法体系化，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解决教育分权、内部管理体制、投资渠道多元化以及高效监督制约机制等

问题。^[19]

(三) 行政干预

楚琳、李清华结合具体案例,对美国联邦教育部干预高等教育的措施展开研究,认为,当前,美国教育部在评估高等教育机构财务、大学生财政援助、联邦援助计划资格认证、高等教育项目实践、保障大学生安全、高等教育信息公开等具体干预措施中均存在问题。因此,需要教育部行使恰当的高等教育职能,减少不规范的法规,改进低效用的高等教育项目,降低行政负担,减少高等教育机构的运营成本,使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转向高效性和精简性。结合我国情况,则需要不断回顾和检验政策措施实践的有效性,并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现实,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明确高等教育核心任务、调整高等教育干预措施、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更新政策实践的技术手段、明确高等教育相关主体责任、提升高等教育信息公布有效性等方式,推动高等教育改革,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保障高校学生的公平发展。^[20]

(四) 行政执法

左冬梅就森林公安林业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进行研究,认为,森林公安是林业日常执法部门,林业行政执法在某种层面上关乎林业总体质量。然而,从目前森林公安执法总体情况来看,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对我国林业事业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为此,应当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切实解决这些问题。^[21]

高瑞祥对公安机关执法公正的内涵意义和标准作了研究,认为,公安机关执法公正,是指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照法律规定,正当地履行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职能,充分发挥法的作用,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即法的首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赋予了“执法公正”在公安工作中的全局性、根本性地位,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现实需要。是公安机关发挥自身职能的使命所在。就公安机关执法活动而言,要达到公正的基本要求,应当符合职权法定、权利保障、裁量得当和高效便民的标准。^[22]

(五) 行政裁量

尚海龙对行政裁量的个案正义原则进行研究,认为,个案正义原则是由平等原则所衍生的控制行政裁量权运作的重要法律准则。无论是同

时在多个案件中行使裁量权,还是先后在多个案件中行使裁量权,行政机关都应当认真考量案件的不同情况,在此基础上作出最适当的决定,而不得进行“一刀切”式执法。否则,违反个案正义原则,会构成行政裁量怠惰之违法。^[23]

(六) 政府购买

马雁就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结构性风险与声誉激励法权治理作为出研究,认为,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理依据、法源结构和法律关系来看,其治理机制重点在于构建声誉激励与诚信约束的法权治理机制,基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流程中的三方法律关系及潜在的结构性风险,凸显法益衡平价值,在时间轴与项目轴上,以多次合作模式形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完全信息佚名博弈,阶段博弈的个体理性效果与重复博弈的策略均衡后果一致,该结构可印证多阶段非合作行为与单次博弈的理性合作契合,形成参与方声誉激励法权治理结构,具体通过增强市场机制效能、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系的法权配置体系、增进公益治理与共享发展等方面,针对其法权结构风险形成具体的预防措施。^[24]

(七) 行政程序

陆洲、于晴晴结合河北省具体情况,就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进路问题加以研究,认为,通过对我国17个省份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比较考察,河北省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进路应当是:在立法原则上,坚持科学决策原则、民主决策原则与依法决策原则;在立法框架和具体内容上,除总则、决策动议、法律责任和附则外,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分别作为专章予以规定。关键在于界定重大的范围包括重大决策事项范围与主体范围及运用科学的立法技术进行决策程序设计,并且在与中央立法保持一致前提下,充分考虑地方特点,进一步实现立法的精细化。^[25]

(八) 行政监管

赵凤华对新时代广播电视节目监管的新规范作出研究,认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节目备案管理和违规处理的通知》发布,意在加大对广播电视节目的监管力度,整治运行秩序,健全监管体系。当前,广播电视节目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严格按照这一新

的规范要求进行监管,结合自身职能,切实吃透通知精神,更好地服从并服务于新时代发展要求。^[26]

(九) 交通管理

肖辉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相关问题加以探究,认为,交通事故案件情况十分复杂,不同于一般案件,而交通事故认定书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审查上,一般应强调驾驶人员职业上的注意义务;从性质上说,尽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具有一定行政行为的性质,但就法院审理的角度而言,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一种特殊的证据比较适宜;在证据类型上,不能简单将其划归到某一个证据种类。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对其进行审查、核实、质证并最终决定其效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非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起诉的必经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可援引以往做法,当事人因道路交通事故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要求其提交公安机关作出的事故责任认定书,确因情况特殊难以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或未按时及时制作出来的,告知当事人催促公安交管部门尽快做出,对其起诉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则可暂缓受理。^[27]

刁道远、冯兆蕙研究了高速铁路安全的社会公共责任问题,认为,目前社会认识普遍存在误区,认为高速铁路安全是铁路系统内部的事,与自己关系不大。然而,高速铁路点多线长,影响安全的因素极其复杂,仅靠高速铁路系统内部很难实现安全需求,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共同维护高速铁路安全。因此,在不断强化高速铁路安全内部防范的同时,也应强化高速铁路安全的社会公共责任,这就需要界定其内涵,细分其内容,定位其属性,探索其实现途径,为高速铁路安全治理提供理论依据,以社会共治的方式,依靠全社会力量维护高速铁路安全。^[28]

朱方强立足于分享经济视阈,对共享单车的法律问题及协同治理作出研究,认为,分享经济和共享经济是两种经济形态,分享经济不同于共享经济。分享经济是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创新模式,而共享经济是互联网经济的升级模式。而通过对共享单车经济模式的法律探究,可以整体把握共享单车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将共享单车押金纳入监管体系,规范引导共享单车市场

发展,而政府则应该包容审慎地监管,以形成与社会协同共治的监管治理模式。^[29]

陈亚婷研究了“网约车”的相关法律问题,认为,科技的发展必然会导致许多新鲜事物的产生,新事物的出现必然会冲击传统的经营模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约车”现象应运而生。“网约车”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法律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和关注。^[30]

(十) 边境管理

马振超、李丽对中越边民跨国的流动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中越边民的跨国流动与国家的边境管理具有一定的张力。国家语境下,边民自发的跨国流动容易造成边境地区无序的社会状态,影响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边民视角下,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是基于民族文化认同下的生活方式,边民间有着跨国流动交往的现实需要。有序的国家边境管理意志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意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边民跨国流动下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国家严格边境管理存在着无形的冲突。因此,国家需要做出制度性调整,充分尊重边民的社会主体地位,通过国家治边意志的边境地方化和再社会化,在保障边民合理跨国流动需要的同时,有效落实国家的治边方略。^[31]

杨旭、张燕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促进内蒙古陆地口岸边检站发展的相关问题,认为,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内蒙古陆路口岸在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凸显。陆地口岸边检站在内蒙古自治区深入推进中蒙俄三国经贸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线区域国际合作开辟新的空间,加快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促进内蒙古陆地口岸边检站发展,有利于内蒙古陆地口岸边检站科学的规划自身工作,推进边检管理工作顺利开展。^[32]

黄新宇、周修杰则研究了广西边境地区的偷渡问题,认为,打击边境地区偷渡活动是营造和谐边疆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必要保障。目前,广西边境地区偷渡入境活动呈现高发态势,偷渡方式日趋多元,境内外“蛇头”相互勾结,反偷渡形势异常严峻。对此,公安机关应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加

强警民间的联系,对边境线实施联合布控,并通过加强地区之间以及国际间的警务合作,加大对偷渡活动的打击力度。^[33]

四、诉讼法研究

(一) 民事诉讼

蔡志勇研究了处分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问题,认为,现阶段在民事诉讼中,处分原则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对于处分原则来说,不仅可以保障人们的根本利益,同时还对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对处分原则在民事诉讼适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切实保障处分权。^[34]

刘宇晖、白静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完善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于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已经初步得到确立,在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是否合理、管辖制度是否完善、标的物的处分规定是否合适仍存在疑问,在实践中产生诸多矛盾。因此,有必要就以上问题加以深入探究,以期完善。^[35]

刘宇晖、胡钰彬还就我国民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制度加以反思,认为,地域管辖制度在管辖制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国现行立法和理论界对于管辖制度现状的误读,以及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一直影响管辖制度的运行。德国、台湾地区、美国在地域管辖制度的设置上各具优势,我国也应该在借鉴境外经验的同时,适当地转变观念,从立法层面对我国地域管辖制度作出调整,修改立法。^[36]

另有学者对民事诉讼释明制度的完善对策作出研究,认为,目前,释明制度是世界各国非常重视的民事诉讼制度,可以更为有效地防止当事人因为对于相关法律规定认识不足而造成的实体上不应由其承担的不利后果。从目前来看,我国当前对于民事诉讼释明制度的建设还不是非常完善,需要进一步研究。^[37]

(二) 刑事诉讼

有学者对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交互作用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体现在二者的构造及制度方面的交互作用。因此,需要对二者间的作用关系加以梳理,进而让二者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

应用。^[38]

陈奎、么冬霞对我国普遍辩护的现实困境及其因应策略展开研究,认为,刑事辩护率低是困扰我国刑事诉讼的问题之一。在当前司法改革形势下,为突显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司法公正等目标,刑事辩护亟须改革,由有限辩护向普遍辩护迈进。然而,普遍辩护与诉讼效率和有效辩护短期内可能产生的冲突,以及良好辩护环境和制度保障的缺失是推进普遍辩护进程中的障碍。为此,从刑事案件类型化下的差异辩护、被追诉人自主辩护及制度构建等方面寻求解决之道就显得尤为必要。^[39]

(三) 行政诉讼

李静研究了滥用行政起诉权行为的规制问题,认为,自2015年5月1日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及其配套的人民法院立案登记制度实行以来,行政诉讼案件呈井喷式增长态势,在新法实施前许多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案件得以进入诉讼程序,对积极推动解决行政争议具有重大意义。但与此同时,滥用诉讼权利、恶意诉讼现象层出不穷,尤其是政府信息公开类型的行政诉讼案件成了滥诉的高发地,甚至有原告一人就同一事项启动了100多起行政诉讼。可见,在司法实践中滥用诉权问题急需解决。^[40]

(四) 公益诉讼

秦鹏、田韶华对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问题予以探析,认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基于我国国情的一项诉讼制度设计,基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完善以及司法机关试点工作实践,其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建立,但其受案范围的界定、起诉条件等仍不完善,在诉讼实践中行政公益诉讼启动条件模糊、诉讼程序设计不合理等问题较为突出。我国应该明确检察机关作为原告的角色定位,适当扩大受案范围,逐步完善“诉前检察建议+正式提起诉讼”的“双轨”运行制度,探索建立多渠道的案件信息共享及线索移送机制,从而更好地完善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41]

郭雪慧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案登记制进行研究,认为,立案在司法程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当事人有冤情而得不到立案,司法目的将难以实现。过去60年,我国一直都是实行立案审查制度,很多案件不能进入立案程序。立案

登记制有助于破解诸如环境案件立案难的困境,但是,也要防止环境公益诉讼滥诉的发生。毕竟尽管这种制度自身存在着很多优势,但是,作为我国实施的一项新型的法律制度,在具体的运用中出现了多种问题,法官的审案压力倍增,实践中容易出现滥诉与恶意诉讼等。进一步完善该项制度,可以有效解决环境公益诉讼等案件的立案难问题。^[42]

(五) 仲裁制度

王碧军对法律实务中仲裁协议无效的认定问题作出研究,认为,仲裁在民商事领域是重要的解决纠纷途径之一,因其具有高效、便捷、保密的特点,使其在商事领域备受欢迎。而仲裁协议作为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提交仲裁的书面文件,是申请仲裁的必备要件,更是仲裁法律制度的基石,在仲裁程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缺乏仲裁意思表示、仲裁事项约定不明、仲裁委员会约定不明等都会导致仲裁协议无效。因此,在签订仲裁协议时,应尽可能避免因仲裁协议无效而使仲裁无效的情况,切实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43]

(六) 证据制度

叶亭亭研究了微信在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实践中的应用问题,认为,快速发展的科技,使得相关电子文件就成为重要证据。越来越多的民事纠纷案件会涉及电子数据,在某些案件中,电子数据甚至发挥着决定案件审判结果的关键性作用。这一现象决定了类似于电子签名、QQ聊天记录、电子邮件、微信语音或文字以及其他形式的聊天记录等以计算机和手机等电子设备为载体的电子数据在民事司法实践领域的广泛运用。微信作为近年来新兴的日常交往软件,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产生的法律问题、法律矛盾等让微信作为电子证据的体现越来越多,微信聊天记录在民事诉讼中已经成为重要的证据。^[44]

赵冬静则研究了刑事证据收集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三个部门各司其职,而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侦查。侦查是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途径,也是检察院据此起诉的基础,同时也是法院定罪量刑的关键。但是在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在证据的收集方面仍存在一定问

题。追根溯源,法律法规不完善、物质保障不足、评估机制欠缺以及侦查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因此,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建立评估机制及提高侦查人员素质是解决相关问题的关键。^[45]

四、民法研究

(一) 民事主体

田韶华、肖向婷对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民法总则》对宗教活动场所法人资格的定位,将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界定为非营利法人、公益性法人和捐助法人,并将其区别于宗教团体法人,这样界定有诸多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的成立条件中,《民法总则》允许具备法人条件的宗教活动场所取得法人资格,但并未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必须登记为法人。其治理结构应设有法人机关,包含决策、执行、监督三个机构;宗教活动场所法人享有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但需依据宗教事务条例对其财产权进行保护和限制。同时,在宗教事务中,其需要对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教职人员和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等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46]

杜晓建探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制度,认为,《民法总则》在特别法人一节中,做出了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规定,明确了其法人地位,这是我国《民法总则》的一大亮点。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存在其特殊性,该法人缘起于从互助组发展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阶段绝大多数地方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处于这一阶段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和完善,特别是在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需要从理论到制度层面加以解决。^[47]

(二) 民事行为

常成在现有立法框架下对商事行为和民事行为作了区分,认为,我国学术界一直将“民商合一”作为重要理论之一,“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这样一种说法几乎成了学界的经典学说。但商事行为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并且从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上看,商事行为同商事主体密切相连,商法逐渐从民法中脱离出来形成单独的立法。因此,我们应该从商事行为的概念、特征以及与民

事行为的联系和区别等方向来真正理解其本质,并根据私法的概念和原则构建这一制度。^[48]

田韶华研究了民法典编纂中身份行为的体系化建构问题,认为,身份行为作为一种迥异于财产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有其独立于财产行为的理论建构。身份行为的体系化既应重视与民法总则中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衔接,也应突出其身份法的特色。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之于身份行为的意义主要在于为其提供一个总体理论框架,这主要包括身份行为的成立与生效、身份行为的效力体系以及瑕疵类型体系等。基于身份法的背景,身份行为在意思表示的构成、身份行为能力的判断标准、瑕疵身份行为的界定基准及其法律后果等方面有其独特的理论构成。有鉴于此,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应对身份行为予以更加系统化、科学化的制度设计。^[49]

(三) 婚姻家庭

田韶华以瑕疵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婚姻家庭编中的适用为视角,提出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瑕疵婚姻制度的立法建议,认为,婚姻家庭编中瑕疵婚姻的制度设计应兼顾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体系性和结婚行为作为身份行为的特殊性,民法总则中的瑕疵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应以是否有悖于身份行为的特质为标准予以有选择的适用。瑕疵婚姻的类型除了应维持目前效力瑕疵上的双轨制之外,还应增设婚姻的不成立制度。无效和可撤销婚姻的,事由上应当以《民法总则》的规定为依据并结合结婚行为的特性加以确定和解释;在婚姻无效和被撤销的后果上,应取消可撤销婚姻具有溯及力的规定,增设婚姻瑕疵的治愈事由,增设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中善意一方以及无过失一方当事人的救济制度。^[50]

罗杰研究了中国民法典亲子关系立法模式的改进问题,认为,亲子关系立法是亲属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值中国民法典编撰之际,我国现行亲子关系立法模式应契合时机,逐步进行完善与改革。为此,应在《民法总则》未成年监护制度设计的基础上,设计有中国特色的亲子法,明示“子女最大利益原则”作为亲子关系立法的最高原则,统一使用“子女”称谓,将《收养法》中的养父母子女关系整合进入统一的亲子关系立法,以专章或专节规制人工授精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与亲子关系,构建亲子关系确认制

度,包括亲子关系推定、否认、认领、准正制度以及明示父母照顾权内容以及未成年子女权利与义务。^[51]

侯春平对留守儿童的法律保护对策问题作了研究,认为,保护留守儿童不受犯罪行为的侵害或在被侵害后有好的救济途径,不仅关系到留守儿童的成长,也关系到其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由于大多数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的照顾与陪护,既容易成为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犯罪行为的实施者,为此,有必要研究留守儿童作为被害人的法律保护对策,切实保障其健康成长。^[52]

陈尧对我国继父母子女间形成扶养关系的认定标准进行研究,认为,以实务中出现的问题为出发点,结合《继承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以及《婚姻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从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拟制血亲关系、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发生继承关系的理论基础出发,对于扶养标准的形成应当结合主观扶养意愿和客观经济支持来加以确定。^[53]

(四) 物权制度

王玉花以物权的绝对性为核心,对物权法律制度的构造基础展开研究,认为,围绕物权根本属性这一基本问题,必须明确,物权的核心要素在于其绝对性而非支配性。从法哲学视角来看,财产法律制度的两种模式均证成物权法制度体系的构造基础在于其绝对性。为此,应当从物权绝对性视角出发,对善意取得、物权变动模式等问题进行统一梳理,并对当前物权法学界有关争论和思潮,包括第三人保护、占有制度、物权的限制与社会化等热点问题,作出理论澄清。通过物权制度的发展轨迹与趋势可知,公信原则与善意取得存在天然局限,而异质法律文化具有潜在危害,因此必须捍卫物权法的科学性与体系性。^[54]

安文靖就我国页岩气矿业权制度存在的困境及破解问题作出具体研究,认为,我国页岩气矿业权是《物权法》中规定的用益物权的一种,具有私权属性,然而我国立法对其进行了较多的公法管制,使得其无论是在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均存在诸多制度困境。为此,应当借鉴国外经验,通过制定专门立法或者修改现行法律,从实体及程序方面对页岩气矿业权制度进行市场化改革,从而完善我国现行的页岩气矿业权制度。^[55]

马凤娟、崔佳慧研究了我国农地“三权分置”在实践中面临的政策难题及对策问题,认为,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是我国农村改革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次制度创新,但也面临着土地经营权如何定性、农地“三权分置”配套机制、土地流转成本及农民阶层分化等政策难题。这就需要守住政策底线、积极稳妥推进,发挥试点作用、不断完善保障机制,健全法律体系,解决现实、政策与法律之间的衔接,坚持农地“三权分置”与城乡融合发展配套进行,同步推进,以推动新一轮土地改革顺利进行。^[56]

李凤奇、王金兰则就我国宅基地的“三权分置”状况展开研究,认为,我国宅基地制度有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国外虽然也有一些对土地的研究及法律规定,但对宅基地却缺少系统的、专门性的法律规定及研究成果。由于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与资格权分属不同的法律属性,因此需要制定专门的《宅基地法》,通过赋权、确权与护权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规范宅基地制度,以切实保障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及资格权的正常、健康、有序运行,进而实现宅基地的法律、经济与社会价值。^[57]

郜亚燕研究了土地使用权出资的法律问题,认为,在一些商业投资方面,土地使用权被作为商业入股权证纳入法律的规定范围之内。土地使用权包含以划拨方式、出让方式取得,以及集体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出资问题非常复杂。我国现有的立法尚不够完善具体,有必要对土地使用权进行分析,了解其中不足,以完善相关规则,以解决纠纷。^[58]

还有学者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加以分析,认为,一直以来,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即城镇居民的财产权界定清晰,而农民财产权的概念模糊。这种模糊性使得农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对农民财产权的内涵、特点、类型及来源进行分析和说明,而允许农地经营权流转才是根本途径。^[59]

(五) 合同制度

张婧、顾长河研究了我国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立法选择问题,认为,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不同于一般合同之处在于其具有对特定第三人的

效力,依此可形成较为独特的法律关系结构。社会实践特别是现代商业实践对此结构存在强烈的制度诉求。目前,我国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只存在于保险、运输等具体的法规当中,其一般规范仍处于缺失状态。学术界对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一般规范立法存在广泛共识,应当从立法层面对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进行建构。^[60]

梁亚、王芳提出应对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的立法及实务加以完善,认为,我国《合同法》第97条规定了合同解除后违约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在合同条款的设计中,该条是对合同解除后违约责任的规定。实践中,如何通过违约责任条款约束双方当事人全面履行合同则是需要研究的重点,为此,应对违约责任在实务中的具体运用予以关注,不断进行完善。^[61]

朱方强研究了网络购物合同中管辖格式条款的效力与解决争议问题,认为,对于日趋增长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网络服务平台与消费者之间关于管辖权争议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是因网络交易平台服务提供者制定的格式条款中的管辖条款引发的争议,而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裁判结果也不尽相同。有些法院认为有效;有些法院则支持消费者。具体来说,对于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管辖格式条款应认定无效;加重消费者的诉讼负担的协议条款,应侧重对网络消费者保护,确立以合理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为效力判断的前提。对管辖格式条款规定理解不同,则侧重适用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服务提供者和网络交易平台作为商品经营者均应积极介入解决纠纷,建立积极的协商机制;同时,引入网络法庭审理机制,使网络购物合同中的管辖格式条款争议真正得到解决。^[62]

(六) 侵权责任

尹世鹏就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的调整问题加以研究,认为,《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体现了“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损害必有赔偿,有责任必被追究”的现代法治理念。但是由于该法条采用了“连坐”方式,因而饱受争议。责任自负与连坐责任是一一对立的归责方式,在《侵权责任法》的领域内,责任自负是主要的规则方式,要突破该原则必须给出强有力的理由。因此应当对《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所规定的连坐对象进行适当调整,赋予“连坐”正当

性,以寻求受害人救济与避免伤及无辜之间的平衡。^[63]

刘彤研究了我国网络服务商的间接侵权责任,认为,随着网络用户的不断增加,人们已从阅读传统纸质媒体过渡到电子阅读,著作权的领域也随之不断地扩展,导致网络侵权的案件不断上升,网络侵权案件备受关注。在网络侵权案件中,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商一般承担直接侵权责任,而提供中介服务的网络服务商则可能构成间接侵权。对于间接侵权的网络服务商来说,严格责任更适合作为归责原则,有助于提高网络服务商的注意义务,减少网络侵权案的发生。我国应完善间接侵权责任的规定切实解决现有的网络版权间接侵权问题。^[64]

还有学者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问题作出研究,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机动车作为人们出行或者运输的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与此同时,我国的交通事故也逐渐呈现上升趋势,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逐年增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此,应以《侵权责任法》为依据,解决交通事故发生后的侵权和赔偿范围问题。^[65]

(七) 民事责任

李菲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民法地位与民事责任作出研究,认为,《民法总则》首次以法律的视角承认了网络虚拟财产的合法地位,但并未涉及具体规定。这需要明确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概念,分析比较其与“卖方”“柜台出租者”“居间人”等存在的特殊之处,以网络交易法律关系为线索,剖析平台提供者的民法地位,进一步确定平台提供者的义务及其在消费者权益受损情况下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逐步探索虚拟交易环境下违约责任抑或侵权责任发生后的责任承担问题。^[66]

(八) 知识产权

刘宇晖对著作权合理使用扩张适用的路径选择问题作出研究,认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是著作权人、使用人和公众利益的平衡器,我国封闭式的合理使用立法模式不能充分实现其利益平衡器的功能。司法实践中,法院采取类推适用法定列举,并借用国际条约中的“三步检验法”和美国的“四要素”“转换性使用”等方法扩张

适用合理使用。在我国著作权法修订之际,建议在合理使用的法定列举之外增设一般条款,以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为总体限定,具体考察作品利用的目的、方式和范围。^[67]

宋慧献、张今从系列案件的分析出发,对委托作品的目的价值与权利分配展开研究,认为,委托作品属于“为他作品”,即为他人创作的作品,其权利归属的立法大致可区分为两种倾向:创作者模式和使用模式。我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的现有规定遵循了创作者原则,并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但委托人的行为动机与利益期待未能得到充分考虑。参照已有的司法解释,该条款应做必要修改,以更多地考虑到委托方的预期利益,从而实现委托人与创作者之间全面的利益平衡。^[68]

宋慧献还就音乐作品再录制法定许可的存废与变革问题进行研究,认为,音乐作品再录制法定许可制度的设计是为了预防垄断。历经长期争论,美国立法、国际公约都没有将其废除。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际,该制度的修改与存废引发热烈讨论。参照国外经验及国际做法,我国法律仍应继续保留该制度,并做必要修改,增加作品使用与付费程序、再录制者违法责任等条款。^[69]

曹琴仙、付华就京津冀知识产权法治协同保护机制问题展开研究,认为,知识产权合作保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组成部分,构建法治协同机制是实现该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举措。当前,京津冀知识产权协同发展面临缺乏区域联动统一的法治体系,区域协调机制的法律保障不到位,知识产权审判机构和审判队伍发展不均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需要完善法治体系建设,加强法治理念协同,促进法治机制创新性改革,拓宽法治人才协同保障,从法治、理念、机制、人才四个维度构建京津冀知识产权法治协同保护机制。^[70]

王聪会则具体研究了电视节目模板著作权法的保护问题,认为,现有法律对电视节目模板的保护不足,且严重滞后。为满足现实需要,电视节目模板应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内。在具体制度构建上,可以通过增设电视节目模板类别、明确侵权纠纷认定标准、建立模板登记备案制度,填补电视节目模板在著作权法保护上的

空白。^[71]

祁秀枝探讨了网络直播中的体育赛事著作权问题,认为,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关于体育赛事直播这一新类型的连续性画面,对著作权法提出了新要求。对此,应当借鉴已有理论成果,就现行法律与草案相关规定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从技术层面与内容上对独创性标准进一步加以明确,切实完善现行著作权法及草案相关规定内容。^[72]

郎正午就 ASMR 主播的刑责与 ASMR 知识产权的完善作出研究,认为,ASMR 是一种新型的直播节目,ASMR 直播是网络平台技术发展的产物和民众需要精神娱乐的体现。但是,ASMR 主播却出现了越轨行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不仅与“流量”有关,也与不完备的声音类知识产权体系不健全有一定的关系。刑法是治标之法,对主播进行刑法规制并不能在根源上解决 ASMR 主播的踩雷行为,而只有经济法和知识产权的完善,才是解决 ASMR 主播越轨行为的根本。^[73]

贾润田研究了网盘资源分享行为的著作权法规制问题,认为,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资源共享方式更加便捷,网盘资源分享成为当代信息存储共享的新渠道,广大用户过于追求使用云盘的便捷,忽视使用中产生的著作权侵权问题。面对网盘资源分享行为对著作权法保护的冲击,需要创新筛查技术和改变网盘运营模式,完善侵权冲突化解机制,重视网盘用户管理,改善我国网盘运营环境,切实维护著作权人利益。^[74]

梁岩妍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遗产法中文化多样性价值的确立问题,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文化遗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文化遗产工作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保障。文化多样性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等国际公约确认的法律概念,我国应当将文化多样性作为文化遗产法的价值,加强深层价值构建,建立内容饱满、结构紧凑的法律体系,并与国际法接轨。为此,我国应制定文化多样性保护法,在部门法中确立多元文化发展原则和文化遗产权,从而与“一带一路”所倡议的文化包容精神相契合,完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历史使命。^[75]

王红英具体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多元价值,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构成了一方百姓的精神寄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繁荣农村文化市场,丰富农村文化业态,展现出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是我们应当代代传承的精神宝藏。^[76]

崔璨研究了农村历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困境与出路,认为,依法保护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对丰富农村地区文化和全面保护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农村历史文化遗产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缺少专门立法、割裂式的保护方式、不健全的监督惩戒机制等导致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堪忧。因此,应当通过制定专门立法,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扩大法律保护范围,完善事后救济机制等方式,加强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77]

艾蓉具体研究了大名草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问题,认为,草编是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古老手工编织技术,它是劳动者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艺术形式。大名草编历史悠久,长期植根于农耕社会传统村落。社会经济发展对这项传统手工艺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面临着原料受限,需求不旺,传承乏人等诸多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蕴藏着很大的机遇。模式创新、互联网平台运用等都为大名草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逐步满足大名草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可持续发展。^[78]

刘宇对植物品种权的交易价值评估展开研究,认为,植物品种权作为农业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顺利交易转化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我国政府日趋重视植物品种权保护,无论申请量还是授权量均呈现出逐年上升态势,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也在逐步成为农业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现实中以市场交易为目的的植物品种权价值评估研究不够完善,传统评估方法的应用也存在诸多不足,需要根据其特殊性,重点对其价值区间评估展开研究,并对其均衡价值进行确定,以切实促进我国植物品种权的转化交易,有效指导评估实践,保证评估质量。^[79]

刘期家、邵丽娜对专利成果转化的众筹模式

作出探索,认为,专利成果转化众筹是指为了专利成果转化这一特定目的,以网络作为平台,在指定期限和设定额度内,从普通公众中筹集小额投资资金的行为。众筹模式与专利成果转化具有高度契合性,可以有效化解专利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的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供需对接难,因投资风险高而导致的项目融资难等问题。为了解决专利成果转化众筹过程中面临的法律制度保障不足、融资环境培育不良等困难,切实提高专利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水平,应当加强平台建设,构建信任环境,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确立防控融资欺诈制度办法,给予众筹项目适当的政策倾斜。^[80]

(九) 商法研究

宋阳就自治性商事规则的渊源地位问题进行研究,认为,自治性商事规则由于自身所存在的诸多缺陷和客观上的限制,导致其所可能发挥的作用空间极为有限。因此,这类规则不可能成为实现商法统一的主要法律渊源。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后,商事立法的权力已经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到国家的控制下,而且国家立法性渊源从本质上排斥与否定自治性商事规则。由于这类自治性的民间规则所能发挥的功能区域是极为有限的,因此我国不宜将其作为处理涉外商事交易法律关系中的主要法律渊源。^[81]

李思分析了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认为,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要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完善。新《公司法》中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做了相应规范,这是我国公司制改革下的重大进步,但在实施中仍存在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82]

王会兰就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资格展开研究,认为,近年来,我国经济现实了大跨步发展,经济领域的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多,其中,有关股东资格纠纷尤为突出。这就需要从有限公司的视角观察股东资格,弥补我国法律在股东资格继承、除名等方面的部分不足,研究分析各种实际出现的股东资格的变动情况,进一步完善股东资格标准,以有效解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问题。这不仅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也有利于司法的公正判决,有助于维护国家司法的权威性,从而有效减少法律纠纷。^[83]

赵树文结合相关案例就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

司法适用问题作出研究,认为,认缴资本制下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已成为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路径,然而不仅学界对此存在着鲜明的争议,而且相关案件的司法裁决也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撑,因此,为了推进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案件司法裁决的公正与效率,更好的保护债权人利益,应结合实践中相关案件所呈现的具体特点,沿着公司法路径,通过明晰立法规制宗旨、规定具体适用情形、确立董事催缴义务、重新界定抽逃出资以及强化民事责任等相关制度构建,推进其专门性法律规制。^[84]

赵树文、张勇等还对公司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法律制度完善进行研究,认为,公司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履行对于保护公司、中小股东以及债权人利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在对控制股东进行概念界定并明晰其承担信义义务的法理基础上,梳理我国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并围绕着细化持续信息公开义务、健全关联交易判断标准、强化承诺义务履行保障机制、明晰控制权收购中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以及完善控制股东对公司债权人信义义务等相关路径,加以完善。^[85]刘丽新则对龙薇传媒信息披露违规案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赵薇夫妇因收购万家文化过程中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操作而被证监会处罚,体现出政府有关部门加强证券市场监管的决心。^[86]

由于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极易引发金融系统风险,严重冲击实体经济,甚至危害整个国家经济安全,因此,政府必须对证券市场进行及时、主动、有力的干预,以克服证券市场的失灵。但是,以行政主导为路径的政府救市模式不仅实际收效甚微,而且会导致证券市场风险后移、投资者理性弱化,甚至诱发严重的机会主义行为与道德风险。对此,赵树文、郝丹丹认为,应借鉴美国以及我国香港特区政府救市法治化经验,将政府救市模式由行政主导走向法治主导,通过对证券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治监督环节的完善,将政府救市纳入系统的法治化轨道,以期更好地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与繁荣。^[87]

五、刑法研究

(一) 刑法理论

张亚军、宋立赓探讨了冬奥会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刑法介入问题,认为,冬奥会作为竞技类

比赛,各种伤害行为频频触发。如何有效地将竞技体育伤害管控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既需要考虑刑法对于竞技伤害行为的抑制,同时又要兼顾竞技伤害行为的特殊性。其中,竞技伤害中主观故意的认定是刑法介入的关键因素,处理好体育规则与刑事法律之间的界限,有助于更好地规制各类体育赛事。^[88]

苏永生就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借鉴问题作出研究,认为,从近代以来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理论发展来看,虽然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指导作用在逐步扩大,但始终未能出现依据刑事政策而入罪的情况。在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上,德国刑法理论从功能和思考方式上严格区分了刑法和刑事政策,而且刑法的功能及思考方式优先于刑事政策的功能及思考方式。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理论已然表明,刑事政策只能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来运行,不能依据刑事政策而入罪。我国全面照搬德国理论显然行不通,只能从刑法解释方法体系和刑罚裁量理念两个细微之处着手建构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在刑法解释方法体系上,应当把文义解释塑造为刑法解释方法之桂冠;在刑罚裁量理念上,应当通过提倡与贯彻罪责原则来实现刑事政策的刑法教义学化。^[89]

苏永生还通过对德国刑法中双重罪过立法的研究,提出可供我国刑法立法借鉴的立场,认为,德国刑法中的双重罪过立法主要是指罪过由对行为的故意与对结果的过失组合而成的故意犯罪的立法,主要分布在公共危险之犯罪中,共涉及20余个罪名。双重罪过立法严格贯彻了明确性原则、责任主义和刑罚个别化,体现了较为鲜明的法治立场。我国刑法总则把罪过形式的判断根据明确限定为“危害社会的结果”,但分则对部分犯罪的罪过形式规定不明确,致使难以解释抽象危险犯的罪过形式,在侵害犯和具体危险犯上难以贯彻责任主义,同时无法消除罪过形式解释上的混乱。从德国刑法中的双重罪过立法来看,在完善我国刑法中的罪过立法时,不仅应当满足判断罪过形式的实际需要,更应当注重贯彻法治对刑法的基本要求,同时还应坚持刑法文本的逻辑性和适度性。^[90]

敦宁以“法规竞合”现象为中心,就犯罪与治安违法行为的“但书”界分作出研究,认

为,犯罪与治安违法行为的界分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难题,特别是在《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相关违法行为的规定出现“竞合”的情况下,一般只能运用《刑法》第十三条中的“但书”对其进行合理界分。但是,在“但书”的适用上,学界的认识却并不统一,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较为混乱。由此,必须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但书”的适用不能脱离犯罪构成,也不应综合考察各种主客观因素,只能在犯罪构成体系之下进行客观判断。在实践中,应当明确“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规范构造与实质内涵,并采取有序的逻辑步骤,将其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判断。^[91]

敦宁还研究了“但书”在阶层式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定位问题,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运用阶层式犯罪构成体系,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但书”在这一体系中的合理定位。对此,学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在这一方面应当明确,“但书”并不是违法性阻却事由,也不属于责任阻却或降低事由,而只能定位于可罚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同时需要注意,“但书”只阻却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而不阻却其行政违法性。在实践中,对于行为是否符合“但书”的规定,也只需进行客观判断。^[92]

关于择一罪过立法问题,苏永生认为,我国刑法分则中的择一罪过立法主要包括基本犯罪过形式不明的立法、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形式立法和选择性罪过形式立法。刑法学理论长期以来坚持的“单一罪过说”和近年来提出的“复合罪过说”都无法合理地解释择一罪过立法,应当针对择一罪过立法确立“择一罪过说”,并通过建立“规范一事实”论的罪过形式判断基准来展开。择一罪过立法虽然有利于惩罚犯罪,但是给责任主义带来较大的冲击,致使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在量刑上失去意义,具有明显的不妥当性。应当在责任主义的指导下,明确区分择一罪过立法中包含的故意犯和过失犯。^[93]

苏永生还与朱晓平一起就中德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展开比较研究,认为,择一罪过立法是中德刑法中共有的立法现象。中国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主要分布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中,其中规定的过失犯占有所有

过失犯的约 80%。德国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主要分布在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和污染环境的犯罪中,其中规定的过失犯占有所有过失犯的约 90%。中国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罪过形式,而德国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明确规定了罪过形式;中国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规定的过失犯与故意犯的处罚范围和处罚程度完全相同,而德国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规定的过失犯(或轻率犯)与故意犯的处罚范围不尽完全一致,而且对同一犯罪的过失犯(或轻率犯)的处罚均轻于故意犯。这些差异表明,德国刑法在明确性原则和责任主义的贯彻程度上均比中国刑法彻底,值得中国刑法立法借鉴。^[94]

(二) 刑法总则

孙燕山就社会危害性研究 40 年的共识作出回顾,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我国犯罪概念的核心,也是传统刑法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地位,从核心或本质特征到与刑事违法性共同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相互制约犯罪的成立。共识的达成,得益于刑法学理论界不遗余力地译介欧陆刑法理论,以及犯罪概念宜采取何种形式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匹配,危害的实质是对社会关系的侵害还是对法益的侵害,社会危害性是在犯罪构成内评价还是并行评价等问题的持续争论。但是现有的研究,存在学术史方面梳理不够、西化现象严重导致主体性和创新性不足、缺少必要的实证方面的考察,以及理论上的争议未必是现实真问题等现象,社会危害性是否必须应逐出注释刑法领域,还远未达成共识。这些应成为未来学界继续关注的课题。^[95]

陈海平、赵春莲对司法控制死刑问题展开研究,认为,限制死刑已成国际共识,“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已成我国死刑共识。刑法两次削减死刑罪名后,立法限制死刑的手段暂时用尽,死刑控制路径需要从立法限制转向司法控制。在立法尚保留大量死刑罪名、民众普遍支持死刑的背景下,司法控制死刑要避免“以不杀止杀”的风险,即司法强推“不杀”减少死刑适用,而应恪守“不杀止于杀”的必要限度,即通过司法程序公正、准确地适用死刑(“杀”),进而引导死刑民意、赢得舆论支持、构建死刑的司法标准,死刑数量下降(“不杀”)自然水到渠成。^[96]

(三) 刑法分则

王超就电信诈骗犯罪特征及对策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近年来,我国电信诈骗犯罪持续高发。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 1152 例电信诈骗犯罪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电信诈骗犯罪各年度及各地区分布不均,8 个重点地区的犯罪比例较高;犯罪人的人口学特征与犯罪学特征差异明显。在司法应对方面,检察机关的处理效能和法院的审理效能相对较高,而公安机关的打击效能有待提升;电信诈骗犯罪的持续高发态势仍将持续,有效打击该类犯罪依然任重道远。^[97]

朱振洁、朱翠景对虚拟货币金融犯罪的监管问题作出研究,认为,虚拟货币作为互联网金融的去中心化产物,具有占用空间小、流通速度快、隐蔽程度高及风险系数大的特点,在给人们生活带来商机和便利的同时,也极易成为犯罪分子进行金融犯罪的工具和渠道。近年来,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洗钱、诈骗、逃税的金融犯罪现象越来越多。据此,我国应在借鉴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监管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明确央行主导监管地位,提高监管技术,增强协同监管等举措,从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完善我国对虚拟货币金融犯罪监管的体系,更好地推动金融市场健康持续发展。^[98]

苏永生研究了环境犯罪的独立性和体系性建构问题,认为,环境犯罪的独立性意味着环境犯罪有自己的独立品格,在刑法评价上是不受其他犯罪制约的一种状态;环境犯罪的体系性意味着环境犯罪是一个由多个具体犯罪构成的体系。建构环境犯罪的独立性和体系性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为,回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目标,有效治理环境犯罪,实现环境犯罪治理的法治化以及回应生态法域的形成。从立法体例上看,环境犯罪的独立性更倾向于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体例。在法典化的立法体例下,基于环境犯罪在危害结果上的特殊性,应当将该类犯罪从“节”犯罪提升为“章”犯罪,并设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后,表述为“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罪”,内容包括污染环境的犯罪和破坏生态的犯罪两大类。前者既需要对污染环境罪进行分解,也需要增加新的犯罪类型,后者不仅需要增加新的犯罪类型,而且需要设立整体意义上的破坏生态罪。^[99]

六、经济法研究

(一) 企业制度

梁亚、王芳研究了企业并购中的法律风险防范问题,认为,当前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在此背景下,企业要想脱颖而出、日益壮大,一是可以通过自身发展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效益,二是可以通过并购的方式直接吸收其他公司,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而并购则能够充分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有关并购的法律规范不健全以及企业自身在并购活动中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导致各我国并购的成功率相对较低。因此,必须防范和降低这些并购中常见的法律风险,在实际操作中提高成功率,实现双赢。^[100]

梁彦红、王延川研究了公私合营项目风险治理机制的构建问题,认为,公私合营(PPP)项目是一系列合约的合集,性质上属于企业联合,合作企业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PPP项目中存在社会资本的机会主义风险与政府的信用风险。对社会资本机会主义风险可以采用监管与激励相结合措施;针对政府可能出现的信用风险,则需奉行风险公平分配原则,以法律法规代替政策,在个案中区分行政与民事法律关系。^[101]

(二) 破产制度

梁小惠、李笑飞认为,中共十九大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充分阐明了加强破产法律制度尤其破产重整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破产重整制度以清理债务和拯救企业为主要目标,通过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与股东、债权人与战略投资人、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实现多方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债务人的重生。重整制度本身不仅契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更彰显现代法治文明的要求。审视和反思中国现行重整制度的立法及实践,仍然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难以充分体现和发挥重整制度的价值功能,亟待从重整程序的启动和运行机制、重整计划的制定、批准和执行等方面进行完善。^[102]

段卫华、王伟东则具体研究了我国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商事登记变更与注销问题,认为,“僵尸企业”的大量存续无疑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依法处置“僵尸企业”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举。在破产程序中,企

业因破产重整或破产清算引起的商事登记变更与注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理论和实务界,针对目前实践中存在的商事登记变更与注销难问题,应分析借鉴相关国家经验,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以期更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103]

(三) 金融法治

马洪超、易崇艳就影子银行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异化效应及应对问题进行研究,认为,2018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其中影子银行的大量出现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最终效果产生了异化。由于影子银行具有“银行的影子”“非典型性脱媒”“剪刀差式风险”等三大特征,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传统操作工具和操作目标发生异化,使得货币供给量的传统中介目标失效,同时也使利率这一新中介目标的效力得以提升;又由于信贷配给下的利率双轨制、土地垄断下的收益双轨制和监管缺失下的体系双轨制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导致资金脱实向虚、资产泡沫不断膨胀、金融风险持续累积,最终使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产生异化。为了改善货币政策的效果,需要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影子银行监管和完善配套制度建设等三个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104]

潘敏对我国的农村金融制度作出研究,认为,农村金融虽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因为非正规化运行及自身弱点,导致我国农村金融风险频发。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主要受农村金融制度改革阻力大、金融立法滞后及现存法规与金融发展的实际需求不匹配、金融监管效率低下等因素影响,因此需要通过放宽农村金融发展环境、出台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等多渠道,盘活优化农村金融。^[105]

王利军、纪翔则从多元法学视角出发,对农村金融的联结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形成了以行政指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农村二元金融体制,农村的金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探索建立资金反哺回流机制。农村金融联结在信息甄别、交易成本、抵押担保等方面存在优势,通过建立农村金融联结可以有效扩展农村金融服务。但是,应克服目前存在的法律文件位阶较低、担保物狭窄、风险监管不健全、

乡村中介准入不明确等问题,需要在法律监管及合同条款设计上加以完善。^[106]

(四) 保险制度

王卫国就保险合同的前沿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实践中,保险合同存在种种问题,主要是效力问题,如究竟何时生效,“代签名”的合同效力,保险卡未激活的合同效力,赠予保险的合同效力,投保人失踪未续费的合同效力等。再就是保险法告知义务的细化问题,欺投保情形下保险公司的理赔问题等。此外,应增加不可抗辩条款适用的例外情况,还要搞清比例因果关系在保险理赔中的运用等。^[107]

张婧通过研究马克思关于保险功能的论述,对“保险姓保”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中国保险公司近年来热衷于发展投资型保险,不仅带来巨大损失风险,而且举牌上市公司引发资本市场波动。马克思保险理论中“分摊损失”“补偿损失”的论述,揭示了保险的最初本质。区分保险的原生性功能和依附性功能,才是“保险姓保”的理论基石。在法律上,公共利益是限制民商事主体自由的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保险之所以姓保并不是保险公司发展了保障型保险以外的产品,而是其他业务给保险公司带来了更大的经营风险,从而危及到了保险业背后的公共利益。落实“保险姓保”,需要抓紧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具体规则。^[108]

(五) 反不正当竞争

臧梦时研究了网络经济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与完善问题,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革新与发展,网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在网络交易便利和突破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存在着《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局限性、立法权威性不足、经营者责任规定不清和申诉人申诉困难等问题。这些因素已经成为网络经济中《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存在不足的重要原因,需要合理科学的设计及规制。^[109]

(六) 消费者权益

贺健宾就网络金融消费的法律保护问题作出研究,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名为“互联网”的计算机网络慢慢步入世界舞台。如今,在政治层面积极引导经济转型和促进消费的倡导下,我国网络消费市场发展迅速,除传统网络消

费产品外,近年来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型消费产品创新不断。网络消费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拷问着诚信和网络的安全性,必须采用法律手段予以保护。^[110]

(七) 标准化管理

王广宇、董晋良研究了消防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认为,当前,消防技术标准的形式法源瑕疵和实质约束力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消防技术标准法律性质的困境。2017年11月《标准化法》重新修订,重新规整强制性国家标准,为界定消防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指出了新出路。为此,应当从形式外观和实质效力两个层面把握消防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强制性消防技术标准属于不包含法律后果的技术法规,而推荐性消防技术标准则属于规范性技术文件。^[111]

(八) 食品安全

郭桂环、兰红燕等就WTO视域下转基因食品强制标签的法律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伴随着《国家生物工程食品披露标准》法案的签署,美国转基因食品标签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由自愿标签转变为强制标签。自此,欧美开始实施相同的转基因食品标签制度,即强制标签。随着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转基因食品强制标签措施对自由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转基因食品强制标签措施要在WTO法律体系中获得正当性,需要满足几个条件,即为了实现正当目标、非歧视性、不超过必要的贸易限制程度等。^[112]

郭桂环、纪金言还就美国转基因食品强制标签立法对我国的启示进行研究,认为,美国须行《国家生物工程食品披露标准》标志着美国转基因食品标签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即由自愿标签制度转变为强制标签制度。该法案一方面明确要求披露转基因食品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又以产品为导向,允许使用包括通过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在内的多种形式披露转基因信息,便于食品生产者履行义务。美国转基因食品强制标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均衡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对完善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签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13]

(九) 税收法治

郭凤喜、李笑一就新版个税法“其他所得”项目取消的缘由及其归属问题展开分析,认为,新版个税法中取消了旧版个税法规定的“经国

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应税项目，这也是本次新个税法改革的内容之一。新版个税法颁布之后，需要对“其他所得”项目取消的缘由及“其他所得”项目的归属问题作出预测和分析，以帮助财税人员正确判断应税所得项目，提高业务能力。^[114]

李登喜、李大庆研究了税收核定权的裁量属性及法律控制，认为，《税收征管法》规定的税收核定权，体现出明显的裁量属性。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判例将税务机关在执法实践中基于税收核定权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为一种具体的行政裁量过程，该认定符合行政法的一般原理与理论。据此，应当从行政裁量的视角观察税收核定权的法律性质及其裁量属性，以对其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115]

(十) 会计制度

张存彦基于财政体制改革视角，对政府会计主体权责界定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政府财务会计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改革的首要问题，是明确界定政府会计主体的权责。从我国当前的财政管理体制来看，各级地方政府、政府各单位还不是权责明确的经济主体，而这却是作为会计主体的基本前提。为此，应当追根溯源，围绕我国政府主体权责溯源、现状与问题、原因分析和改革思路等，借鉴美国政府会计改革的路径，为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智力支持。^[116]

(十一) 环境法治

孟庆瑜、张思茵等研究了河北省清洁生产的立法问题，认为，清洁生产强调整个产品生命期的污染控制和能耗最小化，是解决河北省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和最佳模式。因此，应制定《河北省清洁生产促进条例》，为推动全省清洁生产提供法律依据和立法保障。河北省清洁生产立法应以解决清洁生产中的突出问题为宗旨，理顺清洁生产地方立法与相关立法的关系，坚持三大产业全覆盖、京津冀协同发展等立法原则，针对清洁生产行政管理、清洁生产审核等关键环节作出制度安排，并完善清洁生产教育、培训、融资等方面的配套制度建设。^[117]

孟庆瑜、梁枫就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完善进行研究，认为，生态环境保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中需要实现率先突

破的三大领域之一。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调查数据显示，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形势复杂严峻，但社会民众对于其成因和危害后果尚缺乏足够认识，由此导致在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上，尽管民意基础良好，但对环境保护立法的关注度依然偏低，对环境保护执法和环境监测公信力的理性判断缺失，进而在遭遇环境侵害时难以做出正确应对。因此，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已是形势所需、大势所趋。为此，必须精准施策，切实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依靠法治协同，逐步形成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共治的新格局。^[118]

尤晓娜、刘广明对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作出研究，认为，目前，京津冀流域存在一体性与跨区域性、流域内环境资源分配与生态利益分享的不公性、流域生态空间的有限性与环境保护的严峻性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应当遵循权利义务公平配置、平等互利以及“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等基本原则；同时，秉持政府主导的基本模式；此外，还应着重解决区际生态补偿主体厘定、区际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以及区际生态补偿方式确定等关键性问题。^[119]

刘广明、尤晓娜还就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作为生态补偿的一种具体形式，区际生态补偿关涉区际生态公平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并直接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此，需要对区际生态补偿的基本理论作出系统性梳理，坚持利益均衡保护和政策法律协同的基本理念，通过对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模式、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保障机制以及制度体系构成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构建起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体系，以推动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在制度层面的真正“破题”，进而促进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的更好实施。^[120]

刘茜则对我国生态福利供给制度的完善展开研究，认为，生态福利是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或低费供给高品质生态环境的福利形态。生态福利供给制度，即调整生态福利供给和需求这一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目前，我国生态福利供给制度存在立法目的不全面、立法层次低、立法体系缺乏整体性、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对此，应确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立法目标，提升立法位阶，健全国家公园体制，建立非环境污染生

态修复机制,以完善我国生态福利供给制度。^[121]

贾倩则对因雾霾治理需要采取的限行限号措施进行研究,认为,近年来,大气污染严重,很多地区出现严重的雾霾现象,为了治理雾霾,政府出台了诸多措施,包括机动车限行限号。从利益冲突的角度分析,机动车限行限号是权衡各方利益后的取舍;从权利义务的划分探讨,是行政部门为了特定的公共利益,对部分机动车在某个时间段内禁止通行义务的行政立法行为;而从经济法的成本效益分析,则是为使社会产能最高而采取成本较低的控制手段。因此,具有合法依据。^[122]

蔡荷欣研究了环境公众参与的重构问题,认为,环境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公众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因此,环境公众参与就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环境公众参与制度不仅是环境权的实现方式,更有助于国家的环境管理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的实现。目前,环境公众参与的缺陷制约了该制度诸多价值的实现,所以应采取必要措施来完善我国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123]

李珍就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的价值评估问题作出研究,认为,对森林资源资产价值形成和价值特征的认知与分析,应当以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理论和抵押目的的价值评估理论为基础。目前,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价值评估在理论和技术方法上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加以改进。为此,应当确立不同于传统市场价值的“抵押价值”类型,并围绕该价值类型的特征,分别采用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改进的计算思路,切实解决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价值评估问题。^[124]

王金兰、梅媛立足于河北,就环境治理的立法框架展开研究,认为,法律制度是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之一。河北省环境治理立法在与上位法的衔接等方面有特色、有成绩,但也存在立法主体权限不清、法律制度缺失、滞后等问题,需要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及河北省立法实践的需要,在环境治理立法上,从立法主体层级化、法律制度体系化、法律保护全程化等几个方面出发,建构起更加完美的、科学的立法框架。^[125]

还有学者就我国太阳能利用方面的法律问题

予以思考,认为,太阳能产业的发展,急需立法先行。而针对行业立法缺位、政策指导性强、可操作性欠缺等问题,应从增加太阳能利用的鼓励措施、完善太阳能用户激励和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法制完善,促进产业发展。^[126]

七、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研究

(一) 劳动法律制度

张俊桥对新时代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政府监管问题作出研究,认为,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所在。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需要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共同努力,但更离不开政府的监管,首先要发挥政府的顶层设计和超前引领作用,在相关法律法规框架下,及时出台符合河北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发挥政府的检查监督作用,采用督促、检查、惩处等多种手段确保相关主体落实劳动标准,防范劳动关系风险,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打下坚实法治基础;发挥政府的教育与引导作用,打造和谐劳动关系的健康生态与环境。^[127]

崔文成、于江飞研究了劳务派遣中的工伤损害赔偿问题,认为,劳务派遣是我国很常见的一种用工合同模式。现有的法律构造对劳务派遣劳动者工伤损害赔偿问题进行救济的程度非常有限,如果双方像派遣单位和劳工的关系,那么工伤保险制度会对劳工的合法权益加以保护,接下来应该考虑的是用工单位和劳工的关系。但是在工伤损害事实认定时,现有的法律只是规定作为雇主的派遣单位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也不合理,因此应当结合我国的劳务派遣用工现状,针对我国工伤损害赔偿制度和立法现状提出建议,切实解决此类问题。^[128]

李思、周淑影就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后竞业限制协议的效力问题进行研究,认为,竞业限制制度在我国起步比较晚,相关的理论研究和立法都不够完善,在实践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对于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后竞业限制协议的效力,应当借鉴国外经验,统一竞业限制协议效力认定审查标准,建立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时竞业限制协议无效确认制度。而在司法实务中,则应在裁决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经济补偿金的同时,裁决附属于劳动合同的竞业限制协议的具体效力。^[129]

朱振洁就约定的竞业限制的适用期间展开研究,认为,当前,约定的竞业限制制度成为了保护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重要手段。《劳动合同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都对竞业限制进行了规定,对维护就业市场的秩序起到了引导作用,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适用期间而言,学界针对其是否适用在职期间、两年的期限是否过于笼统以及违约后是否终止等方面存在诸多争议,也给实务操作带来诸多困难。^[130]

有学者研究了就业歧视的法律问题,认为,在法律规制方面,我国《宪法》《劳动法》等相关法律相继做出规范,使就业歧视有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和调整。然而,就业自身有着特殊的复杂性,一部法律很难妥善解决。所以,就业歧视的规制应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协调好法律法规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不断完善就业歧视法律制度,以有效应对新的挑战。^[131]

宋立娟研究了我国农民工劳动权的保护问题,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各阶层分工不断地深化,农民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分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却在实际生活中得不到有效保护,农民工劳动权益常常受到侵犯。为此,应当准确把握劳动权的相关概念,充分认识农民工劳动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现状及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措施,切实维护农民工劳动权。^[132]

(十一) 社会保障制度

雷堂、雷小菲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前后的社会保障立法进行了追述及展望,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其前提的社会保障立法工作,在改革开放前经历了起步、缓慢发展甚至遭遇挫折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则得到稳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立,但仍存在体系不够健全、法律层级较低、城乡间差别大等诸多缺憾。而弥补这些不足,将是未来社会保障立法的主要工作。^[133]

赵立新研究了英国的养老保障制度,认为,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的国家之

一,其历史上最早的积累型养老金计划可以追溯到1590年。从总体上看,英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比较复杂,可分为三个层面,称为“三支柱”体系。第一支柱由英国政府提供,旨在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养老保障,主要通过国家保险和税收进行运作,以现收现付制为基础;第二支柱以非积累的现收现付制为缴纳基础进行运作,借助国家保险体系来完成,以雇员的收入所得情况为依据,为其提供进一步的老年收入保障;第三支柱是私人养老保障计划,包括所有个人自愿加入的养老金计划。英国的养老保障体系政府干预较少,使保障负担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了比较合理的分配,国家财政负担比较轻;同时,不断的改革也使得该体系具备了可持续性。^[134]

肖辉对京津冀养老一体化路径与对策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如何在养老一体化进程中充分挖掘各自优势,创新体制机制,为三地养老一体化发展提供良好环境,成为三地协同发展的重大民生课题。为此,应当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形成多元共赢的组合模式和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助老类社会组织作用,推进养老一体化进程;整合京津冀三地现有养老资源,打造多层次的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强化政策协同,保持政策的统一性和联动性;加强三地地方立法机关协调联动,作好协同立法工作,努力提高有效性和针对性;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为养老一体化提供技术支撑。^[135]

张俊娜就中欧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损害赔偿问题进行比较,认为,人身伤害问题及其赔偿具有重要的社会及经济意义,在此领域社会保障法会对侵权法产生哪些影响,欧洲侵权法与保险法研究中心在21世纪初就已做出研究。该中心提供的共同场所第三人侵权的假设案例在中国,既可向工伤保险管理机构请求,也可向本单位外的侵权第三人或其雇主请求,由此导致的请求权竞合,司法实践已出现有限度的兼得模式:针对第三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在民事赔偿上侵权第三人将被雇主追偿或负刑事责任,而工伤赔偿无区别;若侵权第三人和受害人同单位,受害人一般只能获得工伤赔偿。因此,中国和欧洲被调查国家对第三人侵权的解决途径存在共同点,并

且社会保障法均对侵权法产生显著影响。^[136]

八、军事法研究

(一) 部队建设

杜元斌对武警院校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作出研究,认为,健全军队院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既找准了长期制约部队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体制机制短板,更明确了补齐短板的改革良方。加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研究,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对加强军事院校办学顶层设计、构建院校和部队广泛参与的全方位育人体系、全面提升我军的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137]

邓民、谭富根则研究了新时代公安消防部队基层党委的建设问题,认为,公安消防部队基层党委既是基层单位集中统一领导的核心,也是上级党委决策部署得以落实的执行终端。新时代,加强公安消防部队基层党委建设,应瞄准党建工作科学化以加强党委班子建设,推进实战化训练以加强部队战斗力,加快消防工作社会化以促进辖区消防安全水平提升,落实后勤保障制度化以确保消防经费科学安排,抓好作风建设常态化以树立廉政消防好形象。^[138]

维和培训是维和理念形成、价值观输出及行动模式和规范形成的重要阵地,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提高参与联合国维和事务深度和广度的重要抓手,是中国提高在联合国维和事务中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对此,辛越、王宏刚认为,应以维和警察培训作为切入点,梳理当前中国维和培训存在的问题,尝试探索一条更加合理可行的维和培训发展路径,以提升中国维和培训的话语权。^[139]

(二) 部队管理

岳青春研究了公安边防部队的应急管理机制,认为,从公安边防部队应急管理的现状出发,结合公安边防部队担负的任务特点,针对公安边防部队应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监测预警不够完善、协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保障能力有待进一步增强等问题,应当构建科学合理的监测预警机制、多元参与的协同应急机制,以及系统完善的应急保障机制,以提高公安边防部队应急管理的效能和水平。^[140]

(三) 军警权益

尚洪强研究了中国维和警察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认为,结合目前我国立法层面对维和警察权益保障方面理论研究的现状,面对我国维和警察派遣人数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的现实,必须正确理解维和警察权益,明确我国维和警察应当拥有的实体和程序权益,借鉴相关国家先进立法经验,做好国际法的转化运用,逐步加强国内立法,切实保障中国维和警察的法律权益。^[141]

(四) 军事行动

王万里对公安边防部队边境高原山地的反恐行动进行研究,认为,近年来,边境地区恐怖活动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边境地区各有关执法力量的联合打击下,恐怖分子转而潜入边境高原山地地区,利用复杂的地形条件和恶劣的气象环境逃避打击,伺机发动各种恐怖犯罪活动。公安边防部队作为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执法力量,如何在边境高原山地地区成功遂行反恐行动是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142]

王洪海、孔炜良就利比里亚国家安全形势现状与中国驻利维和警队安全应对策略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当前,中国和利比里亚已正式确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利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自2003年我国正式向利比里亚派出第一支维和警队至今,中国维和警察为利比里亚的和平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更好地开展工作,我国维和警队应根据利比里亚政治局势、社会治安形势以及当地警察执法能力现状及需求,科学部署警力,合理配备装备器材,进一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不断提升中国维和警队在任务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143]

王洪海、赵鑫以新时期中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为出发点,研究了全方位外交布局视角下中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战略定位,认为,新时期中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维护国家主权及发展利益,发展大国外交、特色外交,通过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与智慧。^[144]

田乾坤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风险评估及应用问题作出研究,认为,风险评估作为金融保险业的

重要业务手段,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针对风险评估的全过程,用来识别联合国维和行动风险源,制订联合国维和行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描述联合国维和行动风险评估结果。总之,定期开展维和行动风险评估,对中国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大有裨益。^[145]

张铁就新时代关于中国维和警察事业重大职责使命与发展展开思考,认为,维和警察是国际执法合作的一支生力军。新时代深入参与维和行动可以更好体现中国的大国地位,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培养锻炼国际执法队伍。同时,维和警察工作还面临法律依据不足、话语权较弱和安全风险凸显等诸多挑战,因此应当开拓创新,积极推进中国维和警察事业向前发展。^[146]

(五) 边防管治

杨振辉、张保平就新时代边海防建设问题加以研探,认为,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对边海防工作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成为新时代边海防建设的指导思想。新时代边海防是“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防”,其内涵为通过建设“现代”边海防来实现边海防的“强大”,继而达到边海防的“稳固”,本质上是安全和发展的有机统一,而建设的根本方法在于统筹兼顾、因势制宜、循序渐进,从而维护沿边沿海地区和谐稳定,服务国家安全和全局。^[147]

齐凯就法治边检视域下的执法执勤规范化问题作出探讨,认为,立足法治边检建设背景下执法执勤规范化工作实际,需要认真探讨和认识边防检查依法行政规律,强化执法执勤规范化理念,提高官兵执法执勤能力,加强执法保障条件建设,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依托信息化应用驱动发展,加强边防检查执法执勤规范化建设。^[148]

唐立江、岳清春对公安边防派出所的激励机制进行研究,认为,公安边防派出所对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最大程度激发广大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既是公安边防派出所建设的内在诉求,也是队伍管理的核心问题。当前,部分公安边防派出所激励机制存在着重视精神激励、轻视物质激励,重视思想教育、轻视联系实际,重视考评形式、忽视激励效果等问题。为此,亟须构建多元

的激励促进机制、以人为本的目标管理机制、长效的培训教育机制和科学的绩效管理机制。^[149]

(六) 海警建设

苏彦山对我国海上执法体制建设影响因素加以分析,认为,面对影响我国海上执法体制建设的主要因素及面临的突出问题,海上执法活动必须要解决国家间或国家与地区间、人与人涉海洋活动间、人与自然间等三类矛盾。重点从解决主要矛盾、把握海上执法活动特点、坚持立足国情与汲取他国先进经验并举、科学区分涉海事务的属性等四个方面,建立以政府性行政执法与军事性维权执法相结合,以统为主、统分结合的新型海上执法体制构想。^[150]

李佑标、李玉鹏立足于法治视阈,对海上治安特别管理区域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海上治安特别管理区域能够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当前,该区域仅停留在部分省份的地方立法层面,在实践中没有正式适用过。从设立海上治安特别管理区域缘由和国际法层面来看,当前设立该区域存在着行使主体、设置程序、范围划定和管控措施等方面的法治障碍。因此,需要修改现行法律,进行专门立法,完善该区域管理的法治路径,切实解决这一问题。^[151]

唐军对军警民海上联合维权行动的实践及其对策作出研究,认为,通过分析当前我国军警民海上联合维权行动的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应当建立军警民融合的海上联合指挥系统,加强联合维权基础力量建设,建立常态化联合行动机制,建立军警民协作保障体制,健全联合维权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军警民海上联合维权优势,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152]

李丽娟研究了我国海警执法武力使用的法律问题,认为,对于我国海上执法来说,主要是以海警为主。海警部队是我国海上维权执法的主要力量,在其履行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打击海上犯罪和维护海洋治安的职能中,必然会出现武力使用的情形。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海警执法需要使用武力的情况逐步增多,而关于武力使用的问题,则需要按照相关程序进行合理作业。因此,必须了解武力使用的条件、原则,提高对海警执法武力使用问题的认识,为我国海警建设和海上执法作业奠定良好基础,并为我国海警部队整合改革服务。^[153]

王鹤则具体研究了山东沿海船舶治安管理的沿革,认为,在山东沿海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山东公安边防部门在开展沿海船舶治安管理工作,历经了初步建立船管体系、严密船舶管控、管控能力逐步弱化三个阶段。今后,可通过加快信息化建设、合理统筹管理与服务、加强涉海部门间合作来提升沿海船舶治安管控能力。^[154]

九、司法及相关制度研究

(一) 司法改革

敦宁就我国刑事制裁体系的变革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从刑事制裁体系的概念和构造入手,我国传统刑事制裁体系在新形势下面临诸多挑战,必须加以改进:在刑事制裁范围方面,应当实现从“恪守谦抑”到“法网严密”的转变,主要措施就是以人身自由罚为标准,对犯罪与行政违法的范围进行重新划分;在刑事制裁方法方面,应当实现从“隐性双轨制”到“显性双轨制”的转变,核心就是在我国刑法中专章规定保安处分制度;在刑事制裁制度方面,应当实现从“平面化”到“层次化”的转变,最终目标是建立系统化的犯罪分层制裁制度。^[155]

陶建国、闫雨萌等就日本中小学法教育与司法改革的关系作出探讨,认为,日本中小学法教育制度的建立是司法改革推动的结果,法教育未被设置为独立的课程,而是渗透到社会课、生活课、家庭课、道德课以及特别活动课之中。在开展法教育方面,司法行政机关、法院、律师协会、大学等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最高法院的作用是向学校派出法官进行授课,在学校开展模拟裁判和模拟调解活动,开展指导下的法庭旁听及参观法院活动,宣传陪审制度。日本律师联合会的作用是推进教育方案的策划和实践,指导学校的模拟裁判,向学校派出律师进行授课,开展宪法讲座,举办裁判旁听会。文部科学省通过修改学习指导要领,在教学目标、内容方面给予指导。而法务省则针对法教育编写了示范教材,确保法教育取得实质性效果。^[156]

(二) 司法制度

陆洲就我国公众参与司法的相关问题加以研究,认为,公众参与司法是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应对其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公众参与司法的主体经历了从“群众”到“公民”再到“公众”的发展历程,“公众”更能表达和实现公众参与司法的合理性与广泛性。同时,应注意公众参与司法行为的外部性、实质性、广泛性和有限性。在价值层面上,公众参与司法不仅有利于促进司法民主,培养公众法治意识,最终实现政治民主,还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增强司法公信力,并有利于协助司法运行,提高司法能力。但公众参与司法也存在相应的短板,因此需要针对公众参与司法的理性不足特点,进行理性引导;同时针对公众参与司法的合法性缺失确立相应规范,并基于公众参与司法的有效性之不足,通过建立长效保障机制加以弥补。^[157]

(三) 法院建设

梁平就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与运行机制进行研究,认为,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是我国司法体制的重大改革,既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趋势和国内需求有关,也是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的重大突破,应当立足于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总体布局深刻地理解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目的。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已按照司法改革的要求,建立了新型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逐渐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并深入推进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的“三合一”改革,在此基础上探索诉讼与行政复议的程序衔接,最终运用新型审判机制,有效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涉及的不同诉讼问题。^[158]

(四) 司法方法

苏永生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司法判定问题展开研究,认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之司法判定的核心是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界定、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与正当民族宗教规范的界分,以及刑法规范与民族宗教规范的对接等。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依据首先是法律规范,但同时应将包括民族宗教规范在内的社会事实作为重要依据。在判定方法上,不能借助目的解释超越用语的含义范围来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而应当坚持客观解释的立场,采取从包括案件事实在内的社会事实到刑法规范的方法,来

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159]

苏永生还研究了反恐的刑法立法及司法判断问题,认为,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定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160]

徐昀、王森炎立于间主观性视角,对汉德公式判定的过失认定标准缺陷加以研究,认为,传统的过失认定标准,大陆法系为“善良家父”,英美法系为“理性人”。根据间主观性理论,传统标准和汉德公式标准统一于主客观连续统,传统标准客观性较弱而非纯主观,汉德公式客观性较强但非纯客观,故难以量化实属必然。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此困境,在假定原始汉德公式具有准确概率 N 之基础上,采用包括四个命题的“修正的汉德公式”。在间主观性理论的视角下,由汉德公式判定的过失注定无法达到绝对准确的程度,因此,我们不如放弃那个注定无法达到的目标,转而去把握那个可以准确把握的结果。“修正的汉德公式”可能是目前唯一旨在提升汉德公式判定准确度的理论进路,同时其简洁清晰之特质也可以为司法实务部门的操作提供较大的便利。^[161]

(五) 审判制度

梁平、刘帅志就民事审执分离体制改革中的执行权优化配置问题作出研究,认为,民事审执分离体制改革可以打破法制社会建设障碍,提高司法公信力,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然而,当前民事审执分离体制改革中仍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执行权配置的组织构造不合理、人员队伍水平较低、工作思维模式过于单一等问题较为突

出,亟待解决。为此,在改革中应当着重探究执行权优化配置策略,厘清民事执行权内涵,构建民事执行机构,加强内部分权监督,优化民事执行权人员组织构造,统一管理,确保执行权能够顺利运行。^[162]

唐太飞、梁晴以人民法庭诉与非诉二元功能区分为前提,对人民法庭在基层法院员额法官养成中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认为,员额法官改革在保证审判质量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基层法院未成为员额法官的法官助理的培养问题。而人民法庭则因其可以鲜明反映基层社会的司法现状,以及作为司法改革“试验田”最佳选择等功能,与员额法官的职业特征要求存在较好地契合性,对其职业能力的养成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这一作用包括作为法律理论学以致用最佳场所、促进法官助理审判经验的增加和人民法庭可以承担更多的非诉职能等诸多方面。因此,可以通过疏通法官助理进入人民法庭锻炼的制度化渠道、构建激励法官助理对人民法庭审判工作的积极参与机制、创新科学的法官助理职业能力的训练模式,以及开展人民法庭非诉职能的优化改革等路径,促进法官助理职业能力的养成。^[163]

(六) 检察制度

敦宁就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对象与内容的合理确定问题展开研究,认为,实践中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之对象与内容的不同认识,已经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因而亟须厘清。从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来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对象应当是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的相关执法或司法活动,而不包括有关社会组织、民间团体、志愿者等参与社区矫正的活动以及社区服刑人员本身的活动。从我国对社区矫正性质的界定来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内容范围应限定为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的相关执法或司法活动,而不包括执行之前的审判和监狱、看守所的行刑活动或者执行完毕之后的继续帮教活动。^[164]

孙书建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检察监督制度提出了建议,认为,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方案的推进,我国需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并以此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的民事诉讼案件呈现上升趋势,一是说明我国

正处于矛盾的突发期,二是表明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检察监督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进而导致解决民事诉讼调解案件的效率比较低。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民事诉讼调解检察监督制度,以提升民事诉讼调解案件的效率,强化法治建设。^[165]

李亚婧研究了强制隔离戒毒的检察监督,认为,针对财产权益、公民人身,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了一个措施,即健全检察机关,实施强制性司法监督的规章制度。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时间较长的强制隔离戒毒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应对其进行司法监督。检察监督强制隔离戒毒对戒毒人员合法权益的维护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利于维护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稳定运行,确保强制隔离戒毒活动合法进行,预防并降低职务犯罪事件发生概率。综合来看,检察监督强制隔离戒毒是可行的,具有一定的经验基础、法律参考以及实施空间。关于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司法监督是检察机关要探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内容应是有关戒毒诉讼程序中强制或者没有进行复议的隔离戒毒决定以及已经实施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166]

王永刚研究了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检察监督机制,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革的今天,公安派出所在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是由于基层公安派出所人员素质偏低,且缺少完善的监督制约,以至于影响案件侦破,甚至可能出现冤假错案。为此,人民检察院应依法加大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检察监督,构建起完善的检察监督机制。^[167]

(七) 信访制度

蒋冰晶、张继红从整体性治理视野入手,对网络信访进行研究,认为,为完善网络信访,进而推进信访制度乃至国家治理体系革新,改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对公众需求回应的理念,以及解决复杂和破碎问题的路径优势,在整体性治理视野下对网络信访的公众需求价值、问题导向方法、组织功能整合等进行反思。从政府自身便捷性出发,转向以公众需求为核心,发展表达集中程序定位公众需求、发展专家程序实现公众需求;以问题为导向,建构横向层面的行动线,发展特别程序、委员会程序、评估程序,综合建构“四类三级”程序。引入大

数据和互联网思维与技术,推进“预警—解决一体化”的“一站式”信访大数据平台。^[168]

(八) 法律援助

王春良等就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作出研究,认为,法律援助制度应当综合考虑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愿望,针对法律援助界定、制度定位、公民权利、国家责任、律师义务、供给、机构设置、经费保障、承办补贴、质量标准等基本问题,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此外,还应就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中的值班律师制度及认罪认罚从宽的法律援助,死刑复核及对刑事被害人、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国家赔偿、申诉、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援助的专项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同时,在京津冀法律援助协同和社会组织法律援助等领域作出努力,最终出台《法律援助法》,以全面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切实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援助制度。^[169]

王超就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展开实证研究,认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在现实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实证研究发现,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相对较高、群众对法律援助案件满意度很高,但还存在基层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相对不足、群众获知法律援助途径紧跟大数据和“互联网+”形势有效扩展不够、群众法律援助知识相对有限、受援人被援助的刑事案件数量需要增加等问题。因此,需要在扩大基层年轻法律援助工作者比例、推行点援制,同时结合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并建立科学合理的法援案件评价体系、尝试与高校联合培养基层法援人才、推进新媒体下的法援宣传途径等方面做出努力。^[170]

(九) 辩诉交易

有学者从法社会角度研究了辩诉交易制度,认为,辩诉交易起源于美国,虽然自产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但在实践中也给各国司法带来了便利,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我国是否应该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理论界一直没有定论。从法社会学角度来看,我国社会中存在与辩诉交易精神相通之处,因此可借鉴吸收该制度的合理内涵,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引入辩诉交易制度。^[171]

（十）刑事和解

陆洲、张晓旋研究了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认为，刑事和解制度为我国诉讼模式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价值冲击，主要表现在个人本位对国家本位的冲击、沟通性对对抗性的冲击、恢复正义对报应正义的冲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法律条文规定偏主观，被害人自愿性审查标准模糊，制度配套的惩罚机制不完善以及赔偿标准不统一引起和解失败率增加等问题。为此，应当配备考察加害人悔罪态度的持续性措施、自愿性审查涵盖的实质性条件，提倡多元化的赔偿方式，规范赔偿标准，以完善与刑事和解配套的惩罚机制。^[172]

（十一）社区矫正

有学者对新刑法下社区矫正的现存问题加以思考，认为，新刑法内容涉及到社区矫正，使得社区矫正中再次进入到人们的视野，我国的社区矫正开始时间不长，加上经验不足，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从立法、配合、管理、观念等几个方面予以完善。^[173]

（十二）社会治理

刘志刚、贾少涵就新时代农村普法教育问题作出研究，认为，新时代下，作为全民普法教育重点、难点和短板的农村普法教育，要构建适应新时代的农村普法教育大格局。这就需要提升村民的法治素养，形成适应新时代农村实际情况的普法教育体系，优化农村法治环境，营造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氛围，为农村普法教育提供良好的环境。为此，应当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以村民为中心，坚持创新与实效相结合，坚持全社会共同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村普法教育内容新体系，创建农村普法实施新机制，完善农村普法教育运行与保障机制，优化农村普法环境。^[174]

李柏红、王文强就基层社会治理的时代意蕴、现实困境及创新路径展开研究，认为，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目标是以民生发展为核心，建立多元合作共治的基层社会格局，这依赖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资源等的全方位转型。目前，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矛盾纠纷多发、网络“虚拟社区”治理困难等带来的挑战，亟待创新制度化的民生发展体系、完善立体化的基层治理机制、构筑信息化的

基层治理格局等，以推动基层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打造现代化的基层社会运行模式。^[175]

王子杰、石可涵等研究了法治化视野下高校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问题，认为，当今社会，高校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教育部2003年发布的《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和2012年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均强调把教育管理和办学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实行依法治校。应对突发事件是高校管理的构成要件，理应纳入依法治校的框架。在法治化视野下，为了应对高校突发事件，应完善立法体系，提升高校依法应对的意识，完善规章制度、制定应急预案。^[176]

（十三）环境治理

寇大伟、崔建锋就京津冀雾霾治理的区域联动机制予以研究，认为，近年来京津冀雾霾问题非常严重，雾霾的治理日益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由于京津冀地理位置毗邻以及空气的流动特性，紧紧依靠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治理方式存在很大局限性，往往会高投入、低回报，因此应从府际关系视角来对待京津冀雾霾治理的区域联动机制问题，协调好京津冀雾霾治理过程中的央地关系、地方政府的横向府际关系以及政府部门间的联动机制，在此基础上，直正解决京津冀雾霾治理府际联动过程中存在的深层问题。^[177]

蔡岚、寇大伟还进一步研究了雾霾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参与问题，认为，我国雾霾的根治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是协同治霾的多元主体之一。现阶段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主要行动包括推动信息公开提质、调研协助环境监管、提供治霾技术支持、培育环保社会资本等。这些行动为治霾持续成为公共议题推波助澜，并有效推动雾霾问题从公共议题成为政策议题。决定并影响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主要因素包括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行动者主体三个方面。拓展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制度与政策空间，完善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法律规章，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将有助于拓展社会组织协同治霾的更大空间。^[178]

（十四）犯罪治理

宋伟卫、陈永学从高校职务犯罪案件分析出发，对高校职务犯罪治理进行实证研究，认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高校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高校职务犯罪呈现多发态势。高校职务犯罪的特征表现为犯罪主体文化程度较高、发案领域比较集中、作案手段比较隐蔽、危害性较大。高校职务犯罪既具有公权力犯罪的一般规律,又具有其生成的特殊规律。高校职务犯罪的成因在于高校行政权监控缺失、市场经济规则浸入高校管理活动、某些领导干部心理失衡。高校职务犯罪治理应坚持的原则是:教育、制度、监督相结合,突出重点、提前预警,以及法治等原则。^[179]

(十五) 纠纷解决

吴英旗立足于患者安全的视角,对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展开研究,认为,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构建,必须从患者安全角度出发,结合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明确其理念内涵、价值及作用机理,坚持实证与应然相结合,针对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现状,借鉴欧美等国经验,力争形成一套有助于推动我国患者安全文化发展、行之有效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为促进我国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提供学术支持。^[180]

王鸿羽对我国股权众筹纠纷法律解决机制加以研究,认为,股权众筹作为一种基于互联网渠道进行的新融资模式打破传统的融资局限,使得融资来源于大众,并迅速走入公众视线,成为市场风向标。由于股权众筹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在运营中难免会因为利益冲突而产生纠纷。这既包括投资者与融资者间的纠纷,也涉及投资者与股权众筹平台间的纠纷。目前,我国相关研究还不够成熟,需要重点从股权众筹纠纷解决机制入手,通过纠纷解决来保障多方的利益不受损害或者损害最小化,促进我国经济稳定良性发展,使股权众筹模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81]

还有学者研究了互联网时代下众筹模式的法律风险问题,认为,我国针对股权众筹并没有具体明确且针对性强的法律规定和监管制度,使得股权众筹在实践中面临一些风险。股权众筹会引发投资者、筹资者和众筹平台的法律风险,应当借鉴英美等国众筹监管经验,针对风险提出相应法律对策。^[182]

孟金爽就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的实践展开

思考,认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是新时代背景下人民调解工作的创新发展,也是对人民调解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始,我国加强了法治建设进程,对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做出具体的部署,也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更高要求。然而,也应看到现阶段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存在的不足,切实找出有效的解决对策。^[183]

李柏红、陈焱对雄安新区征地拆迁纠纷的预防与化解对策作出研究,认为,雄安新区建设已正式拉开帷幕,征地拆迁将是当下面临的重点问题,也是社会矛盾纠纷的集中点之所在。经多次实地调查以及对近半年来征地拆迁舆情分析,雄安新区待拆迁居民对拆迁补偿标准的关注度非常高,对未来生存与发展存在某些顾虑,对故土的情感依赖较强,同时对党委政府普遍具有应有的信任。因此,雄安新区征地拆迁应坚持居民拆迁安置先行、保持平均生活水平、注重未来生存发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等原则,通过开展细致的前期普查、确定科学的安置方案、拟定完备的就业规划、做好贴心的心理疏导等措施,确保征地拆迁顺利进行。^[184]

十、国际法研究

(一) 国际公法

卢芳华就职业安全权的国际法保护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必须从人权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角度,重新认识中国职业安全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据此来分析和认识职业安全权与人权及劳动权的关系,建立职业安全权保护的基本法律体系,确立其基本范畴。因此,应当严格按照中国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对职业安全权的结构形态及标准,来分析和查找中国现有职业安全权保护的体系与已签署国际公约的差距,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国职业安全权法律保护措施,构建符合国际标准的职业安全权保护法律体系。^[185]

王玉冲对共生视域下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缘环境、人文精神和经济利益等方面相互交织,紧密联系在一起。基于地缘共生环境的区域合作,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联系愈加紧密,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融

促进了跨境地缘经济区域的形成,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文化相似、经济互融的共生格局,形成了“命运共同体”的雏形。若中国与周边国家能够排除域外国家的干扰,共谋区域和平与发展,定能不断推进命运共同体的构建。^[186]

张正、王爱芹研究了条约的“被当事国嗣后惯行修正”问题,认为,条约是最重要的国际法渊源之一,条约的修正问题不仅能激起理论上的兴趣,于实务亦有实益。条约能否被“当事国嗣后惯行”修正这一问题在理论上素有争议,尽管此次国际委员会报告对“条约被当事国嗣后惯行修正”这一概念持怀疑态度,但是,这种条约修正方式实际上是存在的。从实践与法理上来看,“条约被当事国嗣后惯行修正”这一概念具有其合理性,不必将其完全摒弃。不过,修正条约的“当事国嗣后惯行”则须从严把握,以确保条约的稳定性。^[187]

王亚宁研究了欧盟应对难民危机的边防措施,认为,欧盟申根国家取消边界管控,使得外部边界成为抵挡威胁的唯一防线,同时也使欧盟边防部门在维护整体欧盟安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不断恶化的难民危机首先要求欧盟边防部门积极应对,其主要边防措施是:加强外部边界管控,强化非法移民遣返力度,在边界国家建立难民安置点,加强与相关国家的边防合作,成立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队,以及加强难民问题研究。欧盟边防部门只有秉承“疏通”的思想,才能确保难民危机的良性解决。^[188]

赵国栋、张馨予等就当代联合国改革背景下中国参与维和行动问题作出研究,认为,冷战结束后,历任联合国秘书长都在尝试推动联合国改革,以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的发展要求。当前,国际形势变化和联合国改革新发展,为中国深度参与引导联合国维和行动创造了新契机。中国有必要进一步采取富有成效的应对策略,加强自身维和能力建设和机制建设,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189]

任佳研究了反恐背景下提高国际维和任务区社区警务的相关问题,认为,维和警察在任务区的基层工作,很大程度上要靠社区警务来提高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继而共建社会秩序。只有了解社区警务的内涵和重要性,意识到维和任务区社

区警务与国内社区警务的异同,才能对症下药,提高维和任务区社区警务水平,更好地完成维和任务。^[190]

伍建华就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自卫原则进行研究,认为,除自卫和保卫授权任务之外,不得使用武力是指导维和行动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安理会赋予维和人员合法使用武力的权限。然而,维和人员所享有的自卫权的范围在维和实践不断扩大。因此,探讨维和行动中自卫权的适用范围与法律依据,对于制定武力使用政策和规则,促进维和人员对自卫权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191]

还有学者研究了联合国维和行动风险评估系统的构建问题,认为,应当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研究对象,分析、建立其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利用定性一定量分析法,在对各级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基础上,赋予不同权重。通过建立风险评估模型,计算联合国维和行动风险值,并以不同颜色分等级进行标识,为维和行动提供辅助支持,以降低风险。^[192]

关于非常规移民治理问题,杨春静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非常规移民早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困扰着很多国家,如何有效治理非常规移民也备受各国关注。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非常规移民问题的挑战,从非常规移民输出国逐渐向输入国以及过境国的角色转变。特别是中国地区性非常规移民问题已经十分明显。对此,应借鉴“大禹治水”的智慧,在厘清非常规移民的来源、进入与流向趋势基础上,疏通合法移民通道,根据具体情况因势利导、合理处置,开通一条更加人性化的治理途径。^[193]

另有学者通过分析研究拐卖越南妇女犯罪的现状及原因,结合历年中国打击此类案件的经验总结,梳理案件办理中遇到的困难,借鉴中国东兴市和越南芒街市警务合作新成果,认为,应当构建边境沿线城市对接的国际警务合作模式。^[194]

(二) 国际经济法

宋阳、张源对自治商法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目前国际商法的主流理论认为,若想实现各国商法的统一,应依托商人职业群体中自发产生的自治性规则,从而绕过国内法来实现。但是,通过对现有的国际贸易统一规则和国际贸易的司

法实践来进行实证性分析,自治性商法规则对于商法的统一所能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商人之间的行为达成所谓的“商业默契”可能只是存在于学者想象中的乌托邦式的幻象,在现实中很难真正成为与国家法相提并论的法律秩序体系。^[195]

宋忠胜对我国茶叶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法律风险问题进行研究,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生产与制造贸易在国际的经济发展中大展拳脚,成为一颗熠熠生辉的新星。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帮助下,我国的经济走上了一条前途无比光明的道路,本土企业也渐渐步入了国际化的轨道,融入了世界的潮流。茶叶是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农业产物,随着国际经济的涌流也步入国际化,凭借着自身独到的魅力特色与一定的企业形象,在激烈的企业竞争中逐渐站稳脚步。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亟须预先规避和及时解决。^[196]

张立锋就欧盟碳市场法制建设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展开研究,认为,作为最早的碳市场践行者,欧盟经验对中国碳市场及其法制建设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欧盟碳市场政策法律在推动和保障碳市场健康发展方面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碳市场政策法律制定和调整的及时性,与其他减排工具法制建设的统筹性,与国际碳交易规则融合与衔接的开放性。借鉴欧盟经验,中国碳市场的法制建设工作应处理好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尽快出台统一的碳市场基本法,重视碳市场与其他减排工具法制建设工作的统筹协调,注重不同类型碳市场之间衔接规则的制定,突出碳交易市场价格风险防控法律制度构建的重要性。^[197]

胡海涛、李晓阳就国际竞争中立规则建构的正义维度作出研究,认为,国际竞争中立规则的建构离不开以正义为基础的价值目标。缺失正义维度的竞争中立规则,不仅无法在国际经贸交往中实现公平的秩序环境,而且更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引发缔结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与不信任感,从而导致规则难以有效运行,甚至是“破产”。因此需要人人从现实的竞争中立规则创制实践中去探索正义的理念,为各缔结主体在国际经贸交往环境中建构相对完善的竞争中立规则创造条件。^[198]

韩文倩对反补贴调查中的因果关系进行研

究,认为,反补贴调查中的因果关系是构成“补贴”的要件之一,并且要确定通过补贴的影响,补贴进口产品正在给国内相关产业造成损害,缔约国才可以征收反补贴税。这说明,反补贴调查应该审查双重因果关系,即接受补贴会造成补贴进口产品数量的增加或者价格的降低,进而给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此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因果关系链条断裂会颠覆整个调查结论。但在实践中,对补贴所造成的国内影响的审查往往只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并没有深入、彻底,这种认定并没有直接针对“国内产业”,而是针对“补贴进口产品”,存在反补贴措施滥用的风险。^[199]

王沛就“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展开研究,认为,推进和实施“冰上丝绸之路”是我国与北极地区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起点,也是中国积极应对当前世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冲突而采取的全方位区域经济开放合作新战略。由于“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涉及区域经济复杂、地缘政治多样化等因素制约,沿用世贸组织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已无法满足现有需求。而“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争端解决现有机制也存在不足,需要明确“冰上丝绸之路”贸易争端解决原则,构建域内国家贸易争端解决框架,进一步保障和促进“冰上丝绸之路”建设。^[200]

王沛、刘柳还分析了“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准入的法律风险,认为,“冰上丝绸之路”共建初期主要涉及及北极东北航道开发与与俄罗斯、北欧五国基建、能源合作开发等投资敏感领域,故深入研究沿线国家投资准入制度,将投资风险控制前移,才确保中国资本助推“冰上丝绸之路”发展。俄罗斯投资准入法律制度稳定性较差、限制较多,显性法律风险较大。而北欧五国投资准入法律制度可预见性较强、自由化水平较高,但隐形的政治风险较大。中国可通过双边谈判推动多边投资规则形成、利用先进的立法技术手段重新修订双边投资协定等方式以降低风险。^[201]

此外,王沛、刘柳又进一步研究了“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准入法律风险的防控问题,认为,从国际条约、双边投资协定、国内

境外投资法三个层面研究“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准入法律风险防控问题,明确我国应针对“冰上丝绸之路”的投资需求,积极促进某些特定领域的多边投资条约的形成,包括考虑加入修改后的《能源宪章条约》。而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修订BIT时应采取“市场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在境外投资管理制度中确立“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从而防控中国资本进入“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法律风险。^[202]

(三) 国际私法

刘艳娜就外国法查明责任分配的困境展开研究,认为,我国关于外国法查明责任分配的法律条文已经比较完善,但相关判例表明我国查明外国法的成功率仍然很低。在法官承担查明责任的情况下,我国存在法官使用的查明途径过窄、过度依赖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查明失败的案件二审法院缺少补充查明等问题。在当事人承担查明责任的情况下,我国主要存在当事人选择外国法之后消极证明外国法、当事人承担过高的外国法证明标准等问题。为此,应当从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保障当事人的选法权利,以及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等方面,保障外国法查明的效果。^[203]

李猛、胡海涛研究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私法保障问题,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法律问题主要表现为民商事法律适用冲突问题、海外投资法律风险问题,以及海外投资争端解决问题。构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体系,首先必须推进沿线区域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在“一带一路”国际私法的统一化进程中,应严格遵循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保护弱方当事人权益、促进民商事交往发展等传统的国际私法基本原则,通过国际私法统一化减少或避免跨域法律适用冲突,保证涉外民商事纠纷得以公平公正解决。此外,还应健全海外投资法治保障体系,建设沿线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区法律制度,完善“一带一路”相关国内立法。^[204]

(肖 辉:河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 宋慧献.保障并落实公民文化权利:文化促进法初探[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

- [2] 宋慧献.文化促进法的基本原则简论[J].新闻爱好者,2018(03).
- [3] 高志明.个人信息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理论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
- [4] 朱振洁.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路径[J].品牌研究,2018(04).
- [5] 伊士国.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主体与对象[J].党内法规理论研究,2018(01).
- [6] 伊士国.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制度化[J].人民法治,2018(Z1).
- [7] 任广浩,解建立.改革开放40年我国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变革及其法治化探索[J].河北法学,2018(12).
- [8] 方资,聂晶.从实证分析和理性思考看监察委员会留置措施的适用——兼对强制措施适用不当的分析[J].社会科学论坛,2018(01).
- [9] 刘志勇.中国跨境反恐的路径选择研究[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8(02).
- [10] 刘春玲.论“巨额反恐罚单”与反恐法律责任泛化[J].武警学院学报,2018(01).
- [11] 张冬,黄东升.警卫视角下“独狼”式恐怖袭击特点及防范对策探析[J].武警学院学报,2018(07).
- [12] 宋维才.反恐战略视角下的边防社区警务反恐问题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8(05).
- [13] 马振超.边民国家安全教育的路径研究[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04).
- [14] 杨福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法路径[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8(03).
- [15] 杨福忠.诚信价值观法律化视野下社会信用立法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
- [16] 宋振业.行政立法专家咨询制度探究[J].法制与经济,2018(12).
- [17] 陆洲,杨梅.商谈规则视野下的立法论证研究[J].法制博览,2018(06).
- [18] 王志颖,杨福忠.机构编制管理法制化研究[J].河北法学,2018(01).
- [19] 王金兰,梅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法治化研究[J].学周刊,2018(21).
- [20] 楚琳,李清华.美国联邦教育部干预高等教育措施:案例与问题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06).
- [21] 左冬梅.森林公安林业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J].法制博览,2018(29).
- [22] 高瑞祥.试析公安机关执法公正的内涵意义和标准[J].武警学院学报,2018(01).
- [23] 尚海龙.论行政裁量的个案正义原则[J].法制博览,2018(15).
- [24] 马雁.GPPS结构性风险与声誉激励法权治理——兼同PPP比较[J].政法论丛,2018(04).
- [25] 陆洲,于晴晴.论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路径——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法学,2018(11).

- [26] 赵风华. 新时代广播电视节目监管新规范[J]. 青年记者, 2018(18).
- [27] 肖辉. 交通事故认定书相关问题探究[J]. 河北法学, 2018(12).
- [28] 亏道远, 冯兆惠. 高速铁路安全的社会公共责任[J]. 河北法学, 2018(06).
- [29] 朱方强. 分享经济视阈下共享单车的法律探微与协同治理[J]. 经济论坛, 2018(09).
- [30] 陈亚婷. “网约车”法律问题研究[J]. 品牌研究, 2018(05).
- [31] 马振超, 李丽. 中越边民跨国流动: 国家语境与边民视角[J]. 广西社会科学, 2018(01).
- [32] 杨旭, 张燕. “一带一路”背景下促进内蒙古陆地口岸边检站发展的政策综述[J]. 特区经济, 2018(07).
- [33] 黄新宇, 周修杰. 广西边境地区偷渡活动成因及对策研究[J]. 武警学院学报, 2018(05).
- [34] 蔡志勇. 处分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特色研究[J]. 法制博览, 2018(30).
- [35] 刘宇晖, 白静.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完善[J]. 社科纵横, 2018(08).
- [36] 刘宇晖, 胡钰彬. 我国民事诉讼地域管辖制度之反思[J]. 法制博览, 2018(02).
- [37] 曹政亮. 民事诉讼释明制度完善对策研究[J]. 法制博览, 2018(26).
- [38] 张红伟.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交互作用研究[J]. 法制博览, 2018(30).
- [39] 陈奎, 么冬霞. 论我国普遍辩护的现实困境及其因应策略[J]. 保定学院学报, 2018(03).
- [40] 李静. 浅析对滥用行政起诉权行为规制[J]. 法制与社会, 2018(27).
- [41] 秦鹏, 田韶华.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问题探析[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4).
- [42] 郭雪慧. 环境公益诉讼视角下的立案登记制[J]. 社会科学家, 2018(08).
- [43] 王碧军. 论法律实务中仲裁协议无效的认定[J]. 河北企业, 2018(02).
- [44] 叶亭亭. 论微信在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实践中的应用[J]. 河北企业, 2018(12).
- [45] 赵冬静. 论刑事证据收集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J]. 品牌研究, 2018(04).
- [46] 田韶华, 肖向婷.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1).
- [47] 杜晓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探索[J]. 河北企业, 2018(12).
- [48] 常成. 论现有立法下商事行为和民事行为的区分[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4).
- [49] 田韶华. 民法典编纂中身份行为的体系化建构[J]. 法学, 2018(05).
- [50] 田韶华.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瑕疵婚姻制度的立法建议——以《民法总则》之瑕疵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婚姻家庭编中的适用为视角[J]. 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 2018(01).
- [51] 罗杰. 中国民法典之亲子关系立法模式的改进[J]. 甘肃社会科学, 2018(02).
- [52] 侯春平. 留守儿童的法律保护对策[J]. 人民教育, 2018(07).
- [53] 陈尧. 我国继父母子女间形成扶养关系的认定标准[J]. 品牌研究, 2018(04).
- [54] 王玉花. 物权法律制度的构造基础研究——以物权的绝对性为核心[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8.
- [55] 安文靖. 我国页岩气矿业权的制度困境及破解[J]. 未来与发展, 2018(08).
- [56] 马凤娟, 崔佳慧. 我国农地“三权分置”在实践中面临的政策难题及对策[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2).
- [57] 李凤奇, 王金兰. 我国宅基地“三权分置”之法理研究[J]. 河北法学, 2018(10).
- [58] 邵亚燕. 土地使用权出资的法律问题研究[J]. 河北企业, 2018(01).
- [59] 徐琛皓, 王一超. 论农民土地财产权[J]. 河北企业, 2018(01).
- [60] 张婧, 顾长河. 我国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立法选择[J]. 岭南学刊, 2018(06).
- [61] 梁亚, 王芳. 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的立法及实务完善建议[J]. 南方企业家, 2018(03).
- [62] 朱方强. 论网络购物合同中管辖格式条款的效力与解决争议[J]. 知与行, 2018(01).
- [63] 尹世鹏. 论《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之调整[J]. 经贸实践, 2018(15).
- [64] 刘彤. 我国网络服务商的间接侵权责任[J]. 河北企业, 2018(01).
- [65] 李莹莹. 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问题研究[J]. 法制博览, 2018(11).
- [66] 李菲.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民法地位与民事责任研究[J]. 河北企业, 2018(01).
- [67] 刘宇晖. 论著作权合理使用扩张适用的路径选择[J]. 知识产权, 2018(10).
- [68] 宋慧献, 张今. 作为为他作品的委托作品: 目的价值与权利分配——从《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案件说起[J]. 电子知识产权, 2018(01).
- [69] 宋慧献. 音乐作品再录制法定许可的存废与变革[J]. 出版发行研究, 2018(12).
- [70] 曹琴仙, 付华. 京津冀知识产权法治协同保护机制研究[J]. 河北法学, 2018(07).
- [71] 王聪会. 电视节目模板著作权法保护探究[J]. 河北企业, 2018(02).
- [72] 祁秀枝. 探究网络直播中的体育赛事著作权问题[J]. 法制与经济, 2018(12).

- [73]郎正午.经济法与刑法的良性互动——以 ASMR 为例,兼论 ASMR 主播的刑责与 ASMR 知识产权的完善[J].成功营销,2018(11).
- [74]贾润田.网盘资源分享行为的著作权法规制[J].品牌研究,2018(05).
- [75]梁岩妍.“一带一路”倡议下文化遗产法中文化多样性价值的确立[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3).
- [76]王红英.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的多元价值[J].人民论坛,2018(07).
- [77]崔璨.农村历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4).
- [78]艾蓉.大名草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J].文化产业,2018(07).
- [79]刘宇.植物品种权交易价值评估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 [80]刘期家,邵丽娜.专利成果转化众筹模式探索[J].中国科技论坛,2018(06).
- [81]宋阳.自治性商事规则法源地位否定论[J].当代法学,2018(03).
- [82]李思.探析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J].河北企业,2018(02).
- [83]王会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研究[J].品牌研究,2018(06).
- [84]赵树文.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司法适用问题研究——以“上海香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上海昊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一案为研究样本[J].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7(22).
- [85]赵树文,张勇,郝丹丹.公司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法律制度完善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18(02).
- [86]刘丽新.浅析龙薇传媒信息披露违规案[J].河北企业,2018(02).
- [87]赵树文,郝丹丹.由行政主导走向法治主导的政府救市模式研究——以美国、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救市法治化经验为借鉴[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04).
- [88]张亚军,宋立赓.冬奥会下竞技体育伤害行为的刑法介入[J].经贸实践,2018(06).
- [89]苏永生.德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借鉴[N].检察日报,2018-08-09.
- [90]苏永生.德国刑法中的双重罪过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法学杂志,2018(12).
- [91]敦宁.犯罪与治安违法行为的“但书”界分——以“法规竞合”现象为中心[J].政法论丛,2018(12).
- [92]敦宁.“但书”在阶层式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定位问题[J].江西社会科学,2018(07).
- [93]苏永生.我国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反思[J].法商研究,2018(04).
- [94]苏永生,朱晓平.中德刑法中的择一罪过立法比较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18(01).
- [95]孙燕山.无法逐出注释刑法领域的社会危害性——社会危害性研究 40 年(1978—2018)的共识与再聚焦[J].学术论坛,2018(05).
- [96]陈海平,赵春莲.司法控制死刑:可能与限度[J].河北法学,2018(03).
- [97]王超.电信诈骗犯罪特征及对策问题实证研究[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8(01).
- [98]朱振洁,朱翠景.论虚拟货币金融犯罪的监管[J].信息安全研究,2018(06).
- [99]苏永生.环境犯罪的独立性和体系性建构[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
- [100]梁亚,王芳.浅析企业并购法律风险防范[J].南方企业家,2018(04).
- [101]梁彦红,王延川.公私合营项目风险治理机制构建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22).
- [102]梁小惠,李笑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重整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河北学刊,2018(05).
- [103]段卫华,王伟东.我国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商事登记变更与注销问题[J].天津法学,2018(02).
- [104]马洪超,易崇艳.影子银行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异化效应及应对研究[J].理论探讨,2018(06).
- [105]潘敏.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J].品牌研究,2018(06).
- [106]王利军,纪翔.多元法学视角下的农村金融联结[J].河北法学,2018(03).
- [107]王卫国.保险合同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8.
- [108]张婧.马克思关于保险功能的论述对“保险姓保”的启示[J].云南社会科学,2018(02).
- [109]臧梦时.网络经济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与完善[J].河北企业,2018(10).
- [110]贺健宾.网络金融消费的法律保护[J].河北企业,2018(12).
- [111]王广宇,董晋良.论消防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J].武警学院学报,2018(08).
- [112]郭桂环,兰红燕,张悦仙,李兰花.WTO 视域下转基因食品强制标签的法律问题研究[J].时代经贸,2018(05).
- [113]郭桂环,纪金言.美国转基因食品强制标签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J].食品科学,2018(09).
- [114]郭凤喜,李笑一.新版个税“其他所得”项目取消缘由及其归属分析[J].纳税,2018(30).
- [115]李登喜,李大庆.论税收核定权的裁量属性及法律控制——基于“德发案”和《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的研究[J].税收经济研究,2018(06).
- [116]张存彦.政府会计主体权责界定问题研究——基于财政体制改革视角[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
- [117]孟庆瑜,张思茵,欧钰娟.河北省清洁生产立法问题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 (04).
- [118]孟庆瑜,梁枫.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反思与制度完善[J].河北法学,2018(02).
- [119]尤晓娜,刘广明.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之构建[J].行政与法,2018(04).
- [120]刘广明,尤晓娜.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 [121]刘茜.论我国生态福利供给制度的完善[J].广西社会科学,2018(05).
- [122]贾倩.为雾霾治理提供合法依据——限行限号措施的法律理论支持[J].河北企业,2018(01).
- [123]蔡荷欣.环境公众参与的重构[J].现代农村科技,2018(03).
- [124]李珍.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价值评估[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
- [125]王金兰,梅媛.环境治理立法框架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法学,2018(08).
- [126]于彦梅.我国太阳能利用法律问题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8(35).
- [127]张俊桥.新时代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政府监管研究[J].农家参谋,2018(19).
- [128]崔文成,于江飞.劳务派遣中工伤损害赔偿研究[J].河北企业,2018(02).
- [129]李思,周淑影.论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后竞业限制协议的效力[J].河北企业,2018(08).
- [130]朱振洁.论约定的竞业限制的适用期间[J].品牌研究,2018(01).
- [131]林倩倩,葛雅璇.就业歧视的法律问题研究[J].河北企业,2018(07).
- [132]宋立娟.我国农民工劳动权保护问题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15).
- [133]雷堂,雷小菲.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前后的社会保障立法追述及未来展望[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8(11).
- [134]赵立新.英国养老保障制度[J].中国人大,2018(21).
- [135]肖辉.京津冀养老一体化路径与对策[N].河北日报,2018-11-21.
- [136]张俊娜.中欧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损害赔偿比较——基于共同场所第三人侵权的假设案例[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03).
- [137]杜元斌.武警院校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8(07).
- [138]邓民,谭富根.新时代公安消防部队基层党委建设探析[J].武警学院学报,2018(05).
- [139]辛越,王宏刚.从维和警察维度探析中国维和培训话语权提升方法与路径[J].武警学院学报,2018(07).
- [140]岳清春.公安边防部队应急管理机制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8(03).
- [141]尚洪强.中国维和警察权益法律保障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8(01).
- [142]王万里.公安边防部队边境高原山地反恐行动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8(07).
- [143]王洪海,孔炜良.利比亚国家安全隐患现状与中国驻利维和警队安全应对策略[J].武警学院学报,2018(05).
- [144]王洪海,赵鑫.全方位外交布局视角下中国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战略定位[J].武警学院学报,2018(03).
- [145]田乾坤.联合国维和行动风险评估及应用——以中国参与联合国利比亚维和行动为例[J].武警学院学报,2018(05).
- [146]张铁.新时代关于中国维和警察事业重大职责使命与发展的思考[J].武警学院学报,2018(03).
- [147]杨振辉,张保平.新时代边海防建设若干问题研探[J].武警学院学报,2018(07).
- [148]齐凯.法治边检视域下的执法执勤规范化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8(05).
- [149]唐立江,岳清春.公安边防派出所激励机制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8(05).
- [150]苏彦山.我国海上执法体制建设影响因素分析及其构想初探[J].武警学院学报,2018(03).
- [151]李佑标,李玉鹏.法治视阈下海上治安特别管理区域问题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8(03).
- [152]唐军.军警民海上联合维权行动实践与对策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8(07).
- [153]李丽娟.我国海警执法武力使用法律问题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8(27).
- [154]王鹤.浅谈山东沿海船舶治安管理的发展沿革[J].武警学院学报,2018(07).
- [155]敦宁.刑事制裁体系变革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 [156]陶建国,闫雨萌,吕庆明.日本中小学法教育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8(01).
- [157]陆洲.我国公众参与司法的价值挖潜及短板补救[J].甘肃社会科学,2018(05).
- [158]梁平.司法改革语境下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与运行机制研究[J].知识产权,2018(02).
- [159]苏永生.在刑法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之司法判定问题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
- [160]苏永生.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
- [161]徐昫,王森炎.汉德公式量化困境及其消解——以间主观性为视角[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4).
- [162]梁平,刘帅志.民事审执分离体制改革中执行权优化配置[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02).
- [163]唐太飞,梁晴.人民法庭在基层法院员额法官养成中的作用机理——以人民法庭诉与非诉二元功能区分为

- 前提[J].河北法学,2018(07).
- [164]敦宁.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对象与内容的合理确定[J].铁道警察学院学报,2018(06).
- [165]孙书建.浅析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J].法制博览,2018(33).
- [166]李亚婧.强制隔离戒毒的检察监督分析[J].法制博览,2018(03).
- [167]王永刚.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检察监督机制[J].法制博览,2018(29).
- [168]蒋冰晶,张继红.整体性治理视野下的网络信访研究[J].河北法学,2018(06).
- [169]王春良.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
- [170]王超.法律援助制度现实问题实证研究[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8(05).
- [171]王亚琪.从法社会角度浅析辩诉交易制度[J].法制与经济,2018(01).
- [172]陆洲,张晓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研究[J].法制与经济,2018(05).
- [173]张梦梦.新刑法下社区矫正的现存问题新思考[J].法制博览,2018(11).
- [174]刘志刚,贾少涵.新时代农村普法教育要有大格局[J].人民论坛,2018(11).
- [175]李柏红,王文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时代意蕴、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06).
- [176]王子杰,石可涵,张佳怡.法治化视野下高校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J].保定学院学报,2018(02).
- [177]寇大伟,崔建锋.京津冀雾霾治理的区域联动机制研究——基于府际关系的视角[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
- [178]蔡岚,寇大伟.雾霾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协同行动、影响因素及拓展空间[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04).
- [179]宋伟卫,陈永学.高校职务犯罪治理实证研究——基于103个高校职务犯罪案件的分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6).
- [180]吴英旗.医疗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 [181]王鸿羽.我国股权众筹纠纷法律解决机制研究[J].河北企业,2018(02).
- [182]关建波.互联网时代下众筹模式的法律风险研究[J].河北企业,2018(02).
- [183]孟金爽.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的实践与思考[J].法制博览,2018(29).
- [184]李柏红,陈焘.雄安新区征地拆迁纠纷的预防与化解对策[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02).
- [185]卢芳华.职业安全权保护的国际化研究[M].广东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8.
- [186]王玉冲.论共生视域下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J].武警学院学报,2018(05).
- [187]张正,王爱芹.论条约的“被当事国嗣后惯行修正”[J].河北法学,2018(07).
- [188]王亚宁.欧盟应对难民危机的边防措施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8(07).
- [189]赵国栋,张馨予等.当代联合国改革背景下中国参与维和行动问题初探[J].武警学院学报,2018(07).
- [190]任佳.反恐背景下如何提高国际维和任务区社区警务[J].教育教学论坛,2018(43).
- [191]伍建华.试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自卫原则[J].武警学院学报,2018(01).
- [192]李志.联合国维和行动风险评估系统构建研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8(07).
- [193]杨春静.“大禹治水”对非常规移民治理的启示[J].武警学院学报,2018(05).
- [194]冯雅婷.基于打击拐卖越南妇女犯罪的国际警务合作机制探究[J].武警学院学报,2018(01).
- [195]宋阳,张源.自治商法理论的批判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4).
- [196]宋忠胜.茶叶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分析[J].福建茶叶,2018(10).
- [197]张立锋.欧盟碳市场法制建设若干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J].河北学刊,2018(04).
- [198]胡海涛,李晓阳.论国际竞争中立规则建构的正义维度[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8(02).
- [199]韩文倩.反补贴调查中的因果关系研究[J].品牌研究,2018(01).
- [200]王沛.“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研究[J].商业经济,2018(10).
- [201]王沛,刘柳.“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准入法律风险分析[J].北方经贸,2018(12).
- [202]王沛,刘柳.“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准入法律风险防控[J].对外经贸,2018(09).
- [203]刘艳娜.得与失:外国法查明责任分配之困[J].河北法学,2018(09).
- [204]李猛,胡海涛.用法律为“一带一路”建设护航[J].紫光阁,2018(07).

社 会 学

2018 年社会学研究综述

田翠琴

2018 年,河北省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增加了雄安新区研究、京津冀协调发展研究等方面的内容,深化了人口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内容,尤其生态环境保护与京津冀协调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研究成果仍以实证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理论性研究偏少。出版了多部社会学专著及相关内容的著作,如《京津冀环境保护历史、现状和对策》(田翠琴等)、《城乡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刘刚)、《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研究》(扈红英)、《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养老产业发展研究》(张拥霞)、《土壤污染现状及防治对策探讨》(卢彦琦)等。学术著作的数量有所增加,质量有所提高。本年度的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社会治理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制度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方式不断创新,既为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又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打开新的视角。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合理需求,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起跑线上,唯有以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为指引,不断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步伐,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才能不断提升民众满意度。杨会良等详细梳理和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政策脉络和演变逻辑,重点探讨党的十九大社会治理思想创新的重大价值。通过总结归纳社会治理思想的产生与演变,总结经验,发现了社会治理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制度。^[1]

治理理论是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公共管理理论,为公共管理者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理

论指导。整体性治理理论、合作治理理论与合同制治理理论是治理理论的重要内容,三大理论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大理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核心理念各异。整体性治理主张公众需求、结果导向和整合,合作治理主张信任、平等,合同制治理则以契约关系作为其核心理念。二是价值理念不同。整体性治理侧重于工具理性,合作治理偏重于价值理性,而合同制治理则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兼顾。整体性治理、合作治理与合同制治理理论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三大理论均是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补充与借鉴,共同指导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韩兆柱、于均环通过运用比较研究法对上述理论进行甄别,指出其在产生背景、核心理念、政府角色等方面均具有治理的特征,并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各理论之间也有差别,特别是在价值取向方面差异显著。三大理论的比较研究在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采用平等协商的治理方式、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的治理目标等四个维度为我国公共管理实践提供启示。^[2]

大数据及其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新一轮的政府治理变革创新,成为智慧政府治理的重要背景和条件,对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模式与治理过程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司林波、刘畅认为,为了更好地掌握时代发展态势,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应当更具“智慧”,汇聚政务大数据,打造高效能的智慧政务;建立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提升政府决策精确性;实现精细化数据管理,加速智慧服务建设;完善智能化数据监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监管,努力构建起以大数据为核心资源的智慧政府治理模式。^[3]

二、社会工作与精准扶贫

社会工作与扶贫的关系由来已久,作为社会

福利和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的产生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源于贫困治理。但目前,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如何参与精准扶贫,缺少社会工作介入与已有的精准扶贫体制机制对接的研究。林顺利、孟亚男以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为线索,认为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顶层、中层和情境多重嵌入的过程。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困境在于形式上的嵌入和实践的脱嵌。针对这种状况,要在地方工作中为社会工作嵌入留下接口,积极营造和改善社会工作在基层的工作情境并强化社会工作的行业能力建设,促进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系统嵌入,有效激发社会工作脱贫攻坚的潜能。^[4]

张亚明等认为,探究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分异结构,应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核心,从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三个维度出发,构建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综合评价体系,并借助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模型和 Arc GIS 地理信息软件,测算出环京津贫困带的三维度系统空间分异地图,分析结果发现:环京津贫困带 27 个县的空间贫困分异显著;自然、经济、社会三个系统的贫困叠加会削弱或加重综合贫困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精准扶贫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调控策略。^[5]

中国社会工作史文献资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与中国社会工作史的研究对象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社会工作史的研究对象是作为一种职业、专业和一门学科的社会工作。彭秀良、林顺利认为,中国社会工作史文献资料的开发利用显得很薄弱,需要深入挖掘未被发现的文献资料,并对已开发中国社会工作史文献资料进行解读和研究,使之有机融入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学的知识体系。^[6]

宋之杰等分析了我国社区家庭医生制度面临的问题,剖析了“互联网+社区家庭医生”的优势,探讨如何利用互联网整合医疗行业信息资源、医生资源、资本资源,构建了“互联网+社区家庭医生”资源整合服务体系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互联网+社区家庭医生”资源整合服务体系构建的建议:加强社区及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提升“互联网+社区家庭医生”资源整合协调能力;健全“互联网+社区家庭医生”社会资本支持机制。^[7]

三、人口社会学

(一) 人口政策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明确的以家庭为支持对象的社会政策,对家庭的支持基本上都是间接地包含在其他社会政策之中。由于实施主体不同,导致了政策实施中缺乏整体性和关联性的问题,进而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效果。吕红平、邹超认为,为了解决二孩生育意愿不足的问题,保障“全面两孩”政策顺利实施,有必要加强家庭支持政策建设,重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向按政策生育的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扶助。为此,应当借鉴国外家庭支持政策的有益成分,结合我国国情,把家庭支持政策的内容放在涵盖家庭生活与促进家庭建设、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与和谐幸福指数上,建立一个以维护家庭利益为宗旨的专门负责家庭支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机构,完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加大对家庭发展的支持力度。^[8]

生育政策调整后,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奖励扶助制度作出相应的改革或调整。吕红平、吕子晔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改革或调整应当坚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对于已经形成的计划生育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为了兑现中共中央《公开信》的承诺、体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应当继续实行奖励扶助政策;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后按政策生育的家庭,应当实行“育儿津贴”或“生育补助”制度,这是对生育社会价值的认可和补偿,也是“鼓励按政策生育”的重要保障。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双轨制扶助制度,应当坚持国库保国策、公平公正、保证重点、统筹协调等原则,科学构建生育支持政策,更好地满足按政策生育家庭的利益诉求,保障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顺利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9]

(二) 婚姻与择偶行为

农村的公共仪式主要是指婚丧嫁娶等传统的习俗。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的转变,农村婚丧嫁娶等公共仪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特征 is 市场观念渗透到农村的传统公共仪式中。农村公共仪式的过程中,“市场元素”不断增加,而传统的“户族元素”不断减弱。王敬、海莉娟通过陕西关中地区

“媒人的作用及其变化”“婚姻市场的分层以及男女的不平等”“彩礼”“结婚仪式市场化”等四个方面的研究,厘清农村青年婚嫁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村婚姻市场的变革。^[10]

贾志科等基于江苏南京、河北保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五大类行业 1028 名城市在职青年的调查资料,探讨了青年择偶模式的行业差异。研究发现,青年在择偶时间、择偶途径选择、择偶条件自评、择偶标准、择偶参谋以及择偶地域范围上具有较为显著的行业差异。此外,不同行业间的青年拥挤感差异显著,择偶拥挤感与择偶结果存在一定关联,但从事教育业的青年在强烈的择偶拥挤感之下呈现出“假象”。青年是否存在择偶烦恼与青年所属行业关系不大。新型择偶方式能否取代自主择偶成为主流择偶途径、择偶标准差异与择偶结果的矛盾关系、行业对青年择偶地域范围的影响是否会持续下去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11]

青年婚育利益导向机制是国家、政府和社会三方力量为协同指导青年婚育行为与维护婚育利益而建立的政策导向性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阶段的青年婚育政策有其存在的不同现实背景。贾志科等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的青年婚育政策,将政策实施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政策演变做了历程回溯和特征总结。研究发现,青年婚育政策在创造“人口红利”、规范超生行为、提升“二孩”意愿以及抑制“钻漏洞”婚育行为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成效有限。因此,未来完善青年婚育政策的方向在于建立健全婚育利益导向机制,鼓励青年适龄结婚、适龄生育,加强婚前、婚后辅导教育等等。此外,三方力量协同建立“非常规”婚育行为的监测制度,对增强政策的完备性和弥补漏洞也具有积极意义。^[12]

(三) 人力资本与经济的关系

王金营、李天然以 OECD 中 17 个国家 1960—2016 年的数据为样本,从人口规模、质量、年龄结构和迁移分布等方面刻画 OECD 国家的人口变动轨迹,继而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差(PCSE)估计法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探索检验了这些国家人口变动各因素和综合因素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发展质量等转变的影响及

其作用规律。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定规模和密度的人口环境下,总人口的过快增长会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人口迁移率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有促进作用,但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有抑制作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改变经济结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人口的集聚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 and 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有正向作用;预期寿命的提高为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机会和动力,人口老龄化则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13]

区域经济的发展很多时候会依赖于区域的中心城市带动和人力资本聚集。因此,打造中心城市成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实现中心城市的这些作用,人力资本聚集是关键因素。中心城市如何实现区域人力资本的聚集呢?王金营等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从经济、产业、教育、就业、医疗等方面探讨中心城市对区域人力资本聚集效应和路径,发现中心城市的产业发展、公共支出、教育医疗等水平均对人力资本聚集有着显著影响。不同的中心城市在区域人力资本聚集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有的是积聚作用为主,有的是溢出作用为主。因此,中心城市在制定自身发展战略时既要从自身经济发角度考虑又要兼顾城市间的互动关系,最终实现共同发展。^[14]

杨胜利等在构建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水平的协调性问题。研究发现:1996 年以来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保持着良性互动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从严重失调逐渐向优化协调适应转变。从空间耦合协调度来看,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性,东部最好,西部最差。经济发展环境、对外开放程度、公共财政支出、人口迁移流动、市场化程度、城市化率、人口密度等成为制约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15]

京津冀发展中面临着大城市人口和企业过度集聚而产生的交通拥挤、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的压力;又面临着长期的全国性低生育水平导致的各地区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供给下降的压力。王金营、唐天思采用生产函数反演

法,对京津冀未来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和不同综合要素生产率(发展方式)下的劳动力需求进行模拟和比较。结果显示,京津冀未来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可能性不断增强,为使区域经济实现持续高质量增长和发展,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从而减少对京津冀之外劳动力的需求,实现在人口不再大规模增加的前提下劳动力的供需平衡。因此,京津冀地区在新的人口发展和经济形势下,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创新驱动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并保持必要的人口和劳动力规模与活力,进一步促进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16]

四、老年社会学

(一) 老年人的文化需求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包括老年人口在内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要满足老年人不断提高的教育需求,必须“对症下药”,针对老年教育需求动机进行老年大学课程与专业的有效供给,才能更好地促进老年教育健康发展。韩伟认为,通过对老年教育需求动机的研究进而设计合理的老年大学教育供给内容是老年教育健康发展的关键。他以秦皇岛市老年大学学员为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16个需求动机因素中提取出6个主成分因子,由此得到老年教育的需求动机由强到弱依次表现为实现人生价值、服务家庭、增强社会交往、提高生活质量、丰富情感生活,以及探知新事物。老年教育的需求动机规律为老年大学合理设计专业及课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17]

老年教育是精神文化养老服务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老年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相应地存在消费的“拥挤点”。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环境下,老年教育需求快速膨胀,政府承办的老年大学供给与需求缺口越来越大。因此,探索老年教育的有效供给途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郑新等人的研究发现老年教育存在资源供给有限、分配不均、课程体系设置不完善,以及教育人才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而老年教育供给主体单一,经费投入不足,对老年教育认知错位是造成老年教育供给困境的主要原因。因此,创新供给模式,加大资金投入和资源整合,以及提升老年教育质量

是有效解决老年教育困境的对策。^[18]

通过对老年教育需求动机的研究进而设计合理的老年大学教育供给内容是老年教育健康发展的关键。韩伟等以秦皇岛市老年大学学员为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16个需求动机因素中提取出6个主成分因子,由此得到老年教育的需求动机由强到弱依次表现为实现人生价值、服务家庭、增强社会交往、提高生活质量、丰富情感生活,以及探知新事物。老年教育的需求动机规律为老年大学合理设计专业及课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包括老年人口在内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需求层次不断提升,要满足老年人不断提高的教育需求,必须“对症下药”,针对老年教育需求动机进行老年大学课程与专业的有效供给,才能更好地促进老年教育健康发展。^[19]

(二) 养老方式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着优秀家庭文化和养老传统的国家。在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的现实背景下,养老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农村人口流动性强、老龄化程度高、收入水平低、代际文化转向和养老文化弱化等特点,决定了农村养老问题的复杂性。吕红平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效率原则和利益原则至上、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传入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流传数千年的家庭文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代际关系原则和养老文化受到严重冲击,成为家庭养老的思想文化障碍。正确认识家庭文化与家庭养老的关系,构建支持农村家庭养老的新型家庭文化,形成有利于农村家庭养老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做好农村家庭养老工作的重要思想文化保障。^[20]

农村空巢老人作为城镇化进程的客观产物,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政府职能发挥不到位以及社会力量的不充足,使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变得愈加严峻。如何为农村空巢老人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机制,不断提高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水平以及精神的满足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有着重要意义。仝广顺认为,具有较大基数的农村空巢老人能否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是我国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挑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协调与合作,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让农村空巢老人能够真正地安享晚年。^[21]

居家养老服务是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核心支撑。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实质是在政府与社会两部门之间引入市场因素和自由竞争机制,促使多元社会主体通过协商民主等手段,在社会权力的基础上发起集体行动共同治理社会事务,实现公共利益。陈静、赵新光基于老龄社会治理视域,从要素、流程与管理、竞争程度、主体间关系、制度化程度、购买的规模与质量、评估等方面梳理国内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典型模式及其特征和机制,探讨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合法路径。并以居家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为切入点,将政府、市场与社会要素的互动视为融合传统与现代养老文化、衔接家庭养老与居家和社区养老、联通护理保险制与养老金制的重要机制,探索健康老龄化进程中新型政社关系、服务型政府和多元共治型老龄社会服务体系的构建。^[22]

冀云、孙鹃娟基于 2014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中国不同自理能力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与代际支持对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影响,对自理老年人和不能自理老年人分别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三代共居的老人抑郁水平最低,独居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最高;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和家务支持对自理老年人抑郁水平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与子女见面、电话、感觉亲近对自理和不能自理老年人抑郁水平均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可以得出结论:与家人同住能降低老年人抑郁的风险,顺向支持比逆向支持对自理老年人抑郁症状更具积极抑制作用,情感支持对降低老年人抑郁风险有显著作用。^[23]

(三) 养老保险问题

2005 年我国启动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但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实现规范调整。韩伟等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为前提,综合考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计划覆盖人口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年龄阶段消费需求的差异性,运用回归估计方法确定养老金调整指数,由此设计多层次养老金调整方案,并基于 2016 年物价和实际工资增长情况,以河北省为例测算多层次方案下养老金合理调整幅度,由此得出河北省 2016 年实际调整幅度过大,给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带来压力的结论。^[24]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是解决我国“三农”

问题的一大助力,政策执行的审计指标体系更是养老保险政策的免疫系统。为了更好地检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审计情况的有效性,胥英明等通过梳理相关基础理论,建立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围绕政策执行为核心,构建了包括效率性政策、社会性政策、经济性政策和基金管理政策四大模块,政策执行、政策效果和政策预测共计 34 项指标的指标体系。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的审计指标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做出了有效建议。^[25]

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市场存在着长期性、短期性、正面性与负面性的多方面影响。正面影响是延长人力资本回收期,增加适龄劳动人口;负面影响是阻碍就业进程,不利于供给市场的良性发展;长期影响在于缓解劳动力不足;短期影响在于弱化老年劳动者地位。杜航认为,需要从“弹性”角度、权利保障角度与统筹兼顾角度,推动延迟退休政策发展,促进我国劳动力供给市场的可持续发展。^[26]

五、环境社会学

(一)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农村环境污染包括两部分:一是从城市和工业转移而来的污染,二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本身产生的污染。农村面源污染又称农村非点源污染,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农田中的泥沙、营养盐、农药及其他污染物,在降水或灌溉过程中,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壤中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而形成的面源污染。与农村工业污染相比,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所造成的面源污染已成为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主体。田翠琴等认为与点源污染相比,它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在点源污染逐步得到控制后,农村面源污染问题已成为目前水环境污染控制的重点和难点。随着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等点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农村面源污染已经取代点源成为水环境污染的最重要来源,成为现代农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难点,成为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27]

畜禽养殖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最大来源,也是水体环境治理的重要方面。畜禽污染治理的根本途径是粪便资源化利用,2014 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的政策。金

书秦等建立了政策评估框架,通过对相关政策分析和初步评估发现三方面问题:一是主要责任部门的目标与国家目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二是政策的约束性管控措施偏离政策目标,带来衍生问题甚至阻碍资源化利用;三是激励措施落实不到位。针对政策目标不衔接的问题,各部门应以实现国家目标为根本,调整自身目标或明确由其他部门“补缺”;针对管控过严问题已经有新政策在“纠偏”,具体执行效果仍有待观察;针对激励不到位的问题应当责成各地加大执行力度,或者出台更具有操作性的细则。^[28]

农村生活垃圾是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现有的城市生活污染治理模式不适用于地理特征复杂、排放主体分散的农村地区,农村生活污染小而散的特点在理论上适合引入市场机制。美国是世界上环境制度及管理体系较完善的国家,也是较早关注农村生活污染治理的国家。其基于市场机制构建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值得我国借鉴。韩冬梅等认为,应该吸取国内外的经验,合理确定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各环节的市场化程度;重新界定各主体的责任;建立政府主导下的资金筹措多元化、资金使用一体化的资金机制;逐步推进激励为导向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置收费制度;突出农村生活污染治理的差异性,建立适应不同地区特点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及治理模式库;以及建立并完善相关制度体系。^[29]

(二) 生态环境状况的评价体系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内容,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以此为基础,用多领域指标监测可持续发展进展。SDGs通过后,各国都将其作为自身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指导,中国政府也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并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等实践路径有机结合。然而,SDGs的评价主体是全球和区域进展,对于可持续发展程度各异的国家进行统一评价并不适用,亟待研究一套适合于中国情况的评估体系,一方面形成国内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综合现状评价,摸清基本情况,另一方面形成对SDGs评估的对标,以促成SDGs各项目标的落地。基于此背景,朱婧等重点分析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的出台过程、概念框架,以及评估应用中的具体问题,以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强调的

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理论支撑,对标SDGs的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构建了一套适用于中国国家层面可持续发展进展评估的指标体系,旨在形成对中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评价指标建议。选择2012—2016年为研究期,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构建了针对民生改善、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同时与SDGs评价目标相对应。评价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的总得分在研究期内均保持增长的趋势,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态势始终改善。总分增长较快的年份,资源环境质量改善的得分也较高,其中贡献率较大的主要是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下降相关的指标,通过现状评价明确了发展的薄弱环节,形成了SDGs框架下适用于中国评估的指标建议。^[30]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是区域生态环境管理决策与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王彦芳、裴宏伟利用1980年、2000年、2015年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和植被覆盖等数据,基于防风固沙生态功能区的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了三个时期河北坝上地区的生态环境功能状况指数。结果表明,坝上防风固沙的生态功能状况指数平均值为54.67,自然生态一般,存在一定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功能相对较弱。其中,1980—2000年坝上地区防风固沙生态功能略微变差,2000—2015年则有明显的改善,这主要是受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未来应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构筑科学合理的生态屏障,发展生态经济,加大资金和科技投入,通过完善政策,创新体制,不断提升坝上防风固沙生态功能,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31]

复合系统各子系统协同共生关系具有相互联系、复杂耦合的特点,各子系统协调共生才能实现整体优化。沿海城市的港口经济与低碳经济互动性强,是协同共生关系的典型领域。港口的升级推动城市碳排放的压减,沿海城市的发展质量则成为港口经济水准的关键支撑。通过港口对集装箱适箱货物的物流支撑,沿海城市的产业体系将得以提升、低碳原则将得以强化。张立华等首先用因子分析法评价了沿海城市港口经济子系统与低碳经济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然后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构建复合系统共生度模型和共生趋势模型,最后以河北省唐山市为例进行了具

体测算,并阐述了相应的政策含义。^[32]

(三)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当前,我国的诸多古城在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没有把握好三者的契合点,过度开发,拆古城、建新城,盲目复建古建筑导致了古城生态建设危机、古城资源与人文自然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杨英法认为,生态建设、古城保护和经济发展间具有互促共进的作用,古城保护可为经济发展提供宝贵资源,经济发展可为古城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基本条件,生态建设有助于实现古城保护与开发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古城保护既需要维持古城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也需要保护古城内部和周围的生态系统,还需要通过经济发展筹集资金,发展技术,聚集人才。因此,构建生态建设、古城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互促共进机制是推进古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出路。^[33]

(四) 绿色发展研究

绿色发展是推进环境治理转型的有效途径。河北省是全国产量第一的钢铁大省,多年来过度追求规模和速度的粗放型模式导致严重的钢铁产能结构性过剩,资源消耗量大,环境污染严重。戴维旺、蒋秀兰认为,在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压力下,河北省钢铁产业必须实现绿色转型,要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优化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建立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实现化解过剩产能和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的双重目标。^[34]

祝丽云等应用 2013—2015 年京津冀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雾霾污染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呈现“U”形曲线关系,现阶段处于拐点的右侧,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显著正相关;与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假说;与经济规模、对外开放程度显著负相关,与房屋建筑施工面积显著正相关。据此,需进一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向知识、技术导向型服务业升级,加强对外开放水平,推广绿色建筑,降低扬尘污染。^[35]

李艳红利用 1982—2014 年河北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数据,验证两者之间 EKC 曲线关系的存在性。由于受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金融危机和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曲线具有一定的特殊

性。继而对样本进行了调整再回归,结果显示河北省人均碳排放与人均 GDP 之间存在“倒 U”型曲线,拐点为人均 GDP 达到 30216 元。在上面的基础上,建立了 STIRPAT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是河北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36]

(五)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田翠琴等人出版的《京津冀环境保护历史、现状和对策》(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 年)一书,系统研究了京津冀地区环境保护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对策。作者在详细介绍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地资源开发和利用情况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京津冀三地环境保护的历史、环境问题的特征、环境治理的难点以及未来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走向与对策。构建了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框架,提出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农村环境污染协同治理的具体对策。作者认为,环境协同治理是系统地、根本性地解决京津冀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其中,顶层设计是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基础和前提,一个战略性、综合性、长远性的规划和蓝图是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关键。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可以从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与区域府际协同治理两大路径着手,并根据这两大发展路径,从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生态补偿机制、市场化机制和政绩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制度出发,提出了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37]

目前,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面临着环境保护内聚力不足、责任分担难以界定、合作共识难以达成等治理困境。司林波等认为,建构以内生动力为驱动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形成国家、市场和社会一体化的协作性治理网络是解决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中面临的困境的有效途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的实现,必须健全决策与预防、参与执行、沟通协调、信息共享和互信、政绩考核与监管,以及生态补偿机制等协同治理机制,以保障跨域生态环境治理切实取得实效。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设计需要明确两方面问题:一是应该基于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逐步形成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二是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设计,形成系统化、专业化的

治理机制。^[38]

王韶华等依据能源强度的标准化值分析了2007—2015年京津冀的能源强度时空格局演变,进而通过重心模型提炼能源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重心演变轨迹,揭示能源强度重心变化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京津冀的降耗拉动区包括北京市和天津市,降耗中间区中减少了3个市,廊坊市、沧州市、秦皇岛市先后落入降耗滞后区,从而使得能源强度重心先向东南移动,后向东北移动,与技术重心、经济重心、能源消费重心、工业能源强度重心间的距离呈缩小趋势,与产业结构重心间的距离呈扩大趋势,其中能源消费重心、工业能源强度重心、工业重心等推动了能源强度重心向东移动,能源消费重心、工业能源强度重心等推动了能源强度重心向北移动。^[39]

王韶华、张伟通过构建三次产业结构影响能源强度的岭回归模型,并分解三次产业结构间及其与能源强度间的相关系数,揭示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机理,进而结合“十三五”节能和经济增长目标提炼降低京津冀能源强度的产业结构优化路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下,北京市和河北省的产业结构优化不能完成节能目标;而节能目标下,天津市的产业结构优化不能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因此,北京市应通过节能倒逼第三产业内部升级,河北省应通过节能倒逼工业化进程加速,天津市应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40]

经济要素是决定土地利用范围、结构的关键因素,特别是产业结构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发展特征有着导向性的作用。田桐羽等以呼和浩特市市域为研究区域,结合2009—2015年该市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及产业经济相关的统计年鉴数据,采用信息熵模型研究法和线性回归分析法,对土地利用结构动态变化的信息熵及其与产业投资结构、产业产值结构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二、三产业投资水平与土地利用信息熵变化间的相关性依次为强负相关、弱负相关和强正相关,而三次产业产出水平与土地利用信息熵变动间的相关性依次表现为强负相关、强正相关和弱正相关。研究成果对提高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均质性和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41]

六、城市社会学

(一) 雄安新区与智慧城市建设

雄安新区社会融合是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鲜明的不可“逆”性,原住民与新移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为新区建设释放巨大活力,对新区整体规划具有战略性意义。司林波、聂晓云认为,雄安新区原住民与新移民社会融合具有鲜明特点,社会结构、社会资本、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等会成为影响新区社会融合发展的因素,应从社会管理制度、发展理念、城市接纳度、差别化干预、社会保障网络等方面构建促进原住民和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具体实施路径。^[42]

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为构建“大保定”提供了平台,也为容城县发展奠定了基础。容城县是“大保定”东侧与徐水区近邻的县级中心地,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具有区位优势。“弯月”形的聚集程度较高的小城镇分布格局使容城县能够在主体区域内构建城镇体系,八于乡在其间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孟祥林认为,为了提升城镇发展水平,容城县不但要处理好区划内乡镇中心地间的关系,而且要与邻近区划进行有效整合,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镇发展链,包括“容城县—安新县”发展链、“容城县—雄县”发展链、“容城县—定兴县”发展链及“容城县—徐水区”发展链等。在区域内最终构建“C正+O+C反”的城镇体系,在“大城市环”中强化影响力,积极融入“高碑店市—徐水区—霸州市”三角形与“保定市—廊坊市—沧州市”三角形中。^[43]

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城市建设转型升级的主要发展目标,“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建设也是雄安新区建设的首要规划的目标之一。杨会良、杨秀丹基于场所和流动空间视角,将“人”放在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中心位置,从建设社会—自然—经济城市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构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系统模型,包括以人和流动空间为核心新型社会子系统、将技术融入自然物质和人的新型生态系统以及以信息、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的新型经济子系统,并从信息融合、技术创新、人文情感和时空布局4个方面提出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

的具体可行路径。^[44]

（二）城市布局与发展规划

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为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目标而提出的两个重大战略，尽管两者的内容和侧重点不同，但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陈丽莎认为，为了顺利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必须统筹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两者的关系，以城镇经济反哺和带动农村经济，以城镇化战略助推乡村振兴战略，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合作，实现城镇利益和乡村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主体利益的多赢。^[45]

区域经济学理论在分析城市群问题时都需要设定诸多前提条件，但这些条件实际上都不容易满足，其中，行政区划在理论分析中往往并不顾及。孟祥林认为，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结果，是影响城市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行政区划不合理对城市化形成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邻近行政单元间形成的全包围结构、半包围结构、准包围结构、飞地结构、嵌入结构等，都需要尽快解决。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案包括对既有行政单元进行分割重组、裁弯取直、软区划设计等。一般而言，重新安排县级行政单元以及乡镇行政单元的归属，是理顺邻近行政单元关系的重要举措，调整后的行政区划应该是凸面区域，区域中心地位于行政单元的中央，便于对腹地均匀施加影响。^[46]

扩散效应是极化效应和回程效应的对偶效应，在城市化进程中，腹地内核心城市发展的初期阶段以极化效应和回程效应占主导，随着区域中心城市规模扩大和影响力增强，扩散效应会逐渐超过极化效应。随着扩散效应增强，大城市腹地内的中小城市发展速度增大，并逐渐发展成为分担区域中心城市职能的子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与子中心城市的联系开始加强。孟祥林认为，在城市的自然发展过程中，资源因谋求聚集节省而导致大城市过度发展，同时在相邻区域内会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不足问题，为此需要通过行政力量的影响改变资源的流量和流向，从而使得资源在区域内的布局得到优化，在合适的区位上布局节点中心地，这些节点中心地在高级别中心地与低级别中心地间扮演中介角色。城市群内中心地的等级体系得到完善，城市群得以高效发

展，整个区域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受到来自城市和城市群的扩散效应的影响。^[47]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为了解决河北省行政区划长期以来存在的“空心拳头”问题，需要通过“软区划”方式在京津冀三地通过“做加法”和“做减法”构建起整合程度较高的城市体系。“软区划河北”的直接管理区域为“石家庄 + 邢台 + 邯郸”，在此区域内要形成“一核 + 四星”的石家庄城市团、“一核 + 三星”的邢台城市团和“一核 + 二星”的邯郸城市团，同时还要构建“高邑 + 柏乡”“沙河 + 永年”等微中心组团，在行政区划边界处扮演桥梁角色，分别将“石家庄—邢台”“邢台—邯郸”连接在一起。孟祥林认为，在构建城市团和微中心组团的过程中，不但要重视中心城市的作用，还要发挥县级中心地在整合乡镇中心地中的作用，构建城市环链、微中心三角形等，不断开发新的交通线路与既有交通线路整合在一起，提升不同等级中心地间的通达程度。^[48]

（三）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

城市交通是一个城市系统保持健康运转的命脉，具体表现为由一定数量、不同级别的道路用地组成的网络体系，承载着服务于城市内外活动的多种功能。田桐羽以石家庄都市区为研究区域，通过 GIS 空间分析和相关系数分析法，对近 30 年城市道路系统演变特征及人口和经济等影响道路系统演变的重要因素进行阐述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城市道路系统演变特征突出表现为以方格网为基本布局形式、以环形骨架为主要构架的空间形态；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对道路系统演变的影响分别体现在道路用地结构转变和用地面积增加上。研究成果对于研究区域未来道路系统格局的发展趋势可起到一定的预测和优化作用。^[49]

田桐羽以呼和浩特市市区为例，结合 2001—2016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分类调查数据和相关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数据，分别对 SD 模型和 SD-MOP 集成模型的基于基准、粗放及集约利用等三种情景模式下的 2001—2040 年城市土地利用结构进行模拟仿真，并对两种模型间的不同情景下用地面积仿真结果作对比和择优。结果表明：（1）SD 模型的仿真结果中三种情景约束下用地面积占比的平均年增率最大的用地类型是特殊用

地,年增率平均值达到 16.316%,其中集约利用情景下的年均增率值最大;(2)SD-MOP 模型的不同情景仿真结果中用地面积占比年增率平均值最大的用地类为商服用地,即达到 50.390%,且集约利用情景下其年均增率值最大;(3)不同情景下 SD-MOP 模型的用地预测总面积年增率均要高于同一情景下 SD 模型对应值,且基于基准、粗放和集约情景下分别高出 0.439%、1.790%和 2.047%。结合城市聚集经济原理和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要求,宜选择集约利用情景下基于 SD-MOP 模型的仿真方案为最佳情景仿真方案。^[50]

田桐羽等以呼和浩特市市区为研究区域,利用 2009—2015 年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和相关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数据,以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主要因子为优化决策要素,分别运用灰色模型 GM(1,1) 预测法和灰色线性规划法(Grey linear programming, GLP)进行各因子预测值区间和相关影响因子约束方程不等式的估算、构建,并分别根据预测区间的上下限值,设计出两个关于 2020 年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优化配置方案并进行对比和择优。结果表明,与以区间下限值为准的优化方案相比,取上限值的优化方案在整体用地产出效益和单一类型用地的规模组合等方面均要优于取下限值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以及现状土地利用结构。^[51]

七、基本公共服务

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居民消费的支撑才使得投资有效且保障经济增长。长期以来,中国最终消费率一路下滑,从 1990 年的 62.5% 下降到 2014 年的 51.4%,而居民消费率则由 1990 年的 48.9% 下降到 2014 年的 37.5%,期间曾滑落到 2010 年的 33.8%。通过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来改善民生从而刺激居民消费的逻辑是合理的。国内外学者通过多种经济模型分析证明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影响,王金营等将财政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整合为公共服务支出,分析其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利用基于 1998—2014 年中国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动态模型进行回归和检验,期望能够解释以下几个问题:公共服务支出对我国居民

消费有何影响?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中,公共服务支出是否都能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进而得出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结论。同时指出公共服务支出水平是有一定限度的,不是无限增长的。^[52]

(田翠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杨会良,陈兰杰,杨雅旭.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的理论演变与制度创新[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8(4).
- [2] 韩兆柱,于均环.整体性治理、合作治理与合同制治理理论比较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5).
- [3] 司林波,刘畅.智慧政府治理: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变革之道[J].电子政务,2018(5).
- [4] 林顺利,孟亚男.嵌入与脱嵌: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J].甘肃社会科学,2018(3).
- [5] 张亚明,石笑贤,严玲玉.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3).
- [6] 彭秀良,林顺利.中国社会工作史文献资料与开发利用述论[J].社会工作,2018(5).
- [7] 宋之杰,商贝贝,郭燕平,王浩.“互联网+社区家庭医生”资源整合服务体系构建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18(3).
- [8] 吕红平,邹超.实施“全面两孩”后家庭支持政策改革与完善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8(2).
- [9] 吕红平,吕子晔.“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奖励扶助制度改革之我见[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 [10] 王敬,海莉娟.婚姻市场分层化与公共仪式市场化——陕西关中地区农村青年婚嫁的运作机制[J].中国青年研究,2018(6).
- [11] 贾志科,沙迪,风笑天.城市在职青年择偶模式的行业差异研究[J].青年探索,2018(5).
- [12] 贾志科,沙迪,赵英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青年婚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兼谈政策效果及未来方向[J].中国青年研究,2018(10).
- [13] 王金营,李天然.OECD 国家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8(6).
- [14] 王金营,李庄园,李天然.中心城市在区域人力资本聚集中的作用[J].人口研究,2018(3).
- [15] 杨胜利,王伟荣,王艺霖.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及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与社会,2018(5).
- [16] 王金营,唐天思.京津冀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下的需求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8(6).
- [17] 韩伟,郭晗,郑新.老年教育需求动机研究——针对老年大学层面[J].人口与发展,2018(5).
- [18] 郑新,韩伟,于维洋.精神文化养老服务产业:老年教育

- 供给困境及对策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4).
- [19] 韩伟,郭晗,郑新.老年教育需求动机研究——针对老年大学层面[J].人口与发展,2018(5).
- [20] 吕红平.农村家庭养老的家庭文化构建研究[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9(2).
- [21] 仝广顺,杨竹晴,宋凤轩.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探讨[J].经济研究参考,2018(22).
- [22] 陈静,赵新光:从“购买”到“共治”: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研究——基于老龄社会治理的视角[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1).
- [23] 冀云,孙鹃娟.中国老年人居住方式、代际支持对抑郁的影响[J].宁夏社会科学,2018(6).
- [24] 韩伟,王会敏,郑新.城镇职工统筹养老金规范调整方案设计[J].统计与决策,2018(20).
- [25] 胥英明,金淑娟,王梦源.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的审计指标体系构建[J].当代经济,2018(12).
- [26] 杜航.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市场的影响[J].改革与战略,2018(1).
- [27] 田翠琴,赵乃诗,赵志林.京津冀环境保护历史、现状和对策[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
- [28] 金书秦,韩冬梅,吴娜伟.中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政策评估[J].农业经济问题,2018(3).
- [29] 韩冬梅,次俊熙,金欣鹏.市场主导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美国经验及启示[J].经济研究参考,2018(33).
- [30] 朱婧,孙新章,何正.SDGs 框架下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12).
- [31] 王彦芳,裴宏伟.1980—2015年河北坝上地区生态环境状况评价与对策研究[J].生态经济,2018(1).
- [32] 张立华,李南,史宝娟.沿海城市“港口经济—低碳经济”共生的定量评价——以唐山为例[J].生态经济,2018(4).
- [33] 杨英法.生态建设、古城保护与经济发展间互促共进机制的构建[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1.
- [34] 戴维旺,蒋秀兰.河北省钢铁产业绿色转型战略分析[J].北方经贸,2018(2).
- [35] 祝丽云,李彤,马丽岩,刘志林:产业结构调整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基于中国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研究[J].生态经济,2018(10).
- [36] 李艳红.河北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EKC存在性验证及STIRPAT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评论,2018(第七辑).PHam.
- [37] 田翠琴,赵乃诗,赵志林.京津冀环境保护历史、现状和对策[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
- [38] 司林波,聂晓云,孟卫东.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困境成因及路径选择[J].生态经济,2018(1).
- [39] 王韶华,刘琳,张伟.京津冀能源强度及其影响因素重心演变时空特征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8(10).
- [40] 王韶华,张伟.基于能源强度和经济增长目标的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8(7).
- [41] 田桐羽,玉梅,苏虹.基于信息熵的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相关性分析——以呼和浩特市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8(7).
- [42] 司林波,聂晓云.雄安新区原住民与新移民社会融合的探讨[J].行政管理改革,2018(7).
- [43] 孟祥林.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与容城县城镇体系发展对策分析[J].城市,2018(3).
- [44] 杨会良,杨秀丹.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基本架构与路径——基于场所和流动空间视角[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 [45] 陈丽莎.论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带动作用[J].云南社会科学,2018(6).
- [46] 孟祥林.城市化进程中的行政区划障碍与调整方案思考[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 [47] 孟祥林.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基于城市群的分布与协同发展的视角[J].上海城市管理,2018(2).
- [48] 孟祥林.京津冀协同发展“软区划河北”发展构想[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 [49] 田桐羽:基于GIS的城市道路系统格局演变特征研究——以石家庄都市区为例[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5).
- [50] 田桐羽.基于SD-MOP模型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情景模拟研究——以呼和浩特市为例[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8(6).
- [51] 田桐羽,玉梅,苏虹.基于GLP模型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决策——以呼和浩特市为例[J].湖北农业科学,2018(18).
- [52] 王金营,李庄园,李天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1998—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社会问题研究

闫坤

2018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工作者持续关注社会问题,不但在理论上建树颇丰,更是与实践

相结合,对农民工问题、劳动就业问题、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谐社会构建问

题、人口问题,以及其他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

一、农民工问题

(一) 新型职业农民问题

吕雅辉等人采用实地座谈、电话访谈、案例剖析等方法对以产业联盟为载体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典型模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阳晨模式”中,农广校和企业“校企合作”培训机制是基础,政府“自上而下”保障机制是关键,政府、企业、联盟户间利益联结机制是动力。模式相关利益主体行为均衡,机制运行高效,在一定条件和策略下可复制应用。^[1]

薛晴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所作的重要判断。以调研资料为据,分析农民阶层分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两面性影响,并据此提出引导农民阶层良性分化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对策建议。^[2]

张敬伟、裴雪婷指出,鉴于部分农民创业者在知识匮乏、认知缺陷和经验不足等困境中实现创业成功,通过创业学习视角,综合运用扎根理论和内容分析两种方法,分别定性和定量地分析 CCTV《致富经》栏目报道的 136 个农民创业故事,以期透视中国农民创业者的创业学习行为规律。最终提炼出农民创业者的 2 类(包括直接学习和间接学习)、6 种(包括试验学习、试错学习、即兴学习、观察/调查学习、替代学习和外部建议学习)创业学习方式,及其不同的应用特征。证据表明,农民创业者的直接学习总体多于间接学习,直接学习中的观察/调查学习、即兴学习以及间接学习中的外部建议学习最为普遍;此外,不同创业环节中使用的创业学习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创业学习更多地发生在创业过程的生产环节。^[3]

周瑾、夏志禹指出,随着农业内部职业分化与劳动就业市场化的深入,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区别于身份农民的职业化群体,进一步分化成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与专业服务型三种类型。以河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摸底调查的 84220 个样本数据为基础,运用多分类 logistic 计量模型,对影响新型职业农民从业选择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为男性、处

于中等年龄阶段、从业年限长、家庭人口多、所处区域农业发展水平较高是新型职业农民选择生产经营型职业的主要影响因素。相比生产经营型:女性、处于青年阶段、文化程度相对偏低、从业年限偏短、家庭人口偏少、所处区域农业发展较为落后的从业者更倾向于选择专业技能型职业;女性、处于青年阶段、文化程度较高、从业年限偏短、家庭人口偏少、所处区域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从业者更倾向于选择专业服务型职业。^[4]

(二)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花永兰指出,雄安新区的设立既促进了雄安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又将改变当地农民的生产方式并改善其生活和居住条件。如何推动新区群众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尽早融入新区生活,最大限度地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和身份适应,需要探索以新区土地制度改革为契机,围绕安居乐业有保障,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政策创制,从而让新区广大农民共享各项改革发展成果,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5]

冯立刚、王琨媛指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一个涉及到城镇、农村各类制度的问题,需要城镇管理者创新工作思路,破解制度藩篱;是一个牵涉到原有市民群体与农业转移人口融合与冲突的问题,促进融合要充分考量两个群体的心理与需求;是一个与身份转换有着密切联系的问题,需要引导个体努力去调适。^[6]

王东阁等学者指出,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当务之急。现有的城乡二元格局形成了左右农民工市民化的张力。农民工市民化可分为从农民工到新市民和从新市民到市民化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受城市经济吸引力农民工从农村迁往城市;第二个阶段因城市的部分排斥力,而使农民工生活困难。张力的弹性使农民工融入城市大体稳定。而面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外界作用力的牵引来保持平衡。为此,政府应注意重构农民工市民化的张力平衡。^[7]

(三)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薛晴等学者指出,能力贫困理论认为贫困的实质是可行能力不足,通过五种工具性自由可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进而破解贫困难题。以此理

论为研究依据,可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现状进行分析,分析可知,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程度较低,职业地位总体不高,创业择业能力匮乏,职业发展延续性较差,职业技能与素养不高,并且职业认同处于两难境地。因此应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反贫困路径,即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设计,培养和提升其职业核心能力,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并深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8]

林永民等学者指出,新时代背景下,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是促进城乡深度融合,推进有质量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住房情况总体上还处于“两难”困境:高房价与低收入使新生代农民工“望楼兴叹”;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保障房体系还需要逐步落实。为破解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困境,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购房压力、消除后顾之忧、使其租有所选,应建立住房“梯级”消费理念、切实推进“租售同权”、实现租赁性住房产业专业化和规模化,将新生代农民工逐步纳入公共租赁性住房保障体系。^[9]

(四)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

娄文龙等学者指出,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到城市后住房保障得不到有效解决,同时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却大量闲置,“人地挂钩”政策的出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以我国天津、重庆和广州三地“人地挂钩”的改革实践为基础,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民工宅基地流转与住房保障衔接中关键要素,并在其基础上对未来的衔接模式做了尝试性探索。^[10]

二、劳动就业问题

(一) 大学生就业创业问题

薛凤蕊等学者以河北省大学生创业大赛现状为出发点,分析河北省高等院校社科经济类获奖作品的优势及特点,探讨大学生参与创业大赛及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改变传统教学方式,让大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锻炼大学生从小问题入手做出大文章,提前分配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培养大学生应变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提出教学实践改革路径。^[11]

杨昕结合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这一时代背

景选定保定学院这一地方本科院校作为研究对象,针对保定学院2014、2015、2016三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开展调研,通过对毕业生就业率、就业流向、行业分布、专业对口状况的分析检验学校转型发展效果。结合调研结果从地方本科院校转型改革角度,提出通过优化专业结构建立改革试点专业,推进校企合作、校校合作发展,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等措施,推进学校转型发展,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12]

邢慧斌等学者指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目前社会各界较为关注的热点之一。结合当前高校创新创业的背景,立足河北省大学生,借鉴和参考国内外成功经验,分析河北省参与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情况,在此基础上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模式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深入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不断提升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为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13]

尹晨曦指出,搭建城乡信息共享平台,是大学生及时获取市场发展动态、提高创业成功率的重要保障。当前很多因素影响了城乡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推广效率。所以,应当充分聚合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多方资源,引导大学生妥善利用城乡信息共享平台以助推自主创业,从而改善创业方式,助推城乡联动发展。^[14]

石国强指出,近年来,各高校相继开设就业指导 and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并出版相关教材,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创新创业教育仍处于不断探索和改革阶段。基于此,王英教授和赵宝新教授等人将创新创业教育同就业指导相融合,编写出版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一书。本书与同类教材相比具有鲜明的特色,是一部集理论性、实用性、时代性、普及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一体化教材。^[15]

孙军、齐连颖从社会学政策分析的视角,通过对廊坊市高校毕业生的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深刻分析京津冀就业政策协同对大学生就业行为、就业能力、就业机会可能产生的影响,进一步优化区域内大学生人力资源配置。^[16]

张凯等学者指出,近些年来,国家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全国地方高校依托校园的区位优势和资源,大多成立校园创

业孵化基地,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便利条件,要想提升在校大学生创业团队创造力和竞争力必须先提高在校大学生创业团队的凝聚力。^[17]

王少英等学者通过对河北省高校在校大学生创新创业现状的问卷调查分析,找出制约大学生创新创业影响的因素及其形成原因,结合问卷的数据分析,从增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认知,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加大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等方面提出建议。^[18]

张万兴等学者指出,高校扩招近二十年,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获得空前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人才培养质量和大学生就业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当前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岗位需求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匹配矛盾日益突出。结合当前经济形势、社会需求和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一般特征,基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视角和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毕业生就业选择科学化等视角,深入分析大学生求职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社会各个层面做好大学生就业指导与服务工作具有深远意义。^[19]

孙静茹指出,随着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的急剧增多,高校就业服务体系能力提升工作无疑已经成为高校就业工作的重点改革方向。但是,高校就业服务体系存在建设时间短、相关工作人员经验少、配套基础较弱等问题,高校就业服务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提升高校链条式就业服务体系耦合效能,是对于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的科学构建。在整个体系中利用多链条的协同效应,可以使高校就业服务呈现出多能化和高效化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20]

任国升、付鸿彦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在理论支撑和总结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学生学业成就、创业能力、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氛围四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相互作用机制的相关假设,通过对问卷调查收集来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最终结论。实验结果表明:学业成就对创业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学业成就和创业能力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创业氛围在学业成就和创业能力的关系中的调解作用暂不成立。从创业者学业成就、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氛围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为有效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拓宽了理论视角。^[21]

肖艳通过对心理资本及其文化差异性的分析,探索在价值观视阈下心理资本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中的作用,帮助创业者形成正确价值观和自我价值感,探讨心理资本的提升途径,传播创业心理正能量,通过形式多样课程和活动使得学生能够掌握创业心理学的基础知识与实践技能,最终提高创业竞争力和成功率。^[22]

景勤娟等学者基于北京、上海、天津、河北198家用人单位的调查数据,研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从就业机会获得与稳定、就业单位特征、工作岗位质量、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4个方面构建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重点探讨了大学毕业生个人能力素质对其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个人能力素质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专业素质、工作能力和基本素养对提高其就业质量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家庭背景、学历层次、毕业院校、担任学生干部对提高就业质量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性别、政治条件、学校老师推荐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据此,从高校的功能定位、大学生的角色以及政府的职能定位三方面提出了提高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政策建议。^[23]

(二) 农村人力资源问题

王莹等学者指出,乡村振兴离不开优质农村人力资源的供给。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在持续转移和流失,农村人力资源的老龄化、空心化严重,现有人员的文化水平无法满足乡村新业态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开发和重新利用。梳理目前国内在农村人力资源培育开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机制体制改革、跟进配套管理以及创新职业教育体系入手,培育新型农业主体,着力构建人才供给的长效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24]

(三)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就业问题

铃青莲,宋彦苍在对河北省当前产业结构及就业结构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剖析第三产业对经济以及容纳劳动力方面的贡献,突出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解决就业问题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以第三产业为着力点提出促进就业的建议。^[25]

三、城乡统筹发展问题

张波指出,近年来,京津冀区域合作进一步

深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空间布局有待于进一步优化。优化京津冀地区城乡关系,需构建多中心城市网络,加大跨域城乡统筹发展力度。^[26]

张翼、崔佳慧阐述了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我国乡村文化发展呈现的三大特点:现代因素的增多与民间传统文化的失传并存,历史连续性与文化断层并存,政治主导性与文化自觉精神缺失并存。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协调发展,乡村发展与文化传承同步,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27]

郭岩峰、张春艳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涉及多方面因素的系统工程,在生态文明指导下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以生态文明视角审视河北省城镇化的理念、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从深化改革、转变发展理念、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对策,从而不断推进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28]

朱峰、单耀军指出,长期以来,GDP至上的城市发展观,过度关注城市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却忽略了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同步提升,产生了严重的“城市病”,要素禀赋被错配,价值观念被扭曲,导致作为新市民的青年的需求被忽略或边缘化,城市与青年的关系产生了严重异化。“城市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及政策的发展演进正在重塑青年发展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理论认知和实践逻辑。一方面,作为承载金凤凰的梧桐树,产业的聚集和升级有助于通过高收入示范、优质公共服务、宽容社会环境形成对青年的吸引、凝聚和吸纳;另一方面,青年是城市未来发展的战略性力量,青年的聚集在合意的政策条件下,通过知识溢出效应贡献于产业升级,进而形塑起城市发展的战略优势。以一线城市青年政策改良和新一线城市青年人才新政为标志,我国城市发展逐渐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回归,住房援助、户籍制度、收入保护、就业创业、政务效能、基础设施、城市环境等公共服务不断改进,为青年更好成长、更快发展提供普惠性青年福利的新政措施不断升级,“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对城市更有力”的新型城青关系使得我国城市发展

正迈进一个新时代。^[29]

杨梅、刘嘉茵指出,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过渡型社区教育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起步较晚,发展不完善,过渡型社区教育在发展中还存在很多问题。立足于城镇化视域,诠释了城镇化视域下的过渡型社区教育的职能,详细分析了城镇化视域下的过渡型社区教育实施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城镇化视域下的过渡型社区教育模式的构建对策,以期推动过渡型社区教育模式的构建。^[30]

吴明君、张零星指出,只有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才能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推动以城镇化为主的“四化”协调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乡镇政府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进一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才能加快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31]

张春玲、刘秋玲指出,县域是连接农村和城市的纽带,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与着力点,实现县域新型城镇化在合理利用空间与资源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生的经济形态,在促进农村的电子商务发展、推动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缩小城乡间差距、合理规划空间、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有利于实现县域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32]

四、社会保障问题

(一) 养老问题

1. 养老理念问题

李红英等学者指出,“孝为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它不仅教育子代要知恩图报、回馈善行,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但现实一直存在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困境,随着时代变迁,这种矛盾更加凸显。反思社会“养小不养老”的选择或为无奈之选择,其成因包括:医疗技术发展加剧养老能力与养老成本的矛盾,老年人寿命延长和子女赡养能力局限的矛盾,中国30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子代赡养能力自然削弱,城市发展导致人口迁移并挑战家庭养老,家庭结构不稳定影响养老,社会养老的准备不足等。为保障代际公平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

量,倡导科学养老观,要尊重老年人自主权,完善和促进生前预嘱、安宁疗护等基本需求的评估和监管工作,通过开展相应研究,创建科学养老的系统工程,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33]

程艳彬指出,随着京津冀协同养老战略的推进,京津老年人跨区域赴冀养老现象日渐增多,基于跨区域养老的独特性,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重点从环境、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和心理四个方面分析了京津老年人入住河北协同养老机构的社会适应状况,并从个人和社会层面分析影响其赴冀养老适应的主要因素,旨在为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提供参考。^[34]

2. 城市养老问题

谷彦芳等学者指出,自2014年10月1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统一实行统账结合模式。原有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模式转为部分积累模式将产生较大的并轨成本,急需妥善解决。并轨成本虽然可以通过制度自身调整和社会力量支持予以解决,但是政府仍需承担主要责任和兜底责任,为了解决并轨成本,规避财政运行风险,提出了将养老制度并轨成本纳入中期规划予以消解的思路。^[35]

孙伊凡、陈丽莎指出,在人类的进化史上,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由来已久。当人们随着年龄增长,劳动能力下降,无力再继续从事劳动而不得不休息的时候,就进入了所谓的养老阶段。考察人类养老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养老方式产生了相应的改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主要的养老方式内涵和特征进行分析。^[36]

杜少英指出,“医养结合”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社会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新举措。目前“医养结合”在执行上存在体制、资本投入、效应上诸多不足,需要政府依据时代特征制定“医养结合”规划、鼓励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利用科技平台整合“医养结合”资源,加强人才培养培训,从而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促使“医养结合”养老新模式良性发展。^[37]

刘迪指出,随着中国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经济水平的提城市养老方式向农村不断延伸,新

型养老方式不断受到农村居民的关注,农村养老方式的选择受多重因素的影响,通过调查河北省某农村养老方式发展现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总结河北省农村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相关建议。^[38]

孙伊凡等学者指出,异地养老正在成为一种时尚的养老方式,这对社会养老服务业带来了许多机会和挑战。作者分别考察了候鸟型和长居型两种异地养老模式的特征,分析了它们对老年人流出地和流入地的不同要求与影响,进而阐述了进一步促进异地养老及其服务业发展的几个因素。^[39]

杜少英等学者指出,医养一体化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作为互联网技术与居家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相结合的产物,平台对老年人生活质量产生影响,结果显示医养一体化居家养老服务平台是可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40]

胡耀岭指出,养老金收支缺口将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面临的重大问题。通过分析城镇职工养老金收支动态平衡运行机理,建立养老金收入支出数学模型,并选取和调整养老保险各项参量指标取值,测算城镇职工养老基金收入、支出及其差额变动情况。实证结果表明:单独调整某一参量无法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只有对多个参量进行综合性调整,有效提高养老基金投资收益,才能使养老金收入支出达到动态平衡。相应的实现路径是: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有效增强养老基金“造血”功能,在国有资本一次性划转充实养老保险基金基础上,提高养老基金投资收益率,确保养老基金保值增值。^[41]

王小春、孔金平指出,保障性住房社区居民购买社会养老服务能力弱,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规划设计应注重养老服务功能完善。京津冀地区保障性住房养老服务建设大多严重滞后,供需差距较大。社区居民养老服务需求主要包括医疗保健、休闲娱乐、紧急服务、老年餐桌、失能/半失能老人住院护理、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服务。保障性住房养老服务建设应遵循分阶段建设、潜伏设计、优化共享、适度变通的建设理念;逐步改变大规模集中成片建设,采取灵活配建的建设方式;综合采纳养老服务设施、无障碍设施以及老年住宅等建设标准。根据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优化因地制宜建设养老服务设施、机

构及场地,大力拓展建设资金来源,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人员供给的多渠道多元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42]

刘存、董斌为了研究中日社区居家养老设施差异性,为我国社区居家养老设施的发展提供借鉴。通过比较研究中日两国在社区居家养老设施的发展历程、服务理念和功能应用,总结日本先进养老经验,提出符合我国社区居家养老设施发展的构想。结论是日本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设计相对完备,而我国社区居家养老设施在设计理念、无障碍设计等方面存在不足。借鉴日本先进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居家养老设施设计体系,有着重要意义。^[43]

韩伟等学者指出,2005年我国启动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但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实现规范调整。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为前提,综合考虑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计划覆盖人口的复杂性以及不同年龄阶段消费需求的差异性,运用回归估计方法确定养老金调整指数,由此设计多层次养老金调整方案,并基于2016年物价和实际工资增长情况,以河北省为例测算多层次方案下养老金合理调整幅度,由此得出河北省2016年实际调整幅度过大,给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带来压力的结论。^[44]

许秀文指出,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呈现出“碎片化”的格局,城乡二元分割、多轨制并行的现象较为突出,养老保障的可持续性较低,这将对社会结构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应重视解决养老保障中的“碎片化”问题,完善顶层设计,明确各级政府及社会部门应承担的责任,加强对社会养老的财政支持,推动社会养老保障走向“整合化”。^[45]

3. 农村养老问题

胥英明等学者指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一大助力,政策执行的审计指标体系更是养老保险政策的免疫系统。为了更好地检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审计情况的有效性,通过梳理相关基础理论,并建立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围绕政策执行为核心,构建了包括效率性政策、社会性政策、经济性政策和基金管理政策四大模块,政策执行、政策效果和政策预测共计34项指标的指标体系。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

行的审计指标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做出了有效建议。^[46]

仝广顺等学者指出,农村空巢老人作为城镇化进程的客观产物,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政府职能发挥不到位以及社会力量的不充足,使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变得愈加严峻。如何为农村空巢老人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机制,不断提高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水平以及精神的满足感,对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有着重要意义。^[47]

张岭泉,陈熹指出,农村空巢老人是老年人群体中的特殊群体,7有着比城市空巢老人和农村老年人更为特殊的困境。调研发现,农村空巢老人的问题是综合的、系统的,在家庭养老逐渐削弱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激发社区的居家养老功能,是应对和缓解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的关键所在。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构建“一二三四”农村空巢老人专业服务模式,通过一个中心、两个专业、三方合作、四社联动,可以为解决农村空巢老人面临的生活照料问题、精神慰藉问题、护理和康复问题提供有力支持。^[48]

4. 养老产业问题

仝广顺等指出,老龄化不断加剧给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庞大的市场规模、养老文化的转变、国家政策的鼓励、智慧养老的试点探索等,应通过转变传统观念、加强政策引导、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发展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养老产业健康发展。^[49]

胡耀岭、张苗苗指出,在快速老龄化背景下,慢性病并发症使得残障失能老人数量快速增加,而从事长期照护养老服务的专业人员十分短缺,老年人长期照护问题亦将愈加突出。运用年龄别残障率测算未来老年人口规模结构,并通过年龄别残障率测算未来失能老年人口变动状况,进而得到全国未来长期照护养老服务需求量。测算结果表明:2016—2050年,中国失能老年人口将从652.02万人增至1643.43万人,年均增加29.16万人;如果采取专业机构进行长期照护,2050年所需长期照护养老服务人员150万人;在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过程中,大幅增加养老服务人员配置量将给未来劳动力供给带来严峻挑战,并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增长。针对长期照护养老服务供需失衡问题,有必要采取如下4个方面措施:一是坚持长期照护服务社会化,体现长

期照护服务规模效应；二是提高服务人员素质，有效提升长期照护服务效率；三是鼓励低龄老人从事长期照护服务，有效开拓养老服务渠道；四是加强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建设，从根本上减少长期照护服务需求，实现长期照护服务资源供需动态平衡。^[50]

宋凤轩、王坤指出，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属于商业养老保险，对于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系，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发展必要性、主要障碍和可行性等方面展开研究，为我国设计和实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提供政策建议。^[51]

郑新等学者指出，老年教育是精神文化养老服务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老年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相应地存在消费的“拥挤点”。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环境下，老年教育需求快速膨胀，政府承办的老年大学供给与需求缺口越来越大。因此，探索老年教育的有效供给途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老年教育存在资源供给有限、分配不均、课程体系设置不完善，以及教育人才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而老年教育供给主体单一，经费投入不足，对老年教育认知错位是造成老年教育供给困境的主要原因。因此，创新供给模式，加大资金投入和资源整合，以及提升老年教育质量是有效解决老年教育困境的对策。^[52]

（二）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问题

马军红、蒋晓婧指出，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身、自然和社会等条件的影响，创造财富能力较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较差，无法实现其基本社会生活权利，需要获得国家帮助和社会支持以实现其基本权利的群体。精准扶贫视角下健全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体系，扭转弱势群体问题难以解决的局面，对弱势群体进行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有力支持和保障，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现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53]

五、和谐社会构建问题

班秀萍等学者指出，现代生产运作管理科学中的TQC理论是一种全新和科学的质量管理体

系。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工作应借鉴TQC理论，以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论为指导，实现TQC理论和网络舆情引导及监控预警机制管理的有机结合。在网络舆情管理上强调系统性思想，把网络舆情管理工作视为动态和可控的有机整体，对网络舆情予以全方位、全员性和全过程的有效管理与控制。建立全新的网络舆情监控预警机制，并将其纳入综合质量管理评价体系，为网络舆情态势的感知防范和研判处置营造绿色生态环境。^[54]

左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新论断，对历史发展有全局性的影响。从文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维度，全面考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及主要方面的内涵、提出依据和实践要求，进一步深入探讨了新论断的科学性。^[55]

孙琳琼指出，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都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主。党的十九大重新定义了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我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正确认识、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把握矛盾的变与不变，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实现小康都至为紧要。其中，除了要系统解决利益分化问题，准确把握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外，还应融合主要矛盾与中心任务，坚持经济体制创新，并妥善解决分配不公等问题。^[56]

刘明霞、韩广义指出，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治理过程中，应经济、物质和文明一起抓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河北省新农村建设中仍然存在农业资源偏紧，农村建设资金不足以及文化特色不浓等问题，建议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强文化人才的培养，强化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能力，加强农民的参与度与热情，这样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会最大限度的消除各种不和谐的声音，社会才能更稳定发展，整个国家才会更充满活力。^[57]

六、人口问题

（一）老龄化问题

王丽民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老龄化的经

济学研究逐渐成为热点。通过梳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及应对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对其中的共识、争论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思考。^[58]

井坤娟等学者采用质性与量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质性研究的扎根理论构建居家老年人服务需求理论框架,在此框架基础上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对保定市城区居家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服务需求状况采用构成比描述性分析;服务需求4个维度之间进行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以服务需求情况为因变量,一般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影响因素。结果居家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主要集中在医疗护理康复、心理慰藉、生活照料及家政服务等4个方面,其中医疗护理康复服务需求最为强烈($P < 0.05$),服务需求与年龄、婚姻状况及患病情况呈正相关($P < 0.05$),与文化程度、居住状况及自理能力呈负相关($P < 0.05$)。结论居家老年人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应以社区为平台,通过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满足居家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服务需求。^[59]

杜航指出,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市场存在着长期性、短期性、正面性与负面性的多方面影响。正面影响是延长人力资本回收期,增加适龄劳动人口;负面影响是阻碍就业进程,不利于供给市场的良性发展;长期影响在于缓解劳动力不足;短期影响在于弱化老年劳动者地位。因此,需要从弹性角度、权利保障角度与统筹兼顾角度,推动延迟退休政策发展,促进我国劳动力供给市场的可持续发展。^[60]

(二) 留守儿童问题

陈静等学者指出,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亲子关系呈现断链或缺位状态,隔代抚养使乡村家庭遭遇育儿和养老双重压力。以H省D村家庭育儿观念变迁和代际合作实践为例,根据祖辈参与儿童抚育的程度和方式,把隔代抚养模式分为祖辈较少参与型、适当参与型、较多参与型和完全托付型。在祖辈较多参与型和完全托付型模式中,祖辈的生活质量受到较大影响,不利于儿童发展。政府和社会应及时提供社会保护和支持,形塑断链后的再链接机制,破解隔代抚养儿童社会化障碍,增强乡村家庭自我保障和抵御风险能力,为儿童成长营造健

康的心理和社会环境。^[61]

侯春平指出,保护留守儿童不受犯罪行为的侵害或在被侵害后有良好的救济途径,不仅关系到留守儿童的成长,也关系到其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和谐。由于大多数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的照顾与陪护,既容易成为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犯罪行为的实施者。^[62]

高静华、刘晓静指出,在我国现代农村,产生“失母留守儿童”的家庭因素包括婚姻脆弱加剧家庭解体,经济困难诱发母亲出走,亲情淡薄致使母爱缺失;社会结构因素包括女性成为理性主体婚姻自主性增强,社会流动导致婚姻模式复杂多变,社会关系网络扩大使可替代资源增加。失母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堪忧:监护人大多是祖父母,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居住环境恶劣,父亲在家不能明显改善其生存状况;绝大部分在3岁之前失母,对母亲普遍存在爱恨交织的思念;多因贫困不能接受高中教育,影响未来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保护失母留守儿童,应转变政策理念,从问责政府转为强化家庭责任;改变工作机制,从事后补救转为农村综合治理;发展儿童福利,从救济儿童转为支持家庭。^[63]

(闫坤:中共河北省党校教授)

参考文献:

- [1] 吕雅辉,张润清,张亮,赵帮宏.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阳晨模式”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8(11).
- [2] 薛晴,陈会谦.农民阶层分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两面性及其应对[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18(9).
- [3] 张敬伟,裴雪婷.中国农民创业者的创业学习行为探析[J].科学学研究,2018(11).
- [4] 周瑾,夏志禹.影响新型职业农民从业选择的微观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7).
- [5] 花永兰.雄安新区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8(2).
- [6] 冯立刚,王琨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问题及解决思路[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8(9).
- [7] 王东阁,赵宝柱,李座.农民工市民化的张力分析及其平衡重构[J].职教通讯,2018(3).
- [8] 薛晴,陈会谦,苏庆国.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反贫困路径[J].北华大学学报,2018(9).
- [9] 林永民,赵金江,史孟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住房解困路径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9(2).
- [10] 娄文龙,周海欣,张娟.“人地挂钩”视角下农民工宅基地流转与住房保障的衔接模式研究[J].农业经济,2018(5).

- [11] 薛凤蕊,耿丽敏,闫飞龙,刘伟.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与教学改革研究——基于2017年“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实践分析[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2018(4).
- [12] 杨昕.转型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以保定学院为例[J].保定学院学报,2018(4).
- [13] 邢慧斌,董含星,李亚林.河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研究[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8(9).
- [14] 尹晨曦.为大学生创业搭建城乡信息共享平台[J].人民论坛,2018(6).
- [15] 石国强.创新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一体化教材——简评《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就业指导》[J].学周刊,2018(9).
- [16] 孙军,齐连颖.京津冀就业政策协同对廊坊市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8(12).
- [17] 张凯,田雪丰,赵玉梅.高校大学生创业团队凝聚力影响因素[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8(2).
- [18] 王少英,王松伟,石立叶,刘灵会.河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现状及对策研究[J].经济师,2018(12).
- [19] 张万兴,刘倩,郭晓梅.当前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问题探究[J].智库时代,2018(11).
- [20] 孙静茹.提升高校链条式就业服务体系耦合效能的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8(3).
- [21] 任国升,付鸿彦.大学生学业成就对创业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2017(7).
- [22] 肖艳.价值观视阈下大学生创业心理资本提升研究[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8(3).
- [23] 景勤娟,姚建树,李丽洁.个人能力素质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来自198家用人单位的调查[J].劳动保障世界,2018(7).
- [24] 王莹,张连春,秦树文.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及对策研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8(9).
- [25] 铃青莲,宋彦苍.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促进就业的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18(8).
- [26] 张波.有效弥合京津冀城乡区域发展差距[N].经济日报,2018-9-13.
- [27] 张翼,崔佳慧.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发展的特点及对策[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18(12).
- [28] 郭岩峰,张春艳.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3).
- [29] 朱峰,单耀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市化与新时代青年发展[J].青年发展论坛,2018(7).
- [30] 杨梅,刘嘉茵.城镇化视域下的过渡型社区教育模式建构策略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8(3).
- [31] 吴明君,张霖星.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服务型乡镇政府职能转变[J].邢台学院学报,2018(3).
- [32] 张春玲,刘秋玲.“互联网+”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8).
- [33] 李红英,蒋辉,陈旻,李振良.“养小不养老”与“孝为先”的意识冲突[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8(7).
- [34] 程艳彬.京津老年人赴冀养老社会适应研究——以YJ协同养老示范基地为例[J].社会福利,2018(2).
- [35] 谷彦芳,冉晓醒.中期财政规划视角下养老金并轨成本消解问题探讨[J].经济研究参考,2018(4).
- [36] 孙伊凡,陈丽莎.养老方式的多元化演变及其特征[J].劳动保障世界,2018(11).
- [37] 杜少英.“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障碍及破解[J].人民论坛,2018(11).
- [38] 刘迪.河北省农村养老方式选择影响因素及多元化建议[J].现代经济信息,2018(11).
- [39] 孙伊凡,谭长海,孙宇娜.异地养老及其服务业发展述评[J].经济研究参考,2018(8).
- [40] 杜少英,冯智敏,周艺.“互联网+”条件下城市医养一体化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创新研究[J].现代营销,2018(4).
- [41] 胡耀岭.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收支动态平衡及其实现路径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2018(6).
- [42] 王小春,孔金平.供需视角下保障性住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7).
- [43] 刘存,董斌.中日社区居家养老设施设计比较研究[J].包装工程,2018(1).
- [44] 韩伟,王会敏,郑新.城镇职工统筹养老金规范调整方案设计[J].统计与决策,2018(11).
- [45] 许秀文.社会养老保障何以走向“整合化”[J].人民论坛,2018(4).
- [46] 胥英明,金淑娟,王梦源.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的审计指标体系构建[J].当代经济,2018(6).
- [47] 全广顺,杨竹晴,宋凤轩.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探讨[J].经济研究参考,2018(4).
- [48] 张岭泉,陈熹.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空巢老人养老的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2017(11).
- [49] 全广顺,纪慧,尹俊榕.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促进养老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18(8).
- [50] 胡耀岭,张苗苗.中国长期照护养老服务供需平衡研究[J].长安大学学报,2018(5).
- [51] 宋凤轩,王坤.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发展策略[J].经济研究参考,2018(4).
- [52] 郑新,韩伟,于维洋.精神文化养老服务产业:老年教育供给困境及对策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7).
- [53] 马军红,蒋晓婧.精准扶贫视角下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策略分析[J].邢台学院学报,2018(6).
- [54] 班秀萍,朱晓勃,张扬,闫素霞,郭晓伟.浅谈新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的创新[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8(12).
- [55] 左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及主要方面探析[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6). 左华,冀荣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提出依据及实践要求[J].山东社

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4).

- [56]孙琳琼.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耦合[J].河南社会科学,2018(2).
- [57]刘明霞,韩广义.新农村建设中基层社会治理稳定机制建设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18(6).
- [58]王丽民.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及应对研究综述[J].现代管理科学,2018(6).王丽民.老龄化的全球解决方案与国家利益的非中性[J].湖北社会科学,2018(3).
- [59]井坤娟,高欣茹,杜小静,高晗晗,张逸凡,卢文策,王慧萍,石萧阳,杨兰兰,杨艳玲.河北省保定市居家老年人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
- [60]杜航.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市场的

影响[J].改革与战略,2018(1).

- [61]陈静,白琳琳,栾文敬.“断链后的再链接”:儿童社会保护视域下的乡村家庭隔代抚养模式研究[J].北京青年研究,2018(1).陈静.入乡随俗的“社会补偿”:社区营造与留守儿童社会保护网络构建[J].兰州学刊,2018(5).
- [62]侯春平.留守儿童的法律保护对策[J].人民教育,2018(4).
- [63]高静华,刘晓静.农村失母留守儿童:形成原因及生存现状——以N省H乡为例[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4).

政 治 学

政治学研究

李 娜

2018年,政治学研究主要分布在政治学理论、国家与社会治理、政府治理、乡村治理、廉政建设、西柏坡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际形势、网络政治等方面。与往年相比,政治学理论仍是最为集中的论域;廉政建设研究成果明显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政治学理论

戴木茅在书中指出,以公意为指导的主权者的建立却形成了众意和公意的对立,众意能否“上升”为公意、公意又该如何得到,这成为社会契约能否形成的关键。将从阐释公意、众意的内涵入手,在分析两者不同的价值基础后,指出投票作为手段在众意到公意形成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几个困境,最后通过引入审议民主和双向投票尝试性提出弥补方案。^[1]

他认为,《韩非子》蕴含着中国古代典型的治理逻辑,君主以治人而非治事为核心。为了帮助君主去蔽求真、获得关于人的政治真实,韩非设计了操控性从弱到强的知人之术,在以无求真、以有求真、以真求真、以假求真四种方法中,既有值得今日借鉴的无为而治、广开言路,也有至今仍有影响、值得警惕的君主诈伪。君主

逐渐加强的政治操控导致臣属心理和行为发生扭曲,他们由规则依附转向人身依附,不再以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是以迎合君主为己任,这在今日制度建设中要予以抛弃。韩非的知人之术本欲维护政治秩序,却在强力控制中走向反面。^[2]

胥仕元在书中讲述的是先秦儒道墨理想社会思想,是中国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最初探索。孔子提出“天下有道”,孟子主张“王道”,荀子提出“王制”社会,形成了儒家理想社会思想的基本内容。老子主张“小国寡民”,庄子提出“至德之世”,体现了道家理想社会思想的基本内涵。墨子主张“兼爱社会”,代表了平民的理想社会主张。诸子各家的主张,反映了对人类社会现状的认识以及未来命运的思考,当今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3]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治哲学古已有之。由于时间、地域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中西古今政治哲学之间都存在不小的差异。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而言,悠久的文化传统、复杂的社会结构、独特的生存方式以及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其对道德伦理的关注、天道性命的建构、百姓民生的关怀等区别于其他不同民族文化的政治哲学特质。敦鹏提出,不仅如此,对现实政治

存在的辩护、批判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都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自产生之日起,便在古代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广泛的作用和影响。尽管古代哲学家的许多具体政治主张大多成为思想的陈迹,但作为人类精神遗产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仍包涵着值得珍视的思想资源。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而言,认真地对待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准确地理解它所蕴涵的现代价值,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4]

敦鹏认为,二程礼学思想继承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理念,主张将礼的原则精神和制度规范运用到政治领域,实现礼在改造现实社会秩序时的政治功用。同时,二程虽然注重礼治教化,又高度重视刑罚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避免社会动荡和危机时发挥的强制性作用。在二程的政治哲学中,一方面提出了“礼治本于人性”的哲理化主张,从人的天性入手解决礼治的内在基础问题,进而逐步使“礼”由一种外在的仪式性升华为本己的、内在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将礼与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教化为本,刑政为辅的主次关系。由此,二程的政治哲学在实践层面完成了礼与法的动态结合,在国家政治运作过程中时时处处彰显着德法之间的体用关系,成为后来影响中国政治思想的重要源流。^[5]

祁刚利、魏先法提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质和优良禀赋。中华民族依靠奋斗精神在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开发和建设了祖国辽阔秀丽的大好河山,开拓了波涛万顷的辽阔海疆,开垦了物产丰富的广袤粮田,治理了桀骜不驯的千百条大江大河,战胜了数不清的自然灾害……中华文明久经风雨,持续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实践充分表明,我国社会的发展、国力的强盛,就源自于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不懈奋斗和锐意进取。^[6]

祁刚利指出,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蕴含着我们党的信仰、宗旨和追求,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思想路线、群众观点和纪律作风,是我们攻坚克难、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强大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把红色基因传承。^[7]

刘丽提出,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引用李大钊“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名言,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严谨的求真态度,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党的十九大描绘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美好蓝图,把这个蓝图变为现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8]

《家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家训著作,堪称齐家通鉴。《四库全书》评价这部书“节目备具,切于日用,简而不烦,实足为儒者治行之要”。丁万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摆脱贫困》一书中曾说:“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于物淡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封建官吏尚能如此,我们无产阶级的干部何言不能!”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这几句话分别出自苏轼为司马光撰写的《司马温公行状》和《宋史司马光传》。^[9]

丁万明认为,残暴、专断是人们通常对秦始皇的印象。这体现的只是秦始皇的一个方面,也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就其个性和治政风格而言,秦始皇的过人之处或者说成功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自制而杀伐决断,自奋而知错能改,自戾而知人善任,自律而勤于政事,自负而雄才大略。^[10]

徐振增、杨福忠、牛余庆在书中,系统深入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进行了理论解读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之于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该书从党建、党史和法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角度,解读廉政建设的历史资源、国际经验及其现代意义与启示,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由社会主义初期的“初步探索”到当前进入新时代“系统深入推进”的历史进程,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廉政文化的源头、基础、内涵特征以及体系与经验等。^[11]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满怀信心地指出:“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

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与我们耳熟能详的“四个伟大”“四个自信”“四个意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孙英臣提出，准确地分析和把握其内在逻辑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四个伟大”书写时代新篇章，为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贡献自己的力量。^[12]

孙英臣、傅建芬指出，伟大时代需要思想指引、核心领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主线和灵魂，是指引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理论灯塔，也是新时代河北改革发展的科学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强调“我对燕赵大地充满深情。不只因为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更是因为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六次视察河北，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新时代推进河北发展强起来，必须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全省大局，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想和对河北的重要指示作为根本遵循，在实干奋进中向人民交出优异答卷。^[13]

申文杰认为，有效的载体和方式是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表明，只有不断创新载体和方式，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从实际看，创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和方式。^[14]

他认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阐述了丰富的意识形态理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并论述了其重要作用；深刻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冲击及存在的问题；多方面论述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式。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所阐述的意识形态理论能够让我们清醒认识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高度警觉西方大国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坚决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处理好社会热点问题，维护政治稳定。^[15]

后现代主义者关注实践中人的生存状态，并对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剥削方式作了深入探讨和批判。李素霞通过研究福柯的政治哲学发现，其否定传统的权力观代之以全新阐

释将确定的斗争主体虚无化；放弃统一的阶级领导强调微观权力的多元化导致反抗力量的弱化；放弃暴力革命转而推崇伦理的生存美学使得人的自由解放成为空想。激烈、决绝的批判并不能遮盖后现代思想家的资产阶级立场，所有这一切都充分揭示了其仅仅幻想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有限改革，并没有也不打算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因此，后现代政治最终的结局是走向虚无。^[1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体是指什么样的时代呢？陈志环认为，新时代的“新”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现了新的发展阶段特征，迈上了新的历史征程；在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需要我们凝心聚力解决新矛盾；在于明确了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还在于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这就需要我们新的历史方位把握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从时代主题的角度看，新时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全力奋斗的时代，具体包括国家、民族、人民三个层面。从国家层面来讲，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而分两步走，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从民族层面来讲，新时代是奋力展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扩大中华民族文化自豪感的时代。从人民层面来讲，新时代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期待，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17]

陈步伟提出，回顾党的历史，我们会忆起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但更应缅怀他们的精神和风范。中国共产党人的问题意识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灵魂的金字塔、一尊不朽的丰碑。谈及其马克思主义传统，必然少不了马克思和列宁的问题意识，一个对时代状况进行实践批判，醉心于抽象思辨，为社会主义事业创造了理论基础；一个运用矛盾辩证法处理现实问题，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正是一代又一代怀揣着敏锐的问题意识的共产党人引领着时代的发展进步。^[18]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李芬指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要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坚定人民立场。^[19]

赵亦彭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墨子对政治与人的关系，有着非常精辟的见解。这一思想在他身故千余年后，被司马光准确而全面地继承下来，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资政类通史读本《资治通鉴》的核心思想。^[20]

二、国家与社会治理

(一)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是一个“结构十分明确的信息资本”。柳云认为，国家形象与政府行为、社会景象、国民素质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国际政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多极化的国际政治格局，要求中国应当基于提高政治法治认同而塑造法治政府形象，基于缓和国际政治矛盾而加快塑造和谐社会形象，基于多元国际交流、促进国际政治合作而塑造良好国民形象，进而构建良好的国际形象，参与新的国际竞争与合作。^[21]

王建华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区域一体化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境外产业园区是落实这一倡议的重要构件。受到顶层设计缺失、发展定位模糊、园区布局失衡等因素影响，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存在偏离“一带一路”倡议的倾向。应以顶层设计明确发展方向，战略对接夯实发展基础，依托经济走廊优化园区布局，围绕关键区域明确发展重点，借助合作机制拓展发展空间。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境外产业园区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撑。随着境外产业园区沿线布局的扩展，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会不断加速，区域经济增长极会快速形成，“一带一路”经济区会趋于成熟，最终将实现中国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格局。^[22]

金浩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离不开区域治理的顶层设计。将CAS理论与区域治

理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京津冀区域治理系统，分析了系统的多样性、聚集性、流和非线性等CAS特性，并结合“B-Z”反应方程建立了系统演化模型，探讨了系统的演化规律和协调机制等问题。在京津冀区域治理系统的演化发展中，系统协调机制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亟须构建京津冀区域治理体系与数字化治理共享平台，并协调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等适应性主体间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京津冀区域善治，促进区域协同发展。^[23]

王颖提出，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特殊性，空气污染、水污染严重，是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生态环境治理经验，并结合京津冀地区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环境治理对策。京津冀地区可以发展协作机制，从健全制度、建立补偿机制和公众参与监督等方面共同治理生态问题，这样必将对京津冀一体化迅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24]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范拥军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民生社会建设，是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深入研究民生社会的历史演变、基本内涵、基本特质和基本要求，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治理能力。^[25]

(二) 地方管理创新

张根海指出，河北雄安新区建设，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提出的一项重要区域发展规划，不仅能够加速河北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能够有效提升京津冀一体化的合作程度。这对于新时期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无疑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雄安新区在建设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给予了高度重视，通过召开会议、电视电话、现场指导、发表讲话等多种形式，进行了亲切的关心和有力地支持，使雄安新区建设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循序渐进的规模化发展。这显示出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视，对雄安新区的未来跨越式发展，寄予了厚望。雄安新区，必将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和牵挂下，在河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关注中，获得又好又快的发展。^[26]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集科学性和思想性为一体,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对中国社会发展做出合理规划的伟大理念,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张根海指出,河北省作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省份,不仅在华北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而且也是发挥非首都功能的地缘要地,对于未来华北地区乃至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如雄安新区建设、2020年北京和张家口联合举办的冬奥会等,都与河北省直接相关。可见,河北省在中国未来的地位日益上升,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河北,始终关心和支持河北省的建设与发展,并对河北未来工作和战略决策部署做出重要指示,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河北,情系人民,力争把河北省的未来,建设得越来越美好。^[27]

三、政府治理

吴杰华指出,公民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参与依托并推动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的不断发展完善,我们应该在明确参与式绩效评估的原则、标准、程序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确立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明确定位、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多元、复合的评价机制,不断完善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化回应机制,从而实现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困境超越。^[28]

住房市场化后,买房难、买房贵的情况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我国广大居民的住房福利。住房市场的一举一动也成为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央政府从2004年以来就开始对住房市场展开了数轮调控,但是这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房价在调控中依旧一路上涨。娄文龙在书中提出,在经历了数轮住房市场的宏观调控后,学术界普遍将目光瞄准了地方政府在住房市场中的行为。特别是住房市场作为区域性的市场,地方政府的行为对住房市场的治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地方政府在住房市场中的行为理念及其方式,解释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根源及行为逻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住房市场所存在问题的原因,以及为如何制定住房市场的治理政策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和政策建议。立足于整体性治理的角度,从公共政策的过程来探讨

地方政府如何对住房市场的治理,研究地方政府治理行为的特征与方式。^[29]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我国2018年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重要改革内容,PPP的规范发展可以吸引社会资金降低政府债务,但是不规范的运营则会形成大规模的隐性地方政府债务。白德全基于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PPP模式提出,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在社会融资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跨期调度机制的作用下,PPP能够在短期内通过多种渠道缓解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在中期内通过约束地方政府的非理性行为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并在长期内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在成本收益机制、债务隐藏机制和目标分化机制的作用下,PPP有可能在短期内诱发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在中期内诱发连锁的隐藏债务风险,并在长期内诱发系统的金融经济风险。为了限制PPP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PPP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作用,应该从完善PPP的配套制度建设、加强对PPP运行的监督和管理、培养参与主体的市场契约精神、制定社会资本的进入退出机制等四个方面采取相应对策。^[30]

四、乡村治理

彭建强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质量。^[31]

强有力的基层政府执行力不仅是有效贯彻落实新农村建设各项政策方针的重要保障,也是改变基层政府低效率日常工作局面以及增强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有效途径和必然要求。然而,长期以来基层政府执行力不足的现象却普遍存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也表现出了消极执行、简化执行、机械执行、歪曲执行和行政不作为等一系列执行力问题。因而,当前基层政府执行力的水平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基于此,韩艳丽以执行行为分析为切入点,对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政府执行力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审

视和剖析,指出执行主体、行政体制、执行制度、执行机制、执行资源和执行环境等因素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是导致基层政府执行力低下、执行方向偏离的重要原因。^[32]

五、廉政建设

(一) 廉政建设问题

李聚山、孙英臣指出,着重培养各级干部的互联网思维和素养,解决学网、懂网、用网、管网方面的“本领恐慌”问题,提升通过网络联系群众、解读政策、研判舆情、解疑释惑、回应引导的能力,既是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重要理论指导,又是针对性强、实用性强的“操作宝典”。^[33]

制度虚置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制度失灵现象,运动式管理的大行其道是造成常态化管理中制度虚置的重要原因。梁瑞英认为,对运动式管理的过度依赖会弱化制度的公平正义,很容易使组织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领导者要在管理运动中形成多元的常态化管理体系,修订完善各项规章制度,重视日常管理中的制度落实和监督,切实治理制度虚置顽疾。^[34]

牛余庆、柳建辉在书中,解读廉政建设的历史资源、国际经验及其现代意义与启示,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由社会主义初期的“初步探索”到当前进入新时代“系统深入推进”的历史进程,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廉政文化的源头、基础、内涵特征以及体系与经验等。该书还全面解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组织制度、行为制度、监督制度、惩戒制度等制度体系,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基本特点,对其未来进行了展望。^[35]

杨东广指出,“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党的领导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作用,以三个“永远”指引中国共产党人更好担当起自己的历史使命。铿锵话语,谆谆之言,彰显大国领袖的高瞻远瞩,照见共产党人的赤诚初心。^[36]

杨东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港珠澳大桥开

通仪式后会见大桥管理和施工等方面的代表时强调,这是一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大桥建成通车,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37]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张勇指出,伟大团结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38]

他认为,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渗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蕴含着炽热的人民情怀,对于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的群众工作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坚持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政策策略与群众实际相结合,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既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又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既统筹兼顾又善抓群众中心工作。^[39]

1940年代,华北抗战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局面。刘建军指出,与此相对照,浪费现象在华北各根据地普遍存在着。为根除这一现象,中共采取了多种措施。这些措施的推行,在当时对肃清浪费现象、倡导节约之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今政府反对浪费、倡导勤俭也有重要启示。^[40]

魏先法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如何锻造党的领导力量,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高度,并把“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作为“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条件,给我们在新时代锻造党的领导力量指明了方向。^[41]

(二) 干部管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注重社会矛盾交织叠

加,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陈秀梅认为,当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保健康和公众参与意识增强,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面对环境群体性事件,领导干部如何科学处置。^[42]

付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建设一支忠实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符合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忠诚干净担当、数量充足、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部队伍。这一重要论述,既为做好组织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也对新时代年轻干部提出新的要求。^[43]

张金涛指出,2016年12月16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司法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恩光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经查,卢恩光年龄、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假,长期欺瞒组织;金钱开道,一路拉关系买官和谋取荣誉,从一名私营企业主一步步变身为副部级干部;亦官亦商,控制经营多家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为企业谋取利益;对抗组织审查,为在职务提拔、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44]

陈春生提出,69年前,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京时,毛泽东同志把我们党走向全国执政比喻为“进京赶考”,作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本领的考验。69年过去了,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45]

他指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登高望远,才能更好前行。^[46]

陈春生在书中,对新时代的干部素质与能力进行了归纳总结:政治素质与提高政治能力,法律素质与依法行政能力,文化素质与学习应试能力,心理素质与心理调适能力等等,帮助干部了解与掌握新时代干部应当具备的素质与能力,全面增强执政本领。^[47]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全党同志一定要

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杨福忠认为,思维是人的一种主观精神活动,思维方式是人们看问题的角度、方法。思维方式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方法就有所不同。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就是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从法治角度出发,时刻考虑法律依据和法定程序,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48]

六、西柏坡精神

(一) 西柏坡精神

科学把握西柏坡精神的实质与核心,深化认识,获得新知,要把党中央进驻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作为参照坐标,以主体自身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当前在哪里等为切入点,结合考察西柏坡精神的思想源头进行研究。田丽、薛建中指出,西柏坡精神的实质,是谦虚谨慎、永葆本色、正视挑战、面向未来的不懈进取奋斗精神。“不懈进取奋斗”,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49]

吴杰华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安排,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西柏坡时期处于建国前夜,也是我们党从理论创新转向制度设计的历史节点,在这一制度的最终形成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制度设计进行系统的梳理,无疑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时代课题。^[50]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冯雪梅认为,将西柏坡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从“究内涵、求方法、重成效”这三个方面着手。“究内涵”是西柏坡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求方法”是西柏坡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重成效”是西柏坡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51]

戴建兵指出,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乡村到城市、从战争到和平、从革命到建设的巨大转折。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各地在战

争、土改、整党、工商业政策、统一战线等关系全局的工作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亟待整顿规范。同时，党内军内存在一定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给革命事业带来一定损害。为应对这一系列急剧变化的内外部环境 and 局势，毛泽东、中共中央通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健全党委制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强化政治权威，确立政治规矩，健全执政机制，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提供保障，为中共走向全国执政做好了准备。^[52]

西柏坡时期，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以及夺取全国胜利的迫切要求，切实维护党的领袖和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实现全党全军集中统一，成为一道尤为关键而紧迫的时代考题。姚志军指出，中国共产党统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斗争，通过抓“关键少数”以锤炼领导集体、抓权力统分以健全和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抓政策与策略实施以实现政令军令统一、抓体制机制建设着力提升领导水平执政能力等举措，切实维护了党中央权威，推动了全党团结统一，为新时代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经验。^[53]

李辉提出，“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成功转化的重要思想支撑，对中国共产党开启治国理政探索工作具有重要意义。69年的治国理政历程意味着69年的“赶考”征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需要解读并发挥好“赶考”精神的现代意蕴，促进党的治国理政能力提升，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54]

（二）红色文化

新时代条件下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需要挖掘红色文化的忠诚教育价值。周立军指出，红色文化作为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历程中积累和总结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宝贵文化遗产，在军人忠诚教育中有着积极的作用与价值。将红色文化应用于当代军人思想教育中，对于培育当代军人的忠诚品质是十分必要的。^[55]

周立军认为，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需要挖掘红色文化的忠诚教育价值。红色文化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坚定当代革命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红

色文化诠释党的意志，铸牢当代革命军人对党忠诚的军魂；红色文化蕴含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当代革命军人为国尽忠的意识；红色文化孕育“人民子弟兵”意识，强化当代革命军人忠于人民的精神品质。通过理论学习、榜样引领、实践体验和环境熏陶等，红色文化可创新当代革命军人忠诚品质的培育路径。^[56]

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康振海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仅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而且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伟力。^[57]

魏四海、程瑞山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58]

陈春生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站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提出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是立足我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指南。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意蕴，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5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十九大报告用了八个“明确”概括了这一思想的基本内涵。李寿荣认为，《基础》课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对大学生进行“习思想”的传播和讲授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依据这一新思想的理论性和《基础》课的逻辑结构，采用小班讨论的方式把“习思想”的八个“明确”贯

穿在整个教学当中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教学方式和路径。^[6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我国在新的历史阶段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陈聚芳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中国悠久而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文化土壤。把握这些,有助于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王红信指出,民生思想是重要组成部分,内涵十分丰富。与中华民族经邦济世的智慧、经验一脉相承。党的培养、父辈所传承的家风,影响深远。他是从基层和群众中走来的领袖,对人民的一往情深和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热爱,镌刻在他内心深处,成了他的人生追求。^[62]

八、国际形势

曹海霞、罗永忠提出,印尼马对抗时期是美国对马来西亚政策的重要演变期。美国对马政策经历了肯尼迪政府道义上支持马来西亚实际上援助印度尼西亚的“双轨政策”、约翰逊政府时期的“调节干预和直接卷入”,最后的“扶马抑印尼、确立美马友好关系”三个阶段。印尼马对抗结束时,美国已成为马来西亚最主要的西方盟友。美国对马政策的演变是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体现,确保了美国在东南亚的核心利益。^[63]

张根海指出,印度为达到强国目标,一方面实施周边战略计划,在南亚地区推行其地缘扩展战略,另一方面积极实施“东向行动政策”,使印度有机会参与周边发展计划。然而,由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存在、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的争端,以及隐匿于阿富汗的国际恐怖势力对印度的渗透等,导致印度长期处于安全困境之中。印度对中国未来在南亚地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不仅关系到中印两国的经济合作程度,而且还涉及到南亚地区的经济与社会

发展。^[64]

李翠亭认为,美式民主模式是美国历史、文化土壤的独特产物,且在本国已乱象频现,但已被输入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美国的民主输出在中东、北非及其他地区引发了难民大潮,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难民危机突显了美国民主输出的不合法性。这种不合法性使美国自由民主的“光环”趋于黯淡。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危害着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社会各界必须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重视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在推动形成新的世界格局中提升我国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引领力。^[65]

九、网络政治

闫晓静指出,在互联网技术不断进步的大背景下,微信已经成为用户群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之一,依托微信公众平台,利用微信公众号这一新载体,开启“智慧党建”之路,对增强党建工作的创造性与创新性、提升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大的意义。^[66]

王凤南提出,在移动互联网普及、大数据广泛应用的时代,全媒体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严峻的挑战,对于高校学工队伍而言,应该在准确把握新时期全媒体时代高校学生的特征和需求的基础上,探索思政教育的有效形式,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水平,提升高校育人工程实效。^[67]

当前,在社会的主流思维中就包括互联网思维,大学生可以通过此平台获得有效信息、互相交流感情以及学习专业知识,这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赢得教育学生的主动权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王馨玮指出,在互联网思维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的过程中,高校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与更多的挑战,因此要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互联网+”的有效结合,必须通过互联网思维来实现其有效性,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性以及教育工作者的参与性,让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适应时代的特点和要求,最终推动其迈向现代化。^[68]

(李娜: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戴木茅.卢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10).

- [2]戴木茅.政治真实与知人之术[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8.(3).
- [3]胥仕元.先秦儒道墨理想社会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
- [4]敦鹏.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特质及其现代价值[J].社会科学战线,2018(8).
- [5]敦鹏.礼与法:二程重构政治秩序的双重路径[J].“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8.(7).
- [6]祁刚利,魏先法.始终发扬伟大奋斗精神[N].河北日报,2018.(5).
- [7]祁刚利.传承红色基因 实现伟大梦想[N].河北日报,2018.(9).
- [8]刘丽.不驰于空想 不骛于虚声[N].河北日报,2018.(2).
- [9]丁万明.《家范》中的修身齐家思想[J].学习时报,2018.(2).
- [10]丁万明.秦始皇的治政风格[J].中国领导科学,2018.(9).
- [11]徐振增,杨福忠,牛余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11)
- [12]孙英臣.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J].领导之友,2018.(1).
- [13]孙英臣,傅建芬.牢记殷切嘱托 努力向人民交出优异答卷[J].红旗文稿,2018.14.
- [14]申文杰.不断创新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和方式[N].河北日报,2018.(4).
- [15]申文杰.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阐述的意识形态理论及现实价值[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版),2018.(7).
- [16]李素霞.论后现代政治的虚无主义命运——基于福柯的论述[J].河北学刊,2018.(9).
- [17]陈志环.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8.(1).
- [18]陈步伟.中国共产党人的问题意识[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18.(1).
- [19]李芬.不断增强群众工作本领[N].河北日报,2018.(2).
- [20]赵亦彭.与《资治通鉴》的精神对话[N].河北日报,2018.(5).
- [21]柳云.国家政治视野的国家形象塑造策略[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18.(2).
- [22]王建华.“一带一路”区域建设境外产业园区的战略思考[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1).
- [23]金浩.基于CAS理论的京津冀区域治理系统演化机制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9).
- [24]王颖.京津冀地区环境恶化成因及其治理对策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9).
- [25]范拥军.推进民生社会建设 提升国家治理能力[J].邢台学院学报,2018.(3).
- [26]张根海.析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的指示精神[J].知识经济,2018.(11).
- [27]张根海.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对河北工作重要指示的认识——以河北雄安新区建设为例[J].现代经济信息,2018.(8).
- [28]吴杰华.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困境超越[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8.(1).
- [29]娄文龙.整体性治理视野下住房市场中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18.(2).
- [30]白德全.规范PPP发展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J].理论探讨,2018.(5).
- [31]彭建强.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N].河北日报,2018.(6).
- [32]韩艳丽.新农村建设中基层政府执行力问题研究[M].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18.(1).
- [33]李聚山,孙英臣.践行网上群众路线干部培训纲要[M].河北省委宣传部,2018.(5).
- [34]梁瑞英.制度虚置状态下运动式管理的弊端与出路[J].领导科学,2018.(12).
- [35]牛余庆,柳建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10).
- [36]杨东广.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N].河北日报,2018.(6).
- [37]杨东广.新时代是干出来的[N].河北日报,2018.(11).
- [38]张勇.始终发扬伟大团结精神[N].河北日报,2018.(10).
- [39]张勇.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及其当代价值[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2).
- [40]刘建军.华北根据地1940年代初期对浪费现象的改造[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18.(6).
- [41]魏先法.新时代党的领导力的锻造逻辑[J].共产党员,2018.(1).
- [42]陈秀梅.提高领导干部现场处置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能力[J].贵州日报,2018.(9).
- [43]付华.年轻干部要努力践行“勤、实、悟”[N].河北日报,2018-8-15.
- [44]张金涛.从卢恩光案看官场“蒙面人”现象[J].领导之友,2017(12).
- [45]陈春生.全面增强执政本领 走好新时代赶考路[N].河北日报,2018.(4).
- [46]陈春生.登高望远体现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N].河北日报,2018.(7).
- [47]陈春生,李彦青.新时代干部素质与能力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3).
- [48]杨福忠.领导干部要提高法治思维能力[N].河北日报,2018.(4).
- [49]田丽.西柏坡时期党的历史方位与西柏坡精神的实质与核心[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6).
- [50]吴杰华.西柏坡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理论和实践探索研究[J].西柏坡统战文化研究论文集,2018.(6).

- [51]冯雪梅.西柏坡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究[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8).
- [52]戴建兵.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的执政准备[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 [53]姚志军.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领导核心地位的历史经验[J].红色文化学刊,2018.(6).
- [54]李辉.论“赶考”精神的现代意蕴与新时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8.(6).
- [55]周立军.红色文化在军人忠诚教育中的应用研究[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4).
- [56]周立军.论红色文化与当代革命军人忠诚教育[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7).
- [57]康振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写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N].河北日报,2018.(5).
- [58]魏四海,程瑞山.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改革发展实践[N].河北日报,2018.(8).
- [59]陈春生.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意蕴[J].人民论坛,2017.(12).
- [60]李寿荣.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基础》课小班讨论中的路径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8.(12).
- [61]陈聚芳.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J].邢台学院学报,2018.(9).
- [62]王红信.习近平民生思想溯源[J].邢台学院学报,2018.(9).
- [63]曹海霞,罗永忠.印尼马对抗时期的美国对马来西亚政策[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7).
- [64]张根海.印度周边战略及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J].理论视野,2018.(3)2018年3月第3期81页
- [65]李翠亭.美国“民主”输出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3).
- [66]闫晓静.微信公众平台开辟党建新阵地[J].人民论坛,2018.(9).
- [67]王凤南.全媒体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形式探究[J].传媒论坛,2018.(9).
- [68]王馨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现路径研究——“互联网+”背景下[J].现代商贸工业,2018.(1).

党的建设研究

张 勇 郑时雨

2018年党建研究重点是围绕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举措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执政能力建设、“互联网+党建”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一、全面从严治党

魏四海认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这一重要论述,立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蕴含着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充分表明了我们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一是伟大工程再出发,二是“赶考”路上再动员,三是自我革命再发力。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最大的优势。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1]

孟庆云认为,4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回顾这一光辉历程,我们之所以能战胜各种困难挑战,创造“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奇迹”,归根结底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才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才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引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开放才有坚强的组织支撑。^[2]

杨东广认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总结,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选择。实现二者的紧密结合,就要找到它们之间紧密结合的着力点。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看家本领为着力点,夯实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坚实基础;以领导干部发挥表率作用为着力点,把握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关键;以强化制度执行力为着力点,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提供强力支撑;以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为着力点,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提供良好环境。^[3]

姚志军认为,西柏坡时期,为应对历史转折时期错综复杂的局势和环境变化,迎接中国革命

新高潮，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战争、土改、整党、城市接管、统一战线等中心工作，通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健全党委制以及开展“两个务必”“赶考”历史警示等重大举措，努力锻造有纪律、有科学理论武装、采取科学民主方法、密切联系群众的党，在管党治党与推动历史进程相结合、制度治党与思想建党相结合、从严治党与发扬民主相结合，以及培育革命精神与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等方面，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积累了宝贵经验。^[4]

二、党的政治建设

程瑞山认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根本政治立场，集中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肩负号新时代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不是抽象的概念，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5]

陈春生认为，我们党历来重视战略问题，把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作为全党工作的一大重心。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是更好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是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需要，是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保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必须把保持政治定力摆在突出位置，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根本立场和原则，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本质要求，观大势、谋大事，勇于开拓创新，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安排落到实处。^[6]

周振国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坚持人民立场，始终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自觉审视人民立场站得稳不稳，深刻思考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不断把为人民造福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要以唯物史观打牢思想根基，以敢于担当精神不断为人民造福，回应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以自我革命的勇气防范和抵御最大危险、最大威胁，密切党群关系。^[7]

王彦坤、苏晔认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新时代新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需要人民同心同德、同向同行。新时代新环境，应对新的风险挑战，需要人民成为铜墙铁壁、坚强后盾。新时代新任务，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目标，需要汇聚全体人民的力量艰苦奋斗。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和价值追求；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汇聚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的无穷智慧；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向着共同富裕目标不断前行；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8]

周振国认为，改革开放是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的重大抉择，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坚持人民立场，是改革开放取得非凡成就的重要保障，是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的必然要求。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改革开放的主体力量，是改革开放成效的评价主体。要始终坚持改革为了人民，调动人民群众推动改革开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坚持改革依靠人民，努力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始终坚持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9]

张占辉认为，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关乎一个政党的性质，是其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从信念、责任和底线三个层面筑牢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品格，就是要夯实理想信念之基，锻造责任担当之魂，绷紧伦理底线之弦，以忠诚、务实、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使我们党在新时代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10]

王海认为，坚持执政为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事业中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知之深 爱之切》是一部鲜活、生动的“知民、为民、依民、惠民”心系群众的典型教材，主要体现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真正英雄；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做好群众工作始终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11]

三、党的思想建设

(一) 中国梦和民族精神

程瑞山认为,伟大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精神。伟大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禀赋,中国共产党是在艰苦奋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发扬伟大奋斗精神,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本领,打下更好地为伟大事业奋斗的能力基础;要笃实力行、求真务实、敢于担当,把伟大奋斗精神贯彻落实到党治国理政各方面,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环节。^[12]

祁刚利认为,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蕴含着我们党的信仰、宗旨和追求,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思想路线、群众观点和纪律作风,是我们攻坚克难、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强大武器。传承红色基因可以坚定我们的理想信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可以促进党的思想路线的创新和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思想源泉;可以促使我们树牢群众观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可以促进纪律和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13]

祁刚利认为,创造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创造精神,中国人民书写了辉煌的历史,铸就了绵延几千年的璀璨文明。在新时代发扬伟大创造精神,要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积极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要注重培育、积聚和使用高精尖人才。^[14]

张勇认为,伟大团结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时代,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大力发扬伟大团结精神,凝聚起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发扬伟大团结精神,必须发挥好全党大团结的引领作用;必须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必须加强海内外中华儿

女的大团结;发扬伟大团结精神,还要促进全世界正义友好力量的大团结。^[15]

祁刚利、魏先法认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质和优良禀赋。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大力发扬伟大奋斗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拼搏。始终发扬伟大奋斗精神,就要在辛勤劳动、务实苦干中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不断增强创造幸福的能力;就要坚定信念,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就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去,在不懈奋斗中开辟更加美好的未来。^[16]

张勇认为,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历史使命,保持强大定力,不犹豫、不懈怠、不畏难,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撸起袖子加油干,苦干实干拼命干,就一定能够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辉煌业绩。^[17]

魏先法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高水平跃迁的重要里程碑。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关注民族命运和阶级命运,还密切关注人类命运,自觉地把民族使命与阶级使命、人类使命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新的使命自觉。中国共产党人要牢记阶级使命,为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中国共产党人要牢记民族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要牢记人类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8]

贾玉娥认为,梦想是前进的动力和风帆,伟大梦想精神始终激励中华儿女砥砺前行。把梦想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长征。走好新的长征路,发扬伟大梦想精神,必须始终保持充足的干劲和饱满的革命热情。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敢于创新创造,勇立时代潮头、善开风气之先,以创造精神找寻新方法、探索新路径。^[19]

(二) 理想信念

王秀华认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永不结业的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

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将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20]

王彦坤认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必须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坚定理想信念，要注重理论武装，把握发展大势，明确前进方向；注重党性修养，搞好主题教育，增强“四个意识”；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国情党情，坚定“四个自信”；注重联系群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凝聚圆梦力量。^[21]

刘丽认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想信念是一种精神追求，最终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来体现、客观的实践标准来衡量。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生的必修课，时刻绷紧这根弦，一要加强理论武装，二要强化党性修养，三要提升道德水平。^[22]

（三）解放思想

王彦坤认为，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思想的解放促进了改革不断深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本质上是一致的，解放思想必须增强政治意识、求实意识和创新意识。以思想大解放实现改革大突破，要重视理论学习，把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化问题导向，以实践成效检验思想解放成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勇于担当作为，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大的力度深化改革。^[23]

刘丽认为，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党的创新理论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掌握，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才能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动力源泉。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创新传播手段，创新话语方式。一是要善于将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来表达，做到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二是要融合使用理性话语与感性话语，实现传播主客体在认知和情感上的交融统一。^[24]

（四）赶考精神

李辉认为，“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成功转化的重要思想支撑，对中国

共产党开启治国理政探索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赶考”精神的现代意蕴：一是尊重人民群众“主考官”地位，密切联系群众，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二是执政党的学习之路永无止境，要时刻充电学习，建设学习型执政党；三是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虚心纳谏，自我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不断优化治国理政策略，不断提升新时代党的执政能力。^[25]

四、党的组织建设

（一）基层党组织建设

牛余庆认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影响到党的整体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新时代，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就是要紧紧依靠基层党组织自身的组织体系和组织资源，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推动工作，善于引领各类组织坚持在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行动，善于把党组织意图变成各类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举措，善于引导各类组织做好群众工作，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and 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26]

牛余庆认为，新时代做好“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事关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战略部署的推进落实，事关党的执政根基和事业的兴衰成败。新时代，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为“两新”组织注入不懈动力，必须着力做好“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即在加强政治领导中提升组织领导力；在创新体制机制中提升组织动员力；在发挥服务功能中提升组织吸引力；在推动改革发展中提升组织协调力；在锻造过硬队伍中提升组织影响力。^[27]

孙晓红、刘翠莲、马正英认为，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依法治国的核心力量，对有序推进社会治理发挥着重要职能。但实际上，当前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融合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观念落后、工作模式落后、融合广度深度不够、组织成员素质有待提升等问题，难以实现预期建设效益。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融合发展的措施有：一是革新工作理念，二是更新工作方式，三是加强深度融合，四是加强团队建设。^[28]

李强认为，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党在高校全部

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联系普通教师和学生的桥梁和纽带,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应该处于主体地位。但是现实中高校基层党组织在思想组织工作中存在主体地位没有保障等问题,影响了在思想政治工作主体地位的发挥。因此,要搞好顶层制度设计,在制度上保障高校基层党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工作实效,以达到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主体作用的目的。^[29]

谷聪认为,组织生活应具备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锻炼,坚决防止表面化、形式化、娱乐化、庸俗化。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基层党支部政治生活,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一要优化组织建设,激发支部活力,增强党员自主性;二要贴近学生实际,契合时代特色,提高活动吸引力;三要重视体系构建,坚持规范操作,保证活动常态化。^[30]

李志强认为,高校党支部作为维系党与学生、党与教师的重要枢纽,是校内师生之间的政治组织。完善高校党支部建设工作,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党全面贯彻落实基本路线与教育方针。党建工作在高校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了不断提升党支部建设的整体质量,我国各大高校应全面了解党支部的建设现状,针对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并提出合理的解决策略,以便于促进高校的持续性建设与发展。^[31]

李冰、赵怀璧认为,高校积极分子党课教育中存在教育理念滞后于社会形势的发展、教学内容尚不能充分反映时代社会变革、教学形式单调,缺乏与学生的有效互动、考核与评价方式单一等问题,其原因在于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缺乏统一布局,党课教育没能与“时代”接轨,党课讲授内容与方式缺乏吸引力,对党课教育缺少有效监管和考评价机制。因此,在新形势下,可以通过组建党课教师研讨小组、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调动学习积极性、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和考核评价制度,努力把党课打造为“体验式”“自主式”“故事式”等教育模式。^[32]

(二) 干部队伍建设

张勇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把

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落到实处,需要广大干部更加积极主动地担当作为。一要强化担当作为的政治责任,二要增强担当作为的本领能力,三要突出问题导向、勇于直面困难,四要努力营造敢于担当作为的良好氛围。^[33]

祁刚利认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重视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群众实际,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凝聚起推进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首先要树立群众观念,其次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再次要努力用好各种调研方法,最后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34]

王秀华认为,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注重用经典涵养正气,用经典淬炼思想,用经典升华境界,用经典指导实践。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提升思想水平和推动发展的能力,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我们就会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35]

杨福忠认为,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是提高领导干部综合素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必然要求。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几个着力点:其一,树立法律信仰,敬畏法律,信仰法律,尊崇法律。其二,加强学习,掌握法治思维方式的特点。其三,完善制度,运用监督、检查、考核等方式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导向,提高领导干部整体法治素养。^[36]

付华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于培养选拔一批又一批优秀年轻干部。广大年轻干部要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可靠的接班人,必须有强烈的担当意识,勤修内功、增长才干、锤炼本领,努力在“勤、实、悟”上多下功夫,更好地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37]

王秀华认为,立政德,就要明大德,要求广大干部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立政德,就要守公德,

要求领导干部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立政德，就要严私德，要求领导干部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人民。^[38]

刘翠莲、申灿认为，基层干部作为我党及政府的形象代表，其素质能力高低，直接影响了党的执行能力，更是关乎我党的事业发展。因此，提升基层干部综合素质能力尤为重要，可通过以下几种基本路径实现：一是健全任用体系，二是完善考评制度，三是加强监督管理，四是创新培训机制。^[39]

杨海宽、张美、张巍筠认为，领导班子意见分歧存在异化的风险，导致班子内部出现矛盾冲突。要通过筑牢制度的底、把好分歧的度、架起交流的桥、敲响批评的钟、扎牢纪律的笼、提升个人修养等措施，避免意见分歧异化所带来的危害。^[40]

白凌认为，为敢于担当并勇于担当的党员干部保驾护航，就要切实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形成鲜明的用人导向；就要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为担当型干部提供才华施展的空间与平台；就要完善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鼓励改革进取，宽容失误与失败，让担当型干部将聪明才智应用于改革发展大局；就要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让心怀“功成不必在我”高尚情怀默默奉献、无怨无悔的党员干部解除后顾之忧，努力践行新时代的责任担当。^[41]

五、党的作风建设

刘丽认为，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要求，也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要求我们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沉下心来真抓实干。真抓实干，要勇于直面问题和矛盾，深入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症结，聚焦矛盾困难，从关键问题和具体矛盾入手，一个一个地加以解决。^[42]

张勇认为，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渗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

想，蕴含着炽热的人民情怀，对于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的群众工作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坚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坚持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政策策略与群众实际相结合，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既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又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既统筹兼顾又善抓群众中心工作。^[43]

陈洁认为，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在干事创业中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就要坚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和追求，就要树立多做“潜绩”的价值取向，就要秉持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工作态度。只有把抓落实的出发点放到对党尽责、为民造福上，戒骄戒躁、功成不居，才能真正做出利国利民的事实，取得让党和人民满意的实绩。^[44]

王政燃认为，狠抓落实，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是一切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和保证，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方面，检验着领导干部的思想品质、工作作风和实际能力。要增强狠抓落实本领，牢牢把握抓落实的根本，坚持雷厉风行与久久为功相结合，坚持求真务实与真抓实干相统一，强化督查保障，形成抓落实的常态。^[45]

六、党的制度建设

伊士国认为，通过对党内法规进行实施后评估，有利于及时发现党内法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有利于提高党内法规的质量，如期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如同立法实施后评估，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也是党内法规建设的必要环节和重要内容。^[46]

梁瑞英、张立新认为，制度虚置是指规章制度制定出台之后，却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实，不能有效发挥实际作用，实质上是一种严重的制度失灵。常态化管理中制度虚置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制度本身存在问题，二是制度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实，三是运动式管理的大行其道导致常态化管理中制度虚置。因此，领导者要在开展疾

风暴雨式的管理运动之前,对以往违规违纪的情况进行深刻反思和严厉惩处,在管理运动中形成多元的常态化管理体系,修订完善各项规章制度,重视日常管理中的制度落实和监督,切实治理制度虚置顽疾。^[47]

林群丰认为,党内规范性文件审查是党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对于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都具有重要价值。当前的党内规范性文件审查存在审查范围过窄、审查机构不健全、审查程序存在缺漏、审查责任定位模糊四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科学界定党内规范性文件的范畴,打破仅能由中纪委、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才能制定党内规范性文件的误导性观念;强化党内法规工作机构,确立明晰的党内规范性文件审查主体;建立主动审查与被动审查相结合的审查机制;构建以政治性、合法性为主兼顾合理性的审查责任体系。^[48]

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张志永认为,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战争到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革命胜利后如何领导新中国建设的“本领恐慌”新课题,主要包括政策恐慌、队伍恐慌和知识恐慌。为了更好地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领导重任,中共中央采取在职干部教育和脱产学习等方式,努力提高干部政治文化素质,并大批培训新干部和留用新解放区建设人才,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管理国家和经济建设等知识水平和能力,为建立新中国和全面执政做好了全面准备。^[49]

戴建兵、姚志军认为,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各地在战争、土改、整党、工商业政策、统一战线等关系全局的工作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亟待整顿规范。同时,党内军内存在一定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给革命事业带来一定损害。为应对这一系列急剧变化的内外部环境 and 局势,毛泽东、中共中央通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开展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斗争、健全党委制等一系列战略举措,强化政治权威,确立政治规矩,健全执政机制,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提供保障,为中共走向全国执政做好了准备。^[50]

姚志军认为,西柏坡时期,由于革命形势的

迅猛发展以及夺取全国胜利的迫切要求,切实维护党的领袖和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实现全党全军集中统一,成为一道尤为关键而紧迫的时代考题。中国共产党统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斗争,通过抓“关键少数”以锤炼领导集体、抓权力统分以健全和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抓政策与策略实施以实现政令军令统一、抓体制机制建设着力提升领导水平执政能力等举措,切实维护了党中央权威,推动了全党团结统一,为新时代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经验。^[51]

陈春生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要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矢志接续奋斗,唯有全面增强执政本领,才能更好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适应新时代赶考要求,增强学习、政治领导、改革创新、科学发展、依法执政、群众工作、狠抓落实、驾驭风险八项本领。其途径主要有:理论武装是前提,党性修养是根本,能力建设是核心,实践锻炼是基石,完善机制是保障。^[52]

王英杰认为,只有改革创新,才能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才能进一步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增强改革创新本领,要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要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推动工作;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53]

陈秀梅认为,领导干部如何及早发现端倪,把环境群体性事件解决在萌芽状态,既是对领导干部能力的考验,又是生态文明建设对领导干部的新要求。第一,汇集信息,分析缘由,增强预警能力;第二,平等对话,善于疏导,提高引导能力;第三,公开信息,畅通渠道,加强沟通能力;第四,追究责任,强化意识,提升担当能力。^[54]

李芬认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要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群众工作本领。要坚定人民立场,充分尊重群众,正确引导群众,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特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创新群众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有效增强新时代群众工作的实效。^[55]

魏先法认为,领导力就是一个主体对其他主体实施吸引、号召、影响、团结的功能。政治领导力是党的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目标,和思想引领力一起决定着党的方向、价值和灵魂。锻造党的领导力,要坚持以政治领导力为重点和统领。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坚持人民民主的价值导向,勇于自我革命,接受人民的评判。^[56]

八、互联网+党建

闫晓静、孟梯清认为,在互联网技术不断进步的大背景下,微信已经成为用户群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应用之一,依托微信公众平台,利用微信公众号这一新载体,开启“智慧党建”之路,对增强党建工作的创造性与创新性、提升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大的意义。借助微信公众平台开辟党建新阵地的有效路径:一是拓宽渠道,促使党建微信公众平台的多样化应用;二是内容为王,积极发挥党建微信公众平台的思想引领作用;三是强化运维,提高党建微信公众平台专业化运营水平。^[57]

吴伟刚、吴凤英认为,高校基层支部要时刻适应新时代“互联网+”生态环境,加强高校基层学生支部党的建设,必须从本质上树立与信息网络现状相适应的思维和观念,决不能因为个别学生沉湎于网络而将互联网视为洪水猛兽,而是将互联网作为新的传播渠道、信息载体、服务平台、宣传阵地,通过“互联网+党建”,构建高等院校基层学生支部党建新平台、建立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宣传新阵地、打造服务教师服务学生的新亮点。^[58]

闫晓静、贾耀忠认为,网络是促进党建创新的有力渠道,将这一渠道利用好,要从四方面着手:一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满足现实需求,从而更好发展网络党建;二是基层党建要利用网络平台提高服务效率,进一步便利群众;三是要利用网络平台加强党员干部的组织管理;四是要在移动网络媒体上加强党建宣传,使网络渠道得到延展与高效利用。^[59]

李丽丽认为,利用互联网搭建智慧党建平台,使党建管理走向智慧化,党建服务走向现代

化,党建宣传形式走向多样化,基层监狱党组织的管理更加高效便捷。要利用大数据对党内组织和人员状况进行定性和定量数据分析、开展监狱教育工作,寻求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创新党务工作方式,建造“线上”“线下”互动平台。^[60]

[张勇、郑时雨: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河北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

参考文献:

- [1] 魏四海.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N].河北日报,2018-03-30.
- [2] 孟庆云.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N].河北日报,2018-10-24.
- [3] 杨东广.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N].河北日报,2018-02-23.
- [4] 姚志军.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历史经验[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01).
- [5] 程瑞山.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N].河北日报,2018-05-11.
- [6] 陈春生.着力提高战略思维能力[N].河北日报,2018-01-19.
- [7] 周振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N].河北日报,2018-03-08.
- [8] 王彦坤,苏晔.永远坚守人民立场[N].河北日报,2018-07-04.
- [9] 周振国.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开放[N].河北日报,2018-08-22.
- [10] 张占辉.筑牢党员干部政治品格的三个层面[J].人民论坛,2018(28).
- [11] 王海.从“知之深 爱之切”悟总书记执政为民情怀[J].共产党员(河北),2018(11).
- [12] 程瑞山.弘扬奋斗精神 实现伟大梦想[N].河北日报,2018-12-19.
- [13] 祁刚利.传承红色基因,实现伟大梦想[N].河北日报,2018-09-12.
- [14] 祁刚利.始终发扬伟大创造精神[N].河北日报,2018-07-06.
- [15] 张勇.始终发扬伟大团结精神[N].河北日报,2018-10-31.
- [16] 祁刚利,魏先法.始终发扬伟大奋斗精神[N].河北日报,2018-05-04.
- [17] 张勇.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N].河北日报,2018-02-09.
- [18] 魏先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自觉[J].共产党员(河北),2018(02).
- [19] 贾玉娥.始终发扬伟大梦想精神[N].河北日报,2018-11-21.
- [20] 王秀华.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N].

- 河北日报,2018-11-07.
- [21]王彦坤.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N].河北日报,2018-03-23.
- [22]刘丽.革命理想高于天[N].河北日报,2018-08-08.
- [23]王彦坤.以思想大解放实现改革大突破[N].河北日报,2018-09-12.
- [24]刘丽.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N].河北日报,2018-10-26.
- [25]李辉.论“赶考精神”的现代意蕴与新时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J].大庆师范学院报,2018(03).
- [26]牛余庆.准确把握新时代 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新要求[J].共产党员(河北),2018(15).
- [27]牛余庆.加强“两新”组织党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J].共产党员(河北),2018(07).
- [28]孙晓红,刘翠莲,马正英.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融合发展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8(02).
- [29]李强.新时代如何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的主体作用[J].智库时代,2018(33).
- [30]谷聪,徐建中,赵佳兴.大学生基层党支部政治生活规范化常态化实践探索——以河北科技大学“学‘习’进行时”活动为例[J].学周刊,2018(26).
- [31]李志强.我国高校党支部建设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经贸实践,2018(17).
- [32]李冰,赵怀璧.高校入党积极分子党课教育现状及创新路径探析[J].保定学院学报,2018(7).
- [33]张勇.新时代要有新担当新作为[N].河北日报,2018-06-06.
- [34]祁刚利.大兴调查研究之风[N].河北日报,2018-01-17.
- [35]王秀华.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N].河北日报,2018-05-25.
- [36]杨福忠.提高法治思维能力[N].河北日报,2018-04-11.
- [37]付华.年轻干部要努力践行“勤、实、悟”[N].河北日报,2018-08-15.
- [38]王秀华.领导干部要讲政德[N].河北日报,2018-04-27.
- [39]刘翠莲,申灿.浅谈基层干部综合素质能力提升的基本路径[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28).
- [40]杨海宽,张美,张巍筠.领导班子意见分歧的异化倾向及管控策略[J].领导科学,2018(16).
- [41]白凌.为敢于担当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J].人民论坛,2018(25).
- [42]刘丽.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N].河北日报,2018-02-15.
- [43]张勇.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及其当代价值[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02).
- [44]陈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N].河北日报,2018-04-25.
- [45]王政燃.增强狠抓落实本领[N].河北日报,2018-01-31.
- [46]伊士国.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制度化[J].人民法治,2018(Z1).
- [47]梁瑞英,张立新.制度虚置状态下运动式管理的弊端与出路[J].领导科学,2018(12).
- [48]林群丰.党内规范性文件审查问题及其解决思路[J].理论探索,2018(1).
- [49]张志永.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本领恐慌”问题的历史考察[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1).
- [50]戴建兵,姚志军.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的执政准备[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1).
- [51]姚志军.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领导核心地位的历史经验[J].红色文化学刊,2018(02).
- [52]陈春生.全面增强执政本领,走好新时代赶考路[N].河北日报,2018-04-18.
- [53]王英杰.增强改革创新本领[N].河北日报,2018-01-03.
- [54]陈秀梅.提高领导干部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能力[N].贵州日报,2018-05-29.
- [55]李芬.不断增强群众工作本领[N].河北日报,2018-02-02.
- [56]魏先法.新时代党的领导力的锻造逻辑[J].共产党员(河北),2018(19).
- [57]闫晓静,孟悌清.微信公众平台开辟党建新阵地[J].人民论坛,2018(26).
- [58]吴伟刚,吴凤英,毕艳玲.互联网+背景下的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初探[J].科技风,2018(23).
- [59]闫晓静,贾耀忠.拓展党建工作的网络渠道[J].人民论坛,2018(08).
- [60]李丽丽.“互联网+”背景下基层监狱党建发展特点与困境[J].学理论,2018(06).

教育学

教育理论研究

薛 滩

2018年度,河北域内的专家学者,以及关心支持教育的人士,就教育理论问题阐述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见解,不断补充、丰富和完善了我国的教育理论内容和体系,对各级各类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起到或助推和帮助作用,或借鉴和参考价值。当然,也有的研究成果受到质疑或否定,这也是繁荣与发展教育科学理论的必由之路。

一、教育基本问题

(一) 教育科学的历史偏离

傅松涛认为,非生态性生存的社会现实给以往各种社会暨教育理念理论打上程度不同的非生态性偏离的基本特征与烙印。在今日高科技的加速发展越来越要求、引领和推进全球社会生态化趋势日益凸现和强劲的时代条件下,教育社会学理应充分彰显和发挥自身作为教育科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生态体系“拱顶”领域与学科的生位、特点、优势及职能,在回归人类社会生态性原质原貌的同时和基础上,把教育社会生态作为自己的历史原型、逻辑元点、结构框架、理念公理等方面的通用范式,整合、淬化和催生出真实完整地反映与推进人类生态性文明生存的教育科学乃至有机融合自然、社会、人文领域的综合社会科学生态体系,先行启动和实现全球社会生态化时代的生态范式革命。^[1]

(二) 翻转课堂与教学

宋生涛等人认为,翻转课堂是信息化时代思维创新教学的产物,它将互联网的开放、共享、自由等特征与教育教学的本质规律有机结合,将传统的“先教后学”调整为“先学后教”。它借助信息技术拓展了课堂的时空,颠覆了传统课堂教学的基本结构,颠倒了教学过程,重置了课堂时间,改变了学习方式,转变了师生的角色。翻转课堂的要素是:学生能够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是有效课堂,教学资源准备充分,有网络教学平

台和学生学习终端支持系统。翻转课堂实际由两个时空课堂构成,第一个课堂是课前的虚拟课堂,在虚拟课堂里学生自主学习新知;第二个课堂是学校的真实课堂,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学生二次知识内化。^[2]

(三) 教学论视域下学习方式

潘新民等人认为,探讨学生的学习方式,是教学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当前,聚焦于心理学和哲学视角的学习方式认识来指导学生怎么学,既有价值又有局限。学习方式的概念认识,理应回归教学论立场,吸取其他学科对学习方式概念认识的合理内核。基于教学论立场,学习方式是指在教师主导作用下,以学生主动学习为旨趣,学生个体或与他人,借助学习工具与学习对象相互作用,是一系列外部学习活动和内部心理活动相互统一的学习活动。对“学习方式”概念的教学论解读,学术意义上,有利于丰富教学论概念体系,深化教学论的理论研究;实践意义上,有利于指导教师,建构多种形式的学生主体学习活动,促进学生发展。^[3]

(四)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教师理解

朱立明等人认为,随着2017年11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再次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旨归表现为紧扣核心素养的教育理念、建构综合运用的课程形态和凸显互动创生的教学范式。实践中,部分教师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视为课外活动、学科拼凑、事实体验、知识浅化、精英教育等,这种现实偏颇严重影响课程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理解的应然路向:1. 学科融合:突破分科课程的壁垒;2. 回归本真:转向学生需求的满足;3. 深度学习:提升超越经验的思维;4. 目标导向:追求实践能力的培养;5. 科学评价:观察学生成长的轨迹。^[4]

二、河北教育

(一) 学生学业发展水平评价

董博清等人认为,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框架(试行)》,将“学生学业发展水平”作为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主要内容。随着河北省义务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价系统的不断发展,在未来发展要集中于几个方面:首先,开发基于课程标准的学业发展水平测验,给教学活动、学业水平考试测验及等级划分提供参考和依据,为指导教学和改进学生的学习提供有力证据;其次,补充河北省义务教育学生学业发展水平的评定等级,比如合格、良好和优秀;再次,研究并尝试不同测验方案、模型或方法,探索适用于河北省义务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价的最优方案,为全面实施质量评价做准备。^[5]

(二) 县域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朱文富认为,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是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义务教育公平、优质发展的重要途径。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应然意蕴的核心是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实现城乡教育互补共荣。为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从国家到地方在政策支持、经费投入、资源利用、师资队伍建设、学校内涵发展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依然存在诸多困境。破解困境,加速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向“实然”转变的路径:1. 澄清认知误区,确立正确观念;2. 完善教育治理方式,统筹整合教育资源;3. 投入和优化并重,夯实物力人力资源支撑;4. 城乡互补,形成特色和优势。^[6]

(三) 河北小学科技教师

刘小丽选取石家庄、唐山、邢台、沧州、邯郸、保定、衡水、廊坊八个市的小学科技教师、学校领导为调研对象,通过对河北省小学科技教师专业精神、专业知识、专业教学能力、专业研究能力、专业满意度等方面反映小学科技教师的专业素养等的研究显示:小学科技教师专业素养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且在性别、教龄、学历、专兼职、地域等维度不同程度的存在差异。要提高河北省小学科技教师专业素养,需要合理配置师资,推动优质师资合理流动;完善科技教师选聘制度,把好入门质量关;优化小学科技教师队伍结构;抓好在职培训,提高继续教育质量。^[7]

(四) 河北高校教师教学学术能力

武慧芳等人将教师教学学术能力按知识、交流、反思、观念等四个维度对河北部分高校教师进行测定,结果发现,高校教师教育知识有待进一步充实,教学交流有待进一步活跃,教学反思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教学学术观念有待进一步树立。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同行教学评价制度,健全教学学术能力发展的“基础设施”,开展以教学学术能力发展为宗旨的教学活动。^[8]

三、基础教育

(一) 中小學生品德发展水平评价

张二庆认为,中小學生品德发展水平评价主要涉及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方法以及评价管理。但评价主体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不同评价主体的意见难以整合,品德内涵的丰富性及其争议给评价带来困扰,品德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增加了评价的难度,评价内容不全面导致评价的效度低。而评价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评价方法运用不规范,评价方法间缺乏整合影响评价的真实性。^[9]

(二) 新时代的少年儿童组织教育

薛国风认为,少年儿童组织自身具有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儿童性、自主性、成长性。当下少年儿童组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是:教育方式成人化,缺少对少年儿童在组织中应负责任的明确;教育活动欠体系化,忽视了教育过程中儿童“心理事实”把握;教育取向有所偏差,导致发展缺乏长效机制和效果的平面化。新时代开展少年儿童组织教育的对策:1. 确定少年儿童组织边界,加强组织文化建设,以深耕理念助推少年儿童发展;2. 加强少年儿童组织系统化建设,促进组织活动“在地发展”;3. 活化少年儿童组织实体空间建设,帮助少年儿童完成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组织角色转变。^[10]

(三) 少年儿童情感教育法

梁明伟等人认为,情感教育法是少年儿童信仰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方法,是一种“基于情感、在情感中、为了情感”的信仰教育方法。注重主体性与适应性的结合,强调知、情、意、行的内在统一以及立足现实与着眼未来是情感教育法的基本特点;而体验性、情理交融性和生活性是其基本原则。当前,少年儿童信仰教育中情

感教育法的实施存在评价体系不完善,教师情感教育能力欠缺,家、校、社等三个方面教育分歧等问题。因此,要尊重少年儿童的自然适应性;切实保证情感与认知的并存;创设生活情境,促进人格发展;提升教育者的专业素养;建立家、校、社“三位一体”,形成教育合力。^[11]

(四) 少年儿童的理想信念教育

薛国风认为,在教育范畴内,理想信念教育属于德育范畴,本性是一种信仰教育。要有效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应建立起三重视域:一是建立价值论视域;二是建立生态化视域;三是建立微文化视域。要牢固把握理想信念教育的“八种方法”:用心灵情感去打动,用民族精神去传承,用榜样力量去引领,用生活责任去强化,用地方文化去培育,用社会资源去濡染,用新媒体平台去深耕,用实践活动去锻造。^[12]

(五) 中小学团队衔接

薛国风等人认为,由于大多数小学校与中学校处于相对独立的物理空间和教育阶段,以致团队衔接工作一直未达到理想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团队衔接的顶层设计与组织建设不够健全;学校团队衔接活动匮乏且缺乏组织专业性;工作中缺乏专业性组织理论和专业化辅导员的支撑;学校团队衔接工作主线不够突出。C管理理论最早由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提出,C指的是“中国(China)的易经(Change)的创造性(Creativity)”。C管理模式启示下的团队衔接工作开展对策:1. 确立自主化团队衔接工作组织管理模式;2. 以制度化方式明确细化组织成员职责与义务;3. 以“以人为本”管理原则塑造少年儿童的组织成员角色;4. 以“道法自然”管理思想培养少年儿童组织意识。^[13]

(六) 普通中学生涯教育

索桂芳认为,随着核心素养概念提出和新高考改革的全面展开,普通中学生涯教育日益受到重视,但由于它在我国尚属于新生事物,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之处。普通中学开展生涯教育,应站在核心素养的大背景下,将培育学生自主发展能力作为最终目标;应着力在课程与教学上进行创新,注重课程开发的针对性与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应将普通中学生涯教育作为一项全社会的事业,通过政府、学校与社会的合力共为,使生涯教育全面有效地

开展起来,为我国亿万青少年健康成长带来福祉。^[14]

(七) BOPPPS 教学模式

高丹阳等人认为,当今国际社会人才的竞争愈演愈烈,STEM作为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引起各国的重视。我国STEM课程实施过程中面临着教学模式、师资配备、政策支持等多方面挑战,BOPPPS教学模式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注重学生实践与反馈,较传统的教学模式更适合STEM课程。运用BOPPPS教学模式开展STEM课程教学可以帮助教师明确目标,在教学活动安排过程中注重学生动手实践,使课程结构更加合理完整,同时学生主动探究性明显增加,促进了教学效率提高。但是我国在STEM教学资源、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且BOPPPS教学模式的应用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推广,后期仍需进行深入研究。^[15]

(八) 动画型微课的设计与开发

高丹阳等人认为,动画型微课是指以教学设计为指导思想,时间在十分钟以内,围绕某一个知识点根据教师讲解的音频在画面上呈现出文字、图形、图像等教学内容,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完整教学活动的短视频教学资源。ADDIE模式是一种系统的教学设计模型,可以从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五个方面对微课的设计开发提供指导性意见,为动画型微课设计提供一个系统完整的教学设计流程。对于提升动画型微课的质量、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以及提高碎片化学习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16]

四、高等教育、

(一) 大学评价制度

白玫在多年科研及一线教学经验基础上对大学评价制度进行了归纳,包括国外经典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及大学评价,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及大学评价,大学排名——大学评价的典型代表,国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及大学评价的趋同性、问题及启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及大学评价存在的问题,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及大学评价的建议等。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我国大学评价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案,增强大学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17]

（二）中国大学评价与 ESI 学科评价指标

李兴国等人认为，ESI 学科评价侧重于世界水平，采用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校友会网、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和上海软科等四个代表性的中国大学评价体系，通过对原“985 高校”在四个中国大学排行榜得分指标与其 ESI 各项指标的相关和回归分析，发现中国大学评价得分指标与 ESI 评价指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基于 ESI 指标建立的中国大学评价多元回归模型整体线性关系显著，ESI 各项指标在四个中国大学评价回归模型中显著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热点论文指标对中国一流大学评价得分影响显著，所以不应再纠结于大学排名是否存在，而是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大学排名，理性分析大学排名，合理使用排名结果，引导、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18]

（三）师范院校更名

张云晶等人认为，师范院校更名、脱帽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试想没有好的师范大学能不能培养出优秀的教师？没有优秀的教师能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国家有没有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师范院校更名是教师社会作用弱化的缩影，是过度功利化在教育中的折射，是对西方教师教育经验的刻意仿效。为师范大学正名是必须坚守的追求与归宿。因此，要营造坚守教师教育的生态环境，建立净化教师教育的多元机制，形成发展教师教育的专业自信，提高师范院校持续发展的内在竞争力。^[19]

（四）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及管理

顾岩峰在分析中国高等教育配置的变迁、现状，以及曾经取得的改革创新的成果基础上，分析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国外高等教育配置的情况进行分析与经验借鉴，提出深化中国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策略；在分析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类型，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演进与宏观管理模式的同时，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的要求；通过对国外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分析与比较，提出中国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发展策略。^[20]

（五）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特征

全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评选活动是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在全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

具有广泛影响的一项表彰活动。李明忠等人对先后五届 200 个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进行数据统计后发现：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地区分布差异显著，其设置类型、获奖频次与有无学位点、所属高校类型和层次紧密相关。认为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的典型代表，高度重视自身建设，积极采取一系列有效举措进行组织变革和制度创新，呈现有明确的目标定位和发展规划、有雄厚的学术力量支持、注重决策咨询服务三方面特征。提出，要明确高等教育智库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的重要目标与发展方向；充分发挥知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引领作用，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高校领导要高度重视和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建设，努力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水平。^[21]

（六）研究生教学哲学思想

薛国凤认为，研究生教学中需要人本主义思想、建构主义思想、学术发展取向思想等教学哲学思想。反观当前我国研究生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研究生教学理论研究中重“技”轻“道”现象，我国研究生教学需打破以技统教的传统思想与做法，倡导技道合一，培养教学信仰，增强教学反思性，提升教学效能感；需加强不同层次的研究生教师教学专项培训，为教师多样化教学提供实质性条件支持；需打破书斋式教学，提供研究生教师利用自己专长服务公共事业的机会。^[22]

（七）“双一流”下地方综合性大学国际化发展

郭伟等人认为，国际化是加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大学历史的传承、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自身建设的需要。“双一流”战略对大学国际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地方高校排头兵、区域高等教育先行者的地方综合性大学应乘势而为，正确认识并准确把握大学国际化发展趋势，树立国际化教育理念，构建全员国际化格局，实现广度与深度结合，打造特色国际化品牌，在促进自身“双一流”建设的同时，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23]

（八）体验教育的教育模式

刘金花等人认为，体验教育是进一步深化应用型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它符合现代教育规律，符合应用型本科培养目标的要求，符合应用型本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的要求，

可以通过交互作用实现价值共创。应树立整体、系统和发展的理念,从教育主体体验教育的构建入手,通过对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和考核方式等教育客体体验教育的匹配构建,达到多方参与和融合发展,进而实现教师、学生、学校和社会等多方的价值共创。^[24]

五、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一)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

牛彦飞等人认为,混合所有制办学主要有公办院校吸纳非公有制资本混合办学,民办院校引入国有资本混合办学,公办院校依托二级部门开展混合办学形式,是高职院校通过不同形式资本之间的相互融合和优势互补,充分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共享,是一种具备多元主体的新型办学模式,是高职院校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一大创新和突破,对于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破除阻碍高职院校发展的传统体制机制,解决校企合作缺乏资本纽带和机制保障,以及缓解资本、人才和管理的引进等问题,探索富有活力的办学模式,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要进一步深入剖析和研究基本理论问题,破除固有观念的束缚,依靠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配套政策的完善,以建立健全现代职业院校治理结构为基础,循序渐进,过渡性探索。^[25]

(二) 成人教育内涵与外延

张钊等人认为,成人教育内涵建设与外延拓展的一体性的逻辑叙事,主要源于传统成人教育,尤其是儒家教育文化的实践性本质。而当下成人教育拓展中存在的教育质量、恶性竞争问题、教学滞后问题、人才培养低层问题等都是成人教育内涵建设与外延拓展差异性的现实表象。所以,成人教育内涵建设与外延拓展要均衡、同步、有价值,成人教育内涵建设与外延拓展要中国化、普适化、常态化。^[26]

(三) 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

王宝琴等人认为,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应遵循的原则是在品牌塑造上坚持独创性,知识系统上秉持独立性,研究方法上注重实证性。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有效策略为:注重学科结构的整体性发展,促进学科建设多元互动;加强学科品牌建设,形成学科发展的拳头产品;加强成人教育“元理论”研究,提升学科研究水平。^[27]

(四) 全球成人学习和教育

闫树涛等人认为,2016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发布第三次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旨在评估自2009年以来各国成人学习和教育取得的进展,并以此作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主要努力成果。第三次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以对世界范围内的成人学习和教育的实践审视为基点,展示出成人学习和教育在健康和福祉、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公民和社区生活等领域的重要贡献,为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28]

(五) 成人移动学习

张凤巧等人认为,成人作为生产生活的主体,在终身学习社会视域下,移动学习可以满足成年人个性化和终身化的学习需求,推动学习型社会构建。然而,成人移动学习仍然存在技术滞后、现有移动学习观念不强、缺少系统的学习内容和缺乏有效学习策略等问题。需要加强技术支持,强化学习观念,完善学习内容,进行学习策略指导来提升成人移动学习的质量。^[29]

(六) 学习型城市研究热点及演进

宿静茹等人通过BICOMB2.0软件分析关键词的词频,然后运用SPSS23.0进行共词聚类和多维尺度分析,在对CNKI数据库中有关学习型城市研究的435篇期刊论文分析后发现:学习型城市研究内容呈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趋势,研究的方法趋向多元使研究更具说服力。提出要增强学习型城市与终身学习的契合度,树立由理论研究转向实践探索的风向标,借鉴国内外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有益经验,发挥远程教育对学习型城市建设的作用,为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奠定理论基础。^[30]

(七) 过渡型社区教育模式

杨梅等人认为,过渡型社区是城镇化发展的产物,因农民离开了自己原有的居住地,开始在相对集中的社区内生活而形成的。过渡型社区教育模式以过渡型社区为教育单位,其教育对象主要是过渡型社区内的居民,是为提升社区居民的知识、技能水平,加快经济发展而构建的教育模式。城镇化视域下过渡型社区教育有着扩大就业的服务功能,对社区资源的整合功能,和对公民素质提升的育化功能。构建城镇化视域下的过渡型社区教育模式的对策:1.健全法律与政策体

系,明确战略地位;2.完善管理体制与机制,规范管理行为;3.重视资源开发与利用,完备保障体系,推动过渡型社区教育模式的构建。^[31]

(八) 成人高等教育网络学习

崔亮等人以交互层次理论和学习支持服务理论为指导,借鉴控制原理中的“闭环”概念,构建面向学习支持的学习资源交互式模型,并形成了新的网络学习资源建设与应用模式。模型强调以知识点为单位的资源组织形式,突出面向学习支持的资源设计方式,聚焦以资源为纽带的学习生态构建。网络学习资源的交互式设计从提高学习资源的使用质量出发,用交互式设计的思路推进学习资源的建设。学习资源的交互式设计,改革了学习资源的建设和使用方式,使之能更好地与学生学习需求相协调,体现了学生学习需求在学习资源建设、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32]

六、教师教育

(一) 京津冀高校创业教育师资

冯赵建等人认为,京津冀高校创业教育师资协同发展,是指基于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区位优势互补的原则,搭建协同发展平台,将京津冀三地高校创业教育师资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展。京津冀高校创业教育师资协同发展机制,包括动力机制、传导机制、协调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四部分。京津冀高校创业教育师资协同发展存在顶层设计加强,但政策细则尚不明朗;师资队伍参差不齐,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因此要进行创业教育师资协同发展平台建设,协同发展策略,促进京津冀创业教育的协同发展。^[33]

(二) 教师教育的理想信念教育

梁明伟认为,中小学教师理想信念教育,是培养中小学教师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使中小学教师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意识及价值观念,增强业务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从而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的教育。中小学教师理想信念教育的现实困境:学校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忽视教师主体性;受西方多元思潮的影响,部分教师缺乏正确的价值观;部分教师盲目悲观,缺乏理想信念认同感。加强中小学教师理想信念教育的基本思路:强化理论认知,增强教师积极情感;拓展教育途径,增强教育实践效果。^[34]

(三) 教师教学评价

史晓燕认为,教学评价活动构成主要是解决谁来评、评什么、怎么评的问题,以此为依据,围绕如下问题展开论述:谁来评——评价主体;评什么——评价标准;怎么评——评价模式。因此,应在理念上建立被评教师的主体地位及多元主体评价思想;操作上进行标准建构及评价模式改革。^[35]

(四) 探究性学习与教师专业基础

张文霄等人认为,探究性学习是否得到教师的青睐,教师对探究性学习是否认可,根源在于教师所持教学观。探究性学习起始于探究问题,学生发现问题并将问题表述成可探究的形式并不是天赋的能力,而是需要教师引导培养。探究性学习教师由课堂上的中心主角变为学生学习的辅助者,支持学生探究他们所感兴趣的真实生活问题。从教师能力方面讲,要求更加复杂的专业能力。为推进探究性学习,要确保教师真正理解探究性学习的实质;配套实用技能的培训,提升教师探究性学习的操作能力;改善外部大环境,给教师更多的教学自主权;打破传统的“班、课、时”的限制,给予探究性学习以评估政策的支持。^[36]

(五) 教师教学过程的控制

张文霄等人认为,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具体到课程改革来说,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国家逐渐放松对教师教学的控制,把权力更多地赋予教师、学校和当地:1.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课程内容因地制宜;2.从“教学大纲”到“课程标准”,教学规范模式的蜕变;3.校本课程与研究性学习课程,由学校与教师规划的课程;4.政策舆论引导不断强调教师的课程决策自主权;5.大力推动校本研修,鼓励教师生产和传播教学知识。这五个方面共同指向一个主题,即中央对教学的控制日益放松,基层学校与教师参与课程、专业自主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37]

(六) 全面“二胎”与中小学教师储备

田宝军等人认为,现阶段我国中小学教师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女性教师所占比例逐年升高。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施行,“产假式”缺编问题越发凸显,对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教师管理产生极大影响,也加大了在岗中小学教师

的压力。全面“二胎”政策下对中小学教师储备的建议：1. 适当增加中小学教师编制；2. 拓宽教师来源渠道，优化教师性别结构；3. 完善教育行政部门与中小学教师储备体制、机制；4. 建立“二胎”报备制度，统筹安排顶岗师资。这对于维护我国中小学正常的稳定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完善人才培养结构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38]

（七）农村贫困地区教师资源

马晓红等人认为，农村贫困地区师资的困境为：师资数量不足，班配比低，结构性失衡矛盾依然突出；教师“硬件”建设有一定提高，但整体专业素质依然偏低；农村教师岗位吸引力不够，教师幸福感指数低、专业情感有待改进；城乡教师交流制度存在不足，实效不高。为此，要因地制宜，改进教师编制核定标准，实行“总量控制”和“机动灵活”相结合的方式；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农村学校吸引力；完善城乡教师流动制度，真正提高农村教师专业水平；启动专项检查督导制度和问责制度，保障国家政策的执行力。^[39]

八、中国教育史

（一）洋务派翻译西书与近代教科书

吴洪成等人认为，近代中国经历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内外交困，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洋务派奉行“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先后建立了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两处翻译机构，组织翻译西学书籍，选编教科书，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及思想文化，为我国引进了许多西方先进的技术、理论。这些西学弥补了我国国内技术的短缺，造就一批科学技术方面的人才，在士人的思想中起到一定的思想启蒙和开化的作用，尤其有助于他们改变了“天朝帝国”守旧愚钝的意识，一定程度上使传统的观念得到了解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能够逐渐接受更为丰富深刻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进步。^[40]

（二）清末民初职业教育引入

韩兵等人认为，清末民初，从国外引入的职业教育带有明显的异域化倾向，过多模仿外国学制、聘任大量外籍教习、使用原版授课教材以及生搬国外职教体制等行为都影响了职业教育与中

国实际的有效结合。有鉴于此，近代中国政府及教育家开始有意识地去探寻本土化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他们极为细致地调查并研究了清末民初的国情，继而提出、制定了一些列符合实际情况的职业教育理论和制度。职业教育本土化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的职教事业依然有启示：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须重点突出；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须紧密协作；职业教育与本地产业须有效对接。^[41]

（三）保定莲池书院述评

吴洪成等人认为，保定莲池书院作为清代直隶省最高文化教育中心，是北方最具影响力的一所省级书院。优越的地理条件，政府与社会的合力，书院大师们的榜样作用等因素促使莲池书院打破了原有单一的人才培养目标，为社会培养了各级各类人才，发挥了教育的社会功能。对保定莲池书院兴衰的历史反思：经济能力匮乏使莲池书院陷入了难以为继的窘局；保定莲池书院因其所处位置及机构特点，更为各种力量摆擂争斗之场域，莲池书院被迫退却；书院官学化是国家强化政治对教育统治的手段，体现了社会政治制度对教育的制约，未能跨过教育改制的门槛，无力从转制中走出，而是淹没在战乱与人为困扰、行政乏力无效以及传统文化的包袱重负之中，最终使莲池书院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丧失了自己的元气与活力。^[42]

（四）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教科书

吴洪成等人认为，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适应时代潮流，及时调整出版策略，依据学制课程及教学计划要求，出版了一系列形式多样、质量优良的学校教科书，在民国中小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者以学制的革新为视角，通过对辛亥革命以后至五四运动期间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辑活动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化近代中国教学论史的认识，而且对现阶段教科书的实验与改革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将有裨于我国现阶段中小学教学改革与教科书事业的健康发展。^[43]

（五）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科书

吴洪成等人认为，19世纪70—90年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建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华教育会和广学会三个教育文化机构，从事以学校教科书为主的西方书籍编译工作。此举适应了近代中国早期教会学校及新式学堂的教学需要，有助

于推进新教育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对西学东渐及思想观念进步产生积极作用。但在肯定西方传教士教科书编译活动进步意义的同时，也应对其西方意识观念渗透带来的消极性有清醒的认识，其中所带有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教育色彩。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根本目的自始至终没有改变，部分西方传教士试图通过教科书及一些译著实施西方文化观念的渗透，让西方基督教凌驾并取代中国儒学，实现整个中国基督教化。^[44]

（六）政治家型教育家的生成机制

王喜旺聚焦于张之洞这一典型个案发现，教育家人格是献身教育事业的不竭动力，权变智慧是搭建长袖善舞空间的利器，专业素养与道德操守是凝聚同仁的纽带，而创新性思想体系指引下的教育实践是塑造现实的关键力量。从时间逻辑来看，政治家型教育家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过几十年的磨砺、锤炼，遵循素质奠定、教育思想初步形成、教育思想体系化、社会影响扩大化的生成顺序依次证成。把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打磨、锻造成政治家型教育家，整个社会的人士都应该有的心态是，在创造一定的文化条件后，就静静地等待，让政治家型教育家在适宜的文化土壤中自然生长，“直到它花开烂漫”。只有这样，真正有情怀、有担当、富智慧、多功业的政治家型教育家才可能脱颖而出。^[45]

（七）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在动力

王文利等人认为，在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西南联大能够成为当时及后世所公认的一流大学，与西南联大人们所具有的使命意识密不可分。大学从业人员的使命意识不但能够使他们洞悉学术与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律，足以保证办学方向、路径的正确；而且能够让他们在无外力压迫的境况下，发自内心地尽己所能，用长远的眼光去谋划、践行。如此，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不断跃升当是不期而至的。在当前的一流大学建设中，教育管理与决策者应当将孕育、培养大学学术共同体的使命意识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46]

（八）晋察冀解放区高等教育

张金辉以 1937—1949 年为经，以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解放区的高等教育为纬，以晋察冀解放区主要辖区为面，通过追溯晋察冀解放区高等教育之发展历程，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

教育由短期流动向正规稳定办学的艰难历程、教育体系由战时向平时过渡的艰难探索，分析了晋察冀解放区高等教育在红色基因传承与弘扬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揭示晋察冀解放区高等教育与当代高等教育中“红色元素”积淀的历史关联和必然性，目的是以史为鉴、资政育人。^[47]

八、外国教育史

（一）世界一流大学的智库治理

何振海等人认为，作为公认的一流大学智库，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在长期的智库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以研究所为基础的智库架构、依托内外“旋转门”机制的多样化智库团队、协同化的智库研究模式、多元化的智库影响力实现渠道的建设策略。结合该学院的智库建设经验，我国高校的智库治理应以实体化研究所为基础，切实发挥其智库职能；扩大用人自主权，以灵活的聘任方式打造多元交叉的智库团队；积极实践协同化研究模式，产出高质量智库成果，并广泛拓展成果转化渠道，提高智库的政策影响力水平，打造智库品牌。^[48]

（二）道尔顿制在日本

朱文富等人认为，道尔顿制是一种强调个别差异和个性发展的个别教育制度，它推崇学生自由和师生合作的理念，注重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培养，否定了传统的教科书式的班级授课制。20 世纪初，西方的文化模式和教育思想大量涌入日本，尤其是在欧美新教育思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作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典范的道尔顿制传到了日本。随着日本新教育学者对道尔顿制研究的深入，将其与日本的新教育运动实践结合起来，推动了日本传统教学方式的变革，促进了教师的转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师资力量，推动了日本新教育运动的整体发展，道尔顿制实践后期被军国主义所利用，造成了“明珠蒙尘”的悲剧。^[49]

（三）德国双元制与高职院校教学

王升等人认为，实施开放式教学是彰显高职院校发展特征、提升高职院校培养人才质量的有效举措。德国早在 1969 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中，明确了以“双元制”为核心的职业教育制度，接受“双元制”教育的学生一般在两处学习，一处为专门进行理论、知识、方法培训

的职业教育学校,另一处为提供专业技能实训的企业,学生在学校和企业双重培养下,成为理论、实践两方面达标的优秀人才。对我国高职院校搞好开放式教学启示:1. 只有社会重视职业教育发展,高职办学与社会需求紧密联系,才能提升高职院校人才的培养质量;2. 借鉴双元制,有利于我们树立现代高职教育理念,给予高职院校践行开放式教学以思想指导;3. 德国双元制的“教学做合一”,给予开放式教学以方法论启示;4. 德国双元制校企合作模式是开放式教学的一种理想境界;5. 借鉴德国双元制有利于完善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进一步促进开放式教学发展。^[50]

(四) 俄罗斯大学生科研实践

王英杰认为,在俄罗斯,大学生开展科研活动是大学教学过程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教学过程的继续和深化,是提高能在实践活动中创造性地应用科技成果的学历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作者从俄罗斯政府出台的政策、学校的实施部门、大学生科研活动的具体开展等方面,对俄罗斯大学生科研活动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基础上,提出对我国的启示:完善大学生开展科研实践活动的保障体系;加强对大学生科研方法和创新性思维的训练,提高大学生在未来职场的应变能力;大学生科研实践活动应与教学、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实行导师制,巩固基层科研组织,加强对大学生科研实践活动的有效指导。^[51]

九、比较教育

(一) 比较教育学新马克思主义

李文英等人认为,比较教育学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注重社会冲突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主张学校教育是对社会权利关系的再生产;运用“中心—边缘”的二元分析法,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状态,揭示出教育援助背后的政治意图,强调发展中国家在现行世界教育体系中的被动处境。该范式采用全球化的研究视角,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再生产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研究工具。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丰富了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推动了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加深了国际理解,促进全球范围的教育公平;但也具有偏激和冒进

的倾向。^[52]

(二) 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作

朱鹏举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势:主动服务并经常参与社区发展,与所在城市社区的关系愈加紧密,大学的社会效用更加突显,大学与社区之间已发展成为一种广泛而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我国的启示意义:1. 要认识到大学与社区之间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把“参与”理念引入大学社会服务的整体框架之中,促进大学社会服务由单一服务向双向参与模式的转化和深化;2. 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支持大学参与社区发展,并把“参与”作为衡量大学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3. 大学特别是区域性大学或地方性大学,要利用创造和共享的知识和资源,主动参与社区发展,积极构建与社区的合作伙伴关系,在相互参与、相互促进中实现大学发展和社区建设的合作共赢。^[53]

(三) 美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

李明忠等人认为,“戈登奖”获奖项目是美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典型代表,是引领世界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基于对“戈登奖”获奖项目基本信息的分析可以透视美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三个主要特征:以工程领导者为人才培养目标,以跨学科教育为人才培养方式,以“基于项目的学习”为教学模式。美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实践则为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新工科”建设和工程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借鉴:加强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研究和实践探索;确立工程领导者为工科人才培养目标;加强课程教学与真实企业生产的有效对接。^[54]

(四) 美国加州基础教育问责

郑宏宇认为,学校仪表板的推出是美国加州教育委员会对于ESSA法案倡导的构建“多元化评估标准的创新性评估”的最新回应。新系统在坚持问责制的基础上,设计了多种评估指标,并设计了以颜色和图形来表示的绩效水平,意在反映学区和学校绩效随时间而变化的动态结果。标准化测试时代以学业绩效指数(API)得分来衡量学校绩效的做法正式被淘汰。仪表板的创建优势体现在评估结果不再是单一的数字,更加关注教育公平,支持地方决策。不足之处在于测试结果有待商榷,系统设计较为复杂,系统侧重点

存在异议。^[55]

(五) 美国年度杰出教授

李明忠等人认为,美国年度杰出教授是专门针对全美范围内大学教学卓越的优秀教师设立的教学奖,自1981年设立至今共产生了101位获奖者。年度杰出教授群体呈现出男性为主、多拥有教授职称、多来自学士学位授予院校、集中于基础性学科等特征。作为优秀大学教师的典型代表,年度杰出教授具有高度的教学工作认同感、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谐的师生关系等。借鉴意义:1. 加大教学奖的设置力度并面向广大一线教师;2. 大学教师要积极更新教学理念、不断提升教学能力;3. 教师考核和教学评价要充分重视学生意见。^[56]

(六) 美国中学生涯教育课程

索桂芳等人认为,美国中学生涯教育已形成完善的体系,生涯教育课程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中学生涯教育课程具有课程目标具体,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课程内容整合,全方位培育学生的生涯发展能力;课程实施深入实际贴近生活,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对我国中学生涯教育课程的启示:细化课程目标,整合课程内容,转变课程实施者的观念。此外,中学教师不仅要熟悉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还要熟悉有关生涯方面的相关知识。因此,我国应培养指导生涯教育的专业师资,更好地开发生涯教育课程,使学生得到充分的发展。^[57]

(七) 日本大学创业教育

李文英认为,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的日本长期处于经济低迷状态。为了摆脱经济的不景气,提升大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日本各大学十分重视创业教育的实施。具体做法是涵养创业精神的创业教育目标,丰富而实用的创业教育内容,灵活而多样的创业教育方法,校内外合作的创业教育师资。对我国的启示:创业教育部门和创业援助部门加强合作;创业教育内容要紧密结合实际的创业需求;灵活利用各种方法开展创业教育;充分发挥学校及企业人才和毕业生的作用;加强与其他大学和机构的联系。^[58]

(八) 日本硕士专业学位

李文英等人认为,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受20世纪后半期社会经济形势变化、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以及美国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影响,于2003年正式开展。其发展经历了探索阶段、确立阶段和扩展阶段。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经验:制定专门法令保障专硕制度体系的独立性;适时调整专硕学科种类以适应市场需求;兼顾传统优势学科和弱势特色学科的发展。^[59]

(薛滩:河北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傅松涛.社会生态:教育科学的历史偏离、复位与超越[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 [2]宋生涛,杨晓萍.翻转课堂的基本原理与教学形态[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 [3]潘新民,王升.教学论视域下学习方式概念的新探索[J].教育研究,2018(2).
- [4]朱立明,冯用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理解的现实偏颇与应然路向[J].课程与教学,2018(12).
- [5]董博清,霍素君.学生学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的研究与思考——以河北省义务教育评价为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4).
- [6]朱文富.县域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从“应然”到“实然”的实现路径——兼论《县域内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基于河北省的调查》的实践价值[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8(2).
- [7]刘小丽.河北省小学科技教师专业素养现状与对策探析[J].邢台学院学报,2018(2).
- [8]武慧芳,刘德成,高令阁,王爱玲.河北省高校教师教学学术能力的现状分析——以河北省部分省属本科高校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8(3).
- [9]张二庆.关于中小學生品德发展水平评价问题的思考[J].中国德育,2018(13).
- [10]薛国风.走向新时代的少年儿童组织教育[J].少年儿童研究,2018(4).
- [11]梁明伟,高梦旭.论少年儿童信仰教育中的情感教育法[J].教育探索,2018(1).
- [12]薛国风.“三重视域八种方法”:论少年儿童的理想信念教育[J].中国德育,2018(11).
- [13]薛国风,李苏沙.C管理模式视角下的中小学团队衔接[J].少年儿童研究,2018(8).
- [14]索桂芳.核心素养背景下普通中学生涯教育的几点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18(5).
- [15]高丹阳,赵燕燕,郭伟.BOPPPS教学模式在小学STEM课程的应用探究——以Scratch课程为例[J].教育信息技术,2018(7,8).
- [16]高丹阳,张双梅.基于ADDIE模式的动画型微课的设计与开发[J].中国信息技术教育,2018(18).
- [17]白玫.大学评价制度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8.

- [18] 李兴国,王伟伟.中国大学评价与ESI学科评价指标相关性的统计学检验[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7).
- [19] 张云晶,刘毅玮,赵夫辰.师范院校更名与正名博弈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3).
- [20] 顾岩峰.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及管理模式创新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8.
- [21] 李明忠,杨丽娜,李盼盼,任林芳.我国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主要特征[J].高等教育研究,2018(12).
- [22] 薛国风.从“技”到“道”:研究生教学哲学思想的确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23] 郭伟,赵明媚.“双一流”战略下地方综合性大学国际化发展思考——以“一省一校”入选高校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 [24] 刘金花,韩敏敏,梁秀娟.体验教育:一种值得探索的教育模式——进一步深化应用型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思考[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 [25] 牛彦飞,吴洁,潘新民.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实践探索与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8(3).
- [26] 张钊,安英红.成人教育内涵建设与外延拓展的纠结及廓清[J].中国成人教育,2018(4).
- [27] 王宝琴,许建宝.我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建设的有效策略[J].中国成人教育,2018(2).
- [28] 闫树涛,王慧慧.全球成人学习和教育的进展与愿景——基于第三次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的分析[J].成人教育,2018(7).
- [29] 张凤巧,王欣.终身学习视域下成人移动学习探讨[J].中国成人教育,2018(5).
- [30] 宿静茹,左璐.我国学习型城市研究的热点及演进趋势透析——基于CNKI数据库期刊论文的共词分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8(13).
- [31] 杨梅,刘嘉茵.城镇化视域下的过渡型社区教育模式构建策略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8(3).
- [32] 崔亮,王丽川,王志国.成人高等教育网络学习资源交互式设计研究——面向学习支持的一体化资源设计[J].成人教育,2018(3).
- [33] 冯赵建,高鑫娣,崔亿久.京津冀高校创业教育师资协同发展路径研究[J].教育评论,2018(4).
- [34] 梁明伟.理想信念教育:教师教育的重要内容[J].中国德育,2018(11).
- [35] 史晓燕.教师教学评价:主体·标准·模式·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36] 张文霄,李艳庆.观念与能力:实践探究性学习的教师专业基础[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4).
- [37] 张文霄,李艳庆.对教师教学过程的控制逐渐放松[J].全球教育展望,2018(3).
- [38] 田宝军,展翔.全面“二胎”政策下中小学教师储备问题研究——基于“产假式”缺编问题的背景[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8(7).
- [39] 马晓红,王欣,王继军.农村贫困地区教师资源的优化:困境与对策——基于教育扶贫的视角[J].邢台学院学报,2018(3).
- [40] 吴洪成,郝丽霞.洋务派翻译西书活动与近代教科书的产生[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7).
- [41] 韩兵,孙海军.异域化到本土化:清末民初职业教育的引入与吸收[J].职业技术教育,2018(22).
- [42] 吴洪成,张珍珍.清代书院历史命运的一个缩影——保定莲池书院述评[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8(1).
- [43] 吴洪成,周楠.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辑述略[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8(5).
- [44] 吴洪成,郝丽霞.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早期学校教科书[J].教育与考试,2018(2).
- [45] 王喜旺.政治家型教育家的生成机制:以张之洞为个案的诠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 [46] 王文利,高伟航.使命意识: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在动力——西南联大的经验[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0).
- [47] 张金辉.晋察冀解放区高等教育研究(1937—1949)[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8.
- [48] 何振海,刘尚月.世界一流大学的智库治理策略及其观照——以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为例[J].中国高教研究,2018(8).
- [49] 朱文富,刘双喜.道尔顿制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50] 王升,潘新民,刘兆麟.德国二元制对高职院校推行开放式教学的启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3).
- [51] 王英杰.俄罗斯大学生科研实践管窥[J].教育探索,2018(1).
- [52] 李文英,王薇.比较教育学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
- [53] 朱鹏举,王释云.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及其启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 [54] 李明忠,任林芳,焦运红.美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主要特征——以戈登奖获奖项目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18(1).
- [55] 郑宏宇.美国加州基础教育问责的最新进展——学校仪表板系统释解[J].上海教育科研,2018(4).
- [56] 李明忠,田一洒,任林芳,杨丽娜.美国年度杰出教授的群体特征与教学理念[J].江苏高教,2018(6).
- [57] 索桂芳,高艳春.美国中学生涯教育课程的特点与启示[J].教学与管理,2018(1).
- [58] 李文英.日本大学的创业教育及启示[J].日本问题研究,2018(2).
- [59] 李文英,陈元元.日本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及经验[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4).

教育管理研究

杨今宁

在教育管理研究领域,2018年省内专家学者对教育宏观管理、高等教育管理、职业成人教育管理、基础教育管理等多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若干的有学术水准的理论观点和有效的政策建议。其中对“双一流”大学建设、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国外中学小教育问责制的关注较多,成为研究中的新亮点。

一、教育宏观管理

(一) 办学方略

徐莉对新时代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标准进行了研究。指出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其要旨不仅是速度上的加快,还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跨越,需要新理论内涵与新实践向标的再塑与承载。对学习社会本质内涵及其时代蕴意,在理论指导与实践标准两个方面进行重新梳理和准确把握,需要厘清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新时代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新向标,要站在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新高度上,认清反映时代发展大趋势的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然成为新时代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实践路径及目标框架;二是新时代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理论的新意蕴,全球正经历的新工业革命浪潮,是新工业革命中的一项基本的社会工程,其核心任务是为新时代准备新人和为新人准备新教育;三是新时代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新实践,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是新时代决胜全面小康的重要保障和基本内涵,其中最为基础和紧要的任务是构筑适应新人诞生的新社会形态中的文化教育基础工程。^[1]

潘新民、张燕对学校发展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当前学校的教育改革,用改革促进发展,通常并非一帆风顺;而用改进完善改革,则是助推改革成功的关键手段。只有把改革与改进

结合起来,克服错误的改革心态,才能促进学校发展。学校发展将改革与改进的结合,既要防止改革主导者的“傲慢”,也要注意改革执行者的“消极”;既要重视改革促进发展的重要意义,也要注意通过改进来随时掌握改革中的新情况,制定新措施来化解和纠正改革中的矛盾。正是改革与改进的如影随形,共同推动了学校的扎实发展。^[2]

(二) 区域教育发展

李军凯、刘振东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教育协同起着基础性与先导性的作用。当前,通过三地政府主导、教育主体自发组织等形式,已实现了一些资源共享与交流互动,但因三地的管理体制、合作机制及基础资源不配套等原因,京津冀教育协同仅停留在初级阶段,合作机制与发展路径尚不明确。建议京津冀教育协同以顶层规划为统领、长远共赢发展为原则,在政府主导下建立合理清晰的协同发展策略与机制,最终实现三地的教育协同发展。^[3]

穆桂斌、黄敏以美国硅谷人才集聚规律为视角,探索雄安新区教育发展规划,指出硅谷是当代的全球创新中心。作者简要回顾了硅谷发展历程、人才集聚和创新发展现状,在人才集聚动力、人才集聚平台、人才发展环境、人才培养机制、文化生态系统等方面系统解析了硅谷人才集聚的内在规律,从平台创建、环境发展、大学建设、精神培育等方面,提出了对雄安新区人才集聚和发展的建议。^[4]

(三) 教育管理史

刘京京对蔡元培师范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指出蔡元培的师范教育思想来源于对中国教育国情、教育功用、学生担负历史使命的客观认识。蔡元培重视教师及师范教育的地位及作用,注重师范生“师道”“师德”“师表”的全面培养,主张构建多渠道开放式的师范教育体系。蔡元培的师范教育理论及思想,时至今日依旧对当前加强师范教育地位,提升师范生人才培养质量以及

建构师范生人才培养体系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5]

王永颜认为,清末学校教育转型,属于清末教育改革范畴,作为清末教育转型重要组成部分的直隶教育改革曾一度走在全国前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转型特征上,这场改革是清末直隶教育领域的一项综合改革,具有近现代教育的诸多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河北教育由封建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在转型成效上,直隶教育规模与质量位居全国前列,实现了从封建传统教育到近代教育的初步过渡,为民国时期彻底改变封建教育奠定了前期基础;在因素分析上,取得这样的成效,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和民众的热心参与是基础,有效的筹资措施是保障。由此观之,清末直隶教育转型具有区域教育的代表性,非常值得我们去分析和借鉴。^[6]

吴洪成、蔺士琦系统论述了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述,指出清末教科书审定制与新教育运动紧密联系,旨在为学校教科书市场提供质量指导、技术标准及统一要求。该项制度渊源于清末“新学制”教科书设计方案,形成于学部建立专门审定机构,体现国家规范教育发展的意图。学部编译图书局通过拟订有关审定制规程,具体实施教科书审定活动,对清末兴学运动及社会观念的转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7]

吴洪成等人对中国古代地方教育进行了研究,指出官学的发展与逐步完善是明代重庆教育事业的突出标志。明代重庆官学数量急剧增加,地理布局不断扩大,教育对社会影响力提高。他从教育目的、办学经费、学生管理、办学环境诸方面分析明代重庆官学教育的办学状况,考察其发展轨迹。^[8]明代邯郸书院的发展呈阶段性变化,其书院以官办为主,明代邯郸书院数量高于河北其他区域。他们以3所书院为例,描摹出邯郸书院的教学活动概况,并主要陈述书院的教学目的、教学课程、考课及祭祀活动等相关内容。^[9]雄安新区所包括安新、容城及雄县三地的古代书院,从元代发端,至清代达到鼎盛,其中以安新书院最为突出。他们列数了其中6所书院教育教学状况,指出雄安新区古代书院对当时的人才培养、学术传播及地域思想文化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其间积淀的资源及优秀传统也有裨于当前区域大学教育谋划、城市品位的提升以及

经济产业的发展。^[10]

(四) 国外教育管理

网络课程质量保证是我国网络教育领域最受关注却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钱玲、赵燕燕认为美国 Quality Matters 已成为美国教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课程质量评价标准。他们通过对美国 Quality Matters 的深度探讨,分析其成为美国网络课程评价与质量保证领军者的核心竞争力:独特的课程质量评价标准体系、专家同行评审机制、多元的认证项目和扎根于院校的理念。因其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并以教育技术研究为坚实基础,可为我国网络课程评价的顺利开展提供新思路。^[11]

白玫通过对美国职前教师教育认证制度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认为美国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NCATE)自1954年成立以来,引发了来自各方的论战。论战的历史之长,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之多,甚至动摇其存在的根基。NCATE在每次论战结束之后,都对自身进行各种改革和重构,以至于成为了美国国家认证体系中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非官方机构。尽管2013年被教师培养认证委员会(CAEP)所取代,但是对NCATE认证目标、认证标准和认证程序的价值反思以及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的探究仍然是CAEP面临的问题。^[12]

二、高等教育管理

(一) 高等教育办学方略

郭健基于河北大学办学思路与实践的分析,对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河北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论述。指出,一流大学的逻辑特征是:以一流为目标,扎根中国大地发挥后发优势;以学科为龙头,加强与国家和区域协同创新;以绩效为杠杆,在服务面向中追求卓越;以改革为动力,在与区域融合中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以入选“一省一校”的14所高校为着眼点,认为地方高校在一流大学建设中的角色定位是:应成为重要参与者;应提高国际竞争力;应重视培养大师。基于河北省“双一流”建设面临的形势分析,对河北省加快建设“双一流”大学的举措建议是:优化学科布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试行“人才特区”、改革科研体制机制、持续强化服务面向、全面推进综

合改革、加强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13]

齐艳杰、薛彦华从“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剖析河北省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指出，“双一流”建设作为国家重要战略部署，对地方高水平大学的转型与发展将起到很强的推动作用。河北省在争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的短板表现在：领军人才短缺，高层次人才不足；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慢，教育质量偏低；高等学校重点建设学科占比低，专业同质化严重；普通本科在校生数占比低，学科门类布局不合理；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低，高等教育经费不足。其重要影响因素在于：地缘经济的“虹吸”效应与恶劣自然环境“强覆盖”；高等教育改革路径与高等学校发展思路同质、滞后；高等教育宏观行政管理缺位、越位并存；“双一流”建设经费投入相对较低，且使用分散。建议通过“两个突破”“三项工程”“四个保障”三条路径，统筹推进河北省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14]

冯用军等人基于 C9 巡视报告与整改通报的文本，对中国一流大学巡视问责与治理实践范式进行了研究。指出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中央巡视组对中央直管高校党委开展了专项巡视，这是党和国家治理高等教育的重要体现。以国家首批“985”工程重点建设的 9 所中国一流大学及其对标院校的 36 份专项巡视报告和整改情况通报文本为基础，运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和文本分析法凝练出“巡视问责”的五个核心范畴：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中的核心领导能力、干部选拔任用监管、基建后勤服务监管、经费收支使用监管和内部校院分权治理。之后进行编码质化，进而分析中国一流大学党委履责与治理的普遍问题和特殊问题，据此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对策建议。^[15]

（二）高等教育学术管理

边宇璇基于“行动力”的视角，对高校职业指导教育体系改革进行研究。指出现阶段，高校职业指导教育面临着与社会变化节奏相矛盾、与学生成长发展需求相背离、与学生现实收获有差距等问题。她以激发“行动力”为改革着眼点，提炼后现代主义建构论、混沌理论和教练技术的诸多理念，促使教育体系具有建构性、适应性和探究性。认为教育体系改革策略包括构建以推动“行动力”为目的的课程体系，构建多层

次激发“行动力”的教育体系，构建侧重反馈行动效果的评价机制，积极推动生涯教育理念在中小学各学科中不断推广。^[16]

李明忠以 15 个教育学国家级特色专业为例，对教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径进行了探析。指出教育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存在目标定位模糊、专业认同度低、毕业生就业出路不畅等困境。因此，积极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为主要着力点。其中，15 个教育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在充分结合社会需求、学院办学目标和自身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做出“研究—实践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准确定位和理性选择，并在这一目标指导下探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路径：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科学设置结构合理的课程体系、努力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方式、积极搭建人才培养保障平台。^[17]

（三）高等教育安全管理

李晓华对高校校园安全管理的法治路径进行了探析。指出高校校园安全管理存在缺乏系统法律保障、执法主体不明、管理体制不科学等主要问题。鉴于此，应以科学立法的思维将高校校园安全管理纳入立法工作日程，确立其立法层次及调整对象；以严格执法的思维明确校园安全执法主体和执法权限，提升执法队伍整体素质和履职能力；以公正司法的思维建立和完善申诉制度、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维护师生合法权益，确保高校安全稳定。^[18]

（四）高等教育史

王文利、高伟航以西南联大的经验为视角，探讨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在动力。指出在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西南联大学人以学术救国为己任，将传承和发扬中国学术文化作为学人们所必需的使命意识与担当。纵然艰难困苦，西南联大学人仍旧忘我地投身于学术研究之中，通过课上与课下的“勉力传道”，为中国学术的繁盛与传承而殚精竭虑。西南联大学人的学术使命意识是西南联大能够成为一流大学所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其重要性体现在：使命意识是学术与教育事业的从业者葆有虔敬之心的前提；使命意识是学术与教育事业的从业者自律的基础；使命意识是学术与教育事业的从业者树立长程意识的先导。建议在当前的一流大学建设中，教育管理与决策者应当将孕育、培养大学学术共同体的使命意识

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19]

(五) 国外高等教育

美国教育智库的发展与治理是年内研究的一个热点。任宇红研究发现,美国教育智库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按需设置组织结构自由灵活;研究领域广阔,紧密服务于本国教育决策;运用科学合理的监督与评审评价机制。借鉴美国教育智库的发展经验,国内教育智库的发展可以尝试多元化发展,激发自身活力;以国家战略为主导,促进智库作用的发挥;突出内涵建设,完善国内智库评价机制等,来促进国内教育智库作用的充分发挥。^[20]何振海等人以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为例,研究认为它作为公认的一流大学智库,在长期的智库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以研究所为基础的智库架构、依托内外“旋转门”机制的多样化智库团队、协同化的智库研究模式、多元化的智库影响力实现渠道等建设策略。结合该学院的智库建设经验,我国高校的智库治理应以实体化研究所为基础,切实发挥其智库职能;扩大用人自主权,以灵活的聘任方式打造多元交叉的智库团队;积极实践协同化研究模式,产出高质量智库成果,并广泛拓展成果转化渠道,提高智库的政策影响力水平,打造智库品牌。^[21]田山俊等人对美国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研究领域著名的大学智库之一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进行了研究,指出该研究所自1949年创建至今,基于大学智库建设的内在逻辑与现实需求,在构建多元化研究团队、拓展多元研究领域、拓展多元化的成果产出形式和影响力实现渠道、开辟多元化的学术与经费资源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多元化治理机制,为其成长为全球知名的一流区域政策研究机构和高水平大学智库奠定了制度基础。^[22]

在美英社区学院的管理研究方面,郝理想对美国社区学院研究中心的“引导路径”改革进行了研究,指出它是在美国社区学院协会“路径”项目基础上实施的旨在提高社区学院学生毕业率的教育革新。改革帮助社区学院学生重新制定学习方案的“引导路径”,引领学生树立最终目标,帮助学生选择适合的学习方案,为学生量身定制学习目标,确保学生学习成效,完全打破了以往“自助”式的教育模式,开启了美国社区学院的重塑之路,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目前

它也面临观念、制度和技术操作等方面的挑战。^[23]朱鹏举等研究认为,进入21世纪美国大学院校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大学与社区之间构建起了一种更加广泛且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成为这个时期美国大学发展的典型特点,并且经历从单向服务到双向参与的发展过程。^[24]王释云研究指出,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社区教育的国家,其在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发展中,重视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队伍的组织建设、严格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的准入资质、强调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的职中培训、鼓励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能力的自我提升、保障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的经费来源等方面有着成功经验。^[25]

朱文富、姜雪对发达国家的短期高等教育进行了研究,指出短期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兴起的新的教育类型,20世纪中后期,在主要发达国家得到大规模发展,目前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发挥出巨大的实践价值。它促成了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向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的顺利过渡,极大改变了现代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中高层次实用技术人才,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支撑。发达国家短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我国应从战略高度确立高等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正确处理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关系,做好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对接及融合,使之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26]

三、职业、成人教育管理

(一) 职业教育办学方略

王晶等对我国职业教育制度建设作了现代化审视,指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制度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必然要求。然而在现实中,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建设还缺乏对生命的关怀、对个性的培养、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照。事实上人不是制度建设的主体,更是制度设计的核心、制度建设的目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制度建设的基本目的在于促进职业人的人格、能力与生涯发展。为此,在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制度的过程中,需要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满足人的发展需求、保障人的发展自由、完善促进人们

发展的机制。^[27]

李欣旖、闫志利研究了新时期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分析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广大民众就业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确认新时期职业教育供给侧面临着投资结构、治理结构、师资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布局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等八项重点改革任务,建议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28]

(二) 区域职业教育发展

李欣旖、闫志利基于历史视角,分析了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特点与路径,指出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是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历史根基。他们追溯了京津冀一体化的地缘、文缘、物缘、亲缘与京津冀行政区划变迁,认为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具有受行政区划变迁的影响、需要完整理念的支撑及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推动三个特点。实现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需明确一体化主体、完善一体化制度、优化一体化环境、强化一体化动力、提升一体化效率。^[29]

李欣旖、刘硕等人对京津冀职业教育资源共享模式进行了研究。指出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不应以行政区域为疆界,应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目前,京津冀职业教育资源存在严重失衡现象,职业教育资源流动存在行政性壁垒和制度性障碍,阻碍了一体化发展进程,影响了职业教育资源利用效率。认为应建立师资资源共享机制、课程资源共享机制、教学资源共享机制、教育经费均衡机制与教育政策共享机制。^[30]

李欣旖等人基于 2006—2015 年数据,对京津冀中职教育资源的均衡性与效率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北京市、天津市中职教育财力和物力资源投入,天津市人力资源投入均存在冗余现象,河北省中职教育资源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北京市中职教育资源产出欠缺比例较大,天津市近于平衡状态,河北省已达平衡且效率相对最优。提高京津冀中职教育资源的均衡性和效率性,应加快中职教育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促进区域中职教育资源的合理流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财政拨款制度,加强财政资金投入的追踪问效,推进京津冀中职教育一体化发展。^[31]

(三) 中等职业教育管理

曾姗等人认为专业结构调整是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首要任务。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职学校专业结构调整应以市场需求、学生需求和学校需求为依据,遵循科学性、适应性、效益性、发展性四项原则。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积极推进中职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创建技术技能人才供求信息平台,强化制度供给;中职学校应发挥专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作用,及时实施区域产业发展趋势调研,持续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不断丰富专业结构调整内涵;注重社会各个层面的积极性,以市场化方式推动专业结构调整,不断增强中职学校的社会吸引力,持续优化专业结构调整的社会生态环境。^[32]

李欣旖、闫志利对近十年我国成人中专发展趋势及对策进行了研究。指出近十年来我国成人中专学校数量、教职工数量、专任教师数量均呈“逐年下降”趋势,招生数量、在校生数量呈现“先减后增再减”趋势,资金投入“逐年增加”趋势,办学形式由“封闭”转向“开放”,学校实力由“薄弱”逐步“趋强”,教学模式由“固定”转向“灵活”,制度管理由“分散”转向“统一”等特点。针对成人中专认识尚待提高、办学定位尚待清晰、治理机制尚待完善、办学体制尚待深化等问题,建议推进成人中专与社区教育、远程教育等相融合,继续保持中职教育特色,持续发挥成人教育优势,积极拓展社会经济服务领域,深化办学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新时期成人中专的持续发展。^[33]

(四) 职业教育师资管理

李欣旖、闫志利指出,我国职业教育师资培育制度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的发展,重要性日益凸显,培育体系日渐完善,并逐渐向教师教育转型,呈现出联合培养趋势。基于培育主体多元、类型需求多样的现实,我国职教师资培养目标应确定共性目标和个性目标两个层次,积极推进培育范式转换,包括培育主体由“单独”转换为“联合”,培育方式由“单一”转换为“多重”,培育内容由“供给”转换为“需求”,培育标准由“无序”转换为“规范”,培育环境由“封闭”转换为“开放”。^[34]

吴芳、郝理想等人对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制度进行了研究。通过梳理我国职教教师企

业实践制度,分析了1996年《职业教育法》颁布以来,中央、地方制定的有关教师企业实践的规章制度,回顾了教师企业实践制度发展的三个阶段——问题探索时期、制度建立时期、制度丰富时期。认为存在的问题有政府管理体制不顺、企业利益缺乏保障、学校保障措施不到位、教师动力不足等。建议政府优化管理体制、企业细化实施细则、学校完善培训管理、教师做好核编工作。^[35]

(五) 成人教育发展策略

闫树涛、王慧慧基于第三次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分析了全球成人学习和教育的进展与愿景。指出2016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发布第三次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旨在评估自2009年以来各国成人学习和教育取得的进展,并以此作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主要努力成果。第三次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以对世界范围内的成人学习和教育的实践审视为基点,展示出成人学习和教育在健康和福祉、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公民和社区生活等领域的重要贡献,为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36]

刘奉越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分析了全球成人学习发展的现状与前景。指出在倡导终身学习和构建学习化社会的背景下,随着全球致力于成人学习的推进,成人学习在国际社会关注、建立非正式学习成果认证体系、治理走向“共同利益”、加大融资力度、凸显“全纳”理念、注重质量监测等方面取得可喜的进展,但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机遇与挑战。鉴于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未来全球成人学习的发展将会呈现出加强监测、彰显公平、推进优质学习和注重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前景。^[37]

徐莉探索了终身教育视角下如何定义成人教育。指出终身教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成人教育发展相伴相生、密不可分,从而导致了终身教育理论上纠缠不清的各种问题无不与成人教育问题密切关联,特别是成人教育概念及其使用上的混乱和模糊,一直困扰着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走出当前终身教育的理论困境,必须从对成人教育的准确定位寻求出路。一方面,要跳出传统学校的框架,在终身教育新视角下定位成人教育,另一方面,又不能把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混

为一谈,终身教育理论必须从成人教育化的误区中走出。^[38]

侯小雨、闫志利指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学分银行、向学习者提供教育培训“技能包”的具体安排,体现了服务广大民众终身学习、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理念。基于培训包和学分银行的起源及功能表现,立足我国培训包应用与学分银行建设现状,推进培训包与学分银行融合配套使用,可最大限度发挥两者效能,加快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建设进程。要高度重视域外经验的“本土化”改造,特别关注融合过程的“阶段化”特征,积极推进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努力实现管理体系的“统一化”,尽力顾及各种认证的“适应性”。^[39]

(六) 农村职业教育管理

刘奉越通过分析职业教育与农村“空心化”治理的耦合作用机理,揭示要素、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及耦合所存在的阻力,提出促进职业教育与农村“空心化”治理耦合的路径:以增强内生力为旨归、彰显地方性、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注重资源整合、健全保障机制。^[40]

刘奉越、陈科指出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既是提高农民素质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其价值和意义越来越得以彰显。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分析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利益相关者的类别、属性以及社会关系网络,探讨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运行机制,并从政府、培育机构、农民、行业企业等多个利益相关者层面提出相应的促进路径,以助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健康有序地实施。^[41]

刘硕、王陪航等人在河北省遵化市调查发现,农业龙头企业不仅能够延伸产业链、提升农业综合效益,也具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功能。内在机理表现为对内部员工的职业培训与员工发展环境的营造,促进农民逐步实现职业化、新型化和学习终身化;外在机理表现为对基地农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农民逐步实现专业化、社会化和生产经营一体化,具体表征为农民身份、地位、素质、情感等发生一系列变化。充分发挥农

业龙头企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作用,应以企业规模扩张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总量,以职业培训带动农民素质提升,以经营业态改变农民务农行为,以效益提高激发农民务农情感,以现代化生产方式强化农民务农动机。^[42]

权琨、颜铭在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视野下,探索农民工继续教育新思路。指出文化资本理论是皮埃尔·布迪厄教育思想的有机构成,是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民工继续教育发展的重要依据。根据布迪厄的观点,文化资本与教育发展有着一脉相承、相依相存的关系,即个人发展与其受教育程度具有高度相关性。因此,在探析布迪厄文化资本价值内涵的基础上,对农民工继续教育进行了理性思考,提出农民工继续教育新思路:加快惯习资本生成,提高农民工社会适应能力;加强物化资本建设,促进农民工知识结构优化;完善文化资本制度形态,保障农民工价值权益。^[43]

(七) 技术工人培养管理

张倩、宁永红探究了改革开放后企业参与技工人才培养的情况。指出从企业参与技工人才培养由全程参与、部分参与、校企分离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不同阶段,企业的参与程度、参与特点、参与内容、参与效果有所不同。在此基础上,评析企业参与技工人才培养的动力来源、利益博弈、合作层次、参与过程等。认为未来企业参与技工人才培养要坚持政策引导,推动以行业企业为主导办学;大力发展现代学徒制,促进企业全程参与技工人才培养;建立利益平衡机制,带动企业参与技工人才培养积极性;完善并落实相关法律,保证企业参与技工人才培养有法可依。^[44]

(八) 职业教育管理史

韩兵、孙海军指出,清末民初,从国外引入的职业教育带有明显的异域化倾向,过多模仿外国学制、聘任大量外籍教习、使用原版授课教材以及生搬国外职教体制等行为都影响了职业教育与中国实际的有效结合。有鉴于此,近代中国政府及教育家开始有意识地去探寻本土化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他们细致地调查并研究了清末民初的国情,继而提出、制定了一些列符合实际情况的职业教育理论和制度。职业教育本土化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的职教事业依然有启示与借鉴

意义。^[45]

(九) 国外职教管理

杨燕萍等人研究了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立法的动因,确认职业教育立法受到经济发展、社会认知、政治局势、职业教育发展、域外经验、职业教育理念的推动,各类动因推动立法有其运行轨迹,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借鉴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立法经验,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职业教育法律规制,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程。^[46]

四、基础教育管理

(一) 基础教育评价体系

董博清、霍素君指出,学生的学业发展水平是评价学校教育质量的主要内容。他们结合河北省义务教育的性质及现实情况,借鉴国内外学业评价的相关项目,考量学业评价的维度,整体构建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包括整体框架、内容结构、评价方法等方面,以期为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的制订与实施提供参考。^[47]

戎晓芳、索桂芳构建了初中生学业负担评价指标体系。认为近年来初中生的学业负担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构建一套相对合理、完善的初中生学业负担评价指标体系以对初中生的学业负担进行监控,是达到减负效果的一项有效措施。构建的这一初中生学业负担评价指标体系,共包括4项一级指标、16项二级指标和42项三级指标。其研究过程主要经过四个阶段:对基本概念、构建原则及构建依据进行理论梳理;通过问卷调查进行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通过德尔菲法进行专家调查,修订指标体系;通过进行区分性、独立性及信效度分析,对指标体系进行验证。^[48]

(二) 基础教育教师管理

杜芬娥对台湾地区特殊教育教师资格制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台湾地区的特殊教育教师资格制度在相关政策、职前教育、资格认定以及职后教育等方面都有其可借鉴之处。其特点为:政策制度健全且执行有效;职前教育课程设置具有科学性;资格准入标准较高;资格考试科目设置较全面具体;职后教育形式多样化。基于此,建议大陆以加强特殊教育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为前提,完善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体系,设置特殊教育教师

入职标准,建立严格的资格考试机制,从而保障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49]

(三) 基础教育管理史

吴洪成、于明珠对日本侵华时期华北沦陷区中小学教科书进行研究。指出日本侵华时期,日伪政权实现奴化教育目的的基本保障在于教育资源,而最有效的呈现文本方式是教科书。日伪统治者对华北沦陷区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与审定极为重视,同时这也是实施奴化教育的重要环节。华北沦陷区中小学教科书体现出以侵略者意图为中心、充斥封建传统思想文化以及注重日本化取向等特点,其本质在于妄图控制中小学生的思想,使其成为殖民统治下的“顺民”。^[50]

(四) 国外基础教育管理

郑宏宇研究了美国加州基础教育问责的最新进展。指出2017年3月15日,加州学校仪表盘正式上线发布,这是本次加州基础教育问责制改革的重大特色。学校仪表板的推出是美国加州教育委员会对于ESSA法案倡导的构建“多元化评估标准的创新性评估”的最新回应。学校仪表盘是一个集多元评估指标于一体的在线评估系统。新系统在坚持问责制的基础上,设计了多种评估指标,并设计了以颜色和图形来表示的绩效水平,意在反映学区和学校绩效随时间而变化的动态结果。标准化测试时代以学业绩效指数(API)得分来衡量学校绩效的做法正式被淘汰。加州社会各界普遍对于新系统持积极态度,但也不乏批评之声。^[51]

国外基础教育师德问责制研究,是年内的一个研究热点。乔花云、司林波指出,英国中小学教师管理具有师德问责立法动态发展、问责程序规范完整、师德培训一脉贯穿、师德规范具体可操作、师德与绩效挂钩的特点,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中小学教师师德问责制度体系。借鉴英国的有关经验,我国中小学教师师德建设应关注健全问责立法、注重细化问责规范、将师德培养纳入教师培训全过程,以及将师德与绩效评价结果全面挂钩等方面。^[52]司林波、彭鑫指出,德国基础教育问责制发展已较为成熟。不仅构建了包括政府、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多元化问责主体系统,还形成了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录用和培养制度、评价制度及惩戒制度等相辅相成的教育问责制度体系,共同构成独具特色的中小学教育问责

制。问责主体的多元性与协调性、问责配套制度完善且具有较强操作性和问责惩戒严厉性是其显著特点。借鉴德国中小学教育问责制的成功经验,我国中小学教育问责制应该从提高我国师范生录用标准、健全多元化问责主体参与的评价体系、健全教育督导制度、健全问责奖惩机制等方面加以完善。^[53]

乔花云、吴振其指出,日本基础教育发展相对成熟,得益于完善的中小学师德问责制度。目前日本已经形成了中央文部科学省问责、地方教育委员会问责、校长问责以及学生、家长联合会、媒体问责等密切协作的师德问责主体和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录用和研修制度、评价制度及惩戒制度等相辅相成的师德问责制度体系。较高的问责法制化水平、多元化和协同性的问责主体、完善且操作性强的问责配套机制是日本中小学师德问责制的显著特点。借鉴日本中小学师德问责制的成功经验,我国中小学师德问责制应该从健全问责法律法规、强化异体多元问责主体、确定科学的考评指标、积极推进问责文化建设等方面寻求完善路径。^[54]乔花云、刘畅指出,新加坡历来重视对国家公职人员道德情操的培养,教师作为公务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形成完整的中小学教师师德问责制度,包括规范化的教师准入和发展机制、多元化的问责主体参与制度、完备的教师师德评价内容、人性化的教师师德评价方式,以及科学的教师师德惩戒制度。整个教师师德问责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新加坡中小学教师师德问责理念先进、主体多样、制度完善、程序公平以及问责惩戒点低、处罚力度大等特点。新加坡中小学教师师德问责制建设的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启发价值,我国应当重视国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完善中小学教师师德问责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加强对教师师德问责的严厉度并建立完善的教师准入及评价标准相结合的教师进出机制,以此保障我国师德水平的整体提升。^[55]

(杨今宁: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徐莉.新时代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标准[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 [2]潘新民,张燕.学校发展机制:改革还是改进?[J].教育科学研究,2018(9).
- [3]李军凯,刘振东.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

- 策[J].北京教育,2018(3).
- [4] 穆桂斌,黄敏.美国硅谷人才集聚规律及对雄安新区的启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 [5] 刘京京.蔡元培师范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教育评论,2018(2).
- [6] 王永颜.清末直隶学校教育转型的特征、成效与因素分析[J].江汉学术,2018(6).
- [7] 吴洪成,蔺士琦.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述论[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 [8] 吴洪成,蔡晓莉.明代重庆官学述评[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4).
- [9] 吴洪成,翟蒙毅.明代邯郸书院初探[J].邯郸学院学报,2018(3).
- [10] 吴洪成,宋娜娜.雄安新区古代书院探析[J].保定学院学报,2018(5).
- [11] 钱玲,赵燕燕.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的网络课程质量保证体系——美国 Quality Matters 核心竞争力及启示[J].开放教育研究,2018(5).
- [12] 白玫.从 NCATE 到 CAEP:美国职前教师教育认证的价值反思[J].外国教育研究,2018(4).
- [13] 郭健.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河北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基于河北大学办学思路与实践的分析[J].社会科学论坛,2018(5).
- [14] 齐艳杰,薛彦华.论“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河北省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5).
- [15] 冯用军,赵雪,秦惠民.中国一流大学巡视问责与治理实践范式研究——基于 C9 巡视报告与整改通报的文本分析[J].大学教育科学,2018(4).
- [16] 边宇璇.基于“行动力”的高校职业指导教育体系改革[J].中国成人教育,2018(3).
- [17] 李明忠.“研究—实践型”教育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路径探析——以 15 个教育学国家级特色专业为例[J].保定学院学报,2018(5).
- [18] 李晓华.高校校园安全管理的法治路径[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 [19] 王文利,高伟航.使命意识:一流大学建设的内在动力——西南联大的经验[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0).
- [20] 任宇红.美国教育智库发展的脉络、特征及借鉴[J].中国成人教育,2018(11).
- [21] 何振海,刘尚月.世界一流大学的智库治理策略及其观照——以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为例[J].中国高教研究,2018(8).
- [22] 田山俊,王婧茹.一流大学智库的多元化治理——基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分析[J].高教探索,2018(9).
- [23] 郝理想.美国社区学院的重塑之路——社区学院“引导路径”改革的进展与挑战[J].比较教育研究,2018(3).
- [24] 朱鹏举,王释云.美国大学与社区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及其启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 [25] 王释云,胡国庆.英国社区教育工作者专业化的经验及其启示[J].中国成人教育,2018(5).
- [26] 朱文富,姜雪.发达国家的短期高等教育:历史变迁、实践价值及其借鉴[J].中国高教研究,2018(11).
- [27] 王晶,郑国萍,孙晓涛.反思与构建:职业教育制度建设的现代化审视[J].现代教育管理,2018(6).
- [28] 李欣旖,闫志利.新时期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J].职业教育研究,2018(7).
- [29] 李欣旖,闫志利.基于历史视角的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特点分析与路径选择[J].教育与职业,2018(22).
- [30] 李欣旖,刘硕,闫志利.京津冀职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模式与机制构建研究[J].新疆职业教育研究,2018(2).
- [31] 李欣旖,胡旭睿,闫志利.京津冀中职教育资源的均衡性与效率性研究——基于 2006—2015 年面板数据的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27).
- [32] 曾姗,闫志利,玄远程.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职学校专业结构调整的依据、原则与策略[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6).
- [33] 李欣旖,闫志利.近十年我国成人中专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5).
- [34] 李欣旖,闫志利.我国职教师资培育的制度演进、目标定位与范式转换[J].教育与职业,2018(3).
- [35] 吴芳,郝理想,吴建雯.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6).
- [36] 闫树涛,王慧慧.全球成人学习和教育的进展与愿景——基于第三次成人学习和教育全球报告的分析[J].成人教育,2018(7).
- [37] 刘奉越.全球成人学习发展的现状与前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J].中国远程教育,2018(5).
- [38] 徐莉.终身教育视角下如何定义成人教育[J].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学报,2018(2).
- [39] 侯小雨,闫志利.培训包与学分银行的融合效应与实现路径研究[J].成人教育,2018(4).
- [40] 刘奉越.乡村振兴下职业教育与农村“空心化”治理的耦合[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7).
- [41] 刘奉越,陈科.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J].职教论坛,2018(5).
- [42] 刘硕,王陪航,闫志利.农业龙头企业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机理研究[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18(4).
- [43] 权琨,颜铭.皮埃尔·布迪厄文化资本视野下农民工继续教育新思路[J].中国成人教育,2018(5).
- [44] 张倩,宁永红.改革开放后企业参与技工人才培养的回顾与展望[J].职业技术教育,2018(25).
- [45] 韩兵,孙海军.异域化到本土化:清末民初职业教育的引

人与吸收[J].职业技术教育,2018(22).

- [46]杨燕萍,丁义娟,杨榕,王大江.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立法的动因研究[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 [47]董博清,霍素君.学生学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的研究与思考——以河北省义务教育评价为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4).
- [48]戎晓芳,索桂芳.初中生学业负担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J].课程教学研究,2018(1).
- [49]杜芬娥,李乔峰,隋春玲.台湾地区特殊教育教师资格制度的研究[J].现代特殊教育,2018(1).
- [50]吴洪成,于明珠.日本侵华时期华北沦陷区中小学教科

书述论[J].社会科学论坛,2018(5).

- [51]郑宏宇.美国加州基础教育问责的最新进展——学校仪表盘系统释解[J].上海教育科研,2018(4).
- [52]乔花云,司林波.英国中小学师德问责制述评[J].上海教育科研,2018(9).
- [53]司林波,彭鑫.德国中小学教育问责制述评及启示[J].中小学教师培训,2018(7).
- [54]乔花云,吴振其.日本中小学师德问责制述评及启示[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8(10).
- [55]乔花云,刘畅.新加坡中小学师德问责制的内容、特点及启示[J].中小学教师培训,2018(1).

课程与教学研究

孙 雪 邢秀茶

2018年河北的课程与教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应用型大学课程体系、学科课程改革、校本课程开发与创新创业课程、教学理论与教学评价、教学模式与方法变革、教育技术变革、翻转课堂等方面,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实践成果较多,应用型人才培养、思想政治教学成果相对突出。

一、西方课程理论借鉴

应用型人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力量,完善的课程体系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研究就变得尤为重要。德美两国应用型教育发展较为成熟。贾东立以凯泽斯劳滕应用技术大学和弗莱贝格工业大学为例,分析德美两国课程体系:第一,德国重点培养学生掌握机械工程相关基础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具备良好的多学科背景,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工作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美国培养人才的关键在于丰富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重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第二,德国应用型人才实施模块化课程教学模式,分为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两大部分,基础课程学分较低,而专业课程学分较高;美国则与之相反,但二者的学分分布都以深入分析人才培养目标为基础,实现了人才能力重点化培养。作者提出我国应坚持以开放的视域,制定本土化的应用型人才课程体系,坚持重建课程目标、调整课程内容、

优化课程结构;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层次上与高等教育相融合,在类型上与技术教育相融合,既具备高等教育特征,也强调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适度性与高效性始终影响着课程体系的完善。^[1]

“戈登奖”获奖项目是美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典型代表,是引领世界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李明忠等人基于对“戈登奖”获奖项目基本信息的分析,总结出美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三个主要特征:以工程领导者为人才培养目标,以跨学科教育为人才培养方式,以“基于项目的学习”为教学模式。研究对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和“新工科”建设提供了借鉴:第一,加强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研究和实践探索;第二,确立工程领导者为工科人才培养目标;第三,加强课程教学与真实企业生产的有效对接。^[2]

陈雪梅以美国9年级CPMP教科书为例,研究了美国高中教科书概率专题的设计特色,认为CPMP概率课程的设计是采取概率与统计的整合视角,强调概率与统计的相互补充,把概率的计算、估计与建模置于数据分析以及非正式的统计推断的情境之下。随机化对于得出统计结论有两个重要的用途。第一,从总体的一个随机样本中收集数据,考虑了数据变异的因素,得出的结论可作为总体的有效结论;第二,将个体随机分配

到不同的处理方法中,能保证公平性,使得不同的处理方法都能有效地参与。统计意义下的显著性结果不太可能仅仅由偶然性造成,而这一点只有在随机性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评价。^[3]

二、校本课程与学科课程

宋生涛对多元文化教育理念支持的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多元文化校本课程开发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遵循我国民族教育双重性,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办学定位与办学特色,挖掘和选择民族生熟悉的环境文化知识,开展贴近民族生生活,有助于民族生发展的课程实践活动。指出,多元文化校本课程评价是一个民主开放的过程,关注民族生在多元文化的学习环境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体验;多元文化校本课程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改进和完善课程,确立开放、多元的课程评价观;坚持人文主义的评价取向、过程取向的评价和主体取向的评价,使评价发挥激励、质监、调控与甄别的功能和作用,促进多元文化校本课程建设不断规范。^[4]

在“创新”“创业”理念的大力推行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闫凤霞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地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地方本科院校需根据的新形势,对互联网时代创新创业型人才的新需求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进行研究。作者针对当前创新创业课程设置中存在现实问题,提出构建新颖的课程体系。内容包括创新创业课程理念及目标的更新,网络课程资源整合及在线教学平台建设,拓展多元化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师资,“互联网+”时代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考评机制。^[5]李凤学结合河北北方学院《创业学》课程教学情况,阐述了目前应用型大学开展创业教育的必要性和创业教育的基本内容。在遵循创业教育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从励志教学、平台教学和角色转换教学三方面探索了适合该校学生的《创业学》课堂教学方法。^[6]

为提高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土木工程专业英语》课程的教学效果,宣苓艳以 OBE(成果导向教育)教育理念为教改指导思想,以土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为教改对象,设计了土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的教学内容、教学组

织和教学评价等教学环节,在河北工程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学生中进行了教改实践。具体做法是:将土木工程专业英语中导论性的、通识性的一些阅读材料提供给公共英语教学,在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土木工程导论》课程结束后的一年级下学期和二年级公共英语教学中,这些专业英语阅读材料将作为公共英语教学的课外阅读材料,相关考核计入学生的公共英语成绩。在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实施方面:以学生为主体组织教学,在第一课堂(课堂教学)的基础上补充第二课堂,组织情景化教学。在教学评价方面:根据学生参与 PPT 讲解及参与第二课堂教学活动的次数评分,总分 100 分,占总成绩比例为 30%;学生 PPT 制作和讲解质量和参与第二课堂教学活动的成果质量评分,总分 100 份,占比 40%;同学之间的相互评价,主要是第二课堂教学活动中的小组之间的相互评价,总分 100 分,占比 10%;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综合表现和能力提升效果进行评价,总分 100 分,占比 20%。教改实践结果表明,基于 OBE 的土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模式在提升土木工程专业学生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具有很好的效果。^[7]

沈宁基于合作博弈的建筑设计课程理念进行了课程探索。认为通过将合作意识贯穿于课程中,设定相应的强制性协议,引导学生主动建立正确的合作关系以完成各阶段的学习任务,在合作中锻炼各方面能力。作者建立了评价学习成果的实时评价体系,并运用了相应的评价方式与标准。该教学模式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了综合素质,符合工程人才培养要求。^[8]

刘艳霞针对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培养目标,在进行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中引入现代电子设计 FPGA 实验平台,对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实验内容和方法进行更新,强调课程实验教学的应用性、工程性,增强学生的综合实力,以有效的培养具有实际工程应用能力的数字系统设计人才,推动应用型大学的内涵建设。^[9]

《数字信号处理》课程在通信工程专业课程中是一门基础课,具有抽象、难理解等特点。徐婷将数字信号处理课程的实践教学分为三个层次的教学方案:基础验证型、提高能力型和研究钻研型。三层次的方案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分批完成,既可以考虑到所有学生,又可以实现分层教

学,有针对性的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实践教学后,要求学生利用课下时间,将自己收获的知识 and 实验结合起来,独立完成撰写报告,并在同学之间交流学习,实现不同层次学生之间的实验经验交流。^[10]

尚娟从物流规划设计岗位需求出发,梳理了《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课程的性质及在传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单项目教学法的项目选择、实施过程、实施基础及保障,以此来提高物流管理人才的实践能力。单项目教学法在《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课程的应用中,以学生岗位能力的培养为目标,以项目研究为中心,从一个典型的现实问题出发,使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有目的性、积极性及针对性,兼顾了大学生职业能力发展的需要与企业对物流才的岗位素质要求,为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创造了自我成长、自我表现的机会,提供了培养关键能力的机会,也成为物流行业、企业培养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11]

蒋丽娜结合医学免疫学课程特点,探讨了如何将科研的研究内容和免疫学的前沿进展引入医学免疫学的教学,提高医学免疫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主要方法是: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基础,通过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将科研融入医学免疫学理论教学中,通过科研结合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结果表明教学带动科研,科研促进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独立分析、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科研思维能力和科研实践能力,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12]

三、教学理论与实践

本年度关于教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较少。潘新民、王升从学习方式入手,指出厘清学习方式概念是指导学生“怎么学”的基础与前提。认为对学习方式的观念认识,理应回归教学论立场,吸取其他学科对学习方式的观念认识的合理内核,旨在教师主导作用下,以学生主动学习为旨趣,借助学习工具与学习对象相互作用,一系列外部学习活动和内部心理活动相互统一的学习活动。对“学习方式”概念的教学论解读,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上,有利于丰富教学论概念体系,深

化教学论的理论研究,在实践意义上有利于指导教师建构多种形式的学生主体学习活动,更好促进学生发展。^[13]

李雪通过对课堂教学行为现状展开调查,认为高校教师课堂教学行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教学管理失范、教学行为失范、教学评价失范。对此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建构积极的课堂文化,在课堂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学生需要合理调整自己的情绪,学生需要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中去进行学习效果 and 创造性的体现,这样的学习才能够达到一种轻松活泼的状态。第二,教师要做好自我评价,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能力的提升能够更多地体现出教学行为的有效性。第三,强化教师的责任意识,在课堂教学中,高校教师首先要做好师德素养的提升,把学生的利益放在首位,把教学质量作为教学工作的生命线,强化教师的教学管理意识、教学质量意识,优化课堂教学时间,注重课堂教学效率。同时,教师要按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和学习方式特点,遵循一定的思维方式来使课堂教学时间得到优化。^[14]

形成性评价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形成性评价存在评价只注重形式而忽略本质,评价对象单一,评价结果简单,评价结果的反馈接受度不高等诸多现象。王莹认为需要在形成性评价环节中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通过制度的宏观指导、强化师资素质以及转换学生角色的方式提高形成性评价的运用效果。^[15]

我国的新课程大力提倡教师采用探究性学习这一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探究性学习要求不同于传统教学,要求更加复杂的专业能力。张文霄等研究了实践探究性学习的教师专业基础,提出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第一,确保教师真正理解探究性学习的实质,而不只是由于受到新理念宣传的影响而人云亦云。第二,教师专业发展不应只开展理念更新,还要配套实用技能的培训,提升教师探究性学习的操作能力。第三,要改善外部大环境,包括给教师更多的教学自主权,打破传统的“班、课、时”的限制,还要给予探究性学习以评估政策的支持。^[16]

刘金花认为应用型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越来越重视实践性教学。但是,实践性教学目前存在改革深度不够、教师缺乏创新动力和学生过分依赖网络等问题。体验教育是进一步深化应用型本科

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应树立整体、系统和发展的理念,从教育主体体验教育的构建入手,通过对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教材和考核方式等教育客体体验教育的匹配构建,达到多方参与和融合发展,进而实现教师、学生、学校和社会等多方的价值共创。^[17]

官丽辉认为在生物统计学教学过程中,要始终本着以实际应用为出发点的教学思路,针对各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因材施教,更新教育理念,加强实践训练,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进行改革和大胆探索;通过不断改进教学手段、教学方法,使学生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素质,即从设计到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处理分析资料乃至得出科学结论的能力,从而为学生将来从事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18]

杜金萍根据研究性教学特点,结合机械制造技术基础课程性质,分别从教学内容、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课程考核四方面,对该课程实施了研究性教学探索与实践。将研究成果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等专业进行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其特点突出学习形式的探究性,学习过程的自主性,教学过程的开放性,学习结果的创造性。探索与实践包括:第一,优化教学内容,构架研究性教学体系,突出工程能力培养。第二,推行研究性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习的有效性。第三,推行研究性实践教学,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突出科研能力培养。第四,采用过程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形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19]

四、核心素养背景下的教学变革

随着核心素养概念提出和新高考改革的全面展开,普通中学生涯教育日益受到重视。索桂芳认为,普通中学开展生涯教育,应站在核心素养的大背景下,将培育学生自主发展能力作为最终目标;应着力在课程与教学上进行创新,注重课程开发的针对性与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应将普通中学生涯教育作为一项全社会的事业,通过政府、学校与社会的合力共为,使生涯教育全面有效地开展起来,为我国亿万青少年健康成长带来福祉。^[20]同时,索桂芳对美国中学生涯教育进行了研究,指出美国中学生涯教育课程具有课程

目标具体、课程内容整合、课程实施以学生为中心的特点。当前,我国的生涯教育正处于起步阶段,有必要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在生涯教育课程的开发中,注重细化课程目标、整合课程内容、转变课程实施者的观念。^[21]

中学生物学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生物学科核心素养的主要阵地。任梦然从实验材料、实验装置、实验变量、实验目的和任务、难度5个角度说明如何在实验探究教学中实现进阶,以引导学生进行科学探究,建立理性思维,落实核心素养的培养。指出实验材料的选择、实验装置的设计、实验变量的确定、实验目的的分析以及实验思路和实验步骤的探索,都是一种严谨的思维活动。开展进阶的实验教学,学生的分析能力、推理能力、归纳与概括能力、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都能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22]

李亮以高中英语教学目标为突破口,探索通过诊断性评价为教学目标设计提供参考,依据教学目标将“教、学、评”活动进行一体化整合,并在课堂上落实。通过案例分析,重点探讨了当前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背景下,以英语学科能力框架为依托,通过诊断测试的评价方式为精准设计教学目标提供依据,再通过课堂活动和动态评价落实教学目标,进而实现“教、学、评”一体化整合,随着评价逐渐回归教育本质,未来教学中课堂评价的研究空间定会扩大,教学目标的作用和地位也会更加凸显。^[23]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以培育学生优良体育品格、提升学生体育运动能力、养成学生健康行为习惯为主要育人取向。赵富学提出建立相应的课程研修组织,可使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维度中的各要素有机融入到课程研修程序之中,产生高质量的研修成果。通过体育教师个人设计、研修成员集体设计、改进与修正设计、针对性的有效设计四个环节,可以实现体育教师研修主题从文本形式向课程教学实践形式的转变,使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各要素在研修程序中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和效用,促进体育教师对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结构的理解与认知,进而不断拓展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研究领域和范畴。^[24]

医学信息素养课程对高校医学类学生信息素养的培养至关重要。王华、范婕探究了“TBL-CBLPBL”教学法,旨在构建培养复合型医学学

生为核心的一种创新教学模式,即以学生为中心,以医学案例为出发点,通过案例等问题导向,最终进行小组讨论为主要授课形式的教学法。最终目的是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检索技能的培养,以提升学生的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团结协作的能力,并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25]

五、教学模式与方法

郎少君以实用为目标导向提升财经应用文写作课教学质量为重点进行阐述,从创新教学理念、对课程目标进行准确定位、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安排、创新教学模式、创新考核模式、注重师资的培训和投入这几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指出在财经应用文写作课中以实用为目标导向,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其积极性,使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实用为目标导向,把实践性特点作为中心,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有针对性地对学生展开教学,以有效提升学生财经应用文写作的质量,从而促进学生未来更好地发展。[26]

阎晓军强调“专题+生成性”教学模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预设”和“生成”。“预设”主要针对每节课的专题,强调教师对每次课程基本概念等系统专业知识的把控,聚焦在课堂有限时间内专题教学目标的完成;“生成”强调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参与,围绕专题通过师生、生生互动演化出新的问题,师生共同面对解决。在此教学模式下既能够充分发挥教师的引领作用,也较大调动了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促进了课堂中学生在知识获得、情感体验和技能掌握方面的提升。[27]

吕洋探讨了情景教学模式在留学生《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证明情景教学能够提高留学生《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的教学质量。问卷调查评价教学效果的结果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教学模式、师生互动效果这2项指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实验考核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考核成绩的优良率分别为85.50%、77.1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49$);出勤率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课的出勤率分别为96.40%、91.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42)。研究结论是,与传统教学组相比,情景教学法能显著提高留学生《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教学的教学质量。[28]

杨亦清运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作者将全班30多名学生按照每个小组4—5名学生分组,根据组数把课文内容分为相应的几部分,将讲解任务分配给不同小组,准备PPT;为让每位学生都有学习的压力,在课上以现场抓阄的方式决定哪位学生代表他所在的小组向全班讲解;讲解的内容应至少包括专业英语词汇及课文的含义,其他内容可谈及自己在准备讲解过程中的心得体会等。待学生讲解完毕后,教师对各小组的表现进行点评,并进行适当补充讲解,对学生课前准备及课堂讲解过程中存在疑问的地方进行回答;课后给学生留一些思考题以巩固深化所学知识。[29]

刘丽珺对“概念认知”策略在高校舞蹈理论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研究,提出基于传统理论知识讲授中的概念认知策略。认为概念铺点式教学不仅是学生思维构想的重要索引,还是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点、完成舞蹈知识技能和动作技能学习的重要经验积累。在舞蹈理论课中,教师可以运用“概念”教学,尝试讲授核心概念或概念群,让学生识记概念、练习概念,通过自己主动寻找其逻辑关系加以记忆和习得。这种“概念”教学通过凝练式的思想点拨、模糊式的关系思索、能动式的内核记忆完成教与学的互动。[30]

吴树芳为提高网页设计课程的课堂教学效率,借鉴修订版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采用由易到难的思路分别对知识和认知进行分层,针对不同层次的知识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主要做法:第一,二维分类表的横轴(知识维度)和纵轴(认知过程维度的分类),均采用由简单到复杂,逐层深入的排序,启发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应采用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第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不同形式启发学生,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第三,作品制作与优秀赏析结合,重点能力为“应用”,学生需要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应用所学的知识,能够让认知水平进一步提高。第四,在教学中采用多元的评价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加强学生批判性的思维能力。^[31]

六、教育技术手段变革与翻转课堂

赵杨基于“微课”全新的教学资源,探索建设实验课程资源中心的方法。《虚拟仿真综合实训》实践教学分为实习动员、团队组建、期初建账、固定数据、自主经营、实习总结六个阶段,旨在探索现代教育技术与实验实践课程建设的深度融合,通过对实验实践课程的“微课”设计与制作,扎实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探索微课在课堂教与学创新应用中的有效模式和方法,并在“微课”项目开发与应用过程中,提高实验教师自身的教学设计能力,提升实验教师教学的综合能力。^[32]

郭晓玲利用云班课设计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实现了课堂内外充分互动、教学过程完整记录和教学信息有效反馈。作者选取河北北方学院2016级大一本科生创新创业课程一个班课的教学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发现移动教学对教学方法具有创新和促进作用。云班课移动教学平台创设多样评价项目,清晰完整记录学生学习成长过程和教师的教学活动,为学生平时学习的过程性评价提供了数据依据,弥补了传统终结性评价的缺陷,适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评价机制。^[33]

宋生涛认为,翻转课堂重新定义了课堂与学习的概念,重塑了教育教学形态,将传统的“先教后学”调整为“先学后教”。翻转课堂实际由两个时空课堂构成,第一个课堂是课前的虚拟课堂,在虚拟课堂里学生自主学习新知,第二个课堂是学校的真实课堂,教师在课堂上组织学生二次知识内化,是班级授课制在信息时代的转型升级。翻转课堂颠覆了传统课堂教学的基本结构,颠倒了教学过程,重置了课堂时间,改变了学习方式,转变了师生的角色。^[34]

周红仙根据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的特点,分析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实施“翻转课堂”的必要性,并给出具体的实施方案。第一,课前自主学习的教学,教师根据实验项目的特点,制作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高质量微视频,并通过教师终端将视频及相关学习资料上传到网络,微视频的质量是整个教学方法有效实施的保证,并设计3—5个相关问题,检验学生的自主学习效果。第二,课堂活动的教学,这是大学物理实验

“翻转课堂”模式实施的关键,在实验课上由学生独立完成实验,教师只起督促和引导的作用。为保证课堂效果,教师需在课前查阅尽量多的教学资料以更新知识,引导学生积极交流,参与学生的问题讨论,并对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给予解答。第三,课后的反思,对实验课中观察到的实验现象进行总结,完成实验报告,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及改进的方法,实现学生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并总结教学视频、测试问题及教师课堂中对学生的引导中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教师,促使教师及时修改教学资料、调整课堂的引导方式。^[35]

新形势下的微课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提高教学效率,同时对于高校学生自主学习、交流合作等多方面能力的培养也有着重要意义。刘颖探讨了大学英语微课的翻转课堂创新与实践,认为要整合课程资源,保证微课质量,开展个性化学习与指导,关注学生能力培养。曹燕燕提出了一种适合河北北方学院师生的基于Blackboard平台的翻转课堂模型,并进行了教学实践,从建设资源环境、教与学活动开展、立体化师生互动,教学效果分析等多个环节推动实施。实践证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提高学生学习成绩,以及增强学习兴趣有明显的促进作用。^[36]

七、思想政治教学与英语教学

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跟随时代变化背景及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综合素养的新要求,在教育理念、路径、载体、方法、方式上跟上教育客体的成长成才实际需求。张连春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二三四五一”的新模式,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即打通“行”“知”两个教育环节,选准思政工作路径;贯通第一、第二、第三育人课堂,厚置思政工作载体;联通学校、家庭、社会及学生四个教育主体,形成思政工作合力;融通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心理健康、遵纪守法、安全稳定五个教育层面,突出思政工作重点;直通真善美统一的教育主旨,实现思政工作目标。^[37]

新媒体环境下思政工作更加复杂化。赵金萍等人提出在发挥并利用新媒体在思政教育方面优势的同时,指出要始终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力量加入到思政工作上,了解并引导大学生

的思想,要牢牢掌控话语权,用四个自信武装和说服青年学生,要用具体的数据,让学生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真正价值;也要敦促高校教师特别是思政课教师不断学习并加强利用新媒体工具开展思政教育的能力以及面对新媒体上各种问题的分析力和判断力。^[38]

武菊芳从“供给侧改革”思维视角,研究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教学质量。认为这是一个涉及教学(供给)内容、方法、手段诸要素资源优化配置以刺激需求,形成供求双方良性互动的系统工程。作为“供给者”在教学过程中努力探索,形成供给内容:逻辑主线清晰,“重点、难点、热点”三个环节耦合;供给方法:灵活多样、喜闻乐见;供给手段:与网络技术有机融合的“一线三点相统一”讲授方法,提升供给的“引领性”“精准性”“实效性”,从而刺激了需求侧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以原理课教育最终目的和学生现实需要为出发点的供需两侧的良性互动。^[39]

邵小平简述了在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中使用网络微视频的依据和对其进行选择的原则,从英语电影微视频、英语电视剧微视频、英语演讲微视频、英语新闻微视频、英语音乐电视微视频五种常用的网络微视频类型入手,探讨了将其应用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的方法。^[40]

孙媛媛等人对大学英语课程课外实践教学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大学英语课堂在课外实践教学中的问题。在阐述分层教学作用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基于大学英语分层教学的课外实践教学策略的构建,以期对推动我国课外实践教学模式的转型与发展。^[41]

杨柳探讨了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语音语调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将语音教学融入其他课程、强调输入的质与量、增加输出机会、关注反馈、进行英汉对比教学等措施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英语口语沟通能力。^[42]

元认知策略教学对于英语听力教学起着积极的作用。杨蕴文认为学生学会在听力活动中运用元认知策略进行监控、指导和调节,对听力过程和结果进行有效的自主评价,进而调整听力策略以提高听力理解效果。在英语听力教学中,教师

实施基于听力过程的元认知策略教学,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听力过程中影响理解的因素,提高他们使用元认知策略的意识,发现自身的问题,调控策略的使用,师生共同关注听力的过程,最终逐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掌控听力过程的能力,提升听力理解的效果。^[43]

高洁认为翻译试题在 CET4 考试中的地位逐步提升。2013 年 12 月后的翻译考试分值和难度达到历史最高,给许多学生带来极大挑战,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之一,也有利于推动我国文化输出, CET-4 翻译考试改革会从几个方面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改革起到反拨作用:提高翻译教学地位,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提高教师自身翻译素质,优化教师队伍;加强汉译英教学,培养学生的文化输出意识。^[44]

作为英语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教师的反馈语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对学生的课堂表现提出较为客观的评价,同时也对学生目标语言的输出形成一定影响。魏慧哲对小学教师课堂反馈语特性进行论述,为提升小学英语教师课堂反馈能力提出建议:丰富反馈形式,关注学生个体、反馈到位,注重课程生成、启发引导,注重课程生成、启发引导。^[45]

(孙雪:石家庄学院讲师
邢秀茶:石家庄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 贾东立. 德美两国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的启示. 中国成人教育[J]. 2018(5).
- [2] 李明忠, 任林芳, 焦运红. 美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主要特征. 高等教育研究[J]. 2018(1).
- [3] 陈雪梅, 蔡金法. 美国高中教科书概率专题的设计特色——以 9 年级 CPMP 教科书为例. 数学通报[J]. 2018(11).
- [4] 李凤学, 马旭平, 李继连. 高等教育《创业学》创新课堂教学方法的研究——以河北北方学院为例.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J]. 2018(3).
- [5] 宋生涛. 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多元文化校本课程评价的内涵、特征与取向. 当代教育与文化[J]. 2018(1).
- [6] 闫凤霞, 贾玉洁, 蔺建军. “互联网+”时代地方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构建路径. 教育时空[J]. 2018(2).
- [7] 宣苓艳, 申彦利, 李军. 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土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改革实践.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J]. 2018(4).
- [8] 沈宁. 基于合作博弈的建筑设计教学研究.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J]. 2018(3).

- [9]刘艳霞,刘泉,张雪姣.基于 EDA 技术的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改革探索.电脑知识与技术[J].2018(1)140—141.
- [10]徐婷,通旭明.“数字信号处理”课程体系研究改革与实践.教改教研[J].2018(51).
- [11]尚娟.基于岗位能力的单项目教学法在《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课程中的应用研究.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J].2018(5).
- [12]蒋丽娜,安康,唐玉红.将科研融入医学免疫学教学的探索与研究.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J].2018(22).
- [13]潘新民,王升.教学论视域下学习方式概念的新探索.教育研究[J].2018(2).
- [14]李雪.高校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研究.才智[J].2018(51).
- [15]王莹,刘莹,刘艳俊,吴越,卢年华.教学中形成性评价的运用现状及对策研究.产业与科技论坛[J].2018(4).
- [16]张文霄,李艳庆.观念与能力:实践探究性学习的教师专业基础.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2018(4).
- [17]刘金花,韩敏敏,梁秀娟.体验教育:一种值得探索的教育模式——进一步深化应用型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和思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J].2018(3).
- [18]官丽辉,吴占福,马旭平,刘海斌,王志伟.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生物统计学教学改革的研究与探索.畜牧与饲料科学[J].2018(4).
- [19]杜金萍,刘素明,赵强.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研究性教学探索与实践.河北工程大学学报[J].2018(3).
- [20]索桂芳,高艳春.美国中学生涯教育课程的特点与启示.外国教育[J].2018(1).
- [21]索桂芳.核心素养背景下普通中学生涯教育的几点思考.课程教材教法[J].2018(3).
- [22]任梦然,李秋石.基于理性思维的高中生物学实验教学进阶.生物学教学[J].2018(1).
- [23]李亮.核心素养背景下如何连接教学与评价.基础外语教育[J].2018(3).
- [24]赵富学,程传银,宋生涛.学科核心素养导向的体育课程研修程序设计.山东体育学院学报[J].2018(5).
- [25]王华,范婕.构建创新综合型“TBL-CBL-PBL”医学信息素养课程模式探究.河北科技报[J].2018(3).
- [26]郎少俊.以实用为目标导向提升财经应用文写作课教学质量初探.文化创新比较研究[J].2018(7).
- [27]阎晓军,曾晓娟.“专题+生成性”教学模式在心理健康课程的应用研究.齐鲁师范学院学报[J].2018(1).
- [28]吕洋,王海洋.情景教学在留学生组织胚胎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河北北方学院学报[J].2018(8).
- [29]杨亦青,蒋丽娜.任务驱动式教学法在医学检验专业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医学研究与教育[J].2018(3).
- [30]刘丽珺.浅论“概念”认知策略在高校舞蹈理论教学中的应用.艺术教育[J].2018(3).
- [31]吴树芳,朱杰,李子星.修订版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对网页设计与制作教学的启示.教育现代化[J].2018(53).
- [32]赵杨,仲旭,杨腾皓.《虚拟仿真综合实训》“微课”的制作与应用研究.课程教育研究[J].2018(1).
- [33]郭晓玲,武仁杰,李朴艳,王玲玲.云班课在移动教学中的应用及数据分析.河北北方学院学报[J].2018(2).
- [34]宋生涛,杨晓萍.翻转课堂的基本原理与教学形态.西北师大学报[J].2018(2).
- [35]周红仙.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J].2018(5).
- [36]刘颖.基于转型发展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创新与实践研究.北华航天工业学学报[J].2018(3).
- [37]曹燕燕,张克辉,贾巨才,田野,杜华.“模拟电路”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中国教育信息化[J].2018(2).
- [38]张连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二三四五一”模式探索.中国高等教育[J].2018(3).
- [39]赵金萍,王晶晶,张晓芳.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科教导刊[J].2018(1).
- [40]武慧芳,刘德成,高令阁,王爱玲.河北省高校教师教学学术能力的现状分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J].2018(3).
- [41]武菊芳,刘云章.以供给侧改革思维创新“原理”课讲授方法.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J].2018(18).
- [42]邵小平.网络微视频在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中的应用.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2018(1).
- [43]孙媛媛,邵迪,付大安.基于大学英语分层教学的课外实践教学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J].2018(6).
- [44]杨柳,康静.高校英语专业语音教学再思考.英语教师[J].2018(11).
- [45]杨蕴文,郭京华,马月秋.英语听力课堂上基于过程的元认知策略教学.职业技术教育[J].2018(5).
- [46]高洁,李迎新,梁兰芳.CET4 改革背景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研究.教育教学改革[J].2018(1).
- [47]魏慧哲.小学英语教师课堂反馈研究.教学与管理[J].2018(3).

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

张春长 马超

2018 年度河北省田野考古工作以主动性科研考古和配合基本建设考古为主,全年主要考古

项目共计 39 项,其中主动性科研考古项目 16 项,配合基本建设考古项目 23 项。出版学术专

著2部,发表考古学研究文章40余篇。

一、重点考古项目

(一) 雄安新区考古工作

(1) 雄安新区起步区考古勘探、试掘

2018年3—5月,雄安新区联合考古队对雄安新区起步区48处古遗址、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勘探,实际勘探面积213.5万平方米。经考古勘探,北六西遗址、西里南遗址等16处遗址保存较好;北六东遗址、涞城村东遗址等14处遗址没有明显古代文化层,只存在墓葬、灰坑、窑址等考古遗迹;其他18处遗址未发现考古遗迹和文化层。依据勘探结果,对存在文化层及发现遗迹现象的17处古遗址、古墓葬进行试掘,最终确认起步区王公堤遗址、南河遗址等10处文化遗存保存比较丰富。据此采取分类的方式对10处文化遗址实施有效保护。起步区勘察和试掘工作,基本弄清了该区域文化遗存的埋藏状况,为新区建设规划和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依据。

(2) 南阳遗址考古勘探和试掘

2018年10—11月,对南阳遗址城址外侧区域、西北阳村西南区域进行考古勘探,勘探面积30余万平方米,共发现城壕1条、灰坑7个、窑8座、沟3条、路1条、井2口、墓葬39座,时代为战汉、唐宋时期。此次勘探完善了汉代城址西侧、南侧、东侧城壕走向、形制等城邑防御系统信息,基本确定南阳遗址平面四至范围以及遗址北侧墓葬平面分布范围。

对南阳遗址北部“城台”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约1125平方米。解剖2处夯土城垣遗存,发现灰坑71座、房址10座、沟5条、墓葬5座、灶2处,文化遗存年代为战国、汉代、北朝、唐代、宋金、金元时期。确定城垣年代为战国时期,为寻找战国中期燕文公时期的“易”城提供重要线索。

此次确定南阳遗址文化内涵包括战国晚期城址和汉代城址等2座重要城址,为雄安新区东周、汉代城市考古研究的重要实物载体和范例,进一步推进白洋淀区域先秦时期生态环境演变、人与生态互动关系研究工作,填补雄安新区北朝、唐代、宋金元时期考古空白,南阳遗址文化遗存自先秦时期延续至中古时期,文化遗存时间

跨度长、发展连贯,并且发现系统完备城址及内部道路、窑址、房址等丰富文化内涵,凸显其在雄安区域延续历史文脉的重要地位。

(3) 双堂乡宋辽地道考古勘察、试掘

勘探发现明清时期东西向、南北向地面道路、建筑遗址多处,在双堂村北部发现4座砖室墓葬。发掘表明,雄县双堂村核心区地表下3—5米埋藏有宋元至明清时期砖体建筑遗存,分布范围约230米×200米,纠正了宋辽边关地道的传统认识。

(4) 雄安新区起步区机载激光测绘

对雄安新区核心区域228平方千米范围进行了机载激光扫描与航空摄影,获取0.1米分辨率原始航片与机载激光点云数据(≥8点/平方米);10厘米地面分辨率高清正射影像(DOM);1米网格数字地表模型(DSM)和数字高程模型(DEM);100平方千米范围1:2000比例尺数字线划地图(DLG);用于考古现场的考古放样、平剖面信息采集,提供遗址、遗迹、遗物的空间信息采集功能,实现雄安新区考古现场空间信息精细测绘与信息记录;结合考古研究现状,运用上述数据成果,验证现有遗址的空间结构;并对疑似遗存进行预测和研判。

(二) 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

2018年对崇礼太子城遗址南门、9号基址、3号院落、1号与2号院落南院、东南角、城西外基址等6处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6500平方米,弄清了南门进入太子城后的道路情况;对9号台基进行了解剖,确认其存在前后两期营造过程;对3号院落进行全面揭露,明确其由南北两院组成,总长南北105.38米、东西46.7米,其中南院由主殿、东西配殿、后殿组成,北院由两组长条形基址及5组方形基址组成;1号与2号院位于3号院西侧,平面布局与3号院相似,规模小于3号院。

出土遗物以各类泥质灰陶砖瓦、鸱吻、螭吻、凤鸟、脊兽等建筑构件为主,另有部分绿釉建筑构件、铜铁构件、瓷器、陶器、鎏金龙形饰件等,其中青砖上多戳印“内”“宫”“官”字。新发现部分螭吻上刻“七尺五地”“四尺五地”“天字三尺”等文字。出土瓷器以定窑白瓷为主,其中刻“尚食局”款18件,另有仿汝窑青瓷盒、碗、黑釉双系罐、鸡腿瓶等。铜器有坐

龙、铜镜等残件，另有大量各类木构建筑的包角、铜帽铁钉等。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史料记载，初步推断太子城遗址是金章宗夏捺钵的泰和宫，为金代行宫性质城址的首次发现，对辽金元城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多方努力，原坐落在太子城遗址上的奥运村设计方案全面更改，奥运村全部移出太子城外，使得太子城遗址得以完整保存。当地文物部门已委托清华大学编制太子城遗址保护、利用和展示规划。未来太子城金代皇家行宫遗址将为北京冬奥会举办增添浓重的中国文化元素和皇家历史积淀。

（三）大清河流域文物资源调查

2018年3—11月，对大清河流域涉及的文安县、霸州市辖区进行全面调查，整体调查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调查发现文物遗存点91个，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碑刻四大类遗存，年代跨越战国至现代。并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合作，开展了环境考古研究工作，将雄安新区和大清河流域两地的环境考古融为一体，为雄安新区乃至整个冀中平原的古代环境演化和人类历史发展研究开辟新的领域。

（四）行唐故郡遗址考古发掘

2018年行唐故郡遗址勘探面积10万平方米，发现墓葬、灰坑等遗迹260多处。发掘遗址面积1500平方米，清理墓葬19座、车马坑2座、窑3座、灰坑21、水井15眼、灰沟3条、城壕1段。出土青铜、玛瑙、水晶串饰、虎形贴金铜饰件等以及陶器等珍贵文物100余件。二号车马坑5号车经过实验室考古发掘清理，基本弄清了车的结构：拥有两个直径达140厘米的较大车轮，每个车轮拥有辐条38根。车厢横宽142.5厘米，纵长106厘米，车厢残高达50余厘米，一条残长近280厘米的车轴横亘于车厢底部。车厢左右侧和前后端立板的外表除了饰有繁复的髹漆彩绘图案外，还镶嵌有成组对称的金属兽型牌饰，其表层粘帖有刻画纹饰的金箔饰片。车厢内外还有8柄青铜戈。故郡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填补了中山国前期历史及考古研究的空白，不但可以弥补春秋战国史缺环，也为研究戎狄等北方族群的华夏化进程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以及复原先秦时期车马系驾方式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其他考古项目

积极促进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张家口北部区域考古勘察和发掘、城市考古工作等主动性科研考古项目和石家庄南绕城石邑城考古发掘、肃宁后白寺遗址考古发掘、京雄城际铁路雄安段考古调查等配合基本建设考古项目工作。

（一）东方人类探源

（1）在泥河湾盆地中东部开展旧石器专题调查，调查面积100平方千米，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近50余处。大田洼台地南侧山兑村—细弦子村一带发现中更新世晚期遗址群，发现遗址10余处，皆埋藏于泥河湾湖顶部，时代30万年前后，为研究泥河湾古湖的消失及古人类的行为模式提供了基础资料。泥河湾盆地部南侧深山里的新庙庄遗址周围确认一处晚更新世的遗址群，包括30个地点，时代自晚更新世早中期至晚期之末，对建立区域文化序列，探讨东亚地区现代人类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石器工业包含石片石器和细石器工业两类，石片石器、细石叶两种石器工业类型的遗址集中出现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为我们探索这两种石器工业类型的关系提供了研究对象；细石器工业主要为楔形细石核技术，这种石器工业参与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对研究农业起源也具有重要价值，该遗址群丰富的楔形细石核工业遗存展现了在这一重大课题研究上的潜力。

（2）泥河湾盆地马圈沟遗址的考古发掘，继续在鱼咀沟1号地点2016年发掘探方东侧开展发掘，发掘面积100平方米，发掘深度已近25米，发现含有石制品、动物化石的文化层7个，动物化石层3个，时代在距今166万年至140万年前后。在剖面下部，约160万年前后的层位，第V文化层处揭露一处古地面，发现有流水侵蚀的小水沟、小水坑，草原猛犸象脚印20余个，周围散布有石制品、动物化石70余件。确认马圈沟7个文化层，时代最早176万年前，最晚134万年前，成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早更新世遗址群。

（3）开展石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该遗址遗迹现象独特、动物化石繁多、石器加工连续，为解读古人类生存环境、生存模式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在诸多遗址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

特点。

(4) 西白马营遗址发掘3号地点,获取石器、骨器、动物化石、烧骨、鸵鸟蛋壳等文化遗物万余件,13水平层至15水平层间发现古人类生活面,该层面发现有两处用火遗迹,以及大型石板、砾石砍砸器,周边分布有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为探索旧石器时代晚期5万至1.5万年前人类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提供了重要信息。

(二) 张家口北部区域考古勘察和发掘

(1) 康保兴隆遗址考古发掘发现8座房址、3座墓葬,共分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对应辽西地区兴隆洼—赵宝沟—红山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年代上限可达8400年,下限5300年。揭露的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遗存,起始年代早,时代跨度大,保存情况好,出土遗物丰富,是中国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之一,为研究北方地区农业、文化、定居等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2) 四台蒙古营遗址是继磁山、裴李岗、北福地甲类遗存之后,河北省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又一重大发现,而且由于遗址地处内蒙古高原南部,发现了粟、黍、藜属和小麦族等作物,出土的素面筒形陶罐和有肩石铲等又十分接近但又不同于偏早于辽西地区兴隆洼文化的小河西文化,文化渊源及与周围文化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更为独特的是,出土的器表饰压印折线纹的大口寰底罐、素面筒形罐及无名原始陶器在已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尚未发现。

该遗址有着发达的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谷物加工工具及原始陶器等文化遗物,又发现有火塘、居室葬等遗存,不仅对全面了解新石器时代早期“四台蒙古营人”的生活方式、埋葬习俗及生产方式等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于探讨农业的起源与发展、陶器的起源与发展、文化面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在此遗址中出土了比较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包括浮选采集标本),为复原“四台蒙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存环境,探讨农业及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地关系等,提供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四台蒙古人”遗骸的发现和研究(包括体质人类学研究、古病理学及遗传学研究),对于认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经济方式、食物结构

及环境变化对人类自身发展演化产生的影响也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对典型地层剖面进行高密度取样及系统的实验分析(包括孢粉与植硅石分析、磁化率分析、黏土矿物分析、化学分析等)和精确的地层年龄测定,以及相关的地貌水文研究,可为燕山—长城南北地区环境变迁及人地关系提供重要的科学资料。

(3) 邓槽沟梁遗址2018年勘察发掘,发现夯土城墙、遗址围墙、石护坡、边沟等建筑遗存,发现早(8000年)、中(6000年)、晚期(4300年)三个时期的房址。

(三) 城市考古工作

(1) 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发掘

在上年度工作的基础上,对正定开元寺周边五代时期夯土城墙、开元寺庙建筑基址及其历史时期居住遗存进行发掘,共发现房址、城台、灰坑等遗迹现象71处,出土文物2000余件。明晰了开元寺南广场遗址晚唐五代时期城墙的结构和建造过程,对开元寺布局和轴线的变化也有了新的认识。

(2) 邺城遗址考古工作

以邺南城宫城区北部206号大型殿堂为中心的发掘,发现包括台基、基槽、慢道、连廊、廊房、散水、甬道、卵石堆等遗迹现象,完善了206号大殿的布局结构。开展核桃园北齐大庄严寺中心建筑群周边遗迹的发掘,揭出3号大殿东连廊北半部分;发掘出廊房6间,初步认定8号基址是一东西向长廊式建筑,夯土台基残高0.15—0.2米,南北跨度10.5米,边缘有包砖痕。通过考古发掘,大庄严寺建筑布局已基本清晰。

(3) 大名府故城遗址考古调查与勘探

2018年5—6月对大名府故城遗址范围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范围涉及大名县大街乡双台村、御营村、前东门口村等24个村,行程110余公里。6月至今,对以大名县双台村为中心的大名府故城遗址宫城区与二道城范围进行考古勘探,勘探面积88万平方米;现已探明大名府故城遗址宫城城墙宽度、走向、层位关系,城壕走向、宽度以及宫城东城门东安门、西城门西安门、南城三门中居东的省风门位置,宽度、地层堆积、保存状况等信息;初步探明二道城北部城墙走向、宽度、层位关系以及护城河位置与走

向。并在钻探的同时对宫城区内西北进行小范围试掘，试掘面积 20 平方米，初步了解宫城区地层堆积情况。

(四) 其他考古项目

(1) 灵寿县幽居寺遗址勘探

2018 年 4—6 月首先对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勘探面积 1 万平方米。勘探结束后，为进一步了解遗址内涵和年代，在遗址周缘及核心区域布设探沟 8 条，发掘面积 76 平方米。其中 T3、T6、T8 出土遗迹较为丰富。遗迹有建筑基址 3 座、灰坑 8 座、石（砖）墙 8 座、窑 1 座。遗迹可分为唐代、宋元、明清 3 个时期，出土遗物有陶器、瓷器、石器、铜器、铁器等 100 余件，以建筑构件、生活用器为主，遗物年代为北齐至隋代。通过勘察，发现了北齐时代的汉白玉佛像，证实了幽居寺始建于北朝的记载。还有隋唐至近代遗迹、遗物出土，说明该寺院历史悠久，绵延不绝，从北齐到近代基本未曾中断，是河北地区一处重要的古代寺院。作为一处山间寺院遗址，幽居寺遗址的建筑布局和结构独具特色，与平原地区寺院差异明显。幽居寺遗址的保存情况很差，各个时代遗迹基本都被晚期人类活动不同程度破坏，遗迹的完整度受损严重。

(2) 北京至雄安新区高速公路工程涿州至容城段考古调查

2018 年 3—4 月，沿线共发现文物遗存 15 处，其中战、汉代遗址 1 处，汉代遗址 2 处，金代遗址 9 处，明、清遗存 3 处，寺庙遗址 1 处，墓地 2 处。分别为：保定涿州市陶营汉代遗址、龙门口金代遗址、廊坊固安县南赵金代遗址、半截塔金代遗址、保定高碑店市刘各庄明代墓地、杜村金代遗址、保定营明清寺庙遗址、保定容城县朱庄金代遗址、薛庄金代遗址、南文战汉遗址、河西汉代遗址、张市金代遗址、保定高碑店市宋鱼池金代遗址、保定高碑店市后北阳金代遗址、保定高碑店市小青冢明代墓地。

(3) 鄂尔多斯—安平—沧州输气管道工程项目勘探

2018 年 7—9 月，对该工程项目前期考古调查发现的文物地点进行了勘探，勘探总面积 121 万平方米。勘探确定 12 处文化遗存分为墓葬和遗址。墓葬有献县蔡庄 1 座汉代墓葬，沧县东庞河 2 座东汉墓，深泽县北东固罗 12 座宋金墓等。

遗址包括深泽县冶庄头明清道路，献县窦三疃、前丁庄汉代遗址，馆陶县樊堡金元灰坑，大名县后东门口宋金遗址和北宋大名府官道，顺道店大运河遗址等，文化遗存时代涵盖汉唐、宋元、明清时期。

(4) 东垣古城文化产业园项目文物勘探

2018 年 8—9 月，完成东垣古城文化产业园项目工程的文物勘探工作，对该项目工程所涉及的东垣古城南城墙以南 200 米、东城墙以东 110 米的区域展开考古勘探，勘探面积 16.4 万平方米，新发现遗迹 9 处，复查遗迹 10 处，明晰了该范围内的遗迹分布情况，为东垣古城遗址的保护以及文化产业园项目的科学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5) 天津至石家庄高速公路工程津冀界至保石界段文物考古勘探

2018 年 1—2 月，对天津至石家庄高速公路沿线调查发现的 10 处古文化遗存进行了勘探，确认了大城县战国燕南长城、任丘市阿陵城汉代城址 2 处遗址占地分布范围，此次勘探总面积 53 万平方米。通过文物勘探，了解了津石高速公路工程津冀界至保石界段线路范围内遗迹分布情况，掌握了各遗存的地层堆积、分布面积、保存现状以及文化内涵等信息。

(6) 保定市风云雷雨山川坛考古发掘

2018 年 4—7 月对保定市风云雷雨山川坛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探沟 12 条、探方 8 处，发掘面积 720 平方米。共发现遗迹 12 处，即风云雷雨山川坛的祭坛一处，东部、北部、西部埧埧埧三处，东、北、西门三座，埧面三处，北部外垣一处，附属建筑一处，共出土器物标本 13 件，其瓷器 9 件、陶器 4 件。为明清时期坛埧制度研究提供了科学、翔实的考古资料。

三、课题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

(一) 课题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山国灵寿城遗址相关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已完成灵寿故城遗址绘图、发表张家庙遗址试掘简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磁山遗址发掘报告》已完成 1985—1998 年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发掘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录入等，器物型、式分析，器物描述，地层、遗迹等资料统计，器物图修改、绘制工作进

行中。

（二）考古资料整理工作

邯郸赵王城遗址资料整理、田庄大墓资料整理、张家口早期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整理、邢窑资料整理、定州北庄墓葬资料整理、邺城收费站资料整理等正在有序进行中。

四、学术交流与学术研究

（一）学术交流

201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的业务交流有：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长城学术研讨会”、第八届黄淮七省考古论坛、“城市考古”专题研修班、2018年考古与数字化平台建设培训班、雄安新区勘探试掘工作培训班、田野考古实践训练班等。

（二）学术成果

《瓮棺葬与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研究》收录论文24篇，内容包括东亚各地瓮棺葬的发现及认识、黄骅郭堤城瓮棺葬的发现及意义、黄骅郭堤城的年代和性质、东亚瓮棺葬的起源和发展演变、瓮棺葬葬具及出土器物、瓮棺葬与城址的位置关系，以及中、日、韩瓮棺葬的文化联系和瓮棺葬所反映的古代东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磁县双庙墓群考古发掘报告》，发掘墓葬共计39座，其中两汉时期27座，魏晋时期2座，北朝时期3座，唐代4座，北宋3座，共出土器物710件（套）。报告分为绪论、汉代墓葬、北朝墓葬、唐宋墓葬、结语等五个部分。

《侯家窑遗址周围区域旧石器专题调查报告》，侯家窑遗址发现于1974年，后进行多次发掘，发现古人类化石20件，石制品、动物化石上万件，是认识许家窑人及其文化的主要材料来源。

《泥河湾盆地马梁遗址第10地点2016年出土石制品研究》，马梁遗址地处泥河湾盆地东缘，发现于1983年，并于同年及2006年和2008年分别进行小规模发掘，出土了少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2016年对低于马梁遗址文化层约3米的马梁第10地点开展试掘，发掘面积18平方米，出土石制品197件，动物化石1500余件。石制品原料以燧石、石英砂岩和白云岩为主，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砾石、岩块、断块和碎屑等。技术上，以硬锤锤击为主要打制技术，

石核剥坏较为简单，未见修理台面，工具加工缺乏“精制品”，表现出较为单一和简单化的石器工业面貌。

《河北定州商墓出土玉器光学无损分析》，为充分获取河北定州商墓出土玉器的物质信息，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XRF）、X射线衍射分析（XRD）、激光拉曼光谱分析（Raman）等无损光学技术手段对玉器进行科学分析。获得玉器成分、矿相和结构等信息，研讨其质地和来源。从而探究先民的玉料来源、制玉技术、文化发展与文明互动交流诸方面问题。进一步探讨当时的生产力、社会发展水平，经济组织形态以及拥有这批玉器的人群在当时背景下的发展程度。研究结果对进一步研究河北地区的商代社会有参考价值。

《河北行唐县故郡东周遗址》，行唐故郡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墓葬、车马—殉牲坑、房址、水井、灰坑、窑址、灰沟等遗迹，出土一大批金、铜、玉、石、骨、角、蚌、贝、陶等各类遗物。遗址年代自春秋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晚期，可能与鲜虞和中山国文化密切相关，特别是车马—殉牲坑形制独特，为国内首次发现，为研究北方族群与华夏系统的融合与嬗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北邢台隆尧乡观遗址2014年出土动物遗存研究》，乡观遗址位于邢台市隆尧县固城镇乡观村北100米，遗址东西200米，南北200米，面积40000平方米，保存情况较差。2014年4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隆尧县文物保管所组成乡观遗址考古队，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自西向东划分Ⅰ、Ⅱ、Ⅲ三个发掘区，面积1660平方米。该遗址遗存年代跨度大，可分为龙山、夏代、商代。

《河北平山中山国墓葬出土青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1998年考古工作者于河北平山县发现一批典型的中山国墓葬，其出土的青铜器是研究东周时期中山国青铜器特征、制作工艺以及与周边诸侯国关系的重要资料。为进一步揭示其科学内涵，对该批中山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样品进行了分析与检测。结果显示，这批青铜器的材质包括铅锡青铜与锡青铜，工艺为铸造、热锻、铸后受热与热锻冷加工。铜器的初步检测分析为研究中山国的青铜器特征与制作工艺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河北临漳县邺城遗址核桃园 5 号建筑基址发掘简报》，2014 年勘探和发掘了核桃园 5 号基址及两翼连廊等建筑遗存，并在解剖中发现了早于 5 号基址的建筑遗存，出土大量带有戳记的板瓦、筒瓦以及瓦当、琉璃瓦等建筑构件，可确认 5 号基址为佛殿所属院落正南门。上述发现为探讨北朝时期佛寺平面布局、建造技术以及砖瓦类手工业生产与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资料。

《河北曲阳县定窑窑址调查报告》，2009—2010 年通过对定窑窑址考古发掘确认定窑创烧于中晚唐。2010—2016 年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通过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了一处隋代窑址，采集到有代表性的瓷器和窑具残件 398 片，为定窑创烧问题的探索提供了新资料。

《河北省平山县张家庙遗址 H3 试掘简报》，2013 年 10 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对平山县张家庙遗址做了试掘，遗存年代包括新石器、战国和明清等。发掘灰坑 3 座，其中 H3 属新石器时代，出土陶片 700 余片，复原陶器 2 件，年代为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这是冀中首次发现这一时期的遗存。

《商周青铜球铃初步研究》，青铜球铃，顾名思义就是青铜铸造的球形铃，铃上有若干个镂空，内部有一颗石子或铜丸，振动铜铃可以发声。商周时期经常被用作青铜器的装饰，常见于刀子、短剑、挂纆钩、管釜斧等器物上。对于长条形的器物，球铃常位于首部，如刀子、短剑、觶等。管釜钺上的球铃则位于管釜的一侧，与内的位置相当。球铃主要集中发现于中国北方地区，特别是北方长城地带，一般被认为是北方青铜文化的特有装饰作风。

《河北临漳县邺南城倪辛庄窑址调查报告》，

邺南城倪辛庄窑址是 2015 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经调查新发现的陶瓷窑址。该窑址位于邺南城宫城东墙外约 200 米，地表可见大量红烧土、草木灰、窑砖、窑具及陶瓷器残片等，分布范围约 6 万平方米。通过调查，确认窑址时代为东魏北齐，与邺南城始建与废弃时间基本同步。据其位置与时代推测，该窑址窑业生产可能与东魏北齐宫廷用器有关。

本年度发表的其他考古学文章还有：谢飞的《泥河湾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回顾与展望》^[1]，胡金华的《河北定县 40 号汉墓出土黄金货币及相关的几个问题》^[2]，黄信等的《河北井陘北防口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3]、《河北邺城地区陶瓷窑址调查报告》^[4]，李文艳的《考古遗址中出土麋鹿骨骼遗存研究》^[5]、《张忠培先生与河北考古》^[6]，魏曙光《河北肃宁后白寺遗址发现二里头及晚商遗存》^[7]等。

(张春长：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马超：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馆员)

参考文献：

- [1] 谢飞. 泥河湾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回顾与展望[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 [2] 胡金华. 河北定县 40 号汉墓出土黄金货币及相关的几个问题[J]. 中国钱币, 2018(3).
- [3] 黄信等. 河北井陘北防口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8(1).
- [4] 黄信. 河北邺城地区陶瓷窑址调查报告[J]. 文物世界, 2018(1).
- [5] 李文艳. 考古遗址中出土麋鹿骨骼遗存研究[J]. 文物春秋, 2018(1).
- [6] 李文艳. 张忠培先生与河北考古[J]. 文物春秋, 2018(3).
- [7] 魏曙光. 河北肃宁后白寺遗址发现二里头及晚商遗存[J]. 中国文物报, 2018-03-09.

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研究

金胜勇

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研究，历来都是河北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条目撰写，首先利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通过限定文献分类目录及作者单位进行一次检索，又通过限定中图分类号及作者单位进行补充检索；然后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

文津搜索系统，通过限定关键词，对相关著作进行检索。文献检索的查全率能够保证。本条目述及 100 余篇（部）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其中包含专著 1 部、核心期刊文章 56 篇。通过检索发现，2018 年河北的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服

务”“信息资源建设”“图书馆管理”和“文献学”等领域，其中研究“图书馆服务”的所占比重最大。

一、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作为认识和研究图书馆学的基点，对于探索图书馆的科学本质和引领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意义。本年度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图书馆学科学体系、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和图书馆事业等方面。

（一）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理论是实践的眼睛，而基础理论则是眼睛的瞳孔。巴特勒在构建图书馆学科学体系时，特别强调了阅读的作用，赵俊玲和郭畅深度梳理和评价巴特勒阅读思想的主要观点，指出虽然书籍、阅读以及图书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其根本性质和基本功能还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因此，巴特勒关于阅读的论述，对于阅读研究和图书馆学研究仍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探讨。^[1]

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在于给科学研究提供方法和途径，是科学研究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周莉在界定图书馆联盟概念的基础上，对图书馆联盟的复杂网络特征进行分析，以河北省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为例，深入分析复杂网络视角下图书馆联盟的形成机理，有向选择机理、学习机理、共享机理和协同机理在特定环境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图书馆联盟的形成和演化。^[2]

循证决策是基于证据的决策，证据的本质是知识，循证决策需要知识服务的支持。循证决策理论科学诠释了知识与决策的关系以及知识获取的途径和方法，是正确理解和科学实践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刘志国等人提出图书馆应该根据循证决策的要求深化服务，推动图书馆服务向循证知识服务发展。^[3]

（二）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鄂丽君对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发布的《SPEC Kit 350：支持数字学术》报告、美国图书馆协会及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网站发布的招聘信息、北美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页面等涉及的数字学术支持人员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揭示北美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支持人员的数量与类型、职位、负责的工作、学

位与技能，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具有借鉴意义。认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应适时设立数字学术支持职位，以现有服务为基础开展数字学术支持，构建以专门人员为主、其他人员参与的数字学术支持模式，尽量安排部门主任或高级技术职务人员参与数字学术支持工作，建立层次较高的数字学术支持人员团队。^[4]

高素质、能力强的图书馆员才能较好地引导阅读，提高阅读推广工作的品质，才能把全民阅读活动推向专业化、普适化和科学化。鉴于此，李菊花、樊会霞分析图书馆员的行为，认为在仪容仪表、言谈举止和职业技能方面的消极行为是导致读者产生挫折感的重要因素，加强服务礼仪训练和职业素养教育有助于改善馆员的服务态度，有助于降低读者的挫折感，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水平。^[5]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法案内有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条款，既明确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合法性，又在参与方向上给出指导性的意见。王云萍、梁向波解读分析该法案内规划扶持、捐赠引导、表彰奖励、志愿者服务几个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方面的条款，提出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可行方向，指出了该法案在社会力量的注册性质认定、社会力量的专业能力规范、运营管理规范、捐赠规范等几个方面还存在细节不完善的问题。^[6]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7年图书馆版》描绘了未来5年创新实践和技术对全球学术和研究型图书馆的深远影响。该报告是由新媒体联盟联合瑞士库尔应用科学大学、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图书馆以及美国学术和研究型图书馆协会共同推出的。赵艳、魏蕊等人对报告进行了翻译与分析得出：报告提出6项关键趋势、6项重要挑战以及6项技术的重要发展，主要包括：图书馆仍然是丰富信息和知识的守门人，将新媒体和技术纳入战略规划是至关重要的，图书馆必须适应与紧跟数据存储和发布，学术记录与出版物的格式的发展演变，开放获取是图书馆应对财政拮据问题的一个潜在解决办法，图书馆必须平衡其作为独立学习和合作场所的空间职能，数字学术技术支持图书

馆界研究领域不断演变,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将扩大图书馆服务的效用和边界等,为图书馆员、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工作人员、政策制定者和技术人员提供了参考和技术规划指南。^[7]

智库发展方面,高校图书馆智库一直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保障,它打破传统思维,利用自身科研、人才上的绝对优势,为国家政治、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王艳红、王崇皓等人认为虽然高校图书馆智库的建立为区域经济建设提供了优质的理论保障,但是单一性的理论依赖会阻碍其发展,建立高校图书馆智库联盟,既能解决单一性的弊端,还能有效的促进智库的发展。^[8]

二、图书馆服务

图书馆服务是指图书馆利用馆藏和设施直接向读者提供文献和情报的一系列活 动,有时也称图书馆读者工作。年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又多集中在高校图书馆服务和阅读推广服务研究领域,同时对知识服务的研究成果也有所增加。

(一) 阅读推广服务

阅读推广服务是图书馆向公众提供的一项重要 的阅读服务,对推进全民阅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国民阅读状况。陆遥对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并指出当前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不足:理论研究不够深入、评估体系不完整、活动不具备长期性、阅读推广馆员专业素质不高。^[9]赵俊玲等人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图书馆发展读书会的状况,梳理民国时期图书馆人组织和 发展读书会的理念和做法,对促进当今图书馆发展读书会具有借鉴意义。^[10]高玉洁等人通过对 2011—2017 年国内高校图书馆微媒体阅读推广论文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考察了国内高校图书馆微媒体环境下阅读推广的现状 及动向,认为高校图书馆微媒体阅读推广研究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11]

阅读推广人才培养方面,李杏雨等人通过构建由不同角色组成的阅读推广人团队,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发挥团队合力来进行阅读推广,对实现阅读推广活动的规范化、专业化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2]王荣荣等人认为一所理

想的大学图书馆,所奉献给学校和社会的不仅仅是优质的服务,还要通过工作实践和继续教育,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图书馆人才,生产出一批高质量的信息产品和科研成果,在由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学术交流变革引起巨大变化的数字时代,尤其应该看到这一点。^[13]

在具体的阅读推广内容方面,崔稚英依据德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实际案例,分析其设计思路、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得出阅读推广不仅是对阅读行为本身的推广,还是对阅读辅导服务的推广,也是对图书馆服务方式的推广。^[14]赵俊玲等人通过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关于阅读吸引力元素理论的研究进行分析,从理论的萌芽、正式提出、发展三个阶段对阅读吸引力元素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对具有代表性学者关于阅读吸引力元素理论的研究进行阐述,提出国内应加强以读者为中心的书目推荐相关研究和应用;加强阅读吸引力元素理论研究和应用。^[15]

在儿童阅读推广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多成果,王学贤等人通过介绍“加拿大儿童图书周”“暑期阅读俱乐部”“一年级赠书”“原住民暑期识字夏令营”4项活动,分析加拿大少年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的特征,建议我国少儿阅读推广应该加强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挖掘本土优秀少儿读物创作者及其作品、加强面向弱势少年儿童群体的阅读推广、树立品牌意识和营销意识、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16]金胜勇以儿童权益和近代公共图书馆发展的社会背景为起点,揭示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儿童阅读从零开始的现状,通过分析近代历史资料,描述随着时间推移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及阅读推广的发展情况。^[17]孙玲玲等人针对目前我国民营儿童图书馆(绘本馆)建设与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公共文化服务视角的发展路径,一是扩大规模,加强合作,推动绘本馆“公”与“私”融合发展;二是加大宣传与推广力度,优化微信公众号内容,增加绘本馆的增值服务内容;三是引进高素质专业人员,提高其管理与服务水平。^[18]

(二) 知识服务

知识服务是当前图书情报界理论研究和 工作实践关注的热点之一。刘志国等有通过对与知识服务相关的概念和原理进行分析,发现知识服务是能更深入、更全面满足读者显性知识和隐性知

识需求,促进读者与知识进行更好交流的服务,同时也提出图书馆需要在深刻认识知识服务并处理好与文献服务、信息服务关系的基础上,以知识交流为中心并大力提高馆员的隐性知识水平,开展知识服务。^[19]

阅读疗法服务是典型的知识服务模式,具有较高的知识服务特征分析价值。杨双琪等人回顾了我国2001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儿童阅读疗法研究成果,通过对相关研究内容和类型的分析,总结了研究的现况和特点,并结合存在的问题,为未来儿童阅读疗法研究发展提出了建议。^[20]胡大翠等人阐述了儿童阅读疗法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推广意义,介绍了唐山市丰南区图书馆开展儿童阅读疗法的团队建设、文献资源建设、系列活动等实践探索,总结了该馆儿童阅读疗法服务取得的成效并提出了儿童阅读疗法工作的展望和设想。^[21]杨淑亚等有分析了国内高校图书馆阅读疗法研究现状及国内高校图书馆阅读疗法文献,并根据阅读疗法的要素、资料源、阅读疗法的方式,构建了阅读疗法的服务模式,即群体模式、个体模式。^[22]

学科服务同样是属于知识服务。李素娟在明确我国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流学科建设中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应从助力学校一流师资队伍建设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助力学科特色建设、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和传承创新学科文化等方面入手,制定学科服务发展策略,为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创新思路。^[23]王丹等人选取了10个代表性学术科研类微信公众平台作为研究案例,调查并分析了其基本发展情况、功能模式和传播内容等方面,讨论了当前国内学术科研微信公众平台成功的经验及存在的不足,旨在为改进同类平台的学术科研服务提供借鉴。^[24]

知识服务技术研究方面,董建忠等人基于关联数据的高校馆场景化知识服务系统构架设计,通过将不同类型资源内容的关联化深度整合,并无缝链接外部广阔的相关资源,服务于提高语义关系发现的效率;将高校传统“教与学”关系与“场景”相关理论相结合,实现高校馆虚拟“教与学”场景的知识服务架构设计。^[25]刘海鸥等人认为大数据环境下,推荐系统项目评分的稀疏性问题愈加突出,单兴趣表示方法也难以对用

户多种情境兴趣进行准确描述,导致推荐结果精度大大降低,鉴于此,提出一种多情境兴趣表示方法,在此基础上构建面向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的多情境兴趣推荐模型。^[26]

(三) 服务方式创新

李燕燕等人对接“互联网+”思维,运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调研学生的阅读态度、阅读行为、阅读环境,探讨制定符合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自身发展优势的、切实可行的阅读推广模式,以期增强图书馆理论研究的针对性和完整性,丰富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和转型发展的相关理论。^[27]

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已经进入到图书馆服务中。王荣荣简要介绍AI在资源建设、信息组织以及信息服务三方面对图书馆服务提出挑战的基础上,着重从文献资源、人力资源、共享空间以及服务项目等方面探讨AI与图书馆服务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强调思维方式转变与决策架构转变在“AI+library”服务中的重要性,为图书馆的创新发展与转型升级提供的实践案例。^[28]刘海鸥等人构建了大数据深度融合的移动图书馆情境化推荐系统,通过深度融合图书馆用户的情境信息,有效缓解大数据环境下评分数据稀疏导致的推荐性能下降问题;同时采用Map Reduce的并行处理方式,以此提高大数据的融合与挖掘性能。^{[29][30]}

赵想飞从学科服务、个性化服务、技术支持服务及成果转化服务等方面分析图书馆目前存在的不足,并从学科服务、个性化服务、技术支持服务及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方面探讨图书馆内涵式发展的方法及途径,以实现图书馆在资源保障、服务和技术等方面的跨越式发展,满足学校的“双一流”建设要求。^[31]

(四) 高校图书馆服务

鄂丽君等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高校科研人员的科研行为及对高校图书馆服务的需求,从科研人员的科研合作情况、科研人员涉及的数字学术内容及在科研中使用的数字工具、科研人员对高校图书馆的服务需求与建议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存在科研人员学历越高,与专业馆员合作越少,以及对使用数字工具的重视程度不足等问题。^[32]

高校图书馆基于新媒体的服务研究取得一定

的进展。丁玉东等人针对传统读者讲座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新的按需讲座预约系统框架及服务模式,该模式通过提供嵌入读者环境的精准化服务,能够提升读者体验,满足读者个性化需求,照顾到传统信息素养教育的“长尾”,实现馆员隐性知识的转移,有利于馆员自身的成长和学生信息素养的整体提升。^[33]白静等人分析微信及公众平台概念以及在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系统构建中的优势,针对微信公众平台在高校图书馆服务系统中应用的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探索微信公众在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应用中的创新途径和优化策略,为提高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水平提出合理化建议。^[34]魏小贞等人认为高校图书馆利用新媒体服务需要注意保持对新媒体的敏感、重视人才储备、新媒体运营团队建设、关注用户需求及行为、重视原创和个性化服务以及加强跨平台联动服务等。^[35]

对于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孙秀菊等人通过研究和梳理相关文献,对我国近30年来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总结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进一步加强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的建议。^[36]张晓霞通过访问河北省121所高校图书馆主页和文献调研相结合的方式,深度调查了目前河北省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整体开展的实践现状,分析归纳了其社会化服务面向的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内容及模式、实施细则等方面的情况及特点。^[37]李素娟认为高校图书馆应建立健全面向地方企业的专利信息服务体系,明确服务内容,构建合理机制,形成“品牌化”服务。^[38]

李菲等人通过界定大学图书馆科研智库服务的定义,利用SWOT方法分析大学图书馆科研智库服务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对大学图书馆科研智库服务内容进行定位,基于科研数据的生命周期理论构建服务模式并提出应用对策。^[39]

孙秀菊在分析高校图书馆构建社会读者学习共享空间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从物理环境、虚拟环境、管理和服务三方面提出了学习共享空间的构建方案,并指出了在学习共享空间建设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40]

国外图书馆服务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地方。鄂丽君等人在分析英国高校图书馆界数字学术服务研究的基础上,调查了英国高校图书

馆数字学术服务实践的开展情况,分析英国7所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的学科范围、数字学术服务团队及服务内容、数字学术服务中的合作、数字学术服务机构的组成、数字学术服务的方式,并结合我国图书馆界数字学术服务研究与实践进展,提出建议:建立数字学术服务咨询与指导委员会、数字学术服务管理委员会,加强自身服务能力建设,为用户提供数字学术服务并与用户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合作开展数字学术服务及相关经验的交流学习。^[41]杨海燕通过分析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团队、学科服务内容和模式、学科服务的典型案例,提出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的建议:整合学科资源,重组与拓展空间,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学科服务;提供精细化服务,体现人文关怀;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培养用户版权意识,加强版权信息服务。^[42]

三、信息资源建设

信息资源建设是人类对于无序状态的各种媒介信息进行采集、选择、组织和开发等活动,使之形成可资利用的信息资源体系的全过程。年内信息资源建设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资源建设理论、信息资源建设实践、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领域。

(一) 信息资源建设理论

在馆藏优化方面,孙卫忠等人将博弈论均衡思想引入图书馆图书类别经费分配方案组合赋权中,确定图书类别的综合权重。该方法具有较强的数学理论依据,避免了人为主观确定权重对结果造成影响。以河北工业大学为例进行了实例分析,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为图书采购经费的优化配置提供了一种新思路。^[43]刘绍荣通过对高校图书馆纸质期刊订购、管理、阅读模式的调研,认为在数字出版环境下高图书馆应该重新定位纸质期刊的功能,提出简化休闲娱乐期刊管理流程、适度保存科研学术期刊品种、分时段保存过刊,推行区域共存共用、改变订购模式,实现读者驱动、关注读者利用数据,动态管理期刊的管理策略。^[44]

在数据管理服务模式方面,张连分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采取的基本服务模式主要有两点:一是建立数据管理服务综合联系平台;二是按照国家科研资助机构的政策要求和数据管理基

本流程提供服务。这些服务成效显著,提高了数据存取效率,保证了数据安全,促进了数据共享。^[45]

(二) 信息资源建设实践

在馆藏资源建设方面,支凤稳等人通过对WOS收录的1996—2018年间的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发现国外馆藏数字资源语义化研究发展缓慢,不同国家间的研究成果差别很大,美国和欧洲优势明显,该领域高影响力的作者总体偏少,内容繁杂,研究以理论构建为主,研究方法相对单一。^[46]张华春等人以国立大学图书馆藏书章为例,详细阐述了民国藏书章形制、墨色、内容等及图书馆管理机制,通过藏书章使人们更直观了解民国特色资源发展变迁的魅力。^[47]季双琪对美国图书馆开展的口述历史资源库建设进行研究,发现美国图书馆口述历史资源库建设具有良好的资源基础、较为详细的元数据描述、方便快捷的资源获取途径、严格有效的著作保护措施和专业化的资源库平台系统等特色,能够为我国图书馆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48]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工作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话题。姜新、孙玲玲根据地方高校图书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的情况,讨论非遗数据库的创建工作,对建设地方高校图书馆非遗数据库的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个性化服务体系进行了详细介绍。^[49]

在资源整合利用方面,曹健等人通过文献综述法分析了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大数据分析的现状,研究了基于Hadoop的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大数据分析系统,详细介绍了该系统基础数据集成、读者标签化、资源分析、业务分析以及系统综合管理等五个组成部分的功能设计。^[50]

如何从大数据中挖掘出与用户情境精准匹配的知识服务资源并及时推荐给相应用户,成为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亟待解决的问题。刘海鸥等人提出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的情境化推荐系统框架结构,并通过融合图书馆用户的情境信息进行大数据知识服务的协同过滤推荐,由此缓解数据稀疏性导致的推荐性能下降问题,同时采用MapReduce的并行处理方式,以提高大数据的并行挖掘性能。^[51]数字资源种类多且数据量不断增大,用户在利用信息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信息过载与信息迷航的现象。鉴于此,耿立校等人基于

内容的过滤推荐中,针对向量空间模型表示文本时容易造成维度灾难的问题,提出利用余弦值 r 与匹配度值 Sim 相结合的方法对原有模型进行改进,并利用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的相关数据对改进模型、向量空间模型及LDA主题模型进行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改进模型相比较于实验中的向量空间模型与LDA主题模型具有更高的应用价值与运行效率。^[52]

在数字资源聚合方面,王学光等人对数字资源聚合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分析对图书馆数字资源进行聚合的必要性和意义,并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应用到数字资源聚合中,构建了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图书馆数字资源聚合模型。^[53]鄂丽君等人通过调查北美高校图书馆开展的数字学术教育,提出我国高校图书馆应提高对数字学术教育的重视、明确数字学术教育的基本内容、创新教育活动的形式、开展嵌入式的教育活动、合作开展教育活动。^[54]

在资源采购方面,王永华对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的读者借阅需求进行统计分析,指出其当前图书采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配置馆藏经费,多方位开拓采访渠道,实现采访模式多样化,提高采访人员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建立完善的采访质量评价体系等改进措施。^[55]王淑梅等人对《程焕文之问》中的观点进行汇总,根据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提出了外文数据库订购时应采取的对策及技巧,订购外文数据库过程中要仔细核对本校基础数据,试用数据统计要符合国际标准,对读者进行合理使用数据库宣传,数据库采购公开招标等几点建议。^[56]

在图书馆空间建设方面,谢姝琳从引入、转型与反思3个视角对国内图书馆空间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分析发现,舶自境外与学科交叉显示了空间问题的广泛性与综合性,以人为本与多元趋向的空间转型昭示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在话语构建与本源回归的空间反思中,如何厘清图书馆空间的论域,如何彰显本土特色的理论构建,如何拓展空间而不忘图书馆“初心”,尚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57]刘坤照对高校图书馆网络信息空间服务新模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为了更好地提升高校图书馆自身价值,推动高校图书馆的创新发展,必须建立“以人为本”的网络信息空间服务新模式,加强服务双一流大学建

设,发挥图书馆网站的主导作用,积极开发建设网络新媒体,参与 MOOC 慕课的推广利用。^[58]

戎军涛等人以“数据密集型”研究范式和“知识管理”理论为主线,运用概念模型法和系统论方法详细研究了科技智库知识服务模型,提出了知识服务的范式、价值链模型和驱动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科技智库知识服务机制,揭示了智库知识生产的机理,建立基于“数据—情报—智慧”的服务体系,为新型科技智库的决策咨询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建设思路。^[59]白琳琳阐述了高校图书馆建设新型特色化智库具有明显的优势,剖析面向智库建设的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监管服务平台构建意义,介绍面向智库建设的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监管服务平台构建流程,并从三方面提出展望:建立高校图书馆智库联盟体系,促进科学数据的共享与传播;建设智库资源共享平台,增强数据监管的科学性;丰富高校图书馆科研组织范式,驱动科学数据监管服务完善。^[60]孙会清等人对 15 所美国知名高校机构知识库的使用软件、存档数量、收录学科范围及语种、收录资源类型、是否遵循 OAI-PMH、相关政策制定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认为我国应赋予高校机构知识库多重价值和功能,拓展机构知识库的增值服务内容,提高机构知识库的技术性能和开放程度,扩大机构知识库的成果收录范围,详细制定机构知识库的相关政策。^[61]

(三)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

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指信息机构对信息资源进行有计划地积累和合理布局,以满足、保障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需要的全部活动。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图书馆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研究主要集中于创客空间、学习共享空间、开放获取、文献交换方面。

在学习共享空间方面,李雁英、梁焯以数据策管理念及 OAIS 开放档案信息系统作为参考模型,提出了基于数据策管理念的 DLC 资源建设模型,将情报服务、文献服务和信息素养教育之间的无缝衔接。注重信息资源的共享,采用多样化和便利化的服务方式,为校园乃至社会提供符合用户需求的内容,形成图书馆服务内容与信息系统一体化整合的服务平台。^[62]创客空间是一个聚集志同道合的创客,供其分享学术成果、信息

技术及各种创意知识,并开展交流、合作、动手参与创造的共享空间。林青等人在“双创”时代为背景下,对高校图书馆建立创客空间的可行性和构建内容进行了研究。认为高校图书馆探索创客空间构建,不但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更重要的还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与院情、馆情相符合的构建方案和服务模式。^[63]吴卫华等人通过研究对比国内外图书馆众创空间建设及服务现状,提出了加强创客文化宣传、搭建智能化创客服务平台、开展协作嵌入式创客服务、重视创客教育服务的高校图书馆众创空间服务策略。^[64]此外,吴卫华对美国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构成、服务对象、服务内容、设备设施、资金来源、运营模式等方面进行调查,对比我国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建设,认为国内高校图书馆应向美国高校图书馆学习,完善创客空间的管理制度,拓展创客空间的资金来源,采取适宜的创客空间运营模式,重视创客空间的馆员队伍建设,注重创客文化宣传与教育。^[65]李文玥通过调查我国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实践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创客空间建设要与用户需求相结合,与现实空间匹配,必要时与其他单位相互合作,同时也要遵循高校发展政策。^[66]汤沙沙、王师怡以河北经贸大学图书馆为例,以师生需求为导向,构建创客空间的物理空间、虚拟空间并建立了运营团队和规章制度,认为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的构建要结合学校优势学科,寻求校企合作扩大社会影响,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67]

在开放获取方面,李树霞等人利用网页调查的方法从高校图书馆开发、揭示和利用开放获取资源 3 个方面调查分析了目前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实践进展的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开发新中文开放获取资源、提高共建特色数据库的利用率、参考其他馆建设、利用好开放获取资源等改进措施。^[68]

在文献交换方面,丁若虹通过河北省图书馆与日本鸟取县立图书馆在文献交换基本情况、具体做法、交换文献的管理与利用、实践意义方面的对比,总结实践经验,提出要扩大与其他国家馆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拓展合作内容,创新合作形式,促进国际文化的深度交融,让世界了解中国。^[69]

公共图书馆作为政府开办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公益性文化机构,资金来源、服务人群、服务目标上的高度一致性,在区域协同发展上也具有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基础优势。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雄安新区这一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背景下,三地公共图书馆合作发展无疑具有更加重要和紧迫的现实意义。余兵、张沫以京津冀三地公共图书馆合作共融为切点,对三地公共图书馆服务合作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这种服务合作是在自上而下的强力政策推动下进行的,三地基层图书馆共建共享服务深入开展,从图书馆延伸文化服务合作到整体合作逐步推进。^[70]

四、图书馆管理

学者们在图书馆管理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服务管理、图书馆管理模式与机构设置和其他共三方面。此外,还涉及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公共图书馆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等方面。

(一) 图书馆服务管理

公共图书馆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决策咨询服务效能的提升在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郭巧玲、吴迪等人分析了河北省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现状,论述了影响河北省图书馆决策咨询服务效能的因素及提升服务效能的策略,提出提高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议。^[71]

加拿大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学术支持以学术研究支持为主,并渗透到教学环节,在数字项目支持方面突出了技术、平台等优势,数字学术支持内容突出了人员技术、图书馆资源与平台等优势。鄂丽君通过调查加拿大高校图书馆开展的数字学术支持现状,提出重视基于数字与计算工具的服务、创建跨学科协作的学术研究氛围、重视专业馆员队伍建设、加强数字学术支持中的合作等服务内容,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相关服务提供借鉴。认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应紧跟国际图书馆服务发展的趋势,创新服务,提升服务能力。^[72]

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是由美国和加拿大的124所研究图书馆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由42所高校图书馆与研究图书馆的主管发起,致力于解决与研究、

图书馆、高等教育、学术交流相关的问题。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支持是数字人文支持的扩展。ARL成员馆通过扩展服务、服务机构重组、与校内外机构合作等方式,建立了数字学术中心。ARL成员馆的数字学术中心实施了建立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关系、开展数字学术教学活动、设立研究员基金、深入支持数字学术项目研究等服务举措。借鉴于此,鄂丽君提出我国高校图书馆应加强与校内研究机构的联系,探索建立数字学术中心的适合方式,培养具有数字学术服务能力的馆员,开展数字学术相关培训并支持数字学术项目研究。^[73]

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高等院校招生人数持续增长,图书馆的读者也逐年增多。然而在高校不断发展,人数增多的同时,有些问题也逐渐显露,出现了个别读者破坏图书、毁坏设备、行为不文明等现象。李晓君对诸如此类的高校图书馆个别读者诚信缺失问题进行分析,得出高校图书馆读者失信行为主要表现为图书逾期不还、书刊损毁、电子资源恶意下载、违规使用自助借阅设备和大声喧哗等。提出高校图书馆应当重视读者诚信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读者诚信教育活动,以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74]

(二) 图书馆管理模式与组织机构设置

图书馆跨界合作是指通过与外部的资源、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融合渗透,为图书馆的成长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达到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目标。默秀红阐述了图书馆跨界合作的概念,梳理了“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跨界合作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进展,对图书馆跨界合作服务创新的路径和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就当前图书馆跨界合作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图书馆跨界合作提出一些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及保障措施,如保持开放思路,不断创新服务、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建立多渠道资金保障措施、解决好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完善活动评估、反馈机制等。^[75]

大数据环境下,以年度数据账单方式进行的数据推广工作受到越来越多高校图书馆的认可与使用,但不同机构的年度数据账单内容、模式及推广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常颖聪、路程对国内高校图书馆年度数据账单推广内容及现状进行调查与研究,发现当前高校图书馆年度数据账单推广

并没有统一且长效的模式,并存在时间持续性差、内容价值不完善、文化传承与延展功能及效果缺失等问题。建议从数据推广内容的价值度与活动的持续性、营销品牌构建、基于用户画像的图书馆服务优化策略等方面进行改进与提升。^[76]

杨艳红针对高校图书馆组织结构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高校图书馆组织结构变革的影响因素以及组织结构的基本类型,探索分析了高校图书馆组织结构的变革趋势。认为国内外图书馆机构变革的实践呈现工作朝向用户中心化、部门设置集成化、机构管理柔性化、组织结构虚实一体化、组织结构形式多样化等变化趋势。^[77]

李东燕认为,图书馆在传统管理模式中,管理工作任务繁重,压力较大。而大数据背景下,图书馆管理者可建设信息化管理模式,提升图书馆管理工作整体速率。因此,以提升图书馆管理工作效率为目标,提出基于大数据的图书馆图书管理信息化策略,包括图书录入服务系统化、图书管理工作自动化、图书资源输出可控化等。^[78]

在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信息化管理势在必行,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有利于促进图书馆信息化发展。李东燕、董文域通过分析图书馆信息化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信息化管理提出了增强管理人员信息化管理意识、提高管理人员信息化能力、加强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等建议。^[79]杨曙红通过对图书馆创新信息管理与服务的分析,探讨大数据对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影响,研究了基于大数据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内容以及大数据环境下构建图书馆信息服务创新模式。^[80]

卢木斋为清末官员,在任时积极倡设图书馆,后来脱离官场开办实业,设立木斋教育基金,一生中六次创设图书馆,支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其中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是其以自己藏书及所刊图书为基础开办的,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图书馆。张梅、孙丽芳对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进行研究,发现其馆藏丰富、特色突出、理念先进、管理完善,其发展及运营对今天的私立图书馆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81]

(三) 其他

隐性知识中蕴含着丰富的创新资源,可有效提升区域的创新能力与创新绩效。宋乐平分析当前区域创新体系中隐性知识管理存在的问题,并

立足图书馆知识管理的职能,提出依托图书馆从行业角度梳理和整合区域隐性知识资源的方案,进而依据区域隐性知识的类型探讨了促进隐性知识交流的方式。^[82]

刘静在探析公共图书馆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作用机理基础上,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分别对2000年和2015年我国公共图书馆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我国各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与区域经济协调程度和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公共图书馆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83]

刘海鸥等人指出,用户画像是一种快速、精准分析用户行为模式、消费习惯等商业信息的数据分析工具,为企业进行精准营销、提升用户体验奠定了基础。^[84]对读者进行画像可以协助图书馆进行信息过滤,从而为用户推荐与之相匹配的信息服务资源。海量数据标签化的图书馆用户画像模型相比于传统的用户模型更具柔性,更注重用户需求的变化。通过对用户的信用行为进行记录,可以构建用户的信用画像;当用户出现失信行为时,则可基于用户画像对读者的失信行为进行分类管理,同时还可以将读者在图书馆的失信行为信用纳入个人征信系统。^[85]

阅读环境的影响方面,刘孝文等人立足于家庭阅读环境的角度,旨在探讨阅读环境、阅读动机与阅读素养的相关性。认为家庭阅读环境能够影响青少年阅读动机的形成,优质的家庭阅读环境能够形成正向、积极、主动的阅读动机,建议通过改善家庭阅读环境、端正阅读动机与改进阅读方法来提升青少年阅读素养。^[86]

国内移动阅读的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李雁行以2004—2018年CNKI中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收录的541篇移动阅读领域的研究论文为样本,利用Cite Space软件进行科学知识图谱绘制和关键词聚类,分析移动阅读研究的文献年代分布、主要研究力量、基金资助情况、高被引文章及发展演化路径等。发现移动阅读研究领域已形成了移动图书馆、移动新闻媒体、移动数字出版、电子图书、移动阅读终端、移动阅读推广等研究热点。对我国移动阅读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及演化路径的揭示,可为该领域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参考。^[87]

五、文献学

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年内文献学研究,主要涉及版本学、校勘学、古典文献学专题等领域。

(一) 版本学

版本学通过广泛搜集不同版本,可以刊勘纠谬,为校勘提供基础,避免谬种流传贻误后学,它还可以比较优劣,选择善本,指导阅读。赵嘉通过对清初汪士汉编纂的《秘书廿一种》丛书中《白虎通》的版本进行调查,第一次将此书的版本刊刻顺序加以梳理,以说明清代书坊刻书之复杂与一般官刻、私家刻书不同,以期为日后清代书坊刻书研究提供借鉴。^[88]

李雪铭介绍了萧穆的生平,以其著有的《敬孚类稿》为研究核心,分析了《敬孚类稿》的主要内容,并论述了其历史文献价值^[89]。

张蕾认为,清纪昀所作《玉台新咏校正》广为传抄,抄本品质各异,而徐行可朱笔校订本堪称其中的精校本。其校订之功包括校改抄本讹误、修正稿本疏误、遵循择善而行的校勘原则等诸多方面。严谨细致的校勘工作,使其品质得以超越同一版本系统的其他抄本。尽管尚存偶见漏校、臆改之憾,仍不掩其优异之处。^[90]

李志影梳理了《宾退录》版本流传的概况,对该书的版本流传情况及递藏源流进行考述。指出《宾退录》由南宋赵与时汇集平日见闻及与宾客所谈论的内容,宾退后笔录成编。《宾退录》诸多版本的保存,使后人能更进一步地了解它,其文献价值及史料价值也为日后的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服务。^[91]

(二) 校勘学

校勘学是一门综合群书,比勘其文字、篇章的异同,纠正其讹误,力求接近原文真相的学问。时亮将《明史》相关列传与各朝《明实录》、万斯同《明史》、王鸿绪《明史稿》等文献相对校,试考证《明史》相关列传中吏部长官仕途履历方面的讹误,以期在二十四史重新点校之际,对《明史》校订有所裨益。^[92]

梁春胜参照京都大学藏拓和前人录文,对《汉魏六朝碑刻校注》录文试作订正,并对此碑的史料价值作一些说明。指出北魏霍扬碑其录文至少有近十种,在历史、书法、文字等方面均具

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因原碑剥蚀较甚,各家录文误读之处颇多。作者对各家录文作了汇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霍扬的家世,认为霍扬很可能是晋交州刺史霍弋的后代。^[93]

郭万青对吴汝纶点勘、吴闿生续成的《桐城吴先生点勘国语》中吴闿生案语 27 条进行辨证,27 条中涉及文字校勘的 5 条,通过文字改读进行训释者 5 条,训释语义者 12 条,释文字通借者、解释句读者、评韦注之精当者、释时代特征者、释表现手法者各 1 条。通过辨析可知,27 条案语中既有吴闿生个人的见解,也有与前人相同之处,其中有些说法颇有有益于《国语》研究,但有些说法有欠妥当。^[94]

张雨梳理了古人对《左传》中“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注释,并与今人注释作比较,发现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句读问题,即“西”字属上读还是属下读的问题。其次,对这句话的句读进行了梳理,发现句读和注释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再次,通过观察实际天文星象确定了这句话的正确句读,从而判定今人的注释和标点大多数是错误的。经过深入分析,认为刘歆的看法更符合实际情况。^[95]

(三) 古典文献学

文献学专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图录编纂、古籍修复与整理、书评等方面。赵嘉统计了清末至民国(1901—1944年)间共有 22 部古籍版本图录,并总结出清末至民国古籍版本图录的编纂特点,如在收录范围、编纂思想等方面都经历了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其间还出现了王文进《文禄堂书影》这一带有售卖性质的图录,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通过对这些古籍版本图录在编纂特征上的分析,反映出我国传统版本目录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规律。^[96]

马秀娟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茅山志》内容、编纂体例、版本源流、价值等进行研究。发现《茅山志》全书内容丰富、体例严谨、语言精洁,为学者研究茅山以及茅山道教历史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具有重要文献校勘辑佚、道教史料、文学史料以及科学等价值,希望藉此整理、传布《茅山志》,便于学人研究。^[97]

文献修复与整理方面,宋坤从文体的角度对天一阁藏《国朝诸臣奏议》纸背明代仓场公文中个人撰拟公文进行了大体分类及缀合复原。指

出这批公文是关于明代税粮征纳、仓库管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对于明代的仓储管理及公文制度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一,提供了研究明代税粮交纳程序的新资料;第二,对于研究明代的税粮运解制度提供了新资料;第三,为研究卫所徐丁的职能提供了新资料;第四,为研究明代基层公文制度提供了新资料。^[98]

姚娇等人对入藏邯郸学院首批太行山文书的太行山文书八路军收条进行修复,在国家图书馆修复专家的建议下,最终选用“挖镶”技法对其进行修复,并对这批文书的修复过程及技术手法做了简要阐述和探讨。^[99]赵嘉以黄丕烈藏书题跋的整理为例,讨论了古籍题跋整理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以期为当今古籍题跋的整理与研究方向提供借鉴和参考。^[100]

此外,董丛林就“民间文献”、“地方文献”概念界定方面所存问题,择述学术界富有启发性的意见,陈说自己的倾向性看法,认为按照定义须能反映该事物本质属性的原则,界定“民间文献”和“地方文献”的根本要素,当分别是其“原始民属”和“原始地属”,而非存藏处所。在“民间文献”“地方文献”的利用方面,特以《吴宝福日记》与“高沟事件”研究为具体事例,并结合学术界关于“四清”运动的研究概况来分析和说明。^[101]

(金胜勇:河北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 [1]郭畅,赵俊玲.巴特勒阅读思想评析[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8(4).
- [2]周莉.复杂网络视角下图书馆联盟形成机理——以河北省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为例[J].现代情报,2018,38(3).
- [3]刘志国,李欣依,陈威莉,李亚君.循证决策: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理论基础与行为范式[J].图书馆建设,2018(2).
- [4]鄂丽君.北美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支持人员设置调查与分析[J].图书馆建设,2018(1).
- [5]李菊花,樊会霞.公共图书馆馆员行为对读者挫折感的影响分析[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8,38(2).
- [6]王云萍,梁向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部分条款的解读[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3).
- [7]S. AdamsBecker, M. Cummins, A. Davis, A. Freeman, C. GiesingerHall, V. Ananthanarayanan, K. Langley, N. Wolfson, 赵艳,魏蕊,高春玲,王丹丹,杨志刚.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7图书馆版[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3).
- [8]王艳红,王崇皓,毕长泉,吴卫华,李杏丽,曹健.高校图书馆智库联盟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研究应用[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8,30(1).
- [9]陆遥.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现状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8(14).
- [10]赵俊玲,葛文娴.民国时期图书馆发展读书会之研究[J].图书馆杂志,2018,37(12).
- [11]高玉洁,唐品.我国高校图书馆微媒体阅读推广研究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图书馆研究,2018,48(6).
- [12]李杏丽,崔继方,吴卫华,杜鑫.基于Belbin团队角色理论的阅读推广人团队建设研究[J].图书情报导刊,2018,3(1).
- [13]王荣荣,武海英.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实践及优化策略研究——评《大学图书馆变革发展思考》[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3).
- [14]崔稚英.德国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典型案例与分析[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8(6).
- [15]赵俊玲,白人杰,鲍玉静.阅读吸引力元素理论的形成与发展[J].图书情报研究,2018,11(4).
- [16]王学贤,董梦晨,杨园利.加拿大少年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8).
- [17]金胜勇,韩晓晓.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及阅读推广述略[J].河北科技图苑,2018,31(3).
- [18]孙玲玲,关利革,刘丽.基于公共文化服务视角的民营儿童图书馆发展路径研究[J].文化学刊,2018(1).
- [19]刘志国,陈威莉,于晓宇,董亚臣.基于概念和原理认知的图书馆知识服务研究[J].现代情报,2018,38(3).
- [20]杨双琪,王景文,黄晓鹏.我国儿童阅读疗法发展与内容研究[J].晋图学刊,2018(2).
- [21]胡大翠,杨双琪,胡海燕,董子玉.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疗法服务实践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8,38(4).
- [22]杨淑亚,钱静雅,郝郁.高校图书馆阅读疗法服务模式的构建[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8(7).
- [23]李素娟.一流学科建设中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策略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5).
- [24]王丹,宋梦梦,魏蕊.学术科研类微信公众平台信息服务模式案例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8(9).
- [25]董建忠,任瑞娟.基于关联数据的高校图书馆场景化知识服务系统架构设计[J].图书馆论坛,2018,38(11).
- [26]刘海鸥,孙晶晶,苏妍嫒,张亚明.面向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的多情境兴趣推荐方法[J].现代情报,2018,38(6).
- [27]李燕燕,王喜明,史海嫣,王峰.基于“互联网+”思维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以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为例[J].图书馆研究,2018,48(3).
- [28]王荣荣,武海英.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服务的深度融合路径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8,30(11).
- [29]刘海鸥,黄文娜,苏妍嫒,张亚明.大数据深度融合的移

- 动图书馆情境化推荐[J].情报科学,2019,37(1).
- [30] 刘海鸥,陈晶,孙晶晶,张亚明.面向大数据的移动数字图书馆情境化推荐系统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9).
- [31] 赵想飞.“双一流”建设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内涵式发展研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8(15).
- [32] 鄂丽君,陈淑平,张丽舸,马兰.“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科研服务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8(11).
- [33] 丁玉东,许子媛,张春峰.高校图书馆预约讲座服务模式的改进与思考[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9).
- [34] 白静,苏然然,申晓杰.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8,5(38).
- [35] 魏小贞,韩曾丽,赵蕾霞.高校图书馆新媒体服务实践与探索[J].河北科技图苑,2018,31(3).
- [36] 孙秀菊,牛宝印.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发展历程回顾[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9).
- [37] 张晓霞.河北省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调查与分析[J].图书馆研究,2018,48(2).
- [38] 李素娟.高校图书馆面向地方企业的专利信息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18,31(2).
- [39] 李菲,林幢,于金平.生命周期范式下大学图书馆科研智库服务模式构建与应用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24).
- [40] 孙秀菊.基于学习共享空间的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创新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8(9).
- [41] 鄂丽君.英国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服务调查分析[J].国家图书馆学报,2018,27(6).
- [42] 杨海燕.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分析及启示[J].河北科技图苑,2018,31(4).
- [43] 孙卫忠,王志波,高迎平,李亚函,宁宁.运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的图书馆藏优化研究——以河北工业大学图书馆为例[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10).
- [44] 刘绍荣.数字出版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纸质期刊的重新定位[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9).
- [45] 张连分.大学图书馆开展数据管理服务的实践和成效评析[J].图书馆建设,2018(10).
- [46] 支凤稳,郑彦宁,杜薇薇.国外馆藏数字资源语义化研究现状分析[J].现代情报,2018,38(12).
- [47] 张华春,张靓涵.民国国立大学图书馆特色资源的创建——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等图书馆藏书章为例[J].上海高校图书馆情报工作研究,2018,28(4).
- [48] 季双琪.美国图书馆口述历史资源库建设特色及启示[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11).
- [49] 姜新,孙玲玲.地方高校图书馆非遗数据库的个性化建设和服务[J].教育现代化,2018,5(16).
- [50] 曹健,秦荣环,孙会清,毕长泉.基于Hadoop的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利用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3).
- [51] 刘海鸥,陈晶,孙晶晶,张亚明.图书馆大数据知识服务情境化推荐系统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8(8).
- [52] 耿立校,晋高杰,李亚函,孙卫忠,马士豪.基于改进内容过滤算法的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个性化推荐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8,62(21).
- [53] 王学光,马爱芝,穆莹雪.议图书馆数字资源聚合研究[J].智库时代,2018(19).
- [54] 鄂丽君,单伟,陈淑平.北美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教育调查与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8(02).
- [55] 王永华.基于读者需求的高校图书馆采访工作研究——以河北工业大学为例[J].河南图书馆学报,2018,38(1).
- [56] 王淑梅,闫俊婷,周学敏,张丽娟.高校图书馆外文数据库采购对策探讨——读《程焕文之问》有感[J].河北科技图苑,2018,31(5).
- [57] 谢姝琳.引入、转型与反思:国内图书馆空间研究脉络梳理[J].图书馆建设,2018(9).
- [58] 刘坤照.高校图书馆网络信息空间建设与服务创新工作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8(22).
- [59] 戎军涛,李华,乔伟荣.数据与智慧双轮驱动下的新型科技智库知识服务机制研究[J].图书馆,2018(07).
- [60] 白琳琳.面向智库建设的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监管服务平台构建研究[J].图书馆学报,2018,40(3).
- [61] 孙会清,杜鑫,廉立军.美国知名高校机构知识库调查与分析[J].情报杂志,2018,37(4).
- [62] 李雁英,梁焯.基于数据策管理念的高校数字化学习共享空间资源建设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18,31(3).
- [63] 林青,赵秀丽,李健.双创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构建研究[J].智库时代,2018(28).
- [64] 吴卫华,崔继方,王印会,秦荣环.高校图书馆众创空间建设及服务策略研究[J].图书情报导刊,2018,3(7).
- [65] 吴卫华,宋进英,王艳红.美国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建设实践与启示[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6).
- [66] 李文玥.中国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实践现状及发展探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8(4).
- [67] 汤沙沙,王师怡.高校图书馆创客空间建设构想——以河北经贸大学图书馆为例[J].河北科技图苑,2018,31(1).
- [68] 李树霞,张凤巧,王元立.高校图书馆开放获取实践进展研究——以农业大学图书馆为例[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8,30(01).
- [69] 丁若虹.国际文献交换实践探析——以河北省图书馆为例[J].山东图书馆学报,2018(06).
- [70] 余兵,张沫.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三地公共图书馆服务合作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03).
- [71] 郭巧玲,吴迪,赵昭.决策咨询服务视角下河北省图书馆服务效能提升策略研究[J].河北科技图苑,2018,31(5).
- [72] 鄂丽君.加拿大高校图书馆数字学术支持调查分析[J].图书馆论坛,2019,39(5).

- [73] 鄂丽君. 研究图书馆协会成员馆建立的数字学术中心调查分析[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8, 36(1).
- [74] 李晓君. 高校图书馆读者诚信教育探讨[J]. 河北科技图苑, 2018, 31(3).
- [75] 默秀红. “互联网+”背景下的图书馆跨界合作实践与思考[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8, 41(11).
- [76] 常颖聪, 路程.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数据推广内容及现状研究——以图书馆年度数据账单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 2018, 62(19).
- [77] 杨艳红. 服务创新与转型进程中的高校图书馆组织结构变革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 2018, 62(S1).
- [78] 李东燕. 基于大数据的图书馆图书管理信息化研究[J]. 智库时代, 2018(42).
- [79] 李东燕, 董文域. 互联网环境下图书馆信息化管理[J]. 智库时代, 2018(43).
- [80] 杨曙红. 信息时代下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研究[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8.
- [81] 张梅, 孙丽芳. 卢木斋与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J]. 河北科技图苑, 2018, 31(6).
- [82] 宋乐平. 基于区域创新的图书馆隐性知识管理探析[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8(3).
- [83] 刘静. 公共图书馆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J]. 新世纪图书馆, 2018(11).
- [84] 刘海鸥, 孙晶晶, 苏妍媛, 张亚明. 国内外用户画像研究综述[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8, 41(11).
- [85] 刘海鸥, 孙晶晶, 陈晶, 张亚明. 用户画像模型及其在图书馆领域中的应用[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8(10).
- [86] 刘孝文, 郭红英, 岳爱华. 青少年家庭阅读环境、阅读动机和阅读素养的相关性研究[J]. 河北科技图苑, 2018, 31(2).
- [87] 李雁行. 国内移动阅读研究热点及演化路径可视化分析[J]. 国家图书馆学报, 2018, 27(6).
- [88] 赵嘉. 《秘书廿一种》本《白虎通》版本考辨[J]. 山东图书馆学报, 2018(3).
- [89] 李雪铭. 《敬孚类稿》价值考述[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8(11).
- [90] 张蕾. 徐行可校订《玉台新咏校正》考述[J]. 文献, 2018(2).
- [91] 李志影. 《宾退录》版本流传述略[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18(8).
- [92] 时亮. 《明史》列传考误十七则——以吏部长官仕履为例[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8(1).
- [93] 梁春胜. 北魏霍扬碑校考[J]. 春秋文物, 2018(1).
- [94] 郭万青, 吴闳生. 《国语》案语辨正[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8(4).
- [95] 张雨. 《左传》“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论[J]. 古籍研究, 2018(2).
- [96] 赵嘉. 清末至民国古籍版本图录编纂特征分析[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18(5).
- [97] 马秀娟, 刘大彬. 《茅山志》研究[J]. 宋史研究论丛, 2018(1).
- [98] 宋坤. 天一阁藏《国朝诸臣奏议》纸背公文复原与价值新探——以个人撰拟公文为中心[J]. 文献, 2018(2).
- [99] 姚娇, 李楠, 邹蓓蓓. 太行山文书八路军收条的修复技法[J]. 图书馆杂志, 2018(7).
- [100] 赵嘉. 古籍题跋整理与研究应注意的问题——以黄丕烈藏书题跋的整理为例[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8(11).
- [101] 董丛林. 民间文献、地方文献的界定与利用[J]. 河北学刊, 2018, 38(4).

博物馆学与文化事业研究

李琳

2018年博物馆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和社会协同发展、博物馆教育与服务、博物馆陈列等方面。

一、博物馆与社会协同发展研究

罗向军认为让文物活起来是对博物馆工作中中心旨意的高度概括，也是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服务社会公众的内在要求。其途径一是深入挖掘馆藏文物特色，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的博物馆基本陈列；二是博物馆之间通过整合利用文物、技术、资金等资源，实现优势互

补；三是通过富有趣味、活泼生动的社会教育活动拉近博物馆与观众的距离，以文物和博物馆的独特魅力，潜移默化地感染、感动和启发观众，实现美的教育；四是研发与经营文创产品，盘活文物资源，以富有艺术感和生活气息的方式，进行博物馆文化的传播与教育；五是通过互联网和数字化系统，将博物馆中的文物、人员、观众更为便捷地连接起来，实现集约化发展，构建智慧博物馆。^[1]

王辉认为让文物活起来就要开发新的参观模式、新的展陈模式、新的运营模式。新的参观模

式要有新的讲解,要善于利用高新技术,加强和观众的互动,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开设网上博物馆。新的展陈模式重要的是建立数字化博物馆,利用数字影院、激光、数字场景等技术,建立数字化展览以配合实体展览,使观众耳目一新,并解开由于展品少造成的束缚。新的运营模式即博物馆的运营模式应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适应社会的发展,关注观众的需求。^[2]

王玉鹏认为文物的数量多少、珍贵程度、展出效果往往决定着一个博物馆的层次、实力和水平。但从另一方面说,一个博物馆仅有丰富的文物藏品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使馆藏文物活起来、动起来,将它们身上承载的深厚文化,以鲜活的形式抵达人们的身边、融入人们的心灵,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服务和文化教育功能。首先博物馆要抢救、征集大量丰富且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文物;其次对展陈内容要精挑细选,展陈形式力求丰富多样、动静结合,做到平面展出与主体再现相得益彰,传统艺术与现代手段完美融合,充分运用多媒体、场景复原、观众互动游戏、现场动手体验等多种形式和手段,提升观众的新鲜感和兴趣度,使之在参观中感受传统、触摸历史。第三要加大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力度,延伸博物馆藏品的生命,创新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新途径,坚持走“艺术品实用化,实用品艺术化”的路子。^[3]

黎波就文旅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定位以及发展方向提出个人的思考和建议。认为博物馆与旅游产业具有截然不同的行业属性,前者属于典型的文化事业范畴,后者是运作相对成熟的文化产业,但总体上讲博物馆与旅游都是关注人们的精神需求,担负着共同的社会责任,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更存在着融合发展的内在属性关联。博物馆区别于其他旅游景点,吸引了众多观众的不只是其舒适的环境和声光电等高科技的体验,更为突出的优势是陈列展览。博物馆展览陈列的内容、形式在充分关注社会公众需求的同时,其运作方式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寻求开拓和创新。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应坚持以社会效益为前提,以公众的需求为导向,以文物研究为基础,深入挖掘文物资源的价值内涵和历史文化元素,广泛应用多种载体和表现形式,开发出艺术性和实用性有机统一,并

适应现代生活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4]

徐艳红等对2018年河北省博物馆的创新工作进行了总结:一是创新策展理念,立足本省文物资源特色,撷取河北历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推出了“世界故事”“中国故事”“河北故事”“自然故事”四大展览体系;二是创新展陈方式,采用大型互动体验、原创动漫展示、高清互动三维展示等多媒体展示手段,为观众提供参观的新途径,获取参观新体验;三是推出了自助语音导览、手机智能导览等新的服务,推出了“数字展馆”、手机微视频等服务项目,给观众提供更便利的参观条件;四是依托河北深厚的文物文化资源,打造了“文博讲坛”“快乐学堂”“博秀剧场”“青葵剧社”“博物馆里的动物世界”“博物馆之夜”等品牌社教项目和专题文化活动;五是开发了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当选中国博物馆协会“最具创新力博物馆”荣誉称号。^[5]

耿超等编写的《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结合当前博物馆发展趋势,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既系统介绍了博物馆学的基本理论,强调了多学科交叉在博物馆研究方面的积极意义,又论述了博物馆陈列设计、观众服务、文化产品开发与经营等博物馆实务,对新技术、新理念在博物馆中的应用前景以及高等院校文博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展望。特别是对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和手段在博物馆工作中的应用等给予了充分关注,如互联网+、手机App、智慧博物馆等。^[6]

二、博物馆管理体制研究

当前理事会制度作为中国博物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逐渐兴起。罗向军考察了博物馆理事会制度的历史、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运行机制以及在中国的推行情况,总结了当前中国博物馆理事会制度的运行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发展的两种形态。指出理事会作为一项对博物馆管理行之有效的制度,在欧美国家已较为成熟。2014年,中国的广东省、云南省博物馆率先成立理事会。作者认为:目前中国博物馆理事会制度有三种模式:领导任理事长模式、专家咨询模式和馆长兼理事长模式,存在着理事会权利设置虚化、

决策职能难落地等问题,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中国博物馆理事会未来发展的建议。^[7]

三、博物馆教育与服务研究

刘卫华认为当前高品位的教育项目成为博物馆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并就教育项目的品牌化建设提出了建议。^[8]作者还总结介绍了河北博物院举办的“博物馆里的动物世界”亲子学习项目的成功经验:结合儿童心理特点设定主题;创设自由情境,促进智能全面发展;加强亲子互动,促进儿童情感发展。^[9]

玛丽亚·蒙台梭利是意大利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教育理念的核心观点是让儿童在“导师”的引导下,在“有准备的环境”中通过自主“工作”激发儿童的“内在生命潜力”,使其身心得到“自由”发展。张晓鹏认为博物馆儿童教育运用蒙氏教育理念有自己的优势:首先博物馆儿童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有力补充;其次博物馆灵活的教育形式是儿童教育的最佳“环境”;第三,博物馆藏品是儿童教育的最佳“教具”。博物馆儿童教育对蒙氏教育理念的借鉴,一是要明确以“儿童为本”的理念,可操作性、探索性强的互动式教学更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二是要充分注重教师的“引导”作用,把握好一个“度”,既要讲“自由”,给儿童适当的时间和空间,也要讲“纪律”,不能让幼儿放任自流;三是强调儿童“工作”的目的性,在教育定位上应有别于学校的知识传授,将儿童能力的提升作为博物馆教育的核心内容。^[10]张晓鹏还基于博物馆资源课程化下的儿童教育路径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博物馆儿童教育仍处于摸索阶段,无论在课程设置、课程形式等方面都不够理想,需要博物馆有效整合资源,实现博物馆资源课程化,为儿童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教育资源平台,促进博物馆儿童教育的长足发展。作者以河北博物院的“快乐学堂”之“河北传统文化艺术”系列课程为例,阐述博物馆开发儿童教育项目的基本路径,提出了博物馆资源课程化的改进建议。^[11]

2016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推出关于推进中小学生学习旅行的意见,许多中小博物馆列入“全国中小学生学习实践教育基地”,给博物馆等传统社会教育机构在教育人员、教育理念、项

目评估等方面带来诸多挑战。马率磊结合邯郸市博物馆的教育实践经验,就贯彻落实教育部意见提出建议:一是更新观念,整合博物馆教育队伍;二是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和成长需求,依托本馆文化资源优势,开发特色项目,不断丰富项目形式,拓展教育内容;三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评估标准,更好的发挥对研学旅行工作的引领作用。^[12]

高峰认为中国的公共博物馆一直是使命型的博物馆,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连。要做到博物馆与社会协同发展就要提升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一要以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为出发点,最大化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二要树立现代意识,以人为本,寓教于乐。陈列选题要体现新角度、新成果,在展示上进一步研究观众的新视角,运用现代感的设计去制造情境和氛围;三要做好公共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核心就是要提高服务意识。还要加强对外协作,努力做到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实现双赢或多赢。^[13]

四、陈列艺术研究

《匠艺百年——河北省传统手工技艺“织染纫绣”系列精品展》获得观众广泛好评。赵雅聪认为新颖独特的陈列艺术设计思路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一是巧妙利用空间并适当造景,布置了如屏风、廊柱、展墙和双面柜等多类型的隔断。从整体来看,与展品相分离的辅助内容既不妨碍观众欣赏艺术品,又增加了展览的深度,增强了趣味性和丰富性,带给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同时,展览的九个部分各具特色,展线自然流畅,便于观众的参观。二是展览的空间色调设计以减少游客的视觉疲劳、美化空间环境和烘托展品为基础。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传统文化民俗紧密联系,选用中国红作为展览场所的主色调,穿插灰、白色等冷色调丰富配色层次,降低色调的鲜艳度,避免了抢夺展品的“风头”。三是展柜的选择和设计统筹考虑了展厅面积、展品形制、观众观赏角度等各种因素;四是各主题区域的设计紧抓主题,准确、生动的诠释和表达了展览内容。^[14]赵雅聪还就《粉壁丹青——毗卢寺壁画艺术展》阐述感知心理在现代展览中的重要性。认为展览很好的

利用了视觉、听觉和触觉表现,通过空间环境舒适产生的刺激,使人产生相应的参观欲望。好的陈列设计应该考虑到人们的心理接受能力和审美,陈列展览设计中的人文关怀更易和受众心理产生共鸣。陈列展览设计要与人的心理机制、生理机制相协调,要充分了解参观者的感知特征,考虑人们的感知行为模式和心理上的知觉感应多样化的人性需求。^[15]

(李琳:河北博物院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罗向军.让文物活起来的途径分析:以河北博物院为例[C]//北京博物馆学会.新问题、新实践、新成果:首届“让文物活起来——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博物馆高峰论坛”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 [2] 王辉.精益求精,砥砺前行:浅析如何让文物活起来[C]//北京博物馆学会.新问题、新实践、新成果:首届“让文物活起来——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博物馆高峰论坛”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 [3] 王玉鹏.让文物活起来,更好地服务社会和人民群众[C]//北京博物馆学会.新问题、新实践、新成果:首届“让文物活起来——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博物馆高峰论坛”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 [4] 黎波.试论文旅融合发展中博物馆的定位与方向[J].文化月刊,2018(8).
- [5] 徐艳红,赵小姣.新时代 新发展 河博正青春[N].中国文物报,2018-5-29.
- [6] 耿超,刘迪,陆青松,等.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8.

- [7] 罗向军.博物馆理事会制度实践与思考[J].博物院,2018(1).
- [8] 刘卫华.加强项目品牌化建设 开创社会教育新风景[C]//北京博物馆学会.新问题、新实践、新成果:首届“让文物活起来——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博物馆高峰论坛”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 [9] 刘卫华.畅游动物世界 开发多元智能[C]//中国博物馆协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河南博物院.品牌:博物馆教育的追求与活力.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
- [10] 张晓鹏.蒙台梭利教育理念的博物馆儿童教育活动设计[J].中国博物馆,2018(2).
- [11] 张晓鹏.基于博物馆资源课程化下的儿童教育路径分析:以河北博物院“快乐学堂·河北传统文化艺术”课程为例[J].博物馆研究,2018(4).
- [12] 马率磊.中小博物馆开展青少年研学旅行策略探究[J].文物春秋,2018(5).
- [13] 高峰.深入认识公共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意义,加快提升公共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C]//北京博物馆学会.新问题、新实践、新成果:首届“让文物活起来——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博物馆高峰论坛”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 [14] 赵雅聪.浅谈《匠艺百年:河北省传统手工技艺‘织染刺绣’系列精品展》的艺术设计思路[J].文艺生活,2018(8).
- [15] 赵雅聪.感知心理学在陈列艺术设计中的应用:论《粉壁丹青——毗卢寺壁画艺术展》[J].艺术品鉴,2018(11).

新闻传播学与实务研究

张 芸

2018年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诞生百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回顾历史、审视当下,史论研究有明显突破与创新。随着媒体融合继续向纵深发展,信息科技、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新闻传播业的影响更加深刻,带来新闻传播理念、传播方式、采编流程、媒体业态等系列变革,新闻传播学研究与业界革命和社会发展密切呼应,呈现出鲜明的责任意识、问题导向和前瞻思维。

一、新闻传播实务

(一) 报刊出版

中国图书出版业在全面实行转企改制过程

中,承受着来自内外部的产业化改革、市场化竞争和数字化改革等冲击,传统的出版文化责任、职业价值与商业化所带来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形成交锋与博弈。甄巍然的著作《中国图书出版责任伦理研究》以“责任伦理学”为理论基础,透过图书出版内容生产与市场消费过程中呈现的各种“怪现象”,批判性地反思出版行业的伦理失范行为。并由此进入出版主体的职业认知与价值层面剖析其面对出版责任伦理困境时的感知与评价、出版责任冲突中的行为与心态选择、出版责任冲突的归因等相关问题。同时,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探析造成出版责任伦理失范的

原因,提出内修出版主体职业责任伦理、外建出版职业伦理规范的双重路径。^[1]

十九大报告是20年来篇幅最长的党代会报告,但大家却喜闻乐听。杨秀国认为,“丰富深刻的内容+创造性的表达方式”是十九大报告的鲜明特色之一。它以多元化的排比直击人心、以形象化的比喻传递治国理念、以思辨性的对偶点明深刻道理、以生活化的语言阐明深邃思想、以凝练型的短句阐述大政方针。在时政报道和有关文件、领导同志讲话中,不看对象、缺少文采、不讲究表达、不顾及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情况,屡见不鲜。只有解决好了为谁说、为谁写以及如何说、如何写的问题,真正以人民为本,以受众为本,新闻舆论工作才能真正成为连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才能真正实现“民隐得以上达,国惠得以下逮”。^[2]

标题是新闻的眼睛,制作标题可称为点睛艺术。好的标题能迅速吸引读者的眼球,让读者产生回味无穷、欲罢不能的心理体验。范学亮通过对《人民日报》《长江日报》《新闻报》《新民晚报》中的优秀标题进行分析,总结出引用、化用古典诗词,巧用谐音双关,巧用贬义,巧用人名等制作标题的技巧。^[3]

新媒体浪潮汹涌,诸多出版机构都处于转型焦虑的状态中,此时重提出版理想能够给出版机构以定力。但目前在新闻学的学术研究中,出版理想还处于尚未清晰的状态。白林丰等将出版理想与文化理想相区分,提出出版理想的核心价值是平等。从完善现有的出版理论、重构出版史叙事、构建出版专业教育的本体地位、打造新出版共同体等角度阐明出版理想在出版业发展中的意义。同时,从出版理想的角度对出版人、出版业、经营管理等实践方面提出实际建议,旨在兼顾出版的文化与商业两重属性。^[4]

随着社会对体育赛事关注度的不断提升,个性化、高品质体育赛事报道成为时代之需。白贵等通过对现有体育赛事机器新闻写作的作品分析,指出其存在逻辑运算难以实现语义理解、数字冲突难以转化为趣味表达、非结构化数据难以被机器运用等现实困境。认为,应通过数据积累与知识构建实现逻辑推算到语义模仿的过渡,通过数据升级与知识优化实现信息推送到深度报道的转变,通过机器与人工协调实现单向辅助到相

互协作的良性发展。^[5]

语音交互技术在出版流程和用户使用两方面均有广泛的应用,虽然目前还存在着诸多局限,但依托音频数据量的不断增加和与其他信息数据的融合使用,语音交互技术未来在出版实践中的应用将会更加广泛。余人等认为,在出版业的选题策划、撰写稿件、编辑校对、审查管理中,语音交互技术可以起到优化出版流程、加强出版管理、提高工作效率等作用。但因为技术和声音本身的限制,语音交互技术在出版业中难有用武之地,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需要与图像识别等技术相融合,在多媒介互动中发挥作用。^[6]

任文京认为,新时代出版要打破陈旧观念和因循守旧的惯性,把实现内容创新作为第一要务,将出版视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出版真正发挥推动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进步的作用。作者以《狼图腾》《寂静的春天》《尼罗河传》等精品著作为例,指出出版的永恒魅力在于内容创新,形式上的五彩斑斓替代不了内容上的原创。内容创新的出版物尽管初期可能还不被整个社会所接受,但经过时间淘洗,内在的品质熠熠生辉,最终会被人们接纳并广为传播,有些则会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7]

在信息传播技术不断升级和大众阅读习惯快速变迁的当代,学术出版界也应当适时创新,推出更多兼具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出版产品。这不仅是出版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更是其肩负的传播知识、启发大众的责任。杜恩龙等人对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的推广项目——卡通摘要做了简要分析,认为其具有通俗易懂、趣味性强、风格多样、开放共享等特点,卡通摘要这种方式有利于提高大众读者的科学素养、作者的学术影响力和出版商的竞争力,是我国学术出版界在创新之路上可以借鉴的方式。^[8]

中国是出版大国而非出版强国,由出版大国变为出版强国面临诸多挑战,也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任文京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出版强国,主要看其出版影响力。出版影响力主要包括文化影响力、思想影响力、学术影响力以及国际化水平,这些构成出版强国的主要内涵。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要走向出版强国,首先要强调内容第一、质量第一、出好书第一,出版要回归本质属性;其次是创新性、人

才战略和国际化视野。^[9]

杜恩龙等从第一张藏书票的来源到其流行发展、功能的转变,考查了西方藏书票和出版业的关系,认为藏书票的发展不仅能够成为独具魅力的出版选题,更能够带动纸质书籍的出版和销售。出版业应积极寻求与藏书票的结合,善用藏书票,以其为主题,开拓出版业务或策划图书选题,推动出版业务的丰富和发展。积极利用藏书票进行图书的宣传和推广,带动书籍的销售和出版。^[10]

(二) 广播电视与网络音视频

原创节目是广播电视的“拳头产品”。万强等分析认为,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由于节目类型单一、人文关怀缺失、本土特色不足、现象级节目偏少,过去“叫好又叫座”的广播电视原创节目越来越少。面对竞争压力,传统媒体纷纷加快融合步伐,但往往注重“开通新媒体”,不注重“应用新媒体”,对自身原创内容创新不足,投入不够,推广不够。应充分研究受众需求和接受习惯,用互联网思维深耕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用好传播技术,使广播电视原创内容保值、增值。^[11]

广播剧是主题宣传精品化、艺术化报道的一种新思路。何金宝以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故事)广播推出的五集新闻广播剧《石家庄1947》为例,分析了广播剧在主题宣传报道中以差异化凸显的独特价值。指出,广播剧将“新闻事中新闻人”作为创作题材,深入挖掘新闻的深度,用真实的艺术再造剧中人物,表达方式多样化、富有人情味,既体现了新闻媒体的态度、温度,又关照了受众的接收习惯,并通过体验化传播引发受众心理共鸣,增加了新闻的能见度、感染力。^[12]

电视作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肩负着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的使命任务。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中华好诗词》作为全国诗词文化类节目的先行者,连续播出6年、走过8个赛季,始终在“传承文化、自主创新”的道路上稳扎稳打,不断带给观众知识、惊喜和感动,持续引发诗词文化热潮。武鸿儒从节目创意、内容形式、情感表达和传播渠道四个方面,分析了河北卫视《中华好诗词》的创新传播对电视文化节目创作的

启示意义。《中华好诗词》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以现代电视手段表达和传递诗词文化元素,精心选取主题和角度,不断创新竞技类节目的内容样态和表现形式,为传统文化传播增加温度、开拓路径,凸显了新闻媒体的文化引领作用。^[13]

近年来,网络剧在市场、演员、资本等方面取得了重大发展,但在观念、制作、播放等层面存在诸多问题。王岚等人认为,科学的网络剧评价标准应包括观众口碑、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在观众口碑中,点击率和播放量是基础,好评度和评分值是核心;在市场效益中,盈利多少是指标,投资回报比是核心,个性化和精品化是方法;在社会效益中,价值引领应是网络剧制作方和播放平台始终不能忽视的方向。推动网络剧市场发展,应在网络剧的监管、制作、播放环节上加强规范化管理,还需建立起以受众口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依据的多重评价标准体系。^[14]

独播网络剧的火爆引起人们对其中“剧情式”中插广告的关注,李亚虹等指出,多数此类广告存在宣传产品类型单一,内容重复、平淡,广告人物性格、形象不鲜明,插入时间不当等问题,削弱了广告效果。并用内容分析法对腾讯视频出品的《鬼吹灯》系列《精绝古城》和《黄皮子坟》的中插广告“洞时间”进行分析,认为其可以成为网络中插广告的新标杆。作为网络剧中插广告的创新形式,“剧情式广告”是在网络剧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孕育出来的新样式,它紧密结合剧情,融而不入,小成本,大效果,在一定程度加深了观众的观剧体验,增加了广告与观众的情感互动,目前正处在上升期,还有很大发展空间。^[15]

OTT TV (Over The Top TV 的缩写)是基于互联网面向公众开放的视频服务。业务提供者不再需要传统电视的一些发射台、线路等基础设施,而直接通过互联网与消费者对接。张晓伟指出,与传统电视相比,OTT TV给电视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也带来了全新的用户体验。凭借其基于互联网的优势,OTT TV实现了传统电视所没有的“社交”功能。OTT TV是电视屏幕和电视业务的变化,但其本质与核心是电视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融合。在这一融合趋势之下,

电视媒体、电视内容都要进行融合与转变。^[16]

(三) 新媒体与媒介融合

谢巧玲等分析了新媒体对大学生阅读倾向的影响,认为应借助新媒体平台,为大学生阅读建立更科学、多样、有效、持续的新媒体服务机制,为高校大学生新媒体阅读提供保障。改善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阅读倾向,需要提高高校图书馆管理者和从业人员思想意识,规范图书馆新媒体服务管理机制,提高大学生阅读意识,开展新媒体阅读推广活动。^[17]

微信朋友圈不仅是信息交流的虚拟社区,更是个体现实生活的“网建社区”,是人与社会交往的第二空间。王会等人分析了微信朋友圈中的信息交流,从精神交往的层面分析了微信朋友圈信息交流的场景、介质、形式、路线及社交媒体精神交往的社会意义。指出,微信精神交往来源于社会发展和人自身需求,其核心是信息承载下的精神交往,表现为认同思维下人的主体性全面回归,知识链接和意义重构超越信息本体、隐性对话过程中的情感中介,互被创造的社群个体共塑“第三种文化”,是马克思提出的“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的物化路径之一。^[18]

刘赞等指出,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很多党报在“两微一端”上发力,希望借此扩大自身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壮大主流意识形态。但从实践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党报创办的新媒体在受众中的关注度较低,引发受众刷屏的“爆款”作品寥寥无几,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阅读量与一些动辄“10万+”的自媒体公众号相比差距较大。改变这一局面,就要结合近年来党报旗下新媒体的发展实践,强化用户意识、精准定位,突出优势、重塑话语形态,在保证品质、保持格调的基础上,强化自身的特色,加强自身的吸引力。^[19]

王宏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全面到来,为适应新时期互联网信息传播的要求,网络编辑需要提升平台适应力、信息掌控力、产品原创力、用户亲和力和平台创新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编辑除了简单的网络信息采集、归类、加工、发布、维护之外,更兼有内容产品的策划与组织、信息资源的管理与开发、用户群体的互动与引导等职能,是移动网络文化的建设者、网络舆论的引导者。与之相适应,高校网络

编辑人才培养的模式与实践也要随之改变。“面向应用、道德引领、才能担当、技能优化、产学结合”的“1+3+1”人才培养模式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探索方向。^[20]

魏峻岭根据纸媒发展特点,从技术平台总体设计原则、平台架构、子平台功能等方面探讨报业集团全媒体融合平台建设。指出,全媒体融合技术平台要坚持统一规划、统一指导,并存过渡、逐步整合,安全可靠、高效益用,一次建设、持续发展的原则,面向媒体未来创作和营销渠道的融合路线来架构,从信息汇聚、资源管理、创作生产、出版发布、运营支撑和传播反馈等环节入手,将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媒体业务的每个环节。^[21]

(四) 媒介经营管理

杜浩等的著作《河北太行山文化产业带构建与发展战略》围绕太行山文化产业带的构建和发展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以“点轴”理论为基础,提出要发挥河北省内邢台、邯郸、石家庄、保定等太行山沿线自然风光旖旎、红色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按照“点线相连、融合共赢”的原则,整体设计、系统打造,走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之路,重点打造以红色文化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生态观光旅游及旅游纪念品加工制造、演艺娱乐为亮点的太行山文化产业带。^[22]

宋伟龙的专著《进路:广告新锐养成攻略》,立足广告学专业人才培养,面向初次踏进大学校门的广告学新生,讲述广告的基本原理、如何培养广告理念与思维、广告学和广告专业的外延拓展及专业转换、广告学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技能等话题。以求职手册的形式生动阐释广告专业的就业方向,就业求职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等。^[23]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正在颠覆传统媒体的传播逻辑和商业模式,其中报业受到的冲击尤甚。彭焕萍等认为,报业依靠“+互联网”模式开发新媒体项目,并没有跳出传统媒体的基本逻辑,不能支撑报业整体转型的重任。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在向“互联网枢纽型传媒集团”的战略目标迈向过程中,探索出一条“互联网+”式的发展路径,其主要经验是:以用户为中心,巩固壮大互联网阵地,以技术驱动服务,形成系统化转型的核心突破点,通过“新闻+服务”的商业

模式打造新闻传媒、数字娱乐、智慧服务和文化产业投资平台,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报业集团融合发展要借鉴“浙江经验”,树立“互联网+”理念和平台意识,借助技术和服务聚合用户,跨界进行大文化产业布局,发展为文化传媒集团。^[24]

张艳认为,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以及高可用性等特性,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传播链路中存在的欺诈和寻租现象。区块链技术已经渗透到广告欺诈规制、广告交易实时结算、广告效果评估、产业链管理与品牌信息整合等场景应用中。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成熟和普及,广告产业的生态网络与业务流程将面临新一轮变革。区块链平台应用是广告生态网络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用户在生态网络中的主体地位越发明显、广告产业生态网络的去中心化、分享与协作的开放式自组织生态网络。^[25]

王倩从微电影与地方文化软实力之间的联系入手,分析指出,媒体影像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从文化战略的角度认知微电影是当前文化产业的重要议题。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等角度,依托微电影的推广传播模式,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一种快速有效的拉动地方文化软实力、宣传地方文化的方法。^[26]

刘毅等以《厉害了我的国·中国电商扶贫行动》《第一书记》等为例,研究精准扶贫传播中的融媒体思维,认为,运用融媒体思维制定扶贫传播策略,多屏互动全媒体预热,多平台直播全程互动,广告配合新闻报道全媒体推广,以媒体公信力帮助贫困地区打造地域品牌是融媒体思维应用于精准扶贫传播的现实意义。要运用好多元化传播渠道的融合思维、媒体价值的叠加思维、多向交互传播的平台思维,以传媒的影响力凝聚社会力量,全媒体融合助力扶贫攻坚。这是践行十九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部署的具体实践,又是新时期脱贫攻坚阶段媒体应具有的社会担当。^[27]

赵凤华针对2017年12月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节目备案管理和违规处理的通知》,分析了新时期广播电视节目的监管规范。指出,广电监管新规范从美的艺术理念出发,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坚定地举起

了审美导向这面大旗,即广播电视节目要坚持审美导向,绝不允许美丑不分、媚俗化现象的出现。审美导向上出现问题的,要整改、要警告、抑或停播,这要作为一项制度建立起来,纳入新的监管规范,发挥长效机制作用。^[28]

二、新闻传播学理论

(一)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

王凤鸣等认为,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已成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新阵地,为新时代党媒党建宣传创新带来机遇与挑战。目前,地方党媒党建内容难以完全满足新媒体环境的需要,新媒体技术与党建宣传结合还不够紧密,党建传播渠道还未形成强大合力,各自为政的情况还较为普遍。地方党媒要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抓住新媒体传播优势与特点,进一步实现党建内容由单一向多维转化,构建多维立体的“新媒体+党建”平台,利用微博、微信等构建层层扩散、全面覆盖的传播渠道。^[29]

全方位、多领域的社交网络不仅给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而且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播提升到了新境界。赵征等将社交网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定位概括为:社交网络成为发布国内信息的重要平台,其快速反馈与互动性强的特性可以有效监控公众对某一事件的看法,并为做好下一步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尽管社交网络影响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对政治的影响力毕竟是有限的。只有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才能在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30]

陈华明等分析认为,在传统媒介环境下,政治传播具有典型的“控制论”色彩。政治文本在政治主体、大众媒介与受众之间呈现为单向的信息流动过程,政治主体在政治传播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微信是一种偏向关系传播的新媒介,虽然在概念层面上具有“元传播”的特征,但在社会现实维度难以找到实践的根基。尽管微信空间中生成了新的政治传播格局,但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政治传播模式并未发生变化,甚至放大了主客体二元对立政治传播模式所带来的风险。作者从文本诠释学角度考察微信政治传播困境以及功能失调问题,以文本为核心概念,以理

解和解释作为文本诠释的本体论,从而构建微信政治传播功能的“视域融合”。^[31]

(二) 媒介与受众研究

彭翠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媒介商品属性的回归、市场竞争的日趋白热化以及事业单位企业化发展模式的变迁,皆可视为“中国式”的媒介商业化。这一划时代的转变,一方面为传统媒介的新生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与该历史进程相伴而来的还有各种猝不及防的危机与困境。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传媒业并非单纯的商业企业,除了社会公器的责任担当外,它还承担着媒介“喉舌”的重要职能。因此,媒介内容的生产、媒介机构的经营与管理,以及媒体人的何去何从等问题亟待梳理与解决。尤其是对传媒业媒介问题内容的产制研究,更是迫在眉睫。^[32]

王威指出,社会情绪在特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域内持续,并且在社会公众中广泛地弥漫和流行。由于公众对风险信息缺少完整的认识或应有的关注,容易出现风险感知偏差,或者放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忽视某些小概率的风险。关注风险传播中危害性和可能性两个变量,有利于公众做出合理风险决策。运用萨德曼的“移动跷跷板”理论引导公众社会情绪,帮助公众全方位看待问题并采取组织引导的立场行事,可以实现组织风险传播的理想状态的平衡。^[33]

媒介融合背景下,主持人即兴口语表达能力受到更多关注,即兴口语表达课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赵晶晶认为,更新教学理念,设计教学内容,探索案例式教学、混合式教学、情境式教学、浸润式教学等教学方法,推动即兴口语表达课程教学改革,能够促进学生即兴口语表达能力的提高,为学生适应新的媒介环境、适应行业岗位需求,奠定良好基础。^[34]

随着媒介技术变迁和媒体传播要素的分化和重构,在社会媒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媒介生态中,用户和入口的争夺更加激烈,媒体和行业间的边界被打破,传统媒体的跨界融合备受业界和学界关注。韩立新等把新媒体技术应用引发的传统媒体传播要素分化和重构所促生的跨界融合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选择1997—2017年间“新闻与传媒”学科中与跨界融合相关的期刊学术论文(不包括硕博论文)

作为研究文本,通过对跨界融合内涵、理论进阶、实践探索和学科范式转换的归纳分析后认为,尽管与跨界融合有关的研究不断深化,理论建构也日渐成熟,但还不成体系,需要不断完善。^[35]

(三) 对外传播

习近平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新闻传播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对标”这一具有跨时代和全人类意义的理论创举,就要主动及时培养既有中国立场又熟悉世界话语的新闻传播工作者,改革现有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适应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的冲击。曹磊等人从新视界、新定位和新使命三个角度,分析了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具有的公共价值,媒介对社会形态的改造和文明交往的价值,要以全球化的文明观和“共情”的沟通能力来改革现有的新闻传播教育。^[36]

陈伟等指出,当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缺失深层次的历史价值审察与评判。中国出版“走出去”本质上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路径,其终极使命在于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立足软实力战略,中国出版“走出去”系统在运作机制上形成特定的学理规约,体现的是文化软实力思想以及文化、价值观传播的特有内涵、规律与方法。新闻出版共同体由此反思并重构“走出去”的思维与范式,这是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37]

关晨认为,我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的受众具有跨文化特征,受众对中国的认知程度不均衡,选择媒体的倾向也不均衡。目前我国电视媒体对外传播面临受众定位不清晰、媒体发展空间有限、没有形成对外传播合力等问题,应构建电视媒体的对外交流平台,推动省级卫视对外传播工作的开展,深入研究国外受众的信息需求,不断提高我国电视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电视媒体还要掌握国外受众所处的媒体环境、阅读习惯等,使对外传播更有针对性。^[38]

郑红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对外传播创造了新契机,也带来了新挑战。作为沿线参与省份,河北既要争取对外传播的平台和资源,也要充分发挥自身潜能,顺势而为,实现传播效能的最大化,搭建河北形象展

示的新平台,提升河北的全面开放程度和国际化水平。当前,河北省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仍然存在传统官方话语模式过于保守,对外传播整合力不足等问题,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扭转官方主要的话语模式,构建区域共生环境,拓宽传播渠道,培养人才队伍,强化对外传播实力,推动“美丽河北”的建设与发展。^[39]

任文京对2012—2017年6年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进行统计,分析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数量和语种偏少的原因在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图书版权贸易相比欧美诸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目前仍处于低迷状态。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是把中国的学术精品译成其他语种,语言是基础也是关键,但目前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名单只列出资助语种,没有列出国外出版机构。在“一带一路”视域下加强与沿线国家学术出版合作,要拓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涉语种人才的培养使用范围,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政策支持力度。^[40]

接受美学是重要的文学理论,其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新闻故事。曹茹等人借鉴接受美学中的“文本未定性”“期待视野”等理论,分析了讲好中国故事中的隐喻、母题、陌生化等问题。指出,新闻的隐喻性及故事元素对隐喻的强化,不仅使新闻故事变得有趣,更使读者放弃戒备,同时唤起读者主动解码的兴趣。故事文本中的母题,可以减少文化隔阂,满足受众期待。故事文本中“情节与细节”的适当陌生化,可使受众产生极大程度的新鲜感,保持阅读活跃度。^[41]

(四) 舆论舆情

危机传播具有综合性、实践性和跨学科特点。王威等将2003—2016年CNKI收录的新闻与传媒科目下危机传播的研究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使用CiteSpace作为数据分析工具,通过绘制解读危机传播研究的相关知识图谱,重点分析2003年到2016年我国危机传播的重点学术研究问题。主要包括:危机传播早期的管理学视角与策略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研究热点转向公共危机和舆论监督、自媒体的兴盛引发学界对网络危机传播的关注。^[42]

和曼等人以2017年2月中旬发生的“塑料紫菜”网络谣言传播事件为例,分析福建省晋

江市委宣传部网络宣传管理中心的舆情应急机制,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中有关“舆论”的理论,探讨地方政府网站在突发事件舆情演变中的舆论引导策略。指出,舆论常常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比如它会随着利益的改变而改变,甚至还会受到一些统治者和活动家的言行的影响。地方政府网站要掌握舆论的客观规律,正确把握舆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在突发事件中,及时关注和跟踪舆情动向,及时调整应急策略,积极设置新闻议题,引导社会舆论,以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43]

基于舆情大数据研究网民关注度转移模型,能够深入解读大数据环境下网络舆情事件的竞争效应,可以为网络舆情治理提供参考依据。兰月新等人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分析大数据环境下网络舆情事件竞争效应以及网民关注度转移机理,基于微分方程组构建网民关注度转移模型,通过研究模型特性和数值仿真,分析两个舆情事件之间网民关注度转移的定量关系以及未来趋势,并给出估计模型参数的方法。经过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证实网民关注度转移模型是可行的,可以通过舆情数据分析确定多个舆情事件的竞争结果以及网民关注度转移的关键节点,为进一步研究网民关注度转移趋势提供模型基础。^[44]

赵征认为,微信平台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网络空间,其传播生态是一种圈层舆论与层级互动的社会化媒体运作模式,圈子文化在微信中体现得非常明显。通过对微信朋友圈、微信群、微信公众平台的分析,可以预测微信网络空间的未来生态:微信将会成为集智能化、交互性、全媒体化为一体的社交、生活与媒体融合平台,从“互联网+,数据连接一切”的理念出发,支持更多的跨平台、跨地域、跨媒体的信息传播活动。^[45]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涉警舆情的发生、发展、演化及传播等特点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应的舆情监测、分析和决策方法日益成为政府及警务部门关注的焦点。张双狮等指出,面向大数据的网络舆情监测可以发现舆情主题,分析情感倾向。采用数据挖掘技术能够在事前、事中和事后分三个阶段对涉警舆情进行分析,对其风险进行评价,预测其发展趋势,及时进行预警。为适应复杂多变的舆论战需求,应该建设一支专业的舆情队伍,积极采用以人工智能

技术为牵引的智能决策方法,推进“人民警察为人民,人民警察人民爱”的舆论新生态建设。^[46]

郑楠从舆情传播和管理的角度分析指出,涉恐网络舆情遵循相应的传播机理,在传播的各个阶段呈现一定的特点。政府部门应把握网络舆情发展的主动权,在涉恐网络舆情生成阶段、扩散阶段、消退阶段分别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控制负面舆情扩散。对已发生的网络舆情进行评估是网络舆情处置的信息基础,因此,总结涉恐网络舆情的传播周期、传播特点和传播范围,对策略实施及效果进行评估,分析经验和不足,得出最优方案,才能在涉恐网络舆情发生时更加高效地予以应对和引导。^[47]

三、新闻传播史论

杨秀国等认为,中国环境新闻的发端始于1973年人民日报刊发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可算做第一篇直面环境问题的新闻报道。1973—1983年间,环境新闻报道从无到有,数量明显增加,报道类型也逐步丰富,并呈现三个明显特征:一是正面宣传,推动环保政策落地落实;二是直面现实,揭露环境污染现象;三是环保科普,树立环境保护意识。通过分析人民日报的《去年世界气候为什么异常》《环境保护与人体健康》《森林对环境保护有哪些作用》《空气污染与人类死亡率》等新闻报道,指出,新闻媒体应该发挥在环保政策宣传、环境科普以及环境监督等方面的优势,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48]

刘莹认为,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同志发表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集中体现了其新闻思想中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新闻工作同样要遵循这一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群众办报”思想就是党的群众观点在新闻宣传战线的具体化。群众观点构成刘少奇新闻思想的鲜明特征,是群众路线基本思想的集中体现。他提出双向沟通的“桥梁说”,核心是新闻工作者要为人民服务,向人民群众负责。具体表现为:新闻工作的成败以群众的评价为最终标准,新闻媒体的内容和形式要群众化,新闻事业要尽量满足群众的需要。^[49]

魏海岩等考查了宋代邸报的读者特征,指

出,宋代邸报大体上可分为基本读者和扩散型读者。基本读者拥有固定衙司和具体差遣,拥有法定的邸报接收、阅读权,具体包括中央各部门和路、州、县、镇等地方各衙司的在职官员。扩散型读者是借助工作之便或依靠人际关系而获得邸报阅读机会,具体包括部分致仕官员、官员亲属、吏胥、在野知识分子等。没有被剥夺差遣的犯官属于基本读者,已经被剥夺差遣的犯官属于扩散型读者。宋代邸报读者群体的数量是相对庞大的,涵盖了当时主要的政治、文化精英。在此方面,宋代超越了唐、五代和元、明、清。衡量宋代舆论主体的力量就是度量宋代士大夫和文人的地位,而读者群数量的庞大和消费能力的稳定性成为小报诞生、发展的促成因素,而其阶层特点又成为当时舆论监督效果提升的保障因素。^[50]

《北洋官报》创办十二年间,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工作自始至终十分关注。都海虹从政治传播的视角,探讨《北洋官报》建构宪政舆论的方法路径,指出,官报集中宣传报道“预备立宪”的每一个阶段性工作,议题设置明确。对每一个关键措施的实行,《北洋官报》都给予集中宣传报道,为立宪工作的推行鸣锣开道。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宪政编查馆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这是清廷筹备立宪的总体规划方案,《北洋官报》的宣传报道也依此清单有计划展开。除此之外,大力报道设立宣讲政治所、识字学塾等新闻,宣传“开民智以扫除立宪障碍”的观点,并主动探访新闻,满足受众的信息饥渴。《北洋官报》积极宣传报道,自觉维护官方立场,努力成为立宪改革的吹鼓手和宣传者。^[51]

互联网技术引发新一轮媒介形态的嬗变,引发了学界、业界对媒介形态研究的关注。张秀丽等人以文献计量学研究方法,对30年间(1988—2018)CNKI数据库中关于媒介形态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共词分析和历时分析。指出,我国媒介形态研究正在实现由“媒介形态理论”到“媒介融合”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共词分析看,“媒介融合”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议题;从历时分析看,早期的研究范式以“媒介形态理论”为主,受到技术和政策双重因素影响后,出现了以“媒介融合”为主的研究范式,呈现

出“范式转换”的趋势。^[52]

王雅坤等人指出,1940年代至1980年代以来,敌后抗日根据地许多革命文学作品被改编成连环画,成为文学图像传播的重要形式。作为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艺术形式,连环画吸纳了革命文学的内容,并将其故事和人物加以形象化,重塑了文学文本的艺术形态和价值生成方式。通过图像再现文学文本,是图像时代最为活跃且重要的文艺创新领域。用图像图解部分文字内容,从而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达到知识普及和道德教化的目的。对于粗通文墨者来说,书商意在以图像增加阅读兴趣,激起读者的观看欲望,提升视觉享受,使原本枯燥无味的内容更受欢迎,进而在市场竞争中抢得先机。^[53]

韩立新等人利用文献计量学原理,分析指出,1996—2017年20余年间,学者对媒介融合的研究为“现象”所牵引,表现为一个从概念、定义到现象和规制的演进路径,媒介融合的主体研究、载体研究、从业人员及用户研究、产业及政策研究是研究成果聚集的四个方面,呈现出与媒介融合技术先导性特征不相一致的现象化特征。我国媒介融合研究对媒介融合技术先导性的实质关注不足,新闻传播学科领域的媒介融合研究在整体上并没有形成知识融合的研究取向,知识创新陷入困境,媒介融合急需展开跨学科研究。技术先导性的缺位是导致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学研究滞后于媒体实践的主要原因。^[54]

王玉蓉等人认为,民国时期的商业广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活动,深受西方广告意识与经营理念的影响,但也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新旧更迭、中西碰撞的特殊时代造就了商业广告文化的精彩纷呈。《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期刊史上存世最长、最具影响力的政论性综合杂志,曾刊发过大量商业广告。这些广告投射出了基于中西文化民族认同和价值观认同的文化冲突,也展现了从中西并立到求索中西文化之调和的过程,呈现出多元文化碰撞与交织的时代特色,体现出民国时期文化的复杂性。^[55]

白贵等人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考查抗战电影,指出国民政府的抗战宣传具有抗战和建国两个维度:一方面要打击侵略者,维护自己的主权;另一方面,要动员各族民众,自下而上构建民族国家。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给人带来

的身临其境的感觉恰好满足了这个时代需要,自觉地成为构建民族共同体的媒介手段。电影所创造的视觉世界把抗战和建国的观念传播给了广大中国人,国民政府通过电影放映队的下乡活动把偏僻的农村与繁华的大城市联系在一起,打通了近代以来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落后地区的文化隔膜,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得以进一步巩固。同时,日伪政府也积极利用电影展开宣传攻势,力图瓦解或者误导中国人的民族建构,使之有利于日本战略。电影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其宣传教育、动员作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战争双方的高度重视,从而使抗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媒介战争的色彩。^[56]

刘伟娜通过《妇女杂志》(1915—1931)摄影图片、多彩广告图片、手绘插图等类别的图画分析,从发式、足部、服饰、气质等几个显性特征对《妇女杂志》图像中女性风貌进行了观察。认为,图像展现了崇尚时尚的新生活方式、追求平等的新两性关系和走向社会的知识女性的民国新女性风貌。《妇女杂志》丰富的图像描绘了生动的女性图谱,表达了追求平等、崇尚美好、渴望新知的女性诉求,记录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解读与实践,倡扬了女性的自我觉醒与人格独立,在社会文明进程中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57]

王晶以《人民日报》《河北日报》为基础资料,结合地震亲历者口述资料,考查了邢台地震时期的新闻报道。指出,邢台地震发生在“文革”的序幕和初始阶段,特定的时代环境决定了相关报道呈现出“文革”时期突出政治的特点。邢台地震新闻报道具有重视思想政治宣传、时效性差、回避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视察消息等特点,这些都反映出当时新闻报道“突出政治”的时代特色。特定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当下如何实现政治意识与新闻价值的更有效结合,同样是新闻工作者尤其是党报工作者应当慎重思考和对待的问题。^[58]

(张芸: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甄巍然.中国图书出版责任伦理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 [2]杨秀国,刘洪亮.十九大报告的文本话语解读[J].青年记者,2018(11)中.
- [3]范学亮.新闻标题制作技巧例析[J].青年记者,2018

- (10)中.
- [4]白林丰,杜恩龙.重论出版理想:含义、意义与实践[J].中国编辑,2018(12).
- [5]白贵,王太隆.体育赛事机器新闻写作的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以腾讯“机器人 NBA 战报”为例[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6).
- [6]余人,白林丰.语音交互技术在出版实践中的应用[J].编辑学刊,2018(6).
- [7]任文京.新时代出版的本质内涵是创新[J].中国编辑,2018(5).
- [8]杜恩龙,李枫,谢鹏飞.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学术出版的趣味性推广[J].出版科学,2018(2).
- [9]任文京.由出版大国到出版强国的发展战略[J].出版发行研究,2018(2).
- [10]杜恩龙,葛琦.西方藏书票的发展及其对出版业的启示[J].新闻界,2018(3).
- [11]万强,刘梁.广播电视如何提升节目原创力[J].新闻战线,2018(1)下.
- [12]何金宝.广播剧:主题宣传精品化的一个思路——新闻广播剧《石家庄 1947》的创新实践与思考[J].中国广播,2018(12).
- [13]武鸿儒.从《中华好诗词》看电视媒体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12).
- [14]王岚,吴占永.论网络剧的规范化管理与评价标准[J].传媒,2018(6).
- [15]李亚虹,王冰曦.网络剧“剧情式”中插广告内容编创研究[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8(5).
- [16]张晓伟.OTT TV 兴起背景下电视的“变形”之策[J].传媒,2018(6).
- [17]谢巧玲,王静.新媒体背景下大学生阅读倾向探析[J].新西部,2018(9).
- [18]王会,李娜.微信朋友圈精神交往的路线与生成[J].青年记者,2018(8)中.
- [19]刘赞,彭焕萍.党报旗下新媒体发展思路[J].青年记者,2018(12).
- [20]王宏.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编辑人才培养模式[J].出版发行研究,2018(4).
- [21]魏峻岭.全媒体融合技术平台建设探析[J].中国传媒科技,2018(2).
- [22]杜浩,商建辉.河北太行山文化产业带构建与发展策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3]宋伟龙.《进路:广告新锐养成攻略》[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
- [24]彭焕萍,李小品.从“浙江经验”看报业集团的融合发展之道[J].青年记者,2018(1)下.
- [25]张艳.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广告场景应用与生态网络变革[J].中国出版,2018(5).
- [26]王倩.微电影传播与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研究[J].传播力研究,2018,(02).
- [27]刘毅,李桂凤.精准扶贫传播的融媒体思维——以电视通过全媒体融合对精准扶贫的传播为例[J].新闻战线,2018(06).
- [28]赵风华.新时代广播电视节目监管新规范[J].青年记者,2018(6)下.
- [29]王凤鸣,全静海.新时代地方党媒如何创新党建宣传[J].党建,2018(6).
- [30]赵征,王南舒,刘华欣.社交网络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位与形态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8(20).
- [31]陈华明,冯月季.文本诠释学视野下微信政治传播功能建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11).
- [32]彭翠.批判与反思:媒介内容的问题与对策——论《媒介问题内容产制研究》[J].传媒,2018(2)上.
- [33]王威.风险传播中公众社会情绪的平衡[J].当代传播,2018(5).
- [34]赵晶晶.媒介变革趋势下即兴口语表达课程教学改革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8(9).
- [35]韩立新,张秀丽.国内传统媒体跨界融合研究文献综述[J].新闻战线,2018(6).
- [36]曹磊,白贵.培养全球化的文明观与“共情”的沟通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教育未来的思考[J].新闻记者,2018(2).
- [37]陈伟,董明伟.软实力战略下中国出版的新时代使命与运作机制[J].中国编辑,2018(2).
- [38]关晨.全球化视野下电视媒体对外传播思路分析[J].新闻战线,2018(4).
- [39]郑红.“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北省对外传播策略研究[J].新闻战线,2018(6).
- [40]任文京.“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现状与推进路径[J].中国出版,2018(8)上.
- [41]曹茹,郭小旭.从接受美学看媒体如何讲好中国故事——隐喻、母题与适度陌生化[J].出版发行研究,2018(10).
- [42]王威,呼东燕.危机传播研究的发展综述[J].青年记者,2018(6).
- [43]和曼,白树亮.突发事件中政府网站的舆论引导策略——以“塑料紫菜”网络谣言传播事件为例[J].青年记者,2018(3)中.
- [44]兰月新,刘冰月,张鹏,夏一雪,刘茉,连芷萱.基于舆情大数据的网民关注度转移模型研究[J].现代情报,2018(10).
- [45]赵征.圈层舆论环境下微信网络空间的传播生态探究[J].视听,2018(1).
- [46]张双狮,夏一雪,兰月新,李亚峰.面向大数据的涉警舆情分析与决策方法研究[J].传播与版权,2018(4).
- [47]郑楠.涉恐网络舆情传播机理及应对策略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8(4).
- [48]杨秀国,王敬照.我国早期环境新闻报道的发展与特征

- [J].新闻战线,2018(8)上.
- [49]刘莹.刘少奇新闻思想中的群众观点——纪念《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发表70周年[J].青年记者,2018(11)下.
- [50]魏海岩,徐一铭,云浩桐.宋代邸报读者特点及其影响[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5).
- [51]都海虹.政治传播视角下《北洋官报》的立宪宣传[J].青年记者,2018(11)中.
- [52]张秀丽,韩立新,俱鹤飞.我国媒介形态研究30年:演进脉络与范式转换——基于知识图谱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传媒,2018(10)下.
- [53]王雅坤,于广杰.文学与图像的会通共振及其文化意义——以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学图像传播为中心[J].河北学刊,2018(3).
- [54]韩立新,张秀丽.我国媒介融合研究20年之进路[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
- [55]王玉蓉,宋伟龙,张晓宇.民国时期商业广告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涵化——以《东方杂志》商业广告为例[J].传媒,2018(1)下.
- [56]白贵,曹磊.媒介战争与民族构建:抗战电影的媒介环境学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1).
- [57]刘伟娜.《妇女杂志》(1915—1931)图像中民国女性风貌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8(10).
- [58]王晶.突出政治:1966年邢台地震新闻报道的时代特征[J].新闻研究导刊,2018(15).

管 理 学

管理科学研究

陈立文 刘广平

本年度省内的管理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科学理论研究和工业工程应用研究两部分,重点研究集中在一般管理科学理论、决策理论与方法、评价理论与方法、工业工程、金融工程、知识与创新管理、数量经济分析理论与技术、预测理论与技术等领域;而管理科学与管理思想史、组织理论、复杂性研究、管理心理与行为理论等研究相对较少。其中,以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为载体,涌现出一些具有创新性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一、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一) 一般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

李素红、方洁等人利用R聚类—变异系数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能综合反映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城市养老地产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博弈论思想,通过极小化G1法得到主观权重和余弦夹角法客观权重之间的偏差,确定各个指标的组合权重,构建基于博弈论组合赋权的城市养老地产开发适宜性评价模型,对2014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养老地产开发适宜性进行实证分析。根据评价结果,将35个城市分为重点发展城市、潜力发展城市和不适宜

发展城市三类,三类城市养老地产开发的主要制约因素分别为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1]

孔造杰、李斌为解决产品创新设计过程中多维需求的集成与筛选问题,提出一种基于三维坐标及余弦相似度的创新需求筛选方法。采用创新需求三维坐标来表示每项创新需求,应用矢量模的计算方法确定每项创新需求强度的大小,根据余弦相似度计算创新需求与基准创新需求间的相似度,以需求强度和相似度为基础,构建一个创新需求四分图来对创新需求进行直观的筛选,计算出每项创新需求的创新集成度来对创新需求做出精确的筛选,将二者相结合组成系统的筛选方法,通过实例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2]

李刚、李建平等人对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的组合方式及其合理性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基于级差最大化的组合赋权方法和基于客观修正主观组合赋权法等两种组合赋权方法是合理的。工作的主要特色有三:一是定义了主客观组合权重的合理区间概念,为组合权重的合理性判别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从指标层面讨论了指标的组合赋权方法,组合方式更加灵活,保证了组合权重对主客观权重优点的反映;三是提出了主

客观组合赋权的组合原则及合理性判别标准,为主客观权重的组合方式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3]

赵欣、翁钢民考虑交通拥堵环境下游客路径选择心理,将疏散路线的复杂度最小作为优化目标之一,建立了基于路线复杂度与疏散时间的双目标拥堵疏散路径优选模型。将疏散路线的复杂度定义为疏散路径车辆平总长度,认为疏散区域路网中各路段上的均运行速度是随时间的推移连续递减的函数,应用 Dijkstra 设计了模型的求解算法,仿真结果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4]

王妍妍、王艳宁基于数据挖掘技术设计物流成本分析方法,首先分析物流成本构成,找出分析对象,并对其进行数据预处理;然后改进 k-means 算法,根据熵值选择聚类中心,将物流成本依据相似度归类,使得同一类中的物流成本相关性最强;然后在每个类簇中实施关联规则分析,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发现物流成本之间隐藏的关联;最终形成物流成本决策支持库。实验证明该方法运行效率和质量较高,能够发现物流成本之间的相关关系。^[5]

刘广平、连媛媛等人利用 2003—2016 年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方法分析了房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房价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正 U 型关系,即房价对人力资本先产生挤出效应后产生集聚效应。房价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影响程度依次增加。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医疗卫生条件和生活环境对人力资本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中部地区的城镇化率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西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对人力资本产生抑制作用,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医疗卫生条件和生活环境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最后,从提高住房支付能力和分区域制定差异化的政策两个方面给出了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对策建议。^[6]

张琳、陈立文等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考察了影响建筑业从业人员购买绿色建筑意愿的 9 个关键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环境意识、绿色建筑舒适度、政府激励、邻居/朋友评价四个因素对从业人员的购买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之下,绿建价格对从业人员的购买意愿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因素,即成熟的绿建市场、

受欢迎程度、开发商对绿建的宣传程度、绿建的可承受性与从业者购买意愿的关系不显著。研究结果可为决策者制定有效的促进绿建的激励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7]

韩楠通过分析供给侧要素与碳排放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构建碳排放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预测未来中国碳排放的发展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 GDP 增长率年均 6.5% 的情景下,按照现有系统行为规律,至 2025 年中国碳排放量预计将达到 300669 万吨;(2) 通过增加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提升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以及加大科技投入等路径均能够使得碳排放呈现不同程度地下降;(3) 资本、劳动力及创新等要素综合调控下,能够实现 GDP 增加的同时碳排放量下降,预计下降到 286284 万吨。^[8]

(二) 决策与对策理论与方法

孔造杰、李斌等人针对现有的多属性问题决策过程大多无法体现决策者对产品的个人的多等级偏好以及缺乏一个客观合理的多属性评价基准的不足,提出一种基于矢量余弦投影的多属性偏好决策方法。首先,通过多等级成对比较法来确定决策者对各项属性的偏好度;其次,根据理想点来确定理想评价对象各项属性的理想值;最后,利用矢量余弦投影法计算一般多属性问题矢量在理想多属性问题矢量方向上的投影强度,然后根据强度的大小确定各个方案的优先级排序结果,通过一个算例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9]

姜昊、梁林等人运用多案例对比法,以企业决策过程为观察视角,分析 9 家案例企业开展大数据服务的具体决策过程,揭示大数据理念范式和技术工具对企业决策过程的影响范畴以及企业应用大数据的差异化模式。研究发现:大数据对企业决策过程中的影响范畴主要包括信息搜集与分析、目标形成与制定、决策方案制定、方案实施、实施评估、决策中的沟通六个大类以及市场业态分析 13 个具体影响方面;根据企业在应用大数据的理念、目的和手段上的差异,划分了“大数据+”再造型和“+大数据”融合型两种应用模式。研究结论可为大数据背景下企业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有益启示。^[10]

陈立文、杜泽泽根据文献识别出适用于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四种 PPP 模式,构建了四种 PPP

模式下的投资回报率模型并判断四种 PPP 模式的可行性;建立了四种 PPP 模式下的博弈投资决策模型,运用等额年金法对四种 PPP 模式进行比较优选;以实际案例对构建的投资回报率模型和决策模型进行验算分析。^[11]

刘兵、曾建丽等人以共生理论为视角探索雄安新区城乡关系,根据雄安新区城乡发展失衡现状以及雄安规划要求,发现雄安新区适合运用城乡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雄安新区城乡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及新型城乡共生体,并提出雄安新区与京津共生的对策,为雄安新区解决城乡发展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12]

杨欣、曾珍香等人考虑了云制造模式创新对企业运营的敏捷性(考虑能力因素和驱动因素)及绩效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对天津工业云平台的案例研究,运用 DEMATEL 方法,探讨云制造模式创新如何通过增强企业运营敏捷性从而提高企业绩效,并提出企业发展云制造创新模式的对策。^[13]

赵钊、贺荣戈认为慕课时代的到来,高校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教学和学习的模式都将发生深刻变革。为更好地支持学生学习,高校教师需要扮演好技术、管理、教学和社交四个维度的角色。然而,由于受到传统教育惯性、教师能力储备以及绩效考评导向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高校教师角色转变面临巨大挑战。高校管理者要着重从改变教师对于慕课的态度、重塑教学行为和模式以及提升数字素养和技术能力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以促进教师的顺利转型和慕课的广泛深入应用。^[14]

赵萌等人发现,群体决策(GDM)中最理想的替代方案是最能反映群体共识的方案。然而,很少有关于概率语言术语集(PLTS)的 GDM 共识测量的研究。在研究中,提出了一种基于 GDM 中 PLTS 可能性程度的共识测量方法。首先,在可能度的基础上定义两个 PLTS 之间的相似度的概念,并将这个概念扩展到群决策者提供的概率语言信息之间的共识度量,并推导出每个群决策者的相关权重。然后汇总每个集团决策者提供的 PLTS,对备选方案进行排名。最后,提出了两个说明性的例子来应用该方法以评估专家之间的集体偏好值的共识程度和 PLTS 的大群体决策问题。通过对比分析,验证了该方法的

优点。^[15]

袁旭梅、张旭阐述了利用正态云模型的 PROMETHEE 多准则决策方法。将云模型理论、参数特征(期望、熵、超熵)、云运算原理、云比较规则带入 PROMETHEE 方法的求解过程,对其中的参数进行云转换,获得云滴形式的决策数据,体现决策的模糊性、波动性和随机性。通过应用算例,实现了考虑港口企业偏好的煤炭需求客户分类和关键客户识别,验证了云 PROMETHEE 方法的有效性与优势。^[16]

袁旭梅等人针对多准则决策问题的意义以及经典粗糙集方法在不完备系统方案排序问题中的不足,在前人基于概率优势关系(PDR)排序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云理论提出了基于云概率优势关系的不完备系统多准则决策方法,即云 PDR 排序法。将期望、熵、超熵等参数引入 PDR 方法,充分考虑了决策的模糊性、波动性和随机性,评价过程和结果更加客观全面。以煤炭资源型城市为例进行应用研究,获得其中各城市发展水平及其波动情况的排序,并通过与其他方法结果的比较验证了该方法的优势与有效性。^[17]

宋之杰、王浩等人针对指标评价值为三参数区间数的群体决策问题,提出了一种同时考虑决策风险偏好确定的决策指标与各决策者权重的方法。定义一种简化的三参数区间数距离公式和记分函数排序法;引入熵测度方法,构建多指标风险偏好的权重模型,结合决策者主观赋权计算得到新的调整权重;基于群体意见的偏差最小与差异性保留的偏好关系,得出各决策者权重,通过加权平均集结各方案的综合值进行排序。最后通过案例计算,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18]

(三) 评价理论与方法

本年度的评价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主要集中在企业评价研究、区域评价研究和信用及价值评价研究等领域。

关于企业评价研究。牟玲玲、尹赛等人针对 PPP 模式下准经营性项目风险因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利用文献阅读和案例分析方法,识别出影响 PPP 准经营性项目成败的 6 个一级风险影响因素和 34 个二级风险影响因素。采用 DEMATEL 模型对一级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基于 ISM 模型划分层级结构;运用模糊综

合法确定二级风险因素的重要性。结果表明,建设风险、环境风险、管理风险和经营风险是直接影响因素,经济风险在系统中是间接因素,政策法律风险是深层根源因素。该研究完善了PPP模式下准经营性项目风险评价方法,有利于PPP模式在准经营项目中的推广。^[19]

吕荣杰、贾芸菲等人以我国31个省份技术转移为研究对象,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比分析以高校为主体和以企业为主体的省份技术转移效率,并对省份高校、企业技术转移效率的有效性和非有效单元投影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整体技术转移效率低下,高校情况更不乐观,处于规模效率递增阶段,而企业处于规模效率递减阶段;高校和企业普遍存在着投入冗余情况。针对研究发现,因地制宜地提出提高我国不同省份不同主体技术转移效率的建议。^[20]

王天伟、李向东等人针对建筑施工企业BIM应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成问题,基于对BIM应用影响因素的分析,结合专家访谈研究,应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手段,得到初步的指标体系,其包含4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根据指标形成调研问卷,收集数据,检验问卷的信度,应用因子分析法分析指标体系的构成,剔除1个二级指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并给出各指标的权重。^[21]

王超认为,我国医药企业正全方位走向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如何建立有效的评价模型,从而防控上市医药企业的财务风险,对于医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者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模型对X医药企业的财务风险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控制财务风险的方法和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22]

郭净、耿军会等人认为非研发创新与研发创新都是创新的重要形式,能够为企业带来创新绩效,非研发创新对于中小企业尤其重要。但在目前传统创新理论为主的研究中,创新绩效评价更多反映的是研发创新的结果,而没有体现出非研发创新的作用。作者利用文献分析法,将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分为两大类六种模式,即技术类包括外部技术和知识采用、现有知识创新应用和改良、产品和服务定制与设计,非技术类包括营销

创新、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每种模式的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以全面反映中小企业的非研发创新绩效。^[23]

吕荣杰、贾芸菲等人打开“黑箱”将技术转移系统内部结构解析为技术创新和产业价值创造前后联结的两个阶段,并采用两阶段DEA方法,首次对比分析以高校为主体的省市技术转移效率和以企业为主体的省市技术转移效率。结果表明,中国省际高校、企业整体技术转移效率偏低,技术创新阶段是制约总体技术转移效率提升的瓶颈,高校情况更为严峻;中国省际技术转移效率差距较大;针对比较发现,因地制宜提出适合不同主体提高技术转移效率的建议。^[24]

侯维磊、郭跃显等人为了检验各个铁路运输企业货运服务创新方面的效果,构建了货运服务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双基点法对铁路运输企业的货运服务创新绩效进行评价,得出铁路运输企业货运服务创新绩效的排序,找出货运服务创新方面的不足,提出提高货运服务创新绩效的措施,目的在于提高铁路运输企业的货运服务水平。^[25]

王大本、刘兵为了深入了解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承载力水平,从污染物、技术管理、使用消费3个方面构建了大气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3个地区2006—2015年的大气环境承载力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6—2015年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承载力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大气资源的使用消费状况是影响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承载力水平的主要因素。^[26]

刘兵、曾建丽等人从投入产出角度建立科技人才资源配置评价指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2010—2015年我国31个省份科技人才资源配置效率。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科技人才资源配置效率整体水平在高低交错中呈递增趋势,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缩小,而东北与东部的差距增大;根据地区科技人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匹配的匹配程度,将地区科技人才资源配置效率分为与经济发展水平正向同步型、反向同步型、领先型、落后型4种发展模式。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优化科技人才配置效率的建议。^[27]

孙丽文、郭竞认为对创新平台的运行效率做

出科学、客观、有效的评价,是推动区域创新平台有效运行的关键。基于对区域创新平台运行机制的分析,构建了区域创新平台运行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两阶段SE-SBM模型,以河北省为例进行了实证评价。根据科研开发与成果转化两阶段的评价结果分析,提出河北省区域创新平台运行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28]

金浩、李瑞晶以京津冀地区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构建区域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组合评价法评价区域治理绩效。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各地市治理绩效呈现“一家独大、差异明显”的特点,北京市治理绩效远远优于其他城市,区域内部存在着较大差异。现阶段实现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的当务之急是要弥补河北省部分城市的治理短板。^[29]

孙丽文、张蝶等人以京津冀2010—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区域科技协同创新指标体系,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京津冀三地协同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和评价。实证结果显示:京津冀和津冀协同创新水平逐步攀高,但同京津冀、京津依然存在差距。协同创度程度排序由高到低为京津、京津冀、津冀、京冀。京津冀协同创新差距大是外在表现,内部不协调才是根本。应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协调分工合作、建立共享机制、提升成果吸收能力等促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30]

李炜、李子彪等人基于区域创新系统是由多创新极共生的复杂演化系统的观点,将区域创新极培育能力的组成因素概括为产业创新活力、区域知识支撑水平、区域创新极培育环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四个方面。围绕创新极培育能力的组成要素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聚类分析与主成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中东部11个省份的创新极培育能力强弱程度进行排名以及分类,分析区域间培育能力存在差异的原因,提出了提高区域创新极培育能力的政策建议,并对区域创新极培育的研究以及培育能力的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展望。^[31]

席增雷、袁青川等人研究发现北京、天津、河北存在着明显的科技创新资源分布和创新能力的梯度差异。作者通过建立区域性科技创新评价指标,采用Malmquist-TFP模型评价了京津冀三地的科技创新效率,发现从总体上而言三地的全

要素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河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高于北京和天津;河北的技术规模效率最大;建议促使京津冀三地的科技投入要素的流动,逐渐转移至河北,以有效地通过技术的规模效率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2]

孙丽文、陈继琳基于经济—环境—社会(EES)协调发展的理念,在明确绿色创新内涵和价值维度的基础上,将绿色创新绩效分解为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并运用投影寻踪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以环渤海经济带为例进行绩效评价,进而分析绿色创新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各维度的协调发展程度。为进一步提高绿色创新绩效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33]

马宇博从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个子系统19个二级指标入手,针对京津冀与河北省重要城市进行空间差异和时序差异分析发现,京津冀在PRED系统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从PRED系统综合评价得分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确实起到了城市功能布局优化的作用,河北省各城市应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契机,进一步探索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自身发展能力特别是综合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从而促进京津冀区域PRED系统的协调发展。^[34]

关于信用及价值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张培、李楠从价值共创视角探索生产性服务外包中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揭示其商业模式创新诱因和不同服务模式价值共创的情境差异性。研究表明:价值主张契合从功能契合进阶为感知契合将会引发生产性服务外包的商业模式创新;价值主张形成功能契合将会促进过程型服务模式,而若形成功能与感知双重契合将会促进结果型服务模式;在过程型外包和结果型外包的不同服务模式中顾企互动路径分别对应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具有显著的情境差异性。^[35]

张莉、梁凯等人站在客户的角度,从客户价值产生的过程中主要包含的物流服务质量、客户关系维护、服务收益与投资三个方面提出物流服务供应商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ANP-TOPSIS法的物流服务供应商核心竞争力评价方法,通过案例应用验证了这一评价方法的合理性。^[36]

赵丽丽、王雪青等人运用区间直觉模糊集构

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监理工程师的信用行为进行评价。此模型通过相似性度量值、精确度函数分别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权重和信用评价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运用 IIFHG 等算子对区间直觉模糊信息进行集结,可以充分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在评价过程中的话语权,有效规避评价主体因主观偏好所引起的偏差。算例分析表明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合理性。^[37]

申晨、程冬玲认为,长期以来,“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制约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作者采用融合了层次分析法的灰色关联度模型对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价,将企业状况和发展前景纳入到信用风险评价当中。实证结果表明,该方法是可行的。^[38]

路丽、陈松奕以我国沪深两市 2010—2017 年间 108 家流通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旨在研究流通企业政府补贴、跨境电商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当期和滞后一期的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并且对于拥有跨境电商业务的流通企业,政府补贴能够更加显著地提升滞后一期的企业市场价值。^[39]

(四) 风险管理技术与方法

李杰、马士豪等人通过分析众筹违约相关因素,结合众筹平台提供的公开信息,从众筹项目基本特征、发起人信用度、项目关联度、项目融资进展四个方面构建众筹违约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将模拟退火(SA)算法与支持向量机(SVM)相结合,构建众筹违约风险预警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鲁棒性好、精度高,能有效预警众筹项目违约风险。^[40]

金浩、张晓园等人为了研究互联网金融对供应链风险和收益的影响,通过构建基于互联网金融的供应链主要成员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风险因子修正的 Shapley 值法并结合蚂蚁金服的供应链案例,对比分析引入互联网金融前后供应链风险和收益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蚂蚁金服降低了供应链整体的风险,提高了供应链整体的收益。^[41]

李延军、金相杉选取沪深股市 2006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共计 144 个月 300 支股票的数据为样本,对我国股市流动性风险溢价效应与三种溢价渠道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其他

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对我国股票期望收益率的影响更为显著;三种流动性风险中个股流动性成本对市场收益率的敏感度最为重要,是流动性风险溢价的主要渠道,而另外两种风险渠道的影响相差不大。同时,在市场整体流动性降低时,投资者会选择将投资资金从流动性低的股票转移到流动性高的股票中,使流动性较差股票的价格急剧下降。^[42]

刘霞、任驿佳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提炼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风险因子,建立基于 COBIT 5 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风险管理模型;然后收集专家意见,对该模型予以完善,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风险管理机制。包括 4 个 IT 管理层面、52 项风险因子和 130 项控制措施。采用案例研究法,通过结构化访谈的方式,对案例公司的副总经理和 IT 管理部负责人等进行访谈,验证所构建的风险管理机制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基于 COBIT 5 的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风险管理机制能协助企业通过风险识别、评价、应对、监督与修正完成整个风险管理过程,并快速找出潜在的风险因子,进而实施有效的控制措施,是一个便利、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43]

王健、刁广付等人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大多数种粮合作社的风险转移方式为购买政策性保险,其他风险转移方式实施规模有限。针对沧州市具体的生产条件,提出合作社应加强与政府、保险公司和期货公司的合作,创新风险转移工具,保证“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的顺利实施的相关对策建议。^[44]

杨会朴、康凯对供应链融资系统中参与个体与集群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论证创新型产业集群合作主体收益分配的改进路径,通过对创新型产业集群中供应链融资模式的应用研究,探究如何改善创新型企业的融资生态。研究发现供应链融资模式的信用转换和信用回流效应有助于解决创新型企业的信贷弱势地位,但供应链系统网络结构和参与主体联结的脆弱性,容易出现供应链融资风险聚集特征。^[45]

王培辉、袁薇分析了平安集团内部金融风险结构特征。认为平安集团风险集中度较高;规模对控股子公司重要性有较大影响;平安集团风险主要来自于银行业务、寿险业务和信托业务。指出保险集团强化风险管理应注重系统重要性控股

子公司识别与风险管控,注意保险集团内部各类业务间交叉金融风险识别与防范,健全完善集团内部风险管理控制系统,构建综合金融监管部门。^[46]

辛兵海、陶江使用中国 A 股上市银行 2007 年第 1 季度至 2017 年第 1 季度数据,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同群效应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首先,中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同群效应,个体银行的流动性政策选择会受到群体银行的影响;其次,中小银行之间的同群效应最为显著,“太多而不能倒”的集体道德风险构成了中小银行之间相互效仿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国有四大银行与中小银行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模仿行为,这排除了基于信息获取的学习动机导致同群效应的可能性。本文结论为系统流动性风险监管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实证支持。^[47]

(五) 数量经济理论与方法

李博、李海波以“能源—环境—经济”的“3E”系统理论为出发点,构建环境约束下的能源经济发展模型,探究了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无论长期还是短期能源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经济发展会造成资源浪费与效率低下,从而引发生态环境问题,但是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人们意识的提升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使得经济发展在长期内重新恢复生态平衡,进而达到经济持续发展目的。^[48]

王金营、李天然以 OECD 中 17 个国家 1960—2016 年的数据为样本,从人口规模、质量、年龄结构和迁移分布等方面刻画 OECD 国家的人口变动轨迹,探索检验了这些国家人口变动各因素和综合因素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发展质量等转变的影响及其作用规律。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定规模和密度的人口环境下,总人口的过快增长会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人口迁移率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有促进作用,但对经济结构的调整有抑制作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改变经济结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人口的集聚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有正向作用;预期寿命的提高为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机会和动力,人口老龄化则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49]

王金营、唐天思对京津冀未来不同经济增长速度和不同综合要素生产率(发展方式)下的劳动力需求进行模拟和比较。结果显示,京津冀未来劳动力供给减少的可能性不断增强,为使区域经济实现持续高质量增长和发展,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从而减少对京津冀之外劳动力的需求,实现在人口不再大规模增加的前提下劳动力的供需平衡。因此,京津冀地区在新的人口发展和经济形势下,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创新驱动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并保持必要的人口和劳动力规模与活力,进一步促进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50]

李凯伦、刘梦月等基于我国 1990—2015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作为门槛变量实证检验了 FDI 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处在低门槛值之下时,FDI 的流入对我国的城镇化具有促进作用;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处在低门槛值和高门槛值之间时,FDI 的流入对我国的城镇化具有抑制作用;当其在高门槛值以上时,FDI 的流入对我国的城镇化又具有了促进作用。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不同,FDI 对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具有阻碍作用,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加快经济展方式的转变,从而使 FDI 成为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强大动力。^[51]

孙芳、韩江雪等人通过设置影响生态建设与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规模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与政策因素四大类 37 个影响因素,利用 SPSS 软件回归模拟结果显示各个因素对生态建设与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依据定性分析假设与计量模拟分析结果,针对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机遇,提出对策建议:继续加强生态建设项目的推进、适度扩大产业经营规模、加大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投资力度、实施资源节约型生产创新模式以及健全和完善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制度。^[52]

许秀文为了研究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以三个地区为样本,说明了文化旅游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方式,探讨了协调发展的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实验结果表明,在 2009 年至 2013 年时,文化旅游发展较为滞后,然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在 2014 年至

2017 年时, 文化旅游逐渐发展, 具有较好的协调性。^[53]

(六) 预测理论与方法

赵现锋、赵颀淇通过 GM (1, 1) 模型对河北省旅游业经济增长潜力进行预测, 并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对河北省旅游经济增长潜力进行评价。认为河北省旅游业经济增长潜力是实现河北旅游质量提升行动计划 2020 年目标的关键因素; 客观评价与合理预测河北省旅游业经济增长潜力, 是转化增长潜力为发展实力的重要环节, 也是发现增长规律与突发问题的必要方式。^[54]

冯鑫、王晨以在线评论信息为基础, 从用户情感角度出发, 通过词语级情感分析技术把评论情感倾向量化表示为积极与消极情感两类, 然后运用 BP 神经网络进行客户流失预测建模来进行用户流失预测。研究结果表明, 会员等级、评论星级、点赞数、回复数等在线评论信息均不同程度影响客户流失, 其中评论内容情感极性为识别客户流失的主要指标。^[55]

李杰指出电商企业商品销量预测具有影响因素多、自相关性显著等特点, 传统方法的预测效果对其并不理想。对此, 提出了一种销量预测方法, 应用 Grange; 因果检验分析影响商品销量的主要因素, 利用 XGBoost 算法建立商品销量预测模型。该预测方法能有效提高商品销量的预测精度, 具有较高的实际应用价值。^[56]

刘璞、王萌等人通过建立灰色马尔可夫预测模型和加权加增长率移动平均法, 对制度环境进行预测, 并对预测结果的精度进行比较。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果的可信性, 从全国选择 14 个省份进行预测, 预测结果表明灰色马尔可夫预测结果优于加权加增长率移动平均法。^[57]

邵双双、刘丽冰等人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DBN 预测模型, 将动量学习率引入到 DBN 无监督预训练阶段, 改进了受限波尔兹曼机 (RBM) 网络以提高特征提取精度及参数在训练过程中的抗振荡能力; 同时, 将共轭梯度法嵌入 DBN 微调阶段来提高学习速度; 最后, 在袋式除尘器数字样机工作性能数据集上进行了验证。实验结果表明, 与传统 DBN 及其变形模型相比, 改进的 DBN 网络模型不仅收敛速度快而且预测精度高。^[58]

陈亮、王金泓基于 STIRPAT 模型, 选择旅

客周转量、货物周转量、人均 GDP、机动车保有量、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和城市化率 7 项指标作为我国区域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 建立基于支持向量回归机的碳排放预测模型, 并以 1990—2016 年北京市交通碳排放相关数据为基础数据做实例分析。结果表明: 训练样本交叉验证均方误差仅为 0.008040, 得到参数 C 和禅勺最优值; 模型预测值与真实值的拟合回归效果良, 即模型具有良好的学习和推广能力; 未来区域交通碳排放增长趋势逐渐变缓, 但总量将继续呈上升趋势, 社会仍然面临较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压力。^[59]

杨军胜、彭石等人指出配电网规划与城市的用地性质息息相关。基于城市的用地性质进行负荷分区, 并将其与负荷预测相结合, 使之成为空间负荷预测中负荷密度预测的依据。针对实际规划中存在的样本数据充足和不足的情形, 分别使用最小二乘法和相似搜索方法加以研究, 使负荷密度预测有规可循, 也是空间负荷预测的前提准备。^[60]

赵丽娟、余秀萍等人研究了 2022 年冬奥会下张家口市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预测未来张家口市房价的变化情况, 选取了可能影响房价的 21 个因素设计调查问卷, 利用所得数据先后进行单因素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冬奥会、投资炒房、实时房价、收入、市场需求是影响张家口市房地产价格的五大因素, 其中冬奥会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61]

李杰、张睿在 C5.0 决策树算法的基础上, 结合处理不平衡样本集的 EasyEnsemble 思想, 建立患者非医嘱离院预测模型, 有效识别非医嘱离院倾向患者。基于 EasyEnsemble 思想, 通过 Bootstrap 采样方法抽取多数类样本子集组建多个新的均衡数据样本集, 运用 C5.0 决策树算法并结合交叉验证方法与代价矩阵, 训练多个基分类器, 最后经 Bagging 算法集成, 得到最终预测模型。^[62]

(七) 复杂性与复杂系统

庞明宝、刁化尧采用元胞传输模型建立城市快速路节点耦合的复杂网络动力学模型, 以同步为目标设计多入口匝道协调控制器并确定控制策略, 推导出城市快速路网络系统同步的稳定性条

件, 以此得到牵制节点和反馈增益矩阵。通过具体例子仿真验证了协调控制方法的有效性, 能以较少的控制范围代价达到抑制交通拥堵从而提高道路通行效率的目的, 控制效果优于传统协调控制方式, 可进一步推广到大规模城市交通网络系统。^[63]

孟旭彤、宋川通过构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以及灰色关联法分析各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研究结果指出河北省北部山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不足, 为进一步完善区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64]

陈立文、赵士雯等人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系统回顾, 对影响绿色建筑项目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全面梳理。首先, 对绿色建筑内涵和特征进行分析; 其次, 构建包括外部驱动因素和内部驱动因素两个维度的分类框架, 其中外部驱动因素包括法律法规、激励措施、评价体系、市场需求, 内部驱动因素包括道德责任、声誉形象、人类福祉。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以期为我国推进绿色建筑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和借鉴。^[65]

周莉对图书馆联盟的复杂网络特征进行分析。以河北省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为例, 深入分析复杂网络视角下图书馆联盟的形成机理。认为在图书馆联盟的形成过程中, 图书馆联盟成员会结合自身情况和外部环境进行有向选择, 有向选择机理、学习机理、共享机理和协同机理在特定环境下相互作用, 共同推动图书馆联盟的形成和演化。^[66]

孙文霞、赵晓娟等人通过建立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公交系统站的配置模型, 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站点配置融入公共交通网络规划中。利用 Space L 模型、Space P 模型分别构建公交系统有向网络模型, 针对由复杂网络拓扑特性得出的公交系统网络中重要度低的节点, 结合自行车接驳距离模型以及汽车公交线路最优站间距的确定, 建立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公交系统站的配置模型。该模型最终确定自行车配置站点时, 需要综合分析站点及其所在线路相关网络信息、环境信息, 对汽车公交线路进行调整, 进而达到通过配置自行车站点优化现有城市交通线网的目的。通过合理配置自行车站点, 在保证公共交通网络覆

盖率不变的前提下, 节约站点数量, 提高了站点利用率及公共交通出行效率。^[67]

谢廷宇、康凯等人在给出基于复杂网络的供应链网络鲁棒性指标的基础上, 分析了受随机和蓄意两种不同攻击方式的供应链网络的鲁棒性。研究结果表明: 供应链网络崩溃过程是鲁棒性指标逐渐变为 0 的过程; 随机攻击具有鲁棒性, 即具有很好的容错能力, 而对于蓄意攻击则非常脆弱; 重要节点对整个供应链网络效率影响很重要。提出了面对蓄意攻击的应对策略可以达到改善供应链网络鲁棒性的目的, 并对于提高供应链网络的抗干扰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68]

刘清利用河北省投入产出表数据构造复杂网络, 用以分析新时代、新形势下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关联状况, 并将复杂网络生成的指标纳入指标评价体系, 采用因子分析法研究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 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理论支持。^[69]

富国亮、胡静指出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目前职前职业教育和职后职业培训都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短板, 都难以独立完成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系统培养。因此, 要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宗旨, 以满足行业企业人才需求为目标, 依托高职院校优势教育资源, 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律, 在校企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 构建一个“职前企业深度参与, 以促进就业为导向; 职后院校跟踪培养, 以服务发展为宗旨”的职前职后一体化教育模式。^[70]

李靖、韩凯通过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披露研究, 找出我国表外业务会计信息披露的原因, 并给出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会计信息披露的对策建议和信息披露框架, 为我国商业银行不断创新的表外业务会计信息披露领域提供借鉴, 为我国的相关监管部门在法规的制定上提供参考。^[71]

王艳楠等人研究了一类具有随机扰动和部分不确定转移的马尔可夫跳跃复杂网络的指数同步问题。通过构造新的随机 Lyapunov-Krasovskii 函数 (LKF), 利用随机分析, 反馈钉扎控制技术和不等式技术, 根据线性矩阵不等式 (LMI) 建立了一些充分的标准, 以保证 MJCDN 与时间的

指数同步。根据具有部分不确定转移率的马尔可夫链,给出了一些数值例子来证明所提出结果的有效性。^[72]

马越超研究了具有马尔可夫跳跃参数和混合时滞的奇异复杂网络的同步问题。该系统由 N 个节点组成, N 个节点根据具有已知转移概率的马尔可夫链从一种模式切换到另一种模式。基于钉扎控制的策略,奇异复杂网络是同步的。通过利用适当的 Lyapunov-Krasovskii 函数,线性矩阵不等式(LMI)方法,随机分析技术和矩阵函数的凸性,可以获得一种新的同步准则。仿真实例证明所提方法的有效性。^[73]

(八) 知识与创新理论与方法

王海波、马金伟认为,在影响老字号品牌创新有效性的因素中,消费者感知老字号品牌创新性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消费者感知老字号品牌的创新性水平,决定了老字号品牌的创新能否被接受。作者以老字号品牌个性为基点,研究消费者对老字号品牌创新性的感知与认同,提出老字号品牌创新对策,以期使老字号品牌能够适应现代消费需求。^[74]

邢丽云、俞会新从网络层面、企业层面和个体层面分析了网络关系强度、绿色动态能力和高管环保意识及其两两交互作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网络关系强度、绿色动态能力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高管环保意识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网络关系强度、绿色动态能力与高管环保意识两两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实践。^[75]

王智新、梁翠构建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支撑创新驱动发展评价体系,选择灰色综合评价方法测算了 2011—2016 年全国 31 个省份(不考虑港澳台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状况。提出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撑引领,加快知识产权运用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政策建议。^[76]

刘娟、马学礼在重新界定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雄安新区创新主体培育、创新环境建设、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良性互动过程。认为雄安新区应区分不同主体功能,按照“中心—外围”结构,构建共生关系。同时,建设

应内嵌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充分利用其提供的创新环境,通过促进协同创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内在动力;政府需以相关政策为指导,解决雄安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中的功能缺位和功能错位等市场失灵问题。^[77]

张红霞从产业链整合的视角出发,在对流通业与产业链整合的内在联系进行简单阐述之后,对我国流通产业的创新与转变路径进行系统研究,并从流通功能、流通模式、流通产业结构、流通政策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对推动我国流通产业的健康发展、有效提升产业链竞争力起到一定作用。^[78]

王晓雪认为高科技的发展、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激烈的多边市场竞争等,都是共享经济下商业模式创新的源动力。作者具体分析了住房、汽车、金融三个共享经济典型案例,从案例中了解到共享经济对商业模式变革和创新的影响,并得到了一定的启示,为共享经济企业的发展方向提供相关建议。^[79]

李炜、李子彪等人在对区域创新极的内涵,并对现有区域创新极培育能力的组成因素的文献进行梳理研究基础上,提出区域创新极培育能力影响因素的假设。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法发放问卷收集数据,使用 SPSS 软件对数据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运用结构方程的研究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区域创新极培育能力的组成因素包括产业创新活力、区域知识支撑水平、区域创新极培育环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四个方面。^[80]

孙丽文、陈继琳基于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在明确绿色创新内涵和价值维度的基础上,将绿色创新绩效分解为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并运用投影寻踪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以环渤海经济带为例进行绩效评价,进而分析绿色创新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各维度的协调发展程度,为进一步提高绿色创新绩效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81]

田学斌、柳天恩认为雄安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强化,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作者探讨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几个基本共识,分析了雄安新区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并从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攀升产业价值链高端、推进产业转移升级、培育壮大高端高新产业、创新

产业扶持政策、重视人力资本投入和加大政策配套力度等几个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82]

李子彪、孙可远等人探索了三类政府财政激励政策（政府补贴、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和研发加计扣除税收减免）对不同所有权性质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机制及其差异。认为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最强，其次是研发加计扣除税收减免，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最弱。三类政府财政激励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力投入来激励企业创新；政府财政激励政策对私营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优于国有企业，且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果为负，但对私营企业的激励效果为正。^[83]

陈昭翔、陈立文以天津某房地产项目为例，从新建公租房项目和改建商品房项目两个方向构建公租房融资租赁模式。通过收益测算，新建公租房项目以8%左右的内部收益率吸引相关企业参与，可解决一、二线新城市人口住房问题，改建商品房项目因成本偏高，收益不理想，但仍可考虑通过税收减免、租赁期结束重新收购、销售住房的方式吸引相关企业参与。融资租赁为保障性住房的发展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研究方向，为解决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新城市人口”住房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84]

杨玉楨、李珊等人测算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006—2015年两阶段创新效率，实证检验城市化和对外开放对创新效率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整体较低，创新效率的提升依赖于知识研发和成果转化两阶段的共同作用；城市化和对外开放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差异化特征明显；对外开放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随着开放度的提升，城市化将显著提高区域创新效率。^[85]

高树军、李洪英基于高德拉特制约因素理论，构建了地方平台公司创新驱动效能评价体系，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青岛市30家平台公司进行了实证评价。根据创新驱动效能的差异，明确转型动因和方向，从平台公司创新驱动视角下，提出了地方平台公司治理模式由行政型向经济型转型的进化、拓展和跨越的三种可能路径。^[86]

二、管理科学与工程专题研究

（一）运筹与运营管理

李士森等人对区域相关性与赔付风险的关系进行研究，利用我国2007—2015年省级保险数据，通过蒙特卡洛模拟方法测度了保险赔付的区域相关性对农业保险机构赔付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保险赔付的区域相关性显著提高了我国主要农业保险机构的赔付风险。通过构建和求解以赔付风险最小化为目标的优化模型，提出了降低区域相关性影响的对策，即保险机构能够通过承保区域进行份额重组，降低农业保险的赔付风险。^[87]

王剑通过阐述全渠道零售的内涵与演化进程，分析了当前零售企业全渠道模式发展面临的困境，探讨了传统零售企业供应链模式运行的不足之处，从生产、销售、物流配送管理、售后服务等具体环节，优化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全渠道零售供应链模式，以期实现零售企业全渠道供应链的协同发展。^[88]

康凯、韩杰等人综合考虑配送车辆的固定成本、运输成本、生鲜农产品的货损成本、制冷成本、配送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成本，以及因未满足客户要求的服务时间窗而产生的惩罚成本作为目标函数，构建考虑碳排放的生鲜农产品配送路径优化模型，并用实例对模型及算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仿真实验及算法对比结果证明模型和算法是有效的，可以为物流企业的配送决策提供参考。^[89]

赫连志巍、王丽莹通过对创新活动过程和创新网络扩散过程及二者搞合作用的分析，确定创新网络活跃度的影响因子，构建集群创新网络活跃度模型，并运用 MATLAB 进行仿真模拟。结果表明：平均路径长度与创新网络活跃度呈负相关，集聚系数和中心度与创新网络活跃度呈正相关；异质性创新能力的均匀分布和适度的吸收能力有助于激活集群创新网络活跃度；集群创新网络中节点之间的关系强度、转移意愿、溢出效应和共同理解越高，集群创新网络活跃度越高。^[90]

佟林杰、盖宏伟为探索更高效的企业技术创新资源优化配置算法，提出了基于蚁群优化算法的求解方法。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流程，构建了以时间、成本和应用性为目标的企业技术创新资

源优化配置模型,设计了模型求解的蚁群算法,并通过具体算例验证了算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91]

陈业华、黄璐针对突发事件应急决策信息不完全、不确定的模糊特性,在分析现有直觉模糊熵定义不足的基础上,分别考虑隶属度与非隶属度的偏差以及犹豫度对直觉模糊集的影响,定义一种改进的直觉模糊熵。结合不同应急方案的可信度,引入一个可变系数,对决策方案的优劣进行合理评价,由评价准则得到最终的排序结果。最后通过一个应急决策算例,验证了方法的适用性和可行性。^[92]

陈立文、赵士雯通过梳理智慧社区的概念和开发模式,提出政府引导、地产开发商为主体的智慧社区运营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精细化、高效化的智慧社区运营管理平台体系,并对综合决策平台、监测评价平台、服务管理平台、资源整合平台、监督受理平台和服务选择平台的运行机制和相互作用进行分析。^[93]

赵晓冬、藏誉琪等人基于对偶犹豫模糊偏好信息的双边稳定匹配问题的描述,依据双边主体给出的偏好信息构造对偶犹豫模糊偏好矩阵,使用投影技术将对偶犹豫模糊偏好矩阵转化为满意度矩阵,以双方主体满意度最大化为目标,运用组合满意度分析方法,将多目标优化模型转化为单目标优化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得到最优的匹配方案。实例分析说明了所提方法的实用性和有效性。^[94]

赵欣、翁钢民指出,随着私家车出行比例日益增长,优化疏散路径是缓解交通拥堵的根本途径。作者将疏散路线的复杂度最小作为优化目标之一,建立了基于路线复杂度与疏散时间的双目标拥堵疏散路径优选模型,将疏散路线的复杂度定义为疏散路径总长度。认为疏散区域路网中各路段上的车辆平均运行速度是随时间的推移连续递减的函数,应用 Dijkstra 设计了模型的求解算法,仿真结果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95]

康凯研究调查了一个新的双目标库存分配规划问题,即在不确定的多个时期内供应商选择和碳交易。提出了碳信用额度和碳排放上限的概念,以证明碳排放成本对库存分配网络成本的影响。结合归一化正态约束方法,差分进化算法和不确定性模拟来处理复杂模型。一个具有代表性

的案例表明了该模型和提出的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96]

李杰、赵旭东等人针对电子商务环境下终端物流配送规模大、电动车货物容量和行驶里程有限的问题,建立了电商终端物流配送的电动车配置与路径规划集成优化模型,并提出一种基于临近城市列表的双策略蚁群算法,实现物流配送电动车辆配置与配送路径集成优化。该模型以电动车辆数最少和总路径最短为目标,以电动车货物容量和电池续航里程为约束,是带容量的车辆路径问题的进一步扩展,属于双容量约束路径规划问题。通过阿里巴巴旗下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上海的 30 组真实配送数据进行了测试,验证双策略蚁群算法显著优于一般蚁群算法。^[97]

刘广平仿真模拟了市场匹配效率、市场紧缺程度、维修费用、租赁期限等因素对住房租赁市场搜寻匹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市场匹配效率、市场紧缺程度、租赁期限、过度需求率变化对市场租金的单位影响程度等变量正向影响承租人的最优搜寻强度;出租人单位搜寻成本、维修费用和空置率变化对维修概率的单位影响程度等变量负向影响承租人的最优搜寻强度。其次,出租人最优搜寻强度的最优解并不一定存在,取决于出租人对匹配数量弹性的数值大小。再次,北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市场匹配效率负向影响承租人和出租人的搜寻持时;市场紧缺程度负向影响出租人的搜寻持时,但正向影响承租人的搜寻持时。^[98]

(二) 工业工程与管理

吕荣杰、郝力晓基于技术演进视角,总结了 4 次工业革命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刻画了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理论框架。采用 2010—2016 年我国 31 个省份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人工智能对就业人数和工资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就业,但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乡村劳动力,且人工智能发展并没有使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工资极化现象。最后提出了人工智能时代,确保劳动力市场面向未来需求平稳过渡优化的对策建议。^[99]

张敬、张志颖等人基于多元制度逻辑视角探究关系逻辑、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下供应链治理模式选择倾向及其背后原因。研究表明:供应链成员企业的商业关系与政治关系越强,越倾向于

选择低控制治理模式；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商业关系与政治关系对非国有企业治理模式选择行为的影响效果更明显；市场化改革有利于缓解商业关系、政治关系对供应链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强度。研究成果为丰富本土供应链治理理论，促进我国供应链发展提供了新的依据。^[100]

李宁、韩同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北京耦合协调度上涨缓慢，协调机制处于中下等水平，天津处于稳步提高期，河北省耦合协调度比较薄弱且低于天津、北京。进而从产业自身、生产要素和外部环境三个维度，提出了驱动因素的7个理论假设，进一步运用面板模型对两产业协同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市场规模、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四个驱动因素与京津冀两产业协同发展呈正相关，而市场化程度、环境水平两个驱动因素与京津冀两产业协同发展呈负相关。最后，提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101]

李惠茹、陈兆伟以制造业为例，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构建我国区域性高端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在高端制造业上的显性比较优势在沿线国家较为显著，但由于我国出口主要以最终品出口为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比重高，表明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价值链分工定位还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产业升级的任务依然艰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实施使我国价值链分工位置得到一定提升，但提升较为缓慢。“一带一路”带动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参与度不同程度地提升，“一带一路”互利共赢的愿景初步显现。^[102]

武义青、陈俊先利用引入势效系数的方法来测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河北省11个设区市规模以上工业进行了实证分析。该方法测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体现各单要素生产率在绿色生产率中的作用，既能体现资本和劳动力的节约，又考虑了能源和资源的消耗，符合绿色发展的理念。^[103]

魏杰、王月等人发现绿色和再制造策略在动态制造商—零售商供应链中的相互作用，其中制造商在第一阶段仅使用原材料生产新产品，并在第二阶段使用旧产品（以及原材料）生产新产

品，这两种图案制成的产品是同质的。作者制定了三个两期 Stackelberg 模型，描述了制造商在后期使用产品的收集选项和利润折扣对定价，绿化和再制造策略的影响。认为，首先，双收集模式不仅提高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而且提高了产品在第一阶段的绿色程度，并提高了总收费；其次，与静态场景不同，制造商的利润独立于谁在单一收集模式下收集二手产品；再次，如果第二期利润的公用折扣因子增加，制造商将在第一期减少产品的批发价格，在第一期快速增加产品的绿色程度，并在第二期略微增加收集工作量。^[104]

赵斐、刘学娟等人提出了基于三阶段故障过程的单一组件系统的定期检查策略，并在提出的策略中考虑了两种不同的“硬”和“人”故障。认为如果通过检查发现严重缺陷，则需要立即修复。但是，一旦确定系统处于次要缺陷状态，则有两种选择。首先是在识别严重缺陷或硬故障之前什么也不做，第二是立即修复。对任何缺陷的修复可以以有限的概率更新系统，使得系统可能由于人为错误而在修复后失效，这在许多工业应用中是常见的。通过最小化每单位时间的预期成本并进行比较来构建两个模型，并提供了一个数值例子来演示所提出的模型。^[105]

（三）工程与项目管理

李万庆、武京等人提出了基于 AGA-AHP 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运用加速遗传算法（AGA）对层次分析法（AHP）进行改进，快速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修正不满足一致性原则的判断矩阵，并计算 AHP 中各层指标权重，再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国际工程项目进行风险评价。经理论分析与实例验证证明，运用 AGA-AHP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国际工程项目进行风险评价，其结果更合理、客观，精确度也更高，为国际工程项目领域进行风险管理与决策制定时提供了参考依据。^[106]

宋晓刚、曹聪慧通过分析 BIM 技术的特点与功能，研究工程建设各阶段造价控制的措施与方法。在设计阶段，可采用精益设计、限额设计、优化设计以及 BIM 审图控制方法；在招标阶段，可采用 BIM 技术编制招标控制价与招标文件，实施电子招标；在施工阶段，可利用 BIM 技术，编制资源计划，做好采购管理和工程结

算,并严格把控工程变更、签证与索赔;在竣工阶段,可利用 BIM 技术建立竣工 BIM 模型,减少结算审计,并有效运用于运维阶段。^[107]

陈敬武、俎照月等人发现特许期是 BOT 模式中的重要参数,其决定着政府与项目公司间的利益分配,影响项目成败。以公用事业 BOT 项目为研究对象,建立纯经营性项目中政府和项目公司两个主体之间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计算在项目投入建设之前以预测需求量、供应量和成本情况为依据的最优特许期。结合具体项目案例,对纯经营性项目特许期的确定及不同情况下的调整方案进行讨论。^[108]

白德全认为,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 PPP 模式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在社会融资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跨期调度机制的作用下,PPP 能够在短期内通过多种渠道缓解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在中期内通过约束地方政府的非理性行为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并在长期内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在成本收益机制、债务隐藏机制和目标分化机制的作用下,PPP 有可能在短期内诱发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在中期内诱发连锁的隐藏债务风险,并在长期内诱发系统的金融经济风险。应该从完善 PPP 的配套制度建设、加强对 PPP 运行的监督和管理、培养参与主体的市场契约精神、制定社会资本的进入退出机制等四个方面采取相应对策。^[109]

李妍、马丽斌等人采取 ISM 和 F-ANP 相结合的方法对 PPP 项目成功影响因素的关联性和重要性进行分析,并得出其关键成功因素的影响程度权重值综合排序。研究表明,绿色 PPP 项目经验与技能、政府监管持续性和政府对项目支持意愿是开发区绿色 PPP 项目关键成功影响因素中的深层次因素,是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并积极实施绿色生产技术的核心推动力,进而对最终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产生影响。^[110]

李金海、申丽洋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项目导向下社会组织能力框架体系,根据该框架体系分析发现了我国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存在竞争意识不足、组织机制不规范和知识管理机制不健全的问题,提出加快行政化改革、转变为项目导向型组织结构及规范知识管理机制的能力建设对策。^[111]

崔武文、刘雨菲通过蒙特卡洛—熵权分析模型的构建,将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及项目风险因素引入到考虑政府财政补贴的 PPP 项目财务模型中,从项目公司、政府和融资机构三方利益目标出发,量化得出某高速公路 PPP 项目前期的合理负债率区间为(67.50%, 75.04%)。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具备不同债务水平的决策建议方案进行赋权,进一步确定出该 PPP 案例的最优负债率。通过案例实证研究使模型得到实践的检验,对 PPP 项目发起阶段项目公司合理资本结构的确定具有借鉴价值。^[112]

(四) 金融工程

刘静、李媛媛基于产能过剩的视角,运用改进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研究信贷资本配置效率问题。从总体来看,中国工业的信贷资本配置效率时间趋势不稳定。从细分行业来看,产能过剩行业信贷资本配置不合理,信贷资本尚未配置到具有较高价值创造的行业中去。提出了着力提高银行风险定价能力,逐步完善信贷管理政策,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以抑制产能过剩的政策建议。^[113]

马洪超、易崇艳在分析中国影子银行特殊性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对于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最终目标的异化效应。由于影子银行具有“银行的影子”“非典型性脱媒”“剪刀差式风险”等三大特征,导致中国货币政策的传统操作工具和操作目标发生异化,并使得货币供给量的传统中介目标失效,同时也使利率这一新中介目标的效力得以提升。但是,由于信贷配给下的利率双轨制、土地垄断下的收益双轨制和监管缺失下的体系双轨制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导致资金脱实向虚、资产泡沫不断膨胀、金融风险持续累积,最终使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产生异化。为了改善货币政策的效果,需要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影子银行监管和完善配套制度建设等三个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114]

魏翠玲、安玉洁等人从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意义和主要特征的分析入手,简要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金融支持的作用机制和意义,并进一步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在金融支持上存在的问题,继而提出增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金融支持的建议。^[115]

金浩、张晓园指出,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其与供应链的融合在进一步优化企业融资、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意义重大。通过构建基于互联网金融的供应链主要成员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风险因子修正的 Shapley 值法并结合蚂蚁金服的供应链案例,对比分析了引入互联网金融前后供应链风险和收益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蚂蚁金服降低了供应链整体的风险,提高了供应链整体的收益。^[116]

樊锦霞、叶莉等首次研究了房价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依据不确定性特征,将其划分为“优于预期”不确定性和“劣于预期”不确定性两类,在现阶段,房价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有显著抑制效应,且不确定性特征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城镇居民消费对“优于预期”不确定性反映更为敏感。通过检验发现,当不确定性变动危及居民心理安全需求时,居民消费对收入增长的弹性反应系数显著降低,上述结论预示着政府对房价不确定性进行调控时,一方面可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以保障居民心理安全,另一方面可通过合理引导预期,提升居民消费意愿,进而达到刺激消费增长的目的。^[117]

李延军、史笑迎等运用空间回归偏微分方法,研究京津冀区域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借助经济地理学中的威尔逊模型,测算京津冀区域金融中心城市的辐射半径。研究表明:京津冀区域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比较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北京市和天津市作为京津冀区域的增长极,对其周边城市存在着辐射效应,但是还不能对河北省整体形成强有力的辐射。因此,京津冀应加强区域金融协同发展,降低金融壁垒,进而促进区域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118]

李博、田瑞兰等人利用混沌与分岔理论对一类金融风险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行为及其稳定性展开研究,分析金融风险系统模型分岔图与相图可知,认为该系统存在复杂的动力学行为。为此,选择不同参数组合下合适的控制强度参数,可为实现金融风险系统的平稳运行提供参考。^[119]

段宏煜、武敏等人分析了消费金融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增值机制,通过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的分析,对消费金融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增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完善消费金融管

理政策、优化市场建设、引导居民科学消费,给出了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的政策建议。^[120]

(五) 信息化条件下的管理模式

吴树芳、张雄涛等人基于微信公众号的社会化属性考虑,以关系型心理契约破裂和转换成本为理论基础,提出微信公众号采纳后用户退出一建言—忠诚—忽略(EVLN)行为的影响模型及研究假设。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样本,采用 Smart PLS 软件对模型及假设的合理性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关系型心理契约破裂和转换成本均部分显著影响用户的 EVLN 行为;转换成本在关系型心理契约破裂和 EVLN 行为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提出四条运营建议:细致了解用户关注动机、合理设置消息推送频率、积极履行关系型心理契约及规范应用平台转换成本。^[121]

于树江、范萌萌发现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新媒体沟通成为团队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将团队的任务类型划分为观点创造型任务和决策型任务两类,各新媒体沟通形态在两种任务类型下对团队沟通效果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在观点创造型任务中“电子文本”和“共享空间”两种沟通形态对团队沟通效果的影响最大;在决策型任务中“音频”沟通形态对团队沟通效果的影响最大。基于研究结果对优化团队沟通效果提出相关建议。^[122]

魏菲、孙立伟等人利用手机终端微信平台调研河北省内高校及市县级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服务情况。发现截止到调研时间,仅有不到一半的图书馆开通了自己的微信服务公众号,且一部分图书馆的账号主体、认证情况有待规范;各馆间推文数量及频率差异悬殊,发展失衡。建议河北省各图书馆重视微信公众服务,设置专门机构维护平台良性有效运行,多渠道宣传扩大影响,并向省内外微信公众服务较好的图书馆学习。^[123]

郭海玲、胡若静为全面分析微信订阅号受众行为,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心理契约理论,运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受众关注微信订阅号动机满足对心理契约破裂、心理契约破裂对受众退出一建言—忠诚—忽略(EVLN)行为的具体影响。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样本,并借助 Smart PLS 软件对研究模型进行假设验证发现,环境监测动机满足对交易型心理契

约破裂、人际关系动机满足对关系型心理契约破裂、自我确认动机满足对理念型心理契约破裂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心绪转换动机满足对关系型心理契约破裂没有显著作用；交易型心理契约破裂对微信订阅号受众退出、建言、忠诚、忽略行为意向均不具有显著影响；关系型心理契约破裂对受众建言和忠诚行为意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受众忽略行为意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受众退出行为意向影响不显著；理念型心理契约破裂对受众建言、忠诚、忽略行为意向均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受众退出行为意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此，应当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激发受众建设性行为，避免在提供经济利益方面投入太多资源；应当充分考虑受众关系型需求的满足，增强订阅号与受众之间的交互性，发展运营主体和受众的强关系网络；应当在推荐商品或服务时适度增加与目标受众所认同价值不一致的内容和风格，激发其好奇心理，提升其活跃度，避免其退出。^[124]

梁巍、白金发现微信传播基于强关系的特点，通过线上呈现与互动打破时空限制，将动态变化的生活场景移动化，朋友圈的实时动态也同样被赋予自我呈现与主体重塑的重要功能。微信朋友圈中的熟人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融合性更强，大家能够通过朋友圈中介传递的功能表达与传播自我，一定程度上实现外界对自我的认知转变。从人际传播的角度来看，个人在朋友圈呈现自我实际上是一种对自我的建构，这个建构过程既有对本我的表达，也有对群体价值、社会规范的认同与迎合，还伴随着自我披露与隐秘的选择。^[125]

（六）管理心理与组织行为

李艳双、杨思捷等人发现我国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可划分为家族控制、家族参与、政商关系、家族情感、家族继任意愿五个维度。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政商关系和家族继任意愿正向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家族参与负向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这一结论不仅丰富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也为家族企业领导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国际化战略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126]

刘培琪、刘兵等人研究了授权型领导对员工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以及心理安全感和过度胜任感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授权型领

导对知识型员工的知识分享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心理安全感在授权型领导与知识型员工的知识分享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知识型员工的资质过高感知负向调节心理安全感在授权型领导与知识分享意愿间的中介作用，形成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127]

张昱城、张龙等人借鉴社会认同理论，探索一种重要的机制——患者对医院的感知移情，定义为医院提供的关怀，个性化关注——解释服务质量如何影响患者对医院的忠诚度。通过两项基于医院员工和患者的研究，估计服务质量与患者忠诚度之间的中介关系。在研究 1 中，医院工作人员调查数据显示，服务质量增强了患者对医院的同情心。在研究 2 中，通过使用患者调查数据证实并扩展了研究 1 的结果，该数据表明患者的同理心调节了服务质量与患者对医院忠诚度之间的关系。^[128]

杨春江、王玉婷等人以社会认同理论和个人—组织匹配理论为基础，探讨了组织匹配在两类典型的组织社会化策略（接受培训和组织理解）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应用 Mplus 软件进行假设检验，结果显示：接受培训和组织理解均与员工知识共享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组织匹配在接受培训、组织理解与知识共享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129]

刘兵、刘培琪发现员工工作幸福感是影响企业稳定与绩效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内在动机理论，从个体层面探讨了授权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考察了心理安全感、心理所有权在授权型领导与员工工作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授权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安全感和心理所有权在授权型领导和员工工作幸福感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即授权型领导通过增强员工的心理安全感提升其心理所有权水平，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幸福感。^[130]

刘新民、俞会新基于认知评价理论考察压力认知对青年教师科研动机和绩效的影响，探究压力认知差异对科研绩效的影响机理。通过对 588 个有效样本的研究发现：压力信息性认知对青年教师科研绩效有促进作用，而控制性认知对青年教师科研绩效有抑制作用；自主动机在两种认知

对科研绩效影响中均起到中介作用；探索性创新难度通过调节压力认知对自主动机产生作用，进而影响科研绩效。研究为高校科研绩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管理启示。^[131]

付鸿彦、任国升等人发现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探讨，但是关于客户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对其他企业绩效的影响，如非财务绩效，尚没有进行充分的探讨。作者采用偏最小二乘法 Smart-PLS 统计分析技术，对 403 家上市制造业公司进行了实证调查，结果表明，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以及客户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客户满意度在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132]

张晓悻、王云峰从群体层面实证研究了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首次从过程氛围和战略氛围的角度，研究了公正氛围对建言氛围的影响，从群体层面探讨了程序、分配、人际和信息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影响及建言氛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公正氛围能够作为过程氛围促进战略氛围—建言氛围的产生。程序、分配、人际和信息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均具有促进作用，建言氛围具有完全或部分的中介作用。^[133]

路璐、刘春玲等人基于滑雪游客体验的视角，通过查阅相关的文献，结合滑雪旅游的特点，确定滑雪游客感知价值的测量维度，并以崇礼密苑云顶滑雪场游客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构建滑雪旅游消费者感知价值、满意度和行为意向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三者之间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滑雪游客感知价值通过满意度间接影响行为意向，满意度是感知价值和行为意向的完全中介。^[134]

刘佳鑫通过社会交换理论，发现员工的实际升迁和职业生涯成功的关键要素取决于高品质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阐述了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对员工晋升力的影响，从追随力的两个方面——效忠和独立思考的视角来系统分析员工晋升力的驱动要素。结果显示，建立高品质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不仅有助于员工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而且有助于提升组织绩效和价值。^[135]

张明认为组织管理者应积极运用工作内容、

工作资源、领导力、人力资本投资、目标管理以及工作环境等相关因素对员工的工作行为进行内在动机的驱动，以激励员工将个体与工作角色更好地结合，自发地投入工作中，实现更好的组织绩效。^[136]

(陈立文：河北工业大学教授；

刘广平：河北工业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李素红,方洁,苑颂.基于博弈论组合赋权的城市养老地产开发适宜性评价[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01).
- [2] 孔造杰,李斌.基于三维坐标及余弦相似度的创新需求集成与筛选方法[J].运筹与管理,2018,27(11).
- [3] 李刚,李建平,孙晓蕾,赵萌.主客观权重的组合方式及其合理性研究[J].管理评论,2017,29(12).
- [4] 赵欣,翁钢民.旅游高峰期双目标交通拥堵疏散路径优选方法[J].燕山大学学报,2018,42(03).
- [5] 王妍妍,王艳宁.基于数据挖掘的物流成本分析方法[J].物流技术,2018,37(07).
- [6] 刘广平,连媛媛,田祎萌.挤出效应还是集聚效应?——房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8,34(11).
- [7] Zhang, L., et al. (2018). "Key Factors Affecting Informed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Green Housing: A Case Study of Jinan, China." Sustainability 10(6).
- [8] 韩楠.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碳排放减排路径及模拟调控[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08).
- [9] 孔造杰,李斌,赵啸天,耿立沙,孙可远.基于理想点——矢量余弦投影的多属性决策方法[J].计算机应用研究,2019(09).
- [10] 姜昊,梁林,刘培琪.大数据对企业决策过程的影响:一个多案例的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39(03).
- [11] 陈立文,杜泽泽.保障性住房项目 PPP 模式可行性与投资决策研究——基于博弈论[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04).
- [12] 刘兵,曾建丽,梁林.雄安新区城乡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构建及对策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0(03).
- [13] 杨欣,曾珍香,魏津瑜,李旭东.发展云制造创新模式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8,36(04).
- [14] 赵钊,贺荣戈.慕课时代高校教师面临的角色挑战与应对策略[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0(03).
- [15] Zhao, M., et al. (2018). "An Approach to Consensus Measure Based on Possibility Degrees of PLTSs in Group Decision Ma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uzzy Systems 20(07).
- [16] 袁旭梅,张旭.基于云模型的 PROMETHEE 多准则决策

- 方法[J].模糊系统与数学,2018,32(02).
- [17]袁旭梅,王亚娜,张旭.不完备系统多准则决策的云PDR方法[J].计算机应用研究,2019,36(02).
- [18]宋之杰,王浩,赵红美.基于风险偏好调权的三参数区间数型多指标群体决策方法[J].统计与决策,2018,34(02).
- [19]牟玲玲,尹赛,齐丹.PPP模式下准经营性项目风险评价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0(04).
- [20]吕荣杰,贾芸菲,张义明.我国省份技术转移效率评价——基于高校、企业比较的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12).
- [21]王天伟,李向东.建筑施工企业BIM应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06).
- [22]王超.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财务风险评价研究——以X医药企业为例[J].会计之友,2018(03).
- [23]郭净,耿军会,陈小荣.中小企业非研发创新绩效评价的探索性分析[J].会计之友,2018(08).
- [24]吕荣杰,贾芸菲,张义明.中国省际技术转移“黑箱”解构及效率的评价分析——基于高校、企业比较的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22).
- [25]侯维磊,郭跃显,崔晶娜.铁路运输企业货运服务创新绩效评价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2(02).
- [26]王大本,刘兵.区域大气环境承载力评价——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环境工程,2018,36(10).
- [27]刘兵,曾建丽,梁林,李娜,李青.基于DEA的地区科技人才资源配置效率评价[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14).
- [28]孙丽文,郭竞.区域创新平台运行效率评价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8,47(03).
- [29]金浩,李瑞晶.基于组合评价法的京津冀区域治理绩效评价[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0(02).
- [30]孙丽文,张蝶,李少帅.京津冀协同创新能力测度及评价[J].经济与管理,2018,32(03).
- [31]李炜,李子彪,康凯.区域创新极培育能力综合评价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04).
- [32]席增雷,袁青川,徐伟.基于Malmquist-TFP模型的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经济效率评价[J].宏观经济研究,2018(07).
- [33]孙丽文,陈继琳.基于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的绿色创新绩效评价——以环渤海经济带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08).
- [34]马宇博.京津冀与河北重点城市PRED系统综合评价[J].中国流通经济,2018,32(11).
- [35]张培,李楠.生产性服务外包中价值共创与商业模式创新[J].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18,11(03).
- [36]张莉,梁凯.客户价值视角下物流服务供应商核心竞争力评价研究[J].物流科技,2018,41(07).
- [37]赵丽丽,王雪青,陈超.区间直觉模糊信息下的监理工程师信用评价[J].运筹与管理,2018,27(01).
- [38]申晨,程冬玲.基于灰色关联度的科技型小微企业信用风险评价[J].时代金融,2018(12).
- [39]路丽,陈松奕.政府补贴、跨境电商与企业价值关系研究——基于我国流通企业的经验证据[J].商业经济研究,2018(21).
- [40]李杰,马士豪,靳孟宇,Chao-hsien Chu.基于SA-SVM的众筹违约风险预警模型[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8,33(11).
- [41]金浩,张晓园.互联网金融对供应链风险及收益的影响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8,37(10).
- [42]李延军,金相杉.中国股市流动性风险测度及风险溢价渠道[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05).
- [43]刘霞,任驿佳.基于COBIT 5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风险管理机制[J].财会月刊,2018(19).
- [44]王健,刁广付,郑小六.沧州市种粮农民专业合作社风险转移模式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8,46(03).
- [45]杨会朴,康凯.创新产业集群供应链融资风险结构与收益分配[J].会计之友,2018(09).
- [46]王培辉,袁薇.中国保险集团控股公司综合金融风险甄别——以平安保险集团为例[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8,39(04).
- [47]辛兵海,陶江.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同群效应吗[J].财贸经济,2018,39(04).
- [48]李博,李海波.生态资源、能源环境绩效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18(24).
- [49]王金营,李天然.OECD国家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8(06).
- [50]王金营,唐天思.京津冀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下的需求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8(06).
- [51]李凯伦,刘梦月,朱天龙.FDI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门槛效应检验[J].商业经济研究,2018(18).
- [52]孙芳,韩江雪,王馨玮,王怡然.京津冀生态涵养区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05).
- [53]许秀文.文化旅游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J].社会科学家,2018(08).
- [54]赵现锋,赵颀淇,田玉山.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河北省旅游业经济增长潜力评价与预测[J].经济研究参考,2018(35).
- [55]冯鑫,王晨,刘苑,杨娅,安海岗.基于评论情感倾向和神经网络的客户流失预测研究[J].中国电子科学研究院学报,2018,13(03).
- [56]李杰,王玉霞,赵旭东.电商企业商品销量的预测方法[J].统计与决策,2018,34(22).

- [57]刘璞,王萌,马苓,石盛卿.灰色马尔可夫预测模型和加权加增长率移动平均法预测精度的比较[J].统计与决策,2018,34(22).
- [58]邵双双,刘丽冰,谭志洪,孙世荣,王梦雅.改进的深度信念网络预测模型及其应用[J].计算机应用,2018,38(S1).
- [59]陈亮,王金泓,何涛,周志华,李巧茹,杨文伟.基于SVR的区域交通碳排放预测研究[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18,18(02).
- [60]杨军胜,彭石,王承民,樊会从,林榕.基于城市用地性质的配网空间负荷预测研究[J].电测与仪表,2018,55(11).
- [61]赵丽娟,余秀萍,谢聪,麻振华,马连洁.张家口市房地产市场价格影响因素分析及预测[J].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18,36(04).
- [62]李杰,张睿,芮晨,王欣然.基于 EasyEnsemble 和 C5.0 决策树算法的患者非医嘱离院预测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2018,35(04).
- [63]庞明宝,刁化尧,赵冰心,黄玉满.基于复杂网络同步城市快速路协调控制研究[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18,18(03).
- [64]孟旭彤,宋川.河北省北部山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及绩效评价[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10).
- [65]陈立文,赵士雯,张志静.绿色建筑发展相关驱动因素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09).
- [66]周莉.复杂网络视角下图书馆联盟形成机理——以河北省高等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为例[J].现代情报,2018,38(03).
- [67]孙文霞,赵晓娟,马晓静.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公交系统站的优化配置[J].公路交通科技,2018,35(10).
- [68]谢廷宇,康凯,王军进,张学龙.随机和蓄意两种攻击方式供应链网络的鲁棒性分析[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8,48(16).
- [69]刘清.河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研究——基于复杂网络与因子分析法[J].经贸实践,2018(10).
- [70]富国亮,胡静,郭少卿.高职院校构建职前职后一体化教育模式探索[J].教育与职业,2018(02).
- [71]李靖,韩凯,姚苏芮.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会计信息披露分析[J].财会通讯,2018(01).
- [72]Yanan Wang, Yuechao Ma, Aihong Chen. Exponential synchronization of Markovian jump complex dynamical networks with partially uncertain transition rates and stochastic disturbances[J]. Neurocomputing, 2018, 304.
- [73]Yuechao Ma, Nannan Ma, Lin Chen. Synchronization criteria for singular complex networks with Markovian jump and time-varying delays via pinning control[J]. Nonlinear Analysis: Hybrid Systems, 2018, 29.
- [74]王海波,马金伟.消费者感知老字号品牌的创新性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23).
- [75]邢丽云,俞会新.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的跨层次分析——以建筑企业为例[J].技术经济,2018,37(11).
- [76]王智新,梁翠.知识产权保护支撑创新驱动发展评价体系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8,36(05).
- [77]刘娟,马学礼.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实现路径研究——创新生态系统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08).
- [78]张红霞.产业链整合视角下我国流通产业的创新与转变[J].商业经济研究,2018(05).
- [79]王晓雪.共享经济背景下商业模式的变革与创新——基于三大典型案例的启示[J].商业经济研究,2018(03).
- [80]李炜,李子彪,康凯.区域创新极培育能力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06).
- [81]孙丽文,陈继琳.基于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的绿色创新绩效评价——以环渤海经济带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08).
- [82]田学斌,柳天恩.创新驱动雄安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3(04).
- [83]李子彪,孙可远,吕鲲鹏.三类政府财政激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机制——基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调节效应[J].技术经济,2018,37(12).
- [84]陈昭翔,陈立文.公租房融资租赁创新模式可行性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39(01):61—65.
- [85]杨玉桢,李姗,宋文松.城市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创新效率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8(24).
- [86]高树军,李洪英.地方平台公司创新驱动效能评价与治理模式转型路径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18,36(06).
- [87]李士森,任金政,吴海平.区域相关性对农业保险赔付风险的影响——理论、实证及承保方案的优化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02).
- [88]王剑.零售企业的全渠道演变及供应链优化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04).
- [89]康凯,韩杰,普玮,马艳芳.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低碳配送路径优化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9,55(02).
- [90]赫连志巍.基于产业集群升级的创新网络节点吸纳能力研究[J].企业经济,2018,37(03).
- [91]佟林杰,盖宏伟.基于蚁群优化的企业技术创新资源配置问题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8,48(12).
- [92]陈业华,黄璐.直觉模糊熵的改进及其在应急决策中的应用[J].统计与决策,2018,34(22).
- [93]陈立文,赵士雯.智慧社区运营管理体系及平台构建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J].当代经济管理,2018,40(08).
- [94]赵晓冬,臧誉琪,王晓倩.基于对偶犹豫模糊偏好信息的双边稳定匹配决策方法[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8,48(05).

- [95] 赵欣, 翁钢民. 旅游高峰期双目标交通拥堵疏散路径优选方法[J]. 燕山大学学报, 2018, 42(03).
- [96] Kang Kai, Pu Wei, Ma Yanfang, Wang Xiaoyu. Bi-objective inventory allocation planning problem with supplier selection and carbon trading under uncertainty. [J]. PloS one, 2018, 13(11).
- [97] 李杰, 赵旭东, 王玉霞, CHU Chao-hsien. 面向电商终端物流配送的电动车配置与路径集成优化[J]. 运筹与管理, 2018, 27(10).
- [98] 刘广平. 住房租赁市场搜寻匹配模型与仿真[J]. 系统工程, 2018, 36(10).
- [99] 吕荣杰, 郝力晓. 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效应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18, 37(12).
- [100] 张敬, 张志颖, 魏旭光, 康凯. 供应链治理模式选择: 低控制还是高控制? ——基于多元制度逻辑的实证研究[J]. 预测, 2018, 37(06).
- [101] 李宁, 韩同银.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实证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09).
- [102] 李惠茹, 陈兆伟. “一带一路”倡议对高端产业区域价值链构建的影响[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8, 39(04).
- [103] 武义青, 陈俊先.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定的一种新方法——以河北省 11 个设区市工业为例[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8, 39(02).
- [104] Wei, J., Wang, Y., & Zhao, J. (2018). Interaction between greening and remanufacturing strategies in a manufacturer-retailer supply chain.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89, 585—601.
- [105] Zhao F, Liu X, Peng Y. Inspection-Based Policy Considering Human Errors for Three-Stage Delay Time Degradation Systems [J].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ience)*, 2018, 23(05).
- [106] 李万庆, 武京, 孟文清, 马利华, 刘康宁. 基于 AGA-AHP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国际工程项目风险评价[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8, 48(23).
- [107] 宋晓刚, 曹聪慧. 基于 BIM 的工程项目全过程造价控制方法研究[J]. 建筑经济, 2018, 39(05).
- [108] 陈敬武, 俎照月, 张娅. 公用事业 BOT 项目特许期决策模型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 35(24).
- [109] 白德全. 规范 PPP 发展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J]. 理论探讨, 2018(03).
- [110] 李妍, 马丽斌, 薛俭.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下开发区 PPP 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8, 38(22).
- [111] 李金海, 申丽洋. 项目导向下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研究[J]. 管理现代化, 2018, 38(06).
- [112] 崔武文, 刘雨菲. PPP 项目前期最优负债率研究[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8, 20(04).
- [113] 刘静, 李媛媛. 基于产能过剩视角的信贷资本配置效率实证研究[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18(01).
- [114] 马洪超, 易崇艳. 影子银行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异化效应及应对研究[J]. 理论探讨, 2018(06).
- [115] 魏翠玲, 安玉洁, 纪俊霞.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金融支持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进程[J]. 财会通讯, 2018(29).
- [116] 金浩, 张晓园. 互联网金融对供应链风险及收益的影响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18, 37(10).
- [117] 樊锦霞, 叶莉, 张玉梅. 房价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一个行为金融学角度的分析[J]. 当代经济管理, 2018, 40(05).
- [118] 李延军, 史笑迎, 李海月. 京津冀区域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 经济与管理, 2018, 32(01).
- [119] 李博, 田瑞兰, 张炜华. 混沌与分岔理论在一类金融风险系统中的应用研究[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8, 39(06).
- [120] 段宏煜, 武敏, 韩敏敏. 消费金融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增值机制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 2018(13).
- [121] 吴树芳, 张雄涛, 郭海玲. 微信公众号采纳后用户 EVLN 行为影响——基于新媒体运营视角[J]. 企业经济, 2018, 37(09).
- [122] 于树江, 范萌萌. 新媒体沟通形态对团队沟通效果的影响研究[J].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0(03).
- [123] 魏菲, 孙立伟, 于慧. 基于微信移动服务的河北省图书馆发展现状研究[J]. 出版广角, 2018(22).
- [124] 郭海玲, 胡若静. 心理契约破裂视角下微信订阅号受众 EVLN 行为影响研究[J]. 中国流通经济, 2018, 32(11).
- [125] 梁巍, 白金. 从大众文化与人际传播视角解读微信朋友圈[J]. 出版广角, 2018(05).
- [126] 李艳双, 杨思捷, 吕亭. 社会情感财富视角下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研究[J]. 领导科学, 2018(29).
- [127] 刘培琪, 刘兵, 李娜. 授权型领导对知识型员工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的视角[J]. 技术经济, 2018, 37(07).
- [128] Zhang Y, Zhang L, Zhang X, et al. Hospital service quality and patient loyalty: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empathy [J]. *Journal of Business & Industrial Marketing*, 2018.
- [129] 杨春江, 王玉婷, 郭楠, 张慧南. 企业组织社会化策略对员工适应期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 组织匹配的中介作用[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8, 35(01).
- [130] 刘兵, 刘培琪. 基于链式中介效应的授权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幸福感影响研究[J]. 领导科学, 2018(17).
- [131] 刘新民, 俞会新. 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压力对科研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认知评价视角[J]. 北京社会科学, 2018(10).
- [132] 付鸿彦, 任国升, 廉晓洁. 战略型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客户企业社会责任满意度

的中介效应[J].会计之友,2018(24).

[133]张晓暄,王云峰.组织公正如何激发组织活力?——群体层面公正氛围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及机制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40(06).

[134]路璐,刘春玲,刘琳.滑雪游客感知价值、满意度与行为意向的关系——以崇礼密苑云顶滑雪场为例[J].干旱

区资源与环境,2018,32(05).

[135]刘佳鑫.基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的员工晋升力研究[J].领导科学,2018(17).

[136]张明.新生代知识型员工敬业行为的组织驱动因素分析[J].领导科学,2018(14).

工商管理研究

王冬年

2018年,河北学者对工商管理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多元化和创新性特征明显。

一、企业管理

(一) 经营管理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中华老字号’耦合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创业驱动机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郭会斌等人以八家传统制造型“百年老店”为样本,遵循自然主义质性研究范式进行扎根研究,将界面辐合学说作为元理论,与KSAOs的人力资本资源学说和组织学习过程理论进行了对话。研究发现:以KSAOs图式的渐变为主线,工匠精神的资本化依次经过内化、共享和惯例化三个桥接,在个体、群体和组织三个层面分别存在着师徒制沿袭、群体迁移和惯例演化三种组织学习的机制安排;工匠精神由手工艺人的KSAOs人力资本资源涌现为组织资本资源的过程,是多断面、多层次的界面辐合过程;工匠精神在企业内的熔炼和升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导地位不同,两者交替推动其资本化进程。^[1]

姜昊等人运用多案例对比法,以企业决策过程为观察视角,分析9家案例企业开展大数据服务的具体决策过程,综合一手访谈数据和二手描述资料数据的编码分析,揭示大数据理念范式和技术工具对企业决策过程的影响范畴以及企业应用大数据的差异化模式。研究发现:大数据对企业决策过程中的影响范畴主要包括信息搜集与分析、目标形成与制定、决策方案制定、方案实施、实施评估、决策中的沟通六个大类以及市场业态分析13个具体影响方面;根据企业在应用大数据的理念、目的和手段上的差异,划分了“大数据+”再造型和“+大数据”融合型两种

应用模式。^[2]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陈俊龙通过构建双寡头垄断模型,考察是否存在部分管理授权条件下的产能过剩,以揭示产品差异化对产能过剩的作用机理,从而可以比较企业独立决策和政府干预决策下的产能过剩情况,并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探索最优的产品差异化水平。研究表明:产品差异化与产能过剩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不同条件下的产品差异化对产能过剩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政府的产能规制政策未必会彻底化解产能过剩;产品差异化程度与社会福利水平呈正相关,需要鼓励企业走产品差异化发展之路。^[3]

陈丽兰等人运用2010—2016年3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经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豪斯曼检验,对房价波动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规模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取得了房价上涨、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会促进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资产负债率抑制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行为以及筹资净现金流量净额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影响不显著的基本结论。提出政府应当实施稳定房价的经济政策,激励制造业上市公司多元化投资和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的政策建议。^[4]王重润等人采用663家上市公司2008—2016年微观数据,研究房价上涨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估计方法采用SYS-GMM。回归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企业劳动力成本有较明显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0.0013;房价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存在规模差异、行业差异以及产权差异。^[5]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关于风险投资对IPO效应的研究却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刘霞等人基于管理质

量的研究视角,运用 2009—2015 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风险投资支持的公司 IPO 当日和日后的市场表现,发现风险投资能够通过提升管理质量、缓解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进而促进公司经营行为的规范化和理性化。^[6]

吕荣杰等人以 2010—2015 年处于成熟期的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实际控制权的私有利益为切入点,以投资成本—收益理论为视角考察实际控制权对公司投资方向与投资挤占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司处于成熟期时,实际控制权与公司固定资产投资显著正相关;实际控制权与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显著负相关;实际控制权对公司无形资产投资不产生影响;实际控制权与公司投资挤占显著正相关。该研究结论表明,公司处于成熟期时会进行不同方向投资,且出现了短期投资挤占长期投资的现象。为防止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短期投资行为,损害公司价值,公司治理层需要对公司实际控制权进行合理安排。^[7]

李子彪等人以天津市 69 家众创空间及其在孵的 196 家中小企业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众创空间提升在孵中小企业价值增值体系。提出在孵中小企业增值多维体系包括技术价值、环境价值、政策价值、商业价值,依据众创空间提升在孵中小企业价值的思路;提出组织管理、交流共享、教育培训、融资服务和商业服务等运行机制。结果表明:众创空间的商业服务正向影响在孵中小企业价值提升;组织管理、教育培训、融资服务通过影响商业服务间接促进在孵中小企业价值提升;共享交流负向影响商业服务,间接影响在孵中小企业价值提升。^[8]

(二) 市场与市场营销

张晓云等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4 年数据(CFPS2014),结合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数据,分析了增进地区市场化程度对消除身高歧视的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身高溢价”现象,即身高对收入具有显著正影响,并且身高优势有助于劳动力获得白领职业和进入具有较高职业声望的职业类别。通过“中介作用”模型对其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发现,身高溢价很可能是来自于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主歧视行为,而非消费者歧视或个体在受教育水平、认知能力及非认知能力等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

“身高溢价”现象具有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在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其影响更具显著性,而增进地区市场化程度能够显著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外貌特征歧视。^[9]

王林等人选取淘宝网用户评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网购行为执行意向结构中的网购情景线索与目标导向行为反应的关联机制。结果表明:网购认同线索、知觉感知情景线索是最重要的网购者认知情景,它与愉悦感、口碑传播等行为具有高度关联性;网购细节展示度没有与网购行为反应产生直接关联,但其通过认同线索和知觉感知情景线索作用于网购者愉悦感、口碑传播和行为忠诚等行为反应;网购情景线索与行为反应的动态演化中其核心结构并没有产生裂变,所有弱连接是通过网购愉悦感、口碑传播、知觉感知和认同线索等强连接形成复杂的关联网络。^[10]

价值共创作为一种新型商业模式备受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王玖河等人运用演化博弈相关理论,从是否存在奖惩机制两种情况建立顾客与企业参与价值共创的演化博弈模型,并通过 Matlab 软件进行仿真。研究结果表明,当存在奖惩机制时系统收敛于双方均选择参与策略的概率增大,并且自身能力水平、参与成本系数、价值共创收益、收益分配系数、投入程度、转化率、选择参与策略的初始比例、奖惩系数对演化过程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11]

顾客服务已化是顾客与服务间的广义拥有性关系,是契合营销理论与实践发展阶段中顾客与企业提供物(产品/服务)间关系认识的一个较新概念。周天舒等人对哲学、心理学和营销学领域的已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回顾,提出存在主义哲学、拥有性心理理论、占有心理学理论、心理所有权理论和“占有物作为延伸自我”的理论观点是顾客服务已化的理论基础;整理和比较了已有研究对已化概念的理解和释义及维度划分;梳理了营销领域已化相关研究脉络,归纳研究主题。提出顾客服务已化量表开发、顾客服务已化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研究、顾客服务已化结果效应研究和共享经济背景下顾客对共享产品/服务的已化关系等问题,都需后续实证探究。^[12]

消费者感知价值是决定数字产品价格与发行时间的重要依据。李伟等人基于消费者的时变感知价值,构建了消费者的动态效用模型,并将此

效用模型融入 BASS 扩散模型, 构建了针对消费者策略性与多样性购买行为的数字产品企业最优决策模型。使用 Lagrangian 函数法求解该最优决策模型, 分析了最优解对企业运营的启示。提出在发行时间方面, 若消费者感知价值的变动速度较快, 企业应尽量加快产品的迭代速度; 反之, 应谨慎发行新产品。在价格机制方面, 当低端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感知价值时, 渗透定价优于撇脂定价; 反之, 撇脂定价优于渗透定价。^[13]

冯鑫等人以在线评论信息为基础, 从用户情感角度出发, 通过词语级情感分析技术把评论情感倾向量化表示为积极与消极情感两类, 然后运用 BP 神经网络进行客户流失预测建模来进行用户流失预测。研究表明, 会员等级、评论星级、点赞数、回复数等在线评论信息均不同程度影响客户流失, 其中评论内容情感极性为识别客户流失的主要指标。^[14]

刘佳鑫等人构建了基于人格特质的顾客行为取向对手机银行业务影响的理论研究模型, 并使用多层次问卷调查法对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表明: 外向性顾客比谨慎性顾客更倾向于使用手机银行办理业务, 也更能感受到手机银行服务所带来的有效性和方便性。另外, 凭借着节约时间、提高效益、操作简单等特点, 手机银行能够提升顾客的使用意愿, 进而将成为金融业者最吸引顾客的服务方式。^[15]

(三) 公司治理与财务会计理论与方法

企业的交叉所有权行为需要政府的科学规制, 在混合所有制条件下, 又需要考虑国有股比例。陈俊龙等人构建了由不同性质主体组成的双寡头垄断竞争模型, 考察不同条件下的企业交叉所有权决策以及科学的政府规制政策, 并探索由混合所有制企业与私有企业组成的双寡头垄断市场中的国有股最优比例。结论认为: 企业是否实施以及实施何种程度的交叉所有权安排, 受到市场竞争主体性质、需求函数、企业生产效率以及市场竞争类型等因素的多重影响; 政府对企业交叉所有权的规制政策同样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国有股最优比例受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效率的影响, 与交叉所有权具有密切联系。对此, 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制定科学的规制政策; 稳步有序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政府对企业交叉所有权的规

制要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互配合。^[16]

李子彪等人探索了三类政府财政激励政策(政府补贴、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和研发加计扣除税收减免)对不同所有权性质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机制及其差异, 并构建了以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力投入为中介变量的理论模型。选取 2014—2016 年河北省 586 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库, 运用 Bootstrap 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最强, 其次是研发加计扣除税收减免, 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最弱; 三类政府财政激励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力投入来激励企业创新; 政府财政激励政策对私营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优于国有企业, 且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的激励效果为负, 但对私营企业的激励效果为正。^[17]

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现金股利政策: 基于转型经济背景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付玉梅等人以 2003—2016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平衡型面板数据为样本及相关检验模型进行探讨。研究发现: 多元化经营是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产生的代理冲突是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主要机制, 但治理环境的改善可以抑制代理冲突, 弱化甚至消除多元经营对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水平的负向影响; 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 代理冲突还在多元化经营与现金股利政策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由此, 对于多元化经营的公司, 其自身更应重视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其他投资者和监管部门要注意防止公司将多元化经营异化为公司控股股东或管理层谋取私利的手段、工具。^[18]

李俊强采用 2005—2014 年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事项意见的独特数据, 从明确监管议案事项、非明确监管事项和股权分置改革等三方面深入考察其对独立董事出具否定意见的影响。研究发现, 在我国上市公司中, 对明确监管议案事项出具否定意见概率低, 说明“逆淘汰”机制和“任人唯亲”董事会文化的存在使得监督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发现, 在股权分置改革后, 独立董事对议案事项出具否定意见概率更低; 出于规避法律风险的考虑, 独立董事对明确监管事项出具否定意见的概率相对较高。因此,

监管层应加强对各类议案事项检查力度而非仅仅明确监管事项；科学厘清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决策中的责任边界，明确独立董事承担的法律风险。^[19]

基于女性董事监督效用的视角，石晓飞等人以 2008 年至 2014 年的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理论分析女性董事的人力资本、责任感和保守性分别与董事会行为强度、勤勉度和沟通度关系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女性董事参与度对董事会监督效用的积极作用。研究发现：存在女性董事董事会的董事会会议频数更高，独立董事出勤率更好，更加倾向于选择沟通更好的现场会议形式，并且监督效应更显著。这样的结论符合女性董事可以提高董事会监督积极性的假说，表明董事会性别异质性确实有助于提高董事会的监督效用。^[20]

吴超等人以 2015 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媒体情绪的视角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并率先以金融业竞争水平分组讨论金融环境差异下的民营企业债务融资敏感性。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 2015 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检验，以 WIND 数据库中的新闻情绪作为媒体情绪的衡量指标，将债务融资能力细分为银行贷款率、贷款期限和债务融资成本三方面，并基于金融业竞争水平高低对公司所处的金融制度环境进行分组。实证结果表明，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都会显著降低银行贷款率，负面报道与银行贷款率和贷款期限的显著负相关关系仅在金融竞争水平较低的地区出现，同时并没有发现媒体情绪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突出了金融环境地区差异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为解释我国债务融资市场乱象提供了新的视角。^[21]

吕荣杰等人以 2005—2014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探讨薪酬差距激励效果的适用情境。通过晋升这一因素层层分样，创造出不同的情境，研究薪酬差距在各种晋升情境下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会随着晋升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在内部晋升的情境下，薪酬差距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业绩；但在内外兼有和外部晋升的情境下，薪酬差距并没有起到激励作用。在内部晋升的情境下，晋升时效的长短对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有影响，只有将晋升时限确

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才能发挥到最大。^[22]

二、管理工程

(一) 研究与开发管理

张培等人将信任视为多维变量，构建了多维信任、知识转移与软件外包绩效的影响关系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及对京津冀地区 97 个软件外包接发包企业的有效问卷调查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多维信任对知识转移、软件外包绩效的正向影响存在差异性；显性知识转移与隐性知识转移相比，对软件外包绩效影响更显著；知识转移在多维信任与软件外包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其中知识转移在能力信任与软件外包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计算信任、善意信任与软件外包绩效之间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3]

针对企业多类型知识竞争的复杂情形，李凯等人借鉴生态学理论分析知识竞争的生态特性，考虑知识共同竞争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基于 Lotka-Volterra 生态模型构建了企业知识传播竞争模型，探讨了企业内部知识种群竞争演化过程及自由竞争环境下知识竞争的稳定状态和演化过程。研究发现，知识种群间的相互作用对其传播结果有显著影响，通过分析企业知识传播竞争模型中知识种群构成的系数矩阵，可以预测和分析企业知识种群在自由竞争下的稳定情况、知识种群类型和演化过程同时，企业可以通过改变知识种群的系数，达到选择和改变目标知识种群的目的，使之成为企业知识接受者所认可的主流知识。^[24]

李军峰指出，知识产权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核心资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有效途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知识产权的资产属性未被市场完全认可、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市场尚不规范、科技型企业的运营存在不确定性以及质押物处置不顺畅等。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健康发展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产权价值评估和信用担保机制、发挥财政转移支付作用和金融监管部门对企业风险的控制作用。^[25]

刘期家等人认为，众筹平台具有商业推广、市场预估、项目融资、资源聚合等多重功能。众筹模式与专利成果转化具有高度契合性，可以有效化解专利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的因信息不对称

而造成的供需对接难、因投资风险高而导致的融资难等问题。为了解决专利成果转化众筹过程中面临的法律制度保障不足、融资环境培育不良等困难,切实提高专利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水平,应当加强平台建设构建信任环境,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确立防控融资欺诈制度办法,给予众筹项目适当的政策倾斜。^[26]

初钊鹏等人采用 Innography 专利挖掘与数据分析技术,通过分析专利申请国别、专利技术应用国、专利申请 IPC 分布、专利申请权利人和专利强度等,研究了全球太阳能专利技术竞争格局与发展趋势;进一步对全球主要市场和核心专利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挖掘,通过数据分析提取太阳能技术领域核心专利集中的国家和机构,并开展了中国市场本土研发者和全球研发者技术布局比较研究。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技术竞争和国际化战略四个方面全面评价全球太阳能专利竞争态势和热点研发技术布局,进而提出中国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太阳能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政策建议。^[27]

在混合所有制条件下,国有股比例与企业专利授权行为相互影响。陈俊龙等人构建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构成的混合寡占模型,通过三阶段动态序贯博弈分析,考察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分别作为专利授权主体时竞争双方的专利授权行为,揭示国有股比例对其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并探索国有股最优比例。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对企业专利授权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受到创新主体性质、资本效率、创新收益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国有股最优比例是动态变化的,受到创新主体性质、是否进行授权、资本效率、创新收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8]

李春玲等人以 2010—2016 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依据控股权配置视角,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国企混改后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股权制衡度正向调节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的关系,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的关系;由相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的混改国企股权集中度的负向调节效应最弱,由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的混改国企股权制衡度的正向调节效应最强。^[29]

吕荣杰等人以 2007—2015 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总经理离任前是否会削减研发投入,并从“想不想”(行为动机)和“能不能”(个人权力)两方面分组检验。研究发现:总经理离任与公司上年度研发投入负相关;当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或兼任董事长时,其具有离任前削减研发的动机、权力,两者负相关关系显著成立;当总经理持有公司股份或未兼任董事长时,其离任前削减研发的动机、权力受限,两者负相关关系不成立。总经理持股和两职合一在总经理离任前消极研发行为中的关键作用,为公司获取长期利益提供新的证据。^[30]

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子基金的设立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举措。赵莎莎等人认为质量管理体系是组织的一项战略决策,能够帮助其提高整体绩效,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包括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子基金管理中贯彻质量管理体系的必要性,从理论层面对子基金质量管理的概念、质量管理模型进行了探究和界定,提出了子基金质量管理的理论模型。^[31]

(二) 电子商务与物流系统管理

智慧物流是物流业发展的趋势和必然结果,目前我国物流业已经逐步进入到智慧物流时代。鲍琳等人在专家学者对智慧物流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给出了智慧物流的内涵,并选择程序化扎根理论作为构建智慧物流体系的理论基础,运用该理论对所收集资料进行三次编码后构建出智慧物流体系。该体系是由技术基础、平台功能和保障体系三部分组成的,这三个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为支撑,互相作用。最后,对河北 W 物流集团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分别从技术基础、平台功能和保障体系对该公司的智慧物流体系进行了构建,结果表明所构建的智慧物流体系是高效的、可行的,满足公司发展的需求。^[32]

王淑清等人从我国智慧物流发展现状出发,从智慧物流产业扶持政策、互联互通信息平台搭建、经营方式转型升级、物流管理理念创新和高端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入分析智慧物流产业存在的问题。依托互联网技术发展,从完善政策措施、推动交通互联互通、构建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发挥重点项目带动作用、加快智能技术

推广应用等方面,提出加快构建智慧物流发展体系的对策,推进互联网与物流业深度融合,努力探索新模式、开辟新途径,推动现代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地方经济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添新动能。^[33]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分工的不断深化,企业越来越走向以合作共赢为目的的供应链管理模式,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逐渐延伸至整个供应链,一个节点企业的社会责任会影响链上其他企业乃至整个供应链的利益。朱柯冰等人基于国内外关于供应链社会责任及其相关延伸话题的研究,结合其研究背景和当前形势,对其概念和内涵的产生、发展进行了研究梳理,报告了当前国内外相关课题的研究现状,以及这一概念下驱动力因素和绩效的相关阐述。通过采用文献回顾的方法,展开了一些横向对比,反映了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方向问题。提出了在当前经济、社会环境下,基于供应链本身特性的供应链社会责任的协同治理问题和初步政策建议,以期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供应链的整体责任水平,最终达到使整个供应链走上变绿或者成长的道路。^[34]

袁旭梅等人采用 Stackelberg 主从博弈分析,比较信息分享前后供应链各方绩效的变化,得出不同回收模型下信息分享的价值;并考察预测精度、努力回收成本参数和回收支付水平等对零售商信息分享决策的影响。从供应链、零售商和制造商决策角度给出建议:集中决策优于分散决策,零售商应努力加强供应链的整体协调性,并提高信息预测精度,增大信息价值,进而提高供应链利润;零售商选择回收行为不经济,分享信息会进一步恶化供应链绩效,制造商应选择回收并主动分享私有信息,提高供应链绩效;制造商在信息精度较低、回收努力成本加大时,则可通过适当提高回收支付水平,选择第三方回收,确保自身和供应链利润。^[35]

穆秀清等人研究了存在网络直销渠道和零售商零销渠道的多制造商资金约束供应链融资决策问题。利用 Stackelberg 与 Bertrand 博弈理论分析了分散决策下银行贷款融资模式和享有价格折扣的零售商提前支付融资模式,探讨了多渠道供应链成员最优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提前支付价格折扣与银行利率相等的情况下,带有提前支付融资模式可更好地解决制造商资金约束

问题。^[36]

杨会朴等人以风险—收益分析为起点,探究供应链融资模式的产出绩效和风险结构,对供应链融资系统中参与个体与集群产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论证创新型产业集群合作主体收益分配的改进路径,通过对创新型产业集群中供应链融资模式的应用研究,探究如何改善创新型企业的融资生态。研究发现,供应链融资模式的信用转换和信用回流效应有助于解决创新型企业的信贷弱势地位,但供应链系统网络结构和参与主体联结的脆弱性,容易出现供应链融资风险聚集特征。^[37]

石善冲等人以供应链环境成本分摊为研究对象,针对传统分配方案单一、分摊结果为绝对值的缺陷,在 Shapley 值法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环境成本率、环境成本利润率、环境资产占有率和环境收益率 4 个企业环境影响力因素,利用组合权重法得出新的供应链环境成本分摊模型,并通过算例分析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为更加公平、合理的环境成本分摊提供可靠依据。^[38]

刘一健等人指出,电子商务下,生鲜农产品供应商采用双渠道供应链运行模式,即电商直销渠道和零售商零售渠道并存。考虑生鲜农产品的特性,设定其实际效用因子。当突发事件导致需求扰动时,分别在一体化和独立模式下,通过生鲜农产品双渠道模型,得出供应链应急决策办法。^[39]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近年来,房价对人力资本数量的影响效应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而关于深层次的人力资本质量随房价上涨的变化尚未引起关注。刘广平等人运用 2003—2016 年我国 31 个省级面板数据对房价对人力资本影响以及产业结构变迁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层级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房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在挤出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关系。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房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产业结构越高级,房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越弱,房价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曲线越平缓,人力资本对房价变动越不敏感。加快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型是避免因房价而造成的人才外迁和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

措施。^[40]

马丽等人以企业员工为调查对象,旨在研究工作家庭冲突的两个维度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工作满意度中介作用。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激活理论提出了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工作冲突、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理论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绩效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存在最佳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可以使员工获得最佳工作体验和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中介了二者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家庭—工作冲突跨领域对工作绩效产生了消极影响,工作满意度中介了二者间的负相关关系。^[41]

徐千等人从组织依附程度的视角出发,选取了689份企业知识型员工调查问卷作为样本,探讨了领导—成员交换对知识型员工关系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工作嵌入在两者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领导—成员交换及其四个维度(情感、忠诚、贡献和专业尊敬)正向影响工作嵌入和关系绩效;工作嵌入正向影响关系绩效;工作嵌入在情感与关系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忠诚与关系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贡献和专业尊敬与关系绩效之间未起到中介作用。^[42]

情绪劳动作为服务员工的一种“特殊劳动形式”,对员工身心健康和顾客绩效都有重要影响。刘喆等人从工作投入视角探讨服务型领导力和自主动机对情绪劳动的多层次作用机理。通过对93名管理者和586名员工的多阶段调研,运用SPSS、AMOS和HLM等统计工具分析数据,结果表明:自主动机和服务型领导力正向影响工作投入;工作投入正向影响深层表演和真实表达;服务型领导力在自主动机与工作投入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服务型领导力通过工作投入在自主动机与真实表达之间起调节作用;服务型领导力正向影响聚合真实表达。^[43]

刘兵等人基于“领导意义给赋—下属意义建构”双层架构,从角色认同的认知形成和同理心的情绪调节的不同路径,探讨了积极和消极服务展现规则对员工情绪劳动的影响。利用对336名服务行业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应用Mplus软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积极展现规则对情绪劳动的浅层和深层行为有正向影响,对真实情感表达有负向影响;消极展现规则对浅

层行为有正向影响,对真实情感表达有负向影响;角色认同是服务展现规则指导员工情绪劳动起效的中介条件;同理心调节服务展现规则与情绪劳动策略的关系。^[44]

卞娜等人以公司治理理论为基本理论,对董事会人力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以2016年127家中国主板上市的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最小二乘法,对董事会成员的教育水平、董事会职业背景以及董事会团队异质性对其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医药制造业企业的董事会受教育程度、董事会职业背景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董事会团队异质性则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存在负相关关系。研究表明,选择教育水平较高的董事以及具有输出职能职业背景的董事进入董事会,有助于促进企业参与更多的创新策略、增加创新的资本投入与人员投入,并能有效地对实物资产与创新人力资本进行有效配置,并最终实现提高企业创新产出这一目的。^[45]

马苓等人以我国环渤海经济区的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动态能力的视角对伦理型领导与组织健康要素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伦理型领导对组织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这两个组织健康要素都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伦理型领导对企业动态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动态能力对组织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这两个组织健康要素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动态能力在伦理型领导对组织健康要素的影响中都具有部分中介的作用效应。^[46]

刘培琪等人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结合对312名知识型员工的调查问卷,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了授权型领导对员工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以及心理安全感和过度胜任感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授权型领导对知识型员工的知识分享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心理安全感在授权型领导与知识型员工的知识分享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知识型员工的资质过高感知负向调节心理安全感在授权型领导与知识分享意愿间的中介作用,形成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47]

沉默行为是组织吸纳谏言渠道的绊脚石,知识型员工作为给企业建言献策的重要支柱,出于

职业安全考虑选择保持沉默,不仅自身使命难以完成,且结果往往与其初衷相悖。仵凤清等人基于京津冀区域知识型员工调查数据,运用层级回归法探讨知识型员工沉默行为对其职业生涯成功的影响,并验证领导授权在沉默行为与职业生涯成功间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表明:员工沉默行为对其职业生涯成功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领导授权在员工沉默行为与职业生涯成功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48]

四、旅游管理

杨丽花等人利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采用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度和核心边缘指数,对2013和2016年的京津冀雄地区的旅游经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分析发现:旅游经济联系度和联系量提高显著,旅游经济联系有均质化趋势;网络结构呈现北部和南部相对稀疏,中东部相对密集的非均质格局;雄安新区是旅游网络空间的战略节点,该区将促进京津冀旅游均质化发展;具有一定的核心—边缘区结构,北京和天津为核心区,邢台和雄安为边缘地区,其他区域为中间区。石家庄和邯郸将成为除京津之外的旅游经济网络结构中心。京津冀雄逐步从“两核独大”网络格局向“两核带动,多点发展”转变,区域整体网络化初步形成。^[49]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旅游共生体系统构建及协调演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孙振杰认为,京津冀区域旅游合作基础良好,旅游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共生关系。在介绍共生关系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梳理了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产生和推进进展,进而用共生度和共生系数等方法研究了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协调演化过程。研究表明:京津冀旅游共生体经过了低水平的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正在向高水平的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进化;北京在京津冀旅游共生中起主导地位,要发挥各共生单元的既有优势,打造京津冀旅游共生体;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优化的关键是推动河北旅游的错位发展;面向新时代,当前主要任务是促进旅游与京津冀居民美好生活的共生。^[50]

陈永昶等人分析了智慧旅游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过程中的驱动作用,阐述了其驱动机理,探讨了其实现路径。研究发现,京津冀区域

旅游协同发展呈现典型的“非均衡协同”特征,区域旅游发展失衡从根本上制约了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进程。京津冀区域旅游要想实现长期有效协同,必须尽快改变区域旅游发展失衡的状态。智慧旅游凭借其创新机制、学习机制、知识管理机制、资源整合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在推进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驱动作用。京津冀三地,尤其是河北省,必须及时抓住智慧旅游的发展机遇,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智慧旅游发展路径,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快速推进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进程。^[51]

李胜芬等人利用集对分析法对我国2012—2016年的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国内旅游流系统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通过计算最优贴适度,分析旅游流系统整体、结构与功能、构成要素的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我国31个省市在2012—2016年旅游流系统整体处于中等的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比较小;从结构和功能角度看,大多数省份处于协调的发展状态;从系统构成要素上看,各省结构方面旅游客流子系统要优于其他子系统,旅游运输子系统整体对旅游流系统支持力度较弱;功能方面,各省生态环境功能都需加强。^[52]

李田等人以2009—2015年河北省11市数据为基础,在借鉴传统产业集群识别方法的基础上,从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度、旅游产业联系度、旅游产业规模3个维度识别旅游产业集群。采用多指标构建识别模型,判定河北省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存在旅游产业集群现象;构建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法,确定保定、张家口、承德、秦皇岛旅游产业集群带来的经济溢出效应。^[53]

刘嘉毅等人基于289个城市对“天价虾”舆情的百度指数,实证分析旅游舆情网络关注度城市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旅游舆情网络关注度总体呈现高峰正偏的非正态分布特征,城市绝对差异大;东部、中部、西部城市对旅游舆情的网络关注度逐渐递减,网络关注度相对差异从大到小依次为西部、东部、中部城市,城市规模越大,其旅游舆情网络关注度越高。旅游舆情高关注城市、较高关注城市、中等关注城市、低关注城市呈现空间交叉共生分布格局,中等关注为主体;高关注城市多在东部,低关注城市多

在西部；省会城市与直辖市是高关注城市的绝对主体，北上广位居位序前三。人均收入水平、人口规模、信息化程度、城市级别、旅游市场规模等表征城市异质性的变量显著影响旅游舆情网络关注度；空间距离对旅游舆情网络关注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旅游目的地同质性正向影响城市对旅游舆情的网络关注。^[54]

刘海鸥等人基于用户基本属性数据、用户行为属性数据以及用户情境属性数据抽象出游客标签并进行形式化表示，结合本体建模方法建立游客的用户画像概念模型，提出基于用户画像的旅游情境化推荐模型并设计了一个景点推荐测试系统进行实验测试。结果表明，基于用户画像的情境化推荐方法较好地融合了用户基本信息标签、行为信息标签与情境信息标签，获得了更优的推荐效果。^[55]

郭风华等人引入认知地图和地图综合思想，利用景观语义特征点进行景观抽象和表达，提出了基于栅格结构的景观感知计算方法，用于定量描述旅游者对景观个体或景观系统的感知特征。栅格结构使计算结果能够表达任意位置的景观感知，准确描述感知的空间格局。清西陵案例研究从模型数据需求、适应的景观类型和应用视角等方面证明了计算方法的可行性。该方法可以准确描述旅游景观感知强度及其空间格局，并能基于观光线路分析重要观景点的景观语义内涵，进而辅助设计师开展景观设计和线路规划，为旅游景观定量研究提供了新思路。^[56]

(王冬年：河北经贸大学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郭会斌, 郑展, 单秋朵, 等. 工匠精神的资本化机制: 一个基于八家“百年老店”的多层次构型解释[J]. 南开管理评论, 2018(2).
- [2] 姜昊, 梁林, 刘培琪. 大数据对企业决策过程的影响: 一个多案例的研究[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8(3).
- [3] 陈俊龙. 产品差异化、政府规制与产能过剩[J]. 财贸研究, 2018(9).
- [4] 陈丽兰, 刘广平. 房价变动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4).
- [5] 王重润, 路迪. 房价上涨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8(5).
- [6] 刘霞, 任驿佳. 风险投资与管理质量: 上市公司 IPO 效应的经验证据[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5).
- [7] 吕荣杰, 高伟强, 吴超. 公司实际控制权对公司投资行为

- 影响[J]. 财会通讯, 2018(17).
- [8] 李子彪, 刘爽, 刘磊磊. 众创空间培育在孵中小企业增值路径研究——来自天津市 69 家众创空间的经验[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3).
- [9] 张晓云, 辛兵海, 杜丽群. 市场化能够消除歧视吗? ——来自“身高溢价”的证据[J]. 财经研究, 2018(5).
- [10] 王林, 骆冬赢, 释海璋, 等. 基于执行意向的网购情景线索与行为反应关联模型研究[J]. 软科学, 2018(1).
- [11] 王玖河, 刘琳, 王勇. 顾客参与价值共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 2018(5).
- [12] 周天舒, 马钦海, 杨春江. 顾客服务已化: 概念内涵、框架与研究展望[J]. 经济管理, 2018(12).
- [13] 李伟, 梁佳. 基于策略型消费者的数字产品价格机制与发行时间[J]. 企业经济, 2018(12).
- [14] 冯鑫, 王晨, 刘苑, 等. 基于评论情感倾向和神经网络的客户流失预测研究[J]. 中国电子科学院学报, 2018(3).
- [15] 刘佳鑫, 许刚, 李娜. 基于人格特质的顾客行为对手机银行业务的影响研究[J]. 金融与经济, 2018(9).
- [16] 陈俊龙, 汤吉军, 汤昊. 企业交叉所有权行为与政府规制研究——兼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国有股最优比例[J]. 中国软科学, 2018(1).
- [17] 李子彪, 孙可远, 吕鲲鹏. 三类政府财政激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机制——基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调节效应[J]. 技术经济, 2018(12).
- [18] 付玉梅, 张丽平. 多元化经营战略与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基于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两大视角的探讨[J]. 商业研究, 2018(12).
- [19] 李俊强. 股权分置改革视角下独立董事对议案事项监督机制研究[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18(5).
- [20] 石晓飞, 牛伟娜, 白云鹏. 女性董事提高了董事会监督效用吗?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8(8).
- [21] 吴超, 吕荣杰. 媒体情绪对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基于金融业竞争水平的分组检验结果[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2).
- [22] 吕荣杰, 董婷婷, 吴超. 晋升情境对薪酬差距激励效果的影响研究[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8(1).
- [23] 张培, 夏立真, 马建龙, 等. 多维信任、知识转移与软件外包绩效[J]. 科研管理, 2018(6).
- [24] 李凯, 安实, 王成亮, 等. 基于 Lotka-Volterra 生态模型的企业知识传播竞争机制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18(6).
- [25] 李军峰. 我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发展现状及对策[J]. 改革与战略, 2018(7).
- [26] 刘期家, 邵丽娜. 专利成果转化众筹模式探索[J]. 中国科技论坛, 2018(6).
- [27] 初钊鹏, 李扬, 刘昌新. 全球太阳能专利技术竞争格局与发展趋势研究[J]. 情报学报, 2018(3).
- [28] 陈俊龙, 王沐笛, 高雅馨. 混合所有制、专利授权与国有

- 股最优比例——基于混合寡占模型的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8(6).
- [29]李春玲,任磊.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的影响[J].工业技术经济,2018(6).
- [30]吕荣杰,张文君,吴超.总经理离任前的公司研发投入变动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8(3).
- [31]赵莎莎,张新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子基金的质量管理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8(10).
- [32]鲍琳,张贵炜.基于扎根理论的智慧物流体系构建[J].企业经济,2018(4).
- [33]王淑清,杨正.智慧物流发展体系构建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23).
- [34]朱柯冰,曾珍香.供应链社会责任研究综述[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7).
- [35]袁旭梅,宓翠.零售商主导下的闭环供应链信息共享价值研究[J].企业经济,2018(3).
- [36]穆秀清,康凯,何华.制造商资金约束的多渠道供应链融资策略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8(3).
- [37]杨会朴,康凯.创新产业集群供应链融资风险结构与收益分配[J].会计之友,2018(9).
- [38]石善冲,康凯立,皮晔正,等.基于组合权重法的供应链环境成本分摊模型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8(9).
- [39]刘一健,陈业华,张志宇.电子商务下生鲜农产品双渠道供应链应急决策[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8(11).
- [40]刘广平,田玮萌,林润辉.房价、产业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J].系统工程,2018(1).
- [41]马丽,鲍红娟,万雪芬.线性还是非线性?工作家庭双向冲突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7).
- [42]徐千,高雪冬,康凯,等.领导—成员交换对知识型员工关系绩效的影响工作嵌入的中介作用[J].技术经济,2018(12).
- [43]刘喆,杨勇,唐加福,等.自主动机、服务型领导力对情绪劳动的多层次作用机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J].管理工程学报,2018(3).
- [44]刘兵,崔文静,李嫒.积极和消极展现规则对员工情绪劳动的影响机制——基于意义建构理论[J].技术经济,2018(6).
- [45]卞娜,李美羽,孙文博.董事会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沪深两市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7).
- [46]马苓,许朋,赵曙明,等.伦理型领导对组织健康要素的影响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8(4).
- [47]刘培琪,刘兵,李嫒.授权型领导对知识型员工知识分享意愿的影响——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的视角[J].技术经济,2018(7).
- [48]作风清,高林,董宇华.知识型员工沉默行为对职业生涯成功的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2018(8).
- [49]杨丽花,刘娜,白翠玲.京津冀雄旅游经济空间结构研究[J].地理科学,2018(3).
- [50]孙振杰.京津冀旅游共生关系的协调演化[J].企业经济,2018(8).
- [51]陈永昶,王玉成.智慧旅游驱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机理与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 [52]李胜芬,翁钢民,李富明.省域国内旅游流系统发展差异及优化路径[J].统计与决策,2018(12).
- [53]李田,黄晨红,张伟,等.河北省域地市旅游产业集群实证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8(2).
- [54]刘嘉毅,陈玲,陶婷芳.旅游舆情网络关注度城市差异——来自289个城市百度指数的实证研究[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8(3).
- [55]刘海鸥,孙晶晶,苏妍姬,等.基于用户画像的旅游情境化推荐服务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10).
- [56]郭风华,程丽萍,傅学庆,等.基于栅格结构的旅游景观感知计算方法[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1).

公共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

张秀玉 郭远远

2018年省内公共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的主要方向,包括治理理论与中国治理现代化实践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公共经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网络舆情引导与政府数据管理等方面。

一、治理理论与中国治理现代化实践创新研究

(一) 治理理论与中国治理特色

韩兆柱等人认为,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

代兴起的公共管理理论,为公共管理者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理论指导。整体性治理理论、合作治理理论与合同制治理理论是治理理论的重要内容。^[1]这三大理论在产生背景、核心理念、政府角色、治理目标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是具有治理的典型特征: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非营利组织、私人公司等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二是政府角色丰富化,政府既是整合者、引导者又是评估者或合伙人;

三是治理目标多样化, 3E (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公众需求、公共利益成为治理要实现的目标; 四是治理方式和諧化, 信任、平等、协商、沟通、合作成为治理的主要手段。这三大治理理论为我国公共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即要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采用平等协商的治理方式以及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的治理目标等。^[2]

白海琦认为, 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就要借鉴世界文明成果, 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情况, 突破西方政治逻辑, 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架构, 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展开对政治与行政体制的现代化改革探索。最终在秉承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下, 改革和完善中国的科层行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监督监察制度、司法制度, 从政治体制设计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3]

李海指出, 中国治理在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引发了国际社会许多学者政要的关注。中国治理在多个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优势, 如长远的战略视野、独特的决策体制、务实高效的治理方式、选贤任能的干部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等。^[4]同时, 中国治理也面临一些挑战, 如中国人口老龄化, 减少了社会劳动力, 影响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给传统治理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环境污染, 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但治理并非能一蹴而就等。^[5]

韩立红在其新著《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管理创新之道》一书中, 基于中共党史与管理哲学的双重视角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社会建设史、社会管理史进行了梳理, 对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创新的八条基本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必然。该书还展望了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趋势: 把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势概括为两个转向与两个结合。两个转向, 即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转向, 由规范行为向引导心理的转向。两个结合, 即虚拟社会治理与现实社会治理的结合, 维持国内社会秩序与参与全球治理的结合。^[6]

一些学者关注了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值得关注的方面。贡太雷认为, 在法治中国建设背景

下, 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更加需要发挥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调整机制的作用。具体而言, 需要从制度环境改善、文化环境改善、组织功能改善和参与能力改善几方面, 进行“四位一体”的协同建设。^[7]宋惠敏指出, 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 要促进政府协商与政协协商在需求、内容、平台和制度方面的耦合。^[8]景枫则强调了伦理在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认为该作用主要通过党委的领导、政府的主导作用, 社会基层组织和民间组织的参与, 公民个人的参与等层面的共同努力来实现。^[9]

(二) 基层社会与社区治理

李柏红、王文强认为,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 目标是以民生发展为核心, 建立多元合作共治的基层社会格局, 这依赖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资源等的全方位转型。目前, 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矛盾纠纷多发、网络“虚拟社区”治理困难等带来的挑战, 亟待着眼于创新制度化的民生发展体系、完善立体化的基层治理机制、构筑信息化的基层治理格局等, 推动基层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 打造现代化的基层社会运行模式。^[10]

李敬华认为, 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比如基层社会的开放性和流行性越来越大; 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存在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 社会治理法律制度不健全; 涉法涉诉和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等等。为此, 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方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具体而言, 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社会组织自治、群众参与等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体系, 建立完善社会法律制度。^[11]尹月认为, 在大数据背景下, 政府应树立智慧治理观, 加强智慧政府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对智慧治理工具技术的研发投入,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借助智慧治理创新政府治理模式, 推动政府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智慧化、民主化、科学化、精细化和可视化。^[12]

贾志科认为,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 60 多年的经验表明, 外部条件、组织基础、功能定位、制度保障和价值认知等主、客观因素从不同角度影响着社区治理。为此, 社区建设应与外部的经济社会条件相适应, 既能吸收更多的成员参与社区治理, 也能将治理效益回馈于外部环境; 要保证

国家意志落实到位、公共管理和服务横向到边、个体权益得到有效保障的组织网络；街道工委和办事处以及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是社区治理体系的组织核心，也是推动社区建设的依靠力量；制度所规范下的社区治理的组织体系，要想发挥切实有效的治理功能，必须有相应的治理资源配置条件为保障；社区建设既要与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相契合，也要通过自身的建设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13]

刘邦凡等人认为，在我国社区救助方面，应用协同治理理论协调社区救助中各个主体的关系，重塑社区的共同意识，增强社区间的救助协同，进而构筑动态、开放、协调的社区救助大系统。^[14]家庭是社区的基本组成单位。刘叶认为，要大力推行家庭亲善政策，从发展空间、实践步伐、运行策略和社会氛围四个方面推动家庭亲善政策与社会政策交互共融。^[15]

（三）乡村治理

尹广文基于高柏镇的实地调查指出，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变革历程中，受党和国家不同时期对乡村制度安排供给的方式和手段不同之影响，乡村社会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形态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应对性力量和意料之中或之外的一系列后果，进而对地方性乡村社会之秩序维系与建构产生不同功效。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通过相关制度和政策的顶层设计，以发展计划和目标绩效的方式指导农业与农村的发展，而地方基层党政则通过与乡村社会及其民众协商动员的方式，以提供有效服务和技术性指导，并最终在民众的动员参与中实现国家的政策绩效和地方党政政权的施政主张。^[16]

刘月霞认为，中华传统美德植根于乡土社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认同，是维系乡情、寄托乡愁、联结故土的精神纽带，蕴含丰富的乡村治理智慧与经验，是当前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因此，要将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当代乡村治理中。^[17]

（四）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刘秋生等人指出，当前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依然面临着危机。在“吉登斯悖论”下，我国地方政府在生态职责上存在的不作为值得重视。生态型政府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向。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需要在多个方向深化和扩展，同时要处理好与生态公民养成、生态市场培育、城镇化建设、生态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中，“邻避效应”治理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点。^[18]

戴彦艳和冯子涵认为，环境邻避运动作为社会发展的衍生品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邻避冲突治理陷入困境。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扩散，对预期损失的不确定性引发公众的恐慌，进而采取激烈的抗争手段引发冲突；信号传递阻塞是环境邻避运动的催化剂；信息不对称加剧了邻避冲突的发生，政府作为主要信息的生产者、加工者、发布者采取“最小抵抗路径”，截留负面信息，引发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冲突升级。为此，必须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重塑激励机制，稳步落实责任制，完善事前预警机制，对信访进行司法转化，并建立邻避设施的政府担保长效机制。^[19]

彭建交等人认为，环保负面舆论扩散、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环境满意度偏低等现象的存在均体现着我国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任流失。重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信任，必须改革和突破陈旧的环境治理思路 and 模式，从加强地方政府对环境利益的重视、复合式环境监管模式构建和环保绩效考核实效性提高三个方面增强政府自身的信任度，通过有效互动构建良好的公共关系并创造公共价值，以此来建立环境治理领域的新型政府信任关系。^[20]陈秀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对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一旦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领导干部必须严格用法，落实诺言，提高化解风险能力；吸取教训，反思工作，提高服务群众能力；引导舆论，稳定情绪，提高监管舆情能力。^[21]

陈鑫认为，TRI，即有毒物质排放清单是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美国最著名的环境政策工具。在实施过程中，为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的最大化，关键在于改变决策者的单向环境管理思路，将市场的导向作用纳入 TRI 实施前的有效评估中，建立企业模型，避免造成高投入低收益的不利现象。^[22]司林波认为，生态问责制已成为新西兰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重要制度工具，形成了包括议会问责、司法问责、行政问责、公众问责、非政府环保组织问责在内的内外约束、纵横交错的立体生态问责体系。借鉴新西

兰生态问责制的经验,我国生态问责制应该在法律法规、问责主体、问责机制设计,以及环境信息公开和问责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进一步完善。^[23]

二、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研究

(一) 行政结构改革创新

任广浩、解建立认为,在我国这样的超大型单一制国家,如何在制度上设计和规范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间的权力纵向配置始终处于治理结构的核心地位。改革开放40年来,围绕构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地方分权自治相结合的权力结构进行过多轮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的改革探索。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更加深刻认识到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为基础的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改革进一步向纵深领域发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改革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各级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改革主要是以国务院规范性文件方式加以部署和推进的,因而改革仍停留在行政性分权层次。要巩固改革成果,必须实现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由政策主导向立法主导转移,以宪法的相关规定为统领,形成规范政府间纵向责权划分与运行的一整套法律体系。^[24]

顾蕾等人认为,垂直管理在保证中央权威、平衡央地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内部管理混乱、外部监督缺失等问题。为此,必须根据我国实际需要来调整权限分配,平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区域之间的协同发展;加强顶层设计和统一领导;建立健全权责清单制度,逐步公开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注重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达到共同治理的良好效果;建立科学监管规则和监管体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25]

高德强等人认为基于利益和权力等现实因素,政府部门协作仍然存在一些体制和人为等方面的障碍因素,亟须正视并采取有力举措。为此,重点应该建立健全部门协作常态化、制度化机制;建立协作争议处理制度,做好责任划分;建立协作部门内部职能机构对接制度;建立协作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政务公开,强化社会

监督。^[26]

(二) 行政审批改革

范爱玲、张才彦认为,行政审批趋于集中、行政审批加强事后监管、加强和规范“三个清单建设”是行政审批改革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必须完善顶层设计,剥离原有审批职能,强化组织体系保障,实施行政审批流程创新。^[27]王梦华认为,要进一步加强行政审批清单建设,必须依法推进简政放权;政府部门做到权责明晰且一致;提高被放权主体承接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完善的监督机制。^[28]

周志刚、张才彦认为,行政审批中介起到了承接部分政府审批职能的重要作用,但仍存在效率低、有依靠、收费乱、服务差、监管弱等各类问题。为此,必须加快中介服务的立法进程,强化法制保障;在中介服务管理过程中实行清单管理;查处实行垄断的中介服务机构,构建和谐的中介市场竞争机制;完善中介服务的监管体系和诚信体系。^[29]

寇大伟总结了行政审批改革的河北经验。认为河北省行政审批局改革成效显著,大大提高了行政审批的质量与效率,但是仍然存在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改革中的“条块关系”尚未理顺、审管分离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等问题。为此,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相关工作人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厘清行政审批局与同级其他部门的横向府际关系;理顺行政审批局与上下级部门的纵向府际关系;加强全省行政审批局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采取防止腐败发生的技术手段和制衡机制。^[30]

(三) 政府绩效管理

王莉莉、孙健夫认为,随着全面绩效管理的实施,独立于预算拨款部门和财政资金使用单位的第三方以客观公正地视角参与绩效评价。从国内外第三方评价的经验来看,要以人民利益为评价目标导向,获取可靠的评价指标数据来源并保持评价的相对独立性。^[31]吴杰华认为,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仍面临一些困境,应该在明确参与式绩效评估的原则、标准、程序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确立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明确定位、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和多元、复合的评价机制,不断完善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化回应机制。^[32]

齐守印和胡德仁认为,要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推进公共经济绩效管理。为此,必须将推进政府绩效管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治本之策;加快研究拟定全国统一的公共经济绩效管理方案;实现公共经济绩效管理的法治化。^[33]

三、公共经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研究

(一) 公共经济

张晋武认为,以公共物品论为核心的公共经济学是在财政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一个大类,应该具有更高、更具总括性的内容层次和区别于财政学的相对独立的内容体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公共经济作为国家的生产活动或公共物品的再生产,也须具备特定的生产方式,其内容也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财政经济活动被视为一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公共经济既具有一般存在性、共同性特征,也具有历史演进性和阶段性特征。^[34]

齐守印指出,公共经济具有五大特有规律,即追求增进公共利益和公共福利、规模持续扩大、与民间经济均衡占用资源、公共物品提供结构均衡以及与民间经济相互作用。^[35]他认为,公共经济管理实际上是由其主体与客体、目标与手段、原则与途径、制度与机制、环境与资源、过程与结果、理论与方法等构成的复杂系统或体系。^[36]要实现公共经济管理目标,需要健全责任约束机制、强化风险控制机制、完善绩效激励机制和改进履职考核机制,同时采用以法制为基础的规范管理法、以计划为依托的目标管理法、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管理法、以激励为主线的人本管理法和以整体协调为基础的系统管理法。^[37]

习亚哲、温立洲基于 1992—2014 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 VAR 模型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行政管理、医疗、教育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一定的负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呈现促进作用;科技支出、支农支出初始为正向影响,之后变为负向影响。支农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占比对 TFP 增长率有较高的解释程度。^[38]

(二) 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 PPP 模式

万长松认为,我国市场经济逐渐成熟,但是

政府财政压力不断上升,而且我国又正处于建设新型城镇化的重要阶段,要改变当前政府依赖的“土地财政”,同时减小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克服债务风险,PPP 模式无疑是最适合的选择。当前对 PPP 模式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多,但还不成熟,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仍显不足。为了更好地推动 PPP 模式在中国的应用推广和健康发展,要在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的探究方面多做功课。总的来说,要将 PPP 模式看作是一种在公共服务领域应用的创新的管理模式,而不仅仅是一种融资模式,这样才能让其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39]

白德全认为,PPP 的规范发展可以吸引社会资金降低政府债务,但是不规范的运营则会形成大规模的隐性地方政府债务。为了限制 PPP 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 PPP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化解作用,应该从完善 PPP 的配套制度建设、加强对 PPP 运行的监督和管理、培养参与主体的市场契约精神、制定社会资本进入退出机制等四个方面采取相应对策。^[40]

张娟认为,PPP 模式日益被广泛应用于各类项目建设中且带来了诸多益处,与此同时加剧了邻避风险,增加了治理难度。任者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构建了 PPP 模式邻避风险的利益相关者二维分析矩阵,通过剖析各利益主体的行动逻辑提出了 PPP 模式邻避风险的治理措施:针对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政府与周边民众应加强双方互动参与;对于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企业和专家应增强其影响力;针对次要利益相关者的媒体要采取“堵不如疏”的策略;与此同时,也要关注一般利益相关者的诉求。^[41]

(三) 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王金营等人将财政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整合为公共服务支出,分析其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利用基于 1998—2014 年中国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动态模型进行回归和检验,得出公共服务支出的增加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结论。同时指出公共服务支出水平是有一定限度的,不是无限增长的。^[42]

张芊和尹福禄利用 2016 年统计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全国各省(区、市)均等化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发展水平是决

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外部条件,基本公共就业服务是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高低的内部因素。因此,应该先缩小各地区基本公共就业服务间的差距,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提升基本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水平,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良好的自然环境,以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43]

韩兆柱认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先行,关键是要加强区域间政府的协调与整合。为此,必须以公众需求为导向,建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法律制度;打破政府部门间的横向分割,密切京津冀三地政府间的联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公私部门的功能整合;构建合理的产业格局,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44]

张贵、薛伊冰认为,公共服务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包含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劳动就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和基本公共文化7个一级指标。京津冀公共服务的协同效应存在但并不明显,发展水平呈明显阶梯落差,并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其中基本劳动就业领域差距最为明显。结合京津冀各领域的发展现状与目标要求,必须通过资源共享、产业转移、统筹规划等对策,协同推进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同城化。^[45]

王晓洁、王丽从构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视角,提出明晰协同范围和深度、优化政府干预、倡导区域财政合作制度、提升区域财政能力、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建立横向转移支付等提升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财政政策。^[46]吴春丽、万翠英认为,推进河北省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立足省情,选择雄安新区等集中承载地,从民生政策保障标准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水平入手,分区域、分领域有序推进全省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并逐步建立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项目融资渠道。^[47]

刘海云等人认为,作为京津冀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津冀人力资源一体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分布不均、人力资源统筹力度不够、人力资源一体化进展缓慢的问题依然存在。为此,必须大力

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适应京津冀区域发展的需要;缩小公共服务资源的差距,以带动人力资源均衡;鼓励人才进入企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向相吻合;深化人才合作深度,提高统筹协调力度。^[48]

刘秀红、马敬芝关注了京津冀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对策:加强三地协调,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加强水源地污染的治理;提高生态文明意识,鼓励居民参与环境治理;加大政府在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支持力度。^[49]

(四) 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王丽慧、陈民认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忽略了农民需求的表达,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出现供需不平衡的异化现象。供给决策机制不合理、需求表达机制的缺失、政府政绩考核机制不健全是制约农民需求表达的瓶颈。通过农民对公共产品需求的积极表达、强有力的需求表达主体的建立、科学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体系和合理的基层政府政绩评价机制的完善,以逐步构建农民需求导向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促进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50]

曹璐迪认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管理方面存在供给量少、供给质量低、面临“公地悲剧”等问题。为此,必须从完善供给及管理机制、畅通需求表达机制和完善公共产品管理机构等多方面做出努力。^[51]申琳等人对保定地区38个村庄展开了调研,发现农户对基础设施服务和公共环境服务满意度较高,对休闲娱乐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满意度较低。农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排序为:教育培训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基础设施服务>农业技术服务>休闲娱乐服务>公共环境服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大公共服务供给力度、寻求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方式、探索农户需求表达机制、建立健全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等提升策略。^[52]

(五) 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创新

郭远远、陈世香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国务院历年公开政策文本分析得出结论,文化建设在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中的定位经历了多维度的转换。在公共政策执行领域,文化建设的地位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就政策目标的视角看,文化建设经历了从组织结构调整到

全面文化建设的转变；从文化功能的定位分析，文化建设经历了从辅助性社会资本到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的转变；在中央政策主导者的心理层面，文化建设经历了从“谨慎”到“自信”的转变。从这些转变趋势可以预见：未来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将进一步强化，有可能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优先任务；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宣传思想工作将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网络文化管理也将成为国家政策关注的重点方向。^[53]

魏翠玲等人认为，未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应进一步优化金融支持的主体结构，鼓励保险、信托等金融机构加入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要进一步优化金融支持结构，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增加直接融资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金融支持所占的比重；要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鼓励国家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54]

陈则谦等人认为，文化云是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重要方式和有效路径。文化云服务具有服务资源的整合性、服务方式的融合性、服务对象的客户化、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服务效能的数据化等特征。未来文化云建设应重点关注用户持续参与的长效机制以及内容资源的增值性利用。^[55]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张琰等人，他们建议开发一款文化云 APP，尽可能地发挥数字化的作用，不仅及时传递最新的文化资讯、推送文化普及类文章，开展文化活动宣传及网上报名或互动、便民文化设施介绍，推出数字化图书馆、文化馆等，还可以开展精准文化扶贫。^[56]

各级图书馆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机构。柴韬认为，社区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基础节点，社区图书馆建设发展与社会公众的现实需要相比还存在着一定距离。应该采用政府购买、公益创投方式，借助社会力量加快社区图书馆建设步伐，提高其服务水平。^[57]韩超认为，应该从阅读推广的角度培育流动人口社会组织，为流动人口定制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建立图书馆社区流动站等方面促进流动人口对图书馆的利用率。^[58]

陈兰杰等人运用文献法分析了对“政府购买公共图书馆服务”这一主题研究的不足之处，认为应该加强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研究，加强对绩效评估结果的实证研究，加强风险评估的相关研究，加强政府购买公共图书馆服务相关管理机制的研究。^[59]贺佳、孙健夫将县市级公共图书馆的财政支出绩效分为两个指标——产出效率和使用效率，依据面板数据，用三阶段 DEA 方法分别评价，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当地的经济状况、对县市级公共图书馆的财政投入数额、县市级公共图书馆对现有资源的利用程度、县市级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文化产品是否满足当地群众的需求，都会影响该地区县市级公共图书馆的财政支出绩效。^[60]

吴卫华等人认为，京津冀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是提升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途径。京津冀公共数字文化信息服务模式的实现策略可以从加强战略管理、服务平台构建、增大技术设备投入、完善服务人员配置四个方面着手。^[61]申伟宁等人认为，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均等，河北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和北京市、天津市相比质量较差。要实现京津冀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均等化，除了采取传统途径如“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等之外，更需要从最基本环节入手，以标准化建设助推京津冀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62]

陈会谦等人认为，河北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由传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型的进程中，还存在整体进一步加快步伐、思路有待进一步梳理明晰、关键环节有待取得突破和组织体系有待逐步建立等问题。为此，要强化转型发展意识、优化转型发展思路、狠抓转型发展关键环节、科学推进组织体系全面创新。^[63]

四、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相关问题研究

（一）腐败与反腐

张国岚认为以利益输送为纽带，以人身依附为特征，将正常交往庸俗化、圈子化、派系化的圈子文化，对政治生态极具杀伤力，其危害集中表现在：弱化执行力，挑战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导致规则失序，冲击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

具有“共生”的价值理念,诱发“塌方式腐败”;导向偏移,败坏党风民风。从根本上遏制圈子文化蔓延,需要强化“补钙”“洗尘”“修心”治本功能,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制度封存圈子文化生成土壤,深入推进现代民主法治建设,释放监察制度活力。^[64]

鲍志伦认为,防范一把手利用帮派行为制造腐败,要大力开展警示教育和宣传活动;提高一把手修养,锻炼其党性;严肃认真地搞好党内政治生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挑选好、任用好一把手;使一把手独立于自我,做慎独的典范;在法治上进行监督与制约;实行政务公开与民众监督;创新公权力运行体制机制;解决一把手监督难题;加强纪律建设,严明纪律。^[65]

张莉莉对当前的执纪监督“四种形态”(常态、大多数、少数、极少数)进行了辩证思考,以扁鹊提出的四种病态(疾在腠理、血脉、肠胃、骨髓)作比喻,认为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未病先防、欲病救萌、既病防变、以惩促治和瘥后防复。^[66]陈会然、刘邦凡等人从电子政务与腐败关系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以EGDI(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为自变量,以CPI(清廉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利用Eviews7.0统计软件,在对全球158个国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电子政务对腐败有一定的预防作用。^[67]

(二) 政府雇员制

李海峰、李敬军等人认为政府雇员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公务员制度的某些不足,特别是对政府管理效果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人力资源开发寻求了一条灵活的新途径。但是目前我国政府雇员制有待制度化,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开支,存在“功利性”风险,“鲶鱼效应”也并不明显。为此,要制定有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加强政府雇员的劳动合同管理,对雇员要“人岗相适”,实施动态管理制度,并科学控制雇员数量以节约成本。^[68]他们还对我国试行政府雇员制经典模式的吉林、珠海、深圳三地的政府雇员制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还存在的未形成有效竞争机制,行政效率提升不明显;职业发展不明晰,薪酬设计缺乏激励性;雇员身份模糊,管理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等问题。对此,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优先选用占编模式,充分重视编制带来的问题;规划公平合理的

薪酬水平,建立与绩效相联系的科学的薪酬体系;完善制度机制建设。^[69]

五、公共政策研究

(一) 公共政策的精准性

王春城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治理的基本手段。在“精准时代”到来之际,确保公共政策精准性,制定和执行精准性政策,促进公共政策走向更高水准的科学性及有效性,应是推进政府精准治理的应有之义。“政策精准性”作为公共政策的应然属性,要求其达到高水平“精细的准确”状态,进而生成与运行“精准性政策”。“政策精准性”从根本上源自其核心要素,主要取决于对政策主体的精准规定、对政策客体的精准界定、对政策目标的精准设定、对政策工具的精准选定。“精准性政策”的实现,需要在精准研策、精准制策、精准施策、精准评策等各个环节综合发力,实现整个政策系统及政策过程的全面改进。^[70]

(二) 精准扶贫政策

席云、牛海峰认为,所谓精准扶贫,是指对于现阶段农村真正的贫困户或人口采取相应的、切实的扶贫措施,落实政府的相关扶贫政策,选取精准的、一一对应的方式对于农村贫困户或人口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帮助与扶持,或提供资金贷款,或提供技术服务,或开展相关培训,从而消解各种致贫因素,实现真正恒久的脱贫乃至致富的目标。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央与地方上下联动,形成一体化的扶贫机制;政府与社会联动,调动社会资源参与扶贫工作的积极性;构建多元发力的综合扶贫机制。^[71]

孙伊凡等认为,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问题而提出的一项具有创新性的重大公共政策,具有精准扶贫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精准扶贫政策信息的透明性和精准扶贫政策的稳定性与创新性等特征。^[72]李汉才认为,新时代的精准扶贫,应坚决抵制形式主义,从事实出发,找准症结把准脉,开对药方拔“穷根”。对于当前我国精准扶贫中存在的走马观花、繁文缛节、“样板工程”、空喊口号、虚假脱贫等形式主义问题,应通过管理规范化的参与民主化、方式专业化、考评科学化、服务制度化等方式坚决杜绝。^[73]

贾淑军认为,金融扶贫力度不断加大、投入越来越多,在扶持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和实现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进一步提高金融扶贫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重点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政策性扶持与市场化运作的关系、直接扶贫与间接扶贫的关系、增加金融供给与增强产业承接的关系以及专业化金融机构与多元化金融主体的关系。^[74]

林顺利、孟亚男认为,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困境在于形式上的嵌入和实践的脱嵌。针对这种状况,要在地方工作中为社会工作嵌入留下接口,积极营造和改善社会工作在基层的工作情境并强化社会工作的行业能力建设,促进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系统嵌入,有效激发社会工作脱贫攻坚的潜能。^[75]王士心、锁罗曼认为,精准扶贫与社会救助具有相同的目标逻辑和风险逻辑、一定的政策交叉和相同的“衔接点”、公共耦合属性和显著过渡特征,这使得两者具有融合治理的“天然属性”。其完善可以采用创新信息采集与核查机制,加大社会救助与精准扶贫政策的集中性调整,建立反贫困标准动态联动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等途径。^[76]

有不少学者关注了河北省的精准扶贫政策。张学敏等人认为,十八大以来,河北省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在精准扶贫实施的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包括扶贫项目选择不合理、扶贫对象的劳动能力不足、配套设施不完善、扶贫资金使用不当、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为此,必须精选扶贫项目、提升扶贫对象的劳动能力、增强配套设施建设、有效管理扶贫资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来化解挑战,顺畅实现河北省精准扶贫的相关目标。^[77]王春城等人通过对河北省两县的实地调查发现,贫困人口中享受就业技能培训、扶贫公益岗位就业的比例依然不够充分,效果不够显著。要摆脱贫困劳动力的就业之困,就要制定提升就业扶贫工作的政策措施,并建立网络平台促进政策落实和指导就业工作,引导贫困劳动力乐就业、会打工,实现扶志和扶智相结合发展。^[78]

(三) 公共政策创新

积极实施政策创新是不断发挥公共政策积极作用的必然要求。蔡乾和等人认为,瑞典创新署开发一套基于全过程的影响评估的系统组合方

法,这一基于全过程的影响评估工作模式,可为国内的政策评估提供一些有益启示和借鉴,包括:创新投入政策应侧重持续性影响的研发;加强基于全过程的影响评估研究与实践;重视成功进行影响评估应具有的必要实施条件。^[79]

刘邦凡、栗俊杰重点关注了河北省的营商环境政策创新。认为,优化河北省营商环境政策有以下着力点:完善要素支持政策,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老难题;改革财政支持方式,切实降低民营企业负担;深化税费政策改革等。^[80]他们还指出,河北省的营商环境政策还面临诸多问题,包括政策超前性、开放意识不强;建立公平透明的竞争生态环境治理机制还有较大差距;已有的财政、金融、土地、人才等要素支撑政策实施效果不够理想;部分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之间存在偏差,政策内容含金量有待提高,政策设计的可操作性有待加强;政策传递不够及时、解读不够精准;政策落实中存在执行困难、执行成本高、重查重罚等等。为此,要实施企业服务标准化,全面改善营商软环境;强化生态治理,扩大生态优势,促进绿色发展;着力减轻商务成本,提升服务企业发展的城市承载力;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加强政策供给侧治理,建构河北政策执行的良好生态。^[81]同时,优化河北营商环境的关键在于政策落实^[82],这也是推动河北省开发区新一轮开放发展的关键所在^[83]。

佟林杰认为,河北省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存在政策制定主动性不足、政策系统性不足、政策执行存在偏差三大问题。必须使政策更加“本土化”;更加注重服务环境建设;强化责任落实,提高政策执行力;建立和完善人才政策评价体系;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念。^[84]河北省科技创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数量与京津相比差距不算太大,造成其科技创新效率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方面。未来河北省应在保证科技创新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通过完善省内科技创新资源共享性和开放性、健全科技创新支撑服务体系、加强科技财政支持力度、激发技术创新市场活力、引导企业创新发展、构建协调互助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和科技创新政策实施评价机制等多方面,不断推进河北省科技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提升。^[85]

（四）雄安新区公共政策创新

刘邦凡等人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雄安新区规划与建设的指导原则，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雄安新区的公共管理、制度安排和文化建设。^[86]同时，要用科学的劳动经济理论来指导雄安劳动政策创新。^[87]

2018年7月28日，由河北新型智库——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燕山大学）主办的“智启雄安——第四届雄安新区建设公共政策智库论坛”在秦皇岛举行。此次智库论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聚焦雄安新区经济建设，凝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专家学者智慧的又一次思想碰撞，为雄安新区的经济发展，创新雄安新区经济发展模式开拓了新视野、注入了新活力，20多位与会学者分别就雄安新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规划、政策创新等方面做了发言。^[88]

六、网络舆情引导与政府数据管理研究

（一）政府信息管理

杜坤、陈兰杰等人对2012-2016年国内外政府信息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国内对政府信息的保密性和隐私性研究较少；对其增值开发、再利用环节的研究较少；对政府信息元数据的质量、标准、发布平台或系统的研究较少；对于政府信息公开之外的其他环节研究较少。为此，要注重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研究，加快政府信息市场化进程，利用信息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政府信息进行系统研究。^[89]刘邦凡认为，在大数据时代要建设“智慧政府”。具体来说，要解放思想，接受变革；要加强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要处理好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问题；要注重信息安全保护。^[90]

（二）网络舆情引导和网络谣言治理

刘丽敏等人认为，从静态视角看，网络语境中的聚集逻辑具有极化的构建特质；从动态视角看，其逻辑具有排异的构建特质。而内在于网络社会群体本身的两种特性蕴含一系列网络语境的风险，如追寻真理的悖论、极端的群体观、价值感的迷失、网络霸权的诞生等，这些风险在现今的网络空间都是真实存在的。^[91]针对这种现象，刘楠认为当前网络舆情表现出传播机制的复杂化、参与主体范围的扩大化和运行规则的系统化

特征。对此，政府应从意识形态领域着手，创新治理理念；应从单一到多元，形成协同治理模式；应从线性到系统，形成生态治理机制。^[92]

回晓文、刘邦凡等人认为，需要政府以大数据为手段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控，具体途径包括建设有效监管平台，强化监管机制；政务信息公开，数据共享；完善网络舆论问责机制，依法治网；引进先进技术和专业化人才。^[93]蒋冰晶、张继红认为，要在整体性治理视野下对网络信访的公众需求价值、问题导向方法、组织功能整合进行反思。从政府自身便捷性出发转向以公众需求为核心，发展表达集中程序定位公众需求、发展专家程序实现公众需求；以问题为导向，建构横向层面的行动线，发展特别程序、委员会程序、评估程序，综合建构“四类三级”程序；引入大数据和互联网思维与技术推进“预警——解决一体化”的“一站式”信访大数据平台。^[94]

朱晓霞等人关注了公共危机伪信息问题。认为在伪信息频现并引发公共危机的大环境下，研究其爆发机制对政府进行控制治理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伪信息的爆发存在一个阈值，小于阈值处爆发规模几乎为0；超过阈值后，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爆发。伪信息在产生初期感染性最强，随着仿真时间的增加，逐渐减弱。^[95]通过对双层网络间的相互联系对伪信息免疫影响的研究表明，双层网络相互联系对伪信息免疫存在双重影响作用，即在单一免疫情况下，表现为扩散抑制；双重免疫下，表现为扩散促进。得出了公共危机双层网络伪信息扩散的综合免疫阈值，发现其相较各子网分别免疫有较大幅度的增加。^[96]

蔡元元认为以德法并举的理念与方式来治理网络谣言，能够最大限度规避单纯强调道德培育或法律手段存在的不足，有效净化网络风气、遏制谣言扩散，从而推动公民道德改良、法治意识普及以及文化污流荡涤的互融共进。^[97]

（三）政府数据管理与开放

司林波认为，大数据及其技术的应用带来了新一轮的政府治理变革创新，成为智慧政府治理的重要背景和条件，对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模式与治理过程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更好地掌握时代发展态势，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应当更具“智慧”，汇聚政务大数据，打造高效能

的智慧政务;建立数据驱动的决策支持系统,提升政府决策精确性;实现精细化数据管理,加速智慧服务建设;完善智能化数据监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监管,努力构建起以大数据为核心资源的智慧政府治理模式。^[98]

白献阳等人认为,针对大数据发展应用背景下大数据治理主体、客体、活动及其风险面临的挑战,在宏观上要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政府大数据共治服务规则,为政府大数据治理主体提供协同创新的解决方案,解决主体角色的转型问题,提供宏观层治理的制度安排;在中观上要构建多层次联通的法治保障规则,为政府大数据治理对象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信息管理提供安全和风险管控方案,提供中观层治理的活动要求;在微观上要构建政府大数据供给治理体系为政府大数据治理提供知识服务的精治规则,满足多利益相关多种多样的复杂需求,提供微观治理的规范要求。^[99]还指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存在政策体系不完善、具体政策缺少规范性和操作性、保障政策力度不够、政策执行缺乏组织保障等问题,必须采取丰富政策内容和类型、加强具体政策规范性与操作性、完善保障政策、设置保障政策落实组织机构等对策。^[100]

迪莉娅对政府数据开放的认知度和成熟度进行了探讨。认为,总体而言我国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对于政府数据开放的认知度并不高。为此,必须进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数据开放意义的建构,即政府工作人员通过对数据开放的了解、学习,形成对于政府数据开放涵义、意义的共识;要进行政府数据开放意义的输出,即通过建立政府数据开放专门机构、一把手负责等方式,实现政府数据开放的意义;要开展政府数据开放意义建设的行动,即政府部门采取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顶层设计政府数据资源跨界共享的协调和整合机制、统一构建智慧政府数据开放云平台、加强政府开放数据的监管等具体行动策略,为政府数据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101]指出应该采取提高政府部门对数据开放的认知能力、开展政府开放数据集的治理、建立统一和集成的政府数据开放门户网站、加强政府开放数据服务及利用效果的监管与评估等方式,提升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成熟度。^[102]

(张秀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教授;

郭远远,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 韩兆柱,于均环.整体性治理、合作治理与合同制治理理论比较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05)
- [2] 韩兆柱,翟文康.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比较研究[J].教学与研究,2018(02).
- [3] 白海琦.论政治体制改革视阈下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J].理论月刊,2018(07).
- [4] 李海,范树成.国外学者视野下的中国治理优势[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05).
- [5] 李海,范树成.中国治理优势源于治理特色[N].北京日报,2018-12-03.
- [6] 孙英臣.社会治理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管理创新之道》评介[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8(03).
- [7] 贡太雷.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与法治中国建设[J].南海法学,2018(03).
- [8] 宋惠敏.促进政府协商与政协协商的耦合[N].河北日报,2018-07-23.
- [9] 景枫.伦理在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探微[J].治理现代化研究,2018(01).
- [10] 李柏红,王文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时代意蕴、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06).
- [11] 李敬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法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J].党史博采(理论),2018(04).
- [12] 尹月.智慧治理: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的新选择[J].河北企业,2018(08).
- [13] 刘玉东,贾志科.新中国社区治理中的五种关系及其治理经验[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8(01).
- [14] 刘邦凡,张耀丹,栗俊杰.论社区救助的协同治理模式[J].中国集体经济,2018(35).
- [15] 刘叶,张芸芸.家庭亲善政策:社会政策的新动向[J].社会工作,2018(02).
- [16] 尹广文.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变革与秩序建构——基于高柏镇的实地调查与思考[J].兰州学刊,2018(11).
- [17] 刘月霞,鲁晨.中华传统美德融入当代乡村治理研究[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04).
- [18] 刘秋生,樊震超,陈翔,张同建.“吉登斯悖论”下我国生态型政府建设研究[J].理论导刊,2018(01).
- [19] 戴彦艳,冯子涵.环境邻避运动的治理困境与优化路径探析[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18(02).
- [20] 彭建交,谢中起,臧红松,盛锁岩.环境治理中的政府信任重塑[J].生态经济,2018(11).
- [21] 陈秀梅.生态文明建设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N].贵州日报,2018-11-13.
- [22] 陈鑫.美国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研究——以TRI制度为例[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8(03).

- [23] 司林波, 聂晓云. 新西兰生态问责制述评及借鉴[J]. 世界地理研究, 2018(01).
- [24] 任广浩, 解建立.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政府间权力纵向配置变革及其法治化探索[J]. 河北法学, 2018(12).
- [25] 顾蕾, 张卫东. 分权背景下的中国政府垂直管理研究[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8(05).
- [26] 高德强, 陈琳. 论政府部门良性协作机制构建的现实障碍及实现路径[J]. 长江论坛, 2018(02).
- [27] 范爱玲, 张才彦. “放管服”背景下行政审批改革对策研究[J]. 法制与社会, 2018(11).
- [28] 王梦华. 行政审批清单下政府简政放权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2018(01).
- [29] 周志刚, 张才彦.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建议[J]. 法制与社会, 2018(10).
- [30] 寇大伟. 行政审批改革的河北经验[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05-16.
- [31] 王莉莉, 孙健夫. 对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价的再认识——基于国内外经验[J]. 经济研究参考, 2018(10).
- [32] 吴杰华.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困境超越[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18(06).
- [33] 齐守印, 胡德仁. 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推进公共经济绩效管理[J]. 当代经济管理, 2018(09).
- [34] 张晋武. 公共经济: 基于社会再生产视角的重新认识[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1).
- [35] 齐守印. 试论公共经济基于自身属性的特有规律[J]. 河北学刊, 2018(02).
- [36] 齐守印, 胡德仁. 关于公共经济管理理论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探索[J]. 当代经济管理, 2018(01).
- [37] 齐守印. 简论公共经济管理的一般机制与主要方法[J]. 地方财政研究, 2018(02).
- [38] 习亚哲, 温立洲. 公共支出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 VAR 模型的动态分析[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8(01).
- [39] 万长松, 吴盼晴. 我国公共服务领域 PPP 模式研究综述[J]. 唐山学院学报, 2018(01).
- [40] 白德全. 规范 PPP 发展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J]. 理论探讨, 2018(03).
- [41] 张娟, 娄文龙. PPP 模式下的邻避风险及其治理——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J]. 唐山学院学报, 2018(05).
- [42] 王金营, 李庄园, 李天然.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 1998—2014 年省级面板数据[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6).
- [43] 张芊, 尹福祿. 省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J]. 经济研究参考, 2018(34).
- [44] 韩兆柱, 于均环.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J]. 学习论坛, 2018(01).
- [45] 张贵, 薛伊冰. 协同论视阈下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研究[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18(05).
- [46] 王晓洁, 王丽. 新时代背景下促进京津冀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政策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 2018(37).
- [47] 吴春丽, 万翠英. 借鉴山东经验 推进河北县域公共服务均等化[J]. 经济研究参考, 2018(58).
- [48] 刘海云, 刘盈甜. 京津冀公共服务一体化中人力资源一体化研究[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02).
- [49] 刘秀红, 马敬芝. 京津冀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径分析[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18(20).
- [50] 王丽慧, 陈民. 需求视角下农村公共品供给异化现象及农民需求表达机制的完善[J]. 经济研究参考, 2018(10).
- [51] 曹璐迪. 浅谈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及对策[J]. 河北企业, 2018(01).
- [52] 申琳, 刘海燕, 刘爱秋, 刘伟伟. 以农民满意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调查及提升策略研究——以保定市为例[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8(21).
- [53] 郭远远, 陈世香. 改革开放 40 年来文化建设定位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基于历年国务院政策文本的分析[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1).
- [54] 魏翠玲, 安玉洁, 纪俊霞.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金融支持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进程[J]. 财会通讯, 2018(29).
- [55] 陈则谦, 刘昱杉, 聂曲哈. 我国公共文化云的服务内容与特征分析[J]. 图书馆, 2018(08).
- [56] 张琰, 楚文一. 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设想[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8(18).
- [57] 柴韬. 政府购买、公益创投与社区图书馆发展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 2018(58).
- [58] 韩超. 流动人口公共文化服务视阈下的图书馆阅读推广[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3).
- [59] 陈兰杰, 刘利. 政府购买公共图书馆服务研究文献计量分析[J]. 河北科技图苑, 2018(02).
- [60] 贺佳, 孙健夫. 县市级公共图书馆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J]. 经济研究参考, 2018(46).
- [61] 吴卫华, 何小凤, 崔继方, 张弘引. 京津冀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及服务研究[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6).
- [62] 申伟宁, 马斌, 袁硕. 以标准化建设助推京津冀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18(03).
- [63] 陈会谦, 王建军, 赵会珍, 冯皓莉. 河北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途径选择[J]. 管理观察, 2018(13).
- [64] 张国岚. 圈子文化及其治理[J]. 河北学刊, 2018(06).
- [65] 鲍志伦. 防范一把手利用帮派行为制造腐败[J]. 领导科学, 2018(07).
- [66] 张莉莉. 对反腐执纪监督“四种形态”的经济思考[J]. 中国集体经济, 2018(04).
- [67] 陈会然, 刘邦凡, 栗俊杰. 略论电子政务发展与腐败治理的关系[J]. 经济研究导刊, 2018(36).
- [68] 李海峰, 李敬军, 李科, 王建强, 鲍志伦. 政府雇员制的现

- 状、问题及发展对策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2018(07).
- [69]李海峰,李敬军,李科,王建强.我国政府雇员制的典型模式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10).
- [70]王春城.政策精准性与精准性政策——“精准时代”的一个重要公共政策走向[J].中国行政管理,2018(01).
- [71]席云,牛海峰.论精准扶贫战略的内涵、意义与实现机制[J].经济研究导刊,2018(17).
- [72]孙伊凡,张欣,张杏会.关于精准扶贫的公共政策解读[J].经济研究参考,2018(10).
- [73]李汉才.精准扶贫应坚决杜绝形式主义[J].人民论坛,2018(36).
- [74]贾淑军.金融精准扶贫要处理好四个关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11-21.
- [75]林顺利,孟亚男.嵌入与脱嵌: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J].甘肃社会科学,2018(03).
- [76]王士心,锁罗曼.精准扶贫与社会救助的融合治理[J].人民论坛,2018(32).
- [77]张学敏,闫博荣,唐潇.河北省精准扶贫现状、问题与路径选择[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06).
- [78]王春城,周玥.地方政府推进就业扶贫的政策措施及其效果提升——基于对河北省两县的实地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18(69).
- [79]蔡乾和,姚顺玉,周丽雯.创新政策影响评估:基于全过程的系统性组合路径——以瑞典国家创新署为考察对象[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6).
- [80]刘邦凡,栗俊杰.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推进河北民营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导刊,2018(31).
- [81]刘邦凡,栗俊杰.以问题导向推进河北省营商政策落实[J].经济研究导刊,2018(30).
- [82]刘邦凡,栗俊杰.优化河北营商环境的关键在于政策落实[J].经济研究导刊,2018(33).
- [83]栗俊杰,刘邦凡.推进政策落实是推动河北省开发区新一轮开放发展的关键[J].经济研究导刊,2018(29).
- [84]佟林杰,杨慧谦.河北省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问题研究[J].河北企业,2018(11).
- [85]佟林杰.河北省科技创新政策实施效果模糊综合评价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8(31).
- [86]刘邦凡,李雪莲,栗俊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雄安新区的规划与建设——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雄安政策与建设研讨会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18(24).
- [87]栗俊杰,刘邦凡.劳动经济理论及其传播与雄安劳动政策前瞻——第三届雄安新区建设公共政策智库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18(22).
- [88]刘邦凡,彭建交.第四届雄安新区建设公共政策智库论坛综述[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5).
- [89]李继存.2012-2016年国内外政府信息研究对比分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8(04).
- [90]刘邦凡,南欣,栗俊杰.大数据助推我国智慧政府的发展[J].中国集体经济,2018(32).
- [91]刘丽敏,王依娜.网络群体聚集的基本逻辑与治理反思[J].经济论坛,2018(04).
- [92]刘楠.治理网络舆情,政府该如何着手[EB/OL].人民论坛网, <http://www.rmlt.com.cn/2018/0313/513601.shtml>, 2018-03-25.
- [93]回晓文,刘邦凡,栗俊杰.大数据背景下政府网络舆情的监控体系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8(30).
- [94]蒋冰晶,张继红.整体性治理视野下的网络信访研究[J].河北法学,2018(06).
- [95]朱晓霞,孟建芳,王成亮.基于爆炸渗流理论公共危机伪信息的爆发机制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09).
- [96]朱晓霞,刘萌萌,沈羽嵩,陆君安.公共危机双层网络伪信息扩散与免疫阈值研究[J].系统工程学报,2018(05).
- [97]蔡元元.德法并举治理网络谣言[J].人民论坛,2018(10).
- [98]司林波,刘畅智慧政府治理: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变革之道[J].电子政务,2018(05).
- [99]安小米,宋懿,郭明军,白献阳.政府大数据治理规则体系构建研究构想[J].图书情报工作,2018(09).
- [100]白献阳,孙梦皎,安小米.大数据环境下我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体系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8(24).
- [101]迪莉娅.我国政府部门数据开放的认知度研究[J].图书馆,2018(08).
- [102]迪莉娅.政府数据开放成熟度模型研究[J].现代情报,2018(01).

体育学研究

常彦君

2018年河北体育工作者在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经济学、运动训练学、体育教育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

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

(一) 体育文化与传播研究

黄璐等从读者的视角,对近年来我国体育学

术期刊办刊的新变化做了分析。认为《体育学刊》坚守质量第一原则,体现了学术期刊精耕细作的从业精神,引领体育学术的前沿研究,是中国体育学术期刊良好生态的范本;《体育与科学》力求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的无缝对接,在理论层面上能做到严谨、规范和精深诠释,又能回应体育现实问题,其改版与策划也具有创新眼光;《运动与健康科学》推出载文的“类增”与“量减”并举、“开门办刊”的意识与行动同步、出版语言的国际化与网络化协同等策略,仅用5年时间,完成了从创刊到国际一流体育学研究期刊的跨越式发展,在中国人文社科期刊中排名第一,成为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国际化办刊的典范。^[1]

葛艳明等指出“泛娱乐化”是当前互联网媒体时代的特色,适度的娱乐性开发有助于传播体育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的文化消费需求,扩大该产业的市场规模。但过度娱乐化现象也普遍出现在体育文化传播尤其是体育赛事报道中,不仅导致体育文化发展脱离正常轨道,也极大削弱了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作者认为就体育赛事报道来说,对“竞技性”和“娱乐性”的有效平衡是关键。^[2]

白贵等通过对目前体育赛事机器新闻写作作品的分析,认为存在逻辑运算难以实现语义理解、数字冲突难以转化为趣味表达、非结构化数据难以被机器运用等现实困境。提出:应通过数据积累与知识构建实现逻辑推算到语义模仿的过渡;通过数据升级与知识优化实现信息推送到深度报道的转变;通过机器与人工协调实现单向辅助到相互协作的良性发展。^[3]

马笑楠指出,当前微电影传播的“异军突起”,为河北体育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借鉴形式。要充分发挥微电影优势,塑造河北的独特体育精神与文化价值。要依托城市体育风貌与特色,有效渗透于微电影情节当中,展示特有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积淀,使城市焕发精神与活力。要努力打造微电影交流平台,增强体育文化认同感,而微电影的“草根性”也为大众提供了参与平台,使其自觉成为河北体育文化的传播者。^[4]

(二) 社区体育研究

刘敏涛等认为,有氧健身锻炼可以预防老年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也可以延缓或改善老年痴呆患者的病情,老年人应以自身条件为依据,选

择适宜的健身锻炼手段进行终身锻炼。^[5]

崔雪梅对城市社区与城中村体育组织发展的差异进行了研究,建议要建立和完善城中村体育管理体系,适当提高城中村体育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标准,优化城中村体育环境,扶持草根民间体育组织的发展,构建体育服务网络共享模式。^[6]

左群等通过对当前社区老年人体育锻炼行为与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社区老年人体育锻炼水平较低;老年人对于公共体育服务的总体满意度和总体满意率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老年人是否参与体育锻炼与他们对公共体育场地面积、公共体育设施维护修缮以及利用效率的满意度有关;老年人体育锻炼频率与他们对公共体育服务活动频率、公众参与公共体育活动积极性、公共体育指导员职业技能、公共体育指导员服务态度的满意度有关。建议今后应更加关注老年人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坚持公共体育服务的软、硬件建设并重的原则,加强公共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水平,有效促进老年人体育锻炼行为。^[7]

(三) 农村体育研究

孙屹立等指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独特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和传承过程,就是其文化样式的再生产过程。在农村要大力发展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让更多农民参与到具有传统性、娱乐性、民族性的传统体育项目中来。高校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开展,对当代农村居民的民族属性意识、民族交往意识、民族发展意识有显著的影响。基层体育管理部门应该充分挖掘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元素,并将其充实到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中,提高农村居民的民族意识。^[8]

赵华恩等指出实现农村体育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有效路径是:强化政府职能,加大体育投入,加快相关政策的制定,强化落实建立体育资源配置均衡化制度,引入问责机制,增加单列经费预算的透明度,实行成本分担与补偿机制,完善资源配置利益表达机制。^[9]

张英媛等对河北省脱贫县留守老年人健康状况进行调研,提出要关注对留守老年人健康状况差异性健康干预机制的制定,注重脱贫区老年人的健康差异性、意识差异性、能力差异性,强化宣传效应,出台鼓励措施,实现老年人自身、家

庭、政府合力并举,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10]

(四) 体育政策法规研究

张少卿等根据现行《体育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体育法》修订与完善要遵循“以人为本”原则、体育自由与公平原则及绿色体育原则。建议要进一步明确公民体育权利,并进行权利救济制度的建立;健全体育社团内部处罚程序,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合理配置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完善法律责任体系及确定环境保护义务等。^[11]

马昆等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河北省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提出建议:发挥区位优势,推动区域内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依据政策指引,构建京津冀公共体育服务一体化发展体系;依托供给侧改革,建立公共体育服务多元化、分层次的供给制度;发展体育小镇,推进公共体育服务示范区建设。^[12]

关于建立竞技体育行业自治体系问题,蓝涛认为要先建立竞技体育行业有限自治体系,最终实现竞技体育行业高度自治。竞技体育有限自治体系要坚持司法最终解决的原则,并明确有限自治体系下竞技体育纠纷的救济范围和救济路径。特别强调在竞技体育有限自治体系中,政府应尽量减少对体育组织自治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体育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同时完善有限自治体系下竞技体育纠纷的司法救济路径。^[13]

(五) 体育史研究

针对当下教育极度偏向“智商”追求而忽视“动商”发展的环境,秦双兰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动商”进行了脉络探析,提出应当深入挖掘“动商”的传统文化含义,让“动商”回归传统文化,为“动商”的发展营造文化氛围。解读动商的文化根脉,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智商、动商互助发展极具文化价值。^[14]

陈汉英对著名教育家约翰·洛克的青少年体育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洛克的教育思想体系中,把体育教育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强调体育、道德和智力全面发展的人才观,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等,这些对中国当今的体育教育有重要的借鉴作用。^[15]

秦双兰等对新石器时期体育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探索,认为新石器时代在继承与发展旧石器时

代祭祀舞蹈、石球、射箭、儿童娱乐活动的同时,也创造性地开辟了集体舞蹈、武舞、弹弓、搏斗、球戏等活动内容;就狭义体育而言,武舞、讲武、田猎都是最原始的体育教育,即通过活动达到育化身体的目的;新石器时代的体育在农业生存模式的主线牵引下不断发展并分化:农业生存模式衍生出农耕节奏的集会娱乐体育;战争衍生出射箭等军事体育内容;规律性农闲促进了体育教化和讲武的产生发展。^[16]

(六) 大众健康研究

孙宏茹等通过对河北省 60 所幼儿园进行调研发现:幼儿的身高、体重方面城市幼儿普遍超过农村幼儿,但自理能力和运动能力方面农村幼儿优于城市幼儿;影响 3~6 岁幼儿健康的因素主要有:户外活动时间、幼儿园组织活动形式以及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改变对策:转变幼儿园和幼儿家长“重智轻体”的教育观念;加大对农村幼儿教师在健康教育组织与实施方面的培训;加强对幼儿园体育工作的管理;加大硬件设施投入;制定系统、科学、合理的幼儿体育活动方案等。^[17]

谭玉霞等调查发现,河北省城市社区老年人习惯清晨在居住地较近的公园,以自发性小群体形式,以健步走和广场舞等动作简单、强度小的运动项目,进行较小运动量的身体锻炼。作者认为,老年人在从事中小运动量的体育锻炼时,其主观锻炼体验会更深刻,积极情绪较高、消极情绪降低,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满足感。体育锻炼是帮助老年人达到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有效途径,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种重要手段。^[18]

郭杰从河北省城镇居民在雾霾天气条件下的体育需求状况入手,对居民进行体育健身活动的场地器材、运动项目的选择、组织管理形式、当地职能部门制定的相关政策法规及媒体参与引导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掌握了第一手数据。在雾霾天气条件下居民不会停止室外健身活动而是采取一定防护措施进行小强度的体育活动;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比较复杂,呈现出年龄阶段的差异性;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选择方面存在偏差和不合理的地方;健身项目的选择与居民的年龄层次有密切关系;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体育的需求差别主要集中在满足生理、心理和社

会三个层面；缺乏场地设施是影响居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重要因素，居民进行体育活动的频率和时间受到很大影响，不同年龄阶段居民的体育活动时间掌握跨度也比较大；中老年群体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多数是结伴进行，体现了这个年龄群体渴望社交的需求；通过手机微信和QQ建立的健身活动群在健身居民中使用非常广泛。^[19]

张文亮等研究认为体育健康综合体是体育与健康服务供给的新业态、新模式，采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市场融合”是成功建设综合体的必要途径，而“体育医院门诊、运动健康体检、科学健身康体、体育与健康旅游等体医融合型产品”是体育健康综合体的主要服务供给内容。还就推进体育健康综合体建设提出对策建议。^[20]

王青涛等以指导民众科学体育锻炼，预防中老年慢性病，减轻患者对药物的依赖为目的，选取70名中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发现持续、规律地参加伸展性体育运动可以有效降低中老年人的血压，改善心血管系统。通过对患有糖尿病的中老人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耐力性运动锻炼，发现其血糖明显下降，建议中老年人应在保证合理膳食，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根据自身体质状况、病情特点，科学合理参加体育锻炼，发挥运动促进健康的最大效益。^[21]

二、体育教育学

(一) 体育教学研究

赵化雨认为，在校园足球教学中，多媒体动态图示引导法较常规教学可以更快地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足球技术动作动力定型，或反馈修正足球技术动作表象，同时由于它的直观性等特点，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22]

靖桥等针对高校大学生体育弱势群体参加体育锻炼面临的问题提出建议：学校及教育管理部门要加大重视程度，制定和出台相关政策；配备专职教师开设与之相适应的体育教学内容；加大对这一部分学生的心理辅导，克服其存在的心理阴影；成立特种体育社团，给予资金和场地器材的支持，开设特殊运动会、设定比赛日等活动形式，使这一群体真正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最终实现健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23]

杨士利指出，“休闲跑酷”运动是一种特别适合中小學生参加的体育项目，鉴于其具有较强

的专业性，建议可借鉴中小校园足球的开展和普及情况，在条件成熟的中小学率先进行试点，同时加大对跑酷运动的宣传力度，多举办一些跑酷运动的展示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对跑酷运动有深入和全面的了解，使跑酷运动得到普及。^[24]

李荣薇等指出，健身气功具有民族传统体育和传统康复保健医学的双重功能，蕴含深厚的传统文化，具有“调神”“调息”“调形”的作用，可使人达到“心全于中，形全于外”，心身和谐的状态。作者通过对一组在校男大学生参加健身气功前后心理健康水平能力的测试，发现健身气功对男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具有改善和提高的效果。^[25]

排球的传球技术要求学生对球的空间位置、人球的相对关系、击球时身体各环节的发力方式有较清晰的本体感知，需要在学生的头脑中建立这种关系和肌肉记忆的链接。赵化雨认为，通过录像反馈可以最直观、快速的使学生获取信息，并通过强化性练习，建立神经与肌肉间的有效链接。在教学过程中，录像反馈教学方法能够体现出其感受直观性、反馈及时性、技术简单性的特点，对于重点难点的教学和错误动作的纠正有很好的效果。^[26]

此外，王海军等的《我国运动康复专业人才培养与职业能力框架分析》对运动康复专业的人才培养路径、专业筹建基础和招生情况等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27]曹英等的《学校体育教学中常见的问题链与矫正措施》从问题链的角度，全面系统梳理了学校体育教学中常见的课堂问题行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28]赵化雨的《运动视频分析软件在羽毛球技术教学中的研究》以羽毛球技术教学为例，研究运动视频分析软件在体育技术教学中的应用，以期对运动视频分析软件的进一步开发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29]陈军等的《中考体育前抛实心球项目运用阻力带训练方法的实验研究》就运用阻力带的训练方法，提高前抛实心球成绩的具体内容、方法、步骤进行了研究探索。^[30]崔冬雪等的《爬行运动改善四年级小学生脊柱形态实验研究》以石家庄市石门小学四年级两个班级的学生作为实验对象，通过体育课实施为期14周的干预方案，采用颈部曲度、腰部曲度和背部形

态评价小学生脊柱形态。探讨了“手足/膝异侧的直线、曲线爬行”运动方案对小学生脊柱形态的影响效果。^[31]

（二）体育教学改革研究

李曙刚等分析认为，当前河北各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中存在五方面的问题：一是项目关联性不强，学习兴趣低；二是校内体育教学与课外体育锻炼的达成度不够，学生仅局限每周一次体育课，练习时间较少频率较低，负荷量和运动强度不够；三是公共体育课的考试及评价方式单一，考核的方式是以终结性评价为主，很少注重过程性评价，打击了“体育差生”的学习兴趣；四是当前大部分高校的公共体育课的教学目标仅是为通过学期末的考试获得学分而设置的，没有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和自我锻炼的习惯，教学目标需进一步的探讨与完善；五是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模式陈旧。教学方面仍然沿袭传统教学模式较多，以课堂教学为主，忽视了学生个性和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并提出了今后改进的意见。^[32]

李辉通过对比发现，高校体育课利用 GIF 动画教学，能够使学生在大脑中建立直观的动作模型，使学生形成一个完整、清晰、准确的运动记忆，可使体育课变得更生动有趣。与传统教学相比，解决了学生在课堂上转瞬即逝的教学问题，同时为学生课后复习提供了参考和标准，不断重复的动作加深了学生对动作运行轨迹的记忆和感觉，提高了学习效果。^[33]

此外，马国震等的《河北省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对普通高校体育课程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对影响高校体育教学质量的因素进行了探讨，为河北省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改革提出了对策与建议。^[34]杨天宇的《基于翻转课堂的乒乓球理论课教学设计》对乒乓球理论课程的主要环节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法进行了探讨。^[35]

（三）体育经济学研究

王晓军等指出，“互联网+”已经深刻融入到人类经济社会，成为一种创新引擎，其与体育及关联产业深度融合，扩大体育及关联产业的延伸范畴，推动关联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为其融合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作者认为，“互联网+体育”是对体育及关联产业的发展模式的

一场深刻变革，将“互联网+”独特性质嫁接到体育关联产业发展过程中，为体育及关联产业的融合发展带来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产业融合的主导模式上，即科技创新主导融合、个性需求主导融合、产业重塑主导融合以及模式创新主导融合。促进“互联网+体育”关联产业融合生态系统构建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打造体育及关联产业全面化信息服务平台；二是建立“互联网+体育”关联产业增值服务体系；三是完善“互联网+体育”关联产业融合的政策体制；四是健全“互联网+体育”关联产业融合生态系统的保障体系。^[36]

刘娟指出，在中国步入多中心治理时代和现代体育运营方式转型的背景下，冰雪体育服务供给面临冰雪制造业的供给侧改革、体育供给主体利益博弈失衡、智慧冰雪体育平台难以整合、冰雪体育服务供给机制缺失、冰雪生态资源保护不力等多种困境。实行多中心治理模式将通过延伸冰雪产业链，更新政府购买机制，拓宽供给融资渠道，打造“互联网+”智慧平台等路径创新现有供给模式，同时促进区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作者认为，多中心治理视域下的冰雪体育服务供给模式创新，既涵盖了冰雪体育产业改革，又涉及区域新经济增长点的引爆与产业结构升级，在完善冰雪体育服务供给的过程中，不仅有助于当前供给市场多元竞争机制的完善，倡导的多中心治理、多主体供给、多方参与监督的模式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拓宽民众对冰雪健身需求的选择空间，增加冰雪体育服务供给的产品总量，并成为扩大内需、产业调整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全新动力引擎。^[37]

王海军等以经济学和体育学为基础，运用 SWOT 分析理论对河北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价值日益凸显和政策支持等是河北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发展的劣势与风险是产业链不完整、融资渠道单一、产业规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专业人才匮乏等。作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具有体育产业和文化产业双重属性，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不仅能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自信，还能丰富体育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体系，提高体育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38]

许朋展等对秦皇岛市马拉松赛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建议政府要进一步结合城市特色,加大赛事的推广力度,提高后勤医疗保障能力,注重与媒体合作强化品牌传播效应,加强赛事组织的严密性,进一步提高赛事的吸引力及影响力,为秦皇岛市打造体育名城而努力。^[39]

在运动训练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有:张萍萍等的《大运动量期间补充黄芪饲料对小鼠身体功能恢复的影响》^[40]、韩志芳等的《河北省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培养研究》^[41]、马啸飞的《乒乓球运动员的核心力量训练方法》^[42]等。

(常彦君:廊坊师范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 [1] 黄璐,邵锦梅,梅景景.从读者视角看体育学术期刊新变化[J].青年记者,2018(06).
- [2] 葛艳明,米珊.论体育赛事报道中竞技性与娱乐性的均衡[J].传媒,2018(06).
- [3] 白贵,王太隆.体育赛事机器新闻写作的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以腾讯“机器人NBA战报”为例[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11).
- [4] 马笑楠.微电影视角下河北体育文化传播研究[J].传媒论坛,2018(12).
- [5] 刘敏涛,云鑫,张红玉,赵新平.长期健身锻炼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03).
- [6] 崔雪梅.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社区与城中村体育组织发展差异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18(03).
- [7] 左群,段梦双,吴凡凡,刘维伟,魏芳,郭雪山,刘辉.基于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的社区老年人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8(04).
- [8] 孙屹立,冯海涛.河北省农村居民参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01).
- [9] 赵华恩,常丽超,李曙刚.河北省农村体育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及实践路径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8(12).
- [10] 张英媛,赵赓,刘思延.脱贫攻坚下河北省脱贫村留守老人健康干预效果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8(08).
- [11] 张少卿,陈志华,赵禹,陈龙浩.基于体育伦理视域分析《体育法》的修订及完善[J].科学大众,2018(05).
- [12] 马昆,马春英,李敬,闫新红,李永发.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省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对策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8(03).
- [13] 蓝涛.社会治理背景下竞技体育有限自治的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01).
- [14] 秦双兰.动商文化脉络的历史溯源[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
- [15] 陈汉英.约翰·洛克的教育理念对我国体育教育的启示[J].科技风,2018(11).
- [16] 秦双兰,马天龙.中国新石器时代体育发展流变——以中原地区为主线[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8(05).
- [17] 孙宏茹,付敬之,毕卫华,刘汝丰.河北省3岁~6岁幼儿体质健康状况调查及提升策略研究[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05).
- [18] 谭玉霞,崔冬雪,高峰刘建立,李艳军,贾文莉,李亚光,王珊珊.河北省部分城市老年人体育锻炼与生活幸福指数的相关性[J].中老年学杂志,2018(02).
- [19] 郭杰,迟桂军,尤婧玮.河北省城镇居民在雾霾天气下体育需求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状况(请作者核实并补充)
- [20] 张文亮,杨金田,张英建,王书彦,郝秀君.“体医融合”背景下体育健康综合体的建设[J].体育学刊,2018(11).
- [21] 王青涛,范璐颖,冯东来,翟西顺.医学基础指导下中老年体育锻炼的研究[J].魅力中国,2018(11).
- [22] 赵化雨.多媒体动态图示引导法在足球脚内侧踢地滚球技术教学中的实验研究[J].青少年体育,2018(06).
- [23] 靖桥,李京航,李永平,孙萍.高校弱势体育群体精准帮扶之研究——以河北省部分高校为例[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8(02).
- [24] 杨士利.河北省中小学生开展休闲跑酷前期的发展前景[J].运动,2018(05).
- [25] 李荣薇,李军.健身气功·八段锦对男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实验研究[J].智库时代,2018(10).
- [26] 赵化雨.录像反馈教学在高校排球课传球技术教学中的应用[J].青少年体育,2018(05).
- [27] 王海军,陈庆合,李曙刚,许朋展.我国运动康复专业人才培养与职业能力框架分析[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8(09).
- [28] 曹英,尹海.学校体育教学中常见的问题链与矫正措施[J].教学与管理,2018(06).
- [29] 赵化雨.运动视频分析软件在羽毛球技术教学中的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8(06).
- [30] 陈军,黄海,刘章娟,徐伟龙.中考体育前抛实心球项目运用阻力带训练方法的实验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8(03).
- [31] 崔冬雪,杨红涛.爬行运动改善四年级小学生脊柱形态实验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8(05).
- [32] 李曙刚,王海军,张献辉,尚宁宁.“健康中国”视域下的河北高校公共体育教学改革研究[J].科技资讯,2018(07).
- [33] 李辉.高校体育课采用GIF动画教学方法改革的实验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8(10).
- [34] 马国震,邢雅涛,夏志伟,黎雨薇,张玲.河北省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8(05).
- [35] 杨天宇.基于翻转课堂的乒乓球理论课教学设计[J].数码设计,2018(09).

- [36] 王晓军,王浩,赵红美,张海鹰.“互联网+体育”关联产业融合发展生态系统构建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8(04).
- [37] 刘娟.多中心治理视域下冰雪体育服务供给创新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8(12).
- [38] 王海军,王忠文,李琼.河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J].当代体育科技,2018(04).
- [39] 许朋展,王婷,王玉扩,张丽,康健,常丽超.马拉松赛对秦皇岛市城市发展影响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8(01).
- [40] 张萍萍,张晗,蔡继云,张红玉,王枫.大运动量期间补充黄芪饲料对小鼠身体功能恢复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06).
- [41] 韩志芳,张晖,段斌.河北省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培养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8(10).
- [42] 马啸飞.乒乓球运动员的核心力量训练方法[J].丝路视野,2018(03).

河北专题研究

河北经济建设研究

高智 梁世雷

2018年,河北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紧跟全省经济发展形势和重大战略部署,围绕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了众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对策措施,研究思路不断创新,研究方法日益多元,研究内容更加丰富,为推动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经济转型研究

(一) 经济高质量发展

郭瑞东认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必须重视先进标准体系建设,用先进标准引领质量提升。一是抓好顶层设计,制定实施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建立重大问题领导决策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联席工作机制;二是重视经费保障,统筹安排标准化工作专项经费,探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经费保障和投入机制;三是加强法治保障,制定相关标准管理办法,促进市场环境的改善和规范;四是培育专业人才队伍,鼓励相关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合作,联合开展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支持各类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进行人才学习交流,加强对企事业单位技术人员的培训。^[1]

颜廷标指出,河北要牢牢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对接京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向深度广度拓展,提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自觉性。

具体来看,一是突破“行政区经济”束缚,在协同发展中构建京津冀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着眼高质量发展,将产业链每个环节都提升为高附加值的产业;三是强化协同观念,在发展中实现共建、共享、共赢;四是积极主动作为,在推进协同发展中加快发展自己。^[2]

颜廷标认为,河北应从实际出发,着眼区域竞争新趋势、环境建设新需求,着力打造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一是着眼吸引、聚集人才和创新团队,打造适应高层次人才发展需求的高品质服务环境;二是着眼引导培育壮大创新型企业,完善服务创新型企业发展的专业技术服务体系;三是着眼促进创新创业,整合相关政策并强化落实,形成合力;四是着眼便利、高效、低成本,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五是着眼营造创新创业氛围,培育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社会文化;六是着眼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营造便民利民、规范有序的消费环境。^[3]

靳志英指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在高质量发展中重塑河北优势,必须以雄安新区和张北地区为引领,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导向,以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为契机,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目标,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为突破,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在重塑河北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开放优势、营商环境、生态环境和人民幸福感上狠下功夫。^[4]

颜廷标指出,河北正处于历史性窗口期和战略性机遇期,必须充分认识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顺利实现转型升级。要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发展思路、确定目标规划、制定政策措施;在考核上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要求,淡化经济增长的数量要求,更多关注是否实现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更多关注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最终成效。^[5]

(二) 产业转型升级

颜廷标认为,河北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矛盾与新问题,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应明确思路,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环节,汲取先进经验,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战略机遇,尽快构建创新驱动型现代产业体系。一是明确产业发展定位,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二是打造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吸引聚集高端要素;三是突出区域特色与创新重点,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四是精准利用产业与创新政策,支持产业做强做优。^[6]

陈璐认为,河北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大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结合实际、系统谋划、精准施策,重点从以下方面发力:一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强顶层设计,找准发展方向,明确总体要求、推进路径与措施;二是坚持“存量变革”和“增量崛起”并重,推动产业新旧动能的完美接续和高效转换,努力做到坚决去、主动调、加快转;三是构建促进新动能培育壮大、传统动能改造提升的制度环境,激发和释放新旧动能转换的动力、活力和潜力;四是推进新型平台建设,构建新旧动能转换的平台支撑体系;五是持续优化提升创业环境、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不断完善激励干事创业的长效机制。^[7]

刘二亮等人提出了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在投入期,政府要增加财政投入,与企业一起分担创新风险;企业要增强资源配置和整合能力。在增长期,政府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的方式支持企业创新,通过中介和担保方式引导金融投资创新企业;企业要积极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在成熟期,政府要出台政策鼓励技术创新,保护企业技术创新成果;企业

生产要积极从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环节和营销环节转移;高校和科研机构要根据企业用人需求调整学生的培养方案。^[8]

石亚碧就雄安新区建设中处理好高新高端产业和传统产业关系,实现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提出以下措施:一是以雄安新区为龙头,按照高端高新产业和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的基本框架,调整产业布局,拉开发展构架,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创新资源,将雄安新区打造成现代产业体系的标杆和中国样本;二是对原本地产业进行筛选,实行分类疏导、组团集聚;三是对原本地服务业进行整体改造提升,以新理念和新技术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9]

郑红玲等人对河北省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及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有助于经济结构改善;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存在转移和释放的空间,第三产业就业弹性大于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有利于增加就业;就业结构优化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被动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稳增长形成较大压力;经济增长对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较大且长远,调结构对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10]

二、产业发展

(一) 现代农业

关于农业现代化。彭建强认为,要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调整农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加快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驱动农业创新发展。对此,一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二是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激发创新潜能和创新积极性;三是加强农业科技推广,推进农业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普及应用;四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培育更多新型职业农民。^[11]

陈建伟指出,河北省正处在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交汇期,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的融合正在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这为改造提升传统农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应抢抓这一历史机遇,以信息化全面提升农

业现代化水平。一是突破农业信息化关键技术,提升生产智能化水平;二是推进农业产业链信息化建设,提升经营网络化水平;三是加强电子政务建设,提升农业管理数字化水平;四是健全产业安全信息体系,提升监管信息化水平;五是增强农业信息基础支撑,提升服务在线化水平。^[12]

陈建伟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探索农业产学研深度融合新模式,提升农业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一是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的统筹协调,引导产学研一体联动和“一盘棋”发展;二是协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农业产业体系内外科技人员、技术研发和产业推广间的关系,实现科技创新上下衔接贯通;三是建立健全创新主体间联动机制,保障各创新主体步调一致、形成合力;四是建立健全人员进出、考核与激励机制。五是研究出台配套政策,为农业转型升级、科技进步提供有力保障。^[13]

彭建强认为,要加快推进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建立健全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保障机制。一是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体制机制保障;二是健全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包括标准体系、检验检测体系、认证体系、监管体系和市场准入制度等;三是加快形成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完善制度环境,以政策激励和制度约束保障质量兴农战略的深入实施。^[14]

吴晓艳认为,以绿色思维推进农业现代化,就要用绿色理念指导农业现代化,用绿色增长评价农业现代化,用绿色技术保障农业现代化。^[15]徐宁等人从一二三产业融合入手,提出了依托“第六产业”推动河北农业现代化创新发展的新途径,一是加快园区示范;二是加强科技支撑;三是结合乡村振兴,推动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四是创新保障体系。^[16]

冯雪芹等人认为,新时代经济下推动全省现代农业发展,应在以下方面着力: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和品牌引领,提升有效供给能力;充分挖掘利用资源优势,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现代农业物质基础;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强化现代农业人才支撑。^[17]

刘刚等人认为,河北发展高产高效生态农

业,要增强京津向河北转移对接农业产业的驱动力,推动优质农业经济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建设服务京津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做好农业生态环境修复与保护。^[18]张凡等人提出了家庭农场的财政支持策略:一是推动家庭农场认定法制化,规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二是推动土地流转补贴系统化;三是推动基建补贴与技术补贴项目化,完善补贴的项目类型。^[19]

穆兴增认为,现代都市型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有力支撑,其发展中所体现的城乡融合、农旅一体、“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同步、“三产”(一二三产业)融合等先进理念,非常契合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对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建议:一是完善体制机制,强化融合发展理念;二是科学制定规划,对接引领乡村振兴;三是明晰功能定位,合理布局现代都市型农业。^[20]

关于农产品物流。樊俊花等人认为,“农超对接”条件下生鲜农产品集约化流通发展,一是要大力推广“新农村”建设与“家庭农场”农业模式,建设现代化农业体系;二是通过集约化流通主导的“农超对接”,提升流通效率、保障流通收益,提升农产品价值。^[21]

关于农业品牌化发展。陈建伟认为,在新时代推进河北省农业品牌建设,应统筹各类资源做好创建品牌、提升品牌、保护品牌三篇文章。一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禀赋,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把握市场脉搏,创建更多具有河北特色的农业品牌;二是从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入手,持续改善农产品品质,不断提升品牌价值;三是要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协同保护好农产品品牌^[22]。闫博慧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提出了农产品品牌发展的创新模式:一是完善农产品品牌立法、执法;二是强化农产品品牌主体培育;三是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23]

关于种植业发展。冯雪芹指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河北省粮食作物种植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生产规模上,经济作物种植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生产效率上,但总体上看,两类作物生产的国内竞争力整体不强。为此建议:一是强化粮食生产科技支撑,提升优势粮食作物品质;二是在

稳定粮食产能前提下,适度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三是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作物,以品牌引领种植业转型升级。^[24]

刁广付等人认为,河北省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断上涨,粮食价格出现下跌,工农业剪刀差不断扩大,农民种粮经济效益变差,农业生产变得不稳定。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规模化经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二是对生产化肥、机械、农药的企业实施减税、补贴政策,降低农业资料的销售价格,减少农业生产成本;三是制定合理的粮食支持价格政策,对农民进行价格补贴;四是发展农产品价格保险和收入保险,保障农民最基本的收入。^[25]

关于蔬菜产业发展。王东平等人提出了促进河北省蔬菜产业发展的路径。一是创新发展模式,促进产业提档升级;二是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区域布局;三是严格生产标准,提升产业质量效益;四是强化科技支撑,提高品牌影响力;五是保障质量安全,强化产业链质量管控。^[26]

宗义湘等人认为,要实现河北蔬菜产业结构优化和提档升级,应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及北京冬奥会筹办的重大机遇,以提升市场竞争力为目标,以强品牌、优结构、提品质、降成本为路径,建设主导品种规模产区和特色蔬菜优势产区,扶持规模经营主体,培育规模运销集团,建立布局区域化、组织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发展绿色化、经营品牌化的“五化发展”产业体系。^[27]

(二) 先进制造业

关于制造业发展。李会霞认为,河北推动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应紧扣新时代要求,改革创新、苦练内功,不断提升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一是强化技术创新引领作用,激发高质量发展原动力;二是加快数字化融合与转型,注入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三是加强质量品牌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形象;四是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构筑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五是推进对外开放合作,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28]

宋宁基于信息生态平衡视角,就如何推动河北省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了建议:一是增加信息服务业投入力度;二是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三

是提升信息人才的综合素养。^[29]靖鲲鹏等人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就“大智移云”背景下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提高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应大力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和信息化进程,加强对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支持力度,促进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融合发展。^[30]

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贾晓松认为,河北新能源汽车产业有一些发展根底,但基础相对薄弱,离开政府政策补助支持,将面临成本过高、利润过低、技术研发资金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建议:一是政府要加强对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支持,扩大对新能源汽车采购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汽车项目提供信贷支持;二是企业要加大对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研究,加强技术力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学以致用;三是对新能源汽车生产层层严格把关,做好产品合格检验工作,从而获得市场对企业的认可度。^[31]

李巧、董绍辉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识别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并对其进行改进,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影响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分别为综合创新、人才、产业生态圈、政策环境、融资渠道以及产业园区。^[32]

关于钢铁产业发展。戴维旺、蒋秀兰提出了河北省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的对策,一是积极倡导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二是建立健全钢铁产业绿色转型的动力机制;三是积极推动绿色技术创新。^[33]任立媛、赵莉认为,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河北省钢铁行业发展应提升产品质量,加强政策引导,加强人才引进,做好职工安置。^[34]武青等人认为,雾霾下河北省钢铁行业发展应压减钢铁产能,调整钢铁布局,优化组织结构,提升设备水平,加强技术创新,让钢铁产业生产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市场需求相适应。^[35]

关于煤炭产业发展。李忠华等人提出了“去产能”背景下河北省煤炭产业发展思路,即通过推动煤炭产业绿色发展,推进煤炭产品深加

工,搭建产学研平台,发挥好煤炭企业的主体平台功能,加强煤炭及相关产业的整合,做好产业风险控制,实现煤炭开采及加工利用的安全、绿色和高效。^[36]王健伟、孙艳文提出了提高河北省煤炭产业盈利能力的建议,一是提高煤炭产业资产使用效率;二是加强煤炭产业成本费用控制;三是增强煤炭产业偿债能力;四是提高煤炭产业收入利润率和市场占有率;五是完善煤炭产业财务管理制度。^[37]

(三) 现代服务业

白玉芹认为,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必然选择。河北省要紧紧紧抓住互联网发展新机遇,重点从以下方面推进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一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重点产业有序发展;二是推动重点企业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三是构建完整的互联网产业生态体系;四是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38]

关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耿卫新认为,河北省要实现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强省的跨越,着力点就是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重点应从以下方面下功夫:一是政府部门加强科学规划,做好顶层设计;二是集中精力、资金打造一批资源禀赋好、发展潜力大的文化旅游品牌;三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有机融合催生新业态,运用设计与创意,提供适销对路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四是精心设计开发一批有创意、有区域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产品;五是坚定不移实施重点项目带动战略,着力打造文化旅游精品景区和线路。^[39]

王倩提出了河北省旅游文化新媒体影像传播对策:一是强化旅游文化官方传播平台影响力;二是推进旅游文化的新媒体影像微传播;三是围绕主题旅游资源,确定新媒体影像传播内容。^[40]赵风华、陈立秀认为,河北省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路径:一是深入挖掘旅游资源内容和文化内涵;二是加强红色旅游资源与民俗文化融合;三是建立旅游规划与管理联动机制;四是构建红色旅游生态系统。^[41]

关于乡村旅游发展。周明勇等人认为,推动生态交通导向(TOD)的雄安周边乡村旅游区域规划法治化,应根据责任权利效益相统一原

则,完善生态会计、统计和审计法治制度,建立城市规模及功能与自然生物发展和谐相处的规划制度,建立规划民事责任保险制度。^[42]李国庆从社区参与角度提出了乡村旅游利益协调机制的优化策略:一是建立以签订契约、股权分红为内容的利益分配机制;二是完善以转变政府职能、赋予社区居民话语权为内容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健全以心理增权、社会增权为内容的社区增权机制。^[43]

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李冉等人认为,打通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行政壁垒,实现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有效对接与协同发展,应采取以下路径:一是以适应文化创意产业专业型发展为目标的人才培养共享路径;二是以提升文化创意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的资源整合共享路径;三是增强文化创意产业资金保障为目标的投融资共享路径;四是以保障文化创意产业知识产权为目标的政策共享路径。^[44]

刘颖辉、尹启星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推动邯郸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应建立层次完善的合作机制,建立能与京津承接的下游产业,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进和培养文创产业优秀人才,加大邯郸传统文化的再造力度,创建邯郸地方特色优势品牌。^[45]

关于体育文化产业发展。邢雅涛等人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河北省培育体育文化产业品牌,一是优化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培育良好的文化市场;二是建立和完善投融资政策体系,广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资金渠道;三是加强体育文化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积极推动体育文化产业的科技进步。^[46]王海军等人运用SWOT分析理论对河北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进行研究,认为,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价值日益凸显和政策支持等是产业发展的优势与机会,产业链不完整、融资渠道单一、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专业人才匮乏等是产业发展的劣势与风险。^[47]

关于现代物流产业发展。齐美然、郭子雪认为,促进河北省物流产业升级,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继续加大对港口、铁路、公路等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不断完善运输硬件条件,提高区域物流需求承载能力;二是制定河北省区域物流信息化平台建设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加快“物流河北”信息服务平台和省市两

级物流信息平台建设；三是加大物流产业研发投入，鼓励物流企业自主创新；四是重视和培养现代物流专业人才。^[48]

关于金融产业发展。杨蕾认为，雄安新区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要走在国内和国际前沿，需探索构建新路径：一是构建“分工—合作”的绿色金融格局；二是明晰绿色金融主体角色定位；三是综合运用多种绿色金融工具，如强化绿色信贷实施过程、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发行绿色债券等；四是创造良好的绿色金融环境，如建立绿色金融政府政策扶持机制、打造绿色金融人才集聚高地、降低绿色项目融资成本等；五是完善绿色金融服务，如发展多样化第三方机构、构建多重绿色评价体系、建立广泛的绿色信息共享机制等。^[49]

三、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

(一) 产业协同

岳志春、张晓蕊认为，京津冀地区承担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随着京津冀现代化产业版图亮相，必须破解产业协同发展面临的困境。为此建议：一是完善京津冀产业协同合作机制，强化发展顶层设计；二是加快发展功能性区域中心城市，合理分配资源；三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50]

刘艳、郑杨认为，在非首都功能疏解背景下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快速优化产业转移的制度环境；必须发挥市场在产业转移中的基础性作用，尽快建立产业合作的动态关联机制；必须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大力提高产业承接的融资信贷水平；必须注重产业创新和产业变迁的生态性和可持续性。^[51]

谷彦芳等人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下产业转移税收分享政策，涉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京津冀三地政府之间的关系，既需要三地政府之间有效协商和协调，也需要中央政府进行有效干预。因此，应构建涉税争议协调机制，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分支机构实行属地纳税，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建立统一的税收征管制度，建立统一高效的税收征管体制，建立成本分担机制。^[52]

颜廷标指出，京津冀产业协同已经有序开展

并取得一定成效，但三地的产业分工定位及实现机理这个涉及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研究透，也没有解决好。为此建议：一是放松政府管制，促进要素市场化流动；二是创新产业协同模式，构建区域利益共享机制；三是构建现代产业组织，促进要素在产业组织内流动；四是提升管理机构能级，建立区域协同制度；五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要素流动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53]

陈永昶、王玉成指出，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呈现典型的“非均衡协同”特征，京津冀三地尤其是河北省，必须及时抓住智慧旅游的发展机遇，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智慧旅游发展路径。^[54]李延军等人认为，京津冀区域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比较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北京市和天津市作为京津冀区域的增长极，对其周边城市存在着辐射效应，但还不能对河北省整体形成强有力的辐射。因此，京津冀应加强区域金融协同发展，降低金融壁垒，进而促进区域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55]

(二) 协同创新

王秀芳等人认为，构建京津冀科技金融平台，应发挥政府在科技金融平台建设中的引导作用，三地联合创建科技金融服务公司，专门负责科技金融平台运营，形成政府主导型科技金融平台；同时应设立三地联合的科技创新引导基金和科技信贷担保公司，建立科技金融服务公司资金引导机制和融资风险分担机制。^[56]

孙丽文等人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京津冀协同创新能力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显示：京冀和津冀协同创新水平逐步攀高，但同京津冀、京津依然存在差距。协同创新程度排序由高到低为京津、京津冀、津冀、京冀。京津冀协同创新差距大是外在表现，内部不协调才是根本。应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协调分工合作、建立共享机制、提升成果吸收能力等促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57]。

刘洁、刘翠君认为，推动 PPP 在京津冀科技创新领域的应用，应构建良性的投资机制，拓展合作范围；构建完善机制，实现科技成果转化。^[58]胡书金等人认为，技术转移需要有产业基础，需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需要政府扶持和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京津向冀的技术转

移有其特殊性,设立国家级新区作为技术转移的集中载体是实现京津冀在技术进步上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59]

张贵、李涛对京津冀城市群创新活动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群创新产出地理集聚特征明显,空间分异显著,京津存在虹吸效应,城市群不存在收敛特征;R&D经费支出、经济密度、第三产业占比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创新产出均有正向影响,但存在空间异质性,同一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对创新的影响不同。因此,不同地区应根据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采取不同政策措施促进地区创新水平提升,缩小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空间分异。^[60]

刘兵等人指出,京津冀科技创新人才集聚、科技创业人才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科技创新人才集聚主要通过财力投入、创新成果产出影响区域经济;创业人才集聚主要通过科技创业主体、科技创业环境影响区域经济;北京的科技创业资源明显优于津冀,但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却弱于津冀。^[61]邢会等人认为,京津冀政府应加强统筹协调,引导集群式产业链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62]

四、数字经济

杜欣认为,当前河北省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重要关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河北应结合实际,牢牢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举措,着力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一是在存量上求“精”;二是在增量上求“深”;三是在企业管理上求“变”;四是在基础建设信息集汇上求“汇”;五是在政策支持上求“实”。^[63]

王菲认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一是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二是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着力在数字经济创新体系、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治理体系建设上谋篇布局;三是要以跨境电商、数字贸易为重点,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识别等一系列新

技术为突破口,将数字经济融入传统产业创新和优化升级的各个环节;四是要以“云”和“数”为核心,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企业大脑”,加速实现智能制造。^[64]

杜欣指出,河北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一是加快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着力打造廊坊京津冀大数据总部基地、张家口数据存储基地,建设大数据应用示范区;二是加强基础数据资源规划,建设统一的公共数据中心;三是全面推进大数据在政府治理和民生服务领域的应用,积极推进大数据在产业发展与对外开放中的应用;四是吸引聚集一批大数据服务企业,构建面向京津冀、覆盖全国的大数据产业集群;五是健全和完善大数据安全法律法规,加大对技术专利、数字版权及个人隐私等的保护力度。^[65]

杜欣认为,河北贯彻落实国家大数据战略,要从基础做起,把数据中心建设做实;要立足省情,抓好大数据常规应用;要创新管理体制机制,让大数据确实能指引决策。具体来看,一是构建大数据开放共享机制,为引进、培育大数据企业创造良好条件;二是提升政府数据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推动相关行业发展;三是积极发展大数据相关的新业态和新行业;四是培育大数据交易市场;五是加强大数据相关技术的研发;六是完善大数据隐私保护体系;七是制定完善大数据人才储备政策。^[66]

朱立新认为,河北作为制造业大省,要巩固和增强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必须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加速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一是补齐制约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短板;二是加强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全局规划与顶层设计;三是夯实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四是聚焦重点、瞄准需求,在关键技术上实现新突破;五是积极营造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良好环境。^[67]

五、科技创新

宋东升认为,以全球视野谋划推动科技创新,必须充分把握科技发展大势,全面把握科技创新形式的多样化特征,借八方之力,着眼世界科技和产业竞争进行创新布局。重点解决好以下

几个基本问题：一是把握国际科技创新规则，构建开放型国际科技合作新体制；二是从实际出发布局搭建开放式全球科技创新平台；三是因事制宜推进开放创新；四是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68]

张学海认为，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共享经济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必须加快众创空间建设，更好地激发“双创”活力。一是加强众创空间的顶层设计和分类管理；二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供多层次资本市场对接服务，完善支持众创空间发展的法律体系，营造众创空间发展的良好环境；三是优化众创空间服务人才生态体系；四是大力弘扬敢于创新、不怕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五是加强区域众创空间协同发展。^[69]

孙宏滨指出，河北省优化营商环境必须紧紧围绕创新创业的本质特征和需求特点，在解决影响创新创业的突出问题和关键制约方面下功夫。一是继续转变行政理念，由科技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二是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增强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的能力；三是加强智慧政务工程建设，推动精准管理；四是搭建征信平台，营造诚实、自律、守信、互信的社会信用环境；五是建立优质公共服务，增强区域创新发展的吸引力；六是推动协同创新，主动与京津在人才、规则、监管机制等方面加强对接。^[70]

郭瑞东认为，对河北来讲，加快提升创新能力，促进转型升级，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是重要途径和抓手。为此建议：一是以市场需求为核心，建立以“用”为导向的创新要素融合新机制，进一步明确产学研用合作的工作重点和着力方向；二是综合考虑区位特征、创新要素基础、产业结构等实际情况，创新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合作模式，丰富产学研用合作内容；三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产学研用合作机制；四是搭建合作创新平台，健全中介服务体系。^[71]

王晨等人认为，促进河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专利运营，应科学评估授权专利的稳定性以及专利价值，加强专利运营的全过程管理，建立运营机构或委托服务机构，加强信息平台建设，配套专利运营监督机制^[72]。路秀平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从宏观层面，需进一步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满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从微观层面，需进一

步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服务措施，释放科研成果巨大潜力。^[73]

孙丽文、郭竞认为，提升河北省创新平台运行效率，一是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推动科技设施从“小孤岛”成为“大资源”，促进平台间、地区间仪器设备的共享、人才的流动，提升资源的协调能力和配置效率；二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增强平台科研成果的市场导向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成为产业发展和经济效益。同时，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实施技术“走出去”、人才“引进来”战略。^[74]苑秀娥、王佳伟人认为，提升河北省科技创新能力，应继续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不断引进国内外的优秀人才，推动产业升级并发展优势产业。^[75]

六、企业发展

张春霞、彭东华认为，利用近邻京津区位优势，借助供应链资源优势，以供应链相关企业信用为保证进行供应链内部和外部融资，是解决河北省小微型企业融资难的创新型模式之一。为此建议：一是利用小微型企业的未销售产品、订单、应收账款等，从供应链上核心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等处获得所需资金，提高供应链企业为小微型企业融资的能力；二是建立技术先进、运行良好的供应链融资信息平台；三是建立小微型企业融资风险动态评估管理体系，进行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76]

赵莉、任立媛提出了互联网金融下河北省初创型科技中小企业融资策略，一是充分利用互联网金融，创新融资模式；二是提升企业自身发展水平，增强融资能力；三是加强监管，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77]王换娥等人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对策：一是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法律体系；二是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财政投入和资金支持；三是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四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规范企业管理制度，提高企业信用等级，提升企业自身实力。^[78]

李素红等人认为，互联网融资平台能够提高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融资成功率，解决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应从互联网金融角度出发，创新性地加入区域创投机构，构建多方参与的科技型小微企业互联网融资平台。要完善科技型小微企业互联网融资平台，加强参与主体协调性，建设

培育指导机制;要丰富平台功能,健全风险控制机制;要加强征信体系建设,完善信用评价机制。^[79]

七、外向经济

王建华认为,加快建设高水平境外产业园区,应以顶层设计明确发展方向,以战略对接夯实发展基础,依托经济走廊优化园区布局,围绕关键区域明确发展重点,借助合作机制拓展发展空间。同时,要针对现有制度缺失的环节,围绕境外产业园区的制度创新、制度供给方式、保障条件、保障形式等,构建统一高效的多层次政策体系,为境外产业园区发展提供清晰制度安排与稳定政策保障。要围绕境外产业园区拓展融资渠道、创新金融产品、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防控海外风险,确保在风险可控、商业可行的前提下,以更为高效灵活的金融手段满足境外产业园区快速发展的金融需求。^[80]

闫永路指出,河北省海洋经济发挥着培育新动能、壮大新产业、引领新发展的重要作用。加快河北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奋力开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从河北省实际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积极培育新动能,加速新旧动能转换;二是加快海洋经济结构优化,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三是加强海洋环保工作,打造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四是完善海洋经济政策体系,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保障。^[81]

(高智: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梁世雷: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郭瑞东.用先进标准引领质量提升[N].河北日报,2018-01-12.
- [2]颜廷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推动高质量发展[N].河北日报,2018-04-11.
- [3]颜廷标.打造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N].河北日报,2018-08-10.
- [4]靳志英.河北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的战略思考[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14).
- [5]颜廷标.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N].河北日报,2018-01-05.
- [6]颜廷标.加快构建创新驱动型现代产业体系[N].河北日

报,2018-06-08.

- [7]陈璐.推动我省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力点[N].河北日报,2018-08-15.
- [8]刘二亮,纪艳彬,于敏.基于协同创新的河北省产业转型升级研究[J].北华航天工业学报,2018(5).
- [9]石亚碧.雄安新区建设要处理好高端高新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关系[J].经济论坛,2018(7).
- [10]郑红玲,刘肇民,鲁丽丽.河北省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联动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2).
- [11]彭建强.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N].河北日报,2018-07-13.
- [12]陈建伟.以信息化加快推进我省农业现代化[N].河北日报,2018-07-18.
- [13]陈建伟.加快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N].河北日报,2018-11-02.
- [14]彭建强.坚定不移走质量兴农之路[N].河北日报,2018-02-09.
- [15]吴晓艳.以绿色思维推进农业现代化[J].人民论坛,2018(6).
- [16]徐宁,张丽云,邸明慧.以“第六产业”推动河北农业现代化途径研究[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8(2).
- [17]冯雪芹,李梦影,陈薇.河北省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及政策着力点思考[J].经济理论与实践,2018(4).
- [18]刘刚,耿玉霞.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河北发展高产高效生态农业探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11).
- [19]张凡,牛要聚.发展家庭农场的财政支持策略与制度保障[J].改革与战略,2018(8).
- [20]穆兴增.加快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N].河北日报,2018-09-14.
- [21]樊俊花,张志红.“农超对接”条件下生鲜农产品集约化流通发展趋向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2).
- [22]陈建伟.推进我省农业品牌建设应做好三篇文章[N].河北日报,2018-03-30.
- [23]闫博慧.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农产品品牌发展[J].科学管理研究,2018(2).
- [24]冯雪芹.粮食主产区种植业比较优势及结构调整思考[J].河北大学学报,2018(2).
- [25]刁广付,刁广强,王健.河北省主要粮食成本收益分析[J].农业与技术,2018(17).
- [26]王东平,郭少博.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河北省蔬菜产业的发展路径[J].贵州农业科学,2018(5).
- [27]宗义湘,乔立娟,赵帮宏,申书兴.河北省蔬菜产业形势分析与政策建议[N].河北农民报,2018-04-26.
- [28]李会霞.大力推动河北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N].河北日报,2018-12-19.
- [29]宋宁.基于信息生态平衡视角下创新驱动河北省制造业转型升级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8(3).
- [30]靖鲲鹏,张秀妮,宋之杰.“大智移云”背景下信息服务业与制造业耦合发展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产业经

- 济,2018(3).
- [31] 贾晓松.河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河北企业,2018(11).
- [32] 李巧,董绍辉.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关键因素识别研究[J].河北学刊,2018(3).
- [33] 戴维旺,蒋秀兰.河北省钢铁产业绿色转型战略分析[J].北方经贸,2018(2).
- [34] 任立媛,赵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河北省钢铁行业去产能问题与对策研究[J].纳税,2018(31).
- [35] 武青,刘向宇,王树义.雾霾下河北省钢铁行业的发展现状及问题[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8(7).
- [36] 李忠华,张艳东,陈荫彬.“去产能”背景下河北省煤炭产业发展思路研究[J].中国煤炭,2018(2).
- [37] 王健伟,孙艳文.战略转型期河北省煤炭产业盈利能力研究[J].管理研究,2018(5).
- [38] 白玉芹.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N].河北日报,2018-07-06.
- [39] 耿卫新.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N].河北日报,2018-02-28.
- [40] 王倩.河北省旅游文化新媒体影像传播研究[J].传播力研究,2018(4).
- [41] 赵凤华,陈立秀.河北省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J].才智,2018(5).
- [42] 周明勇,周迈,陈爱江,王嘉璇.雄安为中心的乡村旅游区域生态 TOD 规划法治路径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8(5).
- [43] 李国庆.社区参与背景下乡村旅游利益协调机制探究[J].农业经济,2018(3).
- [44] 李冉,刘颖辉,张晓阳.基于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共享路径研究[J].人文天下,2018(3).
- [45] 刘颖辉,尹启星.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邯郸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18(2).
- [46] 邢雅涛,马天龙,马国震,杨渭祥,张玲.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体育文化产业品牌培育与发展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2018(5).
- [47] 王海军,王忠文,李琼.河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 SWOT 分析[J].邯郸学院学报,2018(11).
- [48] 齐美然,郭子雪.河北省物流产业升级面临的困境与策略分析[J].河北企业,2018(11).
- [49] 杨蕾.雄安新区绿色金融体系构建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2018(1).
- [50] 岳志春,张晓蕊.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障碍及对策[J].人民论坛,2018(29).
- [51] 刘艳,郑杨.非首都功能疏解背景下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问题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19).
- [52] 谷彦芳,王坤,李克桥.京津冀协同发展下产业转移税收分享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46).
- [53] 颜廷标.区域特质、产业分工定位与实现机理——以京津冀产业协同为例[J].河北学刊,2018(3).
- [54] 陈永昶,王玉成.智慧旅游驱动京津冀区域旅游协同发展机理与路径[J].河北大学学报,2018(5).
- [55] 李延军,史笑迎,李海月.京津冀区域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8(1).
- [56] 王秀芳,于濛,程月.构建京津冀科技金融平台的思路[J].经济与管理,2018(3).
- [57] 孙丽文,张蝶,李少帅.京津冀协同创新能力测度及评价[J].经济与管理,2018(3).
- [58] 刘洁,刘翠君.PPP 在京津冀科技创新领域的应用[J].科技经济导刊,2018(33).
- [59] 胡书金,陈正其,刘濛.京津冀技术势差与技术转移的内生机理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8(5).
- [60] 张贵,李涛.京津冀城市群创新产出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8(1).
- [61] 刘兵,曾建丽,梁林,牛楠.京津冀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科技人才集聚的关键影响[J].科技管理研究,2018(3).
- [62] 邢会,朱欢,高素英,臧丽娟.基于集群式产业链的京津冀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8(3).
- [63] 杜欣.着力做大做强数字经济[N].河北日报,2018-06-06.
- [64] 王菲.抢抓发展机遇 做强数字经济[N].河北日报,2018-04-07.
- [65] 杜欣.加快推进河北大数据发展[N].河北日报,2018-01-03.
- [66] 杜欣.落实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河北选择[J].经济论坛,2018(12).
- [67] 朱立新.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N].河北日报,2018-06-15.
- [68] 宋东升.以全球视野谋划推动科技创新[N].河北日报,2018-08-01.
- [69] 张学海.以众创空间建设更好促进“双创”[N].河北日报,2018-04-18.
- [70] 孙宏滨.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创新创业[N].河北日报,2018-05-23.
- [71] 郭瑞东.着力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N].河北日报,2018-08-22.
- [72] 王晨,张冬丽,吴雁超.河北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专利运营对策研究[J].河北企业,2018(2).
- [73] 路秀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路径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10).
- [74] 孙丽文,郭竞.区域创新平台运行效率评价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8(3).
- [75] 苑秀娥,王佳伟.河北区域科技创新指数的构建及评价[J].经济研究参考,2018(22).
- [76] 张春霞,彭东华.河北省小微型企业供应链融资对策研究[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8(3).
- [77] 赵莉,任立媛.互联网金融下河北省初创型科技中小企业融资策略研究[J].经济纵横,2018(31).

[78]王换娥,孙静,田华杰.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及法律对策[J].商业经济研究,2018(5).

[79]李素红,方洁,蔡轶.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科技型小微企业融资平台建设[J].科技管理研究,2018(11).

[80]王建华.“一带一路”区域建设境外产业园区的战略思考[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1).

[81]闫永路.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N].河北日报,2018-05-11.

河北政治建设研究

吴耀明 程瑞山

2018年,河北政治建设研究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紧密结合河北实际,抓住河北政治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围绕优化河北发展环境、乡村治理、政府职能转变、公共财政、打造首都政治“护城河”等主题,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相关研究成果有50多项,关于首都政治“护城河”的研究是一个新选题,进一步丰富了河北政治建设领域。

一、河北打造首都政治“护城河”研究

王东峰围绕打造首都政治“护城河”撰写了系列文章。在《经济日报》的文章中指出,河北省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提出的“四个加快”“六个扎实”“三个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要求,坚持创新竞进、协同融合、改革开放、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改善民生、优化环境,奋力走好新时代河北“赶考路”。要坚决维护和捍卫核心,自觉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全力办好国家大事,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河北的重大使命。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历史机遇,努力开创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新局面。^[1]

在《中国纪检监察》杂志,王东峰撰文指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河北是京畿要地,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是政治之责、为政之要。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扫黑除恶作为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的重大政治任务贯穿始终;把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作为自觉践行“四个意识”、坚决落实“两个维护”的现实检验,作为对党绝对忠诚、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的实际行动;强化责任担当,坚持

五级书记一起抓,把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要求贯穿始终,建立健全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责任体系,持续升级加力,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引向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统筹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坚持一盘棋,打好主动仗,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各负其责、上下贯通、落实有力的生动格局。探索创新“一案三查”的思路和举措,在查办黑恶势力犯罪的同时,既查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和“关系网”“保护伞”,又倒查属地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和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扫黑除恶提供有力保障。探索推行了“一条主线、三条支线”核查办法,即围绕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坐大成势的过程和原因这条主线,沿着党委政府线、政法机关线、职能部门线,顺藤摸根、循线彻查,切实把黑恶势力“保护伞”和腐败问题挖出来、查彻底。^[2]

河北作为农业大省,打造首都政治“护城河”,离不开农村农民。王东峰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谱写燕赵乡村振兴新篇章。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以实施加强乡村社会治理三年行动为抓手,在创新乡村治理机制上下功夫。一是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持续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热潮,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西柏坡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塞罕坝精神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健康向上的正能量。全面开展文明村镇创建行动,完善村规民约,健全红白理事会,培育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二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沉,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加大农村普法力度,完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打造“一

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综合服务平台,全面开展代办服务。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让农民议事决策管事。三是建设平安乡村。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抓好防控体系建设。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农村黑恶势力、村匪村霸、宗族恶势力及黄赌毒盗拐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乡村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建设,采取领导干部包联的办法,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信访问题,着力削减存量,坚决遏制增量,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县、矛盾不上交,坚决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3]

孙杰、杨守勇等人对河北打造首都政治“护城河”进行了介绍分析。指出,河北为更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省委先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扩大)会议,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省委九届五次全会、六次全会作出部署,就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门下发《决定》《通知》和《实施意见》,提出明确要求。面向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多形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培训,明确河北是京畿要地,更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牢固树立“四个自信”,提高政治站位,站稳政治立场,履行政治责任,坚决维护和捍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立身做人的生命线和根本点,体现在时时处处事事,自觉做到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的重要指示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推动党中央重点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效,自觉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以河北之进服务全国大局。^[4]

二、优化河北发展环境研究

栗俊杰、刘邦凡撰文认为,在河北沿海国际城市化建设中,要深刻认识和高度把握环境、开放这两个要素,贯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务实有效地推进河北沿海地区的城市国际化建设。河北沿海城市要建设成为国际化城市,就要进一步下大力气改善和

优化自己的营商环境,要发挥沿海城市、港口优势,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以沿海开放开发带动腹地开放开发,借鉴国内外国际化城市建设成功经验,全方位对标国际城市标准,研究提出河北沿海各市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的标准、路径、方法和实施计划,为中外客商投资和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更加便利的工作条件和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力求把河北沿海各市建设成为全域开放型经济的标杆城市,助力河北省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发展。^[5]

赵树文、张勇提出,推进雄安新区营商环境的构建必须走法治化之路。营商环境法治化是雄安新区创新发展中“政府与市场”两种机制优化组合的必然保障;是雄安新区经济建设过程中“政策引导”到“法治引导”的必然环节;是雄安新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战略建设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应以系统性、创新性以及国际性三大法治原则为指导,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绿色低碳的生态环境、和谐稳定的劳资环境、科学明晰的产权环境以及激励创新的财税环境等七方面为具体路径,推进雄安新区营商环境法治化。^[6]

二、法治河北建设研究

曹哲、蔡欣欣指出,在推进法治河北建设进程中,政府立法、行政决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行政执法监督、行政争议处置等方面所需要处理的工作情况复杂、责任重大、任务繁重,迫切需要发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用,合理合规处置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同时,民主党派成员往往代表或联系着一定的群体和基层群众,掌握基层群众的实际情况、心理诉求,发挥民主党的民主监督作用,有助于推动政府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倾听基层呼声,回应人民群众关切,从法治层面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力和利益。^[7]

陆洲、于晴晴通过对我国17个省份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的比较考察,提出河北省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进路。指出,在立法原则上,应坚持科学决策原则、民主决策原则与依法决策原则;在立法框架和具体内容上,除总则、决策动议、法律责任和附则外,

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分别作为专章予以规定。关键在于界定重大的范围包括重大决策事项范围与主体范围及运用科学的立法技术进行决策程序设计,并且在与中央立法保持一致前提下,充分考虑地方特点,进一步实现立法的精细化。^[8]

包来军、白志秀等人以河北省三个权威法律类网站为研究对象,指出河北法律类网站绩效整体建设水平、访问量稳步上升,知名度逐渐提高,在传播法治信息、进行法治宣传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但服务意识、内容实用性、深度解析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在改善内容供给结构,提高正能量引导力,保障公民监督权,提升群众获得感等方面加强建设。^[9]

王金兰、梅媛认为,河北省环境治理的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粗浅到提高的发展路径,取得了自己的特色和成绩:如公众参与制度、大气污染治理制度等等,在立法技术上具有科学规范的特点,在适用上具有操作性强的特点,在意识上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创新性。但也存在立法主体权限不清、法律制度缺失、滞后等问题。要完善环境立法框架,需要在立法中解决这些缺陷,需要从环保源头到环境损害后果处理,从立法主体到具体制度等方面,健全河北省环境立法,形成环保过程全程化、立法主体层级化、法律制度体系化的法律框架。^[10]

褚冬宁认为,当前河北环境犯罪的现状有三个特点:一是犯罪案件数量激增并且地域性特点突出;二是环境犯罪案件罪名集中且侦破困难;三是全省环境罪案的处罚强度整体偏低。对此,在治理环境犯罪上应当树立及早、从严的理念,监管预防、调查侦办和司法处理都应当秉承这一理念,设计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以实现环境保护的早期化和治理效果的明显化。应通过改善环境监管、罪案查处和司法处理原有的防治机制,提升省内司法机关查处和打击环境犯罪的能力,以实现环境保护的早期化,进而取得环境犯罪治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11]

杨扬、张宝方对 2011—2016 年河北省非法占用农用地案进行了梳理分析。指出,河北省各市的司法机关在打击此类犯罪的过程中存在查处难、打击力度存在差异、惩处力度不足等问题,致使治理效果不佳。应采取以下对策:一是树立

从严、及早、综合的治理理念;二是强化侦查机关查处违法犯罪的能力;三是提升罪案的打击强度和处罚力度;四是做好省内各地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监管和宣传工作。^[12]

范瑞君认为,河北省妇女权益信访集中在婚姻家庭权益、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财产权益三个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信访问题数量增加;二是信访内容多样化;三是信访问题需依法解决;四是妇女缺乏信访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要通过以下途径解决:完善法律保障体系;创新行政方式方法;提高信访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水平;规范妇女权益信访秩序;加强对妇女依法信访行为的引导,切实保障妇女权益。^[13]

刘春松对河北省法院法官员额制改革情况进行考察,总结了河北省法官员额制改革取得的成效。指出,通过改革,河北省法院的工作质效明显提升,审判活动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但也出现了以下困境:一是员额法官的办案压力剧增;二是法官离职现象严重;三是法院领导“一岗双责”压力变大;四是新型审判团队的现实运行没有达到理想效果。提出深化法官员额制改革:一要坚持科学的法官遴选任用制度;二要打造新型的审判团队运行模式;三要健全员额法官办案的保障机制。^[14]

张悦基于对河北省 2014—2017 年 727 份判决书的刑事裁判概况的实证分析,认为贪污犯罪量刑存在量刑结果偏轻、从宽认定量刑情节、单纯的以数额为标准定罪量刑、刑罚结构的设置不合理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司法体制、案外因素、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立法规定不完善等。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法院在判决书中要加强关于从宽处罚部分的裁判理由;二是司法实践中重视“情节”对定罪量刑的影响;三是改善司法环境,对司法人员要加强法律教育,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律水平。^[15]

滕长江、周亮亮指出,沧州市社区治理法治化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尚存法律空白,阻碍社区治理法治化进程;二是职能界定不清,制约社区职能有效发挥;三是缺乏激励机制,未能形成规范有序的员工新旧更替及补充循环机制。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一要健全法治建设,营造健康有序的法治氛围,多措并举培养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提高居民社区

管理事务的主动参与感；二要明确职能范围，提高社区综合管理水平，加强社区工作人员的法律水平及服务管理水平培训，提高其法治管理能力；三要建立激励机制，建立规范社区工作人员录用制度，最大程度保障社区工作人员合法权益，为社区治理法治化发展容蓄人才资源。^[16]

三、基层党的建设研究

李晓辉以邯郸市 W 县的村级党组织为例，通过调查分析村级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一是党员队伍结构不合理，村级党组织缺乏活力；二是村民价值观的多元化与农村党员的“异化”；三是村级两委关系没有完全理顺；四是家族宗族势力影响村级党组织的建设。针对这些问题，应采取下列措施：第一，打造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农村党员队伍；第二，打造新时代“品牌化”村级党组织；第三，构建和谐“两委”关系；第四，对家族宗族势力的影响予以正确引导。^[17]

韩玉霞以博野县程委镇为例，对加强新时代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行研究。指出，目前博野县程委镇农村的基层党建仍然存在着五方面的问题：一是部分党员思想政治意识薄弱；二是领导班子能力素质亟待提高；三是党员队伍管理工作开展不力；四是运行机制和制度落实执行存在缺陷；五是干部作风与工作方式存在问题。为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如下建议：强化理论学习，提升党员思想政治意识；抓领导班子素质能力建设，加强人才选拔培养；规范发展党员程序，加强党员队伍管理；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推进制度落实；改善干部作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8]

魏皓阳通过调研认为，临城县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问题主要有：部分村党组织带头人领导能力弱化、部分党员身份意识淡漠、组织建设不完善、基层组织没钱办事等。提出了三点对策建议：一是对村级党组织加强教育引导，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扶贫脱贫中发挥作用；二是从根源上解决“思想贫困”问题，加大培训力度，提升致富带富能力；三是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激发贫困村脱贫攻坚内动力，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营造良好环境。^[19]

宋金甫、张军指出，石家庄市桥西区立足城市基层党建的现状，突出民意导向，大胆改革创新，

开展了“党建引领、精准惠民，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活动，实现了社区党建由“单打独斗”到“多元参与”、社区事务由“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社区服务由“政府配菜”向“百姓点菜”的明显转变，探索出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路。主要做法有：一是以基层党建为统领，以民生需求为导向，通过居民群众“点菜”、党委政府“买单”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由职能部门“单独定”的“条状为主”，到基层党组织“统筹定”的“条块结合”转变；二是注重主体责任、确定民主程序、广泛征集民意，实现了社区事务从“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的转变；三是通过精准对接，快速实施，实现了社区治理从以往的“大水漫灌”转变为现在的“精准滴灌”。^[20]

四、政府自身建设与职能转变研究

张宇宁对张家口市政府在京张冰雪体育休闲旅游带建设中所应发挥的政府职能进行研究。认为，在目前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市场作用发挥不显著的情况下，张家口市政府在京张冰雪体育休闲旅游带建设中应主要发挥其经济管理职能，从宏观调控角度加强对市场发展的引导。指出，张家口市政府已经发挥了部分经济职能，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提供政策规划支持；二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吸引市场主体进入；四是加强行业市场监管；五是调整产业结构布局。张家口市政府职能发挥还存在四个方面不足：全能政府的职能“越位”、尽责不力的职能“缺位”、针对性缺乏的职能“错位”、多方共管的职能“掣肘”。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科学定位政府职能；二是健全完善政府职能；三是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四是主动加强府际合作。^[21]

于云鹤以河北省威县为例，对权力清单制度试点情况进行分析。指出，威县在权力清单制度改革中存在着：权力运行流程图和责任清单不全面、资金依赖和承接能力不足、权力清单中部分权责依据不适应当前新形势等问题。对此重点要从依法行政的角度，通过建立权力清单制度配套措施、扩大权力清单运行范畴、对权力清单不断规范和传导政府压力、提升下级政府承权能力等多方面进行应对，提高权力清单制度的有效性和

实用性,充分发挥清单制度的自身功效。〔22〕

贾慧对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行研究。认为在审批、监管和配套措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行政审批流程有待规范、相关部门职能转变不到位、办事程序和环节的实际效能不高、监督机制亟待健全、配套措施跟进不足等。其原因在于改革利益协调较为困难、改革方式方法不健全、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束缚等。对此提出以下建议:提高认识,转变政府行政理念;规范审批,建设行政审批标准化;加强监管,健全完善规章制度;加强对审批行为的内外监督;加快推进相关配套措施改革。〔23〕

孟明明认为,河北省公共服务政府购买属于起步比较晚的地区,但近几年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目前的问题是:缺乏完善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规范、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竞争性不强、购买过程缺乏评估机制等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完善公共服务购买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二是广泛开展政府多领域、多渠道购买公共服务;三是建立招投标工作平台,尝试第三方评估等方式。〔24〕

李玮就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公务员绩效管理改革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优化河北省公务员绩效考核体系建设已成为加快公务员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通过构建以“尚德+任务目标驱动”为核心的河北省公务员队伍的绩效考评体系建设,科学构筑信息共享平台和纵向贯通的立体化公务员绩效考评体系,有助于激发公务员队伍的创新活力,从而为全面提升政府的工作效率,为确保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各项任务的顺利落实奠定基础。〔25〕

刘文博对兴隆县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作了研究,认为兴隆县政府绩效管理存在绩效管理的引导作用不强、考核结果可信度低、结果运用的激励约束作用不强、绩效管理滞后、公众参与度低等问题。提出了从政府绩效指标体系、考核结果可信度、激励约束作用等层面,特别是建立公众全程参与绩效管理循环工作机制的建议。〔26〕

刘尧以基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对唐山建立的激励机制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一是激励机制可以调动整个基层公务员队伍的工作积极性;二是激励机制存在问题为,未能关注到基层公务员生活与工作等方面需求的满意度,也未能建立起

长效、稳定、严格的考核与激励机制;三是目前公务员机制中所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在于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对此提出了对策建议:合理运用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制定合理的薪酬体制;完善公务员奖惩制度;加强公务员日常教育培训制度;建立合理的考核晋升制度;健全法律法规体系。〔27〕

赵宇涛对目前河北省机构编制管理的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河北省在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中存在着缺乏机构编制规范化的管理手段、编制管理不规范、机构职责不清晰、监督机制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监督主体不到位、机构编制法制化建设滞后、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不到位。提出了通过体制建设、加强机构编制动态管理、进行机构改革、加强机构编制管理监督检查力度等方法,以推进机构编制管理规范化工作。〔28〕

五、政府电子政务研究

翟路萍等人指出,河北省通过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了政府行为,提升了政务服务能力。但由于其处于初期实践阶段,仍存在“互联网+政务服务”内容覆盖面有限、平台建设管理不规范、平台信息共享不充分等问题。对此提出了三方面对策建议:一是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供给能力;二是规范政务服务平台管理;三是大数据云平台共建共享。〔29〕

李璐指出,近年来河北省政务微信发展初见成效,但也存在着政务微信的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的现象。通过对“河北发布”的运营现状、传播效果、发布信息、受众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目前“河北发布”在内容上存在着不够接地气、原创性不足、文章深度不够;信息不够公开透明;平台推广力度不够;缺乏与受众互动的问题。指出,“河北发布”应该从精准平台定位、提升推广力度、优化推送内容、注重与用户的互动、加大对新技术的使用五个方面进行具体建设进而提升其影响力。〔30〕

刘宁、李红梅通过对“河北发布”政务微博进行数据搜集、整理和分析,提出了政务微博舆论的生成演变路径的具体形式:信息(来自正规的渠道)—微博(按需求并经过筛选)—

用户（通过互动来达到传播效果）—社会（形成舆论涟漪）。^[31]

刘中立对沧州市行政审批局和“互联网+政务服务”两种改革模式同步推进的做法进行研究。认为，沧州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实行多项改革联动、协同推进，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主方向和原动力，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落脚点，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最终目的，力求打通“最后一公里”，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增强区域发展新活力。沧州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面临的问题有：一是行政许可权集中后政府部门职能如何转型定位；二是行政许可权集中后如何监管；三是成立行政审批局后如何“上下互通”；四是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与相关改革如何协同推进。解决这些问题的新路径有：破解合法性难题、加快推进政府部门职能整体构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建“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与相关改革协同推进。^[32]

赵春莲以河北省庭审视频直播经验为例，对我国庭审视频直播进行观察研究。指出，我国庭审视频直播纵深发展尚面临诸多难题：庭审视频直播顶层制度设计合理性欠佳；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差距显著；平台建设运行质量有待提高，法院便捷的链接资源的获取性差；司法资源浪费，部分地区的庭审直播利用率过低。认为可以推广河北庭审视频直播经验：建立全省范围内的统一平台；结合地方特点，实现地方特色发展；发挥第三方作用，借助评估机构建立督导机制。^[33]

六、地方政府财政问题研究

钟辰对河北省“强县扩权”改革对地方财政收支水平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强县扩权增强了县（市）政府财政层面的自主性，进而对其扩张财政支出产生显著的正向激励。从河北省强县扩权的例子上看，相比强县扩权之前，试点县（市）政府在税收收入分配、转移支付以及税收管理权限等方面的自主性显著增强，在事权和财权上更好地匹配。强县扩权的改革可以给予地方政府在财政增收以及扩大支出方面正向的经济激励。政府可以尝试扩大强县扩权的试点范围，通过财政支出能力的增加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从而使县域经济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进一

步释放其经济发展的潜力。^[34]

2018年是河北省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十周年。马磊对此总结指出，试点十年来，河北初步探索出了一条顶层设计、分步推进、完善提升、全面推开的路子。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成为河北农村基层组织为民办实事和村内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欢迎，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了坚实基础。其成效：一是从根本上破解了农村公益事业发展的难题；二是探索完善了政府引导，村民自愿的村级公益事业发展新机制；三是让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做到了村里的事情村民商量着办；四是促进了村级组织规范化管理，推进了农村民主理财制度建设。其启示有：一是必须坚持依靠基层，调动村民积极性，充分把权力下放给基层；二是必须坚持服务基层，简化工作程序，降低工作难度，按照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做好服务设计；三是必须坚持着力基层，多措并举开源节流，积极主动防范风险，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35]

陈明、赵振英对河北省4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财政运行状况进行了研究。指出，河北贫困地区县级财政运行面临诸多困境，突出表现在政府经费支出保障困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债务压力巨大等方面。县级财政收支不均衡，极有可能引致县级财政风险，出现财政资金支付危机，甚至对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造成危害。对此，应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培育地方政府税源；二是逐步理清支出责任；三是增强地方政府可用财力；四是促进县域内生发展；五是完善财政风险控制体系；六是加强税收征管建设。^[36]

七、乡村治理研究

梁立中、孔鑫鑫指出，河北省新农村文化基层治理中存在着五方面的问题：一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二是缺乏市场经济载体；三是群众观念落后、缺乏参与积极性；四是缺乏人才队伍建设；五是政策落实不到位。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一是新农村文化建设要与经济均衡发展；二是加强市场对新农村文化的引领作用；三是培养群众文化观念，提高参与积极性；四是加强新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五是落实新

农村文化支持政策, 加强问责考核。新农村文化建设中, 基层组织必须要考虑到影响农村文化发展的经济发展因素、市场参与因素、群众观念因素、人才队伍因素、资金落实等因素, 只有正确解决这些因素, 河北新农村文化才可以健康有序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才可以快速实现。^[37]

刘瑜对河北省 30 多个贫困县的上百个贫困村做了访谈调查。认为贫困村“两委”建设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脱贫工作。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 村党支部制度不完善, 领导班子结构不合理, 党员干部培训形式化, 党员干部队伍素质偏低, 党员管理机制不规范等; 第二, 村委会经济脱贫服务功能不足, 村委会脱贫自治功能受外部制约, 村委会脱贫自治功能受内部阻滞等; 第三, 村“两委”或一方绝对领导、扶贫缺乏科学性, 或队伍松散、扶贫工作缺乏实效, 或公开对立、扶贫政策难以落实等。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 加强贫困村党支部建设, 完善村党支部制度, 调整党支部领导班子结构, 增强脱贫攻坚战斗力, 创新党支部培训机制, 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 改进扶贫工作作风, 规范贫困村党员管理机制; 其次, 加强贫困村村委会建设, 完善自治管理制度, 保障村委会经济服务功能, 正确处理村委会外部关系, 创建经济发展环境; 再次, 协调村“两委”关系, 明确“两委”职权, 改善村“两委”合作环境, 加强村“两委”民主素质, 协同开展脱贫工作, 落实脱贫政策, 增强脱贫实效。^[38]

张卓卓在河北省许村的调研中发现, 村民在参与村庄治理中存在参与效能较低、参与心理具有矛盾性、参与体制缺少创新、参与内容失衡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从培养村民公共精神、提高村民科学文化素质、正确定位村委会角色、加强村民参与制度建设、推进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改革等方面加以解决。认为推动村民在村庄治理过程中的积极参与, 保证村庄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村庄治理过程的协商性, 有利于实现村庄治理的善治和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政府也可以从村民参与过程中了解村民的关注热点, 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为建设完善服务型政府奠定群众基础。^[39]

李佳以河北省 L 村为例, 分析基层治理中村民政治参与问题。指出, 村民参与基层治理存在

着三方面的困境: 村民参与的政治效能感低、村民制度性参与不足、村民参与基层治理过程中监督乏力。对此提出的对策: 提高村民参与的政治效能感, 促进村民政治参与制度化, 完善村民参与的监督机制。提出, 农村基层治理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村民参与在农村基层治理中可以说处于核心的位置。必须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 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政策制定, 有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化解矛盾, 使与基层治理相关的政策更加科学合理并符合村民的利益, 进而达到善治的目的。^[40]

刘志奇、李俊奎以河北省临西县为例, 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乡规民约在时代变迁中的创新与重构, 以期能够进一步推进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进程。指出临西县乡规民约有以下特色: 一是乡规民约的有效性来自对村民利益的合理合法保护; 二是乡规民约的目标性始终指向村民利益; 三是乡规民约的合法性是乡村各方利益整合的结果; 四是乡规民约的实践性在于凸显时代性; 五是乡规民约的基础性在于信任。临西县乡规民约治理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通过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 推动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发挥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治理中的优势, 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 来自基层干部群众的创造, 有很强的人民性和地缘性。总之, 是一条适合本地村情民情并切实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41]

曹静波通过对 C 县信访工作的调查, 归纳出 8 个问题, 即: 信访总量大重访多、越级上访现象严重、信访涉及的主体领域扩大、反映问题相对集中、信访人择机信访的倾向明显、极端行为多发易发、信访组织出现萌芽、诉求期望不断上升。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信访制度不够完善、诉访分离、分类处理落实不到位、现有信访考核机制不合理、缺少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镇村两级关系弱化、信访积案得不到有效解决、对信访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部分信访群众的法律意识浅薄以及基层信访工作人员缺口大且整体素质不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从宏观方面要完善信访制度、加强信访工作的法制建设、规范分类处理; 在中观层面要改变信访考核机制、切实解决信访积案; 在微观层面要积极推进“互联网+信访”、全面实行网上信访,

要加强对信访群众的人文关怀,强化信访干部队伍建设。^[42]

盖策以河北省某县某村落的民间信仰为个案,借助当地保存较完整的村志等相关资料以及国外民间信仰的已有理论辅助研究发现,民间信仰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适应、潜在模式维持、整合以及目标达成四种社会功能,但是由于受到信众素养低下、国家权力强制下渗、政府治理失范等因素的影响,其正功能产生了向负功能转化的风险。治理该问题需要政府引导与信众自律兼顾,使新时期乡村的民间信仰能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治理。^[43]

李华以河北石村的集中供水项目为例分析了项目设计、实施和运行所嵌入的政治过程及其对供水分配的形塑和影响。指出,农村集中供水项目的实施应该强调和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和决策权,确保村民在水分配中拥有平等的水获取权。农村集中供水作为村庄的公共产品应以公共利益为导向,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除了资金和技术投入之外,核心在于对农民尤其是贫困群体水权的尊重和保护。^[44]

八、河北政治史研究

吴丰享对唐代河北道北部地区都督府、都护府、羁縻府州、军事驻防设施以及影响这些治边机构的因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唐代河北道北部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交融并时常爆发战争冲突之地,在唐代北部与东北部边防中拥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怎么经营河北道北部地区成为唐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河北道北部自古以来形势十分险要,因此,唐朝统治者只要经营得当,便可以有效地捍卫东北边疆地域。治边机构在管理唐代东北边疆与北疆各民族、推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与守卫边疆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45]

王晓辉对清代热河地区行政管理制度进行研究。指出清廷对热河地区由间接统辖变为直接治理,热河地区逐步实现盟旗州县化、边疆内地化、军政向民政转化、二元管理体制向行省制转化。热河地区行政管理制度的确立与实行,深化了清廷对蒙古地区的统辖,是清代边疆治理的具体实施,揭示清代长城沿线蒙汉杂居地区的治理

方式与特点:在治理理念上,清朝对长城沿线蒙汉杂居地区的治理高度重视又谨慎小心;在治理举措上,清廷对长城沿线蒙汉杂居地区的治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灵活有效,体现其边疆治理的“满族特色”;在治理成效上,相对于其他朝代,清朝第一次实现对长城沿线连续、直接、有效的治理,其治理规模性与成效是之前历代不可比拟的。长城沿线由单一盟旗制度转化成盟旗与州县并存的二元管理体制,再向行省制转化,缩小长城沿线与内地的差距,基本实现长城“内外一体”,为民国行省的建立奠定基础。^[46]

李想对清代承德政区变迁做了研究。指出,清政府对承德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大幅度改革,承德由僻野之地转变成为政治副中心,经历了长时段复杂的行政区划改革。承德政区的变迁体现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交融,也展示了清政府有效地加强了对少数民族与汉民杂居地区的行政管辖。其影响是增强少数民族的向心力,促进了承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文教事业发展繁荣。^[47]

宋立虎对1949至1951年的邢台土改政治动员进行了研究。通过对邢台土改政治动员的发展过程及影响进行分析,以求为新时代农村中的政治动员提供方法和手段的借鉴。认为,土地改革促进了邢台农村经济体制和政治基础重塑,对新政权在邢台农村的基础建设和巩固起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指出,新时代农村,一要注重宣传教育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积极引导新时代的农民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同时,建立一支适应现代农村社会的政治动员队伍,以保证政治动员的效果达到最大化;二要坚决站在农民的立场,始终以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奋斗目标,以此增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三要注意把握好“度”,政治动员的方法和手段一定要在农民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否则过犹不及。^[48]

(吴耀明 程瑞山:中共河北省党校教授)

参考文献:

- [1]王东峰.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奋力走好新时代河北“赶考路”[N].经济日报,2018-01-26.
- [2]王东峰.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攻坚战 全力以赴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J].中国纪检监察,2018(23).
- [3]王东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谱写燕赵乡村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18-03-30.

- [4] 孙杰, 杨守勇, 闫起磊. 坚定自觉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J]. 瞭望, 2018(3).
- [5] 栗俊杰, 刘邦凡. 优化环境 着力开放 推进河北沿海城市国际化建设[J]. 经济研究导刊, 2018(30).
- [6] 赵树文, 张勇. 雄安新区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研究[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 2018(9).
- [7] 曹哲, 蔡欣欣. 法治河北进程中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研究进展综述[J].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学报, 2018(1).
- [8] 陆洲, 于晴晴. 论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路径——以河北省为例[J]. 河北法学, 2018(11).
- [9] 包来军, 白志秀, 周丽. 河北省法律类网站建设研究——以河北省司法厅官网、河北长安网、河北法制网为例[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8(6).
- [10] 王金兰, 梅媛. 环境治理立法框架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 河北法学, 2018(8).
- [11] 褚冬宁. 环境犯罪的现状及治理措施——以河北省为研究对象[J].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3).
- [12] 杨扬, 张宝方. 非法占用农用地问题的刑事司法治理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 法制博览, 2018(23).
- [13] 范瑞君. 依法处理河北省妇女权益信访问题研究[J].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1).
- [14] 刘春松. 法官名额制改革研究——基于河北省法院的考察[D]. 华北电力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15] 张悦. 河北省贪污犯罪案件的刑事判决分析——以裁判文书(2014-2017)为样本[D]. 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16] 滕长江, 周亮亮. 社区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关于沧州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调查研究[J]. 河北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学报, 2018(4).
- [17] 李晓辉. 当前中国共产党村级党组织建设研究——以邯郸 W 县若干村级党组织为例[D].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18] 韩玉霞.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以博野县程委镇为例[D]. 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19] 魏皓阳. 关于河北省临城县抓党建促脱贫的思考[J]. 邯郸学院学报, 2018(3).
- [20] 宋金甫, 张军. 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的创新之路[J]. 人民论坛, 2018(15).
- [21] 张宇宁. 京张冰雪体育休闲旅游带建设中张家口市政府职能研究[D]. 北京体育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22] 于云鹤. 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研究——以河北省威县为例[D]. 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23] 贾慧. 张家口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D]. 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24] 孟明明. 河北省公共服务购买机制存在的问题和路径选择[J]. 经贸实践, 2018(6).
- [25] 李玮.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公务员绩效管理改革思路[J]. 商业经济, 2018(1).
- [26] 刘文博. 河北省兴隆县政府绩效管理问题研究[D]. 燕山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27] 刘尧. 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研究——以唐山市为例[D]. 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28] 赵宇涛. 河北省政府机构编制管理规范化研究[D]. 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29] 翟路萍, 孟超, 吴彤, 陈茜. 新常态下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实践模式与创新路径——以河北省为例[J]. 纳税, 2018(12).
- [30] 李璐. 政务微信“河北发布”影响力分析及提升策略[D]. 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31] 刘宁, 李红梅. 政务微博舆论生成演变路径研究——以“河北发布”微博为例[J]. 新媒体研究, 2018(4).
- [32] 刘中立.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以河北省沧州市为例[J]. 行政科学论坛, 2018(3).
- [33] 赵春莲. 我国庭审视频直播规范化研究——以河北省为例[D]. 燕山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34] 钟辰. “强县扩权”改革对地方财政收支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试点地区的实证分析[J]. 中国物价, 2018(1).
- [35] 马磊. 河北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十年的回顾与总结[J]. 当代农村财经, 2018(11).
- [36] 陈明, 赵振英. 河北省贫困地区县级财政运行风险及对策研究——基于财政收支的视角[J]. 经济研究参考, 2018(70).
- [37] 梁立中, 孔鑫鑫. 基于新农村文化视角下的基层治理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 品牌研究, 2018(6).
- [38] 刘瑜. 河北省贫困村两委建设研究[D].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39] 张卓卓. 村庄治理中村民参与问题研究——以河北省许村为例[D]. 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40] 李佳. 村民参与基层治理困境研究——以河北省 L 村为例[J]. 法制与社会, 2018(13).
- [41] 刘志奇, 李俊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规民约的创新与重构——以河北省临西县为例[J]. 河北学刊, 2018(1).
- [42] 曹静波. 基层信访工作困境与对策研究——以河北省 C 县为例[D].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43] 盖策. 民间信仰在乡村地域中的功能研究——基于河北省某县某村落的田野调查[J]. 中州大学学报, 2018(3).
- [44] 李华. 权力、技术与水分配政治——以河北石村集中供水项目为例[J].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2018(11).
- [45] 吴丰享. 唐代河北道北部地区治边机构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46] 王晓辉. 清代长城沿线蒙汉杂居地区的治理——以热河地区行政管理制为中心[J]. 求是学刊, 2018(4).
- [47] 李想. 清代承德政区变迁研究[D]. 河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 [48] 宋立虎. 邢台土改中的政治动员研究(1946—1951)[D]. 兰州交通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2018.

河北文化建设研究

陈旭霞

2018年,河北文化研究进入新常态,研究成果多点开花,数量稳中有降,特色显著,主要表现在京津冀文化研究持续红火,雄安新区文化继续保持研究的定力和热情,文化理论、文化建设、文化产业、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或拓荒,或深耕,均有不俗的成绩。

一、文化理论研究

(一) 燕赵文化

关于燕赵人文精神研究。汉风认为,燕赵丰富多变的地理条件和反差巨大的自然条件,使燕赵之地成为一个不同习俗的多民族杂居和共同发展的地域。在这里,汉族人融有高原和草原人的豪迈、剽悍和义气,高原和草原人融有汉族人的醇厚和智慧。不同民族、不同血统的人民在几千年的生存斗争中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从而成就着燕赵人民共有的性格特征和审美特征。^[1]万安伦等人认为,“悲歌慷慨”是燕、赵文化板块生长出的共同特质。“四战之地”的赵国在立国之初就深深打上了不畏强权、慷慨悲壮的文化基因。燕国早在春秋时期,就被北地山戎等少数民族侵扰,被迫将都城从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的燕初都南迁至河北易县的燕下都。燕都南迁给燕国上下深入学习农耕文明提供了便利条件,加强了和赵国等内地国家的经济交往与文化融合。同时在抗击少数民族及虎狼之秦的外来侵略中,不断生长和发展着“慷慨悲歌”的文化个性。^[2]

关于燕赵文化传承研究。朱燕、张瑛认为,高校具有作为“燕赵文化”外宣重要阵地的优势,应在优势和机遇的基础上,通过组建跨国教学团队、进行地方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加强与外宣媒体和平台合作三个方面加强燕赵文化的外宣,真正把高校作为燕赵文化外宣的主要阵地。^[3]崔玉静、魏晓光针对燕赵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存在着燕赵文化内容较少、有关部门缺乏正确的引导、师资队伍匮乏、相应教材不足的现状,提出燕赵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结合的四途径: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师资队伍,支持燕赵文化活动的开展,积极革新教材。^[4]张海凤等人针对河北省在燕赵文化对外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提出建设燕赵文化多语种平台、改进思维方式与传播模式、调整内外传播布局、加强国际沟通力建设、加强文化自信的传播的策略。^[5]

(二) 西柏坡精神

关于西柏坡精神内涵研究。王璇认为,西柏坡精神本质上是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赶考精神,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不断学习、破旧立新的开拓进取精神;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民主协商精神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两个务必”精神。只有继续坚持和弘扬西柏坡精神,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才能最大程度上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6]薛建中、田丽概括西柏坡精神的实质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慎终追远的主动“赶考”精神,艰苦奋斗、拒贪防变、固本守正的永葆本色精神,增强本领、提高能力、与时俱进的不断学习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历史进程中,党面临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种危险,西柏坡精神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更有现实意义。^[7]

关于弘扬西柏坡精神研究。陈睿、张福运认为,从毛泽东的“进京赶考”到习近平的“赶考远未结束”和“我们都是答卷人”,表明共产党人一直在进行着“赶考精神”的接力。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的变化,“赶考”的主题不断更新,“赶考”能力逐步增强,“赶考”中谦虚谨慎的态度和人民作为考官的地位始终未改变。在“变”与“不变”间,一以贯之的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感。^[8]贺蕃蕃认为,不忘初心、永远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主题;依靠群众、团结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

势；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西柏坡精神不仅是我们党，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9]张剑飞认为，在新时期继承发扬西柏坡精神，并以此作为精神支撑，指导党内工作，肃清党内腐败现象，切实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第二，以科学方法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第三，构建反腐败体系。^[10]

在西柏坡精神研究的学术检讨上方面。苗培周认为，30年来，学界对西柏坡精神的研究历经起步和初步发展、深入发展，再到繁荣发展阶段，在西柏坡精神的主要内涵、本质特征以及价值功能等方面取得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今后的研究应紧密结合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实践需求，强化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应用，协同推进研究队伍与学科建设，促进西柏坡精神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11]王腾指出，当前，西柏坡精神研究在研究队伍、研究基础、研究程度、研究内容等方面均有不足之处。新时代深化西柏坡精神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论从史出，还原历史背景；立足时代变迁、回应时代课题；改善研究结构，创新方式方法，深化研究内容，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2]

（三）文化遗产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张立阳、杜习震分析了河北省非遗保护及开发存在的投入有限、品牌力度不足、内涵（本真性）破坏、产权保护、后继乏人等问题，提出吸引民间资本、开发旅游资源、建立数字展馆、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体系、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路径。^[13]孙秀芬等人聚焦河北省丰富的非遗资源，从跨文化传播和异域读者接受的视角，提出通过非遗保护宣传网站设计英文入口，利用网络和新媒体技术，培养一批精通中国文化、精通外语、翻译水平过硬的国际化人才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策略。^[14]

关于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刘霞从秦皇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现状及意义入手，结合秦皇岛高校双排键电子琴教学实践，论证其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音乐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中的积极推动作用。^[15]马建波从河北民歌的起源、发展和形成的地理与历史条件、河北民歌所面临的挑战进行研究，提出河北民歌传承与保护的四条路径：收集整理河北民歌素材，保存民歌火种；传播交流河北民歌，形成燎原之势；更新创造民歌，跟上时代步伐；各种媒体让河北民歌重新走上舞台。^[16]

关于传统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胡世铎针对河北梆子被京剧同化现象严重、剧目数量与质量的失衡、行当和武戏的缺失等问题，认为通过国家文艺扶植政策的保障，大环境的改善，戏剧理论的前导，准确把握与坚守梆子剧种文化、美学风格、艺术特征，制定包括剧目生产、人才培养、声腔改革的科学完善等繁荣发展河北梆子的有效措施。^[17]

关于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张长念等人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和逻辑归纳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对孙式太极拳的国内外发展现状，以及在传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提出建立健全传承人制度、利用有利条件发展和宣传孙式太极拳的建议。^[18]

关于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刘立军等人揭示了青龙民间传统织造文化的特征，提出根植地域文化、挖掘个性织造技术、拓展产品营销渠道、设计创新方面的建设性观点。^[19]康丽滢、王勇提出互联网+时代“满绣”文化传承发展的新路径：一是以产业化发展带动“满绣”文化传承发展，二是构建“满绣”文化多方协同的传承发展体系，三是抓好后继人员队伍建设，壮大保护传承力量。^[20]王晟、邵荣伟针对廊坊地区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从扩大宣传，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传统手工艺两方面入手的发展建议。^[21]

关于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赵晓梅以清西陵世界文化遗产为例，通过调研发现，陵寝机构在时代转变之中留存为守陵村庄，家族历史赋予守陵人后代独特的身份认同，村庄历史与当地民俗可以作为清西陵建造、管理历史与礼制文化内涵的生动解说。同时，遗产地居民在地方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当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遗产管理之中，重建他们与遗产的联系，从而赋予遗产地以新的活力。^[22]

关于工业遗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

究。尚海永从打造工业遗产整体传承和景观脉络、再生工业人文景观资源传承、新型建筑与工业遗产的传承特征、工业遗产保护促进城市传承复兴四个方面提出了唐山近代工业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建议。^[23]杨国强结合开滦唐山矿和启新 1889 等工业遗产保护开发利用的实例,梳理唐山市在工业遗产保护与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采用分级保护的 mode、加强唐山市工业遗产的统计工作等唐山工业遗产保护开发的建议。^[24]

关于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王晓健等人将邯郸市西部太行山区 15 个传统村落的 55 个微环境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功能、文化特征、构成要素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近年来急于求成的改建方式影响了乡村整体景观的和谐性,甚至对持续上百上千年的空间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25]霍佳斌、关金国针对当前河北古村落遗迹宣传和保护工作的现状,提出树立数字媒体宣传和保护的意识、灵活应用多元化的数字媒体手段、将线上宣传与线下保护有机结合、切实保护古遗迹文化的知识产权等利用数字媒体宣传和保护河北古村落遗迹的策略。^[26]

关于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王长松等人分析了北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北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的四个途径:一是区域协同管理,构建北运河文化带;二是整合资源要素,差异化构建北运河文化创新功能区;三是重视水体保护,推进北运河流域综合治理;四是发挥社区作用,提高公众参与度^[27]。肖潇等人对在沧州段运河文化遗产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政府统筹规划、做好大运河沿岸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充分开发利用大运河的文化资源优势、开拓文化资源新媒体保护路径的保护措施。^[28]窦兴斌、何边认为,新媒体语境下,大运河(河北段)保护与传承应与现代数字相结合,利用现代传播途径,提高对大运河非遗项目的发掘与传承。^[29]

(四) 京津冀文化

关于文化认同研究。黄建生认为,目前京津冀文化认同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文化认同还没有成为广泛共识,促进文化认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一是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促进形成“京津冀”文化新形象,二要构建京津冀统一的文化符号,三是要借助京津冀三地的历史文化渊

源,打破行政区划形成的隔阂,举办各种跨行政区的群众性大型活动,推进文化认同。^[30]

关于文化协同发展研究。胡宇齐认为,文化协同的关键在于顶层设计上定好位、布好局,促使三地既成为国内文化产业发展的集聚地,又凸显各自特色和优势,形成互补式的文化发展格局。如今回头再看,稳步向好的协同进程中亦不乏一些遗憾,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文化特色不尽鲜明、优势尚未形成,过于“千篇一律”。^[31]黄仲山认为,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分割是三地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要障碍。应考虑将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指标,并以此为视角探索协同发展的合理路径,提升相关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充分释放文化协同发展的正向效应,以实现三地文化软实力的共同提升,“和而不同,错位发展”的提升,有质量的提升。^[32]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协同发展研究。刘琳等人针对三地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存在的对区域整体的文化特征缺乏认识、没有共识、管理参差不齐、缺乏区域联动、社会经济效益发挥不足等共性问题提出对策:一是协同深入研究,推动京津冀形成区域文化认同和共识;二是协同联动,构建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框架;三是创新保护利用模式,点线面结合促进合理利用。^[33]刘艳姗以京津地区风筝和京津冀泥塑为例,分析京津冀传统手工艺的现状,提出搜寻民间传统手艺人、开设面向大众的手工艺作坊、设立手工艺文化博物馆、各地中小学开设手工艺课程等传承和发展建议。^[34]牛甲芝在分析京津冀木版年画传承发展困境的基础上,从加强历史文献的挖掘与扩展研究、木版年画创意产品的开发并融入经济发展、培养新生代木版年画传承人等三个方面提出京津冀木版年画传承发展的新路径。^[35]

关于公共文化共建共享研究。申伟宁等人从京津冀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现状出发,通过实证分析,客观呈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现状,从建立健全标准体系、完善管理组织架构、加强标准培训宣传三个方面提出以标准化建设助推京津冀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36]吴卫华等人梳理了京津冀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的思路和服务模式,从加强文化资源战略管理、拓展资金支持渠道、服务平台构建、增大技术设备投入、完善服务人员配置五个方面

提出京津冀公共数字文化信息服务模式的实现策略。^[37]王晓洁、王丽对京津冀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进行了总体考察,剖析了阻碍京津冀公共服务供给的制约因素,提出了明晰协同范围和深度、优化政府干预、倡导区域财政合作制度、提升区域财政能力、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建立横向转移支付等提升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财政政策。^[38]商金芳、李荣菊从提高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视角,分析京津冀“文化云”建设的意义、京津冀“文化云”建设具备的条件,并提出“头羊”引领、搞好顶层设计、政府主导、监管跟踪到位、利用现有资源分步推进的建设京津冀“文化云”建议。^[39]

关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研究。安庭从文化密集型产业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提出四点建议:规划建设地标性文化演出场所,建立多元化的京津冀文化一体化网络平台,打造京津冀文化品牌,针对京津冀文化产业带中的剧场(院)及文化演出企业给予相关优惠政策。^[40]胡海升认为,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瓶颈与制约是文化认同感逐渐减弱、市场体系欠完善、区域发展欠平衡、产业协同欠顺畅、专业人才缺乏,提出从扩大地区文化认同、建设健全的市场体系、实现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的多元化、完善文化产业对接机制、以项目为抓手、以雄安新区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创新七个方面的发展策略。^[41]张娜等人通过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确定后,三地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根据三地文化产业发展优势,统一思想,统一规划,统一步调,从整个产业链的视角明确各地产业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推动非首都功能文化产业转移对接的建议。^[42]

关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研究。李凤梅等人针对目前京津冀武术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较少、产品匮乏、缺少行业合作联动机制、缺乏专业人才的现状,提出树立地域特色品牌、区域联合、产品互融、加大投资力度、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建立新型宣传模式的建议。^[43]陈怡宁等人从五个方面提出了京津冀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对策,包括围绕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探索“三种资源、两个圈层、多种路径”的京津冀文化旅游融合创新模式;健全融合机制,实现资源、产业、市场、资本、政策“五位一体”的协同

发展;功能分工合理,推动区域与整体文化旅游竞争力的同步提升;优化人才培养,引导文旅产业融合的商业模式创新;细分对标市场,实现“四元结构”下的网络化整体发展。^[44]

二、文化建设研究

(一) 雄安文化建设

关于雄安文化内涵研究。韩立新等人认为在两千余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以白洋淀为地理中心,英雄辈出。不同时期的英雄们在重要关头敢于承担重任,维护民族利益,推动历史前进,深刻地体现了为中华民族凝心聚力,图谋复兴的历史传承。如果与杭州西湖相因应,南有诗湖、爱情湖——西湖,北有歌淀、英雄淀——白洋淀。之所以说白洋淀是歌淀,是指千古绝唱——荆轲的易水之歌的史实就发生在这里,从这里传出。白洋淀作为一个人文景观,是英雄之淀,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载体,适宜作为雄安新区的意象隐喻。^[45]秦双兰对雄安新区武术会这一民俗活动进行系统梳理。认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雄安的尚武传统,崇“义”文化统领了雄安的武术精神,喜欢音乐增强了武术会的欢愉氛围,节庆信仰搭建了武术会的固定展演平台,套式化表演形成了武术会模式化的展演特色。雄安尚武是中华民族农耕时代尚武文化的一面,武术会也是中华民族最普遍的娱乐方式的缩影,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应考虑武术会特色民俗文化的承继发展问题。^[46]张春艳、唐文玲认为,雄安新区具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淀上神兵”雁翎队的英雄事迹,荷花淀派的红色文学,珍贵的红色历史遗存,这些构成雄安新区红色文化的主体。^[47]

关于雄安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研究。胡柏针对雄安新区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现状,提出雄安新区文化保护与传承建议:第一,将传统文化融入到城乡规划当中,使城乡更具当地的地方特色;第二,加大力度对城市文化进行“绑定式”宣传,即把城市和地方特色文化进行捆绑;第三,立足于建设保护地方特色文化的法律,完善文化保护举措;第四,结合创新科技手段,打造传统文化的现代科技载体。^[48]李向振认为,将保护和传承传统民俗文化纳入整体规划之中,在推进新城区建设同时,对该区域传统民俗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摸底普查,摸清区域内传统民俗文

化家底，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科学合理的传承与保护措施，应是新区文化生态建设的当务之急。^[49]

关于雄安新区文化建设发展研究。郭一铭提出进一步推进雄安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立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平台；二是加强文化产业的实体经济建设；三是大力发展文化生态游，带动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四是加大多种资源的参与力度，实现文化的多形式融合；五是抓住文化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六是提高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水平。^[50]陈海燕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雄安，应从历史文化角度建设一个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新城，既要放到“世界眼光”中，学习世界上的先进文化，更要深刻融入、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京津冀和燕赵的地域文化，并且最大限度地注入高科技创新文化。^[51]赵凌宇、陈佩珊分析了打造新区文化名片的重要意义、优势及面临的难题，从制定科学规划、突出文化特色、综合运用营销手段、集结民间力量、注重文化传承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打造雄安新区文化名片的建议。^[52]

（二）城市文化建设

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邱晓丽、谷红梅认为，河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速度远落后于经济、文化发展速度。在当前大数据背景下，只有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远程控制技术等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信息化建设，才能够有效加快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速度。^[53]王滨分析了河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对照国外做法，提出了弘扬主流价值观、推动营利性组织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完善财政投入机制、强化社会协同机制、建立河北省的志愿者机制等发展对策。^[54]陈会谦等人在对河北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强化转型发展意识、优化转型发展思路、狠抓转型发展关键环节、科学推进组织体系全面创新的现实路径选择。^[55]田静在分析河北省城乡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现状的基础上，从构建协同保障机制、健全资源开发系统、统筹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服务体验等方面提出构建资源整合机制的路径。^[56]

关于文化品牌研究。张春玉从创建城市文化

品牌意义和重要性，结合张家口市的实际，对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和发展进行探索，提出提升文化品牌建设作用的观念、创造文化品牌建设的良好政策制度环境、充分发挥人才作用的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建议。^[57]杨丹丹认为，河北省需要在文化传播中挖掘自身文化资源优势，把握传播原则，通过变革自身传播理念，不断创新传播主体观念、主流媒体传播能力，积极融入新媒体传播语境，加强国内地域交流，加快跨国的海外传播步伐，不断推动河北文化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的提升，这是打通河北文化走出去的品牌之路。^[58]李婷花、李关亮从文化品牌的价值、邢窑文化的内涵、邢窑文化品牌建设的可行性三方面进行分析和思考，提出提高区域内群众对邢窑文化的认知度、拓展邢窑文化的宣传渠道、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确立稳定统一的邢窑文化标志的邢窑文化品牌建设的方法途径。^[59]

关于文化走出去研究，周莹等人分析了影响河北民俗文化走向世界的内外部因素，结合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机遇和挑战，从增加政策投入，创新宣传方式，完善人才机制，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京张合办“冬奥会”和“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历史性机遇等角度，提出推动河北民俗文化“走出去”的建议和策略。^[60]郝爽等人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河北音乐跨文化传播进行分析，从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音乐文化的深入研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音乐文化交流、创新河北音乐跨文化传播方式三个方面，提出“一带一路”中河北音乐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路径。^[61]陈永超、鲍健波研究了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外部投资环境的复杂性、内部融资的困境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等现状，提出完善对外文化投资的制度建设、建立文化投资融资平台及文化投资信息共享平台等方式、实现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投资力度的建议。^[62]石亚碧从中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的角度，解析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的目标和任务，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冀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提出加强冀俄人文交流、宣传和推介，办好2018年俄罗斯—中国河北文化年，搭建文化贸易平台推动文化务实合作，支持和鼓励河北企业参与中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河北省与俄罗斯对外贸易的冀

俄文化交流和贸易合作的对策建议。^[63]

（三）农村文化建设

关于农村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李若淇等人针对保定地区的农业资源利用现状，从农业资源的开发、农耕经济的发展、农耕文化下民俗的发展三个方面提出发展保定特色农耕文化的建议。^[64]李坤琪等人以保定市大激店为调查对象，通过对大激店在乡村文化原真性传承以及对新型乡村文化独特性挖掘的研究，提出形成文物保护观念、保护民俗文化的原真性、打造地域特色文化品牌、以教育促进乡村文化发展等新型城镇化中乡村文化传承与挖掘的建议。^[65]

关于美丽乡村建设研究。胡薇宁等人总结了当前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乡村景观的农村特色丢失，使农村城市化，流失当地传统文化等，提出了景观建设突出地方特色、人文自然相融合、发展生态农业、支持和鼓励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借鉴浙江和四川等地的成功经验等建议与对策。^[66]王燕着眼于河北省村落文化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研究，提出参考云南、浙江、贵州等地的村落文化保护建设，将村落文化纳入乡村旅游发展，优化乡村环境建设，维系村落环境等河北省村落文化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规划。^[67]

关于乡村特色小镇开发建设研究。邢志勤提出河北省乡村特色小镇开发策略，主要包括以城区为核心，特色小镇为支撑，形成“一核一环”城乡统筹发展格局；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加强工程监管；植入特色产业，优化经济结构；改善发展环境，增强城镇功能；改革创新机制，转变发展观念；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六个方面。^[68]李刚等人以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为切入点，以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区的廊坊农村文化广场建设为典型，提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加强生态优先建设、人性化建设、地域文化建设、景观空间建设、景观绿化建设，以及配套服务与维护管理的京津冀区域农村文化广场建设的建议。^[69]许凯凯从雄安新区周边旅游文化小镇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优势、谋划布局、推进路径四个方面探析雄安新区周边旅游文化小镇的发展，提出解放思想、加强规划的引领作用、坚持生态优先、把握好地区区位优势、做好人才保障工作、加强文化要素挖掘、打造特色品

牌的路径。^[63]

关于农民文化素质和文化消费研究。赵雪芬在分析廊坊市新型职业农民文化素质现状的基础上，认为建设美丽乡村对新型职业农民文化素质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不仅要求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还要求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政治、道德、生态等多种文化素质。^[70]

蒋丽、程从军认为，目前影响河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因素比较多样，主要表现在村民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公共娱乐设施缺乏，收入提高水平相对于物价来说增长不大，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程度整体较低等方面。提出转变农村居民的传统消费观念、大力建设农村的文化娱乐基础设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升村民接受教育程度等提高河北省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的建议。^[71]

三、文化产业研究

（一）文化产业发展

关于文化产业现状研究。侯艳莉通过分析河北省政府支持下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提出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引入社会资金；结合当地文化特点，确定财政扶持内容；发挥市场功能，避免过度干预等建议。^[72]杨英法等人提出在新形势下，以文化产业和智能制造为抓手推进河北先进制造业的路径：一是在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中，确定文化产业、智能产业及其融合推进下的先进制造业发展目标，以高规格产业园区规划和先进制造业产业集聚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平台；二是科学淘汰落后产能，为制造业整合文化和智能制造发展释放资源空间；三是构建人才引入和培养机制，缓解京津人才“虹吸效应”。^[73]岳志新、王迎春针对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突出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特色，避免文化创意资源的浪费；加快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平台建设，开拓文化创意产业融资方式；政府需要给予文化创意产业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依靠人才力量的推动；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相关法律和文化的保护意识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74]

关于文化产业模式研究。赵天宜等人对滦河迁安段区位文化条件与自然环境进行系统研究，认为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中，除了资源优势、产

业链和特色文化景观外,应更加注重市场环境的改善,促进知识和技术转移扩散,与地区的经济产业基础相适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重视文化内核发展,打造本土文化品牌,发挥政府的统筹和推动作用,提升河北区域文化竞争能力。^[75]李会霞从构建京津冀文化产业园区联盟的可行性、构建原则、构建的外部条件和运行机制三个方面,探讨京津冀文化产业园区联盟的主要职能和工作重点,提出建设若干专业委员会、建设文创商学院、建设联合培养平台、建设行业研究院、建设联合投融资平台、创建推介交流平台的三地文化产业园区联盟的构建路径^[63]。

关于文化产业传统业态研究。王海军等人对河北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进行研究,认为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价值日益凸显和政策支持等是该产业发展的优势与机会;而产业链不完整、融资渠道单一、产业规模、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专业人才匮乏等则是该产业发展的劣势与风险。^[76]陈春霞介绍了河北民间音乐的发展现状,提出了注重学校教育,加大传承力度;融合现代元素,创新民间音乐;联合旅游部门,发展全域旅游等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民间音乐的产业化发展策略。^[77]

关于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研究。耿卫新探析了河北省“互联网+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思路,从推动顶层设计、搭建互联网平台、企业加强合作、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互联网时代河北省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63]。严文杰从京津冀协同发展视域下对“文化+”的理论内涵及河北要把握的几个要点进行阐述,提出以历史机遇带动“文化+”打造文化产业新增长点,以顶层设计提升“文化+”统筹规划区域特色,以科技创新推动“文化+”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以重大项目支撑“文化+”促进文化产业提质增效,以重要平台服务“文化+”加快文化产业集聚发展,以品牌形象推广“文化+”提升文化吸引力影响力等推动河北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63]

关于产业融合研究。李轩、张祎以河北省内高校音乐教学的“产业化”转向为切入点,从强化田野工作,创新特色化教学方式;依托微视频节目,探索同互联网产业融合发展的规律;打造精品,推动与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等方面

探讨了新形势下促进河北民间音乐与其他产业实现有机融合和创新发展的思路。^[78]吴向军在阐释抓好“文化+”的重要意义、“文化+”的目标原则的基础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重点抓好三大机遇,抓好“文化+科技”,抓好“文化+旅游”,抓好“文化+互联网”,抓好“文化+其他”,提高文化产业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63]

关于区域文化产业研究。张彬从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顶层设计的实现路径方面对雄安新区文化创意产业顶层设计进行了深入思考。^[63]索秉、张程明联系石家庄的实际,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优化发展环境,加强政策引导;加快人才培养,提供智力保障;加大创新力度,推动产业发展;发展地方特色,打造优势品牌;加快服务业发展,搭建良好平台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新时期加快创意产业发展的新途径。^[79]刘璐璐等人通过选取北方资源依赖型城市唐山作为研究本体,提出在政府层面上要精准文化产业战略定位,实行人才引进战略;站在企业的角度,应该重点打造特色品牌,加快促进技术创新;社会层面要着重加强人与自然的结合,提高整体人文涵养三个层面的唐山文化产业发展路径。^[80]刘颖辉、尹启星提出包括建立层次完善的合作机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能与京津承接的下游产业、积极引进和培养文创产业优秀人才、加大邯郸传统文化的再造力度等的邯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81]庞善东研究了新时代背景下张家口滑雪产业发展,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加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实现体育与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积极发展冰雪旅游;引进和培养冰雪产业专业人才;提高服务业占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发挥承载力优势,承接京津转出产业六方面的张家口滑雪及相关产业未来发展做大做强建议。^[82]王晓倩等人认为,衡水有着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新时代背景下,衡水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城市发展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以科技创新推动文化产业结构性改革,创建产业园区文化,深入挖掘文化资源与内涵是实现衡水文化产业快速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83]

(二) 农业文化产业

关于美丽乡村建设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

究。邹玲芳认为,美丽乡村建设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美丽乡村建设为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是助推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效途径,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应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基础,立足于乡村文化资源,制定科学合理的美丽乡村建设规划,逐步完善乡村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投融资机制,强化农村文化品牌建设。^[63]

关于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赵然芬认为,河北省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还存在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意识不强、品牌建设滞后、专业人才匮乏、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强、产业投融资体系不健全、管理体制偏向事业化、产业政策针对性不强的主要问题与制约因素。加快推进河北农村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需要科学规划,合理引导,强化农村文化资源整合开发;完整服务,优化政策措施,加大扶持力度,强化要素支撑能力;实施品牌战略,强化项目推动。^[63]

关于村镇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姚胜菊认为,河北省村镇文化产业发展仍存在基层干部群众对发展村镇文化的认识滞后与文化产业在全省经济发展中作用迅速提升不协调、村镇文化产业的水平落后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需要不协调、村镇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掣肘与百姓对文化产业的强烈需求不协调等多种制约因素。促进河北省村镇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树立开拓创新的村镇文化产业发展理念、营造贴近现实的村镇文化产业推进模式、完善多层面的村镇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健全多渠道的村镇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机制、培育具有浓郁区域特色的村镇文化产业品牌、打造强有力的村镇文化产业人才队伍等措施。^[63]

(三) 旅游文化产业

关于文化旅游资源研究。田晓平以河北省为例,联系实际就标准化助力文化旅游提升工程进行分析,提出统筹研究制定河北文化旅游资源分类管理标准、构建河北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标准、完善主题突出的文化旅游标准体系等总体思路和建议对策。^[84]

关于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彭鲁迁认为,河北省在旅游发展和文化外向传播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旅游与文化传播融合不足、旅游业的综合性发展不够、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不足

和对跨文化交际理论掌握不够。提出了大旅游背景下河北文化外向传播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创新河北省文化外向传播策略,加强旅游和文化的有机融合,丰富旅游资源的文化含量,树立外向传播思维。^[85]

关于区域旅游文化产业研究。刘新霞结合邯郸市的文化旅游发展状况,提出联合做好对外宣传,提升旅游产品的知名度;相关旅游政策支持,各部门做好协调协商;加强对邯郸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完善旅游景区的相关设施建设;积极培养旅游人才的邯郸市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86]赵冰、陈思以雄安新区白洋淀为例,从文化旅游的视角,立足文化旅游的五大核心要素探讨白洋淀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路径:第一,品牌定位:培育有影响力的特色品牌;第二,内容为王:打造有底蕴的特色文创产品;第三,供需持平:培育特色文创产品市场;第四,招贤纳士:组建文创产品智囊团;第五,运行监管:健全文创产业服务体系。^[87]

关于名人文化旅游研究。吴庆智在对名人故里与名人经济的概念内涵、河北省名人故里文化资源开发的条件分析、名人故里文化资源开发的外地经验与启示等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提出重点政策扶持、宣传教育引导、综合机制保障的河北省名人故里文化资源开发的建议。^[63]

四、文化史研究

(一) 传播文化

邢路路认为,晚清兴起官书局热潮,李鸿章分别于1881年和1882年在保定和天津两处创办直隶官书局,借助官方力量在直隶地区构建了全省书籍销售网络,向直隶供应了大量图书,除经史子集外,还有大量学堂书籍和西学书籍。直隶官书局一直营业到清朝灭亡,对直隶地区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88]

(二) 红色文化

王雪梅等人认为,《晋察冀画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大型摄影画报,创刊于1942年7月,终刊于1947年2月,一共出版了13期,印刷了约32000份,影响广泛。其主题的报道主要分为:军事战争、民主政治、军民生活、国际援助、宣传动员以及其他。其报道主体主要是军人、女性、儿童以及国际友人。《晋察冀画

报》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摄影画报,在政治宣传、群众动员以及红色摄影等方面有着开创性的历史意义。^[89]

(三) 戏曲文化

陈宁认为,蔚县灯影戏是陕西碗碗腔灯影、蔚县秧歌、蔚县大戏等艺术形式相互融合渗透之后形成的一种地方戏曲。相传,清光绪年间,陕西大荔县一带,发生了连年旱灾,大量民众背井离乡,其中有一些表演“碗碗腔”的灯影艺人,东渡黄河,到达晋、冀两省之后,又分为东西两支,继续沿途表演灯影戏来谋求生计。其中东奔的一支,途经蔚县,被吕家庄当地的民间艺人所接纳融合,继承了当地原有的灯影表演形式,但改驴皮皮影为牛皮灯影,又将本土蔚县剪纸中的刀刻艺术,运用于灯影戏角色造型的制作之中。后又将蔚县秧歌和蔚县大戏中的音乐风格、演唱技巧融汇其中,经过积年累月的磨合实践,形成了现今独具蔚县民间特色的吕家庄“灯影戏”。蔚县灯影戏,班底简约,投资成本和演出费用低,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接受。剧本的内容,通俗易懂,虽偶有引经据典,但都用幽默诙谐的方式处理,为百姓喜闻乐见,是满足民众精神娱乐审美需要的底层传统民间艺术。^[90]

(四) 书院文化

吴洪成、宋娜娜认为雄安新区所包括安新、容城及雄县三地的古代书院,从元代发端,至清代达到鼎盛,其中以安新书院最为突出。雄安新区古代书院对当时的人才培养、学术传播及地域思想文化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其间积淀的资源及优秀传统也有裨于当前区域大学教育谋划、城市品位的提升以及经济产业的发展。^[91]

(陈旭霞: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汉风.燕赵美术的文化根基和文化解读[J].公关世界,2018(18).
- [2] 万安伦,等.论京津冀文化形象的历史风貌与建设路径[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
- [3] 朱燕,张瑛.高校“燕赵文化”外宣的优势与策略研究[J].新闻传播,2018(10).
- [4] 崔玉静,魏晓光.燕赵文化传播与青年思想引领耦合研究[J].才智,2018(2).
- [5] 张海凤,等.大数据视角下燕赵文化对外传播新策略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8(18).
- [6] 王璇.西柏坡精神内涵及当代价值解析[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6).
- [7] 薛建中,田丽.西柏坡时期党的历史方位与西柏坡精神的实质与核心[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2).
- [8] 陈睿,张福运.不忘初心:从“赶考”到“答卷”[J].理论导刊,2018(6).
- [9] 贺蕃蕃.用西柏坡精神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1).
- [10] 张剑飞.西柏坡精神与党风廉政建设分析[J].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18(1).
- [11] 苗培周.西柏坡精神30年研究综述[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8(2).
- [12] 王腾.新时代深化西柏坡精神研究的思考[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8(4).
- [13] 张立阳,杜习震.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产业化发展路径研究[J].艺术教育,2018(9).
- [14] 孙秀芬,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8(18).
- [15] 刘霞.秦皇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中的传承与创新研究[J].理论观察,2018(6).
- [16] 马建波.河北民歌的传承与保护[J].黄河之声,2018(19).
- [17] 胡世铎.河北梆子现状问题断想[J].大舞台,2018(4).
- [18] 张长念,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孙式太极拳发展研究[J].湖北体育科技,2018(11).
- [19] 刘立军,等.河北青龙传统土布织造文化特征研究[J].上海纺织科技,2018(5).
- [20] 康丽滢,王勇.“互联网+”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路径[J].文学教育(下),2018(8).
- [21] 王晟,邵荣伟.非遗视域下的廊坊传统手工艺[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 [22] 赵晓梅.世界文化遗产多层级价值整合的重要性与研究方法——以清西陵为例[J].东南文化,2018(3).
- [23] 尚海永.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唐山工业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5).
- [24] 杨国强.唐山市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研究[J].居舍,2018(35).
- [25] 王晓健,等.邯郸太行山区传统村落微环境空间类型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 [26] 霍佳斌,关金国.利用数字媒体宣传和保护河北古村落遗迹的策略探讨[J].传播力研究,2018(25).
- [27] 王长松,等.北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路径分析[J].中国名城,2018(11).
- [28] 肖潇,等.运河文化带(沧州段)资源的保护策略[J].荆楚学术,2018(22).
- [29] 窦兴斌,何边.新媒体语境下大运河(河北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策略研究[J].大舞台,2018(5).
- [30] 黄建生.论文化认同与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J].大舞

- 台,2018(6).
- [31]胡宇齐.特色是文化协同立身之本[N].北京日报,2018-10-12.
- [32]黄仲山.京津冀文化软实力提升路径[J].前线,2018(9).
- [33]刘琳,等.关于推进京津冀区域文化遗产协同保护利用的研究[J].决策探索(下),2018(2).
- [34]刘艳娜.文化自觉:京津冀区域背景下传统手工艺的活态传承[J].西部皮革,2018(10).
- [35]牛甲芝.以高校为依托探索京津冀木版年画发展新路径[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8(20).
- [36]申伟宁,等.以标准化建设助推京津冀区域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8(3).
- [37]吴卫华,等.京津冀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及服务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
- [38]王晓洁,王丽.新时代背景下促进京津冀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37).
- [39]商金芳,李菊菊.建设京津冀“文化云”提高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效能[J].人文天下,2018(2).
- [40]安庭.以文化密集型产业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J].北京观察,2018(3).
- [41]胡海升.新时代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刍议[J].产业创新研究,2018(5).
- [42]张娜,等.推进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J].前线,2018(5).
- [43]李凤梅,等.京津冀“武术文化旅游产业圈”的赋存特征与空间重构[J].体育文化导刊,2018(11).
- [44]陈怡宁,等.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发展探索[J].前线,2018(9).
- [45]韩立新,等.英雄淀、歌淀:白洋淀文化建设的意象隐喻——基于雄安新区英雄人物的文献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7).
- [46]秦双兰.雄安新区武术会特色文化探析[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8(4).
- [47]张春艳,唐文玲.雄安新区红色文化的传承价值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8(20).
- [48]胡柏.唤醒“雄安记忆”传承民族文脉[J].中国商论,2018(17).
- [49]李向振.雄安新区建设中的传统民俗文化普查与文化生态建设[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
- [50]郭一铭.深入推进雄安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J].经济研究参考,2018(22).
- [51]陈海燕.论文化视域下雄安新区建设中的“中国特色”[A].廊坊市应用经济学会.对接京津——新时代奠基国体法论文集[C].廊坊市应用经济学会:廊坊市应用经济学会,2018.
- [52]赵凌宇,陈佩珊.关于打造雄安新区文化名片的建议[J].中国地名,2018(11).
- [53]邱晓丽,谷红梅.大数据背景下河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8(5).
- [54]王滨.河北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提升策略[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8(2).
- [55]陈会谦,等.河北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J].管理观察,2018(13).
- [56]田静.河北省城乡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机制研究[J].图书馆学刊,2018(1).
- [57]张春玉.张家口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探究[J].山西农经,2018(4).
- [58]杨丹丹.多维度协作打通河北文化品牌的路径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4).
- [59]李婷花,李关亮.邢窑文化品牌建设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18(4).
- [60]周莹,等.河北民俗文化“走出去”的SWOT分析[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
- [61]郝爽,等.“一带一路”倡议下河北音乐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路径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8(29).
- [62]陈永超,鲍健波.面向“一带一路”倡议的京津冀文化产业投资研究[J].中国市场,2018(28).
- [63]河北省社会科学院.2017~2018年河北省文化产业形势分析与预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
- [64]李若淇,等.保定市传统农耕文化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J].农家参谋,2018(21).
- [65]李坤琪,等.对城镇化中乡村文化发展的探究——以保定市大激店为例[J].纳税,2018(18).
- [66]胡薇宁,等.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的问题分析与对策[J].河北林业科技,2018(2).
- [67]王燕.河北省村落文化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20).
- [68]邢志勤.河北省乡村特色小镇开发对策研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3).
- [69]李刚,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京津冀区域农村文化广场建设的探讨[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8(4).
- [70]赵雪芬.美丽乡村建设视域下新型职业农民文化素质调查研究——以廊坊市为例[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1).
- [71]蒋丽,程从军.河北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探究[J].纳税,2018(35).
- [72]侯艳莉.河北省财政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品牌研究,2018(4).
- [73]杨英法,等.以文化和智能制造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路径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云南社会科学,2018(3).
- [74]岳志新,王迎春.河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策研究[J].山西青年,2018(5).
- [75]赵天宜,等.河北省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策略研究——以迁安滦河文化旅游产业园区为例[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8(16).
- [76]王海军,等.河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SWOT

- 分析[J].当代体育科技,2018(11).
- [77]陈春霞.“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视角下的河北民间音乐产业化发展研究[J].黄河之声,2018(5).
- [78]李轩,张祎.河北民间音乐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研究[J].艺海,2018(10).
- [79]索秉,张程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石家庄市文化创意产业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8(2).
- [80]刘璐璐,等.京津冀协同发展视阈下唐山文化产业发展路径[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4).
- [81]刘颖辉,尹启星.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邯郸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邯郸学院学报,2018(2).
- [82]庞善东.新时代背景下张家口滑雪产业发展研究[A],第七届中国体育博士高层论坛论文摘要汇编[C].2018.
- [83]王晓倩,等.大力推进衡水市文化产业快速转型升级的思考[J].西部广播电视,2018(23).
- [84]田晓平.标准化助力文化旅游提升工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河北省为例[J].中国质量与标准导报,2018(8).
- [85]彭鲁迁.大旅游背景下河北省文化外向传播策略创新研究[J].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2018(7).
- [86]刘新霞.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下的邯郸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15).
- [87]赵冰,陈思.文化旅游视角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路径研究——以雄安新区白洋淀为例[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8(4).
- [88]邢路路.直隶官书局述略[J].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6).
- [89]王雪梅,等.图像学视角下的《晋察冀画报》[J].青年记者,2018(11).
- [90]陈宁.河北省蔚县灯影戏传承保护现状的田野调查[J].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8(1).
- [91]吴洪成,宋娜娜.雄安新区古代书院探析[J].保定学院学报,2018(5).

河北社会建设研究

张丽 樊雅丽

2018年,河北学者突出以问题为导向,对河北省城乡统筹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扶贫攻坚、公共服务、人才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雄安新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成果在广度和深度上所有增强,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成果分量更重。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部分河北学者对改革开放40年来河北省社会建设取得成就进行了研究。

一、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研究

(一) 总体分析与展望

武义青等人认为深刻理解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所蕴含的深刻内涵,把握其战略定位与发展目标,对于社会各界深刻领会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目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共同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规划建设,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1]

李晓华探讨了在雄安新区建设中如何汲取国内外城市发展特别是新区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应重点防范一些不良倾向,一是在规划、建设方面主要包括防范规划缺乏科学性、稳定性的倾向,防范行政力量与市场机制失衡的倾向,防范产城割裂与“大城市病”倾向;二是在经济发展方面主要包括防范实体产业空心化的倾向,防

范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倾向;三是在生态环境方面主要包括防范新区建设加重生态环境负担的倾向;四是在社会发展方面主要包括防范新的贫富分化倾向,防范负面舆论泛滥的倾向。^[2]

冷宣荣等人认为,雄安新区建设模式主要有绿色生态宜居的新城区建设模式、创新驱动发展的建设模式、协调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模式、开放发展先行区的建设模式、共享发展模式、城市规划建设模式、绿色智慧新城建设模式。雄安新区发展建设中,必须打破传统体制机制束缚,推动行政管理、生态环保、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开放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发展、高端人才引入和培养、可持续的投融资、依法依规实施管控、住房的租售并举等多方面体制机制创新,使之成为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区和示范区。^[3]

宋东升以对雄安新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建设的三大特征(前沿性、高端性和协同性)的分析为基础和主线,对多维推进雄安新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建设的实施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以自贸区建设为抓手推动形成“引领性开放发展”;以发展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为依托推动形成“高质量开放发展”;以对接京津开放资源为路径推动形成“协同性开放发展”。^[4]

叶振宇认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雄安新区高

水平城镇化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按照高起点、高标准和高定位的要求,建设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城乡融合发展的智慧新城、生态新城、科技新城、共享之城和开放之城,着力解决好本地人、外来人员、北京迁入单位的随迁人员等三类人的城镇化问题,在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5]

李国平等人认为,为实现雄安新区的发展定位,雄安新区应当采取优质承接战略、枢纽城市战略、创新发展战略和智慧宜居战略等四大战略,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积极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打造枢纽城市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创新发展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智慧宜居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将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也将对国内外新区新城建设提供示范与参考。^[6]

刘兵等人以共生理论为视角,将城乡发展模式分为寄生、偏利共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以及对称性互惠共生四种模式。提出雄安新区城乡发展适合走城乡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针对对称性互惠共生特征构建雄安新区新型城乡共生体,雄安新区在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升级、改善公共服务、提升当地居民素质、优化共生环境等方面实现雄安新区与京津及周边县的共生发展。^[7]

秦宇等人认为,要释放雄安新区的建设红利,需要准确把握雄安新区建设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各战略目标的关系以及雄安新区与京、津、冀等周边地区的关系。提出推动机制体制创新、探索全新发展模式、吸引和培育创新要素、建立高新高端产业是实现雄安新区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8]

(二) 生态文明建设

葛全胜等 16 位来自地理学及人居环境科学领域的专家,以笔谈方式,对雄安新区的发展开展了深入讨论。认为雄安新区的发展,应该坚持和秉承以下观念,一是宜居安全观,突出安全第一,切实防范洪涝灾害、环境污染等风险,以创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为目标,走全面宜居城市之路;二是生态城市观,积极采用低碳生态技术,有机组织城市区域生态系统与空间布局,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系统,保证城市生态系统良性循

环,走系统化的生态城市之路;三是创新核心价值观,以科技文化为灵魂,推进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与管理创新等全面创新,建设新一代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之都;四是区域统筹观,从流域视角、区域一体化视角,统筹新区建设,注重区域协作,共享共生,互动互补,带动区域转型新型发展,走区域深度协同发展之路;五是文化城市观,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文化艺术发展,倡导文化包容与和谐,探索中华人文生态特色新型城市风貌,走文化特色城市发展之路;六是综合品质观,突出全面高质量与高标准发展理念,建立国际领先的质量标准体系与规范体系,全面加强综合质量监测评价与督察,结合文化品质追求,走综合高品质发展之路;七是典型示范观,努力将雄安新区打造成生态创新的城市示范区和新型城市化的样板城市,促进京津冀建设生态与创新型世界城市群。^[9]

李维明等人提出从宏观层面理清与新区发展定位和目标相匹配的水安全治理思路:一是坚持以规划为遵循,生态优先、统筹推进;二是坚持以工程为基础,多源互补、稳定供给;三是坚持以治淀为核心,标本兼治、协同治理;四是坚持以流域为单元,系统施治、齐抓共管;五是坚持以尊重自然为原则,分步实施、分类施策;六是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法制保障、长效管理。^[10]

赵腾等人结合雄安新区特色小镇“生态-生产-生活”协调发展的要求,选取九个影响因子,对雄安新区进行生态适宜性评价。将研究区分为低生态适宜性区域、较低生态适宜性区域、中生态适宜性区域、较高生态适宜性区域以及生态适宜性区域。在此基础上,从风景园林的角度出发,将生态适宜性评价结果与雄安新区特色小镇规划图相叠加,得到研究区生态功能分区规划,包括生态保护区、生态修复区,特色小镇开发区及城市综合建设区,并对各分区提出建设策略,为雄安新区特色小镇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11]

(三) 公共服务相关问题

杨宏山认为教育是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优化发展雄安新区现代化教育的路径,一是出台引导性政策,支持著名高校在新区办学,设立新校区、分校或研究生院;二是坚持高

点定位,创建一流水平的雄安大学,为新区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三是推进政府间合作,在雄安新区创建一批高水平的幼儿园、中小学校,提升新区基础教育水平;四是增进干部人才交流,为雄安新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12]

孟莉等人对雄安新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一是完善征地补偿制度,因地制宜建立土地补偿机制,健全监督约束机制;二是建立多层次、多元化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医疗保险制度,建立适当水平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13]

张曦文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与发展中,大量农民将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其就业创业存在诸多困难,亟待解决。提出雄安新区相关部门应完善政策制度,保护农民权益,通过劳务输出、开展技能培训、限定部分行业经营和准入等方式,建立健全失地农民培训和再就业体系,使农民共享雄安新区改革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14]

(四) 人才发展与科技创新

张锐等人从雄安新区建设所需人才入手,深入分析河北省高校人才培养的现状。提出紧紧围绕新区的规划、建设、发展几个重要环节进行人才培养对接,搭建发展平台,优化人才环境。并从高校人才培养方式、结构层次、教育资源和保障体系等方面探索人才培养对接雄安给河北省高校的启示。^[15]

曾红颖从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战略角度,根据雄安新区需要人才分析,认为科技人才对城市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但城市人才结构不能过于单一,提高城市软实力,需要一支和城市文化内恰内生相匹配的文化人才队伍支撑。提出相关政策与建议:一是建立大数据和精准数据相结合的人才供需监测评估决策模型和运行平台;二是对雄安人才需求结构形成战略性总体判断;三是推动当地居民尽快适应雄安发展定位的转变。^[16]

张楠等人通过描述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以及人才基础,认为雄安新区在突出优势,把握机遇的同时,还要从劣势入手,弱化劣势,在面对周边地区人才引进的威胁时,应强化竞争优势,努力推动创新要素集聚,实现人才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17]

徐赛等人以美国硅谷和日本筑波科学城为例,分析并归纳国际上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经验,为雄安新区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提出雄安新区要建设一个成功的区域创新体系,就必须做好区域创新体系的顶层设计,构建创新型的现代产业集群,培育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形成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发展模式,营造国际一流的创新环境。^[18]

二、河北省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研究

(一) 总体分析与展望

康振海等人通过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相结合、理论总结与事实叙述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分工研究与协同攻关相结合,述评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河北省在社会发展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生态文明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的辉煌成就和显著成效,总结丰富经验,探索客观规律,观照历史方位,展望未来前景。^[19]

(二) 生态环境保护

陈婧等人从土地资源利用情况、地表水污染情况、乡镇工业污染情况、农业污染情况、畜禽养殖业污染情况、生活污染情况几个方面,分析了河北省小城镇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一是实行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决策机制;二是开展小城镇生态环境功能区划工作;三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利用区域优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20]

姚雪平等人在生态保护红线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关键区的方法,并划定了河北省生态保护红线关键区。提出河北省生态保护红线关键区建设管理与保护措施,一是以生态红线区为生态源地,以关键区为战略节点,构建了区域安全格局;二是以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机制建设为基础,突出关键区域的示范带头作用;三是明确生态保护红线关键区生态保护具体措施;四是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县建设进行衔接,形成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希望能以关键区作为生态保护红线的管理示范区,以点带面,带动整个红线区的管理建设^[21]。

孟旭彤等人通过构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以及灰色关联法分析各指标间的灰色关联度。结果表明,河北省北部山区生态环境中关

联系数最高的是畜禽粪便处理率(0.754),生态经济中关联系数最高的是农民人均纯收入(0.624),生态保护中关联系数最高的是化肥施用量(0.846),生态人居中关联系数最高的是饮用水合格率(0.682),而关联度大小依次为生态保护(0.724)、生态环境(0.662)、生态人居(0.573)、生态经济(0.543),说明该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仍有很大空间。研究结果指出河北省北部山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不足,为进一步研究区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2]

(三) 扶贫开发

张学敏等人通过对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提出了通过精选扶贫项目、提升扶贫对象的劳动能力、增强配套设施建设、有效管理扶贫资金、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来化解挑战,顺畅实现河北省精准扶贫的相关目标。^[23]

邢慧斌等人从空间角度系统分析了河北省集中连片特困区中保定、张家口和承德3市教育精准扶贫的空间差异,探究了河北省教育精准扶贫的模式,主要有全面改善和深度提升型、教育和产业融合发展型以及脱贫能力和动力提升型3种不同类型的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提出河北省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工作。^[24]

王惊等人通过对河北省贫困乡村开展旅游精准扶贫带动计划战略的解读、研判,基于扶持产业、扶植环境、扶助乡民的“三扶”路径,提出了在实施旅游精准扶贫中应充分遵循政府主导、多元发展、精确识别、立体扶贫、塑造品牌、创新机制的河北旅游精准扶贫基本思路。^[25]

段洪波等人采用田野调查法研究贫困县老龄人口贫困现状,通过实地走访河北省14个县70个村的1083户贫困户家庭,发现老龄人口仍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指出河北省老龄人口贫困问题存在独有特征,在分析相关特征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26]

(四) 城镇建设

王海涛等人结合河北省实际,按照投入产出逻辑构建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层由创新投入、创新产出2个一级指标组成,状态层由8个二级指标组成,指标层由24个三

级指标组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河北省11个地市创新型城市建设进行了实证评价。^[27]

吕媛认为特色小镇既可以解决新型城镇化中的各种困惑,也可以通过建设特色小镇来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河北省城镇资源优势显著,大力发展特色小镇建设既是河北省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精准脱贫”的捷径,并针对河北省的城镇发展优势及存在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路径。^[28]

顾少华针对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提出建议,按照先易后难、分步推进的原则,推动老旧小区实施改造。一是个人出资加装电梯,提升房屋功能;二是政府出资建设进行环境整治;三是对具有二次开发价值的物业,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市场化运作,在房屋主体结构承载力满足安全情况下加层扩建。^[29]

王梦丹等人以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假设和统筹城乡发展六个方面建立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因素分为四个主成分,结果表明:人口、经济、社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至关重要,并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这四个主成分的值与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城镇化率的提高离不开各个指标的发展,尤其是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30]

刘遵峰等人采用AHP和熵值法对指标进行综合赋权,以河北省为例,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对河北省2012-2016年的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得出结论:河北省的城镇失业率在五年之间变化很少;河北省的人口城镇化正在逐年增加;第三产业是有助于带动就业与经济产业发展的产业。^[31]

徐颖等人利用2000-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河北省流动人口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河北省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会持续但增速有所放缓;河北省流动人口空间布局由分散趋向集中,形成中部东北-西南聚集带以及东南稀少带,相应形成城镇化效应东北-西南显著带和东南不显著带;省内流动人口增量多,增速快,集中各地级市市辖区呈散点状,而省际流动人口集中于石

家庄-廊坊中轴线上。^[32]

郭岩峰等人以生态文明视角审视河北省城镇化的理念、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从深化改革、转变发展理念、调整产业结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对策。^[33]

(五) 三农问题

张彩霞等人指出现阶段农村仍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收入低消费高、教育水平落后、医疗卫生和养老保障不健全、住房保障体制还不完善及生活环境相对较差等问题。提出应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农民创造收入,政府加大在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方面的投入,加快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改善农村生活环境。^[34]

刘秀艳等人认为,河北省休闲农业发展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支撑服务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通过深入分析河北省现代休闲农业在行政管理体系、财政支持、融资渠道、土地供应、人才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必须建立健全河北省休闲农业支撑服务体系,确保休闲农业健康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农村振兴、农业增收、农民致富的新动能。^[35]

康广对影响河北省农村居民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河北省农村居民贫富差距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研究表明:在指标体系中,非农收入的权重最高,其次是家庭状况,农业收入最低。在家庭状况中,外出务工人员比例的权重值最高,农业种植技术掌握状况的权重值最低;在农业收入中,土地附加值的权重值最大,作为家庭支出的一项土地投入状况权重值最小;在非农收入中,外出务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权重值最大,最小的是家庭成员工资收入。对农村居民贫富差距影响较大的前5个因素依次是:外出务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家庭经营性收入、土地承包收入、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得出的结论是:河北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处于警戒线以下;非农务工收入是造成河北省农村居民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各种因素对不同农户间贫富差距的影响作用不同,贫富差距是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36]

(六) 人的发展与科技创新

谭玉霞等人对河北省部分城市老年人体育锻炼与生活幸福指数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调查结

果显示,河北省城市社区老年人习惯清晨在距离居住地较近的公园,进行较小运动量的身体锻炼。体育锻炼后老年人积极体验较高,消极情绪降低,表明适当的运动量对老年人产生良好的积极心理体验,有助于提升幸福感指数。积极主观体验与幸福感指数呈正相关关系,消极主观体验与幸福感指数呈负相关关系。体育锻炼是帮助老年人达到身心健康、延年益寿的有效途径,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种重要手段。^[37]

佟林杰等人认为河北省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引进效果与其激励政策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相关。对此提出完善河北省创新型人才激励体系的相关策略:政策更加“本土化”,更加注重服务环境建设,提高政策执行力,建立和完善人才政策评价体系等。^[38]

刘丽丽等人对河北省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中的应用型人才供给改革提出相关对策:一是做好专业调整并加强应用人才培养教学资源的建设;二是优化专业结构,打通壁垒并做好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三是做好“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的构建^[39]。

李春林等人基于2012-2016年我国《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的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河北省本科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进行总体评价,对河北省34所公办本科院校在科技人力投入、获取科技经费和承担课题、科技产出、成果鉴定授奖等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总结河北省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现状,提炼科技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提出提升河北省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2+6”模式。^[40]

三、河北省公共服务问题研究

(一) 教育

刘桂贤等人分析了促进河北省公共教育服务共建共享的重要性,论述了促进河北省公共教育服务共建共享的重要性,河北省公共教育服务共建共享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制约河北省公共教育服务共建共享的问题,并提出了河北省公共教育服务共建共享策略。^[41]

刘为影认为农村幼儿园应立足地方特色,充分挖掘地方教育资源,努力探索农村特色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的新思路,提出相关建议,一

是充分利用农村自然资源,构建农村特色幼儿园生态课程;二是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创建独具地方文化的特色课程;三是建设乡土课程资源库,有效实现城乡间教育资源的共享。^[42]杨亚青等人分析了河北省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河北省农村贫困地区教育改善的对策和建议,主要包括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资力度,加强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改变农民错误的教育观念。^[43]

孙慧佳对河北省高等教育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出河北省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并从平台建设、评价体系、经费投入和学科专业布局四方面提出了改革优化建议。^[44]齐艳杰等人梳理了河北省在争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的短板,分析影响河北省“双一流”建设进程的重要因素,提出通过“两个突破”、“三项工程”、“四个保障”三条路径,统筹推进河北省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45]

刘晓慧认为老年教育是终身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社区老年教育是老年教育的重要形式。指出当前社区老年教育存在覆盖面有限、供给单调且同质化、经费不足、人员配备缺少相应的专业素养等问题,提出相关对策,主要包括扩大社区老年教育的覆盖面、建立并完善社区老年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丰富社区老年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加强社区老年教育师资队伍建设。^[46]

孙怡指出河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存在教育理念落后、矛盾突出、缺乏系统性和深度性、教育的选拔渠道单一、师资力量较差等问题。提出做好继续教育的相关对策建议,提高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重视程度;对专业人员的继续教育进行准确定位;在企业内部建立系统的继续教育培训模式;实施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打造强大的继续教育师资队伍。^[47]

(二) 就业与社保

左海云等人依据对河北省2017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和2015-2017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动态比较,描述了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和变化趋势,分析了不同层次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及其影响因素等状况,并针对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提出了促进就业工作的对策建议。^[48]

杨胜利等人认为河北省劳动力市场中仍存在

着劳动力就业结构层次偏低、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压力较大、劳动力职业结构现代化程度低、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提出需要进一步推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社会保障政策、提升就业环境,有效推进河北省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49]

张亚艳等人以残疾人就业为切入点,分析了河北省残疾人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大数据背景,提出建立河北省残疾人学习平台,分析如何对残疾人信息进行大数据挖掘,并对残疾人就业相关信息进行精准推送,促进残疾人就业。^[50]

李林等人通过对河北省巨鹿县、承德市两地试点政策比较,分析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制度碎片化、资金筹集依赖医疗保险基金和服务模式不能满足需求等问题。提出需要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确定合理的筹集机制,构建完善的管理机制和多样化的服务模式。^[51]刘海啸等人通过分析大病保险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情况得出结论:河北省大病保险筹资标准低于既定政策目标,起付线偏高,建议进一步提高大病保险筹资标准,降低起付线,减轻病人个人负担。^[52]

(三) 社会服务

马明等人针对河北省养老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提出系统化设计,概况为“12345”,即:坚持一个导向——市场导向,疏通两个渠道——政府引导和社会参与,树立三个理念——制度养老、文化养老和科学养老,发力四个“多”建设——厘清多层次需求差异、寻求多元化模式、创新多方式供给、吸引多业态参与,打造五个基础——环境基础、技术基础、人文基础、融资基础和产业基础。还提出构建河北省多层次多方式养老服务体系的对策建议。^[53]

张悦玲等人对河北省贫困山区农村养老保障的现状进行分析,探究河北省贫困山区农村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从大力发展山区经济、不断完善政策制度、积极倡导“孝道”文化、改善山区养老服务、鼓励“医养结合”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54]

李茂结合当下河北省农村养老模式的基本现实,对未来河北农村养老模式的现实选择及完善路径提出解决思路:一是必须进一步明确和强调农村居家养老模式的主体地位;二是大力弘扬孝

道,营造尊重老人选择养老模式的自由氛围,三是切实提高农民养老自我支持力,增强养老模式选择的现实性;四是以提质降费为导向,推动社会化养老机构加快发展;五是扩大互助养老模式影响,推动互助幸福院向互助合作社升级。^[55]

贾丽凤等人对河北对接北京异地养老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从缺乏跨地区综合协调管理机制、两地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医疗保险对接受限以及投资主体单一等方面,分析了河北对接北京异地养老面临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跨地区综合协调机制;二是优化优质资源布局,加强异地医保互通;三是强化专业人才培养,促进河北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四是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56]

高秀春等人以河北省养老服务产业链为研究对象,从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产业链的主体环节、产业链的支持环节三个方面分析其关键环节以及影响因素。提出构建河北省养老服务产业链的对策,包括加强宏观指导、注重组织扩散以及加强产业运营。^[57]

王冬梅认为发展智慧养老是解决当前养老问题的大势所趋。指出河北省还存在一系列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的阻碍性因素。提出应在加大政策倾斜力度、缩小数字鸿沟、建立服务平台整合资源、明确政府定位、发挥市场作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等方面加以完善,以健全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58]

吴雪娟等对以“物业+”养老融合模式推进河北省城镇居家养老服务进行研究。指出目前河北省居家养老服务市场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有老年人对居家养老认知度不足、现有社区养老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缺少、缺乏系统专业的服务企业、市场运行机制不灵活等。提出“物业+”养老融合模式可以运用物业公司独特的经营优势,来弥补养老服务公共资源供给不足,将成为居家养老服务的一种新模式。^[59]

王红英认为随着社会转型,在社会治理中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需要由专业人员用专业的方式去解决,将专业社会工作引进社会治理有助于化解社会问题及社会矛盾。并以石家庄的社会工作为例进行分析,指出其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和挑战。提出工作建议:积极推动成立社工行业组织,加大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力度,加强开

发社会工作岗位,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发育,加强民办社会服务机构的专业能力建设。^[60]

(四) 公共文化与医疗卫生

陈慧谦等人分析了河北省公共文化服务由传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转型整体进程有待进一步加快、转型思路有待进一步梳理明晰、转型的关键环节有待取得突破、转型的组织体系有待逐步建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强化转型发展意识、优化转型发展思路、狠抓转型发展关键环节、科学推进组织体系全面创新的路径选择。^[61]

田静指出,在“重心下移、共建共享”的公共文化建设方向之下,河北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标准化获得了突破性进展,当前覆盖城乡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已逐渐形成,但城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仍然存在差异化、不均衡等问题。在对河北省城乡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现状研究的基础上,从构建协同保障机制、健全资源开发系统、统筹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服务体验等方面提出了河北省城乡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路径。^[62]

杨星等人分析了河北省农民需求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资源利用率不高、供给与需求不均衡,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一是探索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二是构建农村体育需求表达机制,更好地推动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63]

杜英等人以河北省阜平县为调查对象,了解了县级医疗机构卫生资源配置现状,发现其中普遍存在新型医疗设备及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缺乏、医师进修培训效果不明显及患者流失率、转诊率增高等问题,成为阻碍当地医疗卫生服务系统建立的主要因素,并提出远期和近期的解决对策。^[64]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社会建设研究

(一) 总体分析与展望

陈璐客观地描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过程中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成就以及产业、交通和生态环境三大领域协同发展的现状,站在河北的角度从动力机制、协同活力、政策效用及监管机制四个方面分析了推进协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依托“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建设加快推进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基本方略及对策措施。^[65]

李岚等人提出了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路和加快形成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建议：一是以雄安新区为引领，重构河北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与京津共同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二是以提升产业地位为方向，加强载体平台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建设高水平的全国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三是以海河平原和冀西北山区为重点，扩大生态空间、改善环境质量，建设高水平的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四是以生态与经济双赢为目标，扎实推进河北北翼建设和区域脱贫攻坚，实现冀北地区跨越发展绿色崛起；五是以综合交通枢纽和快速便捷路网建设为重点，优化区域交通网络结构布局，加快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六是以创新环境建设为重点，构建吸引京津冀创新资源要素集聚的创新生态系统，协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七是加快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实现京津冀公共服务趋于均衡。^[66]

祝尔娟等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了基于联系度、均衡度、融合度三个方面的测度，得出结论，京津联系最为密切，河北石、唐两市在区际联系中优势明显；京津冀地区教育、医疗、创新均衡度上升，经济均衡度下降，居民生活均衡度变化不显著；京冀融合度较高，京津次之，津冀较低等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京津冀充分均衡发展、高质量协同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对策建议。^[67]

王双等人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产业联动协同、区域交通一体化、社会领域机制体制以及生态协同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同时也指出，由于还未形成有效的发展模式、存在固有的利益束缚以及明显的“虹吸现象”，体制机制创新统筹思路尚未完全形成，成为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短板。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向更深层次的有效路径，通过发挥政府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先行主导作用、推进产业一体化创新发展机制、构建公共服务多层次创新供给机制、探索多点位同步推进的城乡融合创新机制、创新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同主体深度参与机制等，逐步形成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突破。^[68]

王德利通过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存在的关键

问题，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思路及对策：未来京津冀应以强化顶层设计、加快非首都功能疏解、构建经济反磁力中心、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联动、缩小公共服务差距、完善综合交通网络、加强联防联控等为突破口，打破区域利益和体制鸿沟，协同推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69]

（二）京津冀城市群

丁波等人认为从整体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格局呈现双星极化分布态势、城镇化水平差距明显和城市规模比例失衡等特征。根据京津冀城市群空间格局现状，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城市群内部合作、完善城市群规模等角度提出优化策略。^[70]

王振坡等人从人口、环境、资源、经济、交通、科技 6 个层面，对京津冀城市群内 1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综合承载力进行测度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内城市综合承载力整体处于中上水平，呈“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从承载力的供给与需求角度看，多数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超载现象；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制约因素和受限程度存在差异，且制约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并从以城市综合承载力为支撑推进各级城市协调发展、加快交通一体化建设、推进产业对接合作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71]

赵金丽等人基于引力模型和潜力模型，测度 2000、2015 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的空间作用强度、方向与范围。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的吸引区范围不断扩张，为更多城市提供了发展机遇，但也导致京津周边各地级市市区吸引区范围的减小；河北南部各地级市市区吸引区范围变化不大，但潜力等级降低，石家庄（市区）在南部地区的增长极地位愈发凸显；大部分节点城市的等级降低，河北高等级节点数量减少尤为显著；非地级市市区的低等级节点城市增多，且大都位于石家庄 I 级城市体系；京津冀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更为稳定和成熟，但三大 I 级城市体系均存在某一级节点城市的缺失，基本架构仍有待完善。^[72]

刘斌等人对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一是以区域整体战略空间考量为基础，谋划京津冀协同发展；二是以准确的首都战略定位为起点，确立中心城市核心功能；三是以疏解非

首都功能为突破口,治理城市群的现实问题;四是以点、极、带的复合结构为支撑,优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布局;五是以城市群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要素市场的一体联通,带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六是以非均衡的协同互补发展为思路,推动产业的对接协作;七是以城市的人民主体性为导向,提升市民的城市获得感;八是以历史文化的保护挖掘为抓手,推动城市文脉的延续传承;九是以区域生态的整体改善为目标,推动城市环境联防联控;十是以总体规划的法定严肃权威,保障规划的有效实施。^[73]

(三) 生态文明建设

田翠琴等人在详细介绍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地资源开发和利用情况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京津冀三地环境保护的历史、环境问题的特征、环境治理的难点,提出了未来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走向,要构建了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的框架,还提出了京津冀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农村环境污染协同治理的具体对策。^[74]

张贵祥等人分析了京津冀三地 2006~2016 年十年间的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并对比分析三地生态文明建设的差距和协同发展状况。数据表明,京津冀三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均呈好转趋势。不论是从发展态势、规制成效,还是从环境质量、生态宜居方面,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最佳,并与天津、河北有差距拉大趋势;天津市次之,河北省最低;天津与河北的差距不断缩小。在定量分析基础上,提出京津冀绿色发展机制、生态环境协同共建机制,以及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75]刘广明、尤晓娜对区际生态补偿基础理论予以系统梳理,通过对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基本模式、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保障机制以及制度体系构成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尝试提出利益均衡保护和政策法律协同的基本理念,为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正式制度的构建提供参考。^[76]

包庆德等人指出,京津冀城市规划应留有一定比例生态配置,培养城市高人口密度下环保意识提升的生态效应来平衡人口城市化带来的生态负效应。京津冀水土、林草、大气等资源问题凸显,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面临严峻挑战,其中水生生态格局安全面临的挑战最大。京津长期向冀进行污染企业转移,迫使冀亟须进行产业生态化转

型升级和对原有重点行业产业进行专项生态工程建设与改造。京津与冀之间还存在广泛的固体废物转移现象,京津理应给予冀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提出京津冀应打破行政壁垒,形成生态合力,加深深度融合,依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顶层设计,打造天蓝地绿水净的国际化区际协同发展示范范围。^[77]

张红兵等人认为京津冀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京津冀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方面,还存在着产业布局与梯度转移不合理、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环保治理地区政策不统一、环保推动和地区发展矛盾冲突等方面的问题。应从构建新型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合作机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优化区域产业布局、联合开展技术创新等方面加以解决。^[78]

史丹等人对 2003—2015 年京津冀地区的“煤改气、电”政策实施推动城市群绿色发展的效果进行准自然实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城市与农村能源基础设施的差异性,“煤改气、电”政策主要通过作用于城市工业领域及农村“煤改电”消费行为从而推动绿色发展;“煤改气、电”政策显著降低了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对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单位 GDP 能耗的压减效应虽然为负,但在统计上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煤改气、电”政策对人工煤气、天然气用气人口数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煤改气、电”政策使得农村用电量显著下降,可能的原因在于“煤改电”式的能源转型政策并未产生需求响应行为,或是相对于燃煤取暖的高成本引发了农村节能行为的产生。“煤改气、电”政策应避免“一刀切”执法,着力降低技术门槛和成本、确保政策执行初期的补贴可持续性,使得化石能源转型驱动能源需求侧响应行为的微观作用机制畅通,最终实现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79]

王丽等人认为京津冀三地覆盖空间污染比较严重,区域空间生态问题应备受关注。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一是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行为方式,筑守区域生态空间治理;二是优化公共权力顶层设计的系统功能,强化区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三是完善利益互惠共享市场机制,形塑生态共融命运共同体;四是健全多元参与衔接机制,促进生态共享协同共治。^[80]

韩兆柱认为,加强地区合作成为京津冀生态治理的必由之路,选择恰当的合作路径成为解决生态治理难题的关键。目前三地府际关系出现的合作主体单一、合作起点不平等、治理主体各自为政、合作渠道单一等问题成为制约京津冀生态治理发展的瓶颈。提出京津冀生态治理应该构筑多向度的府际网络合作关系,同时,要搭建起京津冀生态治理结构,在府际、政府与其他参与主体之间形成全方位治理网络。^[81]

王玉明等人对京津冀城市群跨区域环境合作提出相关建议: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来引领;京津冀政府间签订合作协议特别是专门的环境合作协议来推动;在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建立专门的环境协作机构提供组织保障;开展联合监测、协同预警、联动执法、项目共建来实施城市群政府间的环境合作。^[82]

(四) 公共服务相关问题

李冬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京津冀地区居民对不同评价指标的主观偏好进行研究,并以此为依据对不同评价指标进行赋权,评价京津冀地区不同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工作状态和不同年龄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偏好存在明显差异的问题;京津冀城市间公共服务质量差异显著,呈现出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逐渐衰减的空间格局。^[83]

张贵等人基于协同论最新理论对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指标体系进行了分析。指出主要包含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劳动就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和基本公共文化 7 个一级指标。通过分析发现,京津冀公共服务的协同效应存在但并不明显,发展水平呈明显阶梯落差,并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其中基本劳动就业领域差距最为明显。提出应结合京津冀各领域的发展现状与目标要求,通过资源共享、产业转移、统筹规划等对策,协同推进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同城化。^[84]

宋文新认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前提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本质要求。对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一是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认识;二是在准确把握河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特殊性基础上完善工作思路;三是明确基本公共服务机会均等、共享发展的政策导向;四是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规划体系衔接配套;五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清单,以标准化推进均等化;六是以供给侧改革思路破解公共服务供给失衡问题;七是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八是坚持借势借力与自力更生两条腿走路;九是健全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机制。^[85]

陈志国等人提出三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一是强化顶层设计、规划引导、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制度保障;二是加大信息共享平台、互联互通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体系等建设力度;三是推动社会保障有序衔接、教育资源合作共享、医疗卫生资源协作发展、养老服务合作发展;四是尽快编制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对接清单,落实基本公共服务路线图及权力、责任,建立和完善监督考核机制。^[86]

薛二勇等人通过系统分析发现,京津冀高等教育存在空间布局不够均衡、层次结构不够合理、专业结构设置不够科学、科研资源分布不够均衡等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一是综合集成教育资源,优化京津冀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二是综合集成区位优势,优化京津冀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三是综合集成产业优势,优化京津冀高等教育专业结构。^[87]

张拥霞针对京津冀地区老龄化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整理出国内外养老服务业模式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国内外研究最新前沿动态,提出要解决京津冀地区养老体服务中技术壁垒。还指出,全国各地“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概念相同,但是根据地区差异养老形式各不相同,探讨符合京津冀地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应充分发挥创新性养老模式的效果。^[88]

杨晖等人对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的“燕达模式”进行研究。指出燕达国际健康城在吸引北京优质医疗资源落地,分流北京就医、养老压力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趟出了一条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的新路径,成为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的典范。“燕达模式”内涵丰富,其表现形式是医养结合,核心要义是共建共享,突出特点是机制灵活,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在公共服务领域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对于深入推进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具

有标杆作用和启示意义。^[89]

吕天宇等人通过对京津冀三省市政府公共卫生合作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当前京津冀三省市在公共卫生联合防治的过程中还存在缺乏横向联合机制、政府职能失衡、政府信息共享与舆情监测不到位及法律保障缺失等问题。指出行政区划体制、区域存在博弈和政府合作意识缺失是制约京津冀三省市公共卫生联合防治的障碍因素。^[90]

张子雪认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作为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一环,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考虑的社会民生重要环节。选取了京津冀三地的13个城市的公共医疗支出的绩效差异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影响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绩效差异的因素,提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提升医疗卫生支出绩效的政策建议以及可行性措施。^[91]

王小春等人针对京津冀地区保障性住房养老服务建设大多严重滞后、供需差距较大问题,提出保障性住房养老服务建设应遵循分阶段建设、潜伏设计、优化共享、适度变通的建设理念;逐步改变大规模集中成片建设,采取灵活配建的建设方式;综合采纳养老服务设施、无障碍设施以及老年住宅等建设标准。应根据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优化因地制宜建设养老服务设施、机构及场地,大力拓展建设资金来源,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人员供给的多渠道多元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92]

张晓微等人从空间、时间、地域三个维度,立体的分析了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两市一省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如何形成一个具有人缘、地缘和业缘密切往来的体育统一体。阐述了这一区域的人口数量、资源结构、经济密度、生产力要素的特殊组合,并提出一系列加快京津冀城市社区体育一体化发展的策略,为今后河北省城市社区体育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93]

(五) 人口与人才发展

梁林等人对京津冀区域城市间的人口流动进行了研究,梳理了京津冀区域城市间人口流动的复杂网络特征。结果表明:一是京津冀城市间人口流动网络符合“小世界”网络特征,具有较高的连通性和运行效率,并且所有城市节点的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均呈显著正相关,京津冀协同

战略发展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效果;二是京津冀城市间人口流动网络具有明显层次性,呈现“北疏南密”流动分布态势和“一大三小”多中心网络空间格局,并非传统认知上“京津双核心”空间格局。^[94]

周进认为要深入分析京津冀地区的人口规模和空间布局等现状特点及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并提出京津冀地区功能布局调整和人口发展的对策建议: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作为基本遵循,强化功能布局;树立全局观念,发挥京津两地的联动优势和辐射作用,适度加大河北省的人口吸收能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走“就地城镇化”路径;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建立人口发展良好平台。^[95]

陈明星等人对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就业、收支情况等流动特征,以及流动人口的“源”(来源地)、“汇”(流入地)的分布格局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以青壮年劳动适龄人口为主,户口类型以农业为主,并以跨省流动为主等特征;流动原因以务工经商为主,收入水平以低、中收入为主;流动人口主要来源于与其地理位置邻近省份和劳动力输出大省。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加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完善和职业培训教育,提升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提高城市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增强流动人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96]

纪凤仪通过构建城际人口流动倾向度模型,利用网络用户搜索行为数据对京津冀主要城市城际间的人口流动倾向的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结果:北京在京津冀主要城市人口流动倾向相对强度的比较中,一直处于最高水平。2013-2017年,五年间京津冀各主要城市的中心度位次结果没有明显变化,主要城市两两组合体现的人口流动倾向相对强度也保持相对稳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影响下,北京在区域内对人口的绝对吸引地位没有变动,短时期内对人口、资源等的极化不会发生改变,协同发展任重而道远。^[97]

张建国提出以开发区为载体合力打造京津冀人才新高地的对策建议:一是在石家庄高新区共建京津冀产业技术国际研究院;二是共建中国雄安人才资源服务产业园和中国石家庄人才资源产

业服务园；三是要聚力打好雄安新区这个金色招牌；四是共建河北开放创新国际峰会；五是要共建世界一流的民办高校，打造全国样本。^[98]

王艳霞等人从京津冀区域人才竞争力比较分析入手，针对区域人才竞争力的优劣势，从提高河北人才竞争力的外力、内力、合力，借力雄安新区建设共享“人才高地”，借力京津人才资源促进河北产业向中高端转型升级等方面，提出提高河北人才竞争力的对策。^[99]

（六）科技创新

席增雷等人根据京津冀三地科技资源的分布以及产出，发现北京、天津、河北存在着明显的科技创新资源分布和创新能力的梯度差异，并通过建立区域性科技创新评价指标，采用 Malmquist-TFP 模型评价了京津冀三地的科技创新效率，发现从总体上三地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上升趋势，河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高于北京和天津，河北的技术规模效率最大。提出的建议是，促使京津冀三地的科技投入要素的流动，逐渐转移至河北，可以有效地通过技术的规模效率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100]

苑泽明结合高校科研创新性的特点，构建高校科研创新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静态 DEA-BCC 模型和动态 DEA-Malmquist 指数模型，分别对京津冀高校 2012—2016 年的科研创新绩效进行整体以及对比分析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分析来看，京津冀高校科研创新绩效水平不高，但科研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高校的资源配置能力、资源使用效率等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从对比分析来看，北京高校科研创新绩效水平最高，天津次之，河北较低，京津冀三地高校科研创新绩效存在较大差异。^[101]

（张丽：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樊雅丽：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武义青,冷宣荣.怎样认识雄安新区[J].前线,2018(11).
- [2] 李晓华.雄安新区建设进程中需要重点防范的几个问题[J].发展研究,2018(03).
- [3] 冷宣荣,武义青,曹华青.推进雄安新区建设与发展的机制与模式研究[M].京津冀发展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7月.
- [4] 宋东升.多维推进雄安新区开放发展研究[M].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1月.

- [5] 叶振宇.雄安新区高水平城镇化的现实思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2).
- [6] 李国平,宋昌耀.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J].改革,2018(04).
- [7] 刘兵,曾建丽,梁林.雄安新区城乡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构建及对策研究[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3).
- [8] 秦宇,李钢.雄安新区战略定位与创新发展机制研究[J].财经智库,2018,3(04).
- [9] 葛全胜,董晓峰,毛其智,张文忠,杜龙江,张伟,何春阳,吴殿廷,吕拉昌,陈明星,孙进柱,孙斌栋,赵鹏军,潘竞虎,彭建,强海洋.雄安新区:如何建成生态与创新之都[J].地理研究,2018(05).
- [10] 李维明,何凡,谷树忠.雄安新区水安全治理形势分析与思路建议[J].中国水利,2018(23).
- [11] 赵腾,胡凯富.雄安新区:基于生态适宜性评价的特色小镇建设[J].北京规划建设,2018(05).
- [12] 杨宏山.雄安新区:优先发展现代化教育路径选择[N].中国教育报,2018-5-29.
- [13] 孟莉,王利敏.雄安新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及对策研究[J].农家参谋,2018(04).
- [14] 张曦文.雄安新区失地农民创业就业保障对策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8(07).
- [15] 张锐,夏鑫.雄安新区建设背景下河北省高校人才精准对接策略[J].中国成人教育,2018(18).
- [16] 曾红颖.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战略思考[J].前线,2018(05).
- [17] 张楠,王颖.雄安新区高端人才引进的分析与对策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中旬刊),2018(05).
- [18] 徐赛,安璐.雄安新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经验借鉴与方向[J].未来与发展,2018(09).
- [19] 康振海.让历史昭示未来——河北省改革开放四十年[M].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
- [20] 陈婧,王丽娜,王博.河北省小城镇生态环境建设策略研究[J].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04).
- [21] 姚雪平,陈艳梅,马心宇.河北省生态保护红线关键区的确定与建议[J].江苏农业科学,2018(04).
- [22] 孟旭彤,宋川.河北省北部山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及绩效评价[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10).
- [23] 张学敏,闫博荣,唐潇.河北省精准扶贫现状、问题与路径选择[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06).
- [24] 邢慧斌,马晓,刘冉冉.河北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空间差异研究[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18(05).
- [25] 王惊,张永翊.旅游精准扶贫带动河北乡村发展的路径研究[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03).
- [26] 段洪波,吴震.河北省老龄人口贫困问题研究——基于河北省14个县的田野调查[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

- 会科学版),2018(01).
- [27] 王海涛,武辉林.河北省创新型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河北省科学院学报,2018(04).
- [28] 吕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河北省发展特色小镇路径分析[J].河北企业,2018(03).
- [29] 顾少华.河北省城镇化进程中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对策[J].经济论坛,2018(07).
- [30] 王梦丹,付云鹏.河北省新型城镇化评价[J].城市,2018(01).
- [31] 刘遵峰,刘秋玲,张春玲.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以河北省为例[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5).
- [32] 徐颖,高倩,张华锋.河北省流动人口空间集聚与城镇化效应研究[J].中国商论,2018(17).
- [33] 郭岩峰,张春艳.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9(06).
- [34] 张彩霞,马跃.从河北农村民生调查现状看未来农村发展对策[J].河北企业,2018(10).
- [35] 刘秀艳,辛阳,韩景豹.河北省休闲农业支撑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J].河北农业科学,2018(05).
- [36] 康广.河北省农村居民贫富差距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03).
- [37] 谭玉霞,崔冬雪,高峰,刘建立,李艳军,贾文莉,李亚光,王珊珊.河北省部分城市老年人体育锻炼与生活幸福指数的相关性[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03).
- [38] 佟林杰,杨慧谦.河北省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问题研究[J].河北企业,2018(11).
- [39] 刘丽丽,郑如斌.河北职业教育供给改革中的应用型人才供给改革探讨[J].知识经济,2018(09).
- [40] 李春林,刘丽丽.河北省本科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基于2012-2016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数据的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8(02).
- [41] 刘桂贤,刘庆芳.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公共教育服务共建共享对策研究[J].才智,2018(31).
- [42] 刘为影.河北省农村幼儿园特色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基于城乡协同发展的背景[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01).
- [43] 杨亚青,国万忠.河北省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以河北省保定市张马庄小学为例[J].西部素质教育,2018(07).
- [44] 孙慧佳.“双一流”背景下河北省高等教育发展策略优化研究[J].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2018(13).
- [45] 齐艳杰,薛彦华.论“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河北省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05).
- [46] 刘晓慧.终身教育背景下河北省社区老年教育的发展对策研究[J].教育现代化,2018(17).
- [47] 孙怡.河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问题探讨[J].教育观察,2018(01).
- [48] 左海云,李春晖,郗红英.河北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与对策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8(19).
- [49] 杨胜利,王伟荣,李鑫.河北省劳动力资源现状与就业特征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3).
- [50] 张亚艳,徐东海.大数据背景下的河北省残疾人就业分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15).
- [51] 李林,郭赞,郭宇畅.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与探索[J].金融理论探索,2018(01).
- [52] 刘海啸,赵美颖.大病保险筹资标准及保障水平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华北金融,2018(07).
- [53] 马明,申淑芳,姜彦飞.河北省以众包商业模式完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对策研究[J].社会政策研究,2018(04).
- [54] 张悦玲,刘秋月.河北省贫困山区农村养老保障的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18(03).
- [55] 李茂.河北省农村养老模式的现实选择及完善路径[J].经济论坛,2018(11).
- [56] 贾丽凤,陈曦,张焘.河北对接北京异地养老发展问题研究——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J].科技视界,2018(09).
- [57] 高秀春,张继方.河北省养老服务产业链关键环节及影响因素分析[J].管理观察,2018(32).
- [58] 王冬梅.河北省智慧养老产业发展路径探析[J].保定学院学报,2018(04).
- [59] 吴雪娟,窦丽琛,付艳涛.以“物业+”养老融合模式推进河北省城镇“居家养老”服务落实[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11).
- [60] 王红英.社会治理视阈下如何推进城市社会工作发展——以石家庄市社会工作发展为例[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8(08).
- [61] 陈慧谦,王建军,赵会珍,冯皓莉.河北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途径选择[J].管理观察,2018(13).
- [62] 田静.河北省城乡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机制研究[J].图书馆学刊,2018(01).
- [63] 杨星,吴瑞红,张忠新,王文锐,孙泽堂.河北省农民需求的体育公共服务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8(27).
- [64] 杜英,张建新,耿惠,淮丁华,安惠彦.河北省贫困县县级医疗机构卫生资源配置现状及解决策略——以阜平县为例[J].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2018(10).
- [65] 陈璐.依托“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加快推进河北与京津协同发展[M].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19),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 [66] 李岚,黄贺林,梁世雷,苏凤虎,闫永清.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15).
- [67] 祝尔娟,叶堂林,毛若冲.京津冀协同指数研究[M].京津冀发展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7月.
- [68] 王双,崔丽红.京津冀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突破领

- 域[M].京津冀协同发展报告(2019),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 [69]王德利.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思路[J].开放导报,2018(03).
- [70]丁波,阎东彬,司秋利.京津冀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8(21).
- [71]王振坡,朱丹,王丽艳.区域协同下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8(06).
- [72]赵金丽,张璐璐,宋金平.京津冀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特征[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02).
- [73]刘斌,牛利娜.京津冀城市群如何实现协同发展与跨区域治理[J].前线,2018(04).
- [74]田翠琴,赵乃诗,赵志林.京津冀环境保护历史、现状和对策[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3月.
- [75]张贵祥,赵琳琳,葛以恒.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模式与机制[M].京津冀发展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7月.
- [76]刘广明,尤晓娜.京津冀区际生态补偿制度构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8月.
- [77]包庆德,梁博.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的生态维度考量[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
- [78]张红兵,张淑莲.论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的问题与对策[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06).
- [79]史丹,李少林.京津冀绿色协同发展效果研究——基于“煤改气、电”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11).
- [80]王丽,宫宝利.京津冀区域生态空间协同治理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05).
- [81]韩兆柱.京津冀生态治理的府际合作路径研究——以网络化治理为视角[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18).
- [82]王玉明,王沛雯.京津冀城市群环境治理合作的探索路径[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
- [83]李冬.京津冀地区公共服务质量评价[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02).
- [84]张贵,薛伊冰.协同论视阈下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05).
- [85]宋文新.以共享发展理念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N].河北经济日报,2018-05-30.
- [86]陈志国,户艳领,周稳海,王朋岗,袁清川,席增雷,孙春生.促进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15).
- [87]薛二勇,刘爱玲.京津冀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优化的政策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8,(08).
- [88]张拥霞.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养老产业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8年5月.
- [89]杨晖,贾海丽.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的“燕达模式”研究[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04).
- [90]吕天宇,李晚莲,卢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横向府际合作机制现状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8(04).
- [91]张子雪.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绩效差异的实证分析[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8(03).
- [92]王小春,孔金平.供需视角下保障性住房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8(04).
- [93]张晓微,刘萍,武志朋.基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河北省城市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研究[M].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
- [94]梁林,赵玉帛,刘兵.京津冀城市间人口流动网络研究——基于腾讯位置大数据分析[J].西北人口,2019(01).
- [95]周进.京津冀地区的功能布局调整与人口发展[J].新视野,2018(01).
- [96]陈明星,郭莎莎,陆大道.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特征与格局[J].地理科学进展,2018(03).
- [97]纪凤仪.京津冀主要城市城际间人口流动倾向空间特征——基于网络关注度数据的时空演化分析[J].保定学院学报,2018(03).
- [98]张建国.以开发区为载体合力打造京津冀人才新高地[N].人民政协报,2018-12-21.
- [99]王艳霞,邢明强.京津冀区域视域下提高河北人才竞争力的对策[J].经济论坛,2018(12).
- [100]席增雷,袁青川,徐伟.基于 Malmquist-TFP 模型的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经济效率评价[J].宏观经济研究,2018(07).
- [101]苑泽明,张永贝,宁金辉.京津冀高校科研创新绩效评价——基于 DEA-BCC 和 DEA-Malmquist 模型[J].财会月刊,2018(24).

河北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高 智 梁世雷

2018年河北省生态文明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等方面,与往年研究相比,更加关注京津冀生态环境

协同,更加注重理论和实证相结合,更加聚焦热点难点问题,研究总体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所提对策建议更具参考和应用价值。

一、生态建设

(一) 生态文明

牟永福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破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立的传统思维,深刻阐明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的认识,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努力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文化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必须强化生态红线意识,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构建低碳高效的生态经济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1]

陈秀梅指出,环境群体性事件在经历了酝酿、发展、爆发后,最终都会平息,但是,善后工作并没有结束,环境问题也不会自然而然解决。提高环境群体性事件善后处置能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领导干部针对事件发生的根源,查找工作中的问题,深刻反省,切实增强环境治理现代化能力,防止环境群体性事件反弹。一是要严格用法,落实诺言,提高化解风险能力;二是要吸取教训,反思工作,提高服务群众能力;三是要引导舆论,稳定情绪,提高监管舆情能力。^[2]

赵艳芹等人认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河北省被定位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这既是一项艰巨的环保任务,又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河北省要在十九大精神指引下,从本省实际出发,弘扬“塞罕坝精神”,加快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为区域源源不断地输送和提供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和康养的圣地。一是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联动机制和长效体制机制;二是积极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活动,着力培育社会生态文明意识;三是依靠绿色科技创新体系,谱写河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3]

张俊娜指出,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和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一样,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只有探索符合河北省情的生态文明建设途径,生态美的河北才能尽快呈现,文化品牌“美丽河北”才能树立,才能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撑。河北推进“美丽河北”文化品牌视阈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一是加强管理,在考核问责体系上下功夫;二是聚焦问题抓要害,大力推进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三是加强对民众生态意识的培育,保障公众对环境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4]

胡悦等人对京津冀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认为,京津冀地区生态文明水平北京市排在第一位,天津市排在第二位,河北省处于最低水平,且与京津两地差距非常大。京津冀三省市要解决当前的生态问题,一是要立足自身优势,寻找解决途径;二是要摆脱属地主义,走向合作之路;三是要配套市场力量,建立长效机制。^[5]

左守秋、陶磊认为,要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生态文明的典范,打造成为国家级生态文明试验区,需要立足于京津冀生态文明合作共建的大格局。京津冀三地应根据国家对雄安新区的定位,在已有的合作共建基础上,把雄安新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新的重点领域,制定新制度、新规划、新举措,开展深入科学合作。必须遵从党中央的统一要求和部署,立足大局,抛弃狭隘的地方利益思维,对雄安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人财物等资源支持。^[6]

(二) 生态环境

张迪妮、李磊认为,建成“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应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一步,重中之重,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2022年将在北京和河北张家口举办的冬奥会,将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提供难得的契机和抓手。冬奥城市张家口要遵循绿色奥运的理念,推进低碳经济示范区建设,实施最严格的环境治理。通过优化生态建设的“零碳”配置,推行生态建设的“零碳”措施,注重生态建设的“零碳”营造,使张家口市成为京北“保水源、堵沙源、送清风”的绿色生态屏障,向世界展现张家口植物零碳景观森林城市形象。^[7]

王娟、邓立建指出,目前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域之间立法联动进程迟缓,京津冀三地缺乏系统的立法决策机制,迫切需要打造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环保协同立法体系。因此,要在坚持区域整体生态利益原则的基础上,严格立法人员的组成结构和程序,建立有效的联动联防机制。

要在统一的立法标准下,充分利用各区域特点,灵活运用地方立法权。要发挥立法的引领作用,在生态环境支撑区立法时更加注重生态涵养、生态补偿等方面的问题,以预防在实行过程中出现矛盾激化的现象。^[8]

王彦芳等人通过对河北省生态环境支撑区植被覆盖动态及其可持续性进行研究,提出了各生态支撑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京津保中心区生态过渡带应合理规划,扩大生态空间。坝上高原生态防护区应坚持生态优先,筑牢绿色屏障。燕山—太行山生态涵养区应修护并举,建设绿色保障。低平原生态修复区应调整农业,恢复生态环境。海岸海域生态防护区应合理开发,加速绿色崛起。^[9]

张蕊认为,保定要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历史机遇,明确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的重点和难点,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为切入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and 建设,建立“结构稳定、功能完备”的生态环境支撑体系。一是深化污染治理措施和生态修复,系统强化环境保护工作;二是加快产业升级,推动产业承接,深入推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三是优化投资结构,助推产业升级,提升环保领域资金保证能力;四是转变观念,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切实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10]

王彦芳、裴宏伟就河北坝上地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坝上防风固沙的生态功能状况指数平均值为 54.67,自然生态一般,存在一定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功能相对较脆弱。其中,1980—2000 年坝上地区防风固沙生态功能略微变差,2000—2015 年则有明显的改善,这主要是受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未来应坚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加大资金和科技投入,发展生态经济,不断提升坝上防风固沙生态功能,构筑科学合理的生态屏障;通过完善政策,创新体制,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11]

张爱国等基于 PSFR 模型,对河北省滦河流域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整个流域的生态安全水平位于三级到二级之间,总体生态安全程度不高;潘大水库上游评估单元刚刚达到二级较安全水平;引滦入津、大黑汀下游和青龙河秦皇岛评估单元属于三级水平;冀东沿海的秦皇岛和唐山评估单元生态安全指数较低,属于三级一般水平。其中,水资源过度开发是各评估

单元共有的不安全因素,农村面源污染严重、有毒有害有机物浓度过高、水源涵养能力降低是造成流域生态安全指数不高的重要原因。^[12]

王大本、冯石岗认为,河北省水资源承载力无论是综合发展水平,还是系统整体协调程度都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为继续保持这一发展态势,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提高工业用水效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加强农业节水灌溉,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三是大力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提高生活用水效率;四是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政府引导;五是注重市场调节,促发节水内生动力;六是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公众节水意识。^[13]

胡悦等人指出,应通过影响京津冀三地要素、资源的流向和分配,引导京津冀的技术和产业发展,实现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缓和与优化生态环境,最终实现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就生态环境而言,应制定针对性的生态补偿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权衡污染防治投入与效益,建立长效的环境治理机制。^[14]

王淑佳等人认为,京津冀三地具有互相耦合与牵制的紧密内在联系,要实现京津冀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须站在区域宏观视角,将京津冀三地作为整体,优势互补谋划未来发展战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进过程中,应以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来评估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通过评估结果分析各地发展优劣势,避免再次走上盲目扩张之路。^[15]

赵慧峰指出,实现乡村振兴,不仅要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还要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目前,河北省农村人居环境还存在空心村治理、宅基地置换、厕所和厨房改造、垃圾处理、能源利用等一系列问题,必须持续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环境治理,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增值,改善农民生活环境,打造美丽宜居生活家园。^[16]

解丹、张铭昊认为,张家口怀安地区碓窰民居具有独特的工艺与奇特的景观,蕴含深厚的文化价值,是兼具经济性和生态性的绿色建筑。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建造技术的更新,这种古老的生土建筑形式面临传承的危机。因此,应根据原

有的建造技艺,运用现代建造手法,结合现代技术手段,针对采光、通风、潮湿、结构稳定性四个方面实施改造,使窑洞既满足现代村民对于居住环境的需求,又能使建筑形式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17]

(三) 生态经济

孙芳等人认为,规模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政策因素对京津冀生态涵养区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建议:一是继续实施绿化工程与退耕还林还草,加强生态项目建设;二是适度扩大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规模,实现产业规模经营效益;三是多方筹集资金,加大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的投资力度;四是推行资源节约型生产创新模式,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五是健全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激励制度,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偿。^[18]

王立源指出,河北坝上历史上人口的增长造成耕地面积不断扩张,过于频繁的农业开发活动给水资源供给带来压力,严重的水短缺致使坝上生态环境趋向脆弱,可以说,人口和耕地是影响坝上生态环境的关键因素,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有效手段是有序推进农业人口退出。因此,要通过争取更多资金支持,保障退出人口权益,落实后续生活保障,创新体制机制,妥善处理矛盾等系列措施,保障人口和耕地退出,在坝上欠发达地区建设生态高地,探索出一条生态发展新路。^[19]

王文录认为,坝上地区是京津冀的重要生态屏障,但受传统发展理念影响,坝上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生态承载能力几乎达到极限。因此,必须树立新发展理念,以全区域生态保护为总目标,重构坝上生态经济体系,真正把坝上建设成生态经济高地。具体应从五个方面着力:一是切实落实水源地保护、防沙治沙和退耕还草还林三大生态修复工程;二是积极退出人口和耕地,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生态干预;三是控制产业规模为目标,多措并举生态经济;四是充分利用国家专项政策,协同推进生态“共建区”建设;五是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依托生态补偿保障坝上居民的整体利益。^[20]

李研、张大红就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出两点结论,一是林业产出对于资本要素投入更加敏感,增加林业资本要素投

入可以有效拉动林业产出,因此,可通过提升林业资本利用效率来进一步促进林业经济的增长;二是林业经济已经进入依靠技术进步拉动林业产出增长的阶段,技术进步对于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明显超越林业资本要素投入和林业劳动要素投入,因此,林业经济的未来发展应该主要依托林业生产技术的创新与进步。^[21]

陈薇、杨帆认为,威县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构建,应通过畜牧业这一核心产业的发展带动种植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同时将废弃物转换形成新的环保产业,使处理负担转化成经济效益。在威县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因其产业链不同的共生模式,主体间的共生关系表现为离散型、依附型、整体型三种状态。随着共生关系的发展,各主体的获益程度不断加强,其中,“种植-养殖-微生物处理-种植”这一整体型共生模式因其主体可以共同获益,受益最大。^[22]

(四) 生态补偿

尤晓娜、刘广明指出,京津冀流域存在一体性与跨区域性、流域内环境资源分配与生态利益分享的不公性、流域生态空间的有限性与环境保护的严峻性等一系列问题。应构建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其具体路径是:一是遵循权义公平配置、平等互利以及“谁受益谁补偿,谁保护谁受偿”等基本原则;二是应秉持政府主导的基本模式;三是着重解决区际生态补偿主体厘定、区际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以及区际生态补偿方式确定等关键性问题。^[23]

杜哲等人认为,生态环保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率先突破领域,而构建生态补偿与生态协同的区域合作机制,是京津冀生态环保一体化的基础。为此,京津冀三省市应建立政府主导、市场配置资源和社会公众参与的生态补偿协同体系,一是建立区域生态协同综合管理体制;二是通过政府和市场手段,实施“造血式”补偿模式;三是引入公众参与机制,加强社会公众的参与、协商与监督;四是建立健全生态资源、生态产品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评估机制。^[24]

王彦芳认为,河北坝上地区是京津冀重要生态支撑区和水源涵养区,是京津冀的绿色生态屏障。作为“生态输出”地区,坝上地区亟待通过生态补偿获得持续发展。坝上生态补偿方案的构建,要涵盖生态工程、人口退出、农业退出、

发展机会等各个方面；要覆盖坝上地区、坝上各县、家庭三个层次；要重视对农业和村庄退出进行补偿，尤其是生态敏感区、极端干旱区的农业退出补偿；要建立以国家补偿为主，地方间横向补偿为辅的生态补偿金分担机制。^[25]

魏强等人认为，生态扶贫围绕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实现展开，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是贫困家庭参与生态产业建设的动力源泉。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应识别生态系统服务对不同类型贫困家庭和生态系统服务消费者福祉状况的影响差异，并逐步推行差异性、多元化的支付标准与支付方式。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生态扶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扶贫效果在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显现，为此，应努力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长效机制，避免短视行为和不可持续问题。^[26]

二、环境保护

(一) 污染协同治理

孟庆瑜、梁枫指出，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预期目标的实现。目前，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呈现出良好的民意基础和强烈的参与意愿，应顺势而为，精准施策，充分依靠法治创新，持续推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一是探索形成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协同立法的新机制；二是合力构建京津冀区域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共治新格局；三是协调推进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司法合作的新模式；四是稳步推动京津冀跨地区生态保护补偿的新发展；五是加强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宣传引导。^[27]

王健伟、温亚红认为，财政税收政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没有独立的环境治理税种，资源税税制尚不合理，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已不能满足治理环境的需要。应通过开设新的税种，完善资源税制度，推行排污“费改税”制度等，利用税收政策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治理。^[28]

乔颖丽、王馨玮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框架中，亟待构建生态协同发展的利益机制与模式，解决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面临的困境。而跨域治理理论倡导的去科层制的扁平网络化协同治理关系，适用于解决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问

题。因此，应基于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的特点，在中央政府整体调配全区域资源前提下，构建三省市各级政府积极驱动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网络化互动的治理模式，形成中央政府统领下的权力线与扁平化相结合的跨域治理机制与途径。^[29]

俞会新、林晓彤运用 EBM 超效率模型，对京津冀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呈逐年递减趋势，科技水平、资金管理水平和环境政策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有直接影响，科技水平越高、资金管理越完善、环境政策越合理、环保产业自身发展水平越高，京津冀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值就越大。因此，应努力提高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水平，加强对环境污染治理资金和设施的有效监管，发挥经济手段在提高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中的作用。^[30]

王大本、刘兵研究指出，通过多年防控治理，京津冀地区大气环境承载力水平整体上呈上升发展态势，但影响各地区大气环境承载力水平的要素和因素存在差异。因此，京津冀地区应在巩固良好发展态势的基础上，做好如下工作：加强京津冀地区政府之间的协同配合，完善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继续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加强清洁能源的使用和消费；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的科学化进程，增强大气环境管理决策的科技支撑；注重建立健全经济政策，借助经济手段提高大气污染防治能力；切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工作，不断提高公众大气资源环保意识。^[31]

金浩、李瑞晶基于组合评价法对京津冀区域治理绩效进行了评价。认为京津冀各地市治理绩效呈现“一家独大、差异明显”的特点，北京市治理绩效远远优于其他城市，区域内部存在着较大差异。实现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弥补河北省部分城市的治理短板。^[32]

闫华荣等人认为，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空气治理上的理念推进京津冀地区雾霾治理，应注重环保立法理念的更新，强化标准制度的可执行性；注重京津冀协同治理，强化立法执法的协同性；注重公众监督机制，强化公众环境治理的参与度。^[33]

(二) 河北污染防治

郑国娟、陈新华以河北为例分析了大气污染

的源头,认为铁路货运量占比太小、公路货运占比太大是一个重要来源。为此建议:河北及周边地区应转变交通运输设施的建设思路,大力发展高铁、铁路客运专线及同周边省市区密集联接的普通铁路货运轨道交通网络,同时减少高速公路及普通公路建设比重,逐步压缩汽车货运空间,大幅度提高绿色轨道交通货运比例。^[34]

徐慧、刘丰指出,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存在着决策程序不透明、诉求渠道不畅通等问题。因此,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的参与权是极为重要的。虽然在宪法和法律中对环境公众参与权均有规定,但是在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方面仍存不足,需要进一步落实和扩大环境信息公开范围,明确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途径和程序,降低诉求门槛。^[35]

金书秦等人认为,做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应立足新时代,顺应新形势,落实新理念。一是完善农业面源监测和统计体系,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二是加强过程管理,推行“最佳管理实践+负面清单”制;三是以流域为单元,实施点源和面源一体化管理;四是鼓励开展机理研究,揭示农业生产、污染排放、环境质量变化之间的科学关系。^[36]

白杰认为,河北省在水污染处理上,水污染处理企业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将发展工艺向除磷方面倾斜,增强处理效率,改进工艺,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减少投入成本。同时,企业内部要加强经营管理,加强与政府沟通,加快资金到账速度;重视培养人才,加强员工队伍建设。政府要加大支持力度,重视污水处理厂投产建设,对污水处理进行合理规划、科学指导,增强整体治理能力。^[37]

卢彦琦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法,研究了农户对土壤污染防治的支付意愿。研究发现,家庭所在地域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家庭年纯收入和年龄,再次是受教育程度,影响最小的是性别。应针对农户不愿意支付的主要原因,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通过政府扶持,引导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并积极与电商联姻,开辟出一条群众脱贫创收新路径,切实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二

是加强监督审计和行政监察问责,促进各级政府部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三是加强宣传,让农户树立土壤污染防治意识。^[38]

三、低碳发展

赵红亮认为,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具体应做好以下方面:一是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重点纳入全省总体规划;二是借鉴国内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成功经验,建立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保障体系,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三是通过实行减免税收、财政补贴、绿色信贷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行低碳创新、节能减排、使用可再生能源,推进环保产业、节能产业、减排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四是加强监管力度,建立健全低碳经济监测和考核体系。^[39]

何永贵、于江浩认为,河北要减少碳排放,应基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视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一是提高能源节约和技术水平,降低煤炭等高排放能源的消费比例,增加清洁能源的消费比例;二是综合考虑人口和经济因素,推动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相协调,最大限度减少碳排放;三是逐渐降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加速发展服务业,提高低碳产业发展能力和水平。^[40]

黄祖光认为,河北省城镇化发展中要走低碳路线,必须构建适合当地发展实际的低碳模式,探索低碳城镇化发展路径。一是对能源结构做出调整,实现能源消耗多元化;二是对产业结构做出调整,做到低碳产业体系化;三是强化城镇化发展内在质量,实现低碳城镇化;四是按照低碳城镇化发展目标,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41]

董博等人指出,京津冀发展区域低碳物流离不开区域协同运作。京津冀物流协同发展不仅要解决区域城市物流发展问题,更要在我国促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中成为样板。实现京津冀区域物流业低碳发展,需要推动区域物流与区域经济、区域环境之间的协同,以及区域物流产业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协同,提高区域物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42]

王韶华等人认为,近年来京津冀经济重心和能源强度重心向反方向移动,东部各市能源强度下降速度低于西部,南部各市经济增长速度快于

北部。进一步降低京津冀能源强度，应从以下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一是因地制宜，重点降低北部各市能源强度；二是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加快工业化进程，降低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依赖；三是加强清洁高效能源对煤炭的替代，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43]

张立华等人指出，从唐山市“港口经济—低碳经济”复合系统看，当前唐山市港口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为推动原材料工业，对高端制造业支持不够，港口发展与低碳经济之间尚未形成理想的互动机制，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唐山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唐山市发展“港口经济—低碳经济”复合系统，必须打破目前的锁定状态，在港口经济方面，积极发展集装箱运输，为高端制造业提供物流载体；在低碳经济方面，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着力推动工业转型升级，为港口提供适箱货源，进一步提高港口经济与低碳经济的复合共生水准。^[44]

四、绿色发展

孙静茹认为，绿色发展是经济增长新的突破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推动绿色发展，既要注重经济绿色化，也要注重绿色经济化。发展绿色经济，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要通过制度与政策的协调，使持续性的资源环境成为生产力；要抓住生态系统循环发展的着力点，保护生态平衡；要贯彻落实绿色发展考核、惩戒机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进一步增强公民环保意识，让绿色发展观念深入人心。^[45]

陈胜开、张云凤指出，对河北而言，绿色发展是新时代建设经济强省、实现全面小康、创建美丽河北的必然要求，是一个必须要遵守的发展战略。实现河北绿色发展，需要从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共同发力。一是加快绿色经济发展，促进河北经济跨越式提升；二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确保打赢河北蓝天保卫战；三是加速社会公平体系建设，确保河北实现全面小康。^[46]

马亚宾等人认为，雄安新区的设立和冬奥会的筹办，为河北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未来河北省农牧业生产，不仅要做到高品质农产品与畜禽产品的生产，还要兼顾生态环境保护，构建形成“绿色饲料—绿色

饲养—绿色环境—绿色产品”的全产业链绿色农牧一体化生产模式。这就要求河北必须坚持国际对标，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谋划，细微入手，着力推进绿色农牧一体化发展，加强养殖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整县、全流域和全市，甚至全省推进。^[47]

孟庆瑜等人指出，清洁生产强调整个产品生命期的污染控制和能耗最小化，是解决河北省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和最佳模式。因此，应制定《河北省清洁生产促进条例》，为推动全省清洁生产提供法律依据和立法保障。河北省清洁生产立法，应以解决清洁生产中的突出问题为宗旨，理顺清洁生产地方立法与相关立法的关系，坚持三大产业全覆盖、京津冀协同发展等立法原则，针对清洁生产行政管理、清洁生产审核等关键环节作出制度安排，并完善清洁生产教育、培训、融资等方面的配套制度。^[48]

(高智：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梁世雷：河北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参考文献：

- [1] 牟永福.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N]. 河北日报, 2018-07-20.
- [2] 陈秀梅. 生态文明建设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N]. 河北日报, 2018-11-13.
- [3] 赵艳芹, 王兆云, 樊东霞. 新时代背景下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J]. 经济论坛, 2018(3).
- [4] 张俊娜. “美丽河北”文化品牌视阈下的生态文明建设[J]. 河北企业, 2018(2).
- [5] 胡悦, 金明倩, 王溧, 孙丽. 京津冀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18(5).
- [6] 左守秋, 陶磊. 京津冀协同推进雄安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J]. 人民论坛, 2018(5).
- [7] 张迪妮, 李磊. 冬奥会：“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建设的契机和抓手[J]. 重庆大学学报, 2018(3).
- [8] 王娟, 邓立建. 打造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环保协同立法问题研究[J]. 法制与经济, 2018(1).
- [9] 王彦芳, 刘敏, 郭英. 1982—2015年河北省生态环境支撑区植被覆盖动态及其可持续性[J]. 林业资源管理, 2018(1).
- [10] 张蕊. 保定市构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的对策研究[J]. 区域经济, 2018(10).
- [11] 王彦芳, 裴宏伟. 1980—2015年河北坝上地区生态环境状况评价与对策研究[J]. 生态经济, 2018(1).
- [12] 张爱国, 张秀雯, 陈国鹰, 王月锋, 李橙, 马雄飞, 吴亦红.

- 基于 PSFR 模型的河北省滦河流域生态安全评估[J].安全与环境学报,2018(3).
- [13]王大本,冯石岗.基于 WSR 方法论和熵值-耦合协调度的水资源承载力综合评价—以河北省水资源承载力研究为例[J].节水灌溉,2018(3).
- [14]胡悦,刘群芳,陈国鹰.京津冀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9).
- [15]王淑佳,任亮,孔伟,唐淑慧.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经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8(10).
- [16]赵慧峰.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乡村振兴的关键[J].农业经济问题,2018(5).
- [17]解丹,张铭昊.冀北窑窑民居的生态节能改造与传承[J].建筑节能,2018(10).
- [18]孙芳,韩江雪,王馨玮,王怡然.京津冀生态涵养区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5).
- [19]王立源.农业人口退出:河北坝上生态经济发展的科学抉择[J].经济论坛,2018(10).
- [20]王文录.构建河北坝上生态经济新高地[J].经济论坛,2018(10).
- [21]李研,张大红.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15).
- [22]陈薇,杨帆.基于共生理论的威县农业循环经济产业链主体行为分析[J].农业经济,2018(8).
- [23]尤晓娜,刘广明.京津冀流域区际生态补偿制度之构建[J].政府与经济,2018(2).
- [24]杜哲,陈哲思,闫丰,马鹰.京津冀区域生态补偿与生态协同机制研究[J].山西农经,2018(13).
- [25]王彦芳.河北坝上地区生态补偿方案研究[J].经济论坛,2018(10).
- [26]魏强,吕静,吕子晔.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与生态扶贫的价值基础[J].经济论坛,2018(8).
- [27]孟庆瑜,梁枫.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反思与制度完善[J].河北法学,2018(2).
- [28]王健伟,温亚红.京津冀环境协同治理中的财税政策研究[J].河北企业,2018(5).
- [29]乔颖丽,王馨玮.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的跨域治理模式与机制[J].南方农村,2018(2).
- [30]俞会新,林晓彤.京津冀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8(5).
- [31]王大本,刘兵.区域大气环境承载力评价—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环境工程,2018(10).
- [32]金浩,李瑞晶.基于组合评价法的京津冀区域治理绩效评价[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2018(2).
- [33]闫华荣,王慧娟,段妍.国外空气治理立法对京津冀雾霾治理的经验借鉴[J].邢台学院学报,2018(4).
- [34]郑国娟,陈新华.换个思路 改善大气环境—河北大气污染治理引发的决策思考[J].中国领导科学,2018(4).
- [35]徐慧,刘丰.论我国环保公众参与权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J].邢台学院学报,2018(4).
- [36]金书秦,韩冬梅,牛坤玉.新形势下做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探讨[J].观察,2018(5).
- [37]白杰.河北省污水处理行业发展策略研究[J].河北企业,2018(2).
- [38]卢彦琦,李焱,薛晴.基于 CVM 的河北 8 市农户对土壤污染防治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18(2).
- [39]赵红亮.生态优先与河北低碳经济发展研究[J].工程技术,2018(4).
- [40]何永贵,于江浩.河北省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变化趋势研究[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8(1).
- [41]黄祖光.河北省低碳城镇化发展路径探讨[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8(2).
- [42]董博,董康成,韩均瑾.京津冀区域物流业低碳协同要素及其关联度研究[J].热点透视,2018(5).
- [43]王韶华,刘琳,张伟.京津冀能源强度及其影响因素重心演变时空特征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8(10).
- [44]张立华,李南,史宝娟.沿海城市“港口经济—低碳经济”共生的定量评价—以唐山为例[J].生态经济,2018(4).
- [45]孙静茹.践行生态文明观 实现绿色发展[J].人民论坛,2018(6).
- [46]陈胜开,张云凤.新时代河北绿色发展的现实必要性与突破策略[J].河北企业,2018(6).
- [47]马亚宾,倪俊卿,马林,王选.河北创新利用畜禽废弃物资源推进绿色发展[J].中国畜牧业,2018(24).
- [48]孟庆瑜,张思茵,欧钰娟.河北省清洁生产立法问题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8(4).